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十卷

1963.1—1964.11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十卷

1963.1—1964.11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1963 年

№25607,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通报中蒙边界谈判情况
1963 年 1 月 1 日 …… 11
№1384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起草答复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 年 1 月 2 日 …… 17
№1384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致函中国领导人
1963 年 1 月 29 日 …… 18
№20798,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提交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3 年 2 月 14 日 …… 19
№1384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修改致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 年 2 月 15 日 …… 23
№2079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重新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 年 2 月 15 日 …… 24
№21502,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
1963 年 2 月 23 日 …… 24
№24299,齐宾致苏共中央报告：利用老挝国王到达北京之机对其表达谢意
1963 年 3 月 11 日 …… 36
№1384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欢迎毛泽东或中共代表团访苏
1963 年 3 月 12 日 …… 37
№2191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文
1963 年 3 月 13 日 …… 38
№16675,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权对边界问题的无理要求
1963 年 3 月 21 日 …… 39
№13733,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总理希望会见苏联国防部长
1963 年 3 月 24 日 …… 42
№23458,莫斯科夫斯基与莫拉维克谈话纪要：苏联的核保护伞
1963 年 4 月 15 日 …… 44
№1039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做出反应
1963 年 4 月 16 日 …… 44

№1384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委托副外长召见中国大使
1963年5月3日 …… 45
№16681，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向苏联散发宣传手册
1963年5月4日 …… 46
№09903，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
1963年5月17日 …… 46
№1384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答复中国
1963年6月10日 …… 67
№1039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3年7月6日 …… 68
№08107，苏中两党会谈第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发言
1963年7月6日 …… 69
№08108，苏中两党会谈第二、三次会议记录：邓小平发言
1963年7月8日 …… 100
№13011，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1963年7月10日 …… 119
№08109，中苏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0日 …… 120
№08110，苏中两党会谈第六次会议记录：邓小平的发言
1963年7月12日 …… 140
№08111，中苏两党会谈第七次会议记录：波诺马廖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3日 …… 157
№13012，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
1963年7月15日 …… 172
№13013，泽登巴尔致西伦凯维兹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1963年7月15日 …… 173
№08112，中苏两党会谈第八次会议记录：彭真的发言
1963年7月15日 …… 174
№08113，中苏两党会谈第九次会议记录：安德罗波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7日 …… 192
№24296，多布罗拉德尼克致苏共中央总务部函：提交中共中央的几份声明
1963年8月10日 …… 207
№08114，中苏两党会谈第十次会议记录：康生的发言
1963年7月19日 …… 211
№08115，中苏两党会谈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发言

1963 年 7 月 20 日 ………………………………………………………… 227
№1384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公开交手的时刻已来临
1963 年 7 月 23 日 ………………………………………………………… 232
№1384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对中共进行反击
1963 年 9 月 10 日 ………………………………………………………… 233
№1384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谈中苏关系
1963 年 9 月 10 日 ………………………………………………………… 234
№25580 ,洛马科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希望苏联工人接替中国工人
1963 年 9 月 13 日 ………………………………………………………… 239
№25623,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议纪要：通报中共的分裂活动
1963 年 9 月 17 日 ………………………………………………………… 240
№25624,契尔沃年科与费伦茨会谈纪要：对中苏论战的反应和评论
1963 年 9 月 18 日 ………………………………………………………… 241
№25625,契尔沃年科与绍伊奇会谈纪要：中国最近向中苏边界调兵
1963 年 9 月 20 日 ………………………………………………………… 243
№24295 ,库兹涅佐夫致波诺马廖夫报告：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1963 年 9 月 23 日 ………………………………………………………… 244
№23051,普拉特科夫致苏斯洛夫函：提交即将发表的批评中共的文章
1963 年 9 月 24 日 ………………………………………………………… 260
№25626,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会谈纪要：罗马尼亚不赞同中共的做法
1963 年 10 月 3 日 ………………………………………………………… 263
№25628,契尔沃年科与法特万会谈纪要：关于艾地对中国的访问
1963 年 10 月 16 日 ………………………………………………………… 264
№13734,贝内迪克托夫与鲍尔斯会谈纪要：中国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
1963 年 10 月 18 日 ………………………………………………………… 265
№1385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如何应对周恩来的讲话
1963 年 10 月 21 日 ………………………………………………………… 267
№2079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会议而采取的措施
1963 年 10 月 23 日 ………………………………………………………… 267
№21925,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问题
1963 年 10 月 22 日 ………………………………………………………… 270
№1039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
1963 年 10 月 25 日 ………………………………………………………… 271
№1385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
1963 年 11 月 10 日 ………………………………………………………… 271

№1385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给毛泽东的信
1963 年 11 月 26 日 …… 275
№25630,契尔沃年科与索苏尔巴拉姆会谈纪要：中蒙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1963 年 11 月 28 日 …… 276
№10397,波诺马廖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言论
1963 年 12 月 …… 277
№10396,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裂
1963 年 12 月 …… 289
№10395,伊利切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
1963 年 12 月 …… 300
№23016,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
1963 年 12 月 13 日 …… 311
№09905,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草案)：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
1963 年 12 月 13 日 …… 328
№23017,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记录：讨论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1963 年 12 月 13 日 …… 330
№20821-5,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阿法纳西耶夫的讲稿
1963 年 12 月 13 日 …… 331
№09904,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印发波诺马廖夫等人在中央全会的讲话
1963 年 12 月 16 日 …… 332

1964 年

№25531,黑根与邓小平谈话纪要：中苏分歧与政治论战
1964 年 1 月 14 日 …… 334
№25780,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
1964 年 1 月 14 日 …… 335
№25530,契尔沃年科与黑根会谈纪要: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
1964 年 1 月 25 日 …… 338
№25533,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1964 年 1 月 28 日 …… 338
№20278,外交部远东司呈送的备忘录：中国领导人对蒙古的要求
1964 年 1 月 30 日 …… 339
№10400,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节录)：关于中苏关系部分
1964 年 2 月 14 日 …… 341
№25777,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苏联的对外援助

1964 年 2 月 14 日 …… 346
№25776,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
1964 年 2 月 15 日 …… 347
№23019,韦尔边科致赫鲁晓夫函：拉丁美洲人民拥护苏联
1964 年 2 月 15 日 …… 348
№23020,别图霍夫致苏斯洛夫函：如何答复中国寄来的贺信
1964 年 2 月 15 日 …… 350
№25534,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苏共要求停止公开论战
1964 年 2 月 18 日 …… 350
№25774,甘科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中国在火车上散发反苏传单
1964 年 3 月 23 日 …… 351
№1039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4 年 4 月 13 日 …… 352
№25762,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古巴进行宣传活动
1964 年 4 月 14 日 …… 352
№25790,苏联驻印尼使馆致苏共中央报告：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工作
1964 年 5 月 29 日 …… 353
№21930,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来信的回复
1964 年 6 月 1 日以前 …… 354
№21931,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草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共运的立场
1964 年 6 月 1 日以前 …… 355
№21932,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草案)：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回信
1964 年 6 月 1 日以前 …… 366
№1385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
1964 年 6 月 4 日 …… 366
№20800,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来信的答复
1964 年 6 月 4 日 …… 368
№10399,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述苏中边界历史问题
1964 年 6 月 8 日 …… 368
№23047,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宣传
1964 年 6 月 24 日 …… 369
№21934,赫鲁晓夫的口述记录：对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思考
1964 年 6 月 27 日 …… 371
№2193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制定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
1964 年 8 月 19 日 …… 373

№13854,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苏边界问题
1964 年 8 月 19 日 …… 373
№25973,帕杰尔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关于美国旅游公司的情况
1964 年 8 月 29 日 …… 379
№25786,奥尔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驻华使馆开设中学高年级班
1964 年 9 月 14 日 …… 381
№20803,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 年 9 月 21 日 …… 382
№20806,安德罗波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为庆祝中国国庆在苏联开展的活动
1964 年 9 月 22 日 …… 383
№2080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 年 9 月 23 日 …… 384
№21938,赫鲁晓夫致中国领导人函：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 年 9 月 23 日 …… 385
№21940,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 年 9 月 23 日 …… 386
№21939,苏共中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注意事项
1964 年 9 月 23 日 …… 387
№2080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针对中国国庆活动而采取的措施
1964 年 9 月 25 日 …… 388
№1385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处理中苏边界问题
1964 年 9 月 25 日 …… 389
№20805,葛罗米柯致陈毅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
1964 年 9 月 30 日 …… 390
№20770,赫鲁晓夫同日本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国的核武器
1964 年 10 月 3 日 …… 391
№25632,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中国试图离间苏蒙关系
1964 年 10 月 7 日 …… 392
№25635,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
1964 年 10 月 7 日 …… 395
№25636,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立场
1964 年 10 月 8 日 …… 396
№1385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
1964 年 10 月 8 日 …… 397
№2195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一些措施

1964 年 10 月 8 日 …………………………………………………… 398
№25637,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匈牙利代表团访华情况
1964 年 10 月 9 日 …………………………………………………… 399
№10273,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赫鲁晓夫的错误
1964 年 10 月 14 日以前 ……………………………………………… 399
№20286,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1964 年 10 月 14 日以后 ……………………………………………… 431
№20006,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1964 年 10 月 15 日 …………………………………………………… 436
№25399,苏联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1964 年 10 月 16 日 …………………………………………………… 437
№25763,苏达利科夫的报告：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
1964 年 10 月 21 日 …………………………………………………… 438
№25764,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
1964 年 10 月 27 日 …………………………………………………… 441
№20771,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事宜
1964 年 10 月 28 日 …………………………………………………… 441
№25640,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共希望在访苏期间与兄弟党联系
1964 年 10 月 29 日 …………………………………………………… 445
№2077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驻华使馆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
1964 年 10 月 29 日 …………………………………………………… 446
№2000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通报中共中央的建议
1964 年 10 月 30 日 …………………………………………………… 446
№2000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
1964 年 10 月 30 日 …………………………………………………… 448
№2000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驻华使馆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事宜
1964 年 10 月 31 日 …………………………………………………… 449
№21171,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
1964 年 11 月 2 日 …………………………………………………… 451
№10141,契尔沃年科致苏达利科夫电：越南代表团到达北京情况
1964 年 11 月 3 日 …………………………………………………… 453
№25406,苏联驻华贸易代表的报告：苏中贸易发展状况
1964 年 11 月 3 日 …………………………………………………… 454
№09907,克里夫佐夫致苏达利科夫电：周恩来等访苏启程日期
1964 年 11 月 4 日 …………………………………………………… 457

№25407,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苏中贸易发展状况
1964年11月5日 …… 457
№16677,范文同与哥穆尔卡会谈纪要：周恩来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
1964年11月8日 …… 459
№20773,勃列日涅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处理
1964年11月8日 …… 462
№2234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同中国代表团会谈的通报
1964年11月9日 …… 470
№2077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央全会通报中苏代表团会谈结果
1964年11月13日 …… 470
№20010(25734),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通报与中共代表团谈判情况
1964年11月14日 …… 471
№25920,谢尔盖耶夫致安德罗波夫函：对苏中关系的意见和建议
1964年11月16日 …… 478
№20775,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与兄弟党会谈的结果
1964年11月16日 …… 493

第十卷(1963.1—1964.11)

目　　录

1963 年

№25607，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通报中蒙边界谈判情况
1963 年 1 月 1 日 …… 11
№1384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起草答复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 年 1 月 2 日 …… 17
№1384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致函中国领导人
1963 年 1 月 29 日 …… 18
№20798，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提交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3 年 2 月 14 日 …… 19
№1384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修改致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 年 2 月 15 日 …… 23
№2079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重新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 年 2 月 15 日 …… 24
№21502，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
1963 年 2 月 23 日 …… 24
№24299，齐宾致苏共中央报告：利用老挝国王到达北京之机对其表达谢意
1963 年 3 月 11 日 …… 36
№1384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欢迎毛泽东或中共代表团访苏
1963 年 3 月 12 日 …… 37
№2191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文
1963 年 3 月 13 日 …… 38
№16675，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权对边界问题的无理要求
1963 年 3 月 21 日 …… 39
№13733，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总理希望会见苏联国防部长
1963 年 3 月 24 日 …… 42
№23458，莫斯科夫斯基与莫拉维克谈话纪要：苏联的核保护伞
1963 年 4 月 15 日 …… 44
№1039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做出反应
1963 年 4 月 16 日 …… 44

№1384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委托副外长召见中国大使
1963 年 5 月 3 日 …… 45
№16681，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向苏联散发宣传手册
1963 年 5 月 4 日 …… 46
№09903，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
1963 年 5 月 17 日 …… 46
№1384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答复中国
1963 年 6 月 10 日 …… 67
№1039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3 年 7 月 6 日 …… 68
№08107，苏中两党会谈第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发言
1963 年 7 月 6 日 …… 69
№08108，苏中两党会谈第二、三次会议记录：邓小平发言
1963 年 7 月 8 日 …… 100
№13011，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1963 年 7 月 10 日 …… 119
№08109，中苏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的发言
1963 年 7 月 10 日 …… 120
№08110，苏中两党会谈第六次会议记录：邓小平的发言
1963 年 7 月 12 日 …… 140
№08111，中苏两党会谈第七次会议记录：波诺马廖夫的发言
1963 年 7 月 13 日 …… 157
№13012，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
1963 年 7 月 15 日 …… 172
№13013，泽登巴尔致西伦凯维兹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1963 年 7 月 15 日 …… 173
№08112，中苏两党会谈第八次会议记录：彭真的发言
1963 年 7 月 15 日 …… 174
№08113，中苏两党会谈第九次会议记录：安德罗波夫的发言
1963 年 7 月 17 日 …… 192
№24296，多布罗拉德尼克致苏共中央总务部函：提交中共中央的几份声明
1963 年 8 月 10 日 …… 207
№08114，中苏两党会谈第十次会议记录：康生的发言
1963 年 7 月 19 日 …… 211
№08115，中苏两党会谈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发言

1963 年 7 月 20 日 …………………………………………………… 227
№1384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公开交手的时刻已来临
1963 年 7 月 23 日 …………………………………………………… 232
№1384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对中共进行反击
1963 年 9 月 10 日 …………………………………………………… 233
№1384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谈中苏关系
1963 年 9 月 10 日 …………………………………………………… 234
№25580 ,洛马科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希望苏联工人接替中国工人
1963 年 9 月 13 日 …………………………………………………… 239
№25623,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议纪要：通报中共的分裂活动
1963 年 9 月 17 日 …………………………………………………… 240
№25624,契尔沃年科与费伦茨会谈纪要：对中苏论战的反应和评论
1963 年 9 月 18 日 …………………………………………………… 241
№25625,契尔沃年科与绍伊奇会谈纪要：中国最近向中苏边界调兵
1963 年 9 月 20 日 …………………………………………………… 243
№24295 ,库兹涅佐夫致波诺马廖夫报告：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1963 年 9 月 23 日 …………………………………………………… 244
№23051,普拉特科夫致苏斯洛夫函：提交即将发表的批评中共的文章
1963 年 9 月 24 日 …………………………………………………… 260
№25626,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会谈纪要：罗马尼亚不赞同中共的做法
1963 年 10 月 3 日 …………………………………………………… 263
№25628,契尔沃年科与法特万会谈纪要：关于艾地对中国的访问
1963 年 10 月 16 日 …………………………………………………… 264
№13734,贝内迪克托夫与鲍尔斯会谈纪要：中国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
1963 年 10 月 18 日 …………………………………………………… 265
№1385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如何应对周恩来的讲话
1963 年 10 月 21 日 …………………………………………………… 267
№2079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会议而采取的措施
1963 年 10 月 23 日 …………………………………………………… 267
№21925,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问题
1963 年 10 月 22 日 …………………………………………………… 270
№1039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
1963 年 10 月 25 日 …………………………………………………… 271
№1385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
1963 年 11 月 10 日 …………………………………………………… 271

№1385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给毛泽东的信
1963 年 11 月 26 日 …… 275
№25630,契尔沃年科与索苏尔巴拉姆会谈纪要：中蒙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1963 年 11 月 28 日 …… 276
№10397,波诺马廖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言论
1963 年 12 月 …… 277
№10396,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裂
1963 年 12 月 …… 289
№10395,伊利切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
1963 年 12 月 …… 300
№23016,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
1963 年 12 月 13 日 …… 311
№09905,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草案)：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
1963 年 12 月 13 日 …… 328
№23017,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记录：讨论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1963 年 12 月 13 日 …… 330
№20821-5,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阿法纳西耶夫的讲稿
1963 年 12 月 13 日 …… 331
№09904,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印发波诺马廖夫等人在中央全会的讲话
1963 年 12 月 16 日 …… 332

1964 年

№25531,黑根与邓小平谈话纪要：中苏分歧与政治论战
1964 年 1 月 14 日 …… 334
№25780,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
1964 年 1 月 14 日 …… 335
№25530,契尔沃年科与黑根会谈纪要: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
1964 年 1 月 25 日 …… 338
№25533,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1964 年 1 月 28 日 …… 338
№20278,外交部远东司呈送的备忘录：中国领导人对蒙古的要求
1964 年 1 月 30 日 …… 339
№10400,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节录)：关于中苏关系部分
1964 年 2 月 14 日 …… 341
№25777,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苏联的对外援助

1964 年 2 月 14 日 …………………………………………………… 346
№25776,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
1964 年 2 月 15 日 …………………………………………………… 347
№23019,韦尔边科致赫鲁晓夫函：拉丁美洲人民拥护苏联
1964 年 2 月 15 日 …………………………………………………… 348
№23020,别图霍夫致苏斯洛夫函：如何答复中国寄来的贺信
1964 年 2 月 15 日 …………………………………………………… 350
№25534,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苏共要求停止公开论战
1964 年 2 月 18 日 …………………………………………………… 350
№25774,甘科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中国在火车上散发反苏传单
1964 年 3 月 23 日 …………………………………………………… 351
№1039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4 年 4 月 13 日 …………………………………………………… 352
№25762,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古巴进行宣传活动
1964 年 4 月 14 日 …………………………………………………… 352
№25790,苏联驻印尼使馆致苏共中央报告：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工作
1964 年 5 月 29 日 …………………………………………………… 353
№21930,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来信的回复
1964 年 6 月 1 日以前 ………………………………………………… 354
№21931,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草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共运的立场
1964 年 6 月 1 日以前 ………………………………………………… 355
№21932,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草案)：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回信
1964 年 6 月 1 日以前 ………………………………………………… 366
№1385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
1964 年 6 月 4 日 …………………………………………………… 366
№20800,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来信的答复
1964 年 6 月 4 日 …………………………………………………… 368
№10399,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述苏中边界历史问题
1964 年 6 月 8 日 …………………………………………………… 368
№23047,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宣传
1964 年 6 月 24 日 …………………………………………………… 369
№21934,赫鲁晓夫的口述记录：对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思考
1964 年 6 月 27 日 …………………………………………………… 371
№2193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制定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
1964 年 8 月 19 日 …………………………………………………… 373

№13854，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苏边界问题
1964年8月19日 …… 373
№25973，帕杰尔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关于美国旅游公司的情况
1964年8月29日 …… 379
№25786，奥尔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驻华使馆开设中学高年级班
1964年9月14日 …… 381
№20803，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年9月21日 …… 382
№20806，安德罗波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为庆祝中国国庆在苏联开展的活动
1964年9月22日 …… 383
№2080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年9月23日 …… 384
№21938，赫鲁晓夫致中国领导人函：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年9月23日 …… 385
№21940，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年9月23日 …… 386
№21939，苏共中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注意事项
1964年9月23日 …… 387
№2080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针对中国国庆活动而采取的措施
1964年9月25日 …… 388
№1385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处理中苏边界问题
1964年9月25日 …… 389
№20805，葛罗米柯致陈毅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
1964年9月30日 …… 390
№20770，赫鲁晓夫同日本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国的核武器
1964年10月3日 …… 391
№25632，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中国试图离间苏蒙关系
1964年10月7日 …… 392
№25635，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
1964年10月7日 …… 395
№25636，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立场
1964年10月8日 …… 396
№1385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
1964年10月8日 …… 397
№2195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一些措施

1964 年 10 月 8 日 …………………………………………………… 398
№25637,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匈牙利代表团访华情况
1964 年 10 月 9 日 …………………………………………………… 399
№10273,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赫鲁晓夫的错误
1964 年 10 月 14 日以前 ……………………………………………… 399
№20286,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1964 年 10 月 14 日以后 ……………………………………………… 431
№20006,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1964 年 10 月 15 日 …………………………………………………… 436
№25399,苏联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1964 年 10 月 16 日 …………………………………………………… 437
№25763,苏达利科夫的报告：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
1964 年 10 月 21 日 …………………………………………………… 438
№25764,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
1964 年 10 月 27 日 …………………………………………………… 441
№20771,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事宜
1964 年 10 月 28 日 …………………………………………………… 441
№25640,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共希望在访苏期间与兄弟党联系
1964 年 10 月 29 日 …………………………………………………… 445
№2077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驻华使馆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
1964 年 10 月 29 日 …………………………………………………… 446
№2000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通报中共中央的建议
1964 年 10 月 30 日 …………………………………………………… 446
№2000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
1964 年 10 月 30 日 …………………………………………………… 448
№2000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驻华使馆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事宜
1964 年 10 月 31 日 …………………………………………………… 449
№21171,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
1964 年 11 月 2 日 …………………………………………………… 451
№10141,契尔沃年科致苏达利科夫电：越南代表团到达北京情况
1964 年 11 月 3 日 …………………………………………………… 453
№25406,苏联驻华贸易代表的报告：苏中贸易发展状况
1964 年 11 月 3 日 …………………………………………………… 454
№09907,克里夫佐夫致苏达利科夫电：周恩来等访苏启程日期
1964 年 11 月 4 日 …………………………………………………… 457

№25407,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苏中贸易发展状况
1964 年 11 月 5 日 …… 457
№16677,范文同与哥穆尔卡会谈纪要：周恩来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
1964 年 11 月 8 日 …… 459
№20773,勃列日涅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处理
1964 年 11 月 8 日 …… 462
№2234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同中国代表团会谈的通报
1964 年 11 月 9 日 …… 470
№2077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央全会通报中苏代表团会谈结果
1964 年 11 月 13 日 …… 470
№20010(25734),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通报与中共代表团谈判情况
1964 年 11 月 14 日 …… 471
№25920,谢尔盖耶夫致安德罗波夫函：对苏中关系的意见和建议
1964 年 11 月 16 日 …… 478
№20775,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与兄弟党会谈的结果
1964 年 11 月 16 日 …… 493

1963 年

№25607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通报中蒙边界谈判情况[①]

（1963 年 1 月 1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 年 1 月 15 日
第 82 号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

兹向您呈上发给 Ю. В. 安德罗波夫同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 Д. 策伯格米德的会谈纪要副本。

附记录共 19 页(绝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 契尔沃年科(签名)

附件：

绝　密

契尔沃年科与 Д. 策伯格米德的会谈纪要

（1963 年 1 月 1 日）

策伯格米德大使回到北京(他于 1962 年 12 月 27 日蒙中边界条约签订后陪同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返回祖国)，策伯格米德受泽登巴尔的委托主动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并秘密地通报了 Ю. 泽登巴尔和周恩来于 1962 年 12 月 25 日和 27 日进行的会谈情况。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手抄件，有些内容难以辨认，以省略号表示。——编注

策伯格米德报告的内容如下：

在12月2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北京当天举行的所有会谈和会晤，其中包括泽登巴尔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都只是正式的，没有超出对边界条约草案进行讨论的框架。12月27日签订条约前与刘少奇的会谈也只是礼节性的、正式的；会谈中也没有涉及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条约签订以后举行了盛大的集会。12月27日泽登巴尔和周恩来进行了第二次会谈。看上去中方对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在会谈过程中提到了许多重要的原则性问题，除了中蒙两国关系之外，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党包括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策伯格米德继续说，在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指出，今天我们签订的中蒙两国的边界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其他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世界整个形势都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国界线划分以后将正式勘定分界线。接着周恩来提到了中印之间的争论，他强调说，过去没有勘定正式分界线，因此双方坚持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传统分界线。现在应该正式勘定中印的国界线。周恩来也提到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谈判，他指出有进展，强调巴基斯坦对勘定边界线的态度正确。可是美国担心中巴政府的谈判进行顺利，对此美国心里很不舒服。周恩来讲到了中巴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这场冲突会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可是他还是希望归根结底这场争论也会得到解决。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试图证明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争论上的立场是正确的，印度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竭力通过外援，包括苏联的援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印度利用这种援助在做赌注。印度曾作过积极的努力试图寻找美国、英国的援助，但这并不能帮助尼赫鲁挽救局势，因为真理在中国一方。最主要的，周恩来指出，亚洲、非洲人民支持中国。策伯格米德指出，他觉得会谈的这部分内容就好像周恩来在给蒙古代表团作演讲。

周恩来讲完这些说，您(泽登巴尔先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印边界争论曾表示遗憾。

泽登巴尔肯定地回答说，我们的确感到很遗憾，中印之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至今发展到军事冲突。周恩来说，中国不喜欢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表示遗憾的这种态度。周恩来提起1959年与泽登巴尔的会见情景，当时泽登巴尔途经印度，谈到中印冲突的问题，他(泽登巴尔)明显地没有站在中国的一方。周恩来重提蒙古政府对中印争论的这种态度，中国对此表示不满。

泽登巴尔对周恩来说，对待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灵活谨慎态度。生活和事实都已证明，在这些情况下灵活行事是何等重要。泽登巴尔接着强调，今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获得世界性的胜利，边界争论将成为历史遗迹。这就是我认为在边界争端和冲突问题上共产党员应采取的态度。继续谈这个问题，策伯格米德说，此时周恩来竭力证明，在中印争论中中国没有过错，中方一开始就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中国方面争取不让这场争论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

泽登巴尔指出,我们应该看这场军事冲突所引起的后果,应谨慎地、负责任地考虑这场争论在印度的反响。目前在印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不仅仅导致共产党,而且导致所有进步组织和进步人士面临的形势都异常复杂;目前印度到处都有镇压活动,反革命分子和右翼分子猖狂,公开对尼赫鲁施压。

此时周恩来赶紧打断泽登巴尔,力图证明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过错。接着他说,中国几乎同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国家商谈了国界问题,他开始夸耀中蒙谈判的结果。谈判之所以成功,周恩来指出,是因为双方相互谅解,相互让步。关于这一点,策伯格米德指出,周恩来强调中国考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作了适当的让步。他希望今后兄弟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互相迁就。比如说,我们希望,如果我方提出了关于允许我们在靠近中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有一个牧场的请求,这就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我方当然也会满足你们的请求。

策伯格米德说,在这一部分会谈快结束的时候,接着泽登巴尔提出了一些国家间的问题。

1. 他说,最近经蒙古到中国的铁路载货量明显地减少了,过境的货物调运量也大大地缩减了。我们希望中国增加铁路的运输量,如果中国觉得可以做到的话。

2. 策伯格米德指出,贸易专家初步谈判已经有了结果,蒙古方面担心中方大量缩减1963年与蒙古的贸易业务,这会使已经形成的相互供应体系受到破坏。这将导致蒙古出现一些以前未曾预料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蒙古企业用一些以前从中国过来的原料有关。

3. 泽登巴尔对中国政府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援助以及派遣工人表示了感谢。目前在各种各样的工厂里同蒙古工人一起劳动的有8 000名中国工人。遗憾的是有时发现有些工人拒绝做一些工作。他们不会说蒙古语,因此产生了一些误会和不愉快的事情。泽登巴尔强调说,现在和将来蒙古人民共和国会有大量的用工需求,因此蒙古欢迎中国工人在自己企业里工作。但现在在蒙古的工人不懂蒙古文。是否可以派遣更多会说蒙古语的内蒙古的工人来我们这里,这样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更高,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听完了泽登巴尔讲话周恩来说,会谈过程中蒙古代表团提出的三个问题,他会尽量回答。

第一,周恩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的商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少得多。我们确实被迫减少一些商品的供应量,特别是棉织品,因为我们国内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最近三年内持续的干旱和歉收。即使我们根本不出口棉纺工业的原料,而全部用这些原料生产布匹,这样的产量也只能满足每个人使用3米布匹。总的来讲,周恩来说,我们目前自己有困难,无法达到前几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供应纺织工业原料的水平。至于大米、茶叶、丝和部分羊毛,我们可以供应,就让贸易和工业部门讨论这些问题吧。

接着,周恩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要中国供应1 700万卢布的商品(按照新的价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概只能供应600万卢布的商品。

周恩来继续说,明年中国尽可能增加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运输量。这样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增加收入。

然后，周恩来说，蒙古答应供应中方10万头马，我们这里临时发生了些困难，请蒙古方面帮助解决。策伯格米德解释说，现在的困难在于中国要求我们只通过两个边防哨所供应马匹。这样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增加了难度，因为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我们建议中国人通过那些对蒙古方面比较有利的边防站运输马匹，而中国人所建议的等于是把从蒙古各地收集到的马只送到两个边防哨。

第二，周恩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设问题，由于原料供应不足，执行计划出现了困难，要考虑重新审查计划。纺织厂和其他企业原料不足，完成计划必须考虑到可能性，因此，周恩来建议有些工厂临时停产。

策伯格米德解释说，中国对蒙古的态度已经完全确定，目前蒙古确实发生了严重困难，难以完成五年计划，按照五年计划的要求，有25项工程由中国工人援助完成。现在与蒙古工人并肩作战的有8 000名中国工人，此外还有5 000多名在中国建设托拉斯以外的工人。

第三，周恩来提到中国工人的问题。他指出派遣中国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两国关系中的新事物，这是件好事，可是中国政府也有困难，周恩来强调了中蒙之间的历史共同点，提到两国之间友谊于1950年开始得到发展。我们把工人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些工人长期工作在异乡，1960年他们的工作期限已满，但政府不仅延长了许多工人的工作期限，而且还派来了新的工人。周恩来说，我们很担心，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工人不懂蒙古文，不了解蒙古人的习俗，出现了一些误会。应该说，在前五年的工作中发生的误会，很快就解决了。最近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工人们不愿干活。泽登巴尔趁机接话，对周恩来说，你看，你自己也说中国工人不肯干活，他们不懂蒙古文，不了解我国的习俗，因此导致了误会的产生，互相不谅解。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可以不干活，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罢工。

泽登巴尔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蒙古也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我们不能同意一部分工人破坏或漠视规定的制度，这种现象会给蒙古工人造成不良的影响。

周恩来听完以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因此也影响了中国与蒙古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首先兄弟之间在原则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到底存在哪些原则分歧，现在我们不想多讲。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我作了发言，发言中我尽量不让我们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收到效果，相反分歧越来越严重。接着，周恩来指出，在中国的报刊上都登载了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刊登在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报刊上。蒙古人民革命党持相反的立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了批评阿尔巴尼亚的文章。周恩来表示了中方的担忧，这样下去，分歧会越来越公开化，会影响到一些党，敌人已经了解我们存在的分歧。谁是谁非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我们认为，不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周恩来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一系列重要问题持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针。周恩来接着转移话题，他说，总的来说中蒙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关于派遣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问题，他说，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问题在于派遣工人与我们对待一些重要问题的态度有关联，在这方面我们会遇到不少困难，很难

在你们那里的工人中做思想工作。如果我们不分是非做工作,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因为中国工人要跟蒙古族人进行交流,他们看书读报,了解大事。8 000 名中国工人生活在他们中间。周恩来强调说,人是活的,是会思维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会放弃工作。你们在报纸上唆使中国工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的话,我们还怎样做他们的工作,还能把他们留在你们那里吗? 我已经说过,他们是人,不是商品。泽登巴尔说,还是要做不愿干活的工人的思想工作。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不要因此使我们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如果情况不改变,那么不愉快的事情和误会还会持续发生。

策伯格米德指出,泽登巴尔和周恩来的谈话火药味很重,有时觉得马上就会爆炸,但他们还是克制了。策伯格米德说,在听完周恩来的话以后,泽登巴尔已经表示,影响我们今后建设的是那些中方承建的工程项目,另外是已签订协定中的商品供应问题,特别是原料,我们经济建设中的困难由此产生。接着泽登巴尔也指出,中国工人给我们的建设提供了许多帮助,特别是在 1961 年前,他们与蒙古工人一起劳动,没有发生多大的困难。从 1960 年起,特别是从 1961 年起,工人就停工了,按周恩来的说法,是工人罢工。如果你们那里允许这样做,在其他国家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工人不肯干活,这是因为我们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不一致。这一点周恩来你说得对,你谈到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谈到了党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态度,是阿尔巴尼亚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统一,背离了国际主义原则,违背了党与党之间团结的原则。我们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党今后仍将坚持这个正确、客观的立场,并将与破坏团结的现象作斗争。蒙古人民革命党赞同苏共的路线,支持苏共为维护统一而斗争。

您(周恩来先生)说,不要把党与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但是,您是知道的,苏共采取许多非常措施,希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走上团结统一的道路。也许你们不知道,1960 年苏联领导人好几次想找霍查和谢胡谈话,赫鲁晓夫也亲自做过努力,但是他们不仅不接受苏联领导人的善意劝说,相反拒绝接受。我想对您(周恩来先生)说,阿尔巴尼亚的活动不仅针对苏共,还针对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们不仅污蔑苏共,而且还污蔑其他马列主义的政党。这就是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先生,您指责我们没有刊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是的,我们没有刊登他们的文章,我想指出,这样的文章我们今后也不会刊登。泽登巴尔对周恩来说,我所讲的一切绝不表示我想把兄弟党的关系尖锐化,我也不想这样做,可是你们中国支持阿尔巴尼亚,鼓励他们粗暴地污蔑苏联。

泽登巴尔谈了关于中国工人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能,也不准备为了 8 000 名中国工人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而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改变我党的正确路线,不会做出让步。我想告诉您,周恩来先生,我们没有在中国工人中间做过任何思想工作。周恩来打断泽登巴尔的话,希望允许他提出一个问题,泽登巴尔表示同意。周恩来问,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刊登了直接和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果中国工人读到了这样的文章,他们肯定会

有所反应。泽登巴尔说，他决不允许这些工人的存在。周恩来问，怎样解决工人的问题呢？

周恩来说，他并不要求对方改变自己党的路线，对泽登巴尔老是提改变党的路线表示不满。泽登巴尔说，周恩来所讲的不符合兄弟党会议的精神。

周恩来生气地回答说，莫斯科会议被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给糟蹋了。

泽登巴尔请周恩来别生气，生气是不好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苏共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共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拥护。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以来走过了40年。蒙古党和蒙古人民毫不动摇地与苏共并肩战斗，任何人别想动摇蒙古党和苏共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是鲜血凝成的。我们深信苏共路线的正确性，深信苏共是伟大列宁的党，世界和平运动的先锋队，深信苏共忠于自己的事业。周恩来问，你们那里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也是这样吗？

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中国工人问题上。

泽登巴尔声明，现在中国工人生活在蒙古工人中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他们可以单独安排。可以像建筑托拉斯管辖下的8 000名工人一样有组织地安排在一起。

周恩来开始冷静下来，他说，是否可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相关代表进行洽谈，例如说请中国驻乌兰巴托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蒙古的有关单位商谈这个问题。目的是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困难，以便取得谅解。泽登巴尔说，关于刚才说到的中国工人，大概可以将他们集中到第一工段。如果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收到相关指示后，我们就可以派人进行商谈，并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他没有不高兴，也没有生气，但再次强调泽登巴尔似乎教训了他40多分钟。

泽登巴尔强调说，我们蒙古人尊重中国共产党，珍惜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它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说，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党，他只是提请注意一下蒙古党和人民所关注的一些问题。

……

泽登巴尔说，边界条约已经签署，在这方面他明白了很多问题。在来北京的时候，他认为条约的签署会在改善两国友谊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策伯格米德指出，泽登巴尔后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告诉了其他蒙古同志，即看来边界条约的签署并不能改善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

最后泽登巴尔代表蒙古代表团全体成员对中国政府的盛情接待和有益的意见交流表示感谢。

我对策伯格米德所作的通报表示了感谢。

会谈纪要基本反映了大使所谈的内容。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 0100，оп. 56，п. 495，д. 7，л. 1－19

№13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起草答复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年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月2日会议第7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И. 勃列日涅夫、А. П. 基里连科、А. Н. 柯西金、О. В. 库西宁、А. И. 米高扬、Д. С. 波利扬斯基、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В. В. 格里申、Л. Н. 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 Н. 杰米切夫、В. И. 波利亚科夫、А. П. 鲁达科夫、В. Н. 季托夫、А. Н. 谢列平;会议由 Ф. Р. 科兹洛夫主持。

关于给中国的信。[①]

起草信件。

就关于举行兄弟党协商会议的问题[②]分别发出了信件。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7,л. 57－57об

---

① 正如1963年3月12日《真理报》所报道的那样,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信中阐述了关于兄弟党必须共同努力,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的意见"。苏共中央还指出了,再一次强调 Н. С. 赫鲁晓夫在1963年1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阐述的党的立场,即"共产党之间应该停止辩论,并提出了苏联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其他兄弟党代表进行双边会晤,以便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问题的建议"。由于这封信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2月23日接见了苏联驻中国大使 С. В. 契尔沃年科,并与他进行了会谈。3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向苏联大使转交了中共中央对2月21日信函的答复函。正如3月12日《真理报》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信函中,都表示了赞成必须举行双边会晤,以讨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问题。这些信的全文发表在3月14日的《真理报》上。——原注

② 关于举行共产党协商会议的思想,是几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因为他担心在苏中辩论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会议,将不会达到制定共同纲领的目的,而只会加剧已经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局面。关于 Н. С. 赫鲁晓夫的立场,可参阅:1963年11月10日会议速记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立场也被改变了。——原注

№13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致函中国领导人

(1963年1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月29日会议第8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

关于准备给《真理报》的文章——给中国人的复函。①

应该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情况。

关于南斯拉夫(当时是正确的，时间在流逝，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关于国际方面的问题——根据声明的精神。②

争议问题仍然存在着。

在对南联盟纲领的评价方面。③

——仍然如从前一样这个评价是否意味着永远呢?

目的，驱除？或者是帮助摆脱错误。

我们已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了，党掌握着政权。而党掌握政权的时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应该是一种更宽容的环境，不是必须拿来十字架——也就是镇压政策。我们应该促进摆脱错误立场的过程，帮助铲除缺点。

中国人——迟钝的人。在南斯拉夫也存在着这样的人。

现在，当我们拥有10亿居民的时候，居民和领土都将会扩大的。

是否能够出现分歧呢？可能。

怎么办？实行驱逐政策？这样我们就会滑向民族主义的立场。我们正在朝着民族同一性前进。驱逐——这不是马克思主义道路。我们在为未来铺设道路——不应该排斥，而是应该宽容地对待。例如：在经互会组织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合作。④

我们帮助在南斯拉夫的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些力量。而西方只帮助那些想使南斯拉夫倾

---

① 在标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文中，继续活跃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辩论。文章还指出了，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里，"已经出现了正面的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近的过程"。——原注

② 可能指的是 H.C.赫鲁晓夫在1962年12月12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做的题为《当代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报告(《真理报》，1962年12月13日)或者是他在1963年1月1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是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讲话(《真理报》，1963年1月17日)。——原注

③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是在1958年春天通过的。这个纲领被苏联共产党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并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原注

④ 自1964年起，南斯拉夫开始积极地与经互会组织进行合作。——原注

向于他们的力量。

在文章公布之后发出信函。①

РГАНИ, ф. 3, оп. 16, д. 947, л. 60-61об

№20798

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提交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3年2月14日)

苏共中央：

根据委托现提交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文本,这封信件的文本已经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我们认为,在把这封信发往北京之后应该再把它转发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同时也要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领导人了解这封信的内容。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Ю. 安德罗波夫

Б. 波诺马廖夫

1963年2月14日

附件：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

1. 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文本(附后)。

批准发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文本(附后)。②

2.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把这封信转交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朝鲜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和古巴革

① 参阅：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1963年2月21日信(参见：1963年1月2日第76号会议记录)和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文章(《真理报》,1963年2月10日)。——原注

② 在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命组织联盟民族领导。

3. 把这封信件的副本送给苏联驻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使兄弟党(名单附后)领导人了解这封信的内容。

草　案

苏共中央就中共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你们发出此信，以便再次对近期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表示关切。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及其代表在国际会晤中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公开且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大多与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共产党主义运动总方针背道而驰。与我们之间所达成的协议相对，几乎每次国际性会面都成了中国同志与其他兄弟党代表之间观点激烈斗争的舞台。

因此我们不得不担心，由于中国同志的言论将导致共产党运动中的激烈论战将不断走向深入。所争论问题的范围常常被人为地扩大化，尖锐和公开的争论采取了令共产党员所不能容忍的方式。莫斯科会议文件的结论及其地位经常被随意阐释，由此导致在涉及我们总任务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论战同样也造成了这样一些事实，或不准确地、有时简直是歪曲式地解释兄弟党的立场，或从一系列问题中只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或只图论战的激情发挥而不能客观、清醒地分析所产生问题的实质。

这些分歧已超出了共产党运动范畴的制约，被带入到民主组织之中，涉及国家间关系，并在解决当前国际问题的具体政策领域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自然就制造了我们都极其不愿看到的隔阂，并无助于我们党际关系的改善。

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所发生的分歧对兄弟党的活动，尤其是那些国内政治形势复杂的国家的兄弟党，造成了越来越负面的影响，妨碍了他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顺利地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许多兄弟党公正地对这种情况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如果允许事情继续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势必面临严重困难，结果导致我们处境的恶化并将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失。如果我们不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行动中团结一致，如果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仍各行其是，那么只能削弱自己的力量而相应加强了敌对势力，并进一步激励西方侵略集团实现其反共产主义的企图。

自从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被公之于众以来，社会主义的敌人们动员一切力量希望从业已形成的局势中为自己最大限度地捞取好处。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就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情况极尽污蔑和诽谤之能事，有意歪曲兄弟党的立场，试图以此来瓦解和分化我们的队伍。帝国主义者们明白，目前并没有能力以武力和在经济竞争中战胜紧密团结起来的

社会主义体系，因此便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破坏我们的团结方面。而我们内部的分歧表现得越明显，帝国主义者们也就会表现得越肆无忌惮。

我们认为，在帝国主义者们和世界上的反动派极力联合自己的势力以积极反对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情况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的团结也就显得尤其必要。这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不断高歌猛进的可靠保证。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形势下，每个兄弟党，尤其是像苏共和中共这样的大党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在于，尽一切可能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以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团结。

我们相信，目前出现的分歧只是暂时的，不一定发展到深刻冲突的地步。因为我们坚信，今天导致我们分离的那些分歧是完全可以被克服的。我们认为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苏共和中共都是以我们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这是确保苏联和中国之间友谊长久的主要基础。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世界所有国家无产者的共同阶级利益，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伟大的马列主义学说。

无论今天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深刻，都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力量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性斗争中我们都将与你们在同一战壕中并肩战斗。从此出发并考虑到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尤其有必要指出，我们关注的并非是那些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的问题，而是那个主要的，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关键性问题。

中共中央在其信函和声明中均始终强调自己忠实于莫斯科会议宣言及其声明，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自己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斗争中，在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坚持和平共处诸原则斗争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这些都是与苏共和所有马列主义政党的基本立场相一致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是统一的，那么我们就拥有了克服分歧和加强我们之间团结的良好基础。

正如实际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涉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方式等问题。这些当然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它们不能也不应当妨碍全世界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和亲近这个主要问题。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战略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派及其侵略战争的基础。与此同时，每个共产主义党派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民族、地域范围和国际条件下存在的，在马列主义武器库中现有的那些斗争方式和方法均能够较好地与这些条件相适应，从而有利于各共产党派别利用之以实现我们的上述总目标。

如果有人突发奇想要求处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斗争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的共产党人都采用千篇一律的(革命)策略和方式，那就违背了马列主义。因此，要对兄弟党所实施的这样或那样的战术步骤及其整体策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需要对不同党派斗争和生存的具体环境进行全面、细致的马列主义分析。

莫斯科会议决议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条件下的总路线。与此同时，它们给予了自己队伍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根据自身的民族条件和具体情况来多样化地选择各自的斗争策略。(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为加强世界共产主义

运动的团结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政治基础。我们党认为，如果坚定地遵循这些文件和根据其结论构建自己的政策，就会确保我们队伍的团结，而所有分歧也都可能正确地得到解决。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与我们一样，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关系正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我们的党以及我们政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继续站在同一队伍中继续前进，还是只一味沉迷于相互之间不必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只可能导致我们的相互隔离并削弱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为了确保苏联和中国人民能够继续过上像兄弟那样的生活，我们两党肩负着历史性的重任。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对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我们党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我们两党有责任从当前困境中摆脱出来，勇敢而坚定地清除所有对我们友谊的阻碍。我们认为，这才是马列主义者能够和应当走的唯一道路。

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的角度和尽一切努力克服分歧的真诚意愿出发，苏共中央主动提出关于停止共产党各党派之间的争论和本党内部对其他党的批评的建议。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 C.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我们的未来，停止目前在报刊上就一些有争议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是明智的选择。让我们把时间投入到工作之中，时间将帮助我们最终明白谁是正确的，而谁误入歧途。"这一建议已得到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再次表明自己已准备尽一切努力以促使我们两党间关系的正常化，并再次向你们提出建议，即停止关于那些我们存有不同理解的问题的争论并不再就此发表公开言论，因为后者将无助我们的团结事业，只会加深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认为，为了着眼于马列主义诸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在各个共产党的关系中(我们)更要掌握分寸，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耐心和更多的灵活性。

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也会为马列主义政党会议的筹备工作创造良好的氛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应进行集体讨论。苏共还在 1957 年和 1959 年便主动召集了兄弟党会议，当时召开这些会议主要是由于国际形势的严重变化和有必要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应路线。

我们如今正准备召集的所有兄弟党会议也是具备了充分理由的。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重心应着眼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总任务，粉碎其侵略计划，进一步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增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在 1962 年 5 月 31 日的去信中我们已经向你们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而如今希望对之再次予以确认。

非常清楚的是，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还需要时间，以便营造必要的氛围并做好必要的筹备工作。我们认为，此次会议必定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我们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非激化我们之间的分歧。

为了给会议的筹备营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党认为最好我们双方事先举行一些会谈。任

何一个兄弟党,如果有兴趣与苏共代表会谈,我们都准备与其代表一起坐到谈判桌前。

在这里,我们向中共中央发出举行两党代表高级会晤的建议。如果中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那么此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可再另行约定。关键在于,这样做是我们当前所必需的,它表达的是一种双方在马列主义学说基础上解决现有问题,严格遵守共同制定的路线,不容许任何可能干扰该路线实现的行为的良好意愿。

苏共中央希望中国同志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的初衷。我们都是以我们的伟大事业——赢得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为了这一事业各共产党正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深信,苏共和中共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赢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本国和全世界的胜利,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而斗争的总目标。只要我们表现出自己的良好意愿和对我们斗争利益及目标的高度觉悟,那么这时候任何困难都将不能阻碍我们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友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РГАНИ, ф.3, оп.16, д.222, л.37、38、41-47

№1384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修改致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年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2月15日会议第8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И. 勃列日涅夫、Г. И. 沃罗诺夫、А. П. 基里连科、Ф. Р. 科兹洛夫、А. Н. 柯西金、А. И. 米高扬、Н. В. 波德戈尔内、Д. С. 波利扬斯基、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Л. Н. 叶夫列莫夫、К. Т. 马祖罗夫、Ш. Р. 拉希多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 В. 安德罗波夫、П. Н. 杰米切夫、В. Н. 季托夫、А. Н. 谢列平、Б. Н. 波诺马廖夫、А. П. 鲁达科夫;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24项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赫鲁晓夫:作者没有完全成功地撰写信的草稿。应该避免论战,而是通过信稿表现出对可能分裂的忧虑。不要抓住在某一点上的分歧不放。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同意举行任何级别的会晤,听取和弄清楚各种意见,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委托书记处最终拟定出信的文稿。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7，л. 63

№2079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重新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件

（1963 年 2 月 15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2 月 15 日会议第 82 号记录
1963 年 2 月 15 日

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根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最终拟定出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文本。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134，л. 10

№215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

（1963 年 2 月 23 日）

绝　密
文本第 2 号

苏联驻华使馆
北京
1963 年 2 月 26 日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谈记录

1963年2月23日

今天19点30分周恩来的助手马列从中共中央来电话，表示毛泽东希望在20点接见苏联大使，以传达他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的意见。

中共中央的同志代表毛泽东表达歉意，毛泽东由于患流感，将在他的卧室接见大使(在谈话中毛泽东半躺在床上)。

在场的中方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苏方有：大使馆参赞 О. Б. 罗满宁和二等秘书 Р. Ш. 库达舍夫。

整个交谈实际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由毛泽东主导。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伍修权会偶尔补充和评论。

在谈话开始的时候，毛泽东非常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并为没能在1963年2月22日接见我们表达了歉意。就解释的原因，他说在最近访问中国南方的过程中得了轻微的感冒，而他现在已经基本恢复，还留下“一点尾巴”。

鉴于他对所有在场苏联同志都相当了解，毛泽东评价说和我们今天的见面有家庭聚会的特点。

毛泽东对我说，作为一名大使我不算幸运，因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充满了争论与分歧。

我回答说，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希望这些争论能够尽快结束。

毛泽东继续说，现在苏联大使正在变得越来越幸运，因为两党之间结束论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我强调，我实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希望实现的了，就像俄罗斯人经常说的那样，上帝保佑！看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都影响到了上帝。

毛泽东答复说：“现在马克思已经成了世界的上帝，而列宁是他的总理。”

然后谈到苏共中央在1963年2月21日发出，由我在1963年2月22日转交到中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说他看过了这封信。

在整个谈话中，毛泽东手中握着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的中文印刷文本，不断参考，并引用其中的一些提法。这封信是在一个文件夹内，它有一个标题，大红色的标题：“中共中央收到的文件”。在这封信的内容及空隙处覆盖了许多标注以及在许多提法下都画了线。从手写的字迹判断，这些批注是出自一人之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欢迎这封信，因为其中有些很好的提法。我们支持这些提法，尽管我们不同意其中的某些东西。(信中)积极的地方包括两党之间的平等和协商的想法，特别是这些地方，它说(毛泽东引用信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苏共中央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具体和现实的步骤，目的在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旨在改善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的气氛。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产生了一项提案，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为我们党的代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结束共产党之间的论战，结束在自己党内对其他政党的批评。这项建议，如你们所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引用信中的这段之后，毛泽东说，这是好话。但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建议结束公开论战时的发言中批评中共感到不高兴。总之，苏共推出了 4 份文件，其中都包括对中共的批评：2 份是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2 份是《真理报》的社论。

他继续说，在 4 天中——今年 2 月 20—23 日，他发表了所有这些文件。我们这样做是使我们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观点。中方报刊也将会发表批评法国共产党的文章。然后，我们将发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我们已经回复了意大利共产党，但我们会再做一个声明。在目前我们不打算发表批评苏共的文章。

在目前，毛泽东说，在 42 个兄弟党——如果算上苏共是 43 个党——都在谴责中共。在本质上这种批评是正常的现象，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人们当然可以发表言论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词汇中的一些是由刘少奇和伍修权向毛泽东提示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附加各种标签。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如果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显然，这是正常的。

这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害怕批评，并询问了我的生活和过去的工作。

我简要地谈了谈自己，并表示我不害怕批评。当然，我会因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偶尔受到批评。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都受到责骂。他强调，在我看来，害怕批评的人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就我们而言，我们会回应所有对我们的批评。由于我们受到了批评，我们就会作出回答。我们有句古语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同样非礼也。

毛泽东强调，正是苏共和其他 42 个党给了我们“往”的权利。你们可以骂我们，我们也可以骂你们，但是某些地方必须有限制。我个人希望能有个间歇。我们不打算立即回应这些给我们的批评。让它们像过去一样，保留在我们的账单上。虽然我们现在不打算回答，但任何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都有权回应。也许，我们一年不会回应，甚至两年。总之，我们视情况来决定我们回应的时间。正如我说过，我们打算发表 3 篇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现在我们无意批评你们，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回应你们那 4 份文件。如果我们去回应所有 43 个党，这将需要半年的时间，甚至整整一年。

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英国的同志说他们属于广大的多数党，在暗示中国共产党是少数派。嗯，毛泽东说，我接受我们确实在少数的事实。

他继续说，我们在所有党之前，早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就做出了关于结束公开批评和攻击的提议。但是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大会上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和人格上的指责。在此之后，许多其他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么，毛泽东说，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各国

人民、各国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被提出来了,也在帝国主义和整个世界的反动派面前被提出来了。

既然这样,他说,“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全部真理属于43个党。那好!但是,我们要提出这项建议:让苏联的报刊和其他42个党的报纸刊登我们的文章。就我们而言,我们不害怕批评。既然论战开始了,那就让它继续下去。事实上,如果论战开始,天会塌吗?中国西山的草会不长了吗?不!天不会塌,草木还会生长,女人还会生孩子,鱼还会在水中游。正相反,如果这43个党的行动结果让天塌了,草木不长了,女人不再生孩子了,鱼从水中消失了,那才是奇迹呢!”

毛泽东进一步引用苏共中央的来信说道:“公开的,越来越尖锐的论战只会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争论,阻碍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对兄弟党的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活动,那里有着复杂的国内局势。”但问题是,他说,谁发起的这些攻击,谁组织起40多个政党的攻击,将这些攻击不仅引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引向中国共产党,谁在大会上第一个挑起对其他政党的公开批评?最近一段时间,5个兄弟党的公开声明里,都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来信中说:“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对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些问题的理解上,有可能产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分歧。这在具体情况下,即在这个或那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枝节问题上,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就是这样,毛泽东说,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

毛泽东再次引用来信说:“但是,这些意见的不同,如果他们不是被人为地夸大了,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尖锐的冲突,他们可以通过联合的、同志间的协商充分得到解决。”他指出,这个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在“人为地夸大这些意见的分歧”?谁在散播谣言说毛泽东已经没用了,还有说他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快死了?当然,这些谣言是有客观原因的。举例来说,我真的生病了,感冒是我的常客,而今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见你们,何况,我也似乎快死了。

散播的谣言还说,我(毛泽东)只是一个傀儡,或者说中国对老而不死的毛泽东有个人崇拜。还说,刘少奇、周恩来他们都和我差不多老,他们是65岁,他们也会很快死去。你,大使同志,是比我们年轻,觉得自己身体更好,但你也会生病。他说,看来你有时也生病。

他再次回到来信上。毛泽东说,总体上,他对此表示欢迎。他继续说,现在我要讨论那些“我们的不满”,那些没有让我们满意的事情。我认为在别人背后议论是不礼貌的表现,特别是在同志关系中。信中有一些很好的提法。尤其是它说:“为了加强我们的友谊和加深互相了解,我们向中共中央提议,进行一次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并进一步说:“这次在苏共和中共代表之间的会晤,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这次会议的)工作不能成功。”毛泽东

说，这是真的，我们已经争吵了好几年，而且最近开始走向公开化。他继续说，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争吵，一个人难以应付，就是有50个人也不够。争吵后应该休息。

毛泽东继续说，在1962年4月7日回答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的来信中，我们建议停止公开攻击，要求召开一次协商会议，最后召开一次兄弟党会议。在这封信中，你们甚至没有提到中共中央1962年4月7日的回信，好像这封信提出的建议完全被你们忽略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英国和瑞典共产党也提出了这个方案。是的，英国和瑞典提出要开一次讨论关于国际组织的群众路线上差异问题的会议。

刘少奇补充说，他们特别记得在斯德哥尔摩出现的差异。

毛泽东指出，印尼和新西兰提出召集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以及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的来信根本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参与了1960年会议并签署了声明。南共参加了1957年会议，但拒绝签署该宣言。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纲领了。在1960年会议上，苏联同志告诉我们必须批评南共。在1960年会议上的81个政党正确地指出，南共在后退，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到现在一直持续。中共正在执行1960年会议的这项决定，即使是现在。目前，社会主义阵营有12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已被驱逐出去，虽然这项制裁不是通过集体的方式进行表决的。

我强调说，没有人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重复说，他们正试图驱逐阿尔巴尼亚，把这个小国从社会主义阵营中驱逐出去。美国正试图驱逐古巴。阿尔巴尼亚哪里变得如此可怕了？如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错，应该予以党内批评，而苏联同志们却发起了公开批评。同时，信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困难，是临时的，是可以完全被克服的”。

毛泽东说，苏共中央的来信还提到一些问题，它们正被提上议事日程：“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会议)工作不能成功”，“我们认为，此次会议关注的中心应该是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计划斗争的任务，为了各国人民自由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所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说，都是好的。

然而，伴随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所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提法，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包括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内？在任何情况下，这封信都没有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对毛泽东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把它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问了一个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否能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由各党决定，由会议的参加者决定。

毛泽东问：那南共是否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也许，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兄弟党之间的协商方式决定。

毛泽东表示，南共已参加了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会议。

我说，关于邀请南共参加会议的问题应该由与会的各党自行决定。这是每一个党的权利。至于兄弟党之间的会晤，请谁参加的问题，可能应该由各党通过正常的方式集体解决。

在此刘少奇指出，《真理报》在今年 2 月 10 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从本质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是否接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补充说：也许大使的看法和《真理报》上文章的作者不大一致？

我解释了苏共对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我指出，有关南共的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最终，它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又向毛泽东引用了赫鲁晓夫在与刘晓的谈话中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在那次谈话中，特别是提到了对铁托的原则性评价(关于铁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众所周知的摇摆不定)。

毛泽东似乎是对在场的中国同志说，他读过那次谈话的备忘录，但不能准确地想起这些内容。

我说，此外，与南共的相互关系还具有复杂性，一如既往，各兄弟党的共同努力可能对南斯拉夫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我提到，南斯拉夫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必须要将这个国家拉近我们，而不至于使它更接近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用一种生硬的语调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明确的——“应该遵循的81 个党的决定”。南共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文件不仅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表示了对此问题的不同意见，并指出应对南斯拉夫采取更好的一些举动，我引用了铁托从苏联回来后谈到所谓“特殊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我强调，我们中央在与南共的关系中，严格区分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间关系的问题，对此，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了解。如果毛泽东同志你向我们党的任何组织发问，他们都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回答你。我还补充说，与南斯拉夫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将促进党派之间关系的改善，纠正某些错误，这些都已经反映在南共的纲领中。

关于我对苏共中央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和国家间关系的解释，毛泽东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解释。同时，毛泽东继续用同样的方式谈论南共。他指出，南斯拉夫的代表没有被邀请出席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样做与 1960 年的声明是一致的，声明说，南斯拉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依靠美帝国主义的钱过活。总之，这个声明对南共进行了严厉批评。

至于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外交维持在代办级水平。他说，我想，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互换大使。例如，英国一直试图让中国同意互换大使代表的级别。但我们不会同意互派大使，因为英国是在搞双重游戏：没有正式承认蒋介石，却还同时在联合国支持他们。

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引用了其中一段说：“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都了解，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从我们来讲，从我们的政党来讲，我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是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之中，还是卷入一种艰难且不必要的斗争，后者只能导致相互疏远，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毛泽东继续说，关于这一段，我同意这个观点。一个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这的确是个问题。

仿佛为了说明这一论断，他转而讨论中方代表团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处境问题。他举例说，中国人在大会上严重地受到阻碍，他们的发言被有意破坏，而最后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也被删节了。

这时，伍修权提到讲话的重点被删节了。

这就是民主？毛泽东问。

他接着说，在兄弟党的5个会议上，就是在最近发生的，中共受到了攻击；而且从你们那边，他说，就有两个声明和两篇文章。他说：“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很有效果，如果你们想在世界人民面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提出来；如果你们不想提，那就停止论战。不管是提出问题还是提出批评，我们都会答复。什么时候回应以及回应什么——这个问题留给我们。”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会留着，会回应一部分。现在我们不会直接回应你们的文章，我们打算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做出回应。

这时刘少奇表示，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国会有第二篇文章，因为意大利已经发出了好几篇。

毛泽东说，法国已经写了几十篇文章，都已经刊登在《人道报》上。他们特别健谈，他说。我们的答复只有一篇文章给他们。关键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

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之前信中提到的关于被卷入“艰难和不必要的斗争”，毛泽东说，这是一个过于夸张的表述。没那么“艰难”，他说，这也不是一个那么“不必要”的斗争。对此，毛泽东说，如果“这场斗争，不那么有必要，那么为什么你们还要发布4份文件，为什么43个党都公开批评我们”？当然，这一切斗争都是通过文字的。这种对立的斗争，正如我们所说，动笔，动嘴，不动手。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一段说：“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与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他对此评论说：“这话说得非常正确，但不应该等到后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都不会原谅我们。”

毛泽东问：事实上，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的敌意，在我们的人民和政党之间？之后自己回答道：“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我说我完全同意这些话。

至于信中提到的克服分歧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都有这些品质。如果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去争论，我们就有勇气和力量克服分歧。例如，在华沙的中方代表与美国人斗争了7年，而苏联已经和他们斗争了40多年。毛泽东继续说，我们最近和你

们讨论的更多是斗争,而不是团结。我们一直在吵架,他说,现在应该休息一下了。

最先提出的一项倡议是在越南、印尼和新西兰兄弟党代表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在 1962 年 4 月 7 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这项建议。1962 年 5 月 31 日苏共中央的来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到要支持这一建议,但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而这封信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毛泽东然后读到信的提法,“我们双方有责任在现有的形势下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已经出现,就是勇敢而果断地清除所有妨碍我们友谊的障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采取的”。他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很好的话,他完全支持这些提法。“但是,这只是文件中说的,我们要看看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最后一段:“我们深信克服那些已经存在的分歧,不仅服务于苏共和中共的利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为了和平,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深层次目标。必须要表现出对目标的意愿和自觉以及对斗争的动力——那么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碍我们加强和发展友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读完,他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些话,并觉得这是好话。他强调说信中两次提到了这些话来表示必须“表现出良好意愿”。

总体而言,毛泽东继续说,研究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我当即决定邀请苏联大使来并且表达我的想法。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苏共中央信中的建议“……召开一次有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的双边会晤”,“如果你同意这样的会晤,可以进一步讨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他表示在这次接见大使之前,他咨询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康生,他们有一个提案,他们希望能够呈给苏联同志们。

我们已经听说,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打算去柬埔寨,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不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在去柬埔寨的途中或是回国的途中是否方便来中国访问并且同我们在这里会晤。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请您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对此次会晤非常有兴趣,多次回到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同志来中国,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在 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时候,在这里公开地责骂我们。

当我表示不同意这些说法时(我提醒说,我当时也在中国),毛泽东在谈话参与者的帮助下,回忆起赫鲁晓夫在北京发言的几个片段(“不应以武力考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然后提到他回莫斯科途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次集会中的发言以及一次接受《新时代》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

刘少奇提醒有这样一句:“他们像好斗的公鸡一样。”

这时,毛泽东有些生气地提到,嗯,那么,我们中国人,像好斗的公鸡,而你们,像好斗的母鸡,是不是?事实上,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是好斗,特别是我。美国人就是这样说我们的,其他人都跟着美国人说话。

再次回到了他对赫鲁晓夫访华的提议上，毛泽东说，我们欢迎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并希望他会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努力改善关系并实现停战。毛泽东仿佛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就个人而言，无论是他，还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和朱德，都不会允许在中国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

我强调，对我来说中国同志不应该把这些词句当成是针对个人的，此外，也不应该怀疑苏联领导人有不友好的言论。我指出，在我们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帝国主义的情报人员利用一切手段来煽分歧的火焰，使我们吵架，用这样或那样的表述来达到某种目的。我本人表示对赫鲁晓夫发言这种解读的明确异议。

周恩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和陈毅早在1959—1960年就同苏联大使谈及此事。

随后，毛泽东拿起苏共中央的来信说，不超过两个星期，中共中央将会给苏联同志一封信进行答复。不过，他接着说，我认为我有责任在收到信后立即告知我们对此的看法和意图。你，大使同志，和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面了。

我说，1962年底我接到指示向毛泽东转达(生日)问候。然而，他那时没有在北京，因此我将此问候转达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

我表达出我个人对于中国同志回应苏共中央关于举行双边会晤的建议的满意之情。我强调，如果我们两党代表举行包括最高级别领导会晤在内的会议更频繁的话，中苏之间就不会有现在出现的这种紧张关系了。我说，我会转达给苏共中央在此谈话中表达的所有想法。总体来说，毛泽东表达了可能访问莫斯科的愿望。

毛泽东说，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而且，在你们(国家)我总是挨骂”。他说，我更愿意远离挨骂。将来我希望能够访问贵国，他说。

带着讽刺的口吻，他开始回忆他是如何“与斯大林争吵”的(中国与会者发出会意的笑声)。谈到他1949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说他不想去那里“听斯大林的批评”。他继续说，原来，那时斯大林不想与中国签署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向我建议(在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陪同下)去列宁格勒旅行。毛泽东说，我对他们说，在莫斯科“我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并拒绝了这次旅行。他说，“我在桌子上挥舞着拳头声明，我不是来苏联参加斯大林70诞辰庆典活动的，我对与国民党分子继续维持关系的条约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继续说，最后，我当时表示几天之内就会离开莫斯科之后，斯大林才改变了他的看法。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他收到一个文本，是斯大林事先准备的“他(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这个文本的问题中，有一个问我打算继续留在苏联多久。“准备好的答复”说：“还要一段时间，以便签署条约。”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的同意下公布了这个消息，此后，我开始等待周恩来的访问，他是总理，必须由他签署条约。然而，他没有立即获准来莫斯科，给出的理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

时出现在苏联会被资产阶级报刊看作是中国政府向莫斯科的靠拢。①但周恩来最终还是来了苏联。之后联系到长春铁路和其他问题的一些争论开始出现。

毛泽东说,当时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这种怀疑是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被解除的,在我们手持武器与美国人的斗争中,我们的关系开始改善了。他说,这些回忆属于“旧账”。我们“告诉你们这些事不是为了要公开”,只是对了解我们的人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

再度回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可能访华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们希望能够实现此行。对于我补充的中国同志如何看待赫鲁晓夫访华的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简短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说,这次赫鲁晓夫到中国来举行两党会谈将采取公开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回顾了1958年“与尤金关于共同舰队问题的争论后”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的情况,第一,他说,赫鲁晓夫同志的那次访问本来决定是一次秘密访问,结果有关发表公报的问题就来了,后来决定对访问“解密”。

在随后与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他主动谈起国内的生活问题。他说:你们的情况比我们好。你们有一个强大的重工业。他说,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情况比前些年要好些,但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困难问题上,就会影响农业和工业。他说,按照英国的数据,中国宣称1962年收获1.85亿吨粮食,是夸大了。实际上,粮食的平均收成应该在1.5亿—1.6亿吨之间。与1961年相比,1962年的粮食生产增加了1 250万吨。

他继续说,我们的工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们确实能够自己生产很多东西了。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不具备生产大型精密机床的能力。

周恩来补充说,困难在于,他们无法生产整套的合金原料,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整体上是低下的。

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缺少精密机械、轧钢机和原材料。至于农业,我们拖延了5年才开始着手。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发展化工,生产各种化肥,各种农业机器和机械,这些机器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使用——开始是播种,之后是照看庄稼,最后是收割与运输。毛泽东这时重复说,他们把农业拖延了5年,晚了。

我评论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向人民公社的调整。毛泽东回应说,在生产大队的调整过程仍在进行中(他说,准确地讲是“生产大队”而不是“公社”),大约有15%—20%还没有作调整。

毛泽东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自发出现的私人贸易的顾虑,投机、受贿和腐败现象一直在增加。他说,中共中央现在正在制定一个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在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说,新资产阶级分子将会产生和发展。“如果我们不掌握他们,他们就会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

谈到国际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近来一个时期急剧恶

① 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有误,斯大林阻止周恩来访问是在1949年12月16日的会谈中。——编注

化。目前，不仅美国和法国的矛盾激化，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也是如此。英国与美国也有很多矛盾。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通过这一点，毛泽东指出，我并不仅仅指日本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指美日垄断者之间的斗争。他说，这种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的间接同盟者，他们的争论对我们是有利的”。

再次转向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有凝聚力，在可能的程度上，解决我们中间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的，可以暂时搁置。总体上，他说：“我们之间停滞的关系应重新活跃起来。我们相互批评只会让帝国主义国家高兴。”

毛泽东一再重复，中共中央打算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并“对指责中共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共产党部分地给予回应”。他着重强调说，此后，我们会暂时停止我们的声明。

随后，毛泽东表示自己的主要思想就是一个“停战”与“和平”的概念，这是在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中建议的。他说，他谈论更多的不是和一场血腥的战争相连的“停战”与“和平”，因为“我们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由“舌头和印刷字”进行的。此时，毛泽东对我说，我们的使馆人员不该怕这个，也不该觉得过于紧张。

即使在家庭中也有争论，更何况两党和两国之间了。人们应该讨论这些产生的问题，并逐步找到消除分歧的办法。有争议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人们可以)耐心地寻找途径来逐渐解决它们。

这时，毛泽东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并引用了信中的提法：“在会谈中人们可以逐点讨论所有关系两党利益的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他们所关注的，这涉及我们斗争的共同任务。一旦这些问题被考虑，就从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不同的意见的存在，那么就应该同意采取措施，这将有利于拉近彼此的立场。”

表示出对这些提法的赞成态度，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意见都很好。不过，他立即表示，苏共中央的信中只是笼统地讲了可能存在的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相信，“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要达成一致，即可以做出决定，有争议的问题将被暂时搁置，而不是写在长篇的文章里相互指责”。

我指出，鉴于我们之间的良好意愿，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完全能够克服的。我提起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同志与刘晓大使的谈话中有关党派团结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渴望重新开始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从一张白纸”一样开始。

在概括地谈到即将举行的会议以及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时，毛泽东说，也许，从现在起，要避免1960年9月中共代表(由邓小平任团长)和苏共代表(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同志参加)之间的那种双边会晤的情况。在那次会议上，“两方都是谈自己的意见和为自己辩解”，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意见。我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同一年，在1960年，毛泽东继续说，有一个由26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委员会的努力下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还有一次经历是在1960年的81个党的大会上，大家都在争先讨论自己的事情。

刘少奇在此时加入了谈话,补充说,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会议工作的最后几天。他继续说,直到我见到了赫鲁晓夫同志,起草委员会才就会议中的所有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经过了事先同意的。

人们可以使用不同方法进行协商和会议,毛泽东继续说。如果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他说,好像在自言自语,人们可以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推迟由起草委员会来处理,如果部分问题不能当即解决,人们可以推迟到以后的协商会议中。根据1960年81个党协商会议的经验,很有可能最终我们两党将要承担起有争议的问题,在两天之内达成协议。

另一种方法也有可能,毛泽东说,即按照1957年莫斯科协商会议的经验召开协商会议。当时邓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与其他同志一起,在一个组里,来完成最后联合宣言的草案的编辑工作,然后它以苏共和中共的名义提到会议上讨论。因此,有两种方法,毛泽东说。在您看来,哪一个更好,大使同志?

我回答说,我们支持后一种方式,这样的方法,将会以最快的方式结束争论,消除分歧,增强凝聚力,并加强团结。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的说法。

加入谈话后,刘少奇说,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在中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谈中制定共同文件的草案,只有在那时才能召开协商会议。1957年的协商会议,他说,在会议前很短的时间里解决提出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别人等待。"毛泽东同意地点了点头。刘少奇继续说,如果我们两党没有马上达成协议,我们在其他场合仍然可以走到一起。

毛泽东说,总之,我们可以用上述方法之一。重要的是所有的会议和磋商最终都能加强团结。他指出,虽然1960年协商会议有许多争论,但是他们采用了闭门的方式。

刘少奇指出,西方报纸公开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一些细节。对着毛泽东,他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公布了莫斯科会议上他们代表的发言。

毛泽东回答刘少奇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对本次会议和谈话表示感谢之后,我说,从毛泽东同志今天的谈话来看,苏共中央非常渴望加强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凝聚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种愿望在1963年2月21日的来信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我强调说,我们的凝聚力会是对那些试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伎俩的最好回答。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所说的话。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反对向报纸公开他此次接见苏联大使的短讯,还问我是否要向莫斯科询问。

(在与安德罗波夫同志于当地时间24点通过高频电话后,我向中国通报了我们同意公开此短讯。)

临别,毛泽东做出友好关系的保证。我表达了毛泽东尽快恢复健康的祝愿,也希望他在将来能够访问苏联。

毛泽东在感谢(我)之后，回答说，将来他不排除这样一次访问的可能性。

刘少奇、周恩来、伍修权在谈话结束后把我们送到车上。

总体而言，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进行交谈。如果和他在过去两次会议上留下的印象相比，这次毛泽东看上去更具活力。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使用笔记，只是不断地参考苏共中央来信的译文以及他在信上的批注。我们没有留下他身患重病的印象，尽管他在谈话过程中一直半坐或半躺在床上。

在中方，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阎明复参与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6, д. 7, л. 98 - 121

№24299

齐宾致苏共中央报告：利用老挝国王到达北京之机对其表达谢意

(1963 年 3 月 11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致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7 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报告说，老挝国王向成功完成飞行任务伊尔-18 飞行机组进行嘉奖(机长沃罗比约夫)。机组人员接受了老挝勋章，并对老挝国王的奖励表示感谢。

契尔沃年科认为，利用老挝国王抵达北京之机，苏联官方对老挝国王授予飞行机组老挝勋章一事表示感谢是合适的。

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同意该建议，并请求通过苏联外交部就此问题给予相应的指示。

H. 齐宾(签名)

1963 年 3 月 11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425, л. 12

№1384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欢迎毛泽东或中共代表团访苏

(1963 年 3 月 12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3 月 12 日会议第 87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 С. 赫鲁晓夫、А. Н. 柯西金、Л. И. 勃列日涅夫、Г. И. 沃罗诺夫、А. П. 基里连科、Ф. Р. 科兹洛夫、О. В. 库西宁、Н. В. 波德戈尔内、Д. С. 波利扬斯基、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В. В. 格里申、Ш. Р. 拉希多夫、К. Т. 马祖罗夫、В. П. 姆扎瓦纳泽、В. В. 谢尔比茨基、Л. Н. 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П. Н. 杰米切夫、Л. Ф. 伊利切夫、Б. Н. 波诺马廖夫、Ю. В. 安德罗波夫、А. П. 鲁达科夫、А. Н. 谢列平，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副主席 З. Т. 谢尔久克；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函。①

一、非常愉快地接受，但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将前往柬埔寨。②

二、非常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如果不能来的话，那么，欢迎代表团来访。③

信函的文本——不能带有论战的腔调。

与南斯拉夫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④

不可能不考虑到那些正面的过程。

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拥有一致的观点。

---

① 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是对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于 3 月 9 日交给苏联大使 С. В. 契尔沃年科的信的答复函。苏共中央答复函所标明的日期是 3 月 30 日，于 4 月 2 日转交给中方，发表在 4 月 3 日的《真理报》上。参见：3 月 13 日关于给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大使的电报的决议。——原注

② 在致苏共中央的 3 月信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 Н. С. 赫鲁晓夫顺道来北京，以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根据中方的情报，赫鲁晓夫计划访问柬埔寨。而计划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Л. И. 勃列日涅夫对柬埔寨的访问，也没能成行。4 月，柬埔寨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双方签署了关于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协定。——原注

③ 1963 年 7 月 5—20 日，以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并没有消除双方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原注

④ 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 1963 年 3 月 30 日的信中谈到：从南斯拉夫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出发，可以把这个国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这个原因，苏联领导人努力争取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符合兄弟党团结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路线。考虑到近期在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良好倾向，苏联共产党接着指出了，与此同时，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认为必须批判南斯拉夫人的那些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观点(参阅《真理报》，1963 年 4 月 3 日)。——原注

最好发表图尔松-扎德的文章①，没有争议。关于亚非国家代表大会。②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7，л. 65

№2191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文

(1963年3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6月13日会议第87号记录

第50项 关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③

1963年3月13日

绝 密

兹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内容(附录)。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访杨尚昆并向其转达如下内容：

"中国同志建议在报纸上公开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信件和中共中央1963年3月9日信件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我们的信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在信中我们坚持必须克服现有分歧，并因此而不再提出任何像当时中共中央信件中所包含的那些争论性的问题。

---

① 指的是M.图尔松-扎德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委员会苏联代表Л.马克苏多夫的以下文章：《在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和平斗争中巩固团结！实现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真理报》，1963年3月23日)。——原注

② 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于1963年2月4—10日在坦噶尼喀举行的。以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委员会苏联主席M.图尔松-扎德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H.C.赫鲁晓夫向会议的参加者表示敬意(参阅《真理报》，1963年2月4日)。关于会议的总结情况，可参阅M.图尔松-扎德向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真理报》，1963年2月20日)。——原注

③ 本决议是1963年3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通过投票表决方式通过的。相关档案中没找到表决单。决议起草和提交人为Ю.В.安德罗波夫。决议摘要于1963年3月13日发送给Ф.Р.科兹洛夫、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以及给苏联驻中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的电报已由Ю.В.安德罗波夫加盖印鉴。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上留有用蓝墨水笔所作的签注："已获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通过。1963年3月13日。印鉴，1963年3月13日，В.马林"(РГАНИ，ф. 3，оп. 16，д. 241，л. 146，147)。——原注

鉴于中国同志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声称,不论我们同意与否他们都将单方面地公开自己3月9日的信件。苏共中央并不反对双方同时在报刊上公布苏共中央今年2月21日信件和中共中央今年3月9日信件的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想指出的是,中国同志在提出关于公开信件的建议之时所采取的方式,听起来就像是最后通牒,这至少不能证明其这样做是怀着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愿。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我们相信,要达到相互理解的目标就需要我们进行兄弟式的协商以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143, л. 44、81

№16675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权对边界问题的无理要求

（1963年3月21日）

苏共中央,1963年3月22日
第779-c号
莫斯科市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近期经常发生中国边境地方政权就有关苏中两国的国界走向以及一些位于阿穆尔和乌苏里界河中的、自身位置朝向中国领土的苏联岛屿的归属等问题发出毫无根据的声明的事件。此类岛屿有152个,其中59个与中国的河岸相连接。

苏中边界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中的走向是由1860年俄国和中国之间签订的北京补充条约确定的。根据该条约,俄中两国的国界线在离中国河岸的最近地区划定,而河流水域及其大的岛屿均归属俄国。如今,在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中共有1 318个岛屿,其中1 037个归属苏联,269个属于中国,还有12个为两国共同使用,国界从这些岛屿上穿过。

可是，如今中国边境地区的地方政府竟然置条约文件所确定的现存两国边界走向的合法地位和阿穆尔、乌苏里等河流中诸岛屿的归属于不顾，声称苏中两国之间的国界线应以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中心线为准，而分布在该中心线中国方面的岛屿即归属中国。今年1—3月份，仅中国县、区级公安局的代表便向苏方发出了6份内容类似的声明。

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同时，中国边界地方政府有意准许(中国)当地居民前往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等河流中线附近的岛屿从事伐木和捕鱼，并派遣身着便装的军人在这些岛屿上登陆，由此可见，他们正打算单方面地对部分苏联岛屿实施渐进性开发。他们是在中国政府机关的指令下才这样做的(附录有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委员会给中国边境哨所负责人的指令的复印件)。

在1963年的两个半月间，共有27批中国平民和军人登上了苏联岛屿，共计近400人。在苏联边防军要求其离开这些岛屿时，中国地方居民和军人不但拒不听从，而且声称这些岛屿均位于河流中线中国一方，因而属于中国。还发生了这样事实，中国军人试图拘留苏联边防军人和阻止其在边境线上执勤。

例如，1963年2月18日，苏联边防军第77中队第14哨所负责人率领一个由8人组成的边防军小组准备修整一条履带式汽车路，该公路是从前由中国公民在我们的第124、124a和巴尔卡斯等岛屿地区的阿穆尔河苏联一侧领土上修建的。就在这时，从第124号岛方向来了一队中国军人，共有10人并由1名军官带队。他们一到便开始阻挠苏联边防军的行动，并对苏方发出的要求其离开岛屿的建议根本不予理会。

1963年3月15日，中国牡丹江地区公安局边防科科长王秀唐(Ван Сю Тан)中校在与苏联边防军第77中队长的会面中竟声称，似乎是苏联边防军1963年2月18日在巴尔卡斯岛屿上对中国军人采取了非法的行动。他还断言，中方并不打算阻止中国公民登上该岛屿，也不对由此可能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会面期间，我们已向王秀唐作了相应的解释，即苏联边防军是在严格遵守条约文件中的规定，因而苏方对侵犯边境者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合法的。

就中国公民侵犯国界并登陆苏联岛屿的所有事实，苏联边境代表已向中国地方政府代表发出通报，要求其采取措施以维护边境秩序并严禁此类违反边境管理制度的行为，可苏方的此类做法并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中国人以开发为目的登陆苏联岛屿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下来。

如今，关于苏中两国边界走向问题的争议以及中国地方居民和军人在陆路地区违反边境管理制度的活动仍在继续。仅在今年1—3月间，便发生此类事件9起。期间，我方边防人员均采取了相应行动以期阻止中国人进入苏联领土，而中国边境地方政府均认为是我方违反了边境管理制度并就此向苏方发出索赔要求。

1963年2月19日，中国查齐(Чазы)边防检查站负责人对苏方第30边防中队代表声称，1962年12月27日2名苏联边防人员似乎侵入了中国国境并对中国运粮队实施了阻挠。但经事后调查确认的实际情况是：1962年12月27日苏联第77边防中队第5哨所的边防值勤人员在离边境1.5公里处遇到一队由11人组成的中国公民正在穿越苏联领土。我边防值勤人员建议中国人立即返回中国领土，但后者拒绝听从并继续前进，只是在我边防人员的坚决要求下他们才最终离开了我们的领土。

据我方的军事观察和中方违反国境者的供述获悉,近3—4个月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采取了切实措施以加强与苏联交界地区的军事力量。他们增设了10个边防哨所,平均人数为10—30人,而对以前就存在的21个哨所也增派了人员,使其平均人数增至30—60人。

1963年2月10—12日,为保卫边境总数近1 000人的中国边防部队进驻黑河地区,并分布在该地区诸县。

中国边防哨所经常派遣由5—10人组成的武装分队进入那些中国地方政府对边界走向和岛屿归属提出异议的地区。

中国边境地方政府在苏中边界线上所采取的上述行动相当程度上使得苏联边防人员完成保卫国界的任务变得复杂化,而一旦中国公民,尤其是武装部队进入苏联领土,并极力侵占我方分布在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中心线附近岛屿的事件,就可能在边境线上引发各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

目前,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共和国边境地区分布有中国居民66 872人,他们都是在1962年4—5月份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入苏联境内的。在这些人中一部分家仍留在中国的人希望重返中国。苏联边防人员早就打算将这些人移交给中国地方政府的代表,但如今实际办理了移交手续的只有约300人。虽然我们曾多次就此向中方提出建议,但中国代表坚决拒绝接收,并声称理应返回中国的总共只有6万名当时越境进入苏联的居民。鉴于中国代表拒绝接收上述人员,后者已打算以非法途径返回中国。

为了阻止苏中边境形势的复杂化,有关方面已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其在苏中边境地区所采取的各种行动中均要表现得谨慎、克制,而在解决边境问题的过程中均须严格遵守苏联国家边防条例中的相关规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谢米恰斯内(签名)

附件:

复印自副本

机　密

文本第1份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委员会指令

外事办公室

机　密

第45号 1962年10月26日发送

接收人:所有边防哨所,县、市人民代表委员会

内容：就我国渔民在黑龙江(苏方称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诸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渔业生产以及苏联方面提出的要求等问题所发布的指令。

当我方渔民在黑龙江(苏方称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诸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捕鱼活动期间,苏联边防人员经济会要求我方渔民离开这些岛屿。我们认为,我方渔民应继续在这些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渔业生产,并向苏联边防人员声明上述岛屿均属中国,侵犯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如果苏方援引爱辉和北京条约,那我们就要对其声明这些条约的内容正表明上述岛屿属于中国。如果苏方要以地图为证,我们就说该地图是由他们绘制的,我们不予承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就向其声明,即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和我们的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应对他们说：不要妨碍我们完成生产计划。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屿上撤出。我们预计,鉴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苏方将不会使用武力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屿上赶走。而如果他们采取武力措施,我们就必须对其声明,为了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些岛屿撤出自己的渔民,但苏方要对破坏中-苏友谊和自己的非法行动承担责任。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承认说,那些岛屿不是我们的。

边境地区凡涉及两国争议问题的事件,均须根据本指令作出报告。

1962年10月26日

国徽印鉴

翻译：马成松(Ма Чен Сун)少校

李大尉

1963年3月2日

АВПРФ, ф.5, оп.30, п.101, д.424, л.47-52

№13733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总理希望会见苏联国防部长

(1963年3月2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3年3月29日

第348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K.尼赫鲁的谈话记录

1963年3月24日

在波兰大使举办的招待会上我遇见了P.K.尼赫鲁。后者今天早上会见并送走了乘机途经德里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

会谈期间,P.K.尼赫鲁对我说,当他从机场一回来便立刻会见了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并详细地谈了关于自己与马利诺夫斯基的会晤情况。他对印度总理说,苏联国防部长从印度尼西亚返回的时间可能要比以前所预计的要晚一些,因为他已受到了奈温将军的邀请——在返回的途中访问缅甸。据P.K.尼赫鲁说,印度总理当时便说:在这种情况下马利诺夫斯基必然将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经过德里,并可能在德里停留几个小时。

P.K.尼赫鲁对我表示,希望马利诺夫斯基能够与印度总理本人贾·尼赫鲁见个面。P.K.尼赫鲁说,如果能与苏联国防部长会晤,印度总理将感到非常荣幸。P.K.尼赫鲁明确地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很希望得到这次与苏联国防部长见面的机会。

关于有情报显示中国军队正在沿印中边境全线集结并可能发动新一轮进攻的问题,P.K.尼赫鲁表示,不论这些消息是否可靠,印度都要小心防范,以避免去年秋天中国人所发动的那样的进攻再次重演。P.K.尼赫鲁说,印度希望和平解决印中冲突。如果中国人将接受科伦坡提出的对双方都非常合适的建议的话,即使"明天"便举行谈判,印方都愿意。印方已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P.K.尼赫鲁强调,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现在最需要的便是建设国家的新生活和发展本国经济。P.K.尼赫鲁指出,中国也需要和平,其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已证明了这一点。P.K.尼赫鲁列举了自己与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时后者所说过的话,即中国至少需要50年和平发展的时间。于是,P.K.尼赫鲁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便可能成为中方接受科伦坡的建议和两国开始谈判的基础。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年3月2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65—3766页

№23458

莫斯科夫斯基与莫拉维克谈话纪要：苏联的核保护伞①

（1963年4月15日）

（我）应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莫拉维克同志的要求接见了他。……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刚从板门店回来，他告诉了我在这期间的会谈情况。张将军②不在板门店，他（莫拉维克）见到的是一名接替张将军朝鲜上校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希尔将军。……莫拉维克同志告诉这位上校，苏联不会要求小国家提供任何在生产昂贵的核武器方面的援助，并且苏联人民仍旧……坚决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这位上校答复，他知道苏联拥有强大的导弹，这些导弹可能还部署在远东，但是如果把这些导弹交给朝鲜和中国，那远东可能会变得更好、更平静。

……

苏联驻朝鲜大使

莫斯科夫斯基

АВПРФ，ф. 0102，оп. 19，п. 97，д. 4，л. 140

№103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做出反应

（1963年4月16日）

关于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

① 该档案译自以英文发表的摘录件。——编注

② 即朝鲜人民军代表张平山将军。——编注

——采取补充措施,排除宣传中共领导人那些众所周知的特殊观点的中国书籍进入苏联境内的可能性;

——查明再版上述书籍并寄给苏联组织和个人的其他国外中心的资料。

二、责成苏共中央联络部提请各部门和各组织的领导人注意,必须更加详细地向前往中国的各代表团、文艺团体和体育团体下达指示,当遇到试图将他们拖入就争端问题进行辩论或者是攻击苏联政策的情况时,苏联人要能够给予应有的答复。

三、责成苏联外交部,就中国的一些组织以及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现役军人的不友好的、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的行为,向中国驻苏联大使提出交涉。

四、责成苏联外交部,就抵达中国的苏联公民的行为举止问题,给驻中国的苏联大使馆下达补充命令。

五、提交主席团审批。

ЦХСД, ф. 4, оп. 17, д. 529, л. 6

№1384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委托副外长召见中国大使

(1963 年 5 月 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5 月 3 日会议第 95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阿列克谢耶夫、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马利诺夫斯基。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在五一节招待会上的反应。

委托库兹涅佐夫同志:召见中国大使。

РГАНИ, ф. 3, оп. 16, д. 948, л. 1 - 2

№16681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向苏联散发宣传手册

(1963 年 5 月 4 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3 年 5 月 4 日
莫斯科市第 1247－c 号

机　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兹报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宣传资料，其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同的看法。

今年 4 月份，苏联各地区有来自中国的 5 000 册以上的宣传小册子。与此同时，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散发了近千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反苏小册子。

上述资料均已没收。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 谢米恰斯内(签名)

АВПРФ，ф. 5，оп. 30，п. 101，д. 424，л. 67

№09903

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

(1963 年 5 月 17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 年 5 月 17 日
第 472 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 M.A.苏斯洛夫同志：

兹寄上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第一季度的政治信件，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和3月20日信件的反应；苏中两党代表准备举行双边会谈前夕的中国国内情况"。

附上述信件共50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附件：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和3月30日信件的反应；苏中两党代表准备双边会谈前夕的中国国内情况

北京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年5月17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系统向中央通报了中共领导对苏共中央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消除中共同整个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分歧，团结队伍，制止中共领导的宗派破坏活动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和行动所持的态度。

苏共中央遵循中苏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以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高利益，严格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止一次地呼吁中共领导共同寻求能够引导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走向团结的途径。早在1960年会议之后，苏共中央于1962年2月22日，然后又于5月31日两次发去了专函。中共中央甚至对后一封信没有做出答复，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非党的民主组织中更加积极地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尽管如此，苏共中央于1963年2月21日和3月30日又两次致函中共领导，再次呼吁停止危害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重申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设性建议并提议将会谈的时间定在1963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表示同意苏共中央提出的双边会谈的建议。但是在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中，既

没有中央主席，也没有其5位副主席中的任何一位。率领代表团的是邓小平和彭真。这两个人，从上次会谈的情况和此后的活动来看，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特别积极地推行中共的特殊方针。

中共中央口头上答应停止论战，实际上却仍在继续发表论战文章。在这方面，最近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东南亚，特别是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所发表的声明[见刘少奇1963年4月18日在巴厘集会上的讲话(载1963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原注)]，5月12日和15日在河内集会上的讲话(载1963年5月13日和16日《人民日报》——原注)不能不予以注意。中国人的一系列其他行动，也使人对即将举行的双边会谈结果不容乐观并有所戒备，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再次交换意见后，双边会谈改在1963年7月5日举行。

总之，可以断定，正如许多事实和事件所遗憾地表明的那样，中共领导将带着错误的纲领，带着在当代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去参加我们两党的双边会谈，仍将像过去那样，大肆宣传和不断加深它的错误纲领和观点，谋求使兄弟党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康庄大道，背离集体制定的、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里所阐明的总路线及其战略和战术。

(一)

现在已用不着怀疑，中共领导所奉行的方针不是别的，而是从“左”倾教条主义立场出发，篡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篡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并在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得到确认的对新形势下战略和战术问题的评价与结论。一切都已变得十分明显，中国领导奉行的现行方针在实践中破坏兄弟党的团结，制造分裂，客观上削弱整个反帝阵线及其主导的决定的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可以完全有理由说，中共领导的这一特殊方针在当前正在变成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

如果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还可以认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中共领导只是误入歧途分子和动摇分子的话，那么，现在就完全清楚了，中共领导人完全是自觉地推行一条既定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基础是中国领导的当头的意向。在个人崇拜和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而兴盛起来的大汉族主义是产生这种意向的土壤。

中国领导的特殊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有着深刻的根源。这个方针是在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农业国里逐步形成的(6.8亿人口中，农民占5.5亿，工人和职员在革命时期为800万，1957年为2 450万，1959年为4 500万，现在为3 500万)。国内曾有一个强大的中小资产阶级阶层，其思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党的干部，尤其是广大党员，没有及时地用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自己，他们是以摘编的形式，通过毛泽东的那些通俗著作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全集》首次在中国全部出版是1959年，总共出版了700万册，而当时毛泽东著作出版的册数已超过3.8亿册，仅他的第四卷《选集》就出版了2.8亿册(在苏联弗·伊·列宁的著作大约出版了3.17亿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13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出版了前13卷。根据中国报刊的资料,在此期间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总共有160种,700万册(1963年5月5日《人民日报》)。

还应当指出一种情况,那就是汉族的优越感是一代代一脉相承下来的。所有这些都在中共有损于国际主义的民族情绪根深蒂固的思想里反映出来。

本报告对上述指出的情况将不详加论述,认为必须特别予以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在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特殊立场是在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中共领导发表那些有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册,冠以自命不凡的名称:《列宁主义万岁》),是其在当代一些根本问题上持特殊立场的首次集中和公开亮相(在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实际上,这是打着"捍卫"列宁主义旗号,头一次以中共的方针公开对抗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方针。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完全支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结论和论点,并将其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中共领导则相反,千方百计地企图贬低苏共这些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中国领导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歪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段,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观点和结论进行攻击。中共领导竭力散布对这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的怀疑,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搞乱,使他们无所适从。与此同时,它在兄弟党中间加强了宗派活动和组织瓦解工作,再次挑起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重新提出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问题。它声称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似乎已濒于危境。中共领导人宣称自己是唯一彻底的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拯救者。他们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作掩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特殊的亲华集团而四处奔走。

众所周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采取两面派及其他不体面的手段,明显地奉行破坏苏共威信和贬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方针。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领导对苏共进行诽谤性的攻击,妄图破坏苏共的总方针,贬低和破坏苏共的威信。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共领导人从背着苏共隐蔽地进行活动到直接地、实际上是公开地反对苏共。他们甚至面对出现分裂也不肯罢休,"即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垮台了,天也不会塌下来"(邓小平同沙尔基的谈话)。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在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也以类似口吻表明对论战的看法。"论战既然已经开始,"他说,"那就继续论战下去吧。要是论战真的开始了,难道天就要塌下来啦?或者中国的西山上就寸草不生啦?不是那回事!天塌不下来,花草树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照样游在水中。"

过去中共领导人曾经形象地把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比喻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即在局部、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而在主要方面,我们是一致的)。现在中共领导人已经不讲这个话了。不但如此,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公开宣称,分歧不在于条件不同,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以及对他们所抱的态度"(中共中央1963年3月9日致苏共中央的信)。在1962年底和1963年春中国发表的、锋芒主要指向苏共及支持苏共的各国共产党的文章中,已经不是暗示,而是直接公开地

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一方，以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为另一方”的斗争新阶段。文章特意作了一次历史回顾，指出同机会主义的“第一次大论战”的结果是列宁胜利了，“第二次大论战”的结果是斯大林胜利了。“第三次大论战”就是当前由毛泽东和似乎是“最正确”、“最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同机会主义的这一次斗争。虽然没有直接那样说出来，但话中所包含的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这些文章反复强调说，第一次大论战导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大论战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的胜利，“中国人民伟大革命的胜利”。第三次大论战，按照这些文章作者的逻辑，将导致“现代修正主义”的覆灭，殖民主义的最终灭亡及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见《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实际上中共领导已着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大的破坏活动，用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粗暴地诋毁苏共，必欲抹去其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锋队的称号。中共领导忘记了仅仅5年前说过的苏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的话，忘记了当时它坚决主张维护这个地位的态度。中共领导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作掩护，毫无根据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扣在苏共及其他不接受中国纲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头上，其真正用心在于为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夺领袖地位而扫清道路，达到其在政治纲领基础上改变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目的。

这一巨大的思想上的破坏活动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篡改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及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和两次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基本结论，首先表现在下述根本性的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对时代的评价，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焦点的认识，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意义，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设。

第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战术的根本问题上。“针锋相对”实际上被看作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唯一方针，而且，中国理论家们在这个方面的论断，客观上会得出推动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个结论。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被看作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这里隐藏着深远的计谋，其实质可归结为一点，即不惜冒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人为地掀起革命浪潮。中共中央在今年3月19日的信中提出的在双边会谈中需要谈的主要问题中，就有“当今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问题，显然与此有关。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会将自己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和理解强加于人。

中国人把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提出来，一方面贬低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并以此贬低苏共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则竭力夸大中国作为民族解放运动先锋队的作用，使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与苏联对立起来。

第三，中国领导避而不谈或贬低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第三部分关于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基本结论和观点。不仅如此，中国领导还企图阻挠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所采取的符合声明精神的实际措施。中共不仅不支持经互会，而且企图从理论上论证被中国领导人说

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自力更生”方针,以此与之相抗衡。在这一点上不能不看到其败坏苏共及其国际主义行为的声誉,离间社会主义国家和使其脱离苏联的意图。中共暗示这些国家处于对苏联的经济附属地位,这种附属地位以后可能扩大到政治领域。

第四,表示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的结论。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这是因为在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中有很多东西与斯大林当年作为苏共和苏联国家首脑时期特有的现象颇为相似。中共领导人之所以难于接受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恰好敲打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此外,中国人是在利用斯大林来与苏共现领导人相对抗。中共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在同其他党的代表(例如同意大利人)的会谈中公开声称,对他们来说,斯大林是一种“不同意赫鲁晓夫政策的象征”。不排除《红旗》杂志和其他中国机关报刊下一轮(在刚发表《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之后)发表阐述中国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评价的文章,试图为在“第二次大论战”中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斯大林恢复名誉。引人注目的是,刘少奇 1963 年 5 月 15 日在河内党校的讲话中三次引用斯大林的话,把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

第五,不仅在国内,而且远在国外广泛开展吹捧毛泽东运动和宣传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硬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学说。说到这里应当指出,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脱离其他国家的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共领导在当代一些根本问题上不可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新的纲领和新的思想。因此,中共领导只好采取人为的手段大吹大擂地夸大毛泽东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众所周知,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曾起到过正面的作用。但是,现在要把其中的论点机械地照搬到别的国家和各个大陆(中国人固执地要这么做)只会造成(并且已经造成)损失,特别是对那些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只会使其偏离共同制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战略和战术。另一方面,也有人企图把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以及一些由各兄弟党或者某些党(首先是苏共)集体研究所得出的论点(关于思想、组织、理论基础和党的策略,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殖民地和附属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理论,等等)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同时,如上所述,从整体上说,中国共产党人不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们主要是通过毛泽东著作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领导利用了这一点。而且近年来中共几乎不了解各兄弟党首先是苏共党的建设、理论和思想活动情况。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是在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产物。中共领导在近来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已就当代的根本问题勾画出了其基本纲领的轮廓,即中共领导为这种思潮提供思想政治根据并企图在此基础上改变各兄弟党的方向。中共领导在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掩护下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企图篡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结论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唯一真正的列宁继承者及其遗嘱的捍卫者,把自己说成是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领袖。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国的想当头的人现在要办的事情是,把北京宣布为新的政治中心,或者作为第一步,与莫斯科并列为第二中心也好。

（二）

中共领导人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分歧从何而来——答莫·多列士及其他同志》、《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以及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是一种处心积虑的策略。因此，在我们看来，着重分析一下近来中共领导人的策略方针是很重要的。

当前，中共领导为把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强加给各兄弟党又在积极地进行活动。在前不久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虽然明确了某些观点(表面上承认帝国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的基本矛盾，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对革命运动发展的意义，等等)，但这并不是退却，也不意味着要修正自己的特殊观点。作为争夺世界领袖地位道路上的主要策略之一，中共领导要在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非大陆上确立独一无二的政治影响的意图，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出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众所周知，中国领导早先就曾提出一种所谓中共与苏共之间进行"分工"的想法。近来这种想法重又强调地提了出来。1962 年 1 月间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时就讲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在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各国人民注目的中心。《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 1963 年 4 月 6 日在同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在东方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

近来中国为加强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同几乎所有的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并且差不多每一次中方都做出了让步。同时下大力气对一系列亚非国家进行交往[邀请班达拉奈克、苏班德里约、西哈努克、布托、阿里·萨布里访问中国；以盛大仪式实现刘少奇(首次)对缅甸、印尼、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邀请奈温再次访问中国；还邀请非洲索马里和苏丹的国家元首访问中国]。

值得留意的一点是，为实现亚非团结所进行的宣传和采取的具体步骤，不讲业已变得模糊不清的阶级原则，不讲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却把地缘的和民族的特点提高到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位。与此同时，还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亚非国家的民主组织(中国代表在雅加达新闻工作者大会上的行为，吸收苏联作为"欧洲代表"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委会，都是企图从亚非区域性组织里把苏联代表排挤出去的先例)。

在实现亚非团结的想法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占据着特殊地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其在亚洲大陆争夺领袖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但是，最近的一些事态表明，凭借这一点就想在解决亚非团结问题时撇开印度，那是很不够的。而且，中国领导人也看到，没有印度的参与，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得以解决。这样，实现亚非团结的任务迫使

中国领导必须着手解决同印度的边界冲突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又想利用这一冲突来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和离间苏印关系,于是这一问题就一直久拖不决。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亚非国家团结所作努力的效果,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了严重矛盾,导致了科伦坡会议的6个参加国与中国之间立场上的矛盾,并使中国的政治威信受到一定损害。

所有这些也对实现第一次万隆会议所奠定的那些积极和健康的原则带来消极的影响。中国领导竭力人为地将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从统一的反帝阵线分离出去。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得不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兄弟党的支持,而且,显然在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得不到支持。刘少奇的东南亚5国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不意识到,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亚非团结问题是不可能得到顺利解决的。中国人却不希望他们获得这种支持。苏加诺在回答刘少奇关于加强亚非团结的呼吁时说的一番话并不是偶然的。他说,他(苏加诺)献身于"新兴力量"的联合。他解释说,"新兴力量"指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依我们看,当时应当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应当给予苏加诺的想法以全面的和广泛的支持。从事情的本质角度来说,这可能是最具有远见和最为有利的做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暴露了中国领导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真实意图。看来,当时要是能同苏加诺举行高层会见就好了。在会见期间也能提供一个让他更加详尽地阐述他的观点的机会,并且,我们甚至有可能拟定一个共同行动的计划)。

耐人寻味的是,刘少奇在印尼和缅甸访问期间,三番五次地强调加强亚非团结的思想,没有利用此机会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在讲话中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所有这一切说明,不能低估中国领导为在三大洲确立自己的政治影响而采取的步骤。按照大使馆的意见,对中国想当头的人的这一方面的活动,需要进行全面的专题研究。我们觉得,他们的上述路线在诸如对时代的评价和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等这样一些当代重大问题上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这条路线在中共领导所制定的国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上也表现了出来。

在分析中国领导奉行的特殊方针和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问题时,按照我们的意见,必须注意到:这里也有使列宁主义去适应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的企图。研究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近些年新成立了相当数量的共产党(有40个之多),其中多数出自落后的农业国。这正像当年中国的情况那样,很多类似这样的党不是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的,而是围绕着民主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而建立的。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在继承国际无产阶级的传统,借鉴苏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的同时,都以很大的注意力研究中共的经验(在中国的那些众所周知的试验失败之前的一个时期尤为明显),由于历史和经济条件相似,这些经验使他们很感兴趣。加上我们过去对毛泽东所作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不留余地的评价和我们对中共的积极推荐,对于提高中共和毛泽东的国际声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并非总能看清中共的民族局限性以及毛泽东理论观点的自相矛盾、不完善和错误的性质。

由既不属于帝国主义体系，又不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中立国家所结成的广泛阵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寻求发展道路和前途还将经历一个复杂过程。随着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大和这些国家内部发展的任务摆到首位，将出现一个意义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即这些国家年轻的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场正确到何种程度，是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因此，重要的是，一定要让这些党明白，只存在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是苏共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刻不容缓地全面加以研究。我们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是指现在就应该出来直接批判这种可能出现的重蹈民粹主义覆辙的农民社会主义倾向。这样的批判可能引起年轻的共产党和中立国家的警觉和怀疑，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一些农民阶层和中小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党可能对这种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共不理解，甚至会促使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密切起来。因为他们可能把对中共领导的批判看作是冲着他们去的。

对中国人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立场也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将亚非团结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协调一致行动的一部分，那么，中共领导所提出的亚非团结的思想本无可非议。同时，在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中可清晰地看到的对阶级原则实际上的掩饰，则会导致统一战线基础的动摇，导致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共同努力的削弱，并在配置阶级力量和评价谁是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等问题上把兄弟党引入歧途。

众所周知，中共的这种片面的好高骛远的方针，客观上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立国家和国际民主组织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人的行为加剧了中立国家的“喜马拉雅山性”，促使他们转向西方。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他也是国际法学家联合会副主席之一，多种国际组织的成员，科伦坡6国会议的代表)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说，在进步运动中，“社会主义曾是不分大陆，不分种族的”。佩雷拉强调说，他在去年10、11月访问叙利亚、埃及、希腊期间，此前他在访问日本时，感到了苏中分歧对民主运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他接着说，持中立态度的活动家(佩雷拉点了纳赛尔、尼赫鲁还有班达拉奈克的名)有可能向右转，转向西方。佩雷拉将他们比作克伦斯基，“大门既可以向反动派打开，也可以向人民打开”。佩雷拉以塞古·杜尔为例。杜尔曾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活动家。但是近一两年来，他“向右转”得很厉害。因此，在几内亚、西方和美国的影响骤增。佩雷拉高度评价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铲除殖民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说，万隆会议的原则，在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是有威力的(见C.B.契尔沃年科同佩雷拉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4日第462号)。

如果对中共领导在国际组织中的分裂活动不加遏制的话，那么，在中立主义阵线中就可能出现严重困难。这将有利于帝国主义和削弱社会主义友好团体对中立国家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中共领导人应对此负责。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应就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关的问题加强正面宣传，并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加强思想和组织工作。也许，应适当地发表重

要的专题政治文件,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由苏联提出的并在宣言中阐明的全部干净铲除殖民主义的思想上来,并对实现这个宣言的情况做出总结。同时,要以事实揭露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所谓援助的实质。

中国领导人明白,在实现其当头的方针的道路上横着一个苏共,而苏共的外交路线得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和世界进步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共领导虽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结成了反苏言论的广泛阵线,但是,考虑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中共领导认为公开反苏的条件还不成熟,还不能说穿"某些人"、"某些党"或者"有些人"的字眼指的是谁。

不但如此,中共领导人近来还变换了手腕,其实质在于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中共和中国领导受到了来自"帝修反"的攻击。因此,中共领导除了进行自卫,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领导及其在当代国际生活中的路线哪怕有一星半点的批评或微词,都被认为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攻击。此外,中共领导还将其现在的纲领与列宁主义等同起来。每一个与中共意见相左的党都被指责为反列宁主义的党,而那些向它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则被宣布为列宁主义的叛徒。为了替最近发表的对兄弟党,特别是对那些处于复杂斗争条件下的兄弟党(如美共、法共、意共、印共)进行无端的粗暴批评的文章作辩解,中国领导声称,有 100 多篇来自兄弟党的讲话向中共发难。尽管如此,中共似乎表现出了"大度",仅对 3 个党作了回答。其实,中共领导人只是利用一些兄弟党的个别的、顺便的、相当委婉的、没有超出党内辩论范围的意见,公开地对他们大加指责,其主要用意是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自己的政治纲领。

中共领导对兄弟党进一步施加压力。在这个方面,刘少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基本意图表现得相当明确。

刘少奇今年 5 月 12 日在河内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把他前些时候(1961 年 6 月 30 日在庆祝中共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所下的不同于 1960 年莫斯科声明提法的定义具体化,提出三个基本观点。按照他的话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是: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互助合作,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给予有力的支援。刘少奇强调指出:"这就是说,不能片面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并把它扩大到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之间,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和平共处来取代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且不允许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来代替各个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今年 5 月 15 日在河内向党校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明确并公开地对越南同志施加压力。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在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当今条件下,"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斗任务是不回避挑战……而要团结一致,以彻底打退进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刘少奇特别提请注意的一点是,现在不能"袖手旁观",不能"走中间道路"。刘少奇在河内的讲话中重点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很多观点"绝对不是什么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老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观点在新的条件下的翻版和发展……"他号召听众研究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文章。谈到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时，刘少奇实际上又重复了中国的"指挥棒"的论点。他指出，必须反对"只啃书本，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经验，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人云亦云"。

在中共领导以往同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代表进行两党接触期间，刘少奇讲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诸如，主要的不是中国帮助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相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帮助了中国。还说什么"有些人不顾事实，总是强调自己对别人的帮助，却闭口不谈别人对他们的帮助。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对刘少奇与胡志明联合声明(见1963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的初步分析表明，中国代表团对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所施加的压力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中方得以使越南同志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在这个声明里写进了一系列反映中国领导人立场的观点。诸如，在分析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给帝国主义统治基础带来沉重打击"，而社会主义阵营只有同这一运动相结合，才能"在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联合声明强调指出，"当前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此外，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其经济成就对世界发展进程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的必要性却闭口不谈。声明对苏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只字未提。中方重申了它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越南人只不过是笼统地表示支持"三面红旗"的政策。

提到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国防力量的必要性时，联合声明贯彻中国路线，并号召"要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核优势"。

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仍像过去一样，越方在声明里实际上完全支持中国人。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从联合声明来看，越南同志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问题上没有接受中方固执地要强加于他们的立场(包括刘少奇今年5月12日和15日的讲话在内)。联合声明没有反映出刘少奇所讲的"不能片面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的论点。虽然在这个声明里把修正主义说成是"在现代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但是这个问题的提法大体上与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内容相接近。对教条主义也不是从刘少奇今年5月15日在河内讲话中提到的那个角度下的定义。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样几个方面：没有称南斯拉夫为非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阿尔巴尼亚未置一词，没有提及亚非团结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和中越联合声明提出的路线都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是在双边会谈前夕对于公开攻击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试探。可以肯定的是，刘少奇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一些观点，在双边会谈期间和在兄弟党会议上，中方将试图在这些观点上对我们发动攻击。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活动中的下述重要方面：

一、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许多年来特别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一直是用中共

领导人的特殊观点的精神对全党和人民广泛进行思想灌输，并批评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在中国缺少对苏联、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活动的客观报道，同时还广泛扩大发行半公开的报纸《参考消息》，其中除了载有专门从资本主义国家资料来源中选择的反苏材料外，还开始出现新华社自己的歪曲报道(见“使馆专报”)。

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正在有目的地分阶段进行着：首先对干部和共产党员进行教育，其次是对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军队、青年、民主党派等，还在报刊登载相应的论文之前，就在会议上，甚至在政治学习中研究了他们。

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和苏共进行系统的愈来愈加紧的攻击，迫使许多正直的好的中国共产党员进行思考。他们想弄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收到有关反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言论的消息。特别是中国公民寄给使馆或者通过使馆写给苏共中央和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见《使馆来信概要》1962 年 11 月 12 日第 787 号，1963 年 1 月 29 日第 177 号等)。

看来中共领导人了解这些情绪，所以为了“缓和”这些情绪，时而采取一些措施，以调整反苏运动的白热程度。想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共领导人才在最近采取了一系列“团结各民族”、“缓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措施。在实行“调整”方针的过程中提高了某些级别的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对农民做了重大的让步(返还了自留地，鼓励发展自由市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灵活策略，延长了支付定息的期限，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进行了大量工作。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进行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等)。

为了把党和人民团结在中共领导人的周围，进一步提高毛泽东的声望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罗瑞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思想是粮食、武器和指南针。”在中国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新阶段这一思想。中国报刊上最近的一些有名的文章(据某些来源称，他们是由毛泽东撰写的或者由他审定的)被当作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马列主义代表作”(郭沫若)。

在中共领导人的特殊方针最为露骨的时期(1962 年 10 月至 1963 年 3 月)，即中国报刊登载一系列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众所周知的文章时，在中国，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思想影响的斗争笼罩了整个宣传活动和思想生活。这个任务成为文学和艺术领域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务。“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罪状是他们的作品背离了阶级立场，鼓吹全人类的超阶级的道德，诋毁革命英雄，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自私自利做辩护，宣扬淫乱等。中国的批评断言：“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与共产主义之间画等号，没有坚定地抵制西方国家的影响，腐朽的文学艺术渗透到由“现代修正主义者”领导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等。

在批判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国文章中没有直接点苏联作家作品的名。但是在阅读这些文章时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文章都(间接地)评论到下述一些影片，如《第四十一个》、《人与兽》、《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伊万诺夫的童年》等。中国的个别负责工作人员在同苏联艺术活动家谈话中，公开表示自己斥责上述影片中的某些影片。

中共领导人之所以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对"现代修正主义"展开进攻，除了上述诬蔑苏联文化的目的之外，还想以此为他们实行的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断绝文化联系的政策找出"根据"，限制苏共和兄弟党对中国舆论界的思想影响。而实际上近年来，由于中国方面的过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显著减少了。1962年文化合作的规模比1961年的水平大约降低了30%，而与1957—1958年相比则减少到原来的六分之一(按参加活动的人数计算)。中国的组织机构向苏联购买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比1961年几乎减少一半，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书籍则减少了三分之一。苏联报纸的零售份数也不够多(例如在北京，《真理报》大约为30份)。苏联的纪录文献影片和科学普及影片的购买量(与1961年相比)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最近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关注加强军队中的思想工作。今年2月2—28日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工会议，会上周恩来和彭真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报告。他们的讲话均涉及建设符合现代时代精神的革命军队问题。有消息说，周恩来好像在回答一旦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处于何种状况的问题时说：众所周知，现代战争将是热核战争。敌人将热核武器打击的主要力量指向那些工业比较发达且有热核武器潜力的国家。他强调说，至于中国，为了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与如此众多的人民作战，帝国主义者就要投入大量的士兵，这就使自己的殖民地发生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中便会发生起义和革命(见苏联驻中国武官瓦西里耶夫同志与保加利亚武官扎伊莫夫同志的谈话记录，1963年3月11日第239号)。顺便说一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人员在同苏联代表的谈话中在这方面表示，现在似乎可以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因为美国人不能向那里投入2万名以上的士兵，以保住自己在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免受威胁(摘自今年5月初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员的谈话)。今年5月12日中国负责干部在同匈牙利工会代表团谈话中说，一些人错误地指责中国消极地对待解放台湾这件事。中国对此有着明显的目的，通过保持现状来吸引可能投入亚洲其他地区用以镇压革命运动的美国大规模军事力量。

据现有消息，今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讨论现代条件下公安机关活动问题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报告。毛泽东关注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必须更加严格遵守法制，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加强这些机关的教育作用，使他们在工作中依靠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刘少奇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来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风都带进国内一些"影响呼吸的灰尘"。刘少奇强调指出，应当特别小心地过滤来自北方的灰尘，应当辨别那里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见斯米尔诺夫同《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张的谈话记录，1963年3月19日第290号)。

二、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的战术企图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上，以引导兄弟党不去揭露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且认为修正主义似乎不仅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而且程度愈演愈烈，范围愈来愈广。虽然南共联盟依旧遭到经常批评，但这种批评不是主要的，也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批评，也不考虑南共

联盟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变化,而是利用南共联盟作靶子来攻击苏共。看来,现在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满足。况且近一个时期南共联盟采取了一系列接近社会主义国家的步骤。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共领导人为他们发起的围绕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喧闹寻找理由时,决定扩大对修正主义的指控,继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甚至把较大的兄弟党的领导人像陶里亚蒂和多列士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名活动家,都算在“修正主义分子”之列。

因此可以预料,在双边会谈中及在即将举行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上,中国领导人会试图把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作为主要问题。至于谈到教条主义,中国领导人虽然也会提到同机会主义的这一变种作斗争,但是,他们的解释只能是从有利于中国人的立场来批判教条主义,不但如此,他们还把利用苏共经验的人指控为教条主义者,从而把兄弟党引入迷途。比如,这一点从刘少奇今年5月15日在河内对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一些文章指出,教条主义“不加选择地仿效其他国家的经验,强加于国内群众”,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人物谈话时也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强调指出:“最好是你们自己能够解决重要问题,而不必求得国外的指示。”

中国领导人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斗的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及其他党进行激烈的不应有的指控,企图引起苏共方面神经过敏的反应,从而加剧公开论战,使中国人可以把公开论战的责任转嫁给我们党。假如苏共不捍卫这些党,那么按照中国人的打算,这就可能被用来挑起这些党和苏共之间的纷争,使他们远离苏共,甚至对苏共产生不良印象,似乎苏共丧失了自己的原则性和战斗性。

中共中央进行批判的腔调是很典型的。它带有公开不尊重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性质。中国文章中关于“指挥棒”、“指手画脚”这类言词的真正用意在于阻止兄弟党支持苏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士气沮丧。中共领导人力图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即如果某一兄弟党直接反对中共、支持苏共,中共领导人可能指控这个党没有独立性,以刺激它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看来,形象地说,中共领导人的企图是把某些党赶入战壕,让他们孤立苏共,而且面对面地同苏共展开论战。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大肆向国外散布自己的言论。他们将最近的几篇文章刊登在中国所有的报纸上,并以最快的速度用14种外文出版了单行本,而且多次向国内外广播,广播均以国际歌结尾。在中国国内,载有上述材料的小册子免费在饭店、餐厅、车站和机场发放。中国的广播电台还通知听众,希望得到这些文章的人可将自己的地址告诉电台。在国外,中国的各种代表机构积极散发和宣传这些文章。与此同时,兄弟党的文章,其中包括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的信,仅被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他们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大力宣传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中国人在退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后,提高了《北京周报》杂志的国际作用,开始用数种外文出版。中国人还利用长期驻华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充当他们观点的喉舌,以她的名义印刷、出版并以致友人信件的形式向国外散发小册子。

中共领导人还不厌其烦地唆使或者公开号召各兄弟党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中国的文

章，他们这样做并非没有用意。众所周知，中国发表这些文章之前，先在骨干中后又在广泛的社会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这些文章的基本论点。与此同时，大家知道，其他兄弟党并未进行反对中共的宣传工作。中共领导人催促兄弟党刊登中国文章，是想从内部瓦解他们，促使其党内产生或复活反对派组织和派别。引人注目的是，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各阶层中广泛发行的半公开刊物(《参考消息》)，经常刊载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种种谣言，说包括苏共在内的一些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好像出现了反对派。

中共领导人发表了对兄弟党进行粗暴抨击的文章后，接着在自己1963年3月9日的信件中声明停止公开论战。但是，正如后来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在准备双边会晤的阶段并未停止论战，而是在继续进行，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和方法。中国的一些资料照旧积极地散发到国外，而且为此目的还利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其他代表机关、国外的对华友好协会、阿尔巴尼亚的报刊和电台、国际运输航线等(见1963年4月8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关于中共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交换信件后继续进行分裂活动》的参考资料)。

中共领导人继续进行公开论战还表现在将日本和印尼别有用心地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刊登在中国报刊上。正是在这个时期，阿尔巴尼亚报刊更加起劲地开展了肮脏的反苏诽谤运动，看来这也不是偶然的。

中共领导人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旨在影响一些兄弟党的措施。最近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了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出版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到中国访问。有人说中共企图召开亚洲一些共产党代表的共同协商会议，以便协调总的行动路线。同时，某些中国人士声言，他们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因为苏共领导人"经常同经互会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共产党交换意见和协调自己的行动"(见1963年4月6日斯米尔诺夫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的谈话记录)。

一系列事实直接证明，中共领导人企图在个别兄弟党内部制造分裂，想把这些党的某些领导人拉到自己一边。中共一直支持个别党内的亲华派别，积极协助扩大他们的影响，并积极协助他们的派别活动。例如，这反映在中国报刊对芬兰、英国和比利时共产党最近的代表大会及新西兰共产党全国会议的情况介绍上。中共领导人的所有这些行动，尽管目前带有隐蔽性，但均旨在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兄弟党疏远苏共，散布怀疑苏共方针正确性的言论，降低苏共的国际威信。

三、中共领导人口是心非地声明自己信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而实际上继续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实质上显著减少了与不支持中共立场和观点的、包括苏共在内的一些共产党的联系，并且也减少了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系。如果说苏共不顾现有的分歧，力争扩大与欧洲以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劳动党等)的政党间和国家间的联系，那么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只是同阿尔巴尼亚、朝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同越南保持事务性联系。

还应当指出,由于中共领导人的过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国家间联系也显著减少。我们两国之间在外交步骤和行动上的相互通报几乎终止,实际上只是苏联单方面进行通报。最近向中国同志转交了有关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资料,然而从他们那里则一份通报也没有收到。交换代表团几乎减少到零,中国军队和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除外,在某种程度上越南民主共和国也除外)军队之间的事务性接触和联系也中断了。

中国同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合作急剧减少。例如,苏联向中国供应成套装备的总规模 1962 年降到 1959 年的四十分之一。中国拒绝在 1964 年以前,从苏联接收过去通过合同订的成套设备。总体讲,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根据中方的倡议急剧缩减,从 1959 年的 18.9 亿卢布减少到 1962 年的 6.45 亿卢布。在今年的相互供货贸易谈判中,中方采取了进一步减少同苏联换货额的步骤,停止或显著减少了向苏联供应许多传统的中国商品(锡、水银、桐油、生丝及其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干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中除了指责苏共"大国主义"("指挥棒"的论点)、"施加经济压力"等外,还开始积极散布新的罪状,说什么苏共在各个时期都采取过"冒险"行动。中国官方人士在其他一些场合也歪曲事实,伪造事实。他们考虑到对苏共的指责很少有证据,会对理解所涉及的重大问题造成一定的混乱,所以先委托中国党政机关和组织的中层干部进行散布上述指责的工作。想必是中共领导人认为,谈话的内容将上报兄弟党的主要人物,会对他们的立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见扎尔科夫与季米特洛夫 1962 年 12 月 25 日的谈话记录,1963 年 1 月 15 日第 74 号;莫丘利斯基与斯托耶夫 1962 年 12 月 30 日的谈话记录,1963 年 1 月 14 日第 42 号;格鲁舍茨基与库库奇卡 1963 年 3 月 12 日的谈话记录,1963 年 4 月 12 日第 338 号)。

在这一方面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马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发表的某些意见很有价值。马丁今年 3 月中旬从布达佩斯返回中国时,在莫斯科同苏联驻中国大使会谈时说,匈牙利高度评价苏共的政策。同时他指出希望各兄弟党互相间更加紧密地协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个别实际问题上的行动。他特别谈到,可能不该邀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让朝鲜劳动党代表发言;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发言时似乎不应搞成起哄的局面等。马丁还指出,或许应当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协调行动,使他们不受来自中共方面的攻击,若无必要不给中共进行各种攻击的借口。类似的想法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治乌的谈话中也有所表示。他在同我们谈话时谈到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最近的一次全会(1963 年 3 月)。用他的话来说,全会强调,必须坚持经互会国家兄弟党会议上协调的立场和文件,不经集体协商不要单方面进行修改(见 C. B. 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 1963 年 4 月 24 日的谈话记录,1963 年 4 月 30 日第 415 号)。

中共领导人的策略手法之一,就是在自己的党和人民面前以及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有主动精神。中国宣传的以下说法就是为这一手法服务的:似乎是中共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也许,毛泽东 1963 年 2 月 23 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报道这次谈话以及发表苏共中央 2 月 21 日的信和中共中央 3

月9日的信，也主要是为这一手法服务的。中共领导人想以此表明，他们不仅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有原则的”批评，而且也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以“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实际上，中共领导人现在采取的策略方针旨在动摇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破坏苏共的国际威信，使兄弟党与苏共分裂，以便为树立中共的世界领袖地位扫清道路。

（三）

我们还认为有必要在苏共和中共两党代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前夕，通报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形势。

在中国目前可以看出，经济困难比起1960—1962年有某些缓和。由于实行“调整”方针，中国国民经济的改善有了一定的有利条件。1962年谷物和蔬菜的生产有某些提高。工业生产基本上停止了下降，个别部门（化学、农机制造、个别种类轻工业商品）比起1961年产量有所增加。居民的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供应有些改善。同时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仍然处在停滞状态，而中共集中主要精力关注的农业在主要指标方面至今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而对农产品的需求却显著增加了。在经济作物（棉花、茶叶和油料作物）生产方面情况仍旧困难。

进行“调整”的一条经验，便是在某些情况下恢复“大跃进”初期曾经实行的一些健康的经济形式和方法，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首先是苏联的经验，虽然后一点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谈论。现在很重视具体的经济问题、核算问题和个别部门生产和分配的监督问题，很重视物质刺激和按劳分配原则。最近，中央和各地就农业和工业问题多次召开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

忽视国民经济计划乃是尽快调整的国内经济生活道路上的严重干扰。在中国已经好几年没有正式批准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了。1963年中国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但这个计划至今未批准；这个五年计划最快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审议。总的看来，中国领导人在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具体确定最主要的经济方向上正经受着巨大困难。周恩来同苏联大使今年5月9日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同志正在研究经济，但是仍然好像摸索着确定其前景，特别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应当指出，中共领导人尽管由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而有了一定的觉醒，但是，大概出于保护面子考虑，他们仍然声称“三面红旗”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据我们观察，现在他们主要是在节日活动、大的国家活动或外宾来访的场合吹嘘“三面红旗”。

中共领导人在保留这些方针的旧名称（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同时，逐渐给它们补充新的内容，以便以后可以重新围绕“三面红旗”开展吹嘘宣传运动，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按他们最初的想法这些方针本来是这样的。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中共领导人调整好经济生活后就开始新一轮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攻击，指责他们以反华言论参加帝国主

义和反动派的大合唱，指责他们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三面红旗”的胜利前进。

中共领导人考虑到中国国际威望的下降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式方法问题上的严重失算和错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他们在政治工作方面继续重视“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提前宣布即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注意在国内加强法制，加快制定法律等(众所周知，在中国至今尚无刑法典、民法典及有关劳动、婚姻、家庭和监护等方面的法典。在国内实施的基本上是临时的法律规定，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以及公民的法律地位无法可依)。

尽管中国人民已有多年(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实际上得不到关于我党和苏联人民生活的正确客观的消息(相反，歪曲报道现在有增无减)，但是，关于苏联实际情况的消息不可能不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那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到，由于消除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我国党内和国家生活中恢复了列宁准则，这给苏联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影响。虽然中国领导人不承认苏共的这些举动，但是在生活的压力下，在这些举动的影响下，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步骤。他们在国内采取了一些措施，显示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以及他同群众、同人民的亲密联系。特别是近几个月，毛泽东频繁会见各种会议和碰头会的参加者，等等。

但是总的来讲，上述措施和其他类似的措施(他们也是为了对外宣传)并不能根本改变国家生活，不能消除毛泽东个人迷信在党内和国内的负面影响。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党代表大会的年度例会仍旧不能举行，他们粗暴违反中共例行代表大会的召开期限(根据党章，代表大会 5 年举行一次，而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是 1956 年召开的)，而且不公布党和国家各种会议、甚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资料和文件(简报和一般决议除外)，也不公布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在国内没有造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难怪中共领导人对待兄弟党对他们的任何批评甚至善意的批评意见都极端敏感，对他们的劝告和希望置之不理，对威信问题表现过分敏感，坚持强调自己绝对正确。

还应当指出，中共领导人最近采取了一些步骤巩固本国的国际地位，继续改善中国同大多数亚洲国家(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国)的关系，恢复了 1958 年中断的同日本的联系，中印边境的态势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同非洲一系列国家的接触更加活跃，在发展同西欧一些国家的经济联系方面，中国的活动更加积极(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访问了英国、荷兰和瑞士)。

与此同时，中共实行的与社会主义国家隔离的特殊外交方针阻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巩固。其后果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不仅未得到广泛发展，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中国在和平共处、裁军、争取和平等问题上的立场，在许多国际民主组织中遭到尖锐的批评和谴责。中国代表就这些问题所作的声明，助长了指责中国有侵略意图的资本主义宣传，降低了中国在争取和平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事业中的威信。尽管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确定维持公认的现状，但是冲突至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这不仅妨碍中印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也给整个东南亚的形势带来不良影响。

中国人在围绕中共拼凑追随其政治路线的共产党集团方面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支持中国领导人进行分裂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准备追随他们，形成了一定的共产党小集团，但(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朝鲜劳动党、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表现出一定的动摇。同时，中共领导人还对印尼、日本和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很大的思想影响，在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中，亲中国分子占有强大的地位。

但是整体上讲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中国领导人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纲领，没有得到绝大多数马列主义党的支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意图相反，他们对于像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共产党这样一些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攻击，并没有损害他们在这些国家劳动人民和全世界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信。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党刊登众所周知的中国全部8篇文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刊登4篇，日本2篇，印尼和古巴各1篇，其他共产党——据中国方面判断——完全未理睬这些文章)。可能是由于这些文章未能得到预期的国际反应，中共领导人的新的长达200页的文章《列宁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只刊登在《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没有广播，尚未译成外文，而且也没有像刊登上述8篇文章时那样，对这篇文章大吹大擂。

中共领导人又开始了新回合的攻击，春天进行了特别粗暴的攻击，企图借此引起苏共和其他大党的强烈反应，抵制**H.C.**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停止论战的建议，把论战的责任加给苏共。但是，苏共中央所表现出的克制和镇静，破坏了中国领导人的这些企图。结果正是中共领导人以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

可见，在双边会晤前夕，中共领导人处于复杂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之中。

不能不注意到，中方着重强调中苏两党必须首先达成协议这一论题，看来有它自己的打算。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特别强调，中共和苏共两党达成协议，以中苏两党的名义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制订并提出协商一致的文件，可能是达到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决定性条件，他们说这番话并非偶然。看来他们认为，他们在单独与苏共会谈过程中比在全体兄弟党会议上易于坚持自己的立场，易于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中国人知道，大多数兄弟党赞同苏共的政治观点。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人企图利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在某种程度上将苏共与其他兄弟党分隔开，并把事情说成不是什么中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而是个别党之间，包括苏共与中共之间的意见分歧。

中国方面准备双方会晤的最初步骤证明，中共领导人不是从真诚愿望出发。他们建议在中国举行高级会晤时不可能不知道，在他们掀起的反苏运动形成的环境下，况且是邀请**H.C.**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谈判，这一建议对于苏共来说实际上是不能接受的。看来，中国人也预见到这一点，打算把拒绝高级会晤的道义责任推给苏共。假如**H.C.**赫鲁晓夫同志去中国谈判，那么这会贬低苏共的威信，抬高中共的威信。

中共中央今年3月9日的信件，形式上表示同意与苏共进行双边会晤，实际内容却是粗暴篡改、歪曲苏共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带有尖锐的论战性质。这封信就其内容来讲

显然是着眼于对其他党的宣传效应,中方代表坚决要求公布这封信的立场就能证明这一点。

苏共中央今年3月30日的信件使中国领导人处于相当复杂的境地。这封信再次强调了我党中央坚持宣言和声明的坚定决心,揭露了中国关于宣传苏共背弃这些文件的指责站不住脚。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苏共不容许把自己拖入继续公开论战之中,而且今后它仍将从原则立场出发捍卫兄弟党的团结。从信件中可以看出,苏共真诚地力图举行两党代表的高级双边会晤,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中方。

然而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苏共中央的这一真诚意愿。周恩来1963年5月9日会见苏联大使时声明,为了举行双边会晤,中共中央决定派自己的代表团赴莫斯科,由邓小平和彭真率领代表团。同时,周恩来建议将会晤时间改在6月中旬,并确定谈判约持续10天。周恩来没有解释中方拒绝进行高级会晤的理由。即使撇开毛泽东本人能否赴苏不谈,中共中央如有真诚愿望,那么也可以指派中共中央5名副主席之一参加谈判。

至于将会晤改期和中共中央迟迟不答复苏共中央信件问题,周恩来解释为"工作繁忙","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分散在各地",特别是刘少奇5月20—22日刚刚回到北京。

中方目前这样做有更深的原因。看来,中共领导人现在很难回复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更广泛地展开论战,就会更加暴露他们与莫斯科会议文件背道而驰的立场。

之所以出现这些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中共领导人碰到了苏共中央坚决克制的态度,苏共中央不顾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在我们3月30日的信中表现出建设性和同志式坚决克制的态度。

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近的几篇文章在国外并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明显期望的那种共鸣。给予中国的蛊惑宣传和诽谤中伤以沉重打击的是,苏共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采取了进一步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反对西方文化艺术渗透的新举措;意大利共产党在最近一次选举中的胜利;法国无产阶级在不久前的阶级搏斗中的胜利;以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伊里安等。

这些情况和其他一些情况不能不影响到一些党内的中国追随者,促使他们发生动摇。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的代表指出,甚至在同情中国人的党之中,许多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除外)也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如对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斯大林问题、中印争端等),而总的来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看来这些党没有许诺完全支持中共领导人。

许多人认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引起强烈国际反应的菲·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对中共领导人推迟回答苏共中央最近的信以及他们将会谈延期有颇大影响。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指望依靠古巴人,看来现在他们在等待访问的最后结果。

显然,中共领导人打算利用双边会谈前的这段时间,围绕H.C.赫鲁晓夫同志即将访问南斯拉夫开展一场蛊惑宣传运动。中国报刊在这一方面现在已经开始了宣传准备工作(发

表批判南斯拉夫新宪法的文章，转载国外报刊反南斯拉夫的材料，等等)。

中国人最近一个时期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有关。中共领导人迟迟不答复苏共可能是为苏共中央全会万一讨论中国问题留一手，为了检验苏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停止在党内反对另一个党的声明有无“诚意”，以便收集另外的“证据”，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

中共领导人采取的立场使人们认为，他们将围绕双边会晤采取新的策略。根据种种情况判断，某种不定的局面(毛泽东称之为“暂停论战”)现在正中中国人下怀，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做出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姿态的同时继续攻击苏共，使白热期与休战期交替进行。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列宁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红旗》杂志，1963 年第 9 期)作了一个历史的类比并非偶然，文章指出，列宁当年也反对停止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争论，认为停止论战就是停止揭露孟什维克。文章还强调，列宁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捍卫了党的政治独立性和纯洁性，保证了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广泛地增长。

据我们观察，很难指望中共方面会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中提出任何改善中苏关系、真诚改变整个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建设性措施。可以认为，会晤将被中国人主要用以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中共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中苏关系正常化、防止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中共领导人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中想必不会完全暴露自己的意图。除了中国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的那些观点外，他们仍旧会留一手，准备就苏共新纲领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详细发言，可能集中批评纲领似乎背离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学说，等等。今年 5 月刘少奇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曾经部分地涉及这些问题。在双边会晤中和兄弟党会议上，预计苏中国家关系问题将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在这方面也企图诋毁苏联(大使馆已将中国人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提出的问题清单以及我们的一些建议发往中央)。

目前北京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是苏共和中共交换信件以及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

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一些代表在与我们会谈时，一致对苏共中央在回答中共领导人的粗暴攻击时所表现出的高度原则性、克制态度、耐心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高度责任感深表满意，认为这样做就粉碎了中国领导人把兄弟党拖入徒劳而有害的论战之中的计划。这些代表表示确信，苏共继续奉行这一路线符合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利益，会使中国领导人的真正企图暴露无遗，将是他们分裂活动道路上的障碍。

通过总结我们的观察，概括中共和中国人民当中的情绪，分析国外不同代表人士的意见，大使馆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当前的国际和内政形势下，中共领导人未必会下决心承担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公然分裂的责任。看来，中国人最希望这样的局面，即他们仍然留在共产党总战线的队伍中，可以借此继续进行自己的宗派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宣称：“为了谈判，如果一次会晤不够的话，那么……可以多进行几次会晤”；如果在例行的会议上不能消除分歧，那么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拿到兄弟党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会议上去解决。由此看来，中国领导人现在就已努力制订某种预案，以便在处于少数派的情况下，保持虚假

的统一,但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路线。

中共领导人背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协商一致的路线,现在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斗争将是持久的、复杂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制订我们长期行动的远景计划。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将继续详细研究中国的内政情况和中共的外交活动。

由于正在准备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大使馆现上报以下材料:

中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苏中经济关系,关于中方已提出的和可能提出的要求,关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苏中贸易往来,关于中方对苏中贸易关系可能提出的要求:对苏中贸易的建议。

中国的对外贸易。

关于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中共领导人在恶化中苏国际关系方面的路线。

关于中国外交活动的基本方针以及中共领导人对当代问题的特殊观点方面的新言论。

中国报刊对苏共和兄弟党关于当代基本问题的立场进行的歪曲。

中国中央报刊刊载的关于苏联国内状况和外交政策的材料简述。

中国报刊对当代某些问题进行宣传的政治方针。

中国对亚非团结的立场。

中共党的教育培训系统和内容。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70—3820页

№1384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答复中国

(1963年6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6月10日会议第10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苏斯洛夫、

赫鲁晓夫、格里申、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马利诺夫斯基。

关于对中国人有关不扩散核武器的报告的答复问题。①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8，л. 9 - 11об

№103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3 年 7 月 6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7 月 6 日会议第 77/72г 号记录

第 72 项　关于延长苏联的汉语广播时间。

一、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延迟苏联用汉语向中国居民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广播 6 个小时。

二、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用于扩大苏联汉语无线电广播规模必要的技术工具。

ЦХСД，ф. 4，оп. 17，д. 539，л. 28

① 在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的与不扩散核武器以及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原则性分歧，出现在 1963 年，在两党之间进行公开的论战期间（可参阅《真理报》，1963 年 3 月 14 日，4 月 3 日，7 月 4 日和 14 日，8 月 4 日和 21 日，9 月 21—22 日。还可参阅 За сплоченно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2 - е，доп. изд.，М，1964）。中国方面尤其反对 1963 年 8 月 5 日签署的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并把这个条约视为是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背叛。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 1963 年 7 月 5—20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没有消除双方的分歧（公报可参阅：《真理报》，1963 年 7 月 22 日）。——原注

№08107

苏中两党会谈第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发言[①]

(1963年7月6日)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谈

1963年7月

第一次会议

1963年7月6日

苏斯洛夫同志[②]：同志们，我们开始吧。

邓小平同志！

彭真同志！

同志们！

我代表苏共中央欢迎你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

我党中央对中共中央同意派代表团来莫斯科举行会议、共同讨论我们两党所关心的问题，表示欢迎。[③] 苏联共产党、所有的兄弟党和一切珍视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与一致以及一切珍视民族自由、和平和民主的人，都欢迎我们两党代表团的会见和谈判。他们期待着我们的会谈能够有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事业。

中共中央在3月9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些中共中央认为需要共同讨论的问题。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中也提出了我们认为需要在双边会谈中加以讨论的全部最迫切的问题。[④] 我们认为讨论下列问题是适宜的，这些问题考虑了双方的愿望，也使我们可以逐点地讨论宣言[⑤]和声明[⑥]的全部主要结论。这些问题是：

(一) 为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与团结和把它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斗争。

(二)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所推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三) 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

---

①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②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会议主席苏斯洛夫同志”。——编注
③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分段。——编注
④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分段。——编注
⑤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莫斯科宣言”。——编注
⑥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莫斯科声明”。——编注

的形式。

(四)现阶段世界革命进程的一般理论问题。

(五)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一致的问题。

(六)其他问题。①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使我们两党代表团的注意力集中到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上。

我们认为②，在会谈过程中我们将使用共产党人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语气，应该集中全部注意力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研究两党的真正立场。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各国共产党1957年和1960年会议的决议研究我们的立场，取得两党之间的相互谅解，为重新召开各兄弟党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我们想特别强调：在1960年9月举行双边会谈时，我们的代表团曾阐述了我们对我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问题的观点。后来这些问题在81国共产党会议上又被提出，并由会议的全体参加者全面进行了讨论。各代表团基本上都是由各兄弟党有威信的领导人、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组成的，为了使观点一致并制定出一致的立场，起草委员会化费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各党都同意，要一致通过宣言。③ 该宣言得到了所有代表的同意和赞成，为各党签署④，成了各国党所必须遵守的，成了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共同法律。

我们的代表团再一次强调苏共中央的观点：在宣言和声明通过以后的时间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实践，国际事件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一总路线是在总结实践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通过纲领性文件来共同制定的。我们党严格地坚持不渝地遵守各国共产党的这一共同路线。

在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中宣布："苏共认为，严格遵守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制定的关于共同反帝，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评价和结论，严格遵守在国际会议上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是自己的国际义务。"

苏共纲领考虑了宣言和声明中的全部重要的论点和结论。应当指出的是，苏共纲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基础上对当代的看法、对世界革命进程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灭亡的分析，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问题、争取独立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民族运动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当代的问题进行的阐释，都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政党的集体结论的。

我们党始终坚决地批驳了并将继续批驳单方面修改宣言和声明、怀疑和任意解释及改变1957、1960年会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原则性结论的任何企图。⑤

---

①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第五条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的问题及其他问题"，而无第六条。——编注

②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为"我们希望"。——编注

③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该句为"各国党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取得一致通过的宣言"。——编注

④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⑤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为"我们党始终坚决地批驳了并将继续批驳修改宣言和声明、怀疑和任意解释及改变会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最重要问题的原则性结论的任何企图"。——编注

中共既在3月9日的信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宣言和声明“为我们的共同斗争制定了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苏共中央便严格遵守反映了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在3月30日的复信中阐述了对一些原则问题的理解。①

苏共中央的信是始终一贯的,没有超出宣言和声明的范围,信中包括了我党对会议重要文件中所阐述的那些问题的鲜明立场,并且逐点地支持了苏共中央的政策和总路线,而这种政策和总路线也是在阐述当代一切问题的宣言和声明的纲领性文件中所制定的。

6月15日,在会议的前夕,中共中央交给了我们一封新的信件,并在全世界散发了这封信件。很遗憾,在这封信件中对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重新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对苏共党纲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苏共中央全会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的信件后,认为这些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诽谤性的。

中国同志们在报刊上公布了自己的信件,并把它广泛地散发,不顾兄弟党关于停止论战的共同愿望,破坏了达成的协议。虽然如此,苏共中央决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履行自己关于停止公开争论的义务,并且不在目前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来信,也不发表这封信所要求的我们的复信。我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中央全会的委托,将在会议的过程中对6月14日的信作必要的答复,阐述苏共中央对信中所涉及问题的态度和我们党对世界革命运动主要问题的立场。②

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以前,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未引起争论。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已有总路线一事表示怀疑,实质上,你们企图用你们信件中由25点所表达的新路线来代替现有的路线。

苏共的出发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已经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努力制定出来,并在它们集体的主要文件——宣言和声明中加以阐述。其基础是现时代的定义: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时代,是两个对立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基于对时代的这种理解,声明所持的出发点是,世界上有强大的革命力量,它们团结一致的行动使共产主义思想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时期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声明指出,现时代世界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一般民主运动汇合为

---

①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该段内容为“中共既在3月9日的信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宣言和声明制定的共同意见反映了共同斗争的政策,苏共中央便在3月30日的复信中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阐述了表明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总路线的原则问题”。——编注

② 在收集的俄国档案中,该份文件的以下内容缺失,为便于读者阅读,根据解密的中方会谈记录文本补出了缺失的内容。——编注

统一的反帝斗争的洪流所决定的。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是根据对革命斗争巨大经验的概括和对近十年来世界舞台发生的变化的深刻分析而制定的，它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充分考虑到了现时代特点的反帝、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出发点是，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这个纲领规定要尽力发展和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现时代的所有革命力量，指出了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完全胜利的道路，指出了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和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条件下，将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

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正确的，不需要再修改和修正，它为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劳动者以及所有人民指出了斗争的主要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对现时代、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目的和斗争，以及为实现这些目的所使用的手段进行理论分析的完整而又是有机的统一体。随心所欲地强调其中的某些方面，并把这些方面同其他方面对立起来，这就为有成效地贯彻整个总路线造成威胁。

宣言和声明中阐述的路线是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体现和国际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积累的巨大经验的概括。马列主义理论的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领导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主义范例在世界革命发展中的力量，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特点及当前的任务，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共产党人在群众中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的学说等，在总路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一条创造性的路线，它概括了各国共产党的新经验和世界上发生了的巨大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确定了实际的结论。

根据 6 月 14 日的来信判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喜欢这条总路线。但这不能成为任何人的一种根据去歪曲我们的观点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观点，指责他们似乎把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片面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这是荒谬的指责。

除此之外，在信中明显地表现出否认两种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否认有利用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否认生活本身提出的并对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

你们忽视各国党共同制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提出了一些实质上是对宣言和声明进行总修正的建议。在自己的建议的借口下，你们实质上是在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我们就以你们对当代世界矛盾问题的解释为例。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列举了四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之

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的确存在。但是你们对矛盾所做的解释的缺陷在于修正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所有这些矛盾中的一个矛盾——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不论对整个人类的未来或是从其他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矛盾。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成为世界发展的基础的结论,是列宁作出的。他写道:“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的国家体系,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是关于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和巩固,作为世界发展决定因素的这一矛盾的意义更加增长了。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强调指出,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力量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占优势。难道在现代世界中能够找到这种现象,它未曾受到现代基本矛盾——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巨大影响?不考虑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深刻影响,就不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发展和尖锐化的特点。你们不仅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的主要的矛盾,并且走得更远了:你们说,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个错误的结论,得出了牢固的概念,认为目前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因素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你们说,第一,亚、非、拉美地区是世界上现有一切矛盾的焦点,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

第二,你们说这些地区人民的斗争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你们这些纲领性的观点是同列宁主义完全相抵触的,明显地离开了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应当知道,世界现有矛盾的焦点,也在首先解决现时代矛盾的基地——这就是同帝国主义主要力量相对抗的、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在行动的基地。

尽管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进程的巨大力量,但它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基地。这个运动现在首先是解决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般民主任务,而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并不是集中在这里。

那么目前世界矛盾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呢?世界政治的中心点,以及世界工人阶级的工人运动的中心,或用你们的话来说,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在哪里?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强调指出了,并结合目前形势发挥了列宁的论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斗争,是世界政治、是整个世界社会发展的中心点。现时代的基本矛盾正是在这里解决。世界现有矛盾、国际阶级斗争、世界政治的中心焦点正是在这里。

你们关于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点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列主义相抵触的。这种论点忽视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

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实际作用，贬低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虽然给予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动摇它的基础，消灭它建立的殖民主义奴役制度，但是不能够粉碎宗主国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中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按你们的说法包括除了美国之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也贬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作用。

你们在发挥这一论点时，实质上是认为现阶段世界政治的基础不是两个体系的斗争，而是美国对中间地带的侵略。你们认为，美国反动派在征服这些国家——指中间地带国家——之前，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间地带的概念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这里，偷偷地用地理概念代替了社会概念。这里毫无根据地把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同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新独立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及帝国的残余混为一谈。这样就抹杀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和矛盾。中间地带的概念忽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公约结成了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集团。这种概念导致对这些集团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另一方面，忽视了包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执行反帝政策的新主权国家的真正新地区，即和平地区。

中间地带的理论造成对现代国际关系曲解的情况。这种理论实际是贬低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侵略的威胁，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失去警惕性，使人觉得美国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反革命活动只是一种烟幕。当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描写成美帝的扩张对象的时候，这种概念就会贬低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意图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意义。忽视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复仇政策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对和平的威胁同这种概念联系起来，就特别有害。忽视现实的威胁就会产生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不能同意这种概念，它模糊美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危险，并完全在事实上忽视西欧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西德帝国主义复仇分子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

不久前肯尼迪访问西德时声称："西欧不再会是世界战争的发源地。"

我们认为这是欺骗人民。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反对只能有害于保卫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斗争事业的幻想。

因之，你们对基本矛盾的提法修正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声明和宣言。这种提法对国际工人运动，对民族解放运动，对普遍和平事业无疑是危险的，是不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的。1960 年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全体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达成了共同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现时代的中心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革命运动的一切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所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担负

了不断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义务,它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国际影响正在年年增长。

我们党把实现这些极其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自由的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成果而走上了把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

我们的出发点是:互相援助和彼此支持,以及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

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历史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巩固和相互援助的历史。起初,组成军事政治联盟是为捍卫自由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成就所必需的,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发展不能到此为止。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完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已经沿着加深和完善全面联系和合作的道路更加前进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制定了现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苏联正在尽一切力量来发展与欧洲、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特别重视同那些继承了过去的落后经济的国家实行经济合作。这里没有必要来列举有关的材料,看来这些材料中国同志们是很清楚的。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竞赛中获得了不少成就。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工业产量方面所占的比重已达37%强。在1950年到1962年的期间内,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大约增加了3倍。但是在最近时间内,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生产增长的总速度降低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要求人们予以严重注意。在1951—1962年这一时期,以工业每年增长速度来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超过非社会主义国家1.5倍。然而,假如看看最后这4年的情况,那么我们超越得就相当少了,仅超过0.5倍。我们必须考虑,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如何保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便赢得时间。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无疑会使我们达到这一点。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和潜力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我们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事情的这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并且在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技术和科学的进步、社会关系的改善以及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认为,经济建设问题必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党的注意中心。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之前,利用内部力量曾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途径。苏联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非常懂得这一点,他们曾经不得不仅仅依靠自己,重新建立经济的各个部门。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的伟大的国际主义责任感,是由承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社会发展中作用不断增长这一点而来的,这种责任感就是要很好地和顺利地建设新社会,发展经济,加强防御能力,团结社会主义阵营,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它们实际的实现中成为对一切劳动者具有吸引力的思想。我们在实践中遵守这一义务,我们也呼吁其他一切人都履行这一义务。这也就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实际贡献,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社会主义的优点,与其说是应当根据口头的论断、理论著作来判断,不如说是应该根据具体事情,根据共

产党人如何来解决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来判断。

假如这项任务我们完成得好，这就是对其他国家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巨大支持；假如完成得不好，这就是对这一斗争的打击，因为如果看到不能解决那些正好是推动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例如，提高物质福利，繁荣文化和民主，保证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等等，那么，谁还愿意去进行合作呢。

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同其他兄弟国家合作的途径，才能在自己的发展中取得最大的成就。在尽力巩固每个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同时，还要不倦地促进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的加强，以与世界资本主义相抗衡。

在这方面将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向后拖，阻挠各兄弟人民之间的经济合作过程，那是不正确的，这会给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带来损害。

全面发展所有 14 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加强社会主义体系对国际生活的影响，使社会主义体系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信中列举了将近 10 项要求，按照你们的意见，完成这些要求，社会主义体系就可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给予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在信中却无一处提到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以经济建设对世界革命的发展给予主要影响的论点。根据列宁的这一论点，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向社会主义各国提出了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的领域内，即物质生产的领域内，使资本主义遭到失败。离开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意味着忽视决定我们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成功的主要之点。

同志们，令人惊异的是，你们企图把我们党完全符合声明的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经济成就的范例的决定性力量的立场，描述成为否定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认为单是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就能够自动导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取得胜利，那是荒唐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以及它们在经济上取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将大大地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吸引力，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反帝革命战线。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不是代替一切进步革命力量为争取社会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斗争，但是从根本上使这种斗争容易进行。这些成就使资本主义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声誉扫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不利于反动、战争、侵略的力量，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创造条件。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使那些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这一革命的政治条件更快地成熟，促进斗争中的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而不是什么幻想资本主义会自动垮台。问题只能是这样，一切想为

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应当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致,像爱护眼珠一样来爱护它,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来加强这个大家庭。

同时,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和威力,壮大它们的军事实力,是争取解决当代的迫切问题——防止热核战争和使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斗争成功的保证。

苏共认为,全力促进各自由民族的进一步全面接近,不懈地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尽一切可能支援兄弟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自己的神圣的职责。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承认,现在再没有比使人类免遭世界热核灾难更迫切的任务了。因此,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只要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是和平共处就只能是破坏性的世界战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声明根据这一结论指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苏共在自己的活动中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义务。根据宣言和声明,苏共认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全部活动的头等任务。

我们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和苏共的新纲领中,向党和人民提出了下述争取和平的具体任务:“继续坚持不渝地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力量和加强其威力,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实行作为苏共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对外政策总方针的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始终不渝地执行团结一切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的力量的路线,对力图破坏和平的帝国主义集团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及对揭露战争冒险的祸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不受侵犯。”

邓小平:这种翻译方法使我们不能清楚地了解您讲的话。

苏斯洛夫:为什么?或许需要稍微慢一些!那就稍微慢一点!

邓小平:您所阐述的是重要的问题。

苏斯洛夫:那么我尽量慢一些。

彭真:这是交换意见么。可否您读一段,然后翻译坐在这里读一遍,然后再来另一段。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您讲的话。现在这样很难了解您讲的话。

苏斯洛夫:那样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

邓小平:听来有时声音很大,有时很小。

苏斯洛夫:你那里有调整器,可以调整。

邓小平:为了这样重要的交换意见,可以多占一些时间。

苏斯洛夫:您看一看,那里还有调整器。

彭真:这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调整。还是请您念得慢一些,我们再听听看。您发言可以多占一些时间,我们来听。

苏斯洛夫: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神圣斗争;全力促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国际工人阶级一切队伍和组织的战斗团结。

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中，再一次阐明了我党对帝国主义的、掠夺的非正义的战争和革命的、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且对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是神圣的战争问题的理解。所以没有必要再来谈这个问题。

进行现代战争的手段的根本变化，要求共产党人现实地、根据科学资料了解和分析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能向人民隐瞒这些资料，要把全部真相告诉他们。

我国人民已经有过惨痛的经验：在迷信斯大林的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没有向苏联人说明关于战争的真相，没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为击败希特勒侵略进行必要的准备，反而要他们相信，用很小的牺牲就可以粉碎敌人。

现在问题这样摆着：要不要向人民说出真相，即根据科学家的计算，仅第一次原子打击就会使7亿至8亿人死亡，现代核弹的杀伤力比毁灭了广岛的原子弹要大1万倍，这样的核弹已经有几千个；或者相反，向人民群众隐瞒这些事实，使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些事实，甚至对他们说，核武器实质上不能改变什么东西。

我们认为，采取后一种做法就意味着犯重大的错误，正中了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诡计，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各国人民愈清楚地意识到热核战争的严重后果，他们就会愈自觉、愈积极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反对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

事实上，到底什么可以更好地动员群众进行争取和平、反对侵略和战争的斗争呢？是原子弹根本不可怕这一论点呢，还是说出真相：热核弹能够完全消灭整个国家，世界核战争将毫无例外地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残酷无情的但是现实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而对他们隐瞒这一真相，如果我们忽视列宁曾预言地警告过的这一破坏人类社会生存条件的危险的现实性，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低估核战争的破坏性的后果，只对那些为继续核军备竞赛进行辩解的帝国主义思想家有利。

(中国代表团说听不清楚。)

这种技术我在你们中国也看到过(笑声)。请告诉他们，怎么样调整。

而我们和你们应该十分清楚，如果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不发挥必要的毅力，不对各国人民敲起警钟，不号召他们积极进行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而让帝国主义者发动热核战争，这对人类将意味着巨大的悲剧，对共产主义事业将意味着巨大的教训。列宁在表现出深刻的人道主义和对人的热爱的同时，经常考虑如何避免战争行动。

列宁写道："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给工农带来什么样的闻所未闻的灾难。因此我们必须极其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保持住我们用这样高的代价换来的和平。"

现在，当热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增长，使战争的后果将成为对人类的真正灾难的情况下，列宁的这些话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

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终于发动战争，各国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没有先

例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该尽一切努力,不允许发生定使亿万人死亡的新的世界大战。

对这个当代的根本问题,即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给了十分明确的回答。目前新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的大家庭为主要堡垒的和平力量,可以用联合的努力防止新世界大战。这一极重要的结论是以严格计算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为根据的。

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根据就在于他们毫不动摇地深信:可以制止侵略势力,防止热核大战,世界革命进程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正在并将更广泛、更顺利地发展。

争取和平,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行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斗争的极重要形式之一。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会削弱帝国主义的战线,孤立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增强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帮助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我们认为,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是有机地联系着的。81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近年来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新的重要的胜利,世界革命进程正顺利地发展。所以,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割断开来,把前一种形式同后一种形式对立起来,即如你们,中国同志所作的那样,就是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变成空洞的词句,阉割其实际内容,实际上是忽视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是对帝国主义者有好处的。

你们指责各国共产党,似乎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扩展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杜撰,是对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兄弟党的污蔑。

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认识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我们党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路线,为了使——

第一,在和平的经济竞赛过程中坚持不渝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变成制止帝国主义和防止国家间战争的更加有力的因素。

第二,更广泛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促进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

第三,动员群众为争取和平、防止热核灾难而斗争,孤立垄断资产阶级,抑制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

第四,迫使帝国主义裁军,制止其输出反革命的企图,为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

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使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时期早日到来。

第五，对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给予更多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促进它们的民族复兴并过渡到符合这些国家人民利益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样，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就意味着同帝国主义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进行紧张的斗争，它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及其附庸进攻革命的人民的时候，采取积极和坚决的行动保卫他们。

因而，问题不是在于谁一点也不触及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是在于用和平共处代替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作了全面表述的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在我们的热核武器时代，一笔带过地承认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禁止核武器和裁军是不够的。

为了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必须鼓起劲来，不倦地劳动，为解决这些世界根本问题而斗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领导这个斗争。

1960 年的宣言强调指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个国家内进行不屈不挠的扩大和加强和平运动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个运动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团体尽很大努力使和平战士的行动更加积极起来，吸引他们参加世界各国人民广泛阶层的队伍。

我们深信，和平战士力量的重要源泉是无所不包的性质的问题。它包括一切愿为人民权利，为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人。相反，如果按地理特征区分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战士，如果一些国家和大洲的工人阶级、劳动者、人民群众把自己的路线独树一帜，并与另外一些国家和大洲对立起来，那么这就会给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带来极大的损失。

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一样，认为在现代的情况下，各国人民通过自己积极的、坚决的斗争，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进行裁军。

苏共积极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并且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在这方面采取更勇敢的行动。

近年来，苏联一贯坚决为实现已经提出的裁军纲领而斗争。在联合国，在日内瓦 18 国委员会，在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谈判中，苏联外交始终不渝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世界舆论来支持旨在维护和平的建设性措施，争取通过全面、彻底裁军的纲领。我们认为，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主要核心和促进裁军的最重要办法，就是停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这丝毫不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这将限制原子军备竞赛计划和阻挠冒险主义的、复仇主义的西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阴谋。

拥护和平共处的中立国家，特别是竭力巩固和平地区的新独立国家是爱好和平力量的阵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苏联一贯奉行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亲密和合作的政策。苏联认为，为了各国人民沿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合作、加强与

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事情。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和为了消除已解放的国家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执和冲突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永远会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这些争执和冲突只有利于帝国主义。

81 国共产党会议要求所有兄弟党承担起尽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和国防能力的责任,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和平。

苏共不断地关注发展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威力和国防威力,改进为回击和报复侵略者的一切手段,力求经常保持并增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武装力量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优势,以此对巩固普遍和平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主要贡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通过动员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斗争,首先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牢固的经济和抑制侵略的强大物质手段,能够制止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防止它们的侵略行动和反革命输出,因为只有实力的理由才会使帝国主义有所考虑。

赫鲁晓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牢固的经济,军队再有良好装备,这就会更好地影响那些想发动新战争的人的脑子清醒起来。”

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手段,并尽一切可能来保卫世界和平。

在热核武器时代,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要保持特别的警惕,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给以毁灭性的回击。这个任务也需要大量的物质耗费。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防,苏联作出了大量的这类耗费,并为建立和巩固火箭核防御做了巨大的工作。结果,制成了强大的现代化核武器,制成了能够在地球的任何地点击败侵略力量的洲际火箭和全球火箭。

苏联火箭核武器的威力是保卫社会主义果实和制伏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可靠手段。

苏共关心和努力把这种威力保持在应有水平,把这看成是自己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和反帝斗争这一事业的有效贡献。谁现今不负责任地断言苏联不反对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者奉承讨好,谁荒唐而愚蠢地大肆宣扬苏联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和平,那么他就是在诬蔑苏联共产党,就是对苏联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垄断及对建立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巨大军事力量而做出的伟大功勋进行诽谤。

苏联对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止一次的发动新战争的企图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世界舞台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根本变化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千百万苏联人真正巨大的工作和努力应得到任何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与进步的拥护者的另一种评价。

苏联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首先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在对外政策中,把坚定与灵活,果断与谨慎结合起来,既利用使帝国主义阵营冒险分子清醒过来的积极进攻的方法,也利用孤立他们、束缚他们手脚的谈判方法。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的政策可做为例子。由于这一危机,苏联在同美国谈判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准备和动员措施,向美帝国主义者表明苏联准备援助英雄的古巴人民。苏联政府的行动,古巴人民英勇的斗争,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制止了将世界置于热核

战争边缘的帝国主义冒险集团的危险挑衅。

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苏联表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和和平力量甚至在极尖锐的形势下也能够制止侵略集团和防止发动世界战争，证明了能够制止反革命输出。

在给予美国帝国主义以主要的打击的同时，我们党认为忽视其他国家——日本、英国、法国特别是西德——的侵略政策是极其危险的。1960 年声明强调指出西德帝国主义对和平事业的特别的威胁，各个共产党面临着加强反对西德侵略野心的斗争的任务。

苏联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帝国主义强盗是何等的危险，苏共中央认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来说，对这个普遍和平事业的敌人估计不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西德帝国主义已远远不单纯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国。西德军国主义依靠大大超过整个希特勒德国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愈来愈起主导作用。

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帝国主义的危险进行斗争，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阵地，在我党和苏联政府的对外活动中过去和现在也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巩固和发展作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力量相抗衡的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苏联和所有华沙条约国的坚决支持，在实行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极重大的措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1961 年 8 月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伯林的边界进行监督。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曾企图借助恫吓和加紧战争准备来破坏这些措施。华沙条约国武装力量司令部采取的警告措施使这些阴谋未能得逞。苏联一贯地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坚持争取和平解决，签订对德和约，并在这一基础上解决西伯林问题。

苏共的出发点是，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和西德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保持最大的警惕，把一切为和平、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战士们联合起来，团结在一起，更广泛地援助一切为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巩固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的人民。

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苏共认为，民族解放斗争在世界革命运动以及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同志们！关于休息问题。如果我再耽误你们 10—15 分钟，把这一段讲完，然后再休息如何？（同意）]

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了消灭殖民制度的完成阶段，目前，只是在总共近 5 000 万人口的个别国家里保存着殖民主义者直接的资本主义统治。不能否认，可耻的殖民制度的瓦解已经成为事实。

莫斯科声明公正地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

殖民主义斗争的顺利进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一斗争同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各国人民在两种制度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同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紧密相互联系的保证。列宁特别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写道："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世界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为被压迫民族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摧毁一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帝国开辟了可能。

1960年声明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对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工人运动给予民族解放运动很大支持。苏共坚决主张完全消除殖民制度，解放一切仍然处于殖民主义者压迫下的人民，从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战争，支持反对专制殖民制度的人民起义。

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了关于给予所有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宣言。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揭露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殖民地、附属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权利，始终是苏共、苏联外交和苏联社会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中心。

赫鲁晓夫同志在世界争取普遍裁军和和平大会上说："苏联的立场是清楚的、明确的：不论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不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该有任何带着殖民主义桎梏的民族，一切民族都应当是自由的。"

鉴于对奋起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压迫者的人民仅用道义上的支持和表示声援是不够的，苏联还向各民族政府和组织提供物质资料、粮食、技术、武器等重要援助。

我们断然拒绝下面这种诬蔑和影射，说什么苏共忽视和低估民族解放斗争，对它采取消极、否定和鄙视态度，以"敷衍"的态度，将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负担或者恩赐。现在，前殖民地的大多数地方已基本完成了消灭殖民主义者直接统治的任务，民族解放革命进入了新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力量面临的巨大任务是巩固已取得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克服多年的落后状态。

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进行剥削的经济基础，是使他们的民族经济从属于垄断资本。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是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在社会经济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它用一切力量企图阻止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将年轻国家人民取得的政治独立变成虚假，使其剥削和掠夺制度永久保存。

抵制外国垄断组织，进行土地革命，发展民族工业，使社会生活民主化，这就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年轻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关键性社会任务。为解决这些任务的斗争，正是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条件。

帝国主义其战略的主要方针之一，就在于分裂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将民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使已获得独立的国家离开中立政策的道路和争取和平的道路，破坏年轻的主权国家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建立的联系。

我们党认为，坚决反对这一计谋是进一步顺利发展上述国家的反帝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战后年代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为巩固政治独立并获得经济独立以反对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斗争，是现阶段民族解放的、反帝的革命开展和深化的主导的主要形式。

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援助年轻的主权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和平的发展条件，在现阶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党纲领中指出，苏共把同摆脱了殖民与半殖民枷锁的民族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的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给予经济援助，在现代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苏联给予的这种援助规模日益扩大。我国为此目的仅贷款就拨出了30亿卢布左右，援助23个国家建设480个工业及其他项目。

我们十分重视援助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巩固和发展民族经济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成分，发展科学和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专家和熟练工人，并继续实现扩大的援助计划。

当然，我们的资源目前还是有限的，但是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将会增加。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竞赛中所取得的成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革命进程发展中的意义，如果对此估计不足，那将是最大的错误。这些成就的作用绝不是归结为，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为人民树立范例和鼓舞他们斗争，尽管这些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应当强调指出，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直接地同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发展相联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增长，同世界经济舞台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更迅速地战胜资本主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威力越增长，那么这些国家对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援助也就越广泛和有效，民族国家在反对国际垄断斗争中的地位也就越巩固，它们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渡也就越迅速和越顺利。

遗憾的是，我们不清楚，中共的领导是否拥护列宁关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原理。

争取和平的斗争符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根本物质利益。这是为消灭军事集团和在一些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这样一些最重要的殖民主义工具的斗争，这是为争取完全排除帝国主义对任何一个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可能性的斗争。禁止军备竞赛将使不发达国家免除帝国主义者进行军事侵略的经常危险，将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规模创造条件。我再次地重复，同时我们也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对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事业有着巨大的意义。正如苏共纲领强调指出，民族国家日益积极地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客观上它基本是一支进步的、革命的和反帝的力量。

殖民体系的解体和老的帝国的崩溃，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其殖民结构和殖民经济开始解体，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世界联系的扩大——所有这些因素在加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和削弱世界帝国主义阵地方面,都起着显著的作用。

年轻的主权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取得经济独立,将是对帝国主义的一次新的沉重打击,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柱即垄断资本对落后国家经济剥削的制度的垮台。

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消灭,应该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当代的中心问题——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如果过去帝国主义能够无阻碍地利用被它们战胜的国家人力物力资源来准备和进行它们所发动的掠夺战争,那么现在这一局面正在告终。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人民,日益积极地参加到争取普遍安全和巩固和平的斗争中来。

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有助于和平共处的巩固。同时帝国主义的势力正在进一步削弱,它的阵地日益缩小。在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根本民族利益,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认为,企图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同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对全世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是极端有害的。我们主张在反帝斗争中竭力把以前殖民地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主张发展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但是,如果有人企图把这种团结变成某种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孤立集团,那么这种团结就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方式,变成把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孤立出来的结果。

不管中国同志如何商谈讨论民族解放斗争的决定作用,说正是民族解放斗争决定人类命运,但是这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在事实上把这一斗争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反帝斗争中孤立出来,这只能给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削弱这一运动,而有利于力图分裂革命力量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

使非洲、亚洲人民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隔离的路线,旨在削弱非洲、亚洲组织与国际民主组织、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路线,是有害的路线。

马列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反对民族的和种族的特殊化,争取消除妨碍所有种族、民族及各大洲的劳动人民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藩篱。你们恶意抨击这一马列主义的立场,把它说成是一种坚持保存帝国主义统治和所谓优等民族统治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对列宁主义的骇人听闻的诽谤。

当我们说革命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反殖民主义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这一能冲毁、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统一洪流时,我们指的是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的反动势力的进步力量的团结一致。谁反对这种不分肤色、民族或地区的人民力量的伟大联合,坚持保存压迫者所建立的种族和地理藩篱,以种族观点代替阶级观点,把人民分成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那么他就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支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阻碍

世界社会进步，阻碍革命事业。

历史将谴责这种极为错误的方针。那些几世纪以来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而同国际工人阶级隔离，现在帝国主义又妄图令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分割开来的人民本身，也将谴责这一方针。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不只一次地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在开展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像我们所知道的，国际无产阶级从它存在的最初年代起，就表现出自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对一切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正在作出并将作出巨大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列宁，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在高度估计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的同时，强调指出这个运动只有同国际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在分析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的增长决不把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主要斗争口号。这个口号的内容在新的条件下扩大了。众所周知，列宁赞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口号。这个口号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增长的意义。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增长，它需要团结的巨大支持；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解放运动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认为，为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紧密团结和兄弟联盟，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同各个大陆的人民，同一切冲击着帝国主义堡垒的革命队伍的联盟，是顺利进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同志们，我请求休息 20 分钟。

同志们！现在就革命理论问题谈几点意见。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声明中关于世界革命运动发展道路的估价和结论仍然有效，不需要加以修改。

这些结论已为最近几年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切矛盾的加深所证实。

革命过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反映这些特点，不应当仅仅限于重复人所共知的公式。

在我们时代，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面前开辟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已不仅仅是在个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对劳动人民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明显的优越性，这个制度，政治上、经济上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日益增长的

经济基础,对任何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都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

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它对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国际义务的忠诚,群众性的、有组织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为任何一个国家顺利地进行革命和保卫革命成果开辟了有利的前景。今天,这不仅是理论上的预见,而且是由实践证明了的事情。

在某些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是主观的和客观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复杂结合的结果。能否正确地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因素的作用的对比是否有正确的理解。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由该国的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

苏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它的纲领中做了如下的阐述: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都是由本国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革命是不能定做的。不能从外部把它强加于人民。它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内部矛盾和国际矛盾而产生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把任何取得幸福的办法强加于别国人民而不因此破坏它自己的胜利。(原文从“不能”以后直到句末是删节号。这一整段话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194 页)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反对从外部推动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它的阶级的成熟程度,它所拥有的同盟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阶级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具备革命的形势,这些就是革命的内部条件。

同时,正如声明所指出的,革命者必须考虑到国际局势、世界革命过程的总进程这些因素。

我们党、苏联人民正在积极促进我国以外的革命事件的发展。我们以苏联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以自己对世界事件的进程的全部影响,以对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对一切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一贯的支持和援助,对革命的世界发展事业作出有效的贡献。这就是执行列宁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支持他国革命斗争的途径的指示。

我们认为,中共领导近来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最近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置之不顾。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运动的阶级立场的背弃。

在你们党的刊物的一些编辑部文章中提出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的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相矛盾的。你们把这种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但这是对他们观点明显地歪曲。这意味着,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的、工人的运动服从于一般性的民主运动,而领导这种民主运动的常常是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就像你们所说的是“爱国的王公贵族”。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宣言和声明中指出,这一个国家或者那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应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自己来确定。(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没有找到这句话。只是在“声明”第五节第二段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

那么，怎么来理解你们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企图呢？问题不在于需要不需要革命。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在一百年前就已解决了。这里讲的是另一回事，是关于必须估计具体形势的问题。你们对于那些"不敢"夺取政权，不敢领导革命，放弃革命目标，害怕牺牲等等人的诅咒，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里革命形势今天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已准备夺取政权，但共产党抑制他们，那就请你们举出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来。

为了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进行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实质是由列宁所全面确定了的。不能从远方，比如从莫斯科，从北京，或者从其他中心来确定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该在何时和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列宁主义的党精心地研究大、小国家的革命过程。但是它从原则上从来不向兄弟党提示革命斗争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认为这个问题完全是每个兄弟党自己的事。

的确不论我们如何精心地从旁研究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的进程，我们也不能比在当地活动的、同群众保持经常联系的共产党更好地确定革命过程发展的道路和形式，不能比这个党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对革命行动的准备程度，更好地估价力量的分布、革命后备的状况等等。

我们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不是为外国同志审查现成的革命斗争方案，不是把这种现成的方案强加给他们，而是解释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尽力援助，积极支持实现他们所选择的方针。

苏共是根据共产党的宣言和声明的论点，以及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来确定自己对现代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道路和形式的问题的观点的。

苏共纲领指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掌握斗争的一切形式，准备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管以什么形式来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社会的创造者——工人阶级只有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段话不是直接引述，类似的话见《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94—196页)

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作用属于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创造性地和坚持不懈地实行这些原则，以及维护它们使它们不受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侵袭——这些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条件。

正确理解和平的和非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共产党的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极其明确地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平和非和平道路的问题。

苏共坚定地保持这个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力求通过和平的方式，不通过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将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全民族的利益。

同时,革命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对人民采用暴力,那么工人阶级将不得不采取夺取政权的非和平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分布的具体条件。

在我们的时代,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增长了。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增长,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性改变了,也不因为目前资产阶级更倾向于自动交出政权,而是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形成了更为有利的力量对比。

共产党人不能不关心充分利用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当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以什么形式实现,它都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不同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现在,表面上似乎也承认革命的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承认是迫不得已的,是不诚恳的,因为你们在同兄弟党的论战中把全部热情用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道路的和平手段是不可能的。

我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在一切国际性会谈中,在自己的一切有关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的文件中都首先强调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应该掌握革命活动的毫无例外的一切形式或一切方面,应该准备好最迅速地和突然地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争取民主、争取广大居民阶层的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谈到革命运动时,不可以对这种斗争置之不顾。在我们的时代,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的重要性正在大大地增长着。这一斗争提高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威信,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大军的团结,是它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声明宣称,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忠实的同盟者,因为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对帝国主义不利。(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23页,这里的“帝国主义”一词在“声明”中是“资本主义”。)我们确信,每一个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是恪守对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的忠实,一贯地和顽强地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争取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

我党中央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给于高度评价,认为给予它们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获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表现在声明中的、由所有的党共同协议、赞同的、各国共产主义者队伍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所结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是相互支持,每一个党对本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以及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责任,是团结一致地遵守共同制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价和结论,坚决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容许任何可能破坏这一团结的行动,或者换言之,禁止派别活动和小组活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的平等、独立、自主,互不干

涉内部事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所有的党，对大党和小党，都提出相同的要求，同时对谁都不例外。

兄弟党相互关系中的这两个方面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不应当把它们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任何企图把每一个党的平等和独立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关心整个运动队伍的团结，不采取反对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对立起来的做法，以及忘记这种义务，实际上就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列宁认为，一个党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以及把对只同一个党有关的问题的观点强加给另一个党是不能容许的。当这种干涉内部事务的行为是来自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并且是为了反对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艰难条件下和在我们阶级敌人的巢穴中进行斗争的兄弟党时，它就特别危险。

苏共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注意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坚决摒弃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方法，如对美共、法共、意共、印共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活动所进行的公开的、主观的、按形式说来是不能容许的粗暴和不友好的批评。这些党遭受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和诽谤，在特别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它们有权期待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而不是背后的打击。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要求，必须有一个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必须遵守的共同纪律。

列宁写道："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在解决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解放的伟大问题时，服从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纪律，考虑各国工人的经验，他们的知识和意志。"

有人会问，在各国共产党没有统一的章程，没有集中的领导机构的情况下，什么是遵守国际纪律的标准呢？标准就是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每个党履行它对整个运动所负的国际义务。

根据宣言和声明，在争取实现自己目的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在其代表会议上制定了统一的观点和立场。会议文件中反映了兄弟党的集体的意见。每个兄弟党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虑这些意见。忠实于会议的决议是每个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这些决议上签了字，而后又违反和藐视这些决议，这就是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

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纪律的基要条件在所通过的宣言中已有充分明确的规定。宣言禁止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建立派别和小集团，声明则责成各国共产党不得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行动。

派别活动有自己的逻辑，它能够把走上这条道路上的人拖得很远。越过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党的党员中广泛宣传自己的观点，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分裂行动，企图建立少数党的集团，支持别国兄弟党内的反对派分子——所有这一切就是派别活动，所有这一切就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纪律的粗暴破坏。中共中央领导走上了这条道路，从而负有严重的责任。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声明中规定了克服产生的分歧和制定对共产主义运动总问题的共同立场的具体途径。这就是：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双边会谈和协商。我们党始终不渝地遵循克服分歧的这些形式和方法。

苏共认为今后仍有必要始终一贯地履行各国共产党所承担的相互义务，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我党第一个起来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也在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方面表现了主动精神。由于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修正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被粉碎了。

因此，在这里应该谈一谈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最近中国同志把事情说成是，似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斯拉夫正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而产生的，你们现在还在自己的尖刻的文章中硬说在南斯拉夫资本主义正在复辟，并且引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声明。

你们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实质上是要把南斯拉夫驱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堵死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与合作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原则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中的路线问题，关系到各国党争取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的方法和形式问题。

在要求把南斯拉夫排除于社会主义之外的时候，任何一个中国同志从来也没有试图提出任何稍微有分量的论据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你们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对南斯拉夫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客观分析表明，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连你们自己过去也不否认这一点。仅仅五六年前你们不仅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甚至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进展表示自己的钦佩。例如 1957 年秋天《人民日报》在一篇论述中国和南斯拉夫友谊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我们两国人民正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这篇文章还写道:“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还可以援引其他一些类似的言论。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同志毫不怀疑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几年后的今天，客观分析表明，南斯拉夫仍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近年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实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家经济中的计划原则，提高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作用重大措施。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在许多国际问题——战争问题、和平共处问题、裁军问题、消除殖民主义问题、德国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同社会主义各国的立场是相同的，或者是相近似的。

为什么中国同志五年前并不怀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还夸奖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赞同它的对外政策，而现在却宣称在那里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会说，中国领导方面采取了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提供对事态的正确的认识。当问题涉及一国人民的命运时，这种态度更是不能容许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继续使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国家，会严重地损害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因此，苏共中央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在于利用可能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它的影响。苏共的这一路线当时曾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赞同和支持，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如果

我们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方针在1955—1957年曾经是正确的，那么在目前，当南斯拉夫发生的积极过程已经完全显而易见的时候，当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许多对内与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了更为正确的立场的时候，当他们已经拒绝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并且实际上已经不再同巴尔干条约组织合作的时候，有什么理由来改变这一方针呢？

苏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存在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我们也看到了南斯拉夫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针上有某种不一贯的地方，对此我们曾经多次坦率地告诉过南斯拉夫领导人，并且公开地指出过。

1957年和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在它所提出的文件草案中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修正主义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我们仍然认为，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一切绝不能成为把南斯拉夫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根据。

声明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成果有失去的危险，根据这一事实，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得出结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使这种危险不致变成事实。

我们深信，我们的这种路线正在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同志根据声明中说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有失去的危险的段落作出结论说，似乎应该尽快地踢开南斯拉夫，不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它推入帝国主义者的怀抱。但是，这种政策不能联合各国人民，而是分离他们；使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离开共产主义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把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看不到别人改正错误，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些错误——这是一种进行政治迫害的方法，它同列宁主义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曾不惜努力，帮助迷失方向的人或者犯了错误的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回到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批评这个或那个兄弟党，这些或那些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目的不仅在于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线，而且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在各共产党的关系中，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利益，需要表现出更大的容忍，更大的分寸，更大的灵活性。在同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中，我们党正是遵循这一点的。

不能闭眼不见，最近在某些兄弟党内，对共产党人的危险现在并不比修正主义小的教条主义占了优势。苏共也反对这种新威胁。你们想推翻从列宁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确定了的关于教条主义的概念和抹杀它的有害实质，苏共驳斥你们的这种完全不合法的企图。

1957年宣言中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妨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妨碍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用引经据典和死啃书本代替对具体情况的研究，使党脱离群众"。你们用自己的理解代替了这种列宁主义的关于教条主义的定义，仅仅把教条主义看成是"照抄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

这样解释教条主义是反对各共产党利用最成熟、久经考验的和成就最大的党的经验。这种解释是贬低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同志们，你们所使用的"指挥棒"的说法，同全世界反

动派所历来喜欢用的“莫斯科之手”的诽谤并无多大区别。

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行动站在宣言和声明立场上，那么，就不能容许一方面禁止兄弟党研究、接受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革命经验，把这说成是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不分皂白把这些兄弟党自己的经验骂成是完全的机会主义，并且把外行地制订出来的纲领宣称为普遍真理而强加给它们，也就是表现出家长制、高傲和对兄弟党不尊重。这显然是违背列宁主义的。

如果是站在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那么，就不能容许口头上承认兄弟党独立平等，实际上却干涉它们的内政，用对它们的领导进行没有根据的攻击，来代替对它们的工作和斗争条件进行仔细研究，代替无产阶级的支持与合作。

同志们，我们两党代表的会谈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交换了信件。你们6月14日的信件使会谈的这一准备阶段发生了新的转折。我们在向你们发出3月30日的信件时遵循着下述考虑：为了使会谈能顺利进行，应当要有可能保持最大的客观态度来对比苏共和中共在它们展开争论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的信就是抱的这个目的。这封信阐述了我们对宣言和声明基本论点的理解，丝毫也没有超出它们的范围。

自然，希望你们走同样的途径，从正面阐述你们对争论的问题的观点，以避免扩大公开争论及对其他党的攻击。6月14日的信不是向准备会谈前进一步，而是向扩大和加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争论和分歧前进一大步。

我们已经提到了苏共中央全会对这封信的评价。这里我应当回答为什么我们没有公布中国报刊的8篇文章和6月14日的信件的问题。这是善意的表现，是不愿意加深和加剧论战。如果公布你们的文章，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公开回答。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我们全体人民热烈赞同的纲领所遭到的没有根据的攻击保持沉默，我们的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是不会理解的。我们不用说，公布这些没有根据地攻击我们党的文章，在我国会引起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态度的急剧恶化，这一点我们是力图防止的。如果我们还在谈判以前就走上公布你们的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答复的道路，就必然会使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论战。当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公布你们的材料和我们对这些材料的答复。

你们的信妄图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已经简要地叙述了中央对这条路线的实质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

一个党有什么权利向整个运动发布总路线呢！你们的整个信证明，你们简直是要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其他党，因为你们处处都强调说，凡是不同意你们这25条的人，都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向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讨好。这种建议只能认为是强加于人的东西，不能认为是别的。

在信中有一些关于和平、关于革命道路等等的详细的议论；有时也引用了正确的论点，转述了宣言和声明的提法和我们党的文件。但随后马上又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反对这些正确的论点。而每一个注意我们争论进程的人都知道，是你们在过去和现在都对这些论点提出异议。同时你们把你们反对的人从来没有主张过的观点强加给

他们。

使用这样的论证方法能够认真地进行辩论吗?

苏共代表团呼吁你们对我们的谈判作出贡献，放弃上述的做法，弄清彼此真实的而不是臆造的观点。否则，任何谈判都会变成聋哑人的对话，花费许多时间，而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你们来信的特点是毫无根据和不能容忍的粗暴语调。通常，敌人之间谈话才使用这样的语调。在你们的信中，给所有不同意你们观点的人按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你们竟然不体面地影射我们党发生了资产阶级的蜕化，重弹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性的老调。我们断然拒绝这种在共产党人的关系中完全不能容许的讨论问题的方法。这种手法不会有效，而且你们永远也损害不了苏共和苏联人民在几十年的伟大斗争和成就中所赢得的威信，只能破坏你们自己在各国共产党和进步舆论界心目中的威信。

在来信中提出了引起我党特别愤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我国的内部问题，涉及苏共制定的并在其纲领中规定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理论原理，涉及我们党的内部政治措施。

你们企图把争论扩大到这些问题上。自然，问题不在于一个党无权对其他兄弟党的纲领有意见并发表这些意见。苏共是国际主义的党，决不打算用民族主权的叫喊来阻止那些意识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义务的兄弟党的批评。我们两党承担了不扩大辩论、促进创造有助于苏中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气氛的义务。

而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正当需要集中力量的时候，你们却把一系列极重大问题的争论强加于人。

如何来理解这个步骤呢？这只能理解为企图在我们分歧的火堆上再加几捆柴。给人的印象是，你们需要的不是协议，而是意气之争，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你们在信中提出的新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新的。我们对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以及我们对待个人迷信的态度，在7年多以前，就曾在我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过十分明确的阐述。那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各兄弟党的支持，包括你们签了字的宣言和声明的支持。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党的问题上的观点，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即2年以前，在苏共纲领草案中就已公布了。纲领草案经过全党、全民的讨论。这个草案也是各兄弟党，包括中国共产党所知道的。为什么中国同志在前一种情况下沉默了7年，在后一种情况下沉默了2年，而现在，恰恰在会谈的前夕，对我们党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发动了攻击。

例如，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正如你们在信中所说的，你们认为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如果回忆一下中共领导人几年以前讲的话，那么对中共的这种立场该怎么解释呢？我指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共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一篇论文以及其他一些材料，这些讲话、文章和材料都包含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并且对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是支

持的。

根据这些材料,只能认为,中国同志或者在几年以前是不真诚的、没有原则的,或者在自己的6月14日的信中是不真诚的、没有原则的。

你们为斯大林的错误、邪气甚至罪行辩护,是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高尚的任务,实质上是企图把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可耻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缺少的特征。

不能不看到,这样提出问题,只能败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的声誉,只能破坏社会主义理想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吸引力。

中共中央的来信硬说,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就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削弱党的战斗力。一切都说明,上述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相反,苏联人民在近几年来之所以取得成就,主要是因为苏共清除了个人迷信的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思想与做法,解放了蕴藏在群众积极性中的巨大的创造力。

大家都公认,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把共产主义运动提到新的更高阶段,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来信中谈到的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情况,恰恰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个人迷信的思想中。领袖和群众的真正的联系必须建立在严格彻底地贯彻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的基础上。只有依靠群众,倾听舆论的意见,关心全力发挥人民的创造主动性的领导人,才有真正的威信。苏共在揭露个人迷信和克服它的消极后果时,一向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出最卓越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这些组织者和理论家在自己的活动中体现群众的愿望,得到群众的拥护。

你们的信件中还不正确地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转变为全民国家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已经转变为全民党的问题。中共中央信件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主要错误,在于不懂得甚至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规律性同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规律性之间的差别。而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指出过这种差别,他们严格区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和作为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这第二阶段是随着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成熟而逐步地从社会主义成长起来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在第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存在着多种成分的经济,还保存着社会分成对抗性阶级的情况,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土壤,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以新的方式展开的,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革命的方式破坏旧的社会主义关系。

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就是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存在着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道路已被堵死,复辟的内部危险已不复存在,社会内部已没有对抗性阶级,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冲突。代替它们的是所有社会集团的友好合作,这些集团给自己提出的共同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

你们看不到这种本质的差别,断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企图实现复辟

的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经常产生着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通过什么道路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呢？是不是为此还需要来一次革命呢？

当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包括中国在内，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但是对苏联来说这早已成为过去的了。只有完全无视现实条件，才会在中共中央来信中不断影射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30年以前，在消灭了人数众多的剥削阶级之后，在苏联就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内部根源。

谁也不否认，苏联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还存在着阶级差别。证明这一点，轻而易举。但重要的是，要正确地理解这些差别的性质。在苏联，阶级已不再具有这个词的旧的本来的含义了。大家知道，列宁曾认为可以简要地给阶级下这样一个定义：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由于它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些集团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这种阶级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这里只有工人和合作化农民这两个友好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某些差别(已经不是根本的差别)正在消失，全民所有制和在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共同劳动把这两个阶级联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同这两个阶级手携手地一起劳动。

自然，社会在社会政治与思想上的一致已在苏联形成的条件下，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提法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外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所以当然也就还存在着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阶级斗争的战线。这一斗争也包括制止敌人的间谍在我们国内的活动。还必须同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受资产阶级腐蚀的分子进行斗争。还必须同寄生虫、懒汉、投机倒把分子、流氓等进行斗争。这些分子虽然有害，但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的舞台，这正是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对期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同的地方。

中国同志在引证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名言时，把下面的断言强加在马克思身上：在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以前，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存在。

然而，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整体，是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大家知道，列宁也是把社会主义称为不完全的、没有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没有，没有任何矛盾，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指的是整个的共产主义形态，其中既包括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包括高级阶段——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

在上述《哥达纲领批判》这一著作中，紧接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这一段话，马克思

对哥达纲领作了以下的指责:“纲领既没论到后者(即无产阶级专政),也没论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区别开的。显然,这样的国家制度只能是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而不是国家制度完全消亡的高级阶段。

按照你们的说法,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都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将是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你们就漠视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国家制度的思想。可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这一思想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该书中,无产阶级专政被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正如列宁所解释的,这已经是“过渡形式的国家(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国家将消亡,因为没有剥削的阶级,因此不能镇压哪一个阶级。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有必要保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监督劳动量和消费量,还有必要对资本主义传统的体现者、染上旧习气的人们采取强制手段。

这些职能(列宁那么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了这些职能的必要性)也就是现在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职能。它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发展成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后者又随着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

中共中央的信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同上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消亡的辩证过程相对抗。根据这个公式,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胜利以前都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在这之后它就立刻消失了。但是,专政这一概念要求实行阶级统治。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情况下,能去统治谁呢?统治“资产阶级”吗?从这些分子的存在中绝对不能得出必须要有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结论,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能放弃国家的强制,不能放弃国家政权。

你们认为,下述结论——即从国家内部的发展任务这一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需的了——似乎造成了严重的危险,“促进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的传播”,认为这意味着用“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明显地暗示由此而来的社会制度变质的危险。

但是,苏共二十二大确认我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难道这削弱了同一切对社会主义社会有害的分子的斗争吗?相反,这种确认使这一斗争变得更加富有成效,因为它保证吸引了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全体人民参与这一斗争。我国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如此广泛的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依靠,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了如此广大的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的日常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意味着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民主变成真正的全民民主。这不是削弱国家政权,而是使它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更有效的手段。

苏共二十二大所做的理论性结论,是对苏维埃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早在30年代下半期,在消灭了所有剥削阶级之后,我们国家镇压敌对阶级的职能就消失了。在1936

年的宪法中，取消了对选举权的一切限制，还取消了工人阶级原先在选举中享有的特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不是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而是依靠全民了。

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提出了不可能有全民国家的公式，来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活生生的经验相对抗。试问根据何在？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表示过反对“全民国家”的口号。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的是拉萨尔派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全民国家”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批评了认为全民国家可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论断，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对于社会改造的必要性。但是，马克思和恩格丝毫没有谈到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全民国家。这是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你们的下述论断恰好也是这样，你们断言，承认党是全民的党就给共产主义建设造成严重威胁，你们企图把这种承认解释为“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解释为缩小党的作用。

这种论断粗暴地歪曲了苏共的立场。党变成全民的党，这是加强党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苏共纲领中谈到，共产党作为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它的意义在增长。党现在依靠着最广泛的人民阶层，不仅是工人，而且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都把党当作自己的党，当作自己的思想和愿望的体现者。怎么能认为这是对共产主义建设的威胁呢！

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和它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即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成了全民的目标。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这种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表示高兴，而不是悲伤。

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它的先进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由于它直接同最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相联系而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拥有革命的经验而决定的。

共产党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这既是整个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也是党本身的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发生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在苏维埃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也不能不反映在党的身上。早在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取消了根据入党人的社会地位所规定的入党条件的差别，因为这些差别，正如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说的，早已不符合“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已经改变了的社会阶级结构”。这意味着党的社会基础的扩大。现在党就其成分来说已经是真正全民的党。但是，就是现在，党也关心使党的队伍主要由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特别是工人来补充。

阶级差别的逐渐消失，是苏维埃社会在向共产党前进的道路上发生的现实过程。这个过程也不能不在党的发展中得到反映，这使党更加强大。实际生活表明，苏共成了全民的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纪律更加严格了。我们可以说，

我们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它能够解决建设新世界的最具雄心的任务。

同志们,我党代表团利用这个讲台,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说明,阐述了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一些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并且解释了我们党在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的立场。

不能闭眼不看这种情况,即中共领导人使自己同苏共和整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这些分歧涉及世界发展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中共领导人还在继续提出新的问题进行争论,不断扩大分歧的范围。

中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如何引起和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离开了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由于他们企图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强加给其他共产党,用这个纲领来代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这种状况使我们感到极严重的忧虑,因为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对我们党来说是最神圣的东西。破坏这种团结只会对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有利。

我们认为,不存在扩大我们之间分歧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存在任何导致分裂的客观因素。当然,由于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条件不同,由于它们的社会成分不同,它们的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会产生某些不同的观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讨论和比较不同的观点,制定一致的立场,看作是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必要的方法。

但是,难道观点上的不同一定应该发展成为威胁我们的团结的原则分歧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动者的阶级利益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我们两国人民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一致使我们两国联合起来,这种生产关系不是使我们的人民分离,而是使他们团结起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我们争取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争取和平事业的共同利益使我们联合起来。

只有帝国主义的诽谤者才会认为,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样,社会主义体系内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有共同商定的文件,它们全面地反映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确定了共同行动的方针。这就是1957年的宣言和1960年的声明。我们承担了共同的义务——那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活动中坚定不渝地遵守这些文件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你们党不止一次地说过,它忠实于这些文件。我们呼吁中共领导在实践中遵守这些文件。

苏共中央全会指示我党代表团坚定地执行兄弟共产党团结的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历史性文件的基础上消除现存分歧的路线。

苏共中央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努力加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之间,苏共和中共之间,以及其他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中的兄弟友谊,以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运动的团结,以利于争取我们的共同事业——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

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对全体进步人类负有最重大的责任,他们热烈期待着世界共产主义

运动中产生的分歧将在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消除。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人民所负的这个重大的责任，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我党中央表示愿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积极争取克服分歧。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加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苏共中央代表团将坚定不渝地遵循着这种意愿来同我们的中国同志们谈判。

邓小平：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苏斯洛夫：同意。那么下星期一上午10点钟再继续。这样就算达成了协议。

宣布休会到7月8日上午10时。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23—3826页

№08108

苏中两党会谈第二、三次会议记录：邓小平发言[①]

（1963年7月8日）

第二次会议

7月8日

邓小平：按照规定，为了我们工作，看来格里申不应该反驳吧？

格里申：今天是工作日。我不知道，同刘宁一一样。

康生：刘宁一不说话，也就是说，他同意。

邓小平：今天怎么办，看来，我发言？

苏斯洛夫：请。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的发言[②]

邓小平：首先，我要表示，中共代表团受我党中央的委托到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是抱

---

①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脚注。——编注

② 在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斜体字表示的内容。——编注

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而来的。

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一致愿望。

同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愿望相反,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正在那里煽风点火,希望我们的谈判达不到任何结果。

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谈,能够像我那天在宴会上讲的那样,达到一个好的或者比较好的结果,来回答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的挑拨,这将符合①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真诚的愿望。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始终如一地为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最大的努力。

不用讳言,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分歧的性质是深刻的、严重的。这些分歧,严重地损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削弱着我们共同对敌的斗争,威胁着我们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

正因为这样,我们没有理由不消除我们的分歧,不加强我们的团结。但是,应该指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也不用讳言,对于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我们认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就必然会歪曲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只要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分歧是能够消除的,团结是能够加强的。

我们很注意地听了苏斯洛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在 7 月 6 日的发言。遗憾的是,在这个发言中,你们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随心所欲地解释宣言和声明。你们把我们在 6 月 14 日的复信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所阐述的观点,任意地加以歪曲和攻击。

你们的发言,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使用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语气”,而是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硬把一大堆罪状加在我们身上,如像什么“不老实”、“无原则”、“诅咒”、“诬蔑”、“粗暴的歪曲”、“荒谬的指责”、“骇人听闻的诽谤”、“耸人听闻的杜撰”、“毫无根据的攻击”、使用“敌人间才使用的语调”、“重弹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性的老调”、用“新路线代替现有的路线”、“把自己的路线独树一帜”、“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对宣言和声明进行总修正”、“离开了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违背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家长制”、“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运动的阶级立场的背弃”、“阻挠各兄弟国家之间经济合作过程”、“阻碍革命事

① 在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同时也回答”。——编注

业”、“阻碍社会进步”、“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支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使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离开共产主义”、把南斯拉夫“推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政治迫害”、“向整个运动发布总路线”、“把自己错误的纲领强加给其他兄弟党”、“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派别活动”、“分裂活动”、“建立少数党集团”、“支持别国兄弟党的反对派分子”、“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中共“要的不是协议而是争吵，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等等。

对于你们的这些指责和攻击的语言，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们愿意指出一点，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双方在会谈中都要坦率。在你们的发言中，坦率地讲了你们的观点。这样并不坏。

在苏斯洛夫同志的讲话中说到，你们将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我们党的文章和信件，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你们还讲到，准备发表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发表之后，我们报刊一定转载，以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进一步了解你们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是能够辩明是非，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你们7月6日的发言，我们认为，有许多原则性的错误。我们今天不可能作全面的答复，只准备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作初步的评论。我们党在详细地研究了你们的意见以后，将考虑作出答复。

对于我们两党这次双边会谈中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两党中央已经交换过多次信件。我们双方都赞成，对于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需要逐点地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陈述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作为我们的建议。我们认为，我党中央在这封复信中提到的问题，连同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件中提到的问题，都应该是这次两党会谈的讨论基础。

苏共代表团在发言中，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从什么地方讲起呢？我们愿意从这个问题，也就是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讲起。我们愿意对历史事实加以分析，来回答分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可以说明，苏共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路线的错误，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我今天的发言，是我党中央6月14日信件中所提到的一个方面的问题的一点补充。下面所谈到的问题，有不少内容是交换信件中没有公开讨论的。在这次两党会谈中，我们愿意本着坦率的态度，对苏共同志谈清楚。

现在，我讲讲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

苏斯洛夫同志在讲话中讲到，我们和你们的分歧，似乎是由于中共领导“企图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强加给其他共产党，用这个纲领来代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

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不正确的。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坦率地说,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的原则分歧,追本溯源,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

过去我们在公开的场合,为了照顾你们的处境,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只是指出: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了1957年宣言的缘故。

现在看来,为了真正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不彻底弄清楚分歧从何而来是不行的。

为了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必须弄清楚分歧的由来、分歧的性质,必须对一系列的原则分歧进行逐点的、充分的、详细的讨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

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来回顾一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7年多的事实吧。

我们先谈从苏共二十大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这一段时间的事实。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二十大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所谓"和平过渡"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两个问题。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也就是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我们曾经多次同你们谈过,我们的观点你们是很清楚的。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再详细地、全面地阐明我们的观点。

在这里,我只简单地谈论如下看法:批判斯大林的某些错误是必要的。揭开盖子,破除迷信,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必须正确。

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事实说明,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共领导同志为了在一系列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道路而采取的重大步骤。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在实质上针对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我们认为,苏共领导同志对斯大林的这样的批判,原则上是错误的,方法上也是错误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由于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引起一个反苏、反共的高潮。帝国主义、铁托集团、各国反动派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给许多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在处理波兰事件中,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企图用压服的方法,甚至企图用动武的方法来压服波兰同志。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法,不仅是对待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而且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态度。

紧接着发生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匈牙利事件同波兰事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苏共同志对解决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的波兰事件问题时采取压服,甚至企图动武。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基本上也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编注

而苏共对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又是采取什么态度呢？苏共领导曾经企图放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你们知道，我们当时是反对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投降主义的态度。对这两个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讲。

苏共二十大的错误，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加拿大、美国、丹麦、荷兰、法国等等国家的共产党内，都出现了公开的、修正主义的反党派别。

同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也使一些过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党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道路发展。

苏共二十大以后，从1956年起，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温和地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苏斯洛夫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沉默了7年，这是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无论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还是在过渡的形式，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都曾多次向苏共领导人阐述过自己的立场。而且我们的这些看法你们也是知道的。①

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同米高扬同志的谈话，随后毛泽东同志同尤金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说斯大林"功过各半，是不对的"，"总是功大于过，要三七开，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毛泽东同志的简单的语言就是这样说的。

你们后来反对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三七开，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要具体分析，要全面估价，要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

1956年10月②，周恩来同志同波诺马廖夫同志（当时是参加我党八大的苏共代表团的成员）谈话的时候，在斯大林问题上也同样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周恩来同志在同波诺马廖夫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了苏共同志的错误：一、"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二、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三、苏共领导同志"缺乏自我批评"。周恩来同志讲了这么三条。

1956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尤金同志的时候，又谈到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他并且指出，对于斯大林这把刀子，你们根本不要它，把它丢掉，结果敌人就拿这把刀子来杀我们。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又接见尤金同志。他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1957年1月18日，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代表团第五次会谈中，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曾经指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同斯大林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方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没有这一段。——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10月1日"。——编注

面所犯的某些错误有关的，也是同苏共领导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所犯的错误有关的。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还再次谈到我们对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三点意见，就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同兄弟党商量。

此后，1957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同志到莫斯科以前同尤金同志的谈话，周恩来同志1961 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同赫鲁晓夫同志的谈话，都同样地提出了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

还要谈到的是，在波兰事件发生的时候，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会谈时，也曾经谈到斯大林的问题，并且批评苏共同志在波兰事件中犯了斯大林时代就有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由此可见，从 1956 年 4 月开始，我们就不断地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怎么能说我们沉默了 7 年呢?

我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善意的，是诚恳的。我们当时提出这些意见，提出这些批评，只在内部少数人谈话的时候进行的。我们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你们。我们提出这些意见，提出这些批评的用意是很明白的，是为了共同对敌，为了促使苏共领导人反省，不要走得太远。①

在那个时候我们写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你们说，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和我在过去的讲话中都赞成你们的“反对个人迷信”、批判斯大林的做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是的，当时我们的讲话中，为了照顾到你们当时的处境，为了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措词是很慎重的。但是，我们在适当地表示了赞成你们的某些措施的同时，又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批评了你们的错误，只是没有指名就是了。这是很明显的。

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的态度一贯是很明确的。赫鲁晓夫同志曾经对中国挂斯大林的像的问题多次指责我们。这就是一个证明。怎么能说我们完全赞成你们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做法呢?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也是多次向你们提出了我们的看法。你们很清楚，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的前夕，在起草文件过程中，我们曾经批评了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个人向你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这个提纲，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观点，丝毫没有含糊的地方。只是为了照顾到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相衔接，为了照顾你们，我们才同意用宣言及其以后的声明所采用的那一段话的词句。

你们在 7 月 6 日的讲话中，说我们“不真诚”，“无原则”。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赞成两手，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后还有有如下一段内容：“实际上，对斯大林问题，对过渡形式问题，也就是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多次向苏共领导同志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编注

只赞成一手，只赞成非和平过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提纲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最近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所讲的，也是同样的观点，没有丝毫的改变。

我愿意提请苏共同志回忆一下，你们起草的莫斯科宣言第一次草稿中，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只有和平过渡。只是在我们提出意见之后，才改成后来那个样子。这个稿子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们的真正观点是什么，真正的立场是什么。

总之，无论在斯大林问题上，还是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我们都曾多次提出过意见，并没有沉默。但是，我们为了使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发表一个大家能够同意的比较好的宣言，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做了必要的妥协，其中包括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

你们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不真诚"，"没有原则"，我们要问，究竟是谁不真诚，没有原则呢？1957 年莫斯科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间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制订了 1957 年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纲领。

我们本来希望，苏共同志同各国兄弟党一起，按照宣言的革命原则，努力发展世界的革命斗争，把我们的目标对准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同志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那个时候，你们对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不随风倒，恨极了；对我们不赞成你们的"和平过渡"，不赞成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恨极了。就在这个时候你们以为内部问题解决了，就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党，严重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

你们在这个时期究竟干了些什么呢？还是让我们举一部分事实来说明问题。

1958 年 4 月至① 7 月，苏共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问题，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看清楚了你们的意图。你们没有达到你们的目的。

接着，你们在言论上和行动中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活动。

你们连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特别是人民公社。

例如，1958 年 12 月，赫鲁晓夫同志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的谈话。

例如，1959 年 7 月，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一个农业社的讲话。

1959 年 6 月，你们单方面废除帮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制造原子弹的协定。

接着，1959 年 9 月 9 日，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第一次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用的不是"至"而是"和"字。——编注

把中苏分歧公开在全世界面前。

同年11月,赫鲁晓夫同志对印度《新世纪》记者谈话,公开指责中国是"愚蠢的"、"可悲的"。

1959年9月的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同志大肆宣扬"三无世界",就是"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极力美化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把和平共处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鼓吹美苏合作决定人类命运,实际上宣扬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

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附带说一句,艾森豪威尔是不承认有什么"戴维营精神"的。

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觉得有了一个什么"戴维营精神",似乎从艾森豪威尔那里抓到了一根稻草。这样,你们就放肆地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的言论。

1959年9月30日,在我们建国10周年庆祝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说,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1959年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的讲话,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

1959年10月31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说什么像托洛茨基那样"既不和,也不战"。

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要"对对表",并且说,"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同志又辱骂什么"破套鞋"。同时,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攻击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犯了"狭隘民族立场"、"狭隘民族利益"的错误。

所有这些讲话,我们,你们,我们的敌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什么。

在这个时期,苏共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和社会科学、苏共党史等方面,继续宣传和发展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观点,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讲话就不行了。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批判了某些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就在这3篇文章中,我们的斗争锋芒,仍然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的错误。

接着,发生了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本来不存在的所谓"戴维营精神"垮台了,证明苏共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地名写作"海参威"。——编注

1960年6月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北京会议上，苏共同志支持的总报告草案，又强调“三无世界”，不同意谴责艾森豪威尔，不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散发了一个全面攻击中共的通知书，并且组织一批兄弟党代表团围攻我们。

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破坏兄弟党的团结，破坏兄弟党关系准则，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活动，所引起的恶劣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布加勒斯特会谈后，苏共同志采取了4个步骤把中苏之间的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1960年7月16日，苏联方面单方面决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撤走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1 300多名，并且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使得这些协定和合同中规定的许多建设项目、技术设计、设备安装和科学技术研究的进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还制造中苏边境纠纷，禁止我国在苏联发行《友好》周刊，无理要求我国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由于阿尔巴尼亚同志不同意苏共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错误做法，苏共同志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提议，宣布短暂休息。)

布加勒斯特会谈以后不久，我们两党在1960年9月举行了两党会谈。在两党会谈以前，我们发出了给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两党会谈中，我们指出了你们在敌我关系和兄弟党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就是在敌我关系上摆错了位置。

上述有些事实，我们在那次会谈中已经谈到了。所以，有些细节，我今天就不谈了。

接着，在1960年[1] 10月的26党起草委员会上，我们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

本来，我们期望，在起草委员会上，能够在各方面取得一致的协议，制定一个共同的文件，提交81国会议通过，开一个团结大会，最为有利。但是，结果还是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放到81国兄弟党会议上去讨论。

1960年[2] 11月，举行了兄弟党会议。苏共同志在会前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攻击中共的信件；发动了一批兄弟党在会上对我们进行围攻。

在会上，我们坚决反对苏共同志的这种错误做法，批判了你们的错误，反对了你们在声明草案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同时，为了使会议达成协议，我们又一次照顾了苏共同志的需要，作了一些妥协(还是关于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关于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1960年”。——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1960年”。——编注

问题)。

当然,也应该说到,苏联同志在会上也作了一些妥协。所以,会议通过了大家都能接受的莫斯科声明。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声明。同样的,我们本来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可是,事实的发展,又一次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愿望相反。

莫斯科声明签字以后,苏共同志根本不把兄弟党的协议放在眼里。从签字的第二天起,就不断地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以及我们之间达成的各种协议,越来越严重地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展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同宣言和声明相违背的。在81国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一些错误论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

你们在前天的发言中说:“在这些决议上签了字,而后又违反和践踏这些决议,这就是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这样做的,在我们看来,不是别人,正是苏共同志自己。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主要的事实吧!

1960年12月2日,就是在莫斯科声明签字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同志就在酒会上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同声明签字相隔只有24小时。相隔48小时也好哇。仅仅相隔24小时,就违反了声明中对南斯拉夫的估价和编辑委员会中的协议。

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都记得,当时,我们两党指定了一些同志,讨论南斯拉夫的问题。当时苏共方面参加的,有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中共方面参加的,有彭真同志、康生同志、胡乔木同志、刘宁一同志,还有别的同志。当时,双方肯定了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彭真同志插话:当时,苏斯洛夫同志代表苏共方面说,苏共在报刊上不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莫斯科声明是12月1日大概像今天这样的时间前后签字的。12月2日,大约过了24—25个小时,你们就否定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达成的协议。

我们不理解,是不是就在这24个小时中,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就改变了自己的错误了呢?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共同志不顾我们再三劝告,采取一系列步骤恶化苏阿关系,这很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共领导很快地恶化中苏关系一样。

1961年3月,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决议,提出发罗那军事基地的问题。

4月,苏联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

5月,苏联把由苏联军人掌握的舰艇撤离发罗那基地。

8月，华沙条约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出席。

9月，华沙条约国国防部长会议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

在这以前，苏联已经断绝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

所有这些步骤，来得这么急，这么猛，好像是1960年恶化中苏关系的翻版。

在苏联采取了这些恶化苏阿关系的步骤之后，中共领导人多次劝告苏联同志不要做绝，要主动改善关系。9月30日，我在同契尔沃年科同志的谈话中，表示了我们的这种愿望。1961年10月6日，刘少奇同志在同契尔沃年科同志的谈话中，也表达了我们的这种愿望。周恩来同志在那个期间了也曾经几次同苏联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劝告苏联同志，表示了我们的希望。

但是，这些劝告苏联同志都听不进去。如果说，在斯大林问题上，和平过渡问题上，由于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苏共同志对我们恨极了；如果说，由于中国不同意建立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你们对我们恨极了，那么，同样的，由于阿尔巴尼亚同志不赞成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对他们也恨极了。

那时，我们的劝告，你们听不进去。苏共同志不但没有主动地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途径，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苏共二十二大把苏阿分歧公开地暴露在敌人面前。

你们在苏共二十二大集中搞了些什么呢？事实表明，你们集中反对阿尔巴尼亚，公开指名攻击和污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

在苏共二十二大会议上，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你们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你们很不高兴。你们实际上用各种方式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你们在这次会议上还搞了些什么呢？你们还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斯大林是1953年去世的，到苏共二十二大，已经8年了。死了8年，在苏共二十大又已经反得那么厉害，这回又大反一次，出于什么目的？是不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的阴魂缠住你们呢？

我们认为，①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一个我们认为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和纲领；还进行了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反对斯大林这么三件大事。

（宣布休息到15点）

第三次会议②

7月8日

邓小平：可以继续吗？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以下会谈仍然是第二次会议的继续。——编注

苏斯洛夫：请开始吧。①

邓小平同志：我们谈到了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

我们觉得，苏共纲领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宣言和声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一条系统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路线。

我们觉得，苏共纲领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宣言和声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一条系统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路线。我们觉得，你们实际上违反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顺便说一下，这在你们今年 3 月 30 日的信中，表达得也很清楚。

在你们的纲领中，你们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党的学说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理论。你们还宣扬离开阶级观点的所谓人道主义，所谓自由、平等、博爱。

苏共二十二大后，1961 年 12 月，苏联采取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同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1961 年 12 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你们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你们的代表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和平运动对立起来，诬蔑民族解放运动为“死尸运动”。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阐明了我们的正确观点。会后，十几个兄弟党给我们写信围攻。我们知道，是有一个指挥棒在那里起作用的。

1961 年 12 月至 1962 年 2 月间，印尼、越南和新西兰等兄弟党提出了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这些建议，实际上遭到了苏共的拒绝。1962 年 2 月 22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给我们安上了 3 个罪名。这 3 个罪名是：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行为”，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了自己的“特殊立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什么所谓“独特路线”。

1962 年 4 月 7 日，中共中央写信答复苏共中央 2 月 22 日的信，提出了有关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的 5 点积极建议，主要内容是：和缓关系，停止公开攻击，兄弟党之间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来交换意见，改善苏阿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建议，实际上又被你们拒绝。苏共中央在 5 月 31 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接着，1962 年 4—5 月间，你们在我国新疆制造事件，进行颠覆活动。

1962 年 8 月 25 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说，将同美国缔结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定。在我们看来，搞这样的协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你们同美国商量好了来束缚中国的。

1962 年 10 月，在印度向中国边境大举进攻以后，苏联进一步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大力进行经济输血，在政治上支持和鼓励尼赫鲁反华。

你们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赞扬。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说：“我认为印度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两句内容。——编注

同莫斯科保持尽可能友好的关系，非常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也非常符合我们(指美国)的利益的。”这是哈里曼在1962年12月9日说的。接着，12月18日哈里曼又在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说：“美国希望看到苏联在支持印度的防御力量方面提供帮助。”

在中印关系的问题上，你们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你们忠心耿耿地同肯尼迪、尼赫鲁共同反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962年10月，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认为，你们犯了两个错误：你们把导弹运进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接着，你们在美国核讹诈面前惊惶失措，又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把导弹运进古巴？我们有经验。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件事的性质，同你们想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性质很有点相像。保卫古巴并不需要导弹。那么，你们把导弹运进去，是对它帮助，还是害它？我们怀疑，你们运进导弹是一种企图控制古巴的行为。

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们不同兄弟国家商量。你们天天讲核战争的危险，但是，你们却这样轻率地玩弄核武器。

你们解释说，你们这样搞，是为了换得美国的什么“保证”。而且，你们说，你们真的得到了什么“保证”。

事实怎么样呢？结果，在美国的威胁下，还不是不得不撤出了导弹？你们还千方百计地去说服古巴的同志，要他们接受损害主权的、干涉他们内政的“国际视察”。你们还向全世界人民宣扬，替美帝国主义搽粉，要他们相信肯尼迪的什么“保证”。

赫鲁晓夫同志在1962年10月27日和28日给肯尼迪的信中说，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我对您所表现的分寸感以及对您目前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承担的责任的理解，表示满意和感激”。

究竟美国给了什么保证没有呢？看看1963年1月11日腊斯克是怎么说的。腊斯克说：“不论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危机期间在什么程度上承担不侵犯古巴的义务，这种义务并未生效。”他又说：“根本不存在这种义务。”

1963年3月13日①，腊斯克又说，美国“没有作出不进攻的无条件的保证”。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事件中，坚决捍卫古巴的主权，积极支持古巴的5项要求。我们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有些人说，这是我们反苏。这真是很奇怪的论调。

紧接着加勒比海危机之后，从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对中国、反对马列主义的浪潮。这主要表现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5个党的代表大会上。

在这期间，赫鲁晓夫同志发表了2篇讲话，《真理报》发表了2篇文章，我们都全文转载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3月12日”。——编注

了。在这期间,有 40 多个党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

你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举例说,像东德这样的党代表大会,甚至用跺脚、吹口哨、起哄这些令人……(该怎么样说呢?)难以相信的手段,无聊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参加德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在这里,就是伍修权同志。他当时在会上说了一句:“这就是你们德国人的文明吗?”

当然,问题不在这里。① 问题在于,如果它是一个严肃的党,是掌握真理的党,是理由在它那一边的党,它就不会采用这种手段,它完全可以用讲道理的方法。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德国党自己干的事。但是,我们坦率地说,难道苏联同志没有分?在这几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完全排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另一方面,硬要把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拉进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来,为铁托集团翻案。在德国党代表大会上,起哄、吹口哨、跺脚,刚刚是在我党代表根据莫斯科声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正是按照原文一字不改地读莫斯科声明的时候发生的。

上面说的苏共二十二大以后的一系列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苏共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一步制造分裂,而且是越来越凶,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有组织,规模越来越大,气势是非把人压倒不可。

我想指出,这种方法,你们是用得很习惯了。你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就是用这种方法。在上次(1960 年)两党会谈时,我就说过,幸好是彭真同志去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谈,他有 80 多公斤,顶住了;我只有 50 多公斤,要是我,我就垮了。以后,在德国,幸好是伍修权同志参加,他也有 70 多公斤,他也顶住了。坦率地说,这种方法没有什么用,不能证明自己正确,不能证明有道理。相反的,对一个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说,是一种亵渎。

波诺马廖夫:而格里申同志重 70 公斤。毕竟这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在北京会谈的时候开始的。这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开端和原因。②

邓小平:我懂得你的意思。③

彭真:请等一下。④ 有你们讲话的时间,你们有多少,讲多少,我们都听。

邓小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很严重。全世界几十个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党进行了围攻。帝国主义反动派配合了这种围攻。

所以,在你们对我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放肆的攻击之后,我们不得不发表 7 篇文章进行答辩。顺便说一说,我们发表了 8 篇文章,7 篇是对某些兄弟党对我们攻击的答复,另一篇是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波诺马廖夫的这句话为:“那么,格里申同志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该是多少公斤呢?布加勒斯特会议是由北京开始的。”——编注

③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号。——编注

④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是对印度丹吉集团说的。

至于印度的丹吉集团，不管你们怎么看，我们看它不像共产党。

在这期间，我们发表了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你们没有发表我们的文章。

以后是中苏两党交换信件：2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3月9日中共中央的复信；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苏共中央给我们的信，我们都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没有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在中苏两党会谈前，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接连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6月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要求召回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等5人；同一天，也就是6月27日，苏联公民砸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新闻图片橱窗；6月29日苏共发表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尽管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采取了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中共中央在7月1日的声明中，仍然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决定如期派出自己的代表，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今年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再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

我们7月5日发表声明，还是照样派代表团来，照样责成我们代表团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来进行会谈。

苏共领导最近的声明、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重复地讲，中共破坏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共中央3月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是这样说的："这件事(指停止公开论战这件事)，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现在，两党会谈刚开始举行，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说得上破坏协议呢！？

或许苏共同志在想，①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比如说，想攻击哪个兄弟党，就放肆地不顾后果地攻击，并且组织兄弟党一块儿围攻；一旦自己需要停止时，就可以不经过平等商量，就下命令停止讨论。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问题上，还是采取平等的态度比较好。

有些人说，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公开争论的号召。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刚提出停止公开争论，接着就马上发出一连串的攻击。这难道是言行一致吗？

坦率地说，我们的7篇文章只是答复某些攻击我们的兄弟党的。我们对苏共领导同志和苏共报刊发表的攻击我们的文章，还没有作直接的答复。

苏共同志说，我们6月14日的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和诽谤性的攻击"。但是，我们的这封复信，只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且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意见是提出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不是苏共同志感觉到"。——编注

来讨论的,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苏共同志却说是诽谤和攻击。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本身并不是作为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倒反而不是什么论战、诽谤、攻击。我们感觉,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总之,近一个月来,苏共领导同志采取这么一系列做法,应当说,实际上是打着停止公开争论的幌子,来加剧公开争论。

在这段时间,苏共领导[①]采取武断的、蛮不讲理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共产党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提出的积极建议;并且进一步把两党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以及你们的报纸这些天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和消息,使人不能不怀疑,你们是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有意地毒化气氛,你们正在加紧进行公开破裂中苏关系的舆论准备。我是有这么一个怀疑的。

我们不能不郑重地指出,你们正在把中苏关系引导到破裂的边缘。我们还要郑重地指出,在你们大肆组织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你们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态度,是同1960年声明相违背的。

我们在1960年9月10日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中,曾经指出苏共同志实际上认为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和美化艾森豪威尔的一系列言论。

近2年来,苏共同志对以肯尼迪为首的美国政府,又发表了许多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言论。例如:你们把肯尼迪比作罗斯福。

1962年7月13日,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我想,美国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野心。”1963年6月15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评论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的时候,又为肯尼迪搽粉,说:“他的这篇演说包含着一系列积极成分,证明他清醒地考虑了现实情况。”顺便说一说,我们要问,肯尼迪最近在西柏林的演说,是不是也是“清醒地考虑了现实情况”呢?

正是基于这种把敌人当作朋友的错误的立场,苏共同志在许多场合,极力鼓吹苏美合作决定人类命运的错误观点。这明显地表现在:1961年10月25日,葛罗米柯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谈到苏美关系时,是这样说的:“如果这两个大国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来保卫和平事业,那么,谁还敢破坏和平,谁还能破坏和平?谁都不敢和不能。世界上没有这种力量。”1962年12月13日,葛罗米柯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苏美两国之间有信任和合作,就会有和平;在苏联政府首脑H. C. 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违反1960年声明的。

声明说:“我们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力量的斗争……”

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宣言和声明,都没有说人类的命运要由美苏合作来决定。

关于苏共对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态度,我们在今天的发言中不可能专门来讨论。但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这里没有分段,且本无此句。——编注

是，我们愿意坦率地指出，尽管在某些场合，在某些时候，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也说过一些正确的话，但是，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不是那样支持的，甚至是反对的。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个问题有机会再谈。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我们需要专门讨论。苏斯洛夫同志在前天的讲话中，为南斯拉夫作了一大篇的辩解。但是，我们还是相信1960年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的评价。道理很简单：有那么一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花了50几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为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的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里边所说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宣言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声明中所说的，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

上面，我们对7年来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作了一个回顾。我们觉得，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承认，事实是最雄辩的。

从7年来的事实中可以看出，究竟谁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谁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谁维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谁维护团结？谁在搞分裂？谁遵守宣言和声明中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谁真正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上面所说的7年来的事实中得到答复。

我们讲这么一篇东西，当然有些语言"不好听"，但是我们讲的是事实。

你们讲的语言也不好听。这不要紧，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弄清楚，大家好好地、冷静地考虑一下，分歧究竟从何而来，从而找到消除分歧的途径，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们今天讲的大量事实，在我们的公开文章中并没有说过。但是，我们觉得在今天这样两党会谈的场合，应该坦率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如果不对，同志们可以批评。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是有益的。因此，我们想提出几点意见来，请苏共同志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们希望苏共同志考虑一下，苏共同志是不是把敌我关系的位置摆错了？

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不明白。①

邓小平：这是个老问题。1960年两党会谈时，我们就提出过。我们是这样看的：你们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内容。——编注

并不是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是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过去,你们捧艾森豪威尔,现在你们又捧肯尼迪。你们把肯尼迪、尼赫鲁、罗马教皇、铁托当作朋友,把兄弟的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看作是仇敌。

刚才说的1960年中苏两党会谈时,我们就着重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你们说,不用担心。现在看来,我们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的。

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对待帝国主义,特别是在对待美帝国主义问题上,有时候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有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实际上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害怕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引起世界大战,反对一切战争,这是犯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错误。

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你们坚持反宣言和声明的独特立场,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对不接受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兄弟党施加政治、经济以至军事压力,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你们在兄弟党内还进行一些颠覆活动,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

总起来说,我们觉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领导所推行的路线,是违反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路线,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反对革命的路线。

我们恳切地希望,苏共同志要看到7年以来,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你们把光荣的、伟大的、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引上多么危险的道路。

我们愿意郑重指出,苏共领导同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少兄弟党在苏共领导同志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教训,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教训,伊拉克共产党的教训,印度共产党的教训。此外,还有意大利共产党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讨论这些教训,以后有时间再专门来讨论。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些兄弟党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严重地侵蚀党和国家的机体,损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由于苏共领导同志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你们的错误的路线,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的声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人民中的威信,都遭到损害。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苏共领导同志喝倒彩。你们的错误,使他们越来越觉得通过“和平演变”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有了希望。尽管这是一种幻想,但是你们的错误鼓舞了他们。

我们诚恳地希望,苏共领导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不辜负全世界人民对列宁缔造的党、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的期望。

我们代表团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是以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

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为指导方针的。

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讲这些话，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斯洛夫：无疑，我们是不赞成的。

翻译：让我翻译完！我应该翻译完。

弗兰佐夫：翻译调节整个会议。

邓小平：我们应该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应该隐蔽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总比放在心里好。我们这样做，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不是加剧分歧，而是为了找出分歧的根源，找到彻底消除分歧的途径，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目的。①

中共中央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尽管我们之间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国共产党总是尊重伟大的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

对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是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你们的错误，我们不能不感到深切的忧虑和不安。我们认为，对苏共同志的错误，这样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

团结对敌是各国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为了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中苏两党两国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使包括古巴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13个国家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使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起来。

我们希望，我们两党都能够以我们两党、两国的团结利益为重，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利益为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遵循宣言和声明，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中苏两党会谈，使得这次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一致愿望。

5个小时了，我这一篇讲话就完了。怎么办？今天继续谈，还是明天再谈？

苏斯洛夫：我们建议休息到后天上午10点，我们需要了解你们的发言。

邓小平：我们同意。后天是你们讲，还是我们讲？

苏斯洛夫：按照顺序，该我们发言。

安德罗波夫：还是按照你们一次，我们一次的原则。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

"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讲这些话，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同时说：无疑，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该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应该隐蔽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总比放在心里好。

波诺马廖夫：这种话讲了好几次了！

伊利切夫：什么赞成不赞成，应该愤慨！

邓小平：我们这样做，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不是加剧分歧，而是为了找出分歧的根源，找到彻底消除分歧的途径，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目的。"——编注

邓小平：这是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发明。①

№13011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1963 年 7 月 10 日)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Ю. 泽登巴尔同志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请求其就蒙古人民共和国打算加入 1955 年 5 月 14 日的友好、合作和互助的华沙条约表示自己的意见。

我们希望就此重要问题与你们进行商议。从自己这方面来说，苏共中央认为对 Ю. 泽登巴尔同志的建议可以持肯定的态度。

众所周知，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于 1955 年。在条约中指出，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和平。希望成为华沙条约的成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协助在目前业已形成的条件下维护和平的意向，在我们看来，值得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组织的成员国的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将有助于继续加强这个组织在世界舆论界眼中的威望。

尽管身处亚洲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非欧洲国家加入华沙条约，大概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备忘录，以明确一下目前仅仅涉及欧洲国家的条约第 4 章，但这与条约总则并不矛盾。例如，在该条约的第 9 章里指出：条约为联合其他国家开辟了可能，这些国家，不论其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将表示为确保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准备通过参加本条约的途径，促进热爱和平国家力量的联合。这条规定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条约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况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定期地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重要机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工作。众所周知，最近几年里，蒙古人民共和国越来越多地发展了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就在不久以前，它已经成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这个组织最开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后还有如下三句：
“安德罗波夫：这算什么发明？
苏斯洛夫：这是个好的发明。
邓小平：好，今天就这样吧。”——编注

始建立的时候，也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

苏共中央所遵循的理由就是如此，同时认为，对Ю.泽登巴尔同志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的建议持肯定态度是适宜的。

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的事情，可以通过召开条约成员国会议的途径得以实现。这次会议（实际上这可能要求一次会议）可以于今年的7月在莫斯科举行，利用兄弟党和政府领导人出席经互会成员国会议的机会。由于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不再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工作，那么，也就不存在关于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寄送这封信的问题。苏共中央请你们就触及到的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赫鲁晓夫

1963年7月1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65—3866页

№08109

中苏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0日）

第四次会议

7月10日

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党代表团认真听取了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我们暂时保留我们重新回到这一发言中所提诸多问题上去的权利，我们认为，鉴于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讲话，我们今天必须讲讲自己的意见。

我们深为遗憾地指出，中共代表团前来谈判，看来绝不是想表达友好意愿，寻找相互理解和克服分歧道路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发言，看来你们完全是另一种目的——加深分歧，在达成相互谅解的道路上制造一个又一个新的障碍。这一发言开始所引用的关于中共领导希望同苏共统一意见和团结的溢美之词与其发言的内容和对我党莫名其妙的指责大相径庭。这一发言是以对我党的指责而告结束的。

邓小平同志发言的意图何在？难道这是同志式辩论的发言吗？不，其目的是败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名誉。不引用任何较为严肃的论据和证据，您往我们头上堆了一大堆最卑劣的诬蔑之词，诸如“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反共颠覆活动”之类，直至把苏共的路线说成是“反革命的路线”。

我党代表团坚决否定这些指控和诬蔑。苏共领导博得了共产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无限支持。我们的党不允许任何人诬蔑自己的领导。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就这个问题明确地发表了意见，表达了全体苏联共产党员和我国全体人民的意愿。在历史上有不少当时享有威望的活动家，他们企图败坏列宁党的声望，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为自己赢得荣誉和光荣，而列宁的党仍在大踏步地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攻击我们的党不会有别的结果，只能使干这种不地道事的人身败名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们又采取1960年那种已遭到各国共产党谴责的人身攻击方法攻击赫鲁晓夫同志。这种方法曾引起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的愤怒，今天也不会有其他结果。

赫鲁晓夫同志是我们公认的领导人。他表现的是苏共中央和我们全党的意志，他无限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保卫全体劳动群众的利益进行着非凡的斗争，因而他在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赫鲁晓夫同志以其忘我的劳动和斗争，以其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灵活的革命策略给帝国主义分子以准确的打击，他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他给广大群众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再次讲这些是为了让你们明白，近来贯穿于你们的发言和行动中的那种把苏共领导同全党对立起来的思想，对于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们来说是何等的侮辱。

你们给苏联共产党员和全体公民们建议的是什么纲领，企图让他们同列宁的苏共中央对立吗？放弃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和平共处斗争的纲领吗？但是，请问，你们找到了一个苏联人支持这种纲领吗？

或是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重新回到个人迷信和他的措施上去的纲领？莫非你们希望我们的人们集合在反对人道主义，反对自由和民主的大旗之下？——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所批评的正是这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获得了真正意义的口号。

不，同志们，你们不了解我们的党，不了解苏联的人们和苏联的实际，看来你们所了解的这些方面的情况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否则你们就该明白了，我们不公布你们的材料绝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他们任何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万众一心地支持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支持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我们之所以克制，唯一的原因是不希望加剧论战，是希望巩固与中共的团结。

从过去交换信件中，我们理解我们两党达成了停止论战的协议。前天我们才惊异地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我们恪守自己停止论战的承诺，不回敬对我们的诬蔑，不加强反对你们，我们这样做似乎又“破坏了”对等。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完全避而不谈我党代表团在第一次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共同深入讨论的问题。你们认为无须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和回答我们的论据——实质上是回答对你们在总路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的立场的批评。难道你们对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你们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注意？假如你们坐到谈判桌旁来是为了寻找真理，寻找解决分歧的途径，那就应该把这些问题放在注意的中心。

关于您发言的格调，我不能不谈谈看法。我不能步邓小平的后尘，堆砌诬蔑、谩骂之语。我谈事情的本质。我们从来不怪罪您的直率，即使是采取最尖锐的形式。但是这种直率我们在您的发言中见到了吗？绝对没有。您的格调是有意激怒对方，荒谬地指责对方，从而挑逗对方也采用您这种信口雌黄的人所采用的格调。

您的发言给达成必要的协议和消除现有的分歧增添了困难。

尽管如此，我党代表团认为需要重新强调，我党代表团不走你们的道路——挑起分歧和加深分歧之路。我们一如既往，认为谈判的主要目的不是加剧斗争，而是在争论的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使我们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在唯一的共产主义运动纲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按照这一目的，我们再次试图把我们的辩论纳入建设性轨道。我们把这个看成是我们今天发言的主要意图。

自然，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我不得不回答他的某些指责。我们不想造成我们离开了您提出的某些问题和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印象。

但重点不在这里。为了使整个谈判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觉得必须公开地和直接地对你们讲，我们怎样理解你们的立场。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许多我们不理解或不完全清楚的问题，现在开始清楚了。

一、关于分歧的原因和中共领导人对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所应负的责任

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特别提到中共和苏共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他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困难的责任推到苏共身上。我们应该坚决地宣布，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这一说法同实际情况毫无共同之处。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制造分歧的是我们的党，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在所有情况下，这种主动性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方。

仅把现有的分歧看成是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事也是不真实的。实际上，现有分歧是以中国领导人为一方和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一方之间的分歧。

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分歧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同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越来越远。这是任何一位把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的信和 6 月 14 日中共中

央的信作一比较的人都能看清楚的。中共领导越来越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企图把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的角色，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把那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指责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产生分歧的真正原因。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分歧由来时说，似乎分歧是由苏共二十大关于一系列原则问题的结论引起的。您声明，似乎你们当时没有同意苏共二十大对于一系列原则问题——关于个人迷信问题，关于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所作的结论和评价。但我们无论是从当时出席这次大会并看了苏共中央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那里，还是大会之后从其他中国领导人那里，都没有听到对于二十大决议的任何反对意见。

中共代表在国际共运纲领性文件——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上签了字，该文件都谈到了我党二十大的国际意义。

在上述宣言和声明中写道：“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而且对于开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和促使它进一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意义。”

我们提醒你们，对二十大决议的支持，不仅表现在你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上签字，而且表现在中共本身的决议里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里。

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讲过，苏共领导在克服了个人迷信的后果后，“揭开了盖子”，他指出了苏共在这些问题上的决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

苏共二十大半年之后，1956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在你们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讲道：“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1957 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讲：“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

在 1956 年中共代表大会上，在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苏共二十大决议也得到了详细的肯定的评价：

“今年 2 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现在中共领导们，正像邓小平同志发言那样，则是以讽刺的口吻来评述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二十大决议了，将其称之为“所谓的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而邓小平同志在

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则是这样讲的：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做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著名文章中，中国同志这样写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中国的同志们当时就是这样评述苏共二十大决议的。不能十分肯定地说，似乎你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妥协的——谁也未胁迫你们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直率真诚。这是很好的号召。但我们现在想问一下，您在评价苏共二十大时的哪些讲话是直率真诚的呢？是7年前您在你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强调二十大国际意义时所说的话呢，还是您现在在毫无根据地恶毒攻击苏共二十大的列宁方针时所说的话呢？

邓小平同志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当时是为了苏共的利益，考虑它的处境违心地赞成二十大决议才进行妥协的。这种解释不能不遭到稍微知道一些实际情况的人的讥笑。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同志说话的用意是什么，但我们认为必须指出，在斯大林死后，我们党由于贯彻二十大决议，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了。苏联经济不断地迅猛发展。苏联人民坚定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团结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周围。

所有想使我党脱离二十大道路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党集团受到我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坚决谴责便是有力的证明。苏共中央最近的全会和党的积极分子在全国进行的宣传活动清楚地表明了党和人民的统一和团结，表明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赞成和支持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路线和实践活动。

如果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最近几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这首先是中共领导人进行分裂活动造成的，看来中共领导人把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

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每一个公正的人都会对您说，您对自己在评价苏共二十大上态度180度的大转弯所作的解释是虚伪的，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诸如战争与和平、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等这些原则问题上，不能也不应该犹豫和摇摆不定。看来，关于以下两点必须承认其中之一：或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同苏共中央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没有分歧，或是中国领导人不真诚，隐瞒了自己的观点。假如你们当时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决议，你们至少可以不发表类似的意见嘛。

至于我们，是在1959年底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露出自己对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错误观点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中国的同志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众所周知,你们第一次公开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方针是1960年4月:当时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你们出版了《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直接修正了1957年宣言关于当今时代特点、防止战争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把自己对于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正确的方针强加给各兄弟党。

1960年6月,在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在非党群众面前陈述自己错误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论战,开始反对集体制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一系列原则。

为什么你们单在这个时候开始攻击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呢?现在还难于详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你们最近的文章,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发言说明了你们这样做的原因。甚至通过你们个人的声明也能看出,你们所遵循的原则绝不是努力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事情在于另外的方面:你们攻击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真正原因,正如你们自己承认的,是由于不满意苏联不支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的许多错误行动。

在《分歧从何而来》一文中,中国同志直接把自己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开始公开论战,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支持中国在印中冲突中的立场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你们甚至说出了日期——1959年9月9日。众所周知,这一天塔斯社公布了阐述苏联政府对印中冲突立场的声明。

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正立场所激怒的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反对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漫长争斗。

中国领导人还把自己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同1959年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与苏美之间冷战的缓和(尤其是赫鲁晓夫同志访美期间)联系起来。你们在国际舞台上奉行特别的路线,你们把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国际紧张形势缓和,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关系紧张作为自己的任务。

最后,不能不看到中共中央开展反对苏共运动,同因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导致当时中国国内遭受经济困难之间存在的联系。中共中央在其党内和国家里如此起劲地批评苏共,是不是想把造成国内困难的责任推到他人头上?

中共领导人由于对根本的理论问题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追逐自己同共产党统一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的特别目的,因而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对苏共党内反对个人迷信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千方百计庇护斯大林。

我们想直接问你们,中国的同志们:你们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拉回来重新讨论它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们居心何在呢?难道你们想让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回到这种状况:一个人像神一样居于人民之上,并按照他个人的意见解决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毫无希望的企图,它表明你们完全不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任何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都不会同意恢复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

难道为个人迷信牺牲了成千上万无辜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共产党员的生命的苏联人民支持这一要求？难道通过自己的经验知道了个人迷信的所有后果——歪曲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政治和经济上的恣意妄为的人民支持这一要求？我们在1937年、战争之初和战后年代，为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粗暴错误和犯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你们现在故意说“所谓的”个人迷信，假装不知道斯大林个人迷信给我们党和我们的国家，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对你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我们不能不感到深刻的痛苦和不安。实际上我们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碰到公开为个人迷信唱赞歌。应该说，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的鼎盛时期，斯大林本人在谈话中也不得不回避这一小资产阶级的理论。

你们的那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批评的，似乎苏共没有客观而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作用，没有具体分析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它的后果。这些问题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材料中，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中得到了广泛的论述。

你们那种认识也是很险恶的，似乎苏共把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理解成否定工人阶级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望。包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我党不止一次强调，它珍重和巩固领导人的威望，在破除个人迷信时，党高度赞扬那些真正反映人民利益并把自己的精力献给共产主义斗争事业的活动家。

邓小平同志，除了众多的谬误和歪曲，出人意料地说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实践和事实是检查真理的最好标准。

然而，正是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着，贯彻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在我国生活中引起了多么明显的变化。从我们党坚决转向恢复列宁的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之时起，在10年时间里，苏联在发展自己的经济、振兴文化和科学、提高人民福利和巩固国防能力方面取得了多么光辉的业绩。在兄弟党彻底贯彻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您强调指出，似乎由于贯彻二十大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其中您特别强调，在许多兄弟党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倾向。但是，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正是由于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摆脱了个人迷信的后果，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他们才能够反击修正主义并从思想上粉碎它。

你们心怀鬼胎，企图把二十大决议和著名的波兰事件以及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联系在一起。你们清楚地知道，苏共中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样你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同这些党对1956年秋季事件的看法和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同志在1960年会议上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做了详尽的回答。

我们不想重提这些问题。我们只想指出，你们的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似乎是二十大决议导致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正如兄弟党的材料里说的，这些事件的原因之一是与斯

大林的活动有关系的原匈牙利领导人的错误，由于斯大林的过错，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关系不平等现象。消灭了这些不平等现象和完全恢复了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二十大，怎么能是匈牙利人民不满的原因呢？

你们现在想捞取资本，企图利用这些事件证明，似乎苏联犯了错误，而你们的干涉未必挽救了危局。

这是对苏共奇怪而荒诞的指控，这是来自中国领导人方面奇怪的主张。难道不是我们国家为了保卫兄弟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牺牲了自己几千名儿女的生命，难道不是我国在友好的匈牙利人民危险的时候前去帮助他们？

为什么你们现在又重提往事，又翻匈牙利和波兰的旧案？这说明你们不仅在理论问题上，而且在最重要的实际政策问题上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立场。

这就是我们对我们两党之间分歧产生的原因和中共领导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所应负责任问题的意见。

二、关于我们分歧的中心问题

我在一开始已经讲过，您在发言中回避了我们两党之间论战的核心问题。不过邓小平的发言有其有利的一面。这一发言帮助我们完全弄清了中共领导人的路线，在此之前我们仅仅是根据中共领导人对个别问题的立场来认识这条路线的。

我们建议集中精力讨论的正是这一路线。

如果不反对，可以建议休息20来分钟。

（休息）

我们认为，争论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那一长串所谓“事实”意义不大。如果分析一下，那算什么事实呢？它们多数是被肆意解释的诸多事件的日期。我们将向您补充说明这些事件以及它们真实的内容。我们认为现在最好是谈原则问题，谈方针、观点、政治路线。

既然我们对于你们的路线现在有了较为全面的概念，那我们的会议现在就面临着另一个首要任务——进行分析，看这一路线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想以此把辩论引上讨论原则问题和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的道路，从而使我们的论战转入建设性的轨道。

在分析你们的路线时，我们不想采用主观评价和“扣帽子”的方法，我们将用唯一可靠的观点——以其是否符合生活、实践、事实、马列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观点来审视它。对于我们，共产党员们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唯一的最高裁判。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但是，只有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才表明，事情不在于在个别问题上哪怕是最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事情在于要开展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行动。这从他攻击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便可看出来。——苏共二十大，按照写进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所有兄弟党一致的意见，这是一次开创

了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代表大会。这从他对待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态度便可看出来——这种态度，正是企图把共产主义拉向后退，拉回它走过的历史阶段。

最后，这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这里所表示的蔑视态度，我想说是敌视态度——蔑视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而生存和它对反帝、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斗争新途径的探索，便可看出。

从邓小平同志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角度看，又提出了我们以前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

说实在的，在谈判开始前几天，从今年6月14日中共的信里我们就明了事情的趋向。在这封信里，你们提出了对当今时代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所谓“建议”。前天邓小平同志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建议遭到我党的激烈批评。

是的，我们是可以解释的。第一，我们认为信的内容，信里对我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发难，对他们政策的有意歪曲是诬蔑。第二，难道还不清楚，中国同志提出总路线的问题，是想以此一笔勾掉载明了集体制定的当今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莫斯科宣言和声明。

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之后，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更清楚了。确实，不能否定苏共二十大，同时就得承认在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固定下来的总路线。

是的，按照普通逻辑，你们，同志们，是不能否定的。谁说了“一”，就应该说“二”。你们向二十大挥拳，就不可避免地要向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进攻。

你们号召我们要直率坦诚。那就请允许我直接地明确地对你们讲，现在已十分清楚，你们在最近活动中所遵循的思想和理论，是完全同莫斯科会议文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许多问题上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这从你们对一些根本问题——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问题、当代解放运动和反帝运动的领导者问题、战争问题、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解释中便可清楚地看出来。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没有阐明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所以必须哪怕是简要地指出，从你们打印的和口头讲话里得出了哪些结论。

我从基本矛盾问题讲起。

难道可以同意中共领导的论断吗？似乎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我顺便指出，这个原则，看来是其所建议的“总路线”的主要原则)？

我们说过，现在再次重复，这种对当今时代主要矛盾的评价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这是对唯一正确的观点——阶级观点的背离，是以民族主义的地理的和任何其他的，总之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取代阶级观点。正在斗争的和已获得解放的殖民地人民为一方，帝国主义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矛盾再尖锐、再重要，毕竟不是这一矛盾决定着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方向，不是这一矛盾构成这一发展的主要动力。

由于错误地估计时代的基本矛盾，导致了对两支伟大的革命力量——今天不仅由资本

主义国家共产党,而且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为其代表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当代革命的、解放的反帝运动中所占地位的错误估计。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两支力量在今天发挥着巨大的革命作用,它们的斗争构成了世界解放过程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丝毫不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能力和前景,与此同时,把世界反帝斗争的领导者角色赋予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把所有的反帝的解放运动引上彻底的反帝斗争的轨道并把它进行到底。只有在这种领导条件下,这一运动最终才能获得社会主义性质,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这里引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当今时代的中心等原则。这些原则是莫斯科声明中固定下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

中国同志有什么地方与此相违背呢?从对时代特点、它的基本矛盾、社会力量分野的错误估计出发,你们把民族解放斗争作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

如果不信口开河,而是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那么,这样提出问题就等于强调,当代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小资产阶级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国际工人阶级。

你们提出了这种观点,还敢指责我们背离了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立场!

我们很难相信,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这些方针仅仅是由于理论迷惑。

我们想分析一下中共领导关于当代最重要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立场。

对中共领导最近3年多以来讲话的分析表明,中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论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无疑,在开始的时候,你们很少注意以抽象议论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好处来掩盖自己的观点,表达观点较为赤裸。后来明显地,你们意识到自己立场的动摇,开始较多地谈你们也争取和平,承认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但你们的观点这些年实质上很少变化。前天邓小平同志证实了这一点,他宣布,中共否定二十大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和平共处问题的结论,似乎这些结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

我们清楚,你们不承认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你们想要证据,我们可以摘录你们的发言和文件以证明我们的结论。

但否定当代条件下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不相信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能力,意味着低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能力,相反夸大帝国主义的能力。

但是,非常奇怪,中国同志似乎与其他共产党在评价现在力量对比方面没有分歧。他们著文和讲话,宣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超过了帝国主义,宣传人民反战运动的巨大规模,等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分歧的本质何在呢?问题在于,当和平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的时候,在世界舞台上执行什么政策。

这就是中国同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所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力量对比于我有利的时候,列宁的方针在于,首先依靠人民

群众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和其他优势，把这些优势作为争取和平斗争的工具，作为遏制侵略势力的强大因素。

而中共领导的立场是怎样的呢？你们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和我们一起认为国际范围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同时你们又强调战争一如既往不可避免，那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首创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革命战争”排除在外。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把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同你们关于“和平共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的原则”这一论断联系起来。

你们在自己 6 月 14 日的信里愤怒地指出了那种认为中国力图“发动战争”，想“通过国家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的“荒谬说法”，宣布这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诬蔑之词”。

当然，你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热核武器时代，这种指责比任何一种指责都更能破坏一个政党的威信，败坏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应考虑到，同志们，是你们自己不止一次地给人们制造这种说法的理由，是你们做了不少工作想让更多的人相信它。

也拿你们对待热核战争前景的态度为例。现在全世界都心怀忧虑地知道了你们《列宁主义万岁》这本小册子中的一个著名论断：“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止一次地对你们讲，类似观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任何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党，它什么时候也不会同意把这种观点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基础。

借助世界战争在其他国家实现革命，从原则上考虑，这条路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建立在“革命输出”这一反列宁的思想基础之上。此外，这条路完全没有考虑可能使用导弹核武器的世界战争现实后果问题。

试问中国的同志们，你们考虑过没有，导弹核战争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废墟？

这绝不是旧的过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废墟。这是我们地球上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城市和农村留下的废墟。在热核战争的情况下，世界主要的文明和文化中心将从地球上消失，甚至许多国家和民族也将整个从地球上消失，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也将处于致命的辐射作用之下，核辐射不会怜悯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行动的国家的领土。

国际主义者能否轻视这一问题？

而你们自己是如何描述热核战争后果的呢？请你们像实事求是的政治家那样，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想听一听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你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的不负责任和轻视的态度使我们很吃惊。

某些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声明说明了你们所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所说的话：

“要设想一下，爆发世界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 27 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毛泽东同志还说，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

利”,中共领导准备牺牲 3 亿中国人。

也许,你们关于牺牲 3 亿中国人的论断是危言耸听?你们指望热核战争仅仅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但是,即使不谈这一观点的道德方面,它也是从不现实的前提出发的。导弹核战争不分前线和后方,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大陆和任何一个国家。这一切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威胁,对此不应该轻视和不予理睬。

应该冷静地估计热核战争的后果。我们应该不应该把这种战争后果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绝对应该。这能否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麻痹”人民呢?相反,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将能激励人民的革命意志。人们对头上的危险知道得越清楚,他们就越积极地不仅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计划,而且反对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本身。正是害怕事情出现这样根本变化,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才努力把热核战争描述成一种虽说是灾难但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说什么就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还可接受的事情一样。至少这种情况是可怕的:中共领导开始客观上同帝国主义分子结盟,欺骗本国人民,不让他们知道也尽量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知道真实情况。

具体而言,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是努力巩固和平共处,还是走激化国际紧张程度即有意识地走战争冒险的道路?是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还是把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派别的策略——“在战争边缘上保持平衡”作为武器?

在这方面,你们是与共产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

的确,中共领导在口头上支持两种社会体系和平共处的原则,甚至不失时机地强调自己参加过著名的万隆原则的制定。但是,从你们对和平共处所作的解释,尤其是你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行动可以看出,你们实际上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实现和平共处的实际可能性。你们仅把和平共处看成是策略口号,而实际上贯彻的是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剧“冷战”的路线。难道你们“针锋相对”的口号不是这个意思吗?

这种口号能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最冒险的帝国主义阶层所奉行的政策——“实力政策”、“战争边缘”平衡政策作为自己的武器。这意味着我们受人挑拨,走向军事冲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军事冲突对军事冲突。

自然,这种政策正中五角大楼将军们的下怀,但它绝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不利于共产主义运动,它分散社会主义国家的精力,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解决国内任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我们认为,国际局势经常紧张不利于中国人民,不利于他们集中精力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建设任务和提高生活水平。

自然,当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会以武力对抗帝国主义的武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把武力政策作为一种原则,以此推行这一政策,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进行冒险主义的和侵略性的比赛。

而你们明确地要求我们,希望我们接受这种挑战。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苏联试图削弱“冷战”,改善自己同美国的关系,加强自己同

美国的经济、文化和其他联系引起了中共领导们的愤怒。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所干的每一件事你们都不赞成。你们指责我们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批评我们同美国就裁军、禁止核武器实验和改善贸易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为什么偏偏两个核大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总是引起中国同志强烈的否定的反应？难道你们真的对这两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冲突感兴趣？

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共处所采取的许多实际步骤，正如你们理解的，追求的是中国的特别利益。你们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实验问题的立场，你们对中立政策的评价，你们在中印冲突中的政策，尤其是你们在加勒比海地区危险时期的立场证明了这一点。

对后两个问题，需要进行一下特别的分析。我认为，你们哪一篇文章、哪一篇讲话都不如中共领导在这两次事件中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更能揭示你们的真正立场。

首先看中印边界冲突。

我们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无论中国同志怎样理解，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尽快停止这种冲突。我们的出发点一直是，印中之间的战争，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你们所谓似乎我们作为盟友没有支持你们的说法是做作的。你们不能不知道，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谴责印度的反动集团，谴责他们企图煽动中印冲突，想利用这一冲突使印度脱离中立的道路，同时取缔国内的左派力量。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给印度政府以可能的影响，希望不要扩大冲突，提醒它通过和平的道路调解争端。苏联政府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旨在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设性建议。

你们，同志们，没有考虑在印度还有右派势力，它专门等待时机，企图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中立道路，把印度和西方联系起来。你们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对待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靠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还有，你们没有考虑你们将把印度的共产党员们置于什么境地。

你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行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协商制定的关于和平共处、关于支持争取独立的所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从而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体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关于中共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立场。

无须指出，这是一场可能导致世界热核战争的最尖锐的国际危机。当时美帝国主义的极端分子表现出了冒世界战争风险以镇压革命古巴的决心。

1962年后半年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这样的形势：只有采取积极的坚决的措施才能使侵略分子头脑清醒，遏制住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机器。这种措施就是在古巴部署苏联的战略导弹，它清楚地表明，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入侵不能逃脱惩罚，入侵意味着热核战争。这一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入侵被制止了。这里有什么“冒险错误”？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指出：“去年中期古巴政府和苏联政府决定采取相应措施警告入侵，我们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之上的。”

尔后的谈判——以撤出导弹武器作为保证不入侵古巴的交换条件——得以粉碎了美国那些准备铤而走险、不顾核战争危险的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谈判以和平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胜利,战争和反动力量的失败而告结束。革命的古巴坚定地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它的社会主义成果得以保全。

在苏古联合声明中写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保卫古巴革命中的坚定立场,苏联和古巴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所表现出的沉着和对形势的冷静思考,还有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对古巴的支持防止了热核战争。"

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呢?其立场在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坚定地宣布自己支持统一的方针,表现出我们队伍的统一,抛弃所有分歧,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地采取措施帮助古巴,同时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发生。

而中共领导采取了什么立场呢?实际上你们没有集中全部火力对准帝国主义,而是对准了他人——对准了苏共和苏联。中共领导企图利用尖锐的国际紧张形势得出有利于自己同苏共进行宗派斗争的结论,从而加强自己对苏共和苏联的进攻。为此你们在古巴危机时期拼命指责我们:说我们牺牲古巴人民的利益搞"慕尼黑阴谋",说我们把导弹运进古巴是"冒险主义",说我们在美帝国主义面前表现出了"投降主义",等等。你们竭尽全力破坏苏联在国际舆论界的领导地位。

在此之前曾证明帝国主义可能随时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关键的时刻采取了旁敲侧击的立场,没有采取作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战斗盟友的立场。我们没有听到你们任何关于中国部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已制定出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建议在美国侵略者进攻情况下中国部队起什么作用等方面的声明,我们没有听到中国政府关于决心不惜一切力量支持古巴人民,决心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保卫古巴成果,履行自己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所承担的盟友义务的任何公开声明。

应该说,你们不仅批评苏联的立场,而且明显地企图加剧本来就已很紧张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形势,给冲突火上浇油。

简言之,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藉以判断中共领导在总路线、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等这些原则问题上所持真正立场的真实的事实。

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2小时吗?到3点15分再见。

(休息之后苏斯洛夫同志继续发言)

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中国同志已经到了指责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步。从今年7月1日起,中共中央第一次开始在文章和声明里正式指责我们。邓小平同志在这里重复了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

我们党坚决驳斥这些诬蔑。每一个了解事实的人都知道,现在的确存在的分裂危险来

自另一方——中共领导一方。企图指责我们党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卑鄙的图谋。

中国同志把自己说成是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统一的“斗士”。在中国的文章和讲话里，再没有比“团结”、“统一”这类词出现频率更多的词了。在7月8日邓小平同志的发言里，这些词重复了许多次。

但是，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统一问题的，让我们把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与此作一比较。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无论是一个党的统一，还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首先是靠思想纲领一致，靠在对阶级敌人斗争中在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观点相同来保障的。

可以说今天中共领导所坚持的思想政治纲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坚持的思想政治纲领吗？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一切，即中共领导对当代最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关于世界舞台上基本力量分布的特别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解以及其他观点，都说明：中国同志们在其思想方针上，是与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坚持的和载入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性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的思想政治纲领相背离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有什么根据把自己说成是统一的“斗士”？

还有，无论是一个党还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靠总路线的统一即该党和整个运动在该阶段为自己所提出的战略和战术、政治目标和任务相统一来保障的。

今天中共领导奉行与宣言和声明所载路线不同的“总路线”，这一事实能说明它在为统一而斗争吗？不，正好相反，这说明它在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分裂整个运动。

还有，一个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靠所有党自愿承担和严格遵守一定的义务来保障的。

从你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你们的纲领是反列宁主义的宗派斗争的纲领。使人产生这种印象的不仅是你们的发言，还有你们的行动。让我们看看某些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在其他党里大肆进行宣传你们“特别”思想纲领的活动。这里指的是对其他党发动群众性的宣传攻势；散发数百万份小册子和文章，批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一些党的一致的思想政治路线；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其一些地区建立进行这种宣传的特别中心；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进行集体或是单个“训练”。而且这一切，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相应党的领导人进行的，因此你们已多次遭到各兄弟党中央的抗议。

看来，你们甚至不为这一事实感到害羞：你们的宣传正受到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共组织的利用，他们正处心积虑地宣传和散发你们的材料。

你们高傲地、蔑视地看待兄弟党，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他们身上。你们肆意把许多兄弟党从共产党国际大家庭中除名。例如，从邓小平同志的发言中，我们惊奇地知道，对于你们来说，印度共产党已不算共产党，而是集团。在同一发言中，你们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古巴共产党抱有同样的看法。

我们十分吃惊,当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愤怒反对残忍杀害伊拉克共产党光荣的领导人的时候,当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加入抗议运动。

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各兄弟党的谈话里,暴露出你们对各兄弟党十分蔑视。原来,这是因为,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一批兄弟党反对中共的行动",在1960年会议上"组织了全面向中共进攻的集团,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之后"有10个党抗议中国共产党,"而我们知道,这是谁的指使",在加勒比海危机之后,"40多个共产党公布了向中共发难的决议和文章,而我们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等等。

甚至难于启齿,在这些极端侮辱性的谈话里还包含着贵族老爷式的蔑视轻慢态度或十足的无知,不知道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看待有的党公开破坏、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危险的分裂破坏活动时是无须什么"指挥棒"的——无论是莫斯科的,还是北京的。您的谈话使各兄弟党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对此您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承担责任。这里还有什么权利平等和尊重各兄弟党(大党和小党)的独立可言?

您在7月8日的发言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进行了骇人听闻的侮辱,指责他们那里"资产阶级思想吞噬了国家和党的机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主张您对此得解释清楚,因为假若我们沉默不语,不对您对没有代表来到此谈判桌旁的其他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员们的指责进行坚决的谴责,我们代表团将承担沉重的责任。

长期以来,你们积极地在兄弟党里招募支持者,企图在那里建立宗派集团。

你们自己,先是在反对美国共产党的文章里,尔后在自己6月14日的信里,道出了这一活动背后的目的。你们所谓"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共产党外"都可以找到沿着你们建议的道路前进行的"力量",可以在党外找到可以领导该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是直接号召分裂,号召成立宗派组织,号召推翻不为你们喜欢的各兄弟党的领导。

这一切不是别的,正是你们对其他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这种干涉的鲜明例证,就是你们粗暴而放肆地反对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你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对整个党还有什么"帽子"没有扣?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你们有意识地推行这种方针——败坏各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名誉并推翻他们。

你们干涉其他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肆意赋予自己评论他们活动的权利,甚至企图以绝对的形式给他们下达指示。你们发言的口气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你们的发言中,对其他共产党充满了这样一些命令字眼儿,如:"各共产党应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等等。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追求特殊地位。你们觊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赋予自己最高裁判的角色——或右或左地给予评价和下达领导指示。显而易见,你们并未发现,在世人眼里,你们6月14日

信里关于各党权利平等，关于“在兄弟党相互关系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的论断是多么可笑。

至于苏联共产党，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清楚，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和公认的功劳，可她不仅不觊觎领导地位和批驳关于某种领导地位的思想，而且主动建议改变关于它的领导作用，关于运动以苏共为首等这些在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文件中长期以来已成为传统的提法。顺便指出，中共在其他党中间，十分积极主张保留这些提法，认为这些提法已完全被苏共的功劳和她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现实贡献所证实。

最后，谈到中共领导的分裂行动，不能对这一事实沉默不语：你们开始中断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联系。仅举出这些例子就够了：中共代表撤出了各兄弟党唯一的集体机关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委会。你们拒绝参加国际援助基金。如果轻视援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掌权的共产党第一个不容违背的行为准则，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毫无根据地说：“某些以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走上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反对你们对兄弟党的这种诬蔑，反对你们企图在此双边会晤时讨论某一其他党的政策，背着他们给以单方面的评价。你们没有这种权利。

我们坚决批驳你们毫无根据的臆测，似乎是苏共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我们严肃地提醒你们，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行动说明，你们没有严肃地、按照列宁的教导对待你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分裂的可能后果。

我们劝你们认真斟酌你们的行动，斟酌不断加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对社会主义阵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解放运动、整个人类命运所带来的一切可能后果。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重提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代表个人发表看法。

我们现在想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对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论据一个也未驳倒。你甚至没有解释清楚，你们为什么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看法，须知在几年前你们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你又把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抛到九霄云外，只知道给南斯拉夫领导人头上堆砌谩骂之词。

至于您说，似乎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会议某一委员会里承诺不把南斯拉夫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完全是谎言。

四、苏中关系的几个问题

苏联共产党在苏中关系上的路线，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坚定地发展和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发展和巩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兄弟般友谊。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各个历史阶段，苏共始终是中共的真诚朋友和战友。我们同中共关系上的立场是建立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实际情况是，正是我们的党，不顾近年来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破坏苏中友谊，把思想意识

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去的企图,为保护这一友谊做着它能做的一切。

邓小平同志毫无根据地攻击苏共和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令人十分遗憾和痛苦。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竭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企图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脱离实际的结论。你们,中国同志们,甚至把一个喝醉了酒的学生的流氓行为——打碎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大楼周围的展览橱窗提到政治行动的高度,在你们国内围绕这一事件制造舆论,从而煽动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帝国主义宣传没有白白青睐所有的反苏事件,他们最近起劲从北京发出报道,津津乐道他们敌视苏联的方针!

但是,不像你们想象的,是个别的不快事件决定着苏共和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容性质。你们的行动让我们想起一些真实的事实。

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立即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是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是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武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贯援助中国建立和巩固国防。在苏联技术帮助下建成的 24 个国防企业成了建立中国相应工业部门的基础。此外又建立了 33 个国防企业。由苏联提供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当时装备了中国军队 60 个步兵师,1955—1956 年,中国军队又实行了现代化,装备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在过去的年代里,我国给中国提供了很大数量的技术和工艺文件资料,因此中国才获得可能,生产米格-17 飞机、米格-19 飞机、米格-21Ф 飞机、图-16 飞机、米-4 直升机,“空对空”、“地对空”、“地对地”、“空对地”、“舰对地”导弹,海军技术装备、潜艇和各类快艇。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了原子工业基础。

邓小平同志,这一切您都清楚得很,但您又重新搬出了我们早就共同讨论过和已十分清楚的长波电台问题,杜撰出所谓共同建立水下舰队问题。的确,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说明,苏联想把中国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是可笑的。1960 年您还没落到如此荒诞想法的地步;如今在此面前看来您还不肯却步。

讲几句你提出的所谓“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似乎我党企图把共同建立海军舰队强加给中国,因此我们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邓小平同志您出席了 1958 年 7 月 31 日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参加了会谈。难道您忘了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所作的如下声明:“任何时候我们苏共中央也没人产生过共同建立海军的想法。你们知道我的观点。我在斯大林生前就反对‘合作社’。”接着赫鲁晓夫又说:“我们认为需要谈谈舰队建设问题,但关于建设共同工厂或共同舰队我们没考虑过,而且也不需要。”毛泽东对此回答说:“如果这样,那所有的乌云都散去了。”

没有问题,而您今天又重提此事。您这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在冷静地对待事情,对苏联帮助中国巩固国防所作一切记忆犹新的情况下,可以允许类似的观点?

我们还想给健忘的中国同志们提醒苏联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些事实。难道在苏联帮助下建起的 198 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苏联培训技术干部没有说明苏共

忠于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在苏联援助下，在中国建起的冶金企业生产的铁，到1959年几乎占到铁总产量的一半，所生产的钢超过了钢总产量的一半，所生产的轧钢中也超过总轧材的一半。在苏联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建起了汽车、拖拉机、航空等这些新的工业部门。苏联向中国转让了2.1万套科学技术文件，其中有1 400多套完整的企业设计方案。

在坚决指出您对苏联臆测的同时，自然，我们保留对您无根据的攻击进行回答的权利。

事实证明，在苏中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中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旨在发展苏中关系和以同志式态度解决分歧的苏共方针，一种希望加大分歧，破坏苏共和中共之间、苏联和中国之间各种联系和合作的中共方针。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问你们：为什么中共领导近几年不理睬苏共中央发展两党两国联系的任何建议，破坏两个兄弟党之间和两个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是由于中共领导的过错，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大大缩小了，1962年我们合作和贸易总额降到1959年水平的36.5%，苏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成套设备下降了97.5%。难道这些事实可以否定吗?！

1962年我们两国之间文化交流人数比1959年减少80%，这难道是出于苏联的倡议?！

难道实际上是苏联方面中断了我们两国社会团体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减少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

难道不是中国方面蓄意挑起多次中苏边界事件，非法侵入苏联领土？仅1963年登录的此类破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

对1962年夏季新疆居民越过中苏边界的事实，您重提此事，似乎这是苏联制造的颠覆活动。您很清楚，这是诬蔑。我们曾建议你们的代表同难民谈判，说服他们返回。但我们的建议没有得到你们的响应。

最后，对于谁也不是秘密，近年来中共领导在中国人民中间开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史无先例的破坏苏联内外政策名誉、破坏中苏友谊、煽动反苏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十分清楚，中国领导的这些行动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给中共党员和中国劳动者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带来了重大损失。

同志们！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的观点和行动是背离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方针的。而且这里说的，还不是同文件字义和个别部分的差异，而是背离整个文件精神，背离文件的主要理论和政治结论。

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这是集体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它是经验的总结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背离这一文件，意味着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无论口头上怎么保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无论怎么攻击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都掩盖不住这一事实。

你们企图拿宣言和声明同苏共二十大结论和苏共纲领相对抗。这种企图是徒劳的。哪个共产党员不清楚，正是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它受到各兄弟党会议的赞许。

其实,是你们自己通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通过6月14日的信表明了你们背离宣言和声明。

中共领导人断定苏共和绝大部分共产党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与当年那些蹩脚的"左"倾空谈家们放肆指责最伟大的革命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修正主义何其相似乃尔。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荷兰极端"左"倾分子Г.戈尔特在1920年秋给列宁的公开信(对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回答)中写道:"您知道第三国际现在的行动同过去的社会民主派一样……按照工人运动的发展,欧洲存在两个派别:急进派和机会主义派。而您,列宁同志,支持机会主义派……您由马克思主义领袖变成了机会主义领袖。"没有必要评述这种荒谬的来信。深为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正在步这种蹩脚的极端革命者的后尘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实施攻击。

当你们提出这种荒诞的谎言——似乎苏共不再区分朋友和敌人的时候,你们的行为与此完全一样。我们愤怒地批驳这些谗言。

我们对你们代表团领导人对我们党——伟大列宁的党、对她的列宁主义方针和二十大以后时期的实践活动所进行的诽谤深为愤慨。

在你们的信里和邓小平同志的发言里,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些普通的词句,如共产党人应该进行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应该联合起来,等等。是的,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些一百年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原则。但是,在当代形势下,我们的运动的战略是什么呢?你们对这些在宣言和声明里论述得很清楚的问题根本不重视,而在毫无根据地攻击苏共和苏共纲领、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方面,却达到了极精美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当绝大多数共产党不赞成中国同志的立场的时候,你们的立场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所谓第四国际的欢迎。在第四国际领导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写道:

"同志们!近来贵党许多领导人和官方机关开始对某些基本命题展开辩论:'和平共处'、幻想全面裁军、把帝国主义理想化——这一辩论的基本点就是这些。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一辩论和你们立场的巨大意义……

第四国际站在你们一边,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同你们今天反对的那种思想进行斗争……第四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这一辩论。它呼吁你们进一步开展这一辩论。"

托洛茨基分子的恭维表明,中国同志走上了多么错误和危险的道路。

我们认为,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公开地告诉你们这一切。

我们再次呼吁中共代表团客观地、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看待如此严肃的对于我们两党两国、对于社会主义合作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从我们方面,我代表团在执行苏共中央训令中,将尽一切努力,做到不加深已有的分歧并为克服它们寻找途径。苏共中央将一如既往,坚定地彻底地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宣言和声明基础上,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奋斗。

邓小平：明天可以休息一下吧？(转向安德罗波夫)

苏斯洛夫：好，到10点钟开始。行吗？

邓小平：好，同意。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67—3909页

№08110

苏中两党会谈第六次会议记录：邓小平的发言[①]

(1963年7月12日)

第六次会议[②]

7月12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发言

同志们：

我们注意地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7月10日的发言。你们在这个发言中，故意地曲解我们的原则立场，回避了许多重要的事实，歪曲了许多重要事件的真相，使用了大量的恶毒语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更加放肆的攻击，给我们加了更多的臆造的罪名。你们的发言，使我们更加清楚了解苏共领导固执坚持的错误立场和观点，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你们的路线，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路线，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背离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路线。

我们分歧的性质是严重的，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为了消除分歧，取得共同的语言，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我们认为，应该不吝惜我们的精力，对当代革命有关的一系列的原则问题，进行逐点的、详细的、反复的讨论。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指责我7月8日的发言回避了原则问题。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我在那次发言中着重谈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只有弄清楚分歧从何而来，弄清楚产生分歧的原因，才能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你们对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都不想弄清楚，这怎么能够说你们对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是抱有诚意的呢？你们在自己的发言中

---

①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② 中方解密的文件为第四次会谈记录。——编注

似乎认为,只有你们谈到的问题才是原则性的、建设性的问题。坦率地说,你们的两次发言,除了重复那些早已被我们多次批驳过的论点,更粗暴地对我们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更说不上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一方面①,你们的发言,力图否认我们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这一事实。但是,另一方面②,你们又一再强调,拒绝苏共二十大就是不承认宣言和声明。你们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你们坚持要把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恰恰说明我们的分歧正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我们在上次发言中,说明了我们对苏共二十大的一贯立场,列举了我们从 1956 年 4 月开始就多次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的事实。这些事实,你们明明是知道的。令人惊异的是,苏斯洛夫同志在 7 月 10 日的发言中说,苏联共产党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没有听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大会的任何反对意见。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对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一向有不同意见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一直就挂着斯大林的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在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在指出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同时,还肯定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难道你们忘记了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吗?为什么你们硬说我们完全支持苏共二十大呢?这难道是讨论问题的严肃态度吗?

你们极力否认苏共二十大的错误,特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但是,历史不是用几句空话能够篡改得了的。我们对于苏共二十大的立场是一贯的。你们要想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所发表的言论里去找帮助,是完全徒劳的。

你们上次发言似乎从托洛茨基分子的第四国际那里抓到一根稻草。

我们要提醒你们,不是别人,正是你们鼓励了托洛茨基分子,并且受到他们的热烈赞扬。你们的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唤起了在绝境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希望。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1957 年 10 月 11 日,第四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说:

"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1961 年 11 月,第四国国际书记处《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

"托洛茨基在 1937 年说了这些话反对斯大林:'莫斯科的清洗和可怕的审讯的主使人将饱尝羞辱,苏联人民将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承诺将树立这个纪念碑。"

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斯大林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托洛茨基分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他们确实企图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混水摸鱼。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很清楚，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在对待叛徒铁托集团问题上，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究竟谁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谁受到托洛茨基分子的赞扬，谁真正走上了危险的道路，这是很容易鉴别的。你们企图借助托洛茨基分子来诽谤我们，这是徒劳的。

你们在发言中，借口我们无权在这次会谈中讨论其他兄弟党的问题，指责我们上一次的发言。你们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上次所谈的是苏共的错误路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恶劣影响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同你们继续进行讨论。

我们倒是要向苏共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口口声声说中苏两党的分歧是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你们俨然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自居，究竟你们受了谁的委托？究竟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利？

坦率地说，你们滥用曾经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伟大成就的苏共和苏联的威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兄弟党，以老子党自居，是太习以为常了。你们居然傲慢到这样的程度，谁批评你们，你们就认为是批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谁不同意你们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谁就是反对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这是一种极坏的习惯。真正要像上帝那样，一个人凌驾于各国人民之上，根据自己的意见解决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中的最重大问题的，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裁判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们自己。

对于你们两次发言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在今天的发言中，不可能一一涉及，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再作评论。现在，我们还是先来谈谈几个原则性的根本问题。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对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的认识和态度的分歧。

这种分歧，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分歧，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的分歧。

这种分歧，集中地表现在两个重大问题上：

第一，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完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

第二，是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要不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我们认为，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是解决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关键。

我先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完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的问题。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规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路线。

1957年宣言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60年声明进一步指出："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最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1960年声明还指出:“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和平战士日益紧密地把力量联合在一起,采取坚决的行动,以防止战争和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一切革命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到,宣言和声明是把争取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中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争取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争取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路线。

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是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革命的路线,而绝不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不革命的路线,反对革命的路线。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是你们在3月30日的信中首先提出来的。你们在这封信里系统地阐述了你们对总路线的观点。

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中叙述了我们对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是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我们的看法,同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是完全符合的。

苏共代表团的发言,攻击我们对宣言和声明进行了“总修正”,把宣言和声明“一笔勾销”,反对我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

我们要问,你们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全世界无产者不应当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应当联合起来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应当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呢?

坦率地说,你们反对我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反对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革命路线,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不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关于共产党人应该进行革命斗争,关于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关于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应该联合起来等等,都是“一百年来马克

思主义原理的起码常识”。是的，这的确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解决的问题，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但是，革命还是不革命，无产阶级要不要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不要联合起来，恰恰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斗争的中心问题。过去，列宁同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我们同你们的争论的中心问题，也正是这个尖锐的问题。因此，你们轻视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

坦率地说，你们所主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

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企图否认你们把总路线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并且说“这是荒谬的指责”。但是，抵赖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对你们的批评，是以你们几年以来大量的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作根据的。

你们对于我们的时代的分析，虽然也常常引用宣言和声明的词句，但是你们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时代说成是两个社会体系和平竞赛的时代，阉割了宣言和声明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内容。你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这段时期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社会体系的竞赛。这个竞赛成了历史现阶段世界发展的枢纽和基础。”

你们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共产党的压倒一切的任务，从来不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和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你们的对外政策总路线的内容。你们说什么“和平共处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难道不是证明，你们的总路线是不要社会主义阵营，不要革命的吗？

你们抹杀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斗争，把和平共处解释成为“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的国际合作”，解释成为“同一切国家实行全面的合作”。

你们错误地夸大经济竞赛的作用，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竞赛中的“彻底胜利”，就“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打击”，说什么只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要用经济竞赛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你们违背宣言和声明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观点，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错误地宣扬“和平过渡”的路线。你们甚至毫无根据地说，在现在条件下，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扩大”。

你们把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我们在7月8日的发言中，曾经谈到葛罗米柯同志鼓吹苏美合作。其实，葛罗米柯同志的讲话不过是反映了苏共领导的观点。

赫鲁晓夫同志1961年9月8日在苏印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了和平和友好的关系，那么未必有谁能够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因为他不得不考虑两国的立场而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照你们看来，美国不但不是当代世界的主要侵略者，

而且它的“立场”还可以使别人“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

由此可见，你们的总路线，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就是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总路线，就是反对革命的总路线。一笔勾销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你们的这种错误的总路线，是同你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对于世界现实的全局，对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革命的领导问题、革命的主力军问题、直接同盟军问题、间接同盟军问题、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的问题，等等。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制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空谈矛盾，重要的是要正确地分析矛盾，通过革命来解决矛盾。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中，正是从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来阐述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的。我们在这封信里强调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我们的观点，是同你们的观点根本相对立的。

你们的两次发言，都攻击我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正确观点。但是，你们的发言恰恰说明了，你们关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口头上也承认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否认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你们的出发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你们的结论，不是革命，而是取消革命。

你们口头上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认为，这个矛盾会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会在苏美合作中得到解决。

你们口头上承认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承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认为这些矛盾都可以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得到解决。

正因为你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观点，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学说，因而你们的总路线，只能是一条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现在，让我们再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一看你们的不要革命的错误路线。

拿苏共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来说吧。

苏共同志有意贬低和抹杀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取消民族解放革命。

例如，苏共纲领在谈到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巨大高涨”。

苏共纲领谈到保卫世界和平力量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纲领在谈到和平共处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成和平共处的巩固”。

你们7月6日的发言，反对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论点，又一次证明你们低估和抹杀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同列宁主义完全相抵触的。

列宁在50年前就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说过："有人仍然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看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和平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

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同几十年前相比较，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你们却对它采取鄙视和否定的态度，这真是令人十分惊讶。

我们认为，当代的民族解放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统治基础的重要的力量。我们是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认为，当代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我们的这种立场完全是列宁主义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而你们那种轻视和鄙视民族解放革命的立场，才真正是违背列宁主义，才真正是背离阶级观点，符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利益。

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是区别进步和反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是资产阶级，甚至是王公贵族，也是起进步作用的；支持帝国主义的，即使是共产党人，也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是列宁早就提出来的原则。

苏共同志常说：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快完成了，似乎目前只在总共5 000万人口的个别国家里才存在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掩饰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几亿人民的侵略和掠夺。事实是，在许多国家中，或者是老殖民主义者改用新殖民主义政策继续进行统治，或者是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殖民主义者又闯进来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苏共同志的错误论调，实际上是取消这些地区人民把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

苏共同志害怕民族解放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引起核战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苏联代表，在会议上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并且用核战争来恐吓被压迫民族。他说："核战争会引起亿万人的死亡，这样还有谁的民族独立？那时有亿万的死尸，我们不希望是死尸的民族独立。"

苏共同志把民族解放革命从属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说：民族解放革命"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你们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取消民族解放革命。

苏共同志散布对于帝国主义能够全面彻底裁军的幻想,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等待裁军的实现,而不要自己起来争取解放。

赫鲁晓夫同志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 1 200 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 8%—10%用于这个目的,那么在 20 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饿、疾病和文盲状态。”看,多么美妙啊!世界上竟然会真正有愿意裁军,就是说愿意放下武器的帝国主义,竟然会真正有愿意“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饿、疾病和文盲状态”的帝国主义。看,帝国主义者是多么的善良和慈祥的呀!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战后年代,帝国主义各国不是都毫无例外地在那里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证明你们的这种论调完全是骗人的吗?

苏共同志在 7 月 6 日的发言中企图为自己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辩解,大谈苏联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我们愿意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适当的经济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你们夸大经济援助的作用,企图以此代替新独立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主要地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能依靠卢布,不管是 30 亿也好,300 亿也好。

而且近些年来苏联对新独立国家经济援助的目的,是值得怀疑的。以印度为例,苏联给印度的经济援助约占苏联对新独立国家贷款总额的 1/4 左右,但是,你们这样的援助恰恰是鼓励了尼赫鲁政府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你们这样做,既违反印度人民的利益,又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苏共领导在实际行动中,不支持并且多次损害民族解放运动。

例如,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苏共长期不予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竟然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 1955 年 10 月 3 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还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又如刚果事件:1960 年 7 月 13 日,苏联竟然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队去干涉刚果的决议,实际上是支持美国借用联合国的名义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1961 年,苏联又极力推动基赞加参加在联合国“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结果使刚果民族力量遭到惨重打击,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对于这些,难道苏联同志一点也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吗?难道这些不是证明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十分错误、十分不光彩的吗?

正是由于苏联同志采取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错误态度,苏联同志在许多场合中,在许多国际民主团体中,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自己不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责备别人,责备我们。你们在 7 月 6 日的发言中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团结污蔑为什么“以地理和种族的原则为基础的某种特殊集团”,毫无

根据地捏造说我们企图“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十分荒唐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人民的利益是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北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只是同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不是站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一边，而是站在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那么他就把自己置于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就必然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老实告诉你们，不管任何人，譬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采取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错误立场，也必然会把我们自己放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帮凶的地位，必然会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唾弃。我们自己也就会变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革命的、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者。

再拿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问题来说。

苏共领导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不是从夺取政权的观点出发，不是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出发。归根到底，你们的观点，就是不要革命。这种不革命的观点，当然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是同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背道而驰的。

我们同你们的根本分歧，并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采取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分歧，而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歧。

你们在 7 月 6 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这是毫无根据的。

恰恰是你们，把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以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条反对革命的路线，千篇一律地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

我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主要是：

第一，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同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即“议会的道路”，说“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第二，在解释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在这里，他抛弃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好像用不着首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

第三，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传统机构，“将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这显然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也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问题。

现在，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在大力加强自己的军事的官僚国家机器，赫鲁晓夫同志的上述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你们的这一系列的错误观点，我们曾经多次向你们提出过批评。但是，你们不但没有接受我们的批评，没有遵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观点，而且继续坚持和发展你们的错误。

你们说:“世界舞台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最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向往,给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开辟着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新的有利的前景,通过由马克思和列宁最先发现的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扩大。”

你们继续宣扬“议会道路”,说什么“在那些议会传统深厚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是通过利用议会的道路”。

你们继续宣扬不需要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就会同意赎买他们的基本生产资料。

苏共纲领说:“也不排除在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增长、工人运动加强和资本主义阵地削弱的条件下,在某些国家中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它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

你们还说,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就能实行超出一般改良范围的措施。

苏共纲领说:“在新的历史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

你们还把和平过渡的错误论点,扩展到民族解放革命方面去。你们说:“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面前,正在展开着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平过渡的前景。”

你们 7 月 6 日的发言,还曲解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作战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你们竟然割裂了列宁的完整的论点,抛弃了列宁论点的核心,即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政权的问题,抛弃了组织苏维埃这样的新国家机器的问题,空谈什么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实在是对列宁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修正。

顺便说一下,你们这几年来,在引用列宁的著作时候,常常采用歪曲的手法,阉割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来为你们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作辩护,这种手法是十分恶劣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一次请苏共领导同志严肃地考虑一下,你们一贯地对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宣扬“和平过渡”的路线,也就是不革命的路线,已经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公然提出要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学说,否定二月革命道路的共同规律,说什么“不是干俄国人干过的事情”,提出了系统的所谓“结构改革”的纲领。试问,这种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古巴人民社会党曾不断攻击卡斯特罗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是“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恐怖主义”,攻击卡斯特罗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一切都是错误的”,“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根源及其首领不依靠群众的结果”,甚至公开

要求卡斯特罗同志“放弃进行盲动活动，进行不依靠人民的武装行动的错误道路”。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从1957年起，完全脱离了武装斗争，并且宣传民族解放战争的“危险性”，主张通过妥协的折衷的途径，取得独立，因而在国内完全丧失了政治地位。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伊拉克共产党放弃了曾经一度实行的正确路线，幻想在伊拉克实现和平过渡，使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挫败。在1963年2月8日的反革命政变中，伊拉克共产党毫无准备，遭到惨重的流血牺牲。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件中曾经指出：“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这里所说到的三种情况，就是从我们前面谈到的古巴、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这三个典型事例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你们竟然把我们的信件中的这段话，曲解为我们公开号召推翻兄弟党的领导，这是十分荒谬的。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的兄弟党，凡是接受你们这条错误路线的，就要瓦解革命意志，涣散革命队伍，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使自己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和挫败。只有拒绝你们这种错误路线、实行革命路线的兄弟党，它们才是生气勃勃的，革命事业才有可能得到不断发展。

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直到这一次会谈中还在强调的那条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不正是麻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革命意志，符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吗?

再拿战争与和平问题来说吧。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讲得实在够多了。其实，你们的基本观点也很简单、很清楚，这就是：你们害怕革命星星之火会引起世界大战，会引起核战争，因此你们就反对革命战争，反对革命。你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甚至不惜牺牲革命利益和革命原则，来同美国做政治买卖。

赫鲁晓夫同志说过：“我们不要战争。打仗——这就是杀人。谁要这?这会得到什么?战争——就是毁灭，我们要杀人，也会被人杀。”

他还说：“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染污的土上建立共产主义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这些话的意思太清楚了。无非是说，不管怎样活着，活着就是一切，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令人可悲的是，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仍然在谈论这种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你

们还重复帝国主义的语言，诽谤我们要借助其他国家实现革命，诽谤我们指望美苏之间发生热核战争。这简直是荒诞无稽的。你们津津乐道地重复这种诽谤，无非是企图为你们自己的反对革命的和投降主义的错误辩解。

1957 年宣言指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这种压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上面。坦率地说，你们的灵魂深处是：从害怕战争到害怕革命，从自己不革命到不许别人革命，从自己不支持革命到不许别人支持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以上所谈到的，是关于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下的、占世界人口 2/3 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总路线是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总路线。至于说到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 1/3 的人民还要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你们的总路线同样是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总路线。关于这类问题，我们也需要另外进行详细讨论。

现在，我来讲一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是不是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因此，各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殷切地期待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巩固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日益加强。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规定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宣言和声明还规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

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必须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我们觉得，有必要请苏共同志考虑一下，你们在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上，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你们所实行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你们所实行的政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是团结的政策，还是分裂的政策？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还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政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

为了说明问题，波兰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是不能回避的。你们在波兰事件中，企图使用武力来对付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难道不是破坏社会

主义阵营吗？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你们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敌人，这难道不是瓦解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吗？

我们再看看你们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吧。阿尔巴尼亚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大国，只有援助它的义务，而决没有欺侮它的权利。只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同志不赞成你们的某些错误观点，不跟你们一起反对中国，你们就向它下毒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你们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呢？

你们对待古巴又是如何呢？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你们一定要把导弹运进去，后来又惊慌失措地把它撤出来，还要迫使古巴接受“国际视察”，你们这样做，究竟考虑过古巴人民的利益没有？你们要古巴放弃主权，难道是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吗？

至于我们对于加勒比海危机的正确的立场，是举世共知的，无须在这里多说。

再看看你们这几年怎样对待中国吧。

我在上一次的发言中，已经列举了一系列的无可抵赖的事实，说明你们越来越放肆地反对中国，蓄意要在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扩大分歧，制造紧张局势，把中苏关系推到公开破裂的边缘。

令人吃惊的是，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竟然企图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我们要问：

是谁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呢？你们大谈几年以前给中国的援助，为什么不提你们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的巨大损失呢？为什么不承认这正是中共两国贸易缩减的主要原因呢？

你们千百次地夸耀你们对中国的援助，从来不讲相互援助，从来不讲别国对你们的援助，从来不讲中国对你们的援助。难道中国过去对你们的援助都是毫无意义的吗？难道中国真的是单靠你们的施舍过日子的吗？

是谁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设置障碍呢？你们可以允许美国在苏联出版刊物，为什么要禁止中国在苏联发行《友好》杂志呢？为什么不允许新华社在苏联发行新闻稿呢？为什么要干扰北京电台的俄语广播呢？为什么把中国的出版物看作是洪水猛兽，甚至把散发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的中国同志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呢？为什么要对中国的留学生实行种种歧视呢？

是谁在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呢？为什么苏共领导多次表示支持彭德怀和[1]高岗呢？

你们把中苏边境的控制线向中国境内推进，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你们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难道有一丝一毫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吗？你们实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没有解密。——编注

际上参加了美帝国主义和尼赫鲁政府建立的反华联盟，难道是符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吗？你们说，苏联不帮助尼赫鲁，美国就要帮助。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在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方面，要同美国竞赛呢？你们为什么要学美国那样，给印度反动派提供武器屠杀中国的士兵呢？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竞赛的对手是衷心欢迎你们这样做的吗？

你们接连不断地采用通过决议、发表声明、领导人讲话、报纸上发表文章等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狂热地进行反华运动。

你们居然还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无端地攻击我们进行“反苏”。你们不是完全颠倒了黑白吗？

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居然有勇气说什么苏共执行的是“旨在发展中苏关系和同志般清除分歧”的方针，难道一点也不感觉到脸红吗？你们不是要破坏中苏团结，不是要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又是什么呢？

你们对其他一些兄弟国家，又干了些什么呢？你们损人利己，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领导的那一套，难道做得还不够吗？你们这一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难道还不值得好好反省吗？你们难道还不应当稍为检点一下吗？难道我们好心好意地提出这些问题，希望你们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也是进行什么“投机”吗？

坦率地说，你们把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搞得这样乱糟糟。你们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关系，根本不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的。

当你们自以为是顺利的时候，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赫鲁那里，或者是从什么别的地方，抓到一根稻草的时候，你们就得意忘形了，大反不听你们指挥的、不愿意受你们控制的兄弟党、兄弟国家，根本不把社会主义阵营放在眼里。

当你们处境困难的时候，当你们由于实行错误的政策而碰壁的时候，你们就恼羞成怒，拿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出气，要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你们的“替罪羊”，甚至牺牲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利益，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讨好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寻找自己的出路。

我们严重地注意到，你们在许多重要场合，在许多重要文件中，已经不大讲社会主义阵营了。

你们对于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态度，也说明你们不要社会主义阵营，要同铁托集团组织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了。你们同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结成阵营的叛徒铁托集团组织的“大家庭”，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家庭”呢？

你们口头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本来，社会主义阵营是应当而且可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像你们这样把社会主义阵营越搞越乱，怎么还谈得上什么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影响呢？

我们在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指出了社会主义阵营要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条件。这些主要条件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阵营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社会主义阵营才能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希望，苏共领导认真地思索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再来谈一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兄弟党关系的问题。

无数的事实说明，你们对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革命的总路线，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你们就实际上把它当作自己的仇人，就采取一切你们所能够采取的手段去反对它，去损害它。

你们就是这样地走上了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到，兄弟党不需要任何指挥棒。这句话倒是对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当是独立的、平等的，本来没有什么“领导党”、“被领导党”、“上级党”、“下级党”的区别。问题正是由于你们坚持着列宁所一贯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

你们任意解释、歪曲和违反宣言和声明，坚持自己的独特立场和错误路线，把你们一个党的决议、纲领和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苏共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说成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你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不听你们指挥的兄弟党，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你们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

你们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的代表大会，利用一切你们所能够利用的宣传工具，公开指名地攻击别的兄弟党。

你们横蛮地只许你们攻击别人，而不许别人回答你们的攻击。

你们想什么时候发动攻击，就什么时候发动攻击。你们想禁止别人对你们的攻击做出回应，你们就下命令“停止公开争论”。

难道在你们的眼里，还有什么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

正是你们这一套挥舞指挥棒的恶劣做法,才确实是对兄弟党的侮辱。我们希望你们停止挥舞指挥棒,希望你们停止用老子对儿子的态度对待兄弟党,希望你们停止对兄弟党继续进行侮辱。

你们两次发言,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叛徒铁托集团百般地进行辩护,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需要?究竟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们在两次发言中,硬说我们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改变了立场,说我们在1957年秋天怎样,以后又怎样。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铁托集团在1957年冬天的莫斯科会议上,拒绝在宣言上签字吗?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铁托集团在1958年,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宣言相对抗吗?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1960年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结论吗?

你们矢口否认1960年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达成的口头协议。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个协议只有我们两党几个负责同志知道,就可以赖掉了?现在我提醒你们,这个协议,是在1960年11月28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里,兄弟党代表会议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彭真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当众宣布了的。

同志们,你们对待兄弟党之间的协议,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叫别的兄弟党怎么能够信得过你们呢?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提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和“国际援助基金”问题。

你们和我们都很清楚,这些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关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你们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和抗议,破坏了杂志创刊会议的决议和协议,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变成了苏共领导随心所欲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讲坛,变成了苏共领导用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制造分裂的工具。你们的这种分裂主义的行为,一定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你们现在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反咬一口,难道你们以为这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

关于“国际援助基金”问题,很清楚,为援助兄弟党进行革命,我们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过去一贯是这样,今后仍然是这样。但是,你们已经把“国际援助基金”变成为推行你们错误路线的一个工具。给谁不给谁,给多还是给少,都是以追随不追随你们的错误路线,听不听你们的指挥为标准的。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援助兄弟党进行革命的基金,而是苏共领导进行宗派活动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通过别的途径来援助兄弟党的革命事业。

苏共领导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的分裂危险。你们沿着分裂主义道路已经走得很远了。你们的行动,已经给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你们的行动,博得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的喝彩。

现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都殷切地希望你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从上面所说的大量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分歧,中

苏两党分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苏共同志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中苏两党的分歧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同志越来越远地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背离宣言和声明”。你们指责我们说，“中共领导越来越走上狭隘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力图把一条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事实恰恰相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背离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冒险主义的路线，实际上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的路线。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宗派主义的立场，实际上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

我们愿意坦率地向你们指出，苏共领导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反对革命，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亲铁托集团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同志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地要同美帝国主义合作，这会有什么结果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不可能实现什么“全面合作”。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也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同社会主义的苏联会完全一致、融洽相处呢？这完全是不能想象的，在这方面决不能抱任何幻想。

请苏共领导同志冷静想一想，一旦国际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肯尼迪、尼赫鲁、铁托是靠得住的吗？难道他们能够是你们的可靠的同盟者吗？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同志们！

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国际无产阶级，只能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中国有句俗话，“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在这次会谈的两次发言中，对你们提出这样的批评，对你们提出这样多的忠告，完全是出于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感。我们诚恳地呼吁苏共领导同志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我们热切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还是采取革命的路线，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采取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路线。

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都迫切希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越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就越是高兴。我们越是团结，就越是能够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在千方百计地挑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关系,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特别是破坏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

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定地进行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我们热切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还是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团结对敌,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而奋斗。①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10—3948页

№08111

中苏两党会谈第七次会议记录：波诺马廖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3日)

第七次会议

7月13日

苏斯洛夫：今天我代表团由波诺马廖夫同志发言。

苏共代表团代表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昨天我们听了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第二次发言。我国代表团不能不说是怀着深深的遗憾和痛苦之情离开会场的。当然,不是因为这一发言中似乎包含有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式的批评。我们共产党员们,坚强的人们,不仅多次遇到过没有根据的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内容：
“邓小平：讲完了。怎么样？下一次,明天怎么样？
苏斯洛夫：你们有什么建议？我们建议明天下午两点会谈,像今天一样。
邓小平：可以。”——编注

批评，而且还多次遇到过最恶意的诬蔑。

不，不是这个引起了我们的痛苦。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他第一次发言末了所产生的最坏的担心。现在越来越清楚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谈判绝不是为了寻求一致意见，消除分歧。看来你们另有意图——给莫斯科运来一大车垃圾，企图把它扔在我们身上，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败坏苏共的政策和活动，从而进一步恶化我们两党之间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个引起了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把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的团结看成是我们整个事业取得进一步成绩的重要条件。

苏共代表团坚决反对肆无忌惮的发言格调和你们乱送苏共和苏联侮辱性外号的伎俩。这种格调，这种语言只能被看作蓄意使关系紧张，使形势达到白热化程度，使与被你们称之为自己苏联同志的人的谈判破裂。我们呼吁放弃这种格调，提醒这种格调不仅在同志之间，甚至在想达成某种协议的人之间谈判时都是不能允许的，看来我们的呼吁成了徒劳。

更为糟糕的是，在谴责我国政策长达 3 个小时的发言中，您狡猾地一字也不提苏共的真正观点和真正行动。您的整个发言全是一派胡言和捏造。

胡言何其多也，大大小小的捏造不计其数。逐一批驳它们，大概得用一整天时间。现在我仅择其一二而已。

捏造之一。邓小平同志说："你们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尖锐的斗争。"这简直令人惊愕，怎么能摇唇鼓舌，对一个不仅在自己的全部文件中一直强调存在这种斗争，而且在实际上不断坚定地进行这种斗争的党说出这样的话？您需要事实吗？我们可以略举一二，哪怕是从 1956 年之后。难道我们反击帝国主义分子武装干涉埃及，我们采取坚决行动反对武装干涉叙利亚，我们对印度尼西亚、也门及脱离巴格达条约之后的伊拉克等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其中包括武器援助，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年轻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对争取自由的民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难道这些不是"尖锐的斗争"？莫非"尖锐的斗争"——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没完没了"严重警告"的文章？

捏造之二。邓小平同志肯定地说，似乎我们的目标是"消灭民族解放革命"。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原来表现在，苏共的纲领在谈到总的危机，谈到捍卫和平的力量，谈到和平竞赛时，没提民族解放运动。而您真的读过我们的纲领还是相信自己的顾问？须知在我们的纲领中白纸黑字写着：总危机的标志之一，这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在反对军事危险的斗争中，解放了的、国家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努力，是普遍和平最强大的因素。这一反映三分之二人类意志和力量的强大阵线可以迫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让步"。如果您嫌不够，我再引述几段纲领中讲民族解放斗争的地方：

"民族解放革命的狂澜席卷殖民主义体系，颠覆着帝国主义的巢穴。在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方出现了和正在出现年轻的主权国家。他们的人民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时期。他们作为新生活的创造者和国际政治的积极参加者，作为摧毁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站起来了。"

还有："解决全民族的任务的根本条件——这就是彻底地同帝国主义斗争。帝国主义力

图控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巩固他们在其中的不平等地位。当代殖民主义的主要支柱是美国帝国主义。”

“苏联共产党把同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桎梏的人民的兄弟联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

难道您没看到,纲领中专门有很长的一节论述民族解放运动?其整个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其中包含有10多亿原殖民地人民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依据。

捏造之三。您昨天宣布,按照苏共二十大路线,革命只能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道路,似乎这条道路不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其前提条件。这也简直是捏造。赫鲁晓夫同志在二十大上讲:

“当然,在资本主义还很强大,在它手中还握有强大的军事警察机构的国家,那里的反动势力的拼命反抗是不可避免的,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在尖锐的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其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是以其先进的部分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舍此就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以是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的报告中指出:“通过和平道路实现革命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如果统治阶级对革命报之以暴力,不想服从人民的意志,那无产阶级就应该摧毁它的反抗,坚决地实施内战。”在体现和发展了二十大路线的苏共纲领中写道:“工人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成绩,将取决于它和它的政党掌握所有斗争形式——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议会的和非议会的斗争形式的程度,他们应准备由一种斗争形式迅速而果断地转变为另一种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立场,它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至于不仅在二十大决议中,而且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都以同一种方式表述的,关于利用议会问题和在许多国家将资产阶级专政机关变为人民政权机关的可能性问题,我们至今还未听说,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把议会和国家机构看成是一回事。把议会变为人民意志机关不仅不排除,而是相反,把打碎整个剥削阶级的军事警察机构并以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取代它作为前提条件。

捏造之四。您明显地编织谎言,似乎苏联没有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战争。请看事实,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1960—1962年,我们无偿地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军提供2.5万支步枪,2.1万支机枪和冲锋枪,1.3万门曲射炮、火炮和迫击炮,几万支手枪和其他武器。仅苏联社会团体给阿尔及利亚寄去的衣物、粮食、药品就价值500万卢布。数百名阿尔及利亚解放军伤员在苏联得到救护和被治愈。苏联的小麦、砂糖、食用油、奶酪、浓缩牛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阿尔及利亚。

最后,捏造之五。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您关于苏联对波兰、匈牙利和古巴政策上的谎言。当这三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全面而坚决地公开地向全世界批驳您的造谣中伤,向您宣

布，对于共产党的代表来说，通过编造谎言力图挑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三国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允许的时候，您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在苏联和他回国之后的讲话中，鲜明地评述了苏共政策的国际主义特点。顺便提一下，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这些讲话？这些讲话将给中国人民表明，你们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的立场是错误的，是违背古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无数类似的捏造，但仅举出的几例就足以表明您所使用的方法了。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过许多的斗争方法，但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种非共产党人的方法和措施。您努力把许多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记在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账上，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党来说绝对是陌生的，我们根本不赞成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赞成这些观点。

驳倒您所有的虚伪的观点并不费力，尤其是您在苏中关系问题上和我党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政策问题上所发表的无数谰言。在这些问题上，我代表团还要给您应有的回答。

但是，如果您今天编造谎言，我们明天揭穿谎言，这样下去我们的会谈会变成什么呢？这样我们将一事无成。

我们认为，必须转向邓小平同志的另一次发言。

一、从一开始，我党代表团就建议把存在分歧的原则问题作为谈判的中心。我们列出了这些问题并建议把他们列入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干了些什么呢？他这样表达问题，似乎分歧的中心完全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而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世界历史使命的问题，承认还是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团结口号的问题。

不，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讨论这些问题。无论是在苏联共产党里，还是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里，您都找不到还在争论这些问题的共产党员。如果您想证明似乎苏联共产党人“叛变了革命”，那我们想郑重地警告您：还是放弃您这没有希望的企图吧——企图说服什么人相信似乎我们的党不再是革命的党。

须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一个会相信您，因为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都晓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进行着多么伟大的反帝斗争，甚至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相信您。帝国主义分子清楚地懂得，是什么力量推动革命前进，是什么力量破坏着帝国主义的立场。

人们相信的不是词句，而是事实。我们不是以没完没了的革命词句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的。对于我们而言，这是多余的事情。全世界都深信不疑，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所领导的伟大的列宁的党，整个苏联——这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人通常是在病的时候谈论健康。同样，正是在与革命不合拍的时候，才开始滥用革命词句。

对我们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而言，重要的是，苏联人民真正地表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有谁在听我们的宇宙飞船上的广播时敢说：“这是世界革命的叛徒在飞行？”实际上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超过了资本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

作为共产党员,我们认为,在你们面前说我们忠于革命事业这是白费口舌。难道那些用事实都说服不了的人还可以用口舌说服吗?

我代表团有充足的理由再次对你们讲: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在我们列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政策中心的问题上有分歧。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问题都是通过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固定下来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靠"莫斯科指挥棒"的指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服从的这一威力无比的指挥棒是生活本身,是现实的实际情况。

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是对工人阶级、苏联人民,也包括中国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民有着决定意义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这就是对世界热核战争威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共产主义运动在自己1960年的声明中明确地写道:保卫和平,同热核战争威胁作斗争——这是共产党第一位的任务。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认为首先弄清这一根本问题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这一态度符合整个列宁主义的精神——不是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是从生活,从整个事态进程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从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和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出发。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每个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如果它想不仅宣传,而且有行动,不仅解释,而且改变现实,领导亿万群众斗争的话。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这样行动意味着——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

苏斯洛夫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对这一当代根本问题的立场令人疑惑,甚至怀疑你们滑向了"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所谓的"革命战争"的方针。

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回答呢?它完全证实了我们所有的疑惑和怀疑。您嘲笑和平共处原则。您昨天的发言令我们完全相信,您是从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甚至盼望这一战争出发的。您故意低估热核战争的危险性和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您肯定地说,我们反对热核战争是因为我们"害怕帝国主义分子的核讹诈",是因为我们"想苟且偷生"。

正是您说的这些话里,而不是夸夸其谈革命的词句里,隐藏着您昨天发言的主要意图。

现在我们明白了,曾在这里被引用过,而在您的发言中未敢批驳的毛泽东关于在热核战争中世界牺牲几十亿人,其中包括中国几亿人的提法不是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你们真正的立场。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坚持你们对"经常保持国际紧张局势"感兴趣,你们对裁军问题的立场得到了真正的解释。

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像苏联共产党这样,经受了和正在经受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考验。当需要对帝国主义实施打击时,我们的手从来没颤抖过。

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力量的全部威力将压在它的头上,帝国主义将灭亡。

但苏联政府不止一次解释过,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拥有强大的核导弹盾牌,这是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建立起来的。这一盾牌保证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可侵犯性,

保护着爱好和平的人类免遭核灾难。你们对这一核导弹防护有益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感到不快。越来越清楚你们对苏联和平政策，尤其是对我们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步骤不满的真正原因。在这里，您明确了你们对中印冲突，对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时的立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无论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们的立场是危险的，它孕育着发动热核战争的危险。

我们应该对你们讲，这不是现代共产主义的立场，而是不明白自己对人民所负的责任的人的立场。

你们把自己和自己伟大的人民置于很大的危险面前，无论你们怎么讲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你们的路线却把你们带到十分孤立的境地。只有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和像他们这样的人支持你们这样做，这一事实难道还没提醒你们吗？

你们的立场是积极对抗列宁和平政策的立场。坚持这种立场意味着帮帝国主义的大忙，给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制造莫大的困难，给他们带来危害。

还有，昨天您完全暴露了您对批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敌视态度，暴露了您对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和对苏共纲领的敌视态度。

关于个人迷信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整个问题，在世界革命运动中是重要的问题之一。这里指的不是别的，正是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形式发展全人类所注目的、新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能否允许实行大规模的镇压，轻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还是必须遵守社会主义法律、人的权利和尊严，经常关心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能否允许随意解决对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经济问题？还是必须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所蕴藏的伟大能力和它的客观规律性？——不注意这些，就不能制定有科学依据的经济政策和在极短的期限里达到共产主义。

能否允许通过行政压制推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能否允许放弃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破坏党内民主制度和以个人权力取代党的集体意志？

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和国家民主制度，及时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全民国家？

我们可以说，苏联在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时候，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以自己的成绩在这一时期首先达成了以下基本结果：

第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为国际舞台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力量对比发生根本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几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上，帝国主义头子第一次承认，他们已没能力在公开的军事冲突中战胜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心目中，和平已紧密地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阵地巩固了，帝国主义阵地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这是人民社会主义成果的可靠保证。

"我们应该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届代表大会上说，"在帝国主义出口反革命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自己的力量，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给自由的敌人、和平的敌人以坚决的反击。"

在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时期就是这样做的,从而防止了反革命向古巴出口。

第二,现在已十分清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苏联在经济领域赶上了美国,在人类活动的关键领域——物质生产方面超过了美国,从而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大大增长了。

第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伟大成就,促进了当代一切革命运动的增长,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革命的极大增长。

而你们中共领导人在这几年为革命过程的发展干了些什么呢?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彻底让我们信服了,你们特别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概念的基本因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这就是作为革命武器的旨在发动世界战争的路线。走上这条路——即意味着走上了冒险主义之路。

2. 这就是使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隔离的路线。这是民族主义的立场。

3. 这就是"强行推动"革命的路线,实质是"出口"革命的路线,只采取一种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的绝对路线。

所有这一切,我们苏联共产党人都非常熟悉。我坦白地说,在昨天我们听您发言时,您所表达的那些思想和您在这里使用的那些"论据",我们感到很耳熟。所有这些都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伙在20世纪20年代所说的话,当时他们猛烈地攻击我党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妄图把他们有害的方针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分子口头上赞成"加速世界革命",但是实际上,他们疯狂反对党的列宁的总路线,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削弱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

须知这是事实,你们许多的政治和思想概念在诸多方面同托洛茨基的相吻合。

的确,托洛茨基分子不断革命"理论"的实质在哪里呢?它的基本思想就是不相信在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可以解决矛盾和困难,不相信在个别国家或一批国家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国家支持,没有其他国家革命,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即没有在全世界对帝国主义的胜利。由此产生了托洛茨基分子虚伪的诽谤性的论断——似乎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成熟",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再生"和"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托洛茨基分子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以此首先支持国际无产阶级,促进整个世界革命进程的顺利发展,而是进行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强行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你们距离这种观点还远吗?

难道这种相似不给我们权利引证托洛茨基分子对你们的褒奖吗?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热尔曼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正式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几乎站在中国领导人的那种立场上猛烈攻击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

另一个事实。1963年2月17日,第四国际领导出版了题为《关于中苏冲突的发展》的文件。在该文件里写道:"在中国共产党人近几个月做出解释和修正之后,第四国际才可以批

准它于1960年9月给中共中央公开信和1961年1月第六次世界会议上通过的文件里所陈述的立场。它认为，中共关于世界范围里阶级斗争方向的论点比赫鲁晓夫的论点更进步，因为他们同我们运动的某些原则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下划线为原作者所加)

然后，托洛茨基分子满意地指出，在和平共处、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西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道路、对待国际共运中“多数”和“少数”问题的态度等问题上，自己的观点同中共领导的立场是吻合的。第四国际执委会从这一切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总而言之，从对中共立场的分析中，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即托洛茨基分子)对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基本政策方向的主要批评意见非常接近。”

再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邓小平同志怎么能在此之后肯定，似乎不是中共，而是苏共的行动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热烈称赞”呢？

现在还为时不晚，苏共代表团呼吁中国同志们深思：你们对苏共的攻击同托洛茨基分子——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凶恶和最狡猾的敌人所说的话相吻合。

二、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

我们已经指出，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无论你们怎么努力饰之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是与各共产党的一致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完全相反的。我们已经说过，甚至很难令人相信，你们的观点——似乎仅是理论谬误的结果。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立场，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共领导的什么特殊目的和计划。

至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最好让这几年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同志的所作所为来说话。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代表团在坦噶尼喀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上的表现，知道它如何反对邀请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如何拒绝同我国的同志们进行事务联系。我并不隐瞒，刘宁一同志在和苏联代表会谈时说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东欧的国家不应该干涉亚非的事务。我们对你们终于前来这里感到遗憾。为什么你们要上这里来？”

以前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名中国负责同志一时克制不住自己所说的话。以前，在观察你们试图在亚非拉建立单独组织的行动时，我们还可以认为，这种有害的分裂主义的实践活动只是出于宗派斗争的逻辑。

现在我们清楚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你们不择手段地利用亚非人民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有意识地推行让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你们想让亚非拉人民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人民对立起来，甚至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冲突。这一方针的根本目的既不是关心世界革命，也不是关心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你们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地位”的说法骗不了任何人。这简直是企图借助动听的词句轻易骗取亚非拉人民的信任，让他们跟随你们走。但你们想带他们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引导他们接近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从而使这些伟大的反帝力量一致行动，以共同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呢，还是引导民族解放运动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各兄弟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我们之所以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因为这里说的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有权知道也应该知道你们的真正意图。

邓小平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宣称,苏共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事实上,正是中共领导极端地低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作用和结果。显然,矢口否认今天的殖民主义者还仅在一些国家里(人口总共不过5 000万)保持有直接的统治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的时候,您就是在抹杀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奴隶体系崩溃和民族解放革命在世界上广大地区胜利的结论,在蔑视绝大多数原殖民地人民争取政治独立的伟大历史意义。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反帝斗争,而结果呢,实际上没有。难道这不是实际上贬低民族解放斗争战无不胜的特点和它的革命作用?

您昨天说,似乎由于我们担心民族解放战争的火花可引起世界战火,所以我们促使各族人民放弃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我已经说过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但这仅是一个例子。近年来,没有一次民族解放革命,没有一次被压迫人民的起义没有得到过我国的全面援助。这一点你们十分清楚。这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是包括武器在内的各种手段的援助。你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还是不知羞怯地说谎。

然而各国人民知道苏联的这一援助,你们必须回答他们的问题。

现在大多数被解放的国家面临着其他的任务——发展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争取经济独立,排挤外国垄断资本,发展民族工业,实行根本的土改,提高人民生活,社会生活民主化。

迷信枪杆子能救一切的"理论家"们想过没有,比如说印度尼西亚,怎样使用武装斗争的方法达到经济高涨和避免经济依附于人?而缅甸、加纳、几内亚、马里和其他许多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呢?

我们再次声明,你们在中印冲突中的立场,直接促进了帝国主义想把印度拉入自己侵略集团的意图。你们帮了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势力的忙。这一冲突给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给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

你们试图破坏苏联给年轻的民族独立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里面充满了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命运及其发展前景的蔑视。现在,当经济舞台正在成为获得了独立的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最重要的桥头堡的时候,贬低为新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他们正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努力而进行复杂困难的斗争——提供经济援助的意义,反对这种经济援助,这意味着忽视人民的需求,帮助新殖民主义者。

昨天,您在这里讲述了列宁关于原殖民地国家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但在论战的硝烟里您未发现,您的解释明显地与列宁意见的内容相矛盾。您说,我们"删改"列宁的引文,阉割相应列宁原则——"关于在这些国家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政权的问题,关于组织苏维埃作为新国家政权问题"的主要内容。但是,每一个读过列宁著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发言中,还是在他的其他发言中,都没有像您所说的类似内容;列宁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像中国同志企图强加给他的东西,因为这等于放弃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听了您的发言,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个获得了解放了的国家的人民,由于那里没有无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就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必然要受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影响。

当然，类似立场自然来自那些把真正的列宁理论称作是“空谈”的人(认为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某种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空谈)。然而这种立场是彻底背离列宁主义的。

列宁提出的，并在苏共纲领中得到阐述的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景，对于摆脱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亚非拉国家就可摆脱国际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这种机制使原殖民地永远处于不平等的帝国主义列强农产品原料供应者的地位。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解放的国家就可保障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并在极短的历史期限里克服长久以来的落后。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原殖民地人民就可冲破束缚他们进步的、过时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桎梏，坚决清除中世纪的残余。对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人民群众来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可接受性越来越清楚。同时，当代历史形势为几亿人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保障着越来越优越的条件。

苏联为帮助人民踏上这条道路做着自己能做的一切。它把这看成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你们的立场妨碍数亿人民看到非资本主义前景，把获得解放国家的劳动群众引入迷途，不是促使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推进，而是在这些国家巩固资本主义，这与列宁主张的内容是相违背的。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你们极端蔑视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利益，把他们作为你们大国目的的牺牲品。

(宣布休息 20 分钟)

同志们！对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分裂活动不能无动于衷。你们努力进行这种活动已有很多年了。

为了给自己的这种活动找根据，你们创造了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别理论，发明了彻底反列宁主义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中“临时少数”和“临时多数”的“理论”——似乎真理在“临时少数”一边，“临时多数”已误入歧途。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它实际上为自由宗派活动树立依据，否认国际无产阶级纪律——列宁早就指出过这种纪律的必要性。你们修改阐述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准则的声明。

在 6 月 14 日的信里和你们在这里的发言中，在谈论各党相互关系原则时，你们闭口不谈这一文件中所确定的原则——“每个共产党都必须遵守各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对反帝，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所共同做出的评价和结论”。你们同时还回避声明中所规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则——“绝不允许某些可以破坏统一的行动”。

你们为什么努力回避这些原则，在你们的文章和发言中一次也未提及这些原则？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你们早就知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严格禁止宗派活动！

为了给自己的分裂活动辩护，你们甚至不知羞耻地把你们同列宁相比，竟把你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比作是当年列宁同第二国际社会改良主义的斗争。但难道你们不明

白,这样提出问题不正好完全暴露了你们？你们所强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什么样的统一,如果预先就把它的大多数参加者宣布为应该“抛弃”的“叛徒”？你们到底想与谁统一和加强“团结”——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多数？但你们已公开地把他们宣布为修正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意味着你们想与“少数人”,即与一小撮与你们思想一致的人统一。但这种“统一”,在共产主义和党的语言里早就有了另外的称呼——具有自己特别纲领和特别集团纪律的宗派。谁不清楚,宗派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真正统一是对立物。

中共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实践,完全符合你们的“理论”主张。

你们在自己肆无忌惮地反对许多兄弟党的文章里所采取的格调,是不能允许的极端粗暴和放荡的格调,是同敌人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格调。你们进攻各兄弟党时所遵循的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利益,而是有完全另外的考虑。中国的同志们,你们有什么权利把所有与你们意见不合的兄弟党列入敌人的营垒,像你们所表达的,“帝国主义的帮凶”的行列？中共领导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败坏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为了把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它,如果这一手不能得逞,那就提前为自己的分裂活动辩护。

7 月 12 日,邓小平同志粗暴地诬蔑攻击苏联共产党,大谈什么似乎它“对各兄弟党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他在这里毫无根据地说他掌握这方面“无数的事实”。然而他一个例子也未举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共领导不掌握这种事实。您在这方面的谈吐,都是预谋的谎言,您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败坏列宁的党——大家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的名誉,企图破坏它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威望。

对于你们来说,已经习惯毫不客气地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拼命地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他们,你们广泛散发反对他们政策、反对他们领导的宣传材料,不择手段地煽动挑拨,在国外散布流言蜚语,不厌其烦地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形形色色的叛徒出版公布的、反对兄弟党领导的诬蔑文章。

应该特别注意的一种情况是,中共中央把自己对那些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根本未遇到过的,应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斗争的党研究的问题的路线强加给其他共产党。须知这是事实,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即面临在自己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提出需要修改革命理论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路线已完全得到生活的证实,这一路线的正确性已得到近年来阶级斗争历史本身的证实。

近 7 年的革命实践(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述中歪曲了这段历史)明确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解是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在培养本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大军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认为,您不了解法国、日本、比利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智利、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国家,在近 7 年的历史上充满了最严重的阶级搏斗,充满了反对资本剥削、反对反动制度、反对法西斯的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只有那些不珍重共产主义运动兄弟般团结的人才可否认,在这些阶级搏斗中,过去和现在都是共产党走在最前列。他们,在为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切实实现宣言和声明的思想而斗争时,遇到困难从不气馁。他们站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沿,处于资本主义的巢穴之

中。当必须适应形势要求的时候，他们将勇敢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们不知疲倦地对帝国主义实施打击，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指教他们如何在他们的国家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宣言和声明的思想。但如果他们不同意和驳斥北京的指教，你们就指责他们背离革命的原则，宣布他们是“修正主义者”，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等等。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碰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不是那些站在一线反对敌人阵营现实资本主义的人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是完全处于另外条件下的中国同志提出这些问题。说得客气点，你们胆大妄为，认为自己看得最清楚，知道在任何国家里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该怎么搞。

你们反对兄弟党的颠覆性宣传，引起了反动营垒里的惊喜。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其他反共组织，甚至把这种宣传当作自己的武器而加以利用。例如美国当局，不仅不设置障碍，反而赞成《人民日报》反对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扩散传播。

中共同志们为自己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内部事务的行为辩解的口实是，这些党，在批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宗派-教条主义的观点时，点了你们的名。但你们的这种辩解再次证明，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自高自大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根子有多么深。

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权利平等的斗士，实际上，你们肆无忌惮地践踏各党的权利和利益，把独立制定、贯彻自己政策的兄弟党诬蔑为某种似乎只会围着“莫斯科指挥棒”左右“旋转”的驯服集团。

中国同志近来企图在自己的领导下，把各兄弟党开除的各种没有原则性的人和腐化变质分子——他们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重振自己的事业——拼凑成一个集团。昨天邓小平同志再次宣布，中共中央将搜集和团结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在共产党内。这意味着，看来你们，中国的同志们，想承担分裂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光彩的使命，搜罗所有叛徒和一小撮宗派分子，使他们同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经过几十年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立。

苏共代表团号召你们，中国的同志们，现在还为时不晚，要防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不要以自己的分裂行动帮助帝国主义。

由于你们的分裂行动，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现在开始活跃起来，反对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反对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可以举出这样一些集团，如：美国以米尔坦·罗津和霍梅尔·蔡斯等为首的几个集团；巴西阿马佐纳斯-格拉鲍斯集团；被比利时共产党开除的雅克·格里巴集团；澳大利亚希尔集团等。你们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叛徒的思想纲领。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大喊在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依靠着你们，是你们的思想鼓舞着他们。

这些叛徒的志同道合者寥寥无几，而他们手里的钱，正如外国同志们说的，却多得无数。看来这就是您昨天所说的对兄弟党“援助的特殊形式”。

你们破坏性的宗派活动已不局限于共产主义运动里。你们已把这一活动推广到群众性

的非党组织里,关于这一点我党代表团还要单独对你们讲。

还应该谈谈你们有意歪曲和伪造关于在两条战线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众所周知,不坚决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同任何修改它的基本原则的企图——不管这种企图是出自右的还是“左”的机会主义立场——进行斗争,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前进。

列宁教育布尔什维克党(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教育的),要善于及时改变主要打击方向,把矛头对准对当时工人运动危险最大的背离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倾向。

列宁在当时之所以只把“左”倾教条主义称之为“幼稚病”,是因为它是共产主义运动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结果。但列宁从未怀疑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都可以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莫大危害。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会议是这样指出“左”倾的特点的:“革命急躁和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分子企图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实质上,是对革命起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建议 1919 年的应征公民反抗动员)。这些企图包含有最危险的冒险主义成分,假如真的采取这些措施,便可长期牺牲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所作的整个革命准备工作。”

列宁在 1921 年 6 月 17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愤怒反对欧洲共产党内的“左”倾观点时指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妨碍共产主义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胜利——这就是‘左’倾的愚蠢行动。如果我们不偏激,继续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一定能胜利。”

在 1956—1957 年,当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时,我们党第一个举起了反对这种危险的旗帜。1957 年会议就是在这种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召开的。正是苏联共产党,建议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原则写进了宣言草案。

你们妄说,似乎整个二十大,其中主要是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是修正主义扩散的主要原因,这是愚蠢的谎言。

生活证明了,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按照列宁的要求勇敢地、主动地在二十大上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是何等的正确。帝国主义宣传及其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们鼓噪一时,企图把这一根本转折说成是思想混乱、瓦解、“共产主义危机”。现在中国同志实质上是在重弹敌人的老调。但实际上,这是深刻的净化过程,激发和团结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形势很快明朗了,经受了锻炼的和再次检验了自己队伍纯度的共产党员们,放下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所积留下来的令人忧郁的包袱,登上了视野更加开阔的新的高峰。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不需要提醒邓小平同志,1958 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公布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草案。但您是否记得,这次坚决批判南斯拉夫领导修正主义错误,是我们党主动提出的?

与此同时,我们党严格遵循列宁关于需要开展双向斗争的教导,时刻对教条主义保持着警惕。在其他党代表团的支持下,苏共中央建议把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评述写入了 1957 年的宣言之中。由于中共和阿劳动党领导人的活动,教条主义的危险性大大地增长了,有鉴于此,在 1960 年的会议上,坚决谴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其声明中详细评述了教

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您在我们这次会晤的发言中，您只字未提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斗争的问题。这意味着你们公开反对共产党人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6月14日的信里，你们对此公开发表了意见。你们把教条主义仅仅理解为“机械地重复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服从他人加给的意志”等。但这仅仅是教条主义的一个方面。所以，你们对教条主义的理解不是列宁主义的，而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难道这不是对宣言和声明的修正吗？

我们清楚地懂得，你们何以这样做——依然是为了败坏苏共的名声，为了把其他兄弟党学习苏共的革命经验说成是教条主义（各兄弟党认为需要在声明中专门强调苏共经验——根本的国际主义）。但你们是否知道，假若各兄弟党响应你们的号召，那遭受损失的不是苏共，而恰恰是需要这些经验，并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这一点的各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邓小平同志昨天在发言中，对苏共肆意吹毛求疵，您甚至忘了您在重蹈那些最卑鄙的反共覆辙。比如，您说，似乎所有那些模仿苏联经验和榜样的兄弟党都“革命意志衰退”，“革命队伍涣散”，这是什么意思呢？看来，您想以此证明帝国主义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无耻谰言。

昨天，您百般诋毁英勇牺牲的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似乎他们“幻想和平过渡”；诋毁为聚集力量而生活、而斗争的光荣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您指责该党把游击队同民族解放军合并、积极参加战争并不断在人民群众中扩大自己的影响是“宣传民族解放战争的危险性”。

言论上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上的冒险主义是危险的，它们会削弱并不时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灭顶之灾。看来，您的出发点是1963年1月10日《人民日报》上所刊登的原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在原则的基础上夺取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当兄弟党，尤其是执政党跌向小资产阶级革命，跌向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左”倾宗派主义，跌向“左”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这时“左”倾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就开始成为突出的危险，其程度绝不亚于修正主义，而且不仅是对一个党，而是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警惕着修正主义的危险。但当反修正主义的任务开始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和损害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当正如列宁所说，“借反对右倾的斗争组织狂热的活动……那我们就应该说：‘够了！否则危险将会变得更大！’”对于你们而言，围绕“当代修正主义”掀起风波，这已不是什么狂热活动，而是分裂我们运动的烟幕。

现在，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已十分清楚，中国领导需要反对修正主义的歇斯底里式的佯攻，为的是吸引对近来日益增长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注意力。如果我们不像以前对待修正主义那样，对所有共产党人发出警报——警惕绝不是出自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那里的特别危险性，那我们就将自动放弃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

昨天邓小平同志发言的实际用意何在呢？其用意在于，他不仅不澄清、不否认我们列举的中国领导在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中搞宗派活动的事实，而是相反，实

际上是肯定中国同志将一如既往,继续搞这些活动。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同志们!在对头6天的谈判做总结时不能不得出一定的结论: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当代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一整套完整的纲领。它构成了你们想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谓总路线的真正内容。

你们关于世界革命的话语在这里骗不了任何人。你们企图利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来达到自己的特别目的。你们把"'左'倾言论"当作武器,想倚仗它轻易地败坏苏共政策的名誉。你们妄图欺骗那些不熟悉列宁主义真正实质,没经受过无产阶级斗争锻炼或远离现实政策和以现成模式与立场对待生活的人。

但生活正在擦亮人们的眼睛,看清你们政策的真正目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坚定地、顺利地前进,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将通过那些今天不惜一切力量顽强同热核战争危险作斗争,通过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人,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人,帮助亚非拉人民的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人的双手来完成。

那些口称革命,而对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十分不负责任和准备离间亚非拉人民的人为一方,他们的革命性对于另一方——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来说,又值几个钱呢?

试想一下,假若中共领导的路线得逞,那它就会给所有兄弟党、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无穷的损害。它将引导国际工人阶级偏离可靠的马列主义方针,放弃工人阶级斗争最重要的问题,把工人阶级引入死胡同。它必将使各兄弟党脱离群众而陷入孤立的境地,最终颠覆工人阶级世界解放运动和革命事业。

我们不相信中国领导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认为,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理论不成熟和缺乏经验的结果,是这些缺点偶尔导致你们"左"倾,迷恋于空洞的革命词句和政治幻想。

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根据你们的文件和你们的许多实际步骤,根据你们的发言,邓小平同志,无论您愿意与否,令人得出这样的印象:你们有某种特别的目的和阴谋。你们的"左"倾"革命"词句仅仅是掩盖和烟幕而已。

我们不禁想问你们,同志们,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是否提出了继续造谣中伤,施展阴谋,不搞垮苏共和苏联,不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不罢休的任务?

苏共代表团再次呼吁中国同志,放弃你们在会晤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停止对我党的阴谋活动和造谣中伤,走真正共产党人需要的、研究现实问题的道路。

你们应该听一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明确的意见,听一听经过对帝斗争考验的各兄弟党著名领导的意见。

我们想再次强调,我们的党,我国人民,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为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为民主、民族独立,为世界社会

主义体系和所有国家共产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

我们党为这些目标而生活、斗争，我党代表团为了这些目标而行动。如果从这些任务出发，那使我们统一的东西就会超过使我们分歧的东西。

那时我们的双方会晤就会有积极的结果。

邓小平：明天是星期天，我们是否休息？

苏斯洛夫：休息。

邓小平：应该遵守你们的章程。

苏斯洛夫：休息到星期一上午10点。同志们，说妥了？

邓小平：很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49—3977页

№13012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

（1963年7月15日）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自讨论武装力量建设问题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至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在华沙条约参加国的武装力量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完善了部队的组织机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准备、战斗和战役训练能力，用新式武器、现代化飞机、坦克、雷达和其他的军事技术装备武装了部队。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那样一种情况：在这段时间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军事侵略集团指挥部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其他措施。

鉴于此，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根据已经工作的经验，讨论旨在继续完善联合武装力量的战斗和战役训练以及提高其战斗准备能力的措施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此外，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已经请求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华沙条约成员国组织。

考虑以上所述内容，苏共中央认为，于今年的7月26—27日，在莫斯科召开有政府首脑

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例行会议是适宜的。

在此次会议上,可以讨论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 A. A. 格列奇科关于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和战斗训练情况的报告以及研究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关于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华沙条约成员国组织中的请求。

请通报你们的意见。

致兄弟般的共产主义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 赫鲁晓夫

1963 年 7 月 15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978—3979 页

№13013

泽登巴尔致西伦凯维兹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1963 年 7 月 15 日)

华沙

致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亲爱的主席同志!

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的委托,我荣幸地向您、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1955 年 5 月 14 日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捍卫者的首脑,提出如下内容的请求:

为继续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与经互会成员国在一切方面的合作,认识到华沙条约组织的重大意义——它真正地捍卫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成果,完全拥护华沙条约的目的——确保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并关注到全球各个地区尤其是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新式武器武装日本;因而意识到,必须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根据以上所述内容,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声明:自己希望根据华沙条约第 9 章规定,加入 1955 年 5 月 14 日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

加入华沙条约——具有严格防御性质和使命，是成为确保根据联合国章程规定的集体安全的重要工具的组织，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一起，坚定不移地履行上述条约规定的全部义务。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征求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府，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这个条约。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预先表示自己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感谢，感谢协助将这个声明通告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政府知悉。

致以深深的敬意！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Ю. 泽登巴尔

1963 年 7 月 15 日

于乌兰巴托市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6 卷，第 3980—3981 页

№08112

中苏两党会谈第八次会议记录：彭真的发言[①]

（1963 年 7 月 15 日）

第八次会议[②]

7 月 15 日

邓小平：开始。

苏斯洛夫：请吧。

邓小平：我代表团今天由彭真同志发言。[③]

中共代表团代表彭真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听取了 7 月 13 日波诺马廖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的发言。令人遗憾的是，你们的这次发言表明，你们没有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而且，你们在会谈期间采取

①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为第六次会谈。——编注

③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三行内容。——编注

了一系列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特别是你们昨天发表了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沿着加剧分歧、制造分裂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我们代表团 7 月 12 日的发言,就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两个中心问题,即关于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团结的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观点,向你们提出了同志式的忠告和积极的建议。我们认为,我们这次会谈才开始,在两党会谈这样的范围内,双方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有利于弄清是非,弄清双方的论点,寻求共同语言,逐步地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而你们在 7 月 13 日的发言中,竟然对我们 6 天的会谈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我们面前摆着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当代最根本的、最迫切的问题的一套完整的错误纲领。它构成了你们想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那条所谓总路线的真正思想。”你们甚至说,我们的全部发言“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是一整套最无根据的谎言和捏造”。你们企图利用这样的遁词来逃避我们所提出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论点的讨论。你们甚至威胁说,我们的谈判“是走不远的”。更离奇的是,你们说我们“没有举出一个事实”。同志们,如果苏共代表团第三次的发言是出自一个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会谈的人之口,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我们的会谈已经进行一个多星期了,我们在两次发言中列举的大量事实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讲的,你们总不能说没有听到吧。这显然只能说明你们不敢正视我们提出的大量事实,更谈不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应有的教训和结论。你们企图用“捏造”呀、“臆造”呀、“诽谤”呀这一类词儿,来否认你们的错误,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最起码的对待事实、对待真理的态度。

也正是由于你们的这种态度,你们认为似乎不需要讲任何事实、任何科学论证,就可以随便给我们加上种种罪名。你们甚至从帝国主义的造谣工厂那里捡起一些陈旧的,诽谤我们要发动热核战争。老实说,对于你们这种极其低劣的手法,人们早就领教过了。凡是不同意你们的意见的人,凡是敢于批评你们的错误的人,你们总是给他们加上什么“反苏”啦、“反共”啦、“托洛茨基分子”啦、“反革命”啦,等等罪名,把他们当作你们的仇人。这是你们惯用的伎俩。但是,请苏共同志想一想,你们这样做会有什么用处呢?你们真的以为这样就可以为你们的错误开脱吗?就可以把批评你们的人的嘴堵住了吗?过去你们这样做,没有成功,难道现在和将来你们就会成功吗?

我们在 6 月 14 日的信件中,在这次会谈的两次发言中,都着重阐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立场和观点。令人吃惊的是,苏共同志在发言中竟然把我们的立场和观点说成是什么“左倾的”、“假革命的”空谈。你们甚至攻击我们说,我们用革命的词句来作为掩盖我们“丑化苏共和苏联、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烟幕。你们认为我们“无休止地重复革命词句”,对你们来说是“多余的”。难道还不清楚吗?你们自己不屑于讲革命,而且厌恶别人讲革命。你们认为,谈论革命是“多余的”。这恰恰说明,你们的路线是反对革命的。这恰恰说明革命还是不革命,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是我们同你们的分歧的一个中心问题。

因此,不管你们是多么厌恶革命,我们今天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同你们再一次讨论这个我

们之间分歧的中心问题。

让我们先来讲一讲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的确，应当说，听了你们的发言，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你们背弃了宣言和声明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你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不惜牺牲革命利益和革命原则，来同美国做政治买卖。你们心目中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确实是一条反对革命的总路线，或者说是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总路线。——你们的发言和你们许多言行，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在对于现代战争的看法方面，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在对于防止世界战争的道路方面，我们都是有根本不同的看法的。

在对于现代战争的看法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现代战争的根源问题。我们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动员全世界人民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观点，是同宣言和声明的论点完全一致的。

声明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接下来指出：[①]"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

但是，你们却违反宣言和声明的观点，实际上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你们反对揭露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美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你们竟然跟肯尼迪、尼赫鲁和叛徒铁托诬蔑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一样，说什么中国主张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推行世界革命。你们不是明明知道，声明曾经正确地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用世界战争来推行革命，只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诽谤吗？你们难道真的认为战争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战争的危险不是来自美帝国主义，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吗？你们难道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划清一下界限吗？

第二个分歧，是关于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问题。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我们一直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确定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正确政策,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

早在1946年,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后来,他在1947年又说过:“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宣言和声明也指出:“各国人民都清楚,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和积极的行动,能够维护住和平,防止新战争。”

我们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指出可以取得世界持久和平这个光明前景的同时,必须向群众指出客观上还存在着世界大战的危险。只有让群众看到这两种可能性,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既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又不致于在帝国主义如果把世界大战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措手不及。

可是,苏共同志却认为,如果同时指出两种可能性,就是对和平力量没有信心。苏共同志甚至有过这种说法,如果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就是吓唬人民。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认为已经不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认为现在已经有了消除世界战争的绝对保证。这并不表明对于维护和平的信心,而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动员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

第三个分歧,是关于是否现在就有可能消灭一切战争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把消灭战争当作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国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宣言和声明都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声明还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多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苏共同志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毫无共同之点的。

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核武器出现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

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你们却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

赫鲁晓夫同志说："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消灭自己的同类。人，按其本性和气质来说，并没有想杀人的特性"。

他还说过："你们可以设想，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难道这些炸弹会知道哪儿是共产党员，哪儿不是共产党员，哪儿是无神论者，哪儿是宗教信徒吗？不，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不用说，这样的看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宣言和声明，是相背离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了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

第二个分歧，是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之间是有不同看法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就讲过这个问题，指出了世界持久和平的光明前景。

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中，就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说，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正如声明所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

可是，苏共同志却一直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赫鲁晓夫同志甚至说，在核战争的面前，"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星球上消失了"。

他还说："在紧张局势下，'冷战'会很容易地变成热战，并且是温度很高的热战——核战争，它不仅会烧坏一切，而且会烧尽一切。""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方舟——地球。"

我们坚决反对你们的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这种“人类毁灭”论,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的正确论断,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能表明你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

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有效地防止核战争。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以便推行它们的核讹诈政策。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

我们不能理解,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同志无数次地一味宣传核战争的恐怖,这种做法,究竟对于保卫和平的斗争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坚决反对战争,但是,在敌人用战争来威胁我们,甚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害怕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害怕得发抖,敌人就会对我们慈悲起来吗?相反的,这种大肆宣扬核战争恐怖的行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但吓不倒帝国主义,反而会吓坏自己的人民群众;使敌人更加猖狂,使人民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更加严重。那才真正是中了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诡计,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你们一再攻击毛泽东同志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讲话中关于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我们应该怎么办的一段话,好像这是中共的一项最大的罪证。但是,这种攻击难道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吗?我们在1960年81国党的会议上,就驳斥过你们。我们党的观点是很清楚的。我们当然坚决反对任何的核战争,并且要用一切努力来防止核战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问题仅仅是: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世界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绝后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究竟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难道那时我们就只有向帝国主义投降吗?难道我们就因为害怕遭受巨大的牺牲而放弃抵抗吗?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不应该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但是,你们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毁灭。这实际上就是说,只能向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屈服,实行投降主义的政策。老实说,毛泽东同志就是针对这种错误论点而讲的。他正确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极而言之,即使人类死去一半,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批驳了认为核战争毁灭人类的悲观论调,另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了核战争的严重后果。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歪曲为我们主张用消灭人类一半的办法来促进世界革命,也不能歪曲为我们不要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核战争。任何共产党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唯一正确的立场,只能是坚决抵抗到底。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应当实行投降主义的政策吗?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我们的正确立场,不是恰恰证明,你们坚持着一条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路线吗?

在关于防止世界战争的道路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该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我们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宣言和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正确方针，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宣言和声明都指出，当代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世界战争的爆发。声明说得好："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的确，如果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群众的联合和斗争上面，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但是，如果像你们那样，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只能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你们的许多言行，证明了你们实际上是不相信并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你们要全世界人民相信美帝国主义的"明智"、"保证"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你们热衷于鼓吹"美苏合作"，希望肯尼迪同你们一起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创造可靠的条件"。你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你们这样做，难道真的能得到和平吗？

我们愿意郑重地忠告苏共领导同志，你们的这条以美苏合作来乞求和平的路线是靠不住的。它不仅不能维护和平，相反的，只能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胃口，会使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使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这是一条鼓励侵略、导致战争的错误路线。这是一条有害革命的路线。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投降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错误路线。

我们在 6 月 14 日的信件中，系统地阐明了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指出：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我们充分估计到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伟大意义,对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革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我们在前两次的发言中,都批评了苏共领导贬低民族解放革命的意义,对它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

苏共同志在 7 月 13 日的发言中,力图为自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立场和错误政策辩解,力图否认你们所执行的是一条反动和取消民族解放革命的路线。但是,你们的毫无力量的辩解,更加证明了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苏共同志说,在你们的纲领中有许多地方谈到民族解放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确实,你们在这里或那里也不能不讲讲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用一些漂亮的词句,来为你们的错误路线打掩护。但是,你们在最重要的地方,例如,在苏共的纲领中,在谈到保卫和平的力量的时候,恰恰删去了 1960 年声明中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为什么你们偏偏这样做呢?很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是同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立场有关的,这是同你们这些年来做了一系列损害民族解放运动利益的事情有关的。

我们曾经指出,苏共同志轻视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立场,表现在你们认为只有在总共5 000万人口的国家还存在着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你们企图拿 1960 年声明关于殖民主主义体系迅速瓦解的论点来替自己辩解,这是徒劳的。

我们在 6 月 14 日的信中指出:"对于一系列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这一观点是完全符合 1960 年声明的。

1960 年声明一方面指出旧的殖民制度的崩溃,另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拉进军事集团",他们"力图阉割和破坏已经获得独立国家的主权,歪曲民族自决的含义,在所谓'互相依赖'的旗帜下,强制推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新形式"。

我们批评你们掩饰新殖民主义政策,正是以声明的论点为根据的。你们把我们的批评说成是低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恰恰说明了你们要取消总共有 10 亿多人口的国家还存在着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任务。你们违反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观点,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强大的直接同盟军。苏共同志歪曲我们的这一观点,说什么似乎我们认为"现时代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恰恰表明,苏共领导把当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对立起来。

不错,目前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在现时代,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民族解放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没有形成产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还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民族解放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是旁观者或追随者，而应当并且能够成为领导力量。这个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苏共同志低估民族解放革命的伟大意义，把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对立起来，取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苏共同志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革命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隔离开来，这种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不是别人，而是苏共领导把自己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隔离开来。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背弃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革命，因而受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这只能怪你们自己，而不能责备任何别的人。

令人惊异的是，苏共同志并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采取可笑的、老爷式的傲慢态度。在第三届亚洲团结会议上，你们的代表，企图以全面彻底裁军、和平主义的路线来代替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一贯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坚决进行民族独立的正确路线。你们横蛮无理地破坏大会书记处的决定，硬要把没有被邀请的人强加于大会，破坏亚非团结。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同志劝你们的代表要支持大会的正确路线，要遵守大会书记处的决定，要维护亚非的团结，反而遭到你们的污蔑。你们完全颠倒了是非。

你们这些错误主张和行动遭到大会的坚决反对之后，你们竟然辱骂不同意你们的错误路线的人是什么"六亲不认的伊万"。你们的这种态度，不正是表现了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吗？不正是表现了你们离开阶级观点的种族主义吗？难道你们这种老爷式的态度，不应当受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吗？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说什么中国同志"用好话讨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领导他们的可能性"。这种说法，不仅是对我们的诽谤，也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侮辱。

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也支持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相互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怎么能够说，光说几句漂亮话，就能够"讨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他们是可以用几句漂亮的空话来欺骗的吗？

说实在的，你们倒是经常说了不少听起来很美妙的话。但是，为什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不相信你们的"好话"呢？坦率地说，这是因为你们并不是真正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革命，而是要把他们的反帝革命斗争纳入你们的和平主义的轨道，实际上是要他们忍受新老

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奴役。

你们口头上也说要“消灭殖民主义”,但是你们的药方是什么呢?

你们的一个药方是全面彻底裁军。你们说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就意味着“彻底和最终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你们还不厌其烦地宣扬帝国主义能够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帮助不发达国家。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等待帝国主义变成和平使者和慈善家。

你们的再一个药方是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你们说:“现在联合国已经宣布了最终消灭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具体日期。而这期限并不是几十年,而是几十个月。”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联合国的恩赐,等待新老殖民主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你们在刚果事件中的错误立场,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的这个药方,会带给民族解放运动多么严重的恶果吗?我们不知道,苏共同志究竟根据什么断定,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会在几十个月内结束他们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掠夺、侵略和奴役呢?

你们的又一个药方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又把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作为民族解放革命的前提条件。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比垮帝国主义,而不去进行反帝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

总之,不管苏共同志怎样辩解,你们在民族解放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仰望全面彻底裁军实现后的施舍,仰望联合国的恩赐,仰望通过苏美合作得到拯救,就是不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你们唯恐他们的革命斗争会妨碍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唯恐他们妨碍你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我们在 6 月 14 口的信件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作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你们在 7 月 13 日的发言中,竟然把我们的这种正确的立场,说成是什么“玩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这真是骇人听闻的诬蔑。

你们口头上也反对种族偏见,但是,根据你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你们实际上鄙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实际上把他们看作低人一等。看来你们真正是染上了种族偏见的病毒。

我们在 6 月 14 日的信中还强调地指出:“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你们说我们不承认新独立国家有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完全是捏造。

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是有根本分歧的。从你们7月13日的发言中，我们进一步地看清楚了，你们所反对的就是列宁所坚持的观点，即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是这些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在你们看来，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权在什么人手里，就是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手里，也是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你们的观点，才真正是要堵塞这些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

(宣布休息)①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说过，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分歧，并不是采取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分歧，而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歧，也就是赞助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只在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形式问题上转来转去，却极力回避这个原则分歧的实质。

现在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你们提出和平过渡，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提供什么新的斗争形式，而是为了反对革命。你们提出的和平过渡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早在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我们就说过："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和平过渡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和平过渡'，同马克思、列宁所曾经提出的和平过渡，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

马克思认为，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

列宁认为，俄国在一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手中"。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论点的时候，并没有指出哪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也没有指出哪些资本主义国家"武器在人民手中"，只是说，"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和平过渡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已有"现实的可能"。究竟在哪些国家存在着这种现实可能呢？

你们在发言中辩护说，你们也说过非和平过渡的道路。是的，我们也知道你们说过这些话，但是你们说这些话是不真诚的，是不得已的。

我们在7月8日的发言中就指出过："我们愿意提请苏共同志回忆一下，你们起草的莫斯科宣言第一次草稿中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只有和平过渡。只是在我们提出意见之后，才改成后来那个样子。这个稿子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们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同志们！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邓小平：现在休息，休息后接着讲，下午一点钟多一点可以讲完。"——编注

你们为什么避而不谈这一点呢?

你们口头上讲非和平过渡道路,其实只是一种烟幕,是怕人看出你们反对革命的本质。

你们反对革命的手法,就是经常不断地宣扬:“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正在扩大”。你们提出“和平过渡”的论点已经8年了,请问,8年来这种可能性究竟在怎样“扩大”着,又“扩大”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在上两次的发言中,一再指出,在你们“和平过渡”路线影响下的古巴人民社会党、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伊拉克共产党等兄弟党的教训,请你们考虑。那么,已经证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正在扩大”的,是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教训呢?还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教训呢?或者是伊拉克共产党的教训呢?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党的教训呢?

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革命是“为了取得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不是为了死去”和“自我牺牲”。你们这些言论,正像列宁所说的,“都是害怕革命的胆小市侩的叫苦”。

列宁还说:“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列宁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你们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同列宁的革命观点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在解释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抛弃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抛弃了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问题,也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问题”。

你们在发言中攻击我们说:“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竟把议会同国家机构混为一谈。”

看来,你们似乎是不同意把议会同国家混为一谈的。

可是,就在你们发言中提到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著作——《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中,却明明白白地说:“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

你们的发言认为,不能把议会和国家混为一谈。

赫鲁晓夫同志却认为,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究竟你们谁的说法代表苏共领导的观点呢?

其实,你们发言中的说法同赫鲁晓夫同志的说法,都是为你们抛弃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你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点辩护的。两种说法的矛盾,只不过是表现你们在真理面前的混乱罢了。

你们在新独立国家革命发展的问题上,也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批评你们这个错误的时候,引证过列宁这样的一段话:

“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织能够独立作战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

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接着，我们指出：“现在你们竟然割裂了列宁的完整的论点，抛弃了列宁论点的核心，即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政权的问题，抛弃了组织苏维埃这样的新的国家机器的问题，空谈什么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实在是对列宁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修正。”

你们在发言中说，“列宁的讲话和你们断言，毫无相同之处”，还说，“列宁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中国同志们妄图加在他身上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就等于不接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请你们把列宁的这段话再仔细读一遍，请你们也把我们所说的话再仔细地读一遍，看看列宁的话和我们的“断言”，究竟在什么地方“毫无共同之处”。难道列宁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吗？难道这是我们强加在列宁身上的吗？为什么这样就是“不接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呢？

你们还说：“听了你们发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十个获得解放的，但是没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就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就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火坑中受熬煎。”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按着你们的说法，不论什么阶级的政党，不论什么阶级的国家，甚至像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尼赫鲁之流执政的一类国家，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了。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听信你们这一套，那就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火坑中受熬煎。

我们说你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你们死不承认，那么，你们的这段话究竟说明什么呢？

你们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断言，又在什么地方同列宁的革命理论有相同之处呢？

下面我要讲讲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问题。

我们在前两次发言中指出，苏共领导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险。

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忠实执行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原则。我们反复地说过，谁是为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能根据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来判断。这些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原则，既是互相联合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经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来达到一致的原则。经验证明，只要按照这些正确的原则办事，兄弟党的团结和兄弟国家的团结就能够得到巩固，即使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反之，如果违反这些原则，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相互关系中，使用压力，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诬蔑和攻击的做法代替协商一致，那必然要损害团结，那就要犯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我们在7月8日和7月12日两次发言中，在批评苏共领导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时候，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说明你们对不听从你们指挥的兄弟党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

以至军事的压力。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居然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举不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感觉很奇怪,我们在两次发言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举了大量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你们是真的没有听见呢,还是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呢?

其实,你们自己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自己都是很清楚的。

对波兰施加军事压力的,不是你们吗?

对待阿尔巴尼亚,你们所能够施加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压力,不是都施加过了吗?

而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的呢?① 正当我们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对我们施加种种压力,你们的企图,很明显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压服。你们对我们施加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还嫌少吗?

你们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不同意你们这样做的兄弟国家,你们就对它施加压力。这样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你们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的利益。你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损人利已的做法,甚至把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那一套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合作关系方面来。对于不同意你们这样做的兄弟国家,你们就对它施加各种压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你们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样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从1956年以来,我们曾经多次批评过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多次劝告你们要铭记列宁的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教训。你们不但不改正,而且在大国沙文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污蔑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力进行分裂活动和派别活动",说我们提出了"暂时少数的理论",并且说这"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纪律",是"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关于多数、少数的问题,首先是你们在1960年提出来的。你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目的何在呢?

事实证明,你们一再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的办法来代替平等协商的原则。你们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不体面的行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② 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的。在目前不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提出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原则",是完全错误的。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对中国"。——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分段。——编注

我们在1960年就对你们这种错误提出了批评。中共中央在1960年9月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中指出："坦率地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事实很明显，违反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不是我们而是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

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又一次批评了你们的错误。我们当时说："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责中共'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志'，认为这会'造成分裂'，'破坏团结'，这种说法，显然是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否定了你们的多数压制少数的错误观点，又一次肯定了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则。

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违反列宁主义的，是你们；破坏宣言和声明的，还是你们。

你们以所谓"多数"作为你们手中的一个法宝，对不同意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兄弟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排斥这个，明天排斥那个，你们就越来越走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在兄弟党的关系中，你们一贯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你们把你们一党的决议、纲领和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苏共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说成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你们把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分歧，说成是"中国领导人为一方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你们一直这样说，俨然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自居。我们再一次地问，究竟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力呢？你们不应该对这一问题避而不答。①

你们对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不听指挥的兄弟党，就指责他们进行宗派活动。实际上，搞宗派活动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前，你们就在兄弟党中间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派别活动，举例来说，你们曾派米高扬同志去动员阿尔巴尼亚同志同你们一道反对中国共产党。你们干的这种丑事，已经被阿尔巴尼亚同志当众揭穿了。这一类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勾当，你们干的还少吗？

你们自己不进行反省，还污蔑我们进行宗派活动，这难道不是完全颠倒黑白吗？

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宗派主义路线已经给许多兄弟党造成极大的危害。有一些兄弟党的领导，接受了你们错误路线，学你们的样子，对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的同志，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排斥的政策，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党。这些同志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坚持革命的。对于一切要革命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理由不同他们来往，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们坚持真理的立场，没有理由不支持他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你们不应该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编注

们坚持革命的斗争。我们支持这些革命的同志,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对待一般的国际友人,都欢迎同他们友好往来,为什么偏偏地不能同这些革命的同志来往呢?

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企图推翻从列宁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关于教条主义的概念",污蔑我们以自己的理解代替了宣言关于教条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定义。

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

"1957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我们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符合1957年宣言的,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

宣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不允许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

列宁曾经多次告诫,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他尖锐地批评过那种简单照抄外国的现成药方,来解决本国革命问题的教条主义,他说这是"奴隶式的……甚至是猴子式的模仿"!他还说:"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单单了解这种经验与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加以考查。"

难道宣言错了吗?难道列宁错了吗?难道列宁和宣言都是"按照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反对教条主义的吗?你们一天到晚大喊大叫地反对教条主义,为什么对这种真正的教条主义,对这种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教条主义却采取保护的态度呢?拆穿了说,就是要把你们那条错误路线强加给别人,要别人跟着你们的指挥棒团团打转。

你们这种挥舞指挥棒的做法,强迫兄弟党顺从你们的意志,指东只能向东,指西只能向西,这才真正是对兄弟党极大的不尊重和侮辱。

真正的教条主义,你们不反,你们要反的教条主义是什么呢?我们早在1960年9月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就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看来还没有懂得什么叫作教条主义。""你们所反对的教条主义","一句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

从伯恩斯坦起,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情况的变化,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

列宁在《怎么办》这本伟大的著作中指出,当时许多国家的不同名称的机会主义者"都成

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你们正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反对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能不导致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进一步的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危险更大了。这就更加证明了宣言和声明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你们硬说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这是对宣言和声明的明目张胆的篡改。你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转移斗争的目标。你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终究是要失败的。

以上的分析充分地说明，我们在 7 月 12 日的发言中对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的看法，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们在那次发言中指出：“苏共领导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反对革命，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亲铁托集团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

正是因为苏共领导犯了这样严重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错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感，在 6 月 14 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宣言、声明的革命原则，提出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我们在这封信中还说，我们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的，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苏共中央在 3 月 30 日的信中首先提出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并且把自己的这种看法说成是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就是可以容许的；而我们把我们的看法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就犯了弥天大罪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苏共领导把自己置于兄弟党之上，自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上帝”，自认为有权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有权垄断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有权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同志在 7 月 13 日的发言中指责我们竟然胆敢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际的问题，似乎我们无权对这个问题说一句话。你们的这种禁令下得实在太奇特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最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宣言和声明中的一个最重要革命原则问题呢？如果可以把这个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议事日程上一笔勾销的话，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岂不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苏共领导禁止别的兄弟党谈论这个问题，而自己却经常大谈特谈在这个问题上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观点。你们不但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在自己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在自己的报刊文章中，宣扬你们的修正主义观点，给资本主义世界的兄弟党提出一个千篇一律的“和平过渡”的药方，而且你们还经常发号施令，挥舞你们的指挥棒，命令这个兄弟党或者那

个兄弟党,在这个问题上或者那个问题上,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这不是唯我独尊的老子党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你们在会谈中并不要同我们讨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只是要企图迫使我们接受你们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你们早在会谈之前,就在你们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责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对你们的什么"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攻击",就对我们的建议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实际上封了门。在会谈过程中,你们又蛮不讲理地坚持你们的错误路线,越来越放肆地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恶毒攻击。在会外,你们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会和决议,通过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苏联人民中间煽起对中国不友好的感情。你们在中苏两党会谈内外所采取的这一系列做法,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的。使人不能不怀疑,你们是把中苏会谈作为你们加剧两党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的手段,作为你们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备步骤。

昨天你们的报纸发表了苏共中央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这个文件,我们党将在详细研究之后,给予评论。但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领导发表这样性质的一个文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请问,你们究竟要把我们的会谈和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引到什么地方去?苏共中央发表的文件,实际上是把两党内部会谈中你们代表团发言的内容公开化,并且对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的立场加以歪曲和攻击。你们悍然片面地破坏了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达成的关于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苏共中央应对你们所采这一严步骤的后果承担责任。

现在,你们已经把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在这个十分严重的时刻,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为重,以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为重,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为重,不要把事情做绝。

从这次会谈中双方发表的意见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是严重的,所牵涉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两党没有理由不经过充分的、多次的、不厌其烦的讨论,一次谈不完,可以谈两次,两次谈不完,可以谈三次,总应该谈出一个好的结果,以便寻求共同语言,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只要承认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只要承认我们有共同的事业,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是抱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到这里来参加会谈的。尽管事情已经恶化到这样严重的地步,我们并不想断定,苏共领导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一切道路都堵死了。在我们方面,我们仍然抱着最大的耐心,竭尽最大的努力,使我们的会谈能够朝着有利于取得积极成果的方向发展。我们期待着苏共同志也做相应的努力。

邓小平:讲完了。

苏斯洛夫：要到星期三上午10点吗?①

邓小平：可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49—3977页

№08113

中苏两党会谈第九次会议记录：安德罗波夫的发言

（1963年7月17日）

第九次会议

7月17日

苏斯洛夫：今天我们代表团发言的是安德罗波夫同志。

苏共代表团代表Ю. В. 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在7月15日最近一次会议上听了彭真同志的发言。中共代表团这第三次发言再次坚定了我们谈判之初所形成的印象：中国同志前来谈判不是为了苏共和中共交换观点，不是为了克服分歧和使立场接近。

看来，中共代表团不想真正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是轻视我们的结论，一味重复已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上遭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驳的对苏共的荒谬指责和诬蔑。

中国同志们不想往前走甚至想往后退的意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彭真同志的发言里。我们反复听到的都是同一种歪曲之词或无关紧要的事实，同一种引文甚至同一话语。可以认为，今天不是1963年7月，而是1960年11月。如果说在彭真同志的发言中有什么新东西，那就是更多了一些谩骂和不负责的诬蔑。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代表团执意重提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并歪曲他们的实质，想借以引起论战。例如，彭真同志为什么需要重提早已彻底解决了的匈牙利和波兰问题，把他们公之于众？现在甚至在联合国里也没人谈论这件事了。你们一次又一次地搬弄这些问题，尽管你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否星期三(17日)上午10时继续会谈?"——编注

们清楚地知道,苏共的立场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这在当时是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承认了的。

在1957年1月18日发表的苏中联合声明中(中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同志)写道:“苏联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反革命叛乱,完成了自己对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也完全符合保卫世界和平的利益。”

你们也十分清楚,匈牙利和波兰兄弟党领导人早已亮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坚决批驳了中共领导从中捞取“资本”的意图。卡达尔同志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一切有觉悟的和诚实的匈牙利人都会满怀感激之情回忆起苏联应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在1956年所给予匈牙利人民的援助……由于这一援助,才粉碎了帝国主义重新把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强加于匈牙利人民头上和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军事基地和战争活动舞台的企图。”

至于1956年的波兰事件,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哥穆尔卡同志已给予你们详尽的回答。当时他说:“……对中国共产党在今年9月10日给苏联共产党同时也交给了我们党的信里所涉及的关于1956年波兰事件的问题,我们不能沉默不语。我们要问中国同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谁需要这个?这是什么目的?问题早已解决,而且是对波兰和所有人民有利的。我们认为,没有丝毫的理由重提这个早已解决并被遗忘的问题。”

难道中国同志还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考虑的要比匈牙利和波兰的共产党员们高明?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同志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仅在这次会晤中,而且在兄弟党之间重提这些问题?他们是否想唤起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结局不满的民族主义反革命分子?

你们对待事实毫不严肃的态度,是你们在这次会谈中所采取的卑劣的手段的明显证明。比如南斯拉夫问题。我不想涉及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还有机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只想说说你们的观点,似乎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在起草委员会上承诺不称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而仅过24小时之后就违背了承诺。中国的同志们甚至讥讽我们,说哪怕过48小时也好。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事实,那我们称赞你们这种幽默。让我们看看没有偏见的见证人——当时的速记吧。其中写道:

“苏斯洛夫同志向起草委员会报告南斯拉夫小组所提出的措辞。

在通过这一措辞之后,彭真说:‘补充一点。在小组会上,由于苏斯洛夫同志同意未来在我们的报刊上不再重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再坚持把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措辞写进去。’

担任主席的苏斯洛夫同志也声明说:‘同志们(中国同志们)这样表述是不正确的。我说的不是党的什么承诺,我是说,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不想把南斯拉夫定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任何地方我们也没有直接说那里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未封口。’

彭真:‘我们还不封口。’”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党未作任何承诺。我们当时认为在报刊上专门讨论南斯拉夫社会

制度性质问题是不合适的，苏斯洛夫同志已声明过这一点。在实际中，我们坚持了这一想法。你们引用苏斯洛夫的发言绝对是没道理的，因为这些话是在欢迎兄弟党的招待会上讲的，而不是在公开的报刊上。后来，当你们利用南斯拉夫问题挑起论战和喋喋不休地强调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站出来捍卫真理，在报刊上发表了客观分析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文章。逻辑本身表明，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其他兄弟党，都不能本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签署声明。

在兄弟党声明中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错误而受到威胁。但是，难道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受到威胁这一事实本身，不就表明南斯拉夫存在这些成果？因为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所谓受到威胁的。

对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十分清楚，如果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革命成果被断送的危险，那么，所有兄弟党的责任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巩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阵地，努力不使危险成为现实。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苏共中央实施了巩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成果的路线。在贯彻这一路线的时候，过去和将来我们都努力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犯的错误，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错误和迷惘给以严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

彭真同志在发言中对苏共中央表示极端不满，说我们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信并表明了对信的态度。彭真同志说，这是恶化我们两党关系的“极端重要”的一步。

这种说法让我们吃惊。难道不是你们，中国的同志们，几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天天骂我们，似乎我们害怕刊载你们的材料和公开进行论战？难道不是您，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发言时宣布欢迎苏斯洛夫同志的表示：在我们党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公布中共中央的信？你甚至说，我们对这封信的复信将在中国报刊上转载。你们现在为什么又愤怒呢？

我们反对你们的指责，似乎我们破坏了关于谈判结束前暂不公布有关谈判消息的协议。首先在我们的公开信里没有有关谈判的消息。其中只是对谈判形势的一般估计。这种估计我们也是被迫做出的，它是对《人民日报》社论中所谓“中苏谈判在开始之前已遇到严重阻碍”的回答。而且，在这篇文章里实际上已将谈判的材料公开——实际上它转载了邓小平同志7月12日发言的许多东西。你们《人民日报》的文章是13日公布的，而我们的回答公布于14日。到底谁第一个在报刊上涉及谈判的过程？

至于你们说似乎现在我国正在进行反华运动，这纯属诬蔑。我们党忠于国际主义原则，任何时候，不论过去和将来都不会进行反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和其他人民的运动。另一个问题，即在我们的党组织里现在正在讨论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材料，其中包括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问题。

但苏共中央全会不能不讨论在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所寄来的信。如果在全会期间我们不让中央委员知道此事就答复你们，那真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个集体领导问题。现在全国正在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六月中央全会的工作。自然，他们不能绕过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央全会工作中占一定位置，是中央全会通过了你们所清楚的决定。

你们指责公布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和对该信的复信。这明显地暴露了你们的一个企图,企图把你们给谈判制造困难和因你们的过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复杂局面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企图给中共中央制定自己特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权利找根据,说中共中央认为可以这样做,因为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里似乎第一个阐述了自己的总路线。彭真同志甚至对我们提出指责,说我们苏共似乎"禁止"其他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对于总路线的观点,"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上帝自居",起"老子党"的作用,等等。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陷入了窘境。假如,你们认为需要认真地和不带偏见地阅读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那你们就会相信,我们的党没有意图在信里提出什么自己的总路线。在这封信里,我们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阐述宣言和声明关于根本问题的立场,换言之,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这样做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中国同志在其1962年底和1963年初所发表的文章中,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是何等的糊涂,肆意解释宣言和声明,在这种情况下,给你提示一下所有兄弟党集体制定的声明的根本原则是非常有益的。当中国的同志们提出自己的特别方针,以此在许多根本的问题上同我们3月30日的信相对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纲领对抗宣言和声明的最重要的原则。

为证实上面所说,我举下面几个例子。

在3月30日的信里写道:"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可以看出,这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阐述兄弟党声明的有关原则。

对此中国同志是怎么说的呢?你们直接指责,苏共的路线——这是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放弃革命的路线。

而且,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在论述当今时代的特点时也回避这个问题: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越来越决定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6月14日的信里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彭真同志在7月15日的发言中又重复了这个错误观点:不是社会主义体系,而是亚非拉地区"是对帝国主义实施直接打击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我们请中国同志回答我们,在宣言和声明中哪里写到这样的原则:亚非拉地区——这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我们还请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发誓要忠于宣言和声明,那你们为什么,有什么根据在所有发言中都拼命回避声明中所载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不断增长这一最重要的原则?

还有一个例子。无论在我们3月30日的信里,还是在我代表团谈判发言中,我们都逐字逐句地引用声明中的下述重要原则:"可以挫败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企图的时代已经到来……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出现了从人类生活中排除世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

你们在谈判发言中严厉批判这些最重要的原则，企图证明，坚持类似观点的只有苏共。同时你们还拿所有那些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批判了的“关于两种可能性——有还是没有世界战争”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结论相对抗。彭真同志长时间毫无效果地向我们证明，似乎在存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一原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难道在宣言和声明中有一处原则证明了彭真同志的这些论点？宣言中一处也没有。

第三个例子。在我们 3 月 30 日的信里和这次谈判我们的发言里，引用了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 1957 年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发言中，彭真同志千方百计辱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歪曲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我们想直接问你们，同志们，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和平共处这一原则的正确性？如果不承认，那就勇敢地说，不同意宣言和声明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还可以举其他许多的例子，说明苏共中央在 3 月 30 日的信里和苏联代表团在谈判发言里所阐述的立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措辞上都是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而中共中央是直接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这就是苏共中央为什么没提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理由。我们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完全赞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而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你们不同意宣言和声明。

你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路线，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它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途径、它巩固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的根本政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有益于世界革命过程的顺利发展，解决当代所有根本问题的保证。

正如你们在这次谈判中在发言时所表明的那样，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上，中共领导采取了与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立场。你们的立场是贬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否定两种体系经济竞赛的意义，轻视经济发展的意义，放弃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相互援助的立场。

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是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增强它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关心每个国家经济顺利发展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进一步融合的立场。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我们谈判的进程完全证明了，中国同志发展了自己关于时代主要矛盾的理论，抛弃了 1960 年声明中所载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增长的原则。实际上，你们不是把世界反帝革命斗争的领导作用归结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是归结为，如果用阶级的语言表达，便是亚非拉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正如你们所表述的，“具有爱国情绪的王公贵族”。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企图捍卫这些错误观点。同时，他们还采取偷换概念

的手法。本应讨论什么矛盾是基本矛盾,而中国同志们却提出了其他问题——他们指责苏共,似乎它强调,一切矛盾都在“和平共处、和平经济竞赛与和平过渡的过程中消失了”。的确,手段是“高明的”,但这能瞒过谁呢?

你们在任何一个苏共文件里,无论是它的纲领里,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讲话里,都找不到这样的观点。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说,似乎在两种体系的竞赛过程中,“阶级和民族矛盾”就可自行消失了。正如1960年所说的,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的经济竞赛为开展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看来,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意识到了自己立场的脆弱性,现在开始说,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很好。但这一原则怎么能同中共领导人关于亚非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观点相提并论呢?不能同意这一论断,因为它,正如上面指出的,是明显地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你们想用这些论断,为你们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对世界革命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辩护。

看来,为了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还需要完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所谓“七项条件”。

他号召苏联领导人“严肃考虑”这些条件。我们应该考虑什么呢?莫非考虑向后转,回到苏联社会已走过的发展阶段,迎合中国的理论家们重新搞无产阶级专政?或人为地煽动起阶级斗争?或回到个人迷信时代的可恶实践?

你们的“七点”所暗指的就是这些。

或许你们想用诸如“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的团结”等这些办法为社会主义国家谋福利?

当然,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请问,谁不知道这些众人皆知的真理呢?正如现在弄清的,除了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里有谁反对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反对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呢?整个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些任务。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上早已前进了很远了。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已几乎20年了。它无论在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方面,还是在全面国际合作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自然,我们离解决所有问题还差得很远。但要对共同经验宝库增添自己一点或大或小的贡献,必须实际参加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不可,而不能靠口头理论,总结什么“七点”、“十点”甚至“二十点”之类。你们近年来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之外,采取观望并且是常常进行批评和恶毒批判的态度。

共产党员们是务实的人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振兴本国经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形式,发展最新生产部门,理顺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事业,是对从事革命斗争的世界工人阶级和所有人民给予援助的最可靠的途径。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清楚了,你们是两种体系和

平经济竞赛思想的顽固敌人。不用吓唬我们，似乎我们的立场是“最新革命成果”！你们的道理只能骗那些分不清事情的本质、受“左”倾词句影响和草率拒绝经济竞赛路线的傻瓜。可以相信，你们在懂得列宁主义本质的人当中找不到这样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牢固地掌握了：同资本主义经济和平竞赛的胜利，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它完全符合1960年声明。它的实质在于，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的成就，在这一竞赛中取胜——这是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帝斗争事业、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事业、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

我们曾多次引用列宁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他嘱咐我们的正是这条路。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已为现有的全部经验所证实。

首先建立在经济胜利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这是所有人民社会主义成果不可侵犯的主要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越强大，他们干预反革命“出口”的能力也就越大。难道古巴的例子还没说明这一点吗？没有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军事经济潜力，我们能给予古巴所需要的援助吗？古巴能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眼底下站住吗？帝国主义只习惯考虑实力，只开声援大会和发表揭露性文章是不能迫使帝国主义却步的。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潜力越大，他们就越有能力帮助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人民。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在革命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破坏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越强大，它对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也就越大。

你们不要企图强加给我们，似乎我们指望由于我们在经济竞赛中取胜，资本主义便“自动垮台”。我们清楚地懂得社会主义榜样的力量对革命斗争的整个影响机制。社会主义革命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每个国家的劳动者、该国人民和该国共产党自己的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代替他们革命。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过，似乎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就不再需要了。但是，无可争辩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当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活中实际实现了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仅靠理论论据和道理——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重要——来说服群众必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最重要的是通过实际，通过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使劳动者生活得更好，走向革命所要求的斗争和牺牲对群众有利。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今天就能使群众成为自觉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即在现代条件下，在存在两种社会体系的情况下，完成列宁所论证过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入工人运动之中。

之所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讲述这些，是因为中国同志回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为了在务实的气氛中对话，我们想听听你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你们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示范作用的伟大革命意义？你们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成就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军事威力提高了粉碎任何反革命“输出”企图的能力？最后，你们是否

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赛的经济成就使新独立的国家容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你们继续回避回答这些问题,你们想以此肯定你们对这些问题的否定态度。

众所周知,面对和平经济竞赛的方针只有一种选择——即所谓的"革命"战争:非此即彼。如果认为热核战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期盼的,在这种情况下,那确实,又何必竞赛呢,又何必花气力去发展经济,又何必绞尽脑汁考虑国际劳动分工问题和从事各种生活"琐事"呢?

说实在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事情的。有一个时期,你们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当时你们似乎站在了和平经济竞赛的立场上。后来,当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遭受挫折之后,这个口号在中国就很少提起了,以后就彻底不提了。从那时起,你们就开始了对和平经济竞赛思想的声讨。

为了故作镇静,你们现在给自己的经济挫折找到了所谓的"理论根据",你们企图安抚自己的人民,给他们指出在革命胜利的第14年他们所遭受的贫穷和困难,不是中共领导的错误造成的,而是为了"世界革命"所必须耐心而热忱忍受的牺牲。

我们当然理解你们的困难处境,也准备帮助你们。但我们永远不能为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子"而抛弃列宁的经济竞赛原则,接受你们提出的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冒险主义道路。

(宣布休息)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中国同志对待这个问题很片面。乍看起来,一切似乎都是对的,一方面不能干涉其他方面的事情,应该遵守平等,尊重独立。谁也不反对这一点。但不能忘记,平等和不干涉——实质这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都同意的原则。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要求的要多得多。众所周知,列宁当年甚至提出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要服从世界范围里这一斗争的利益。

在当代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本国的利益、本国人民的利益应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相结合。

中国同志在这方面沉默不语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近些年来,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实践越来越背离列宁主义。

比如,中国同志们对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合作化这个问题的立场。彭真同志在发言中只提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攻击苏共和苏联的理由。

所有兄弟党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每个单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都依赖这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作的不仅是苏联,它对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更大的意义。

如果中国领导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今天我们和你们讨论的则是另外的内容了:如何更好地把一国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实际加深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合作。这将给我们两个国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带来好处。遗憾的是,中共领导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与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共产党相对立，中共领导提出这样的方针——“每个国家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提法本身没有任何不好。苏联的共产党员们也认为，各国人民首先应该利用本国的国内资源建设社会主义。众所周知，苏联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也是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但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今天，绝对采用这一公式意味着拒绝利用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所带来的社会主义优势，意味着独立发展的方针。

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比你们的理论原则更清楚地暴露了你们的真正立场。现在，尤其是从中国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断绝经济联系的角度看，这一立场完全带有另一种色彩。

你们对诸如国民经济计划协调一致、外贸统筹安排这样一些为实践所肯定的实际操作形式态度如何呢？可以说，在这些事情上，你们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中共领导的特别立场。你们早就宣扬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政策的方针。宣扬这种观点——意味着提倡民族局限性，拉向后退，而不是前进走向当代社会大生产的顶峰，意味着遏制经济的发展和该国以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福利的增长。

中共领导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基本方针的表现就是如此。走上你们所指出的道路——这意味着颠覆甚至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合作。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观点，似乎苏共二十大方针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请问中国的同志们，你们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混乱？也许是在连今天帝国主义分子都不敢否认的苏联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成就里？也许是在克服了一切困难、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里？

仅最近 4 年时间里，经互会国家生产的电力就从 3 290 亿度提高到 5 040 亿度，开采煤炭从 4.82 亿吨增加到 5.36 亿吨，生产钢从 7 200 万吨提高到 1.01 亿吨。1962 年同 1950 年相比，国民收入增加：匈牙利 1 倍，保加利亚 2 倍，民主德国 1.6 倍，波兰 1.3 倍，罗马尼亚 2 倍，苏联 2 倍，捷克斯洛伐克 2 倍以上。

这是什么“混乱”？不，你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混乱”的影子。但在你们特别观点风行的地方可以找到它。这是事实，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跌到这种地步，你们一连几年不敢公布事情真相的统计数字，不向人民通报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

受你们鼓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使阿尔巴尼亚遭受了孤立，脱离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导致阿尔巴尼亚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生产停滞不前。

中共领导加剧中苏关系紧张的路线。中共领导人削弱社会主义体系的路线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你们力图颠覆苏中关系上。

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不列举任何事实，不仅把现在的苏中关系说得一团漆黑，而且歪曲过去，一笔勾销苏中友谊光辉的一页。

邓小平同志在 7 月 8 日的发言中表示了要揭开苏中关系恶化原因的愿望。他认为这些原因在于，似乎苏共“仇视”中国共产党人，因此攻击中共，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在 7

月 12 日的发言中甚至谈到,苏共中央 6 月中央全会决议中关于苏共执行发展苏中关系方针的声明似乎是“为了破坏中苏团结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观点多么荒谬!中国同志为了把苏联兄弟般的援助说得一无是处,竟蜕变到了何等程度!

苏斯洛夫同志已谈到苏联所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我想补充一点,所有这些巨大的无私的援助,是在我国尚未治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争创伤,而且本身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时刻提供的。

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攻击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它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果的列宁主义方针。各兄弟党都公认,正是苏共二十大决议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些关系现在成了真正平等、真正互利、真正社会主义的关系。这里面有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巨大贡献。

中国同志理应清楚地知道,正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才上了规模。取消了斯大林生前苏中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取消了我们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取消了苏中合股公司,取消了禁止其他外国人在东北生活的协议,等等。“关于中国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取消所有障碍和隔离应归功于赫鲁晓夫。正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我们才吐出了当年硬塞给我们的苦果。”

中国的领导人曾多次强调,正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消除了伤害中国尊严的现象,苏联方面才表现出了完全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1957 年 11 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在同葛罗米柯同志会谈时,他特别谈到这一点,为此他还在 1958 年 7 月对赫鲁晓夫同志表示过感谢。

我们的这些行动伴随着中苏相互合作的增长。例如,在 1959 年,我们两国经济往来额几乎比 1953 年增长 1 倍,达到 83 亿卢布,这时为中国建设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材料增长了 3 倍。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些年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牢固站稳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阵地,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我们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努力。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经常同你们协调行动,在最重要问题上和苏联对外政策行动上向你们通报情况。

我们对待中国人民的整个方针表明了和正在表明,我们一直真诚地希望中国繁荣昌盛。我们认为,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现在你们宣布,苏中关系恶化和我们两国之间经济、贸易、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往来减少是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须知这纯属谎言。有哪一个神智健全的人会相信这一点?

有鉴于此,必须特别指出,尽管从 1958 年起,你们开始贯彻自己特别的路线和对我们不友好的方针,我们在 1958、1959、1960 年这几年里继续对中国提供援助,而且数额不断增长。至于说从 1960 年之后,这种援助有所减少,那这是中国领导同志自己开始拒绝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作造成的。

在同兄弟党代表会谈中,在报刊上,在此次会谈中,你们肯定地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召回自己的专家,似乎这成了中苏合作减少的主要原因。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看事实吧，中国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号召要尊重事实。这些事实雄辩地表明，近几年中国方面违背苏联方面不断扩大同中国经济往来的愿望，走上了削减这种往来的道路。

1960年10月31日中国副外长罗贵波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照会，要求修订以前所签订的所有关于工业项目建设、关于技术和科学合作的协定。1961年6月19日，根据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顾卓新的要求，减少了苏联对89个工业企业和35个独立车间、设施和其他项目的技术援助任务。1961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会谈时提议推迟2年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和物资，该协定签字距此时刚刚过去2个月。1961年12月，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宣布中国政府打算全部停止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

在1960年进行的经济问题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同志正式宣布，缩小基本建设和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原因是：第一，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已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因此今后许多项目中国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建设；第二，中国政府决定集中精力搞短期的和国民经济急需的建设，因为中国在1959—1960年期间大部分资金都搞了基本建设，再者，由于农业歉收和在短期内不能扩大短期矿产的开采和出口，国家收支平衡出现了较大的困难。

此外，你们还说，苏中经济往来的减少似乎是召回苏联专家所致。

由于你们奉行减少同苏联经济联系的路线，包括贸易、科学技术合作和提供的军事物资在内，我们两国之间总的经济合作规模，在1962年已降到1959年的36.5%，其中成套设备和物资的供应降到1959年的2.3%。

令我们十分不安的是，中国的同志们不断减少同苏联的联系。正因如此，苏共中央多次呼吁中共中央制止这一过程，不把意识形态问题带到国家关系领域。在这方面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在最近3年时间里，苏联政府曾多次建议中国政府签署长期相互供货协定，协调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购销货物以及租赁外国商船的行动。在1961年贸易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互换贸易情报的意向，并递交了相应的协定草案。1963年4月22日，米高扬同志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谈判时宣布，苏联准备以贷款形式给中国提供扩大锡矿生产的设备。1962年底，苏联方面建议同中国机构举行谈判，核定按照1962年5月13日意向书所规定的中国在1964年想从苏联购买设备的数额和名目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也没收到有关回音。

从以上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苏共的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路线；另一条是中共的压缩和颠覆这一关系的路线。

我们认为，苏中经济联系的现状是完全不正常的，我们再次建议研究我们两国之间加强相互贸易、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其他形式的经济问题。我们顺便再提一下，建议讨论同中国长期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前景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为了我们两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交换世界市场贸易政策问题方面的情报。

中国政府找各种借口回避苏中共同努力建设互利的经济项目。例如,按照政府间协定,共同建筑了兰州-阿克斗卡铁路。苏方早在1958年就把铁路修到了边境("友谊"车站)。而中方停止了施工,留下一小段没修。甚至没有向我们说明其中的原因。为修这条路我们花费了近5亿卢布。

你们的发言迫使我们再次向你们提起关于苏联专家和使用他们经验的真实情况。我们给中国派去了专家,认为你们发展国民经济需要他们。但从1958—1959年起,中国当局突然恶化了对我专家的态度,不再听取他们的建议,对他们很多人实施跟踪,企图唆使他们反对我党的政策,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与此同时,中国行政当局开始要求苏联专家接受违反技术规则的决定,在会上"教育"他们,指责他们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所作所为,迫使我们召他们回国。

不过,1960年,米高扬同志受苏共中央委托,在莫斯科会议上在同中国代表正式会谈时宣布,如果为在华苏联专家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那苏联政府准备把他们派回中国。后来还多次提出这一建议。关于这一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共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团成员会谈时也谈过。但是你们回避,没有给予回答,至今还在回避,不实施派遣专家的相应协议(1961年6月12日)。与此同时,你们继续无根据地指责苏联召回专家的不友好行动。

我们认为,你们千方百计煽动苏联专家问题只有一个目的:把你们近年来经济建设失败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不能不指出,专家问题,是你们有意识地不想解决,以便利用它煽动反苏运动。

我们再次向你们声明,如果你们确实对我们专家的技术援助感兴趣,如能为他们提供正常的条件,那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

我们党以兄弟友谊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已有好多年了。即使在你们采取骤然恶化苏中关系方针的时期,苏联共产党仍教育苏联人民深深尊敬中国人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世代永存,如果利用出现的分歧在我们两国人民中间播下纠纷的种子,那将是犯罪。

由于你们的过错,苏中文化交流合作一年比一年减少。1961年的文化合作比1961年减少了一半,按照你们的意见,1962年又减少了一半。

你们是破坏苏中军事领域和对外政策领域相互合作的罪人。按照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苏中条约,双方有义务统一兵力,"以便禁止日本重新发动侵略和破坏和平以及任何第三国直接或间接联合日本发动侵略"。这些义务至今仍然有效,任何人也没给这方或另一方解除这些义务。

中国方面如何履行这些义务的呢?

当年我们提出了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以迎合你们关于帮助中国建立海军的请求。你们这次提到了这件事。可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否定的立场,而现在又企图把此事说成是苏联想控制中国。

由于中国领导的这一立场，社会主义阵营在自己的东南前哨既没有现代化的舰队，又没有为潜艇提供联系的电台。

你们经常说，也经常写，必须最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每次谈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共同的实际措施时，你们总是找各种借口，躲避合作。你们经常说，也经常写，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国防实力。但你们对发展我们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做出了哪些具体的实际的贡献呢？

如果你们真的想反对美帝国主义，那你们就应该经常关心同自己的盟友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协调自己的国防努力了。

苏中条约规定，中国和苏联“将就涉及苏联和中国共同利益的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彼此相互协商”。根据这一条，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经常主动同中国方面就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协调我们两国的对外政策行动。我们向你们通报了鉴于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苏联拟采取的步骤，通报了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裁军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通报了在苏联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情况，等等。我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供了苏联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会谈的记录，苏联和其他国家会谈的材料，经互会会议工作总结等。仅从1960—1963年期间，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国方面提供这种信息材料就将近140份。基本上这些都是最可靠的情报。

您，邓小平同志，在今年7月8日的发言中，歪曲事实，说您不知道加勒比海地区的情况和苏联的立场。我们可以提醒您，去年10月23日米高扬同志在同中国大使刘晓同志会谈时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出现的形势和事态发展可能出现的后果。所以说，你们说你们不知道加勒比海地区事件的原委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你们，你们早就停止了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1958年，中国方面当时没通知我们你们要炮击台湾海峡近海诸岛，这一决定是在赫鲁晓夫同志离开北京后不久做出的。据很久以后毛泽东同志承认，在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之时，中国同志们已做出决定实施这一战役并已开始准备，但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向苏联政府通报此事。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在中国人民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还是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明，进攻中国意味着进攻苏联。

近年来，中国政府根本没向苏联政府通报从1955年起中美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晤的情况，据报刊报道，会晤已达100多次。从1958年5月起，你们两次改变对日政策方针，你们违背1950年条约，这两次均未同我们协商。

中苏边界，以往长时间是蒋介石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犯的目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则成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象征。但由于近年来你们对苏联采取了不友好的方针，中苏边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形势。这是中国政府预谋已久的路线，邓小平同志在此次会谈中捏造似乎苏联把苏中边界推到了中国领土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能把你们的这一声明看成是企图为你们在苏中边界上的挑衅行动辩护。

你们第一次大规模破坏苏中边界是1960年夏天，当时中国牧民在布兹-阿依吉尔地区闯入了苏联领土。从那时起，中国方面侵犯边界的事屡有发生，数量不断增长。1962年破坏边界近5 000次。现在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从今年5

月起，在苏中边界某些地段，尤其是在远东，中国边防军和受他们指使的个别中国公民猖狂地进行挑衅，挑衅我边防军。只是由于苏联边防军人的克制，才避免了公开的武装冲突。

侵犯苏联边界是中国当局指使的，一位越境的中国公民身上所携带的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说明了这一点。该命令直接号召在苏中边界上进行挑衅行动。“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有争议的岛上捕鱼时，苏联边防军人常常提出要求，要求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我们建议继续在这些有争议的岛上捕鱼，对苏联军人说，这些岛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在这一命令中还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我们认为，考虑到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苏联方面不会采取暴力措施，把我国渔民从岛上撵走。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措施，则应声明，为了保持友好关系，可以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上撤走，但应向苏方声明，是他们破坏中苏友谊，其行动是非法的。”

我已经提到布兹-阿依吉尔地区牧民大规模越界的事。1960 年随同牧民们一起越界的马吉阿克萨拉公社社长对我边防军说，这次越境是根据中国当局的直接命令进行的，现在没有中国当局的许可他们害怕返回中国领土。

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我们自然要问：难道破坏苏中边界现在成了中国的国家政策？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我们建议对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确定进行磋商表示沉默。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中国大使馆图片橱窗问题也完全能说明问题。我们想问中国同志，你们为什么在谈判中大肆夸张这个问题，在报刊上也赋予它政治性质？苏联外交部已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做出了解释，同时还表示了我们的遗憾，声明要处分打碎橱窗的学生。为什么你们就此加剧紧张气氛？当你们对我国在华机关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做出类似事情时，苏联一次也没有这样对待你们。

我不再举这样的例子，但如果中国同志想了解，我们可以举出这些事实。

我们十分清楚，你们利用微不足道的一点儿理由在中国劳动群众中煽动反苏情绪。现在看来，这成了你们的路线。

我们清楚，在中国，尤其从 1961 年起，在会议上，在政治课上，随时处处进行反苏宣传。在中国人民之间，进行类似的反对苏共及其领导的活动，是粗暴地违反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原则和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的。

中国同志们喜欢说自己刊登材料时的所谓客观性。但众所周知，在中国，苏联领导人的某些讲话，有关苏联的新闻都要经过别有用心的检查，肆意歪曲，按照资产阶级报刊的精神进行解释。在中国，苏联领导人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讲话无人问津，你们努力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在美化帝国主义。你们的报刊已经开始刊载反苏的宣传画。

我们不能不提一提你们对待列宁的态度。你们千方百计劝人相信，只有中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无可驳辩的列宁思想的诠释者。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怎样对

待列宁的思想遗产呢？你们说，中国要出版列宁著作、列宁文集。但其中许多著作你们都作了这样的安排，使人们对列宁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你们甚至勘正列宁的作品，删去其中某些字句，以便为你们的反列宁观点辩护。在苏中文化合作谈判时，中方代表拒绝苏方的建议，把在中国办列宁宣传画展改为了玩具展。

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事实雄辩地证明，你们有意识地贯彻恶化苏中关系的方针。

当必须分析你们的举动时，我们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些举动的真正原因何在？难道中国劳动者需要这些？难道这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客观理由。问题完全在于你们预谋的政策，这一政策服从于你们的冒险主义意图，完全是由于你们企图制造苏中关系紧张气氛，以此为你们的反苏方针和你们所有的分裂活动辩护。

从你们的行动可以看出，你们想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放开手脚，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以使你们较为容易地把你们有害的路线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整个国际联系用来为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思想斗争服务。为了这一斗争，中国领导不顾一切，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利益。

你们并不感到羞愧，这一危险的方针损害着你们党的威信，在人民心目中玷污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中国领导人喜欢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正统性，死乞白赖企图说服众人，正是他们现在高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但这一奢望一联系你们的所作所为便化为泡影。怎么可以又谈论世界革命、捍卫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同时又破坏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怎么可以一边说"永远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一边又实际上奉行反苏方针，教育自己的人民仇视社会主义的故乡、仇视列宁的党！

在这次同中共代表会晤中，我们再次有机会深信，中共领导的言论同其实际行动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深信你们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你们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负有重大责任。

你们破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路线，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发展的行动，带来了哪些实际后果？你们力图破坏苏中友谊意味着什么？

你们所有行为，包括此次会晤中的行为，促使我们问你们：你们是否同意，需要巩固成为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免遭帝国主义反动派侵害可靠保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国家和领导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应是进一步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便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赢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和平经济竞赛的胜利？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互相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和团结的所有优势？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顺利发展的利益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民族利益，要求通过自愿而平等地协调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通过生产专业化和合作化来完善国际劳动分工？

我们想听听你们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而直接的回答。

同志们,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以中共为一方,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另一方面的分歧已经很深,正如人们所说的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我们清楚地懂得这条路上的困难。我们深信,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经济领域的关系只能损害社会主义体系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利益,应当坚决停止这一过程。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在我们会晤中,中国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苏中关系已到崩溃的边缘。7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这样公开明确地讲。类似声明不能不使人警惕,因为我们坚信,苏联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行动可以成为这样提出问题的理由。

我们应该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依然加剧苏中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要对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重大责任。

我们呼吁你们尽一切努力,不要继续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回到友谊和合作的道路上来。我们在这方面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们再次呼吁你们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关系发生根本好转,我们两国人民,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都期待着这个。

苏斯洛夫:下次会晤怎么安排?

邓小平:后天。

苏斯洛夫:后天 10 点?

邓小平: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6 卷,第 4019—4050 页

№24296

多布罗拉德尼克致苏共中央总务部函:提交中共中央的几份声明

(1963 年 8 月 10 日)

苏联共产党基洛夫工业州委员会
绝　密

苏共中央总务部第一局:

现呈送中共中央的小册子和信件,这些材料是在基洛夫 1 号车站找到的,具体情况如下:

8月9日2点26分，当莫斯科—北京第8号列车停留在站台的时候，一队送行旅客的中国人把一本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小册子留在了站台上。

И. 多布罗拉德尼克

1963年8月10日

附件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

(1963年7月10日)

1963年7月9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声明中谴责中国一些机关在北京集会声援5名中国同志——苏联政府没有任何根据地要求中国政府召回这5名同志，在中国居民中点燃对苏联的不友好情绪，使中共与苏共代表之间的谈判形势复杂化，并得出结论说，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旨在破坏苏中关系的蓄谋已久的运动，而没有顾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

目前正在举行中共代表与苏共代表之间的谈判，有理由期待在谈判过程中能平静地讨论到中苏分歧的有关问题。但是，苏共中央与期待相反，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掀起新的攻击，中共对此被迫予以公开答复。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包含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的内容是完全不正确的。共产党人应该尊重事实和公正性。实际上，有人在中苏谈判之前和谈判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破坏中苏关系和使谈判形势复杂化的手段。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就是对苏共中央3月30日信的答复。苏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并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苏共中央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自然，中共中央应该系统地阐述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同时，尽管我们不同意苏共中央在信中阐述的意见，我们还是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便让我们党和中国人民都了解苏共中央的观点。这样做很正常，在兄弟党关系中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也有利于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利于消除分歧和巩固合作。但是，苏共中央不仅没有刊登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在自己的一系列决议和声明中诬蔑说，中共中央的信含有对苏共的"诬蔑性和无根据的攻击"。始终不让人们了解中共中央复信中的内容，而是对这封信进行攻击，说信的内容是对苏共的"攻击"，放出一个大的空话，难道这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么？

早在中国报纸刊登苏共中央3月30日信之前，苏联机关和个人就开始在中国散播这封信。此前他们就开始散播一些苏共领导层和苏共中央机关有关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同志是同意这些文件的内容的，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对此并不赞同。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它的党和政府的代表

机关及人物公开散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已经公开的文件,在相互的基础上这是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干涉这类活动。不过,中国机关和个人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的复信,苏共中央却说成是对苏联主权的破坏和对苏联内部事务的干涉。这个逻辑完全行不通。如果这个逻辑行得通的话,难道中国不是已经成为丧失主权的国家了么?

中国机构和个人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的复信,苏联政府却要求中国召回相应的个人。这个要求没有任何根据可言。但是,中国方面以中苏团结为重,没有对在中国的苏联机构和个人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方面的克制态度世所共知。至于中国机关在北京举行声援苏联政府没有任何根据地要求召回的5名同志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弄清楚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并表达了巩固中苏友谊的愿望,这中国在自己国家主权范围内所做的最低限制的事,这样做是有益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苏共中央要严厉谴责这次集会。难道苏共中央的同志要求我们宣布这5名同志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么?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平等的。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这件事呢?“允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团结。对待中苏之间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如下立场:坚持原则、巩固团结、消除分歧和对敌联合斗争。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言行一致。现在有这样一事实令我们感到不安。苏共中央不仅在散布中共与苏共之间在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分歧,还通过组织各级党机关集会通过决议的形式和通过发表冗长的演说和文章的形式,在全国开展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同志想把中苏分歧扩大到何种程度?

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团结,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我们全世界的同志和朋友都对中苏谈判寄予厚望,期待谈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使中苏两国的友谊得到维系和巩固。只有美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势力和铁托叛徒集团才期待中苏谈判破裂,和中共与苏共决裂。中国和苏联的团结非常非常重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让朋友伤心和敌人高兴的事。我们真诚地期待,苏共同志同我们一起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宣言的基础上,共同努力逐步消除分歧,巩固团结,共同对敌斗争。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

(1963年7月19日)

7月14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刊登了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联全体党员的信,同时还刊登了7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这是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14日苏共中央对这封信评价道。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的这封信的内容不符合事实，我们不能同意信中阐述的观点。中共中央对这封信进行了评论，对涉及了的问题进行了澄清。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登7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同时也刊登7月14日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联全体党员的信，以便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并对之进行比较和研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将在其他中央机关报和各省市机关报上刊登。

中共中央还决定通过对外广播向全世界播送7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公开信，同时也播送7月14日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共全体党员的信。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知晓我们的这封信，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听过我们的信以及我们立场和观点的反对者在6月中旬广播时可能没有听到。现在我们再次转播我们的信，期待那些人能听到它。我们特别期待，我们的反对者能耐心听一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借助手头掌握的资料对我们给予相应的批评。坦白地讲，这些人对我们的批评并不合适，也不能让人信服。至于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转播是因为它是份文学杰作。在中国的诗作中应该说是"一部令人深受鼓舞的作品，很难挑出错来"。很有可能，当苏联广播这份"杰作"时，广大革命群众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不想或者没有耐心去听。我们劝告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要以这种态度对待这件事，应该耐心听听，好好研究一下，把这份杰作刊登出来，把积极的和消极的材料比较一下就可以或多或少得到正确的分析和批评。不批评这个思想就不能发展唯物主义；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为了进行批评就必须掌握另一方的资料。现在这封苏共公开信正好就是用于负面案例学习的典型材料。

按照中共中央的观点，应该祝贺苏共中央最终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了7月14日的信件。我们希望苏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和对待中共中央的文件态度一致，能继续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包括从去年12月1日开始的我方刊登的7份文件以及我方7月1日、7月5日、7月10日声明和现在这份声明，以便让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能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一些中央及地方报纸在刊登了苏共中央公开信，从7月15日开始，又陆续刊登了一系列翻译过的和自己写的文章以及读者来信，利用这种形式颂扬苏共中央公开信，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以及意大利、法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政党的机关报，开始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的文章在我国的报纸上都予以刊登，我们将对这些攻击进行答复，当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按照中共中央的观点，苏共中央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这很好。说了总比没说好。马列主义者尊重事实和真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如果我们都一直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而不是与之相反，那中苏分歧最终将会得到解决。

在刊登了苏共中央公开信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印度反动势力和南斯拉夫叛徒集团开始众口一词地颂扬苏共中央公开信,并诬蔑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对待这些颂扬和诬蔑之词。我们将把这些引人注目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以便让我们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也会"赞叹"这些东西。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424, л. 163 - 173

№08114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次会议记录:康生的发言[①]

(1963 年 7 月 19 日)

第十次会议[②]

7 月 19 日

邓小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苏斯洛夫:请开始吧。[③]

邓小平:今天我们代表团由康生同志发言。

中共代表团代表康生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听了 7 月 17 日安德罗波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的发言。

你们的这篇发言再一次表明,你们不是在会谈中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而是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对我们继续进行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并且为你们破坏中苏团结、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一贯错误行为打掩护。你们的这种做法,同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们代表团在前几次的发言中,阐述了我们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性

---

①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② 中方解密文件为第八次会谈记录。——编注

③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以上两句内容。——编注

问题的观点，指出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关键，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路线。但是，你们的发言却对这些重大原则性问题的讨论采取回避态度。

例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曾经多次指出，我们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而是关于现代战争的根源、关于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关于是否目前就有可能消灭一切战争，是否要区别对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问题的分歧，是应当怎样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的分歧。

我们在上次发言中，曾经问过你们：你们难道真的认为战争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战争的危险不是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吗？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你们难道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划清界限吗？

我们还问过你们：你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你们这样做，难道真的能得到和平吗？难道不是应当按照宣言和声明指出的，也是我们一贯指出的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依靠当代各种保卫和平力量的斗争，而是要依靠什么苏美合作，甚至同美帝国主义搞一些不可靠的勾当就能够取得世界和平吗？难道无数事实不是已经证明，我们所主张的是一条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而按照你们的办法，只能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加剧战争的危险？

在当代革命的问题上，我们问过你们：你们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仰望全面彻底裁军实现后的施舍，仰望联合国的恩赐，仰望通过苏美合作得到拯救，就是不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你们的这种立场，难道不是十分错误的吗？

我们还问过你们：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你们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根本的核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不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吗？

我们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批评了你们的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错误路线，批评了你们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你们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你们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仇人。难道不正是你们的这些错误，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的分裂危险吗？

对于所有这些重大原则性问题，苏共同志怎么可以避而不答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

苏共同志7月17日的发言，还颠倒黑白，倒果为因，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片面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协议，撤退全部专家，使对方经济建设受到巨大损失，使中苏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不断缩减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同美国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对于这些举世周知、铁案如山的事实，你们的任何强辩，任何抵赖，都是徒劳的。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我们将另作详细的评论。

我们代表团在7月12日的发言中，诚恳地希望苏共同志认真考虑我们党在6月14日

的信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影响的7个条件的问题。但是,苏共同志的发言,却说是什么我们要你们考虑向后走,回到苏联社会发展中已经走过的阶段去,说什么我们要你们重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煽起阶级斗争。你们的这些话,意思很明白,就是认为苏联现在不存在阶级斗争,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在几次发言中还谈到批判斯大林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

这些问题,确实是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现在,我就来集中地谈一谈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首先,我要谈一谈斯大林问题。

这个问题关系到怎样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重大原则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第一次发言中,已经简要地表示过我们的意见。

但是,你们在发言中竟把我们的意见,说成是“为斯大林的错误、歪风甚至罪行辩护”,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立场的有意的歪曲,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苏共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是始终一贯的,对于苏共领导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所采取的立场也是始终一贯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为了给予斯大林以正确的评价,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分析斯大林的功过,从中吸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否定一切,任意地歪曲和篡改历史。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领导,是以斯大林为首的。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①,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②,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④所实行的对外政策,从总的方面来说,对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编注
③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编注
④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政府”。——编注

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基本上是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斯大林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在为苏联人民建立了伟大功绩的同时，也的确犯过一些错误，其中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

斯大林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肃反工作中，斯大林的领导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冤枉了许多好同志，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党和国家生活中①，他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犯了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

如上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必须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次，斯大林也犯了一些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你们指责我们为斯大林"辩护"。

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的。虽然斯大林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应该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发展和捍卫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在你们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的情况下，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我们为斯大林辩护，不是为他的错误部分辩护，而是为他的正确方面辩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辩护，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辩护，为列宁所缔造的伟大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辩护，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辩护。不仅我们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要这样做。

斯大林的一生的活动，包括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意义上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的财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长时期内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着尖锐的、激烈的斗争。苏联的无产阶级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完全不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是很难设想的。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用的是"组织中"一词。——编注

斯大林的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我们需要把斯大林的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就不但不能使自己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在实际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早有切身的体会。中国党内多次犯过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也是因为受了斯大林一些错误的影响的。早在30多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是批评这些中国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的身上。我们进行这些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的某些错误是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揭开盖子,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采取错误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虽然有某些积极意义,但是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一生不加分析,全盘否定;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对斯大林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各国共产党的重大问题,你们没有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事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在这次大会之后使兄弟党接受事实。①

你们对斯大林的批判,不是采取探索真理的态度,不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而是采取煽动的语言,进行咒骂。

苏共同志把斯大林说成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猪屎”、“白痴”。

这些咒骂都是出于赫鲁晓夫同志之口。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企图为赫鲁晓夫同志辩解,说他对斯大林有“客观的、全面的评价”,是“原则性的态度”。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

老实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苏共领导为什么对于斯大林有这么大的刻骨的仇恨,为什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事先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事后又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编注

么要用一切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他，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人民曾经在30年中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难道苏联人民多年来公认的领袖，竟然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吗？难道苏联人民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验，就是在一个“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经验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一个“混蛋”为首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难道几十年来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尖端技术的发展，是在一个“混蛋”的领导下取得的吗？苏联的核武器和火箭技术，难道也是在一个“混蛋”的领导下奠定基础的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红军，它的最高统帅是一个“白痴”。难道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贡献，是在一个“白痴”的指挥下赢得的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共产党，30年来是在一个“强盗”为首的领导之下的。难道长期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爱戴的苏联共产党，几十年内是以一个“强盗”作为自己的领袖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在长时间内是在“狗屎”的领导之下的。难道各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内竟然把“猪屎”作为自己的旗手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长时期内最痛恨的无产阶级领袖，只不过是一个“赌棍”。难道苏联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导师的吗？

同志们，你们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苏联红军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侮辱。

你们是不是想过，那些曾经作为斯大林的战友的人，现在这样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放在“凶手”、“强盗”、“赌棍”的同谋者的地位呢？还是放在“白痴”一类人的地位呢？

同志们，你们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你们怎能这样地对待斯大林。你们这样做，既违反历史，又使你们自己十分尴尬。

当你们把斯大林说得那么坏的时候，你们就给整个苏联国家和党的领导抹黑，同时，你们就无法分辨，那些当时参与这个国家和党的领导的同志们，对于你们所说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就以赫鲁晓夫同志为例来说，把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发生的一切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完全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把自己说得一身清白，这难道能够令人信服吗？

人们如果不健忘，就会注意到，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赫鲁晓夫同志就曾经多次歌颂斯大林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同志曾经不断地颂扬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等等。

赫鲁晓夫同志在1937年6月6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再如,1938年6月8日在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同志又说过:“亚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例子还很多,这里不举了。我们举这几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你们把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说成黑漆一团,又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老实说,在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你们不如斯大林。斯大林做错了事,有时还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还可以向中国同志和别的人承认错误。而你们呢?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你们现在还吹嘘自己100%的正确,以“神人”自居,你们这样的对待自我批评的态度,难道同列宁所说的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错误、对待真理的起码态度,有丝毫相同之处吗?

正因为你们对斯大林采取了以煽动和咒骂代替探索真理和科学分析的态度,拒绝进行自我批评,所以,你们不能够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取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你们实际上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生的活动中大量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抛弃了,而把他所犯的某些错误继承下来,大大地加以发展了。

你们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丑化苏联、苏共和苏联人民;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样,你们实际上就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

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采取的错误立场和做法,才真正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信誉”,“在世界劳动人民眼里破坏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最近8年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就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帝国主义就利用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都趁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那时绝境逢生,大肆活跃起来。

他们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全盘否定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严重的后果，是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

苏共领导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从1956年批判斯大林开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为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打开了缺口。

苏共领导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说，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恰恰是关于新的社会制度将朝着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展下去"的问题。你们的结论是应当"使无产阶级专政及时地发展成为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新的更高阶段的全民国家"。

你们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是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中提出来的。

苏共纲领说："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

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这是"提出了并且解决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要消灭剥削阶级，而是要消灭"任何阶级"。①

列宁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但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但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②

列宁又说："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③

列宁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斗争。"④"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应该是：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先进的、最觉悟的、最守纪律的那一部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马克思文选》2卷52页)"。——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5卷400页)"。——编注
③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卷382页)"。——编注
④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1卷26页)"。——编注

分人,去教育和训练其余往往是不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①

不难看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和列宁一贯认为,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二、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防止已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复辟;

三、建设社会主义;

四、反对旧社会的传统,教育本阶级的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

五、完全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六、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

在我们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撇开对外的任务不讲,单就国内的任务来说,都远远没有完成。

我们在 6 月 14 日的复信中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是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并且“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都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

你们也无法否认,在苏联社会中,还存在着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寄生分子等等。你们也无法否认这些人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同这些资本主义残余分子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什么“全民的”斗争呢?怎么能够说,要消灭任何阶级,而不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以及产生这些分子的根源呢?

列宁指出,消灭剥削阶级的观点和习惯,消灭剥削阶级的一切残余,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的、艰苦的任务。当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完成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的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根据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呢?

在我们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仅还存在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而且还经常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列宁说过:“工农政权在各方面开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它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扫除地主和资本家——这件事情我们几乎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立一个不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会。在革命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被扫除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富裕农民和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而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时就是:不仅要扫除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产生。”②

列宁还指出,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由于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的影响,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1 卷 154 页)”。——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 卷 20—21 页)”。——编注

质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

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没有解决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产生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从这方面来看，也不能得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要的结论。

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消灭“任何阶级”，不仅指的是消灭剥削阶级，而且包括消灭工农的阶级差别。他们所说的“无阶级社会”，不只是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而且是没有工农的阶级差别的社会。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既然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也就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全的社会主义。”①

列宁又说：“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妄说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论和假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阶级才能消灭。”②

要做到消灭任何阶级，消灭工农的阶级差别，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就不仅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列宁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③

只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还没有消失，工人和农民的阶有差别还没有消失，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就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就依然是必要的。

苏共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在苏联已经不必要了。

我们要问：难道苏联已经消灭了任何阶级吗？没有。

难道苏联已经消灭了工农的阶级差别吗？没有。

难道苏联已经进入了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吗？没有。

难道苏联现在已没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了吗？没有。

难道苏联现在已经消灭了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了吗？没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呢？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天，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包括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阶段。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2卷258页)”。——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2卷237页)”。——编注
③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卷383页)”。——编注

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是"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

但是,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缩短到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按照你们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只是限于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存在着对抗性阶级的时期。只有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必要的。按照你们的说法,只要把多种经济成分改变成社会主义经济以后,对剥削阶级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是必要的了。按照你们的这种说法,苏联早在30年代、全盘集体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必要了。按照你们的说法,不仅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二十二大以前,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误"。

同志们,不是的,你们过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错误,你们现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搞什么"全民国家"才是真正的大错误。

当然,在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形式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还没有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还没有具备以前,就以为可以结束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你们企图引用列宁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解释的一段话,来替你们的错误论点辩护,这是完全徒劳的。请你们看一看,列宁究竟是怎样解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①

列宁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要一直存在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

请问,究竟是谁把自己的断言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难道不正是你们把自己的错误观点,既强加在马克思身上,又强加在列宁身上吗?

苏共同志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了,国家还存在;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民主发展为"真正的全民的民主"。这也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有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随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会逐步自行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你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所谓"真正的全民民主"对立起来,这是完全违反列宁的观点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民主相结合"。②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剥削阶级实行镇压,同时对劳动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人民民主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2卷317页)"。——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8卷55页)"。——编注

的发展。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为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到世界空前未有的地步。①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苏共领导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荒谬的修正。你们在苏联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还没有彻底解决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产生的条件下，在还存在着工农的阶级差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的条件下，就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民国家"，这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

你们这样做，或者是为了吹嘘你们领导下的社会制度发展如何"迅速"，在理论上如何标新立异，如此而已；或者是真的要放弃对资本主义残余分子和新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样就当然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果是前者，纵然是错误的，但危险还可能比较小；如果是后者，那就不能不使人十分担心了。②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全民党"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中，提出用"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这同以"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荒谬的修正。

按照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党之所以成为"全民党"，其理由是：一、党现在依靠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不仅工人，而且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都把党当作自己的党；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和它的先进部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成了全民的目标；三、现在党就其成分来说，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是真正的全民的党。

坦率地说，这不是严肃的论证，而是诡辩。

如果因为人民都把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党，就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早就应该是"全民党"，而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的思想，那么，先锋队和群众的区别也就没有了，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的问题了。

如果说党员成分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就是全民党，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阶层的人，它们岂不是都可以叫做"全民党"了吗？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8卷228页)"。——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休息20分钟"的内容。——编注

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共产党只有在完成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后，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完全消失而消亡。只要还有政党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你们就在半路上宣布苏联共产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已经成为“全民的党”，那岂不是要放弃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历史使命、放弃党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吗？那岂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政党改变成为另外一种阶级性质的党吗？

苏共领导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同它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有关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历来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早在 1949 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但是，我们的这种主张和作法，同你们用“反对个人迷信”来代替列宁的党的学说，代替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代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根本不同的。你们引用毛泽东同志、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某一段话，硬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错误做法，这是徒劳的。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建立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全党应该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是建立在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最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如果不是在集中指导下，就不可能有广泛的民主。如果没有这样的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起来的党，就不可能实现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可能战胜阶级敌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久经考验的、富有天才的领袖组成领导核心，否则，就不可能有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的，是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拥有这样威信极高的领袖，是这个党的政治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

我们这些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

为一句空话。”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竟然把我们对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全面论述，说成是你们“第一次遇到公开为个人迷信辩护的事”。这种诡辩，对你们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你们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就是把党的整体同组成整体的“个人”对立起来，把党的领袖同党员群众对立起来。

你们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你们又大力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你们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推行你们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开辟道路。

你们不仅在苏联大力推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活动，并且硬要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也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这实际上是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事实证明，你们正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活动的掩护下，进行着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

坦率地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来破坏无产阶级事业，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后，他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已经逝世的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说他“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他“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降到了中纪的或者东方的迷信的地位”。

可见，你们提出的所谓所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是从巴枯宁、考茨基一脉相传下来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

你们搞的这一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够严重的了。

我们希望，苏共同志停止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来进行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损害和削弱各国共产党战斗力的一套错误做法。现在，应该是回到列宁关于党的完整学说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应该是回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应该是回到列宁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

我们上面谈到的几个问题，不仅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讲的这些问题以及前几次发言中讲到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迫切要求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相信,他们是能够从实践中辨明是非的。

苏共同志知道,我们本来是不赞成公开论战的。但是,现在公开争论既然已经被他们搅动起来,就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就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双方应该互登对方批评自己的文章,把双方的论点明明白白地、清清楚楚地摆在自己党员的面前,本国人民的面前,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面前,让他们来鉴别是非。绝不应该遮遮掩掩,封锁对方的观点,掩盖争论的实质,采取歪曲欺骗的恶劣手法。这种手法,只能被认为是害怕事实、害怕真理、害怕群众的表现。

7 月 14 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虽然,在你们的公开信中,有很多事情不符合实际,有很多观点我们不能同意,虽然你们采取了这样严重的步骤,虽然你们破坏了已经达成的关于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歪曲和攻击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的立场,但是,我们仍然准备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的公开信。对于你们这个公开文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党将在研究后予以评论。

我们代表团在 7 月 8 日的发言中,曾经说过:“在苏斯洛夫同志的讲话中说到,你们将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我们党的文章和信件,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你们还讲到,准备发表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发表之后,我们报刊一定转载,以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进一步了解你们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是能够辨明是非,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7 月 14 日,《真理报》也发表了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进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苏共同志知道,我们过去多次发表了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和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谁都知道是攻击我们的。可惜的是,你们没有发表我们的在 6 月 14 日信件中提到的 7 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都阐述了我们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问题的重要论点。

我们也发表了苏共中央 6 月 18 日的声明、6 月 21 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①的决议和 7 月 9 日的声明,苏共领导却没有发表中共中央 7 月 1 日、7 月 5 日、7 月 10 日的声明。

我们希望苏共领导采取同我们一样的办法,发表我们的 7 篇文章和我党中央的 3 个声明,以便于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充分了解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以利于我们双方寻求办法,实现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目的。

现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殷切地期待着我们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能为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才指望中苏会谈失败,中苏两党分裂。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公开插手中苏分歧,印度反动派正在利用中苏分歧从中取利,叛徒铁托集团正在趁机浑水摸鱼,进一步起着作为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作用。这些革命的敌人,正在煽风点火,进行各种卑鄙的挑拨离间的勾当。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能中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奸计。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这应该是我们的共同义务。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没有“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表述。——编注

我们在这里，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向苏共同志呼吁，同我们一起努力，通过中苏两党反复的、耐心的会谈，争取积极的成果，力求争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改善，力求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加强，以利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

邓小平：康生同志的发言完了①。

苏斯洛夫：请允许我谈一些看法②。

苏共代表团对今天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将在以后发言中给予详细的回答。但是，我们代表团现在就要提出坚决的抗议，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

同时，我们代表团抗议你们北京电台最近几天开始的同类性质的宣传。我们认为，中共领导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你们在这里大谈特谈团结，但是，你们的行为和康生同志的这次发言，绝对不会有助于获得我们对这次会谈所期待的良好结果。

邓小平：苏斯洛夫同志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③

同志们！现在，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我们代表团对于两党会谈本身的建议。

我们的会谈，已经进行两个星期了。在会谈中，彼此交换了各自的观点。尽管我们双方的观点，一时尚难达成一致，但是，双方在两党会谈这样的范围内，坦率地摆明自己的观点，对于彼此相互了解，寻求逐步地取得共同语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是很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过去十几天的会谈中，双方所说的话，已经不少了。我们需要把会谈的情况报告我党中央，以便我党中央仔细地考虑你们的观点，看来，可能你们的中央也需要考虑我们的观点。当然，彼此都可能还有很多话要讲。讲话的机会是有的。

现在，重要的是彼此都把对方在信件中、文章中和发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冷静地加以研究，才有利于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使两党会谈获得积极的结果，为准备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条件。

因此，我们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这次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一个时间继续举行会谈。下一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中央另行商定。

我们双方都很清楚，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严重的，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同意你们这样的看法：如果认为这些分歧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解决，那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两党会谈暂停一下，并在双方同意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是比较妥当的。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不是可以由我再讲几句”。——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
“苏斯洛夫：请允许我先讲几句。
邓小平：好。
然后是苏斯洛夫的发言。”——编注

③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一句：“现在我就我们会谈本身的问题讲几句话”。——编注

我们代表团再一次表示我党的真诚愿望,这就是:对于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应该不吝惜我们的精力,进行充分的、多次的、不厌其详的讨论。

一次谈不完,可以谈两次,两次谈不完,可以谈三次,总应该讨论出一个好的结果来。

我们深信,我们两党都理解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不辜负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特别是我们两党党员和两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以上关于暂停这次会谈和在另一时间继续举行会谈的建议,请苏共代表团加以考虑。

这就是我想说的。①

苏斯洛夫:我们明天答复你们。②

№08115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发言

(1963年7月20日)

第十一次会议

7月20日

苏斯洛夫:可以开始吧?

邓小平:请吧。

苏斯洛夫:同志们!昨天你们代表团提出建议,暂时结束此次会晤,改在以后继续进行。你们建议通过我们两党党中央协商确定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研究了你们的建议,认为需要声明如下:

苏共中央多次指出,我党的一贯目的是克服出现的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基础上,巩固苏共和中共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以我们认为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会晤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我们认为这一会晤的主要任

---

①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无此句。——编注

②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内容:
"邓小平:好。
苏斯洛夫:明天上午10时。
邓小平:好。"——编注

务，是克服现有分歧，达到更好的相互理解。为此，苏共中央一如既往，将不惜时间和气力。

我们认为，中共为一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克服得越快，我们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争取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斗争进展得就越顺利。不能不看到，所有兄弟党赋予我们的会晤以很大的意义，因为他们清楚地懂得，保留分歧和继续论战将给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带来严重的损害。

我们的会晤使双方代表团有机会详细阐述了本党对当代一系列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的立场，更好地弄清了现有分歧的实质。

从这一切出发，我们代表团准备继续谈判，以便取得积极的结果。但由于中国的同志们认为暂时停止谈判是适宜的，苏共代表团准备迎合你们的愿望。

苏共和中共之间的谈判，只有认真在比较双方的立场、双方努力克服现有困难和放弃攻击与无根据的指责的条件下，才能是有效的并能取得积极的结果。

苏共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再次声明，中共领导想把苏共领导同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分开的企图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不能允许的，这是卑鄙手段，是必遭失败的。

中苏领导应该明白，此种卑鄙手段只能引起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苏联人的愤怒。苏联人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团结在亲爱的共产党和以杰出的列宁主义者、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和为劳动人民的幸福、为和平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畏战士——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一团结像磐石一样，是牢不可破的，任何居心险恶的诬蔑和诽谤碰到它，都会被彻底粉碎的！

在7月6日第一次发言中，我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需要在我们会谈中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问题考虑到了双方的愿望，它有可能逐条逐条地把宣言和声明的基本结论再修改一遍。

苏共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原则问题上，尽可能详细地交换意见，以事实为依据并以此促进克服我们两党关系中的困难。

但在你们对我党进行各种造谣中伤之后，我代表团自然应该进行应有的还击。

现在，当中国代表团建议暂时终止会晤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达成能促使我们两党关系改善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条件。

我们认为这些条件之一，是达成停止相互论战的协议。

在此次会晤之前，苏共中央早就主动建议停止论战，我们坚定地坚持这一建议。但到我们会晤之前，我们看到中共中央不理睬苏共中央这一受到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支持的建议，继续公开论战。正因如此，有必要公布苏共中央致苏联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公开信。

我们再次建议，不要给帝国主义宣传提供炮弹，不再公布包含有相互攻击内容的文章、声明和材料，也不进行电台转播，以便改善气氛，有助于双边会晤的准备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准备。

如果能就这个问题同你们能达成协议，苏共中央准备承担相应的义务。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对克服现有分歧、使关系正常化和巩固中共和苏共、中国和苏联的

团结,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表现出善良的愿望。我们坚信,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符合我们共同的反帝斗争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利益。

我们还认为,关于我们两党这次会晤通过一个简短的公报是适宜的。

我们建议你们,注意讨论以下公报草案: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莫斯科会晤公报草案。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7月5—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____(以下是代表团成员名单)。

在会晤过程中,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各自陈述了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和苏中关系一系列问题的立场。

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提议,达成了代表团暂时休会、过一段时间继续会晤的协议。继续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将通过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另行确定。

双方代表团,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进一步会谈和为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条件,同意停止论战。”

邓小平:我们听了苏斯洛夫同志的发言。苏斯洛夫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为了共同对敌,我们两党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还表示,此次会晤使我们两党有了进一步相互了解,苏共代表团同我们一样,将不遗余力使我们的会晤取得积极的成果。苏斯洛夫同志还说,苏共中央同意我们关于暂时中断会晤的建议。他表示同意,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的中央委员会另行协商确定。这一切我们都很高兴。

至于苏斯洛夫同志发言的第二部分,即谈到此次会晤过程的那一部分,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但今天我不想说这些,我想今后还有机会弄清这些问题。

我想在这里再次声明,我们始终认为,在我们所进行的会晤这种范围里,公开阐明自己的意见和进一步弄清相互的观点,对我们继续会晤是一个好的开端。

我们坚信,由于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事业,我们应该也能够通过多次讨论逐步找到共同语言,做到消除分歧和巩固团结,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苏斯洛夫同志说,我们必须改善气氛,为所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他还说,必须改善和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我们很高兴听到这些话。

苏斯洛夫同志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一贯主张不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暴露在敌人面前。周恩来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的祝词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我党的这一立场。但事与愿违,公开论战还是发生了,它不是我们挑起的。

由于这一公开论战已经发生,由于我们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那么这一论战就应

该按照平等的原则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已讲过多次。

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直是被迫的。我们从未首先攻击过其他兄弟党。只是由于其他党公开攻击我们党，我们才被迫给予回答。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也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先发制人，只是在别人先发制人之后，我们才采取相应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先发制人，以后我们也不先发制人。但如果别人先发制人，不论他走多远，我们都将奉陪到底。

我们请苏联同志们注意这一事实，不久前苏共公布了"公开信"，而且苏共和许多其他兄弟党对我们进行了多次攻击，对此我们还未给予相应的回答。自然，在我们给予了应有的回答之后，如果不出现言行不一这种状况，不对我们实施攻击，我党将不首先"攻击"任何其他党。

我们在3月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里提出了，关于必须按照平等的原则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公平协议。至于苏斯洛夫同志说停止论战，我们方面表示同意。但是我们认为，言行一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在我们这次会晤之后，在两次会晤之间或下次会晤期间，我们和你们能够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

最后，关于公报。我们认为有必要发表公报。我们同意发表公报。

现在我们是否休息一会儿，让我们研究一下你们提出的公报草案，然后我们再谈我们的意见。

苏斯洛夫：好。15—20分钟左右。

邓小平：那好。

苏斯洛夫：好。

(休息)

邓小平：关于公报草案，我们作以下修改。

我们建议，把谈交换意见的第4段改为以下文字："在会晤过程中，双方阐述了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要的原则问题和苏中关系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你们看怎样？

苏斯洛夫：这可以接受。

波诺马廖夫：这里没有当代发展问题……

苏斯洛夫：可以把几种提法拼成这样："在会晤过程中，双方阐述了自己对当代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原则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邓小平：好，通过。一切都清楚。

苏斯洛夫：我们委托两位同志进行核对。

邓小平：下一段。我们建议删去第一句，即"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建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是联合公报。所以最好以我们建议的提法公布。我们建议这样写："双方达成了……协议……"，以下不动。

苏斯洛夫：我们的出发点是按照实际情况来写。

邓小平：我们不坚持这一修改，但我们希望能够接受它。

苏斯洛夫：那么我们保留，如何？

邓小平：好吧。

苏斯洛夫：好。

邓小平：最后一段。我们认为，现在在我们的公报中先不提这个，因为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双方以后的实际行动来决定。

苏斯洛夫：我们认为，这对我们两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益的。

波诺马廖夫：这将受到大家的欢迎。

邓小平：如果苏共代表团坚持这个，那我们建议作如下修改："双方同意，我们两党和有关的兄弟党应该共同努力，为达成公正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寻找理智的基础。"

苏斯洛夫：在你们的提法中，应不提"其他党"。我们没有受委托，我想你们也没有受委托替其他党说话，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

彭真：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不能不涉及其他兄弟党。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同志亲自参加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铁托叛徒集团的代表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而我们的代表甚至被禁止宣读莫斯科声明的有关引文。所以，您建议的这种停止公开论战不会有任何结果。

所以，在我们两党代表会晤中，我们应该真正的行动，不应该采取外交手段。如果达成协议，大家都应该遵守。

邓小平：我们提出我们修改的出发点是，达成大家都能遵守的公正协议。否则公开论战不能停止。

刚才苏斯洛夫同志说，这个问题所有党都感兴趣。既然这样，我们两党达成的协议，将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不是强加给其他人。如果你们认为这将引起误会，被认为是其他党强加给的，那我们建议作这样的改动：把"我们两党和有关的兄弟党"改成"我们两党同意并建议有关的兄弟党同意……"，以下文字不动。

苏斯洛夫：此处措辞，我想直接说，很模糊，意思不明确。可以这样加上：两个代表团双方表示希望，希望各兄弟党也积极评价我们达成的这一协议，停止论战。

邓小平：我想再次声明，正如我上面说过的，既然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那它就应该按照平等原则进行。现在又对我们进行了很多攻击，其中包括你们的公开信。难道我们不应该弄清这些问题，不应该对这些攻击进行评论？

苏斯洛夫：很遗憾，我们应该指出，我们未能同中共代表团就我们联合公报的这一条达成一致意见。

邓小平：对，我们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苏斯洛夫：怎么，今天就不要这段？

邓小平：好，我们还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

苏斯洛夫：什么时候发表公报？

邓小平：考虑到我们还要向我们党中央汇报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后天发表。

苏斯洛夫：星期一我们可以公布？

邓小平：可以。

彭真：双方星期一都可公布。

苏斯洛夫：说定了。星期一你们还在这里吗?

邓小平：我们想今天晚上飞走。

苏斯洛夫：如果在北京如何修改呢?

邓小平：到时我们通电话。

苏斯洛夫：在公报发表问题上可以认为达成了一致意见?

邓小平：我们还要报告我们党中央。

苏斯洛夫：我们建议，你们代表团今晚6点同我党中央主席团在城外奥加廖沃见面。

邓小平：谢谢。结束时我想说几句话。

不管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逐步找到消除这些分歧的途径，因为我们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

在讨论过程中，尽管我们双方都说了许多对方不能同意的观点，尽管你们说我们的话难听，而我们也说了你们的话难听，尽管如此，我们此次会晤还是好的开端。而且我们和你们达成了关于发表今后继续会谈公报的协议。我们认为这是好事。

我们同意，必须使我们的会晤继续下去，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中央协商。

在此我想顺便表示我们的希望，如果你们代表团，如果苏共中央同意，我们想邀请苏共代表团去北京继续会谈。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特别协商。

苏斯洛夫：这个问题，也要由我们两党中央委员会之间讨论。就这些。我们今天见?

邓小平：6点钟?

苏斯洛夫：6点。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086—4096页

№13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公开交手的时刻已来临

(1963年7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7月23日会议第10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沃罗诺夫、基里连科、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叶夫列

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鲁达科夫、波诺马廖夫、季托夫、谢列平、乌斯季诺夫、列谢奇科、葛罗米柯。

1. 关于禁止核武器问题的谈判。①

葛罗米柯同志阅读了条约草案。②

2. 说：我们没有直接与不进攻条约联系在一起，但是，约定做出努力，以便争取达成缔结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成员国不进攻的公约。③

3. 批准对公报草案的修改。④

关于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协商会议。⑤

不能刺激罗马尼亚。

关于对保加利亚人的援助——或者，提供一些煤炭。

关于对与中国人之间的分歧的态度问题。⑥

与中国人公开交手的时刻已经来临。

在废除条约的基础上——提出一切。就一系列问题准备信件，并寄发给兄弟共产党。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8，л. 12

№138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对中共进行反击

(1963 年 9 月 10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9 月 10 日会议第 114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И. 勃列日涅夫、Г. И. 沃罗诺夫、А. Н. 柯西金、О. В. 库西

---

①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批准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草案(参阅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177，л. 1)。——原注

② 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是于 1963 年 8 月 5 日由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签署的。——原注

③ 苏联关于缔结不进攻公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美国总统肯尼迪在 1963 年 7 月 3 日发表声明说：苏联关于缔结两个集团互不进攻的公约的建议，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签署这个公约，就等于美国承认战后东德和整个东欧地区的苏维埃化。——原注

④ 8 月 5 日签署条约结果的公报，参阅《真理报》，1963 年 8 月 6 日。——原注

⑤ 1963 年 7 月 25 日，华沙条约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及政府首脑，在莫斯科举行了协商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原注

⑥ 参阅《苏联政府的声明》，《真理报》，1963 年 8 月 4 日和 8 月 21 日。——原注

宁、Н. В. 波德戈尔内、Д. С. 波利扬斯基、М. А. 苏斯洛夫、В. В. 格里申、Л. Н. 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 В. 安德罗波夫、П. Н. 杰米切夫、Л. Ф. 伊利切夫、В. И. 波利亚科夫；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中国的事情。

(赫鲁晓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伊利切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

委托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是进行防御，而且还要进攻。

协议和休战——应该以证据作为基础。

关于中国公民在纳乌什金火车站的挑衅行动。[①]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②]

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进步力量的信。

除了信之外还有声明。

РГАНИ, ф. 3, оп. 16, д. 948, л. 16－18

№13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谈中苏关系

(1963 年 9 月 10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9 月 10 日会议

Н. С. 赫鲁晓夫：现在，我想谈谈会议日程之外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的事情。[③]

而这方面，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他没在这里，安德罗波夫同志，——这些

---

① 问题的措辞借用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的内容(参阅 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188, л. 81)。——原注

②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批准了苏联外交部因中国公民于 1963 年 9 月 7—8 日在纳乌什金火车站的挑衅行动而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照会文本。——原注

③ 参阅发表在 9 月 21—22 日《真理报》上的苏联政府的声明。无论是在以前的声明中(尤其是 1963 年 8 月 4 日和 21 日的声明)，还是在这份声明中，都阐述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整个范畴以及和平共处问题上的立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争论的内容。1963 年 10 月 25 日和 11 月 7 日，Н. С.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演说中，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放弃公开论战的建议，这个演说稿已经在报刊上发表。11 月 29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再一次建议停止公开的论战，并提出能够使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措施的纲领。在苏联已经单方面地停止了反华宣传活动。希望中苏关系能够有所缓和的愿望没能实现，因为在中国的报刊上继续发表对苏联进行激烈攻击的文章。——原注

同志们应该负责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说过了,应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应该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集中了成千上万人;而如果我们回应得慢了,自然就会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

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应该做好长久的准备。应该不仅仅是进行防御性的回应,现在需要反攻了。但是,我们进行反攻,同志们,不是利用责骂和侮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导致现在这种局面的事情。不。我们应该执行的方针,是能够争取休战和达成协议的方针。

因此,我赞成这样做。休战代表着什么呢?这不代表着证明是正确的,而是代表着揭露。然而,这种揭露不仅是体现在语言上,说这是不正确的,这是谣言,还要体现在证据上。

可以举一个例子。他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仿佛断绝了与他们的经济关系,并把他们置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境地。这里有一封今天收到的列宁格勒工人的来信;这封信写得很好,充满了智慧;谁写的这封信——我不清楚,是工人自己还是别人帮他写的,但是,写得很好。①

如果这样说,我们给你们的农业造成了损失的话,那么,自然,这是在你们那里没有我们的农业专家的时候。他们还说:你们召回了专家人员。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此可以这样说:我们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说——他们将着手这件事情时(也就是我以前说过的),说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采用过这种方法,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说的。当国内战争结束时,列宁采取了另一种方针,这是正确的。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同意这种方法,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试试。"还应该说:以前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其他的我们什么也不能说,除了所说过的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弄清楚。

在工业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工业方面,除了提供原子弹之外,我们没有拒绝任何一个要求,所有订货,我们都给你们供应了,停止也是按照你们的建议。被召回的工程师和专家人员,也是因为你们对他们不尊敬的态度导致的。②可以举出例子。从我们的信里可以举出例子,我们有这些材料。请看,这个例子。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应该以什么形式?我考虑了一种形式——可以致信全党、全体党员和我们的人民,向他们详细地解释: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在信里应该弄清楚所有这些问题。

那么,就让我们来弄清楚这一点吧,为了人民,我们还应该弄清楚中国的事情,当然,这将会被国际舆论所利用,就像那些信件一样。

我认为,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该如何撰写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为什么?我

① 指的是署名为"电力厂"钳工队长B.穆拉维耶夫的标题为《谣言不可能战胜真理!》的文章(发表在1963年9月10日的《真理报》上)。在这篇从《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转载的文章里,谈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的攻讦。——原注

② 1958年,苏联从中国撤回了自己制造原子弹的专家,担心在台湾危机尖锐化的情况下,北京将会针对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使用原子弹。——原注

不清楚，这场斗争将会出现什么结局，它会不会持续很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说，这是不理智的行动，你们发动了这场论战，应该弄清楚：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你们反对我们，并指责我们背叛和变节，指责我们签署了条约①，说我们与帝国主义缔结和约，指责我们赞成没有战争和武器的和平。而你们自己呢，你们致函各国政府首脑，呼吁政府首脑集会和裁减军备。②

你们明白吗？这是矛盾的。就是说，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与资本主义分子缔结和约。是的，我们曾经建议，现在仍然要建议裁军。但是，你们自己也向帝国主义分子发出过呼吁，你们也希望与他们缔结这种和约。

如果你们说，暂时还存在着垄断资本，因此，依然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因为我们知道，与他们不可能达成裁军的协定，——与某个人交谈时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谁是垄断资本呢？我们不可能与加纳、与几内亚进行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没有武器?!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也是事实。一句话，应该周全地考虑我们的立场。在中国人那里存在着许多矛盾，应该把这些矛盾展示出来给大家看。我们把这些都要写到信里，把这一切都说出来，这是正确的做法。

现在，中国人正在呼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已经摆脱和正在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进步力量写信，向他们发出号召，他们正处在美国垄断剥削者的压迫之下。我们说：因为中国同志向你们发出了呼吁和指责我们……——我们应该与他们一起弄清楚问题。应该找到论点和论据，我们这里有一大堆。也许，这将会是一封非常好的、非常有水平的信，我们可以把它寄给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国家，或许，我们还将以呼吁书的形式公布它。

在给自己党的信中可以说："实话说，因为什么指责我们——如果你们说是因为裁军，那么，我们赞成裁军；你们说是因为和平共处，那么，我们赞成和平共处；你们说，工人阶级不应该通过和平途径夺取政权，而我们说，也许通过和平途径，也许通过非和平途径；你们说，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殖民地的，而我们很久以前就说过，殖民主义者是永远也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殖民地的。"

接着，谈一下苏联已经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在未来仍然还要起到。

同志们，现在，对于这一点应该进行仔细的加工。我们有许多聪明的人，应该把他们找来，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工作，如果只有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应该共同努力。同志们，现在，对我们来说头号任务，最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对外政治工作。

---

① 指的是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禁止在宇宙、空中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中国领导人尖锐地批判了这个条约，把它视为对帝国主义的让步，并拒绝签署这个条约。——原注

② 指的是新华社于1963年7月31日发表的声明，其中谈到了所签署的条约的妥协性和毫无根据性，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这个条约掩盖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必要性。——原注

同志们,你们再考虑考虑。只是,同志们,这不是书记处应该考虑的事情,因为当时你们没有给各位书记安排这项工作。这应该是意识形态委员会来做的工作。

A. H. 柯西金:关于技术合作问题——说,我们给过他们多少和还将给多少。①

H. C. 赫鲁晓夫:应该说:"你们现在仍然在从我们这里获得(技术设备)。为什么你们还说,我们中断了(贸易关系)? 如果我们中断了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你们(提供设备)?"

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向印度出售武器。如果你们这样指责我们的话,那么,印度人也能够指责我们,说,你们使用我们的武器与他们打仗,我们在你们那里建造了工厂,并提供了使用权。我们给你们供应(货物),不是为了让你们发动与印度人的边界战争。我们希望你们武装自己和对抗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把印度归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国家。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事情就会清楚的。因此,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 现在,我们为这场冲突感到遗憾,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你们再考虑一下。

这就是,给我们党的信,给进步力量的信,——我不知道,如果称呼它,我认为,给进步力量的信,我们可以直接针对政府。那里也有非进步的力量,但是,管它呢。

现在,为了与我们进行斗争,中国人甚至同意随便与谁结盟。

H. C. 赫鲁晓夫:这不,戴高乐,他们(中国人)将与他结盟。②

因此,我们应该驳斥他们的指责。

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

A. H. 柯西金:他们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呀。

H. C. 赫鲁晓夫: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我们给中国人写信之后,他们如果不答复我们,我们还应该苦口婆心地去说。我们还要把这封信寄发给兄弟共产党,不单单是要寄发给兄弟共产党,或者,我们还会"有损失",它可能会被发表。这样,它就会变成世界舆论的财富。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会编造谣言来反对我们的。

但是,在他们面前不要央求,不要奉承,而是要站在高水平的思想和原则立场上说,这不仅会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而且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造成损失。

Ю. B. 安德罗波夫: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发表声明。③

H. C. 赫鲁晓夫:声明是要发表的。

---

① 在中苏两国之间关系恶化之前签署的苏联与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许多协定,在 1963 年仍然被继续地执行。——原注

② 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都拒绝了在 1963 年的关于禁止在宇宙、空中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上签字。法国这一立场的基础,是夏尔·戴高乐的安全学说,这个学说赋予法国拥有自己核能力以重要的意义。——原注

③ 指的是苏联政府的声明,发表在 1963 年 9 月 21—22 日的《真理报》上。1963 年 10 月 6 日,为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收获量,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致全体工人、职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化学工业企业、科学研究和设计院的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建筑组织、化学机械制造厂以及生产农业化工产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各企业关于扩大化肥和保护作物生长的化工产品生产量的信(参阅《农业生活》,1963 年 10 月 6 日)。稍晚些时候,还发表了一组学者致苏共中央的信,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就提高农业产量和化肥生产量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同时还阐述了关于通过对作物本身的改良和对其采取保护措施的途径来减少化肥用量的想法——《真理报》,1963 年 11 月 17 日。——原注

显然，给苏联共产党员的信也将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可以分章节发表它，因此，一封信会延长一周时间。否则的话，不管我们怎么写，人们在收到报纸之后，会说：这么长的信，就不看了。或者，我们可以一天发表一个章节，还应该不断地加入有用的材料。

在我看来，我们不要做任何记录；这件事应该由苏斯洛夫同志负责，由各部门领导负责。我不知道，在此我们是如何分工的，苏斯洛夫同志不应该袖手旁观，而且也不能束缚我们各个部门的主动精神。

Ю. В. 安德罗波夫：这样非常好。我们这里还有代表团，它参加了谈判，正好所有参加谈判的同志都在这里。①

Н. С. 赫鲁晓夫：是的，应该阐述以下内容：让人如何理解呢——我们约定停止论战，而你们现在却开始了更大的攻击，加深分裂的局面，你们自己说的，你们希望团结。但是，这样做怎么可能会有团结呢?!

然后，再通过领导人向人民发出呼吁。这不是新的方法。所有反动派都使用过这种方法。例如：希特勒，当他宣布战争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将使苏联人民摆脱共产主义，他指望一越过苏联边界，所有的一切都会崩溃和瓦解的。

还有在卡尔·马克思时代，在工人革命运动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巴枯宁是团结工人力量的主要障碍，他是第一共产国际破产的组织者。还有反对列宁的人，也就是你们称之的托洛茨基分子。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人都诉诸过人民群众，李可夫，布哈林，所有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你们也是。

我们党走过了60年的革命道路，它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过各种障碍和敌人，我们党战胜了他们。难道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利用空洞的革命词句来进行申诉，这些词句没有别的内容，有的只是这样的内容，即我们希望和平，而且我们想要和平，但是，在被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面前，我们被解除了武装。

正好相反，我们在武装自己，但是，我们不想把争取和平斗争的优越性，献给世界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分子，敌对力量就会捡起这个口号，并团结人民来反对我们，也就是反对我们的革命和爱好和平政策本身。

应该找到这种让人容易了解的句子。

在这方面，库西宁同志应该好好显示一下。但是，你们也不能完全依靠他，就让他干他熟悉的那方面工作。

我的想法就是这些。你们是否同意呢?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正确。同意。

---

① 指的是毫无成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1963年7月5—20日期间的莫斯科会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邓小平为首。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有：М. А. 苏斯洛夫(代表团团长)、В. В. 格里申、Ю. В. 安德罗波夫、Л. Ф. 伊利切夫、Б. Н. 波诺马廖夫、П. А. 萨秋科夫、С. В. 契尔沃年科。按照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建议，双方协议暂时停止代表团的工作，以便过一段时间继续举行会晤。自1963年9月6日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报刊《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尖锐批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原注

H.C.赫鲁晓夫：你们提交的计划，我还没有看。这只是构想。让其他人先看吧，然后我再看。你们看完之后，要研究一下，并提出准备好的材料。

РГАНИ，ф.3，оп.16，д.941，л.1-44

№25580

洛马科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希望苏联工人接替中国工人[①]

(1963年9月13日)

机　密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П.Ф.洛马科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Ю.泽登巴尔会谈记录

1963年9月13日

苏方参加会谈者：И.И.波兹尼亚克、Н.Н.伊诺泽姆采夫和В.Н.戈留申；蒙方参加者：多洛斯波拉穆。

会谈开始时泽登巴尔谈到了蒙古现在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缩减了在蒙古的工人数量。近两年来中国工人的数量从12000人减少到7000人。1964年二季度将撤走全体工人。

因此泽登巴尔请帮他解决苏联派遣苏联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并且第一批最迟于1964年第一季度到达。

……

П.Ф.洛马科

АВПРФ，ф.0111，оп.45，п.278，д.2，л.17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623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议纪要：通报中共的分裂活动

（1963 年 9 月 17 日）

摘自 C.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 年 10 月 12 日
第 742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蒙古驻中国大使 Д. 策伯格米德的会议纪要

1963 年 9 月 17 日

今年 9 月 17 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策伯格米德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因为 9 月 19 日他准备去乌兰巴托，然后，如有可能他准备去莫斯科进行身体检查，因为他在北京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病，医生不敢贸然给他动手术，而且他自己本人也不想在北京治疗（有关此事专门发给苏联外交部一份通知）。

策伯格米德请我谈谈关于中国共产党分裂活动方面的政治形势。

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情况。

策伯格米德向我表示了感谢，并说，这对他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会帮他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

会谈过程中策伯格米德想知道中国领导人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此时策伯格米德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对手，即中国领导人。他说中国领导人执行的方针是经过周密思考制定的，准备长期与苏共对抗。策伯格米德认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向斯大林以后上台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向 H. C. 赫鲁晓夫同志开火。有些人认为，也这么说，假如中国得逞可能中共和苏共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将会发生变化。可是，他强调，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策伯格米德说，假使中国领导人在与赫鲁晓夫和苏共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即使后者不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中国提出的政治路线，特别是中共在今年 6 月 14 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即使中国得以如愿，他们未必会停止对苏共的斗争，可能他们会改变他们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方法。但是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中伤苏共，降低苏共在世界舆论、共产党，首先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地位。

策伯格米德说,这纯粹是他个人的想法,他强调指出,上面所说的一切表明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它的长远目的。世界上也就是说天下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国内的一切对内对外活动都必须以它为核心。关于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策伯格米德说他对召开兄弟党大会有两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把这次大会延迟到1964年,给中国人说出全部看法的机会。一方面,这很诱惑,但另一方面,很危险。诱惑是因为中国人会进一步地暴露自己,会手忙脚乱。但另一方面,这很危险是因为他们同时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形成以北京为目标的思想一致的队伍。因此有可能,策伯格米德强调,必须召开1963年的兄弟党大会。大会前要集中火力对中国的立场、观点发动政治攻势。

听策伯格米德的发言,我感觉他觉得我们的一些演说似乎论据不足。策伯格米德特别指出,我们必须要有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材料,因为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因此最好在报刊上刊登一些依靠具体的、实质性的材料的发言。

接着策伯格米德谈了一些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局势。他明确注意,尽管过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图穆尔-奥奇尔被撤了职,但蒙古的民族主义危险还存在。因此,他提出,在北京以及整个中国大力开展了宣传内蒙古成果的运动。这里不排除,中国领导人在修建一座在方便的时候可以从内蒙古到外蒙古的桥梁。

会谈中我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所可以提出的问题中有许多问题可以从政治和理论方面展开,如果蒙古同志能写出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文章。这种题目可以用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例子来展开,这对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策伯格米德积极支持我的意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0100, оп.56, п.496, д.8, л.1-3

№25624

契尔沃年科与费伦茨会谈纪要:对中苏论战的反应和评论

(1963年9月18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2日

第743号

机　密

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费伦茨·马尔丁的会谈记录

1963年9月18日

今年9月18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费伦茨·马尔丁拜访了苏联大使馆，他谈到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陈子平，在马尔丁离开北京前的会见。

费伦茨·马尔丁注意到了越南大使的一些说法。首先，越南大使指出，他希望他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大使与大使之间，而是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谈话，不希望这次谈话是正式的、礼节性的。然后他转入共产主义与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情况，提到了共产主义世界中争论的形式问题。他特别指出，越南大使谈到了列宁当时与他的对手进行斗争的时候利用的手段。陈子平就开始详细地谈论列宁被迫与布哈林、季诺维耶夫进行的斗争。列宁进行残酷的原则性的斗争，无情地批评了自己的敌人，但同时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总是寻找一切机会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们应该学习列宁如何进行争论。"越南大使最后这么说。

然后陈子平将话题转入苏共和中共之间的争论问题上，说进行思想上的争论，甚至是斗争都是可以，而且是必需的。但是，哪怕是最重要的分歧和争论也不能影响到各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波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只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帝国主义，他接着说道，千方百计利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形势，从各方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进攻。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不是我们发动进攻，就好似帝国主义进攻我们。因此采取正确的策略，把策略结合各国实际情况是非常重要的。陈子平开始说，帝国主义总是想方设法进攻共产党，但共产党并没有时刻准备给予回击，因为他们在选择斗争形式和方法上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命运是我们的教训。

马尔丁说，越南大使表达的自己不完整而且含糊不清的观点之后，直接问马尔丁他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马尔丁好像对越南大使说，他的观点含糊不清，他，马尔丁，难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马尔丁给陈子平指出，后者不想知道50年前的国际形势和当今形势的区别。同时马尔丁也不想与陈子平进行强烈争论。马尔丁对陈子平说，越南共产党应该知道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提到过的问题的立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始至终一直支持苏共的总方针和对外政策，马尔丁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

马尔丁在说到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时，挑起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罪魁祸首的问题已经真相大白。全世界都知道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加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领导人的目的和企图。然后马尔丁问越南大使的想法，为了制止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这种有害、危险倾向的发展,为了消除社会阵营中的分歧,为了保证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应该做些什么。此时马尔丁向越南大使提起了胡志明同志在会见中共和苏共代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时所讲的话:停止争论,创造良好的气氛。马尔丁问越南大使,胡志明讲的这种气氛以前没有并且现在在共产主义世界也没有形成,这是谁的过错呢?接着,马尔丁问越南大使,说,他弄不明白,如果中国领导人站在宣言和声明的立场上,怎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提出不同的具体的政治口号和对外政策呢?谁的过错?陈子平保持沉默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马尔丁就说,大家都清楚,挑起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是中国领导人。因此看来,马尔丁强调说,召集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要弄清一个问题,谁遵守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谁违背和歪曲宣言和声明这一问题了。

陈子平对此默不作声。突然开始道歉了,因为最初提出进行共产党员式的谈话,不是大使之间会谈。最后作了马尔丁弄不懂的声明。越南大使说他十分高兴,因为越南大使和匈牙利大使之间对当今的根本问题没有任何分歧。马尔丁说,他对陈子平说,这很好,但是他没有完全理解陈子平最后所说的话。越南大使对此什么也没有说。

还要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使陈子平说,他今年24日要举行午宴,欢送马尔丁回国。这个声明是他在上面所讲的会谈之前作的。会谈之后,越南大使取消了午宴,向马尔丁道歉,说他没有时间,工作较忙,无法实现这一诺言。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6, п. 496, д. 3, л. 4-7

№25625

契尔沃年科与绍伊奇会谈纪要:中国最近向中苏边界调兵[①]

(1963年9月20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2日

第744号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姆拉登·绍伊奇的会谈记录

1963年9月20日

……

南斯拉夫代办谈到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的问题，他说，最近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中国将10个师的兵力调到南部与越南接壤的边界附近。总共有10万人左右。据说，行驶在北京-河内干线上的列车走的是边缘线的支线，借口是为了避免水灾，但这不符合实际。火车改变北京-河内干线的原因在于把大量军队调到南面。代办说，这次调防的目的是向越南北方和柬埔寨表示，中国政府对他们与南越局势的尖锐化有关的命运表示真诚关怀。大使指出，这也是对越南北方和柬埔寨的一种压力，特别在当前，许多国家对莫斯科对部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南斯拉夫代办也提到了新疆的问题。请我谈谈成千上万新疆人移居到苏联的真实情况。我把实情告诉了他。然后南斯拉夫代办援引了机密情报说，目前大量的部队被转移到中苏边界的新疆和阿穆利亚地区。该地区正在修建工事甚至在田地布雷。

……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6，д.8，л.9－10

№24295

库兹涅佐夫致波诺马廖夫报告：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1963年9月23日）

1963年9月24日

致Б.Н.波诺马廖夫：

根据约定，兹发送苏联外交部各部门就有关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所编制的资料。

B.库兹涅佐夫(签名)

1963年9月23日

1953—1963年间苏联政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对外政治活动目录

一、基 本 问 题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表关于捍卫非自治领地——巴苏陀兰①、贝专纳②、桑给巴尔、肯尼亚、斯威士兰等诸民族利益的演说(《苏联和亚洲国家》,莫斯科,1963年,第1卷,文件,第32、39、48—49、53、62、88页)。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表关于捍卫被托管地区——坦噶尼喀、卢旺达-乌隆迪、索马里、西萨摩亚、新几内亚、喀麦隆、多哥、瑙鲁、太平洋诸岛屿诸民族利益的演说(《苏联和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6、40、50、54、61、66、82、83页;第2卷,文件,第34、73页)。

苏联揭露北约的殖民主义实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莫斯科,1961年,文件,第35、64、66、93、94、95、96、99—102、110、115—119、121、128、131、144、145、147、149、169、174、175、177、184、185、197、200、204、219、223、229页;《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114、115、123、125、131、134、138、142、149、152、155页;第2卷,文件,第16、23、25、27、34、56、67、75、80、91、99、101、107、108、117、125、132、162、175、179、180页)。

1955年5月11日

——苏联政府积极评价万隆会议的结果(苏联部长会议声明——《消息报》,1955年5月12日)。

1957年2月11日

——苏联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提案:在3—5年间让如下被托管地区——坦噶尼喀、卢旺达—乌隆迪、新几内亚、喀麦隆、多哥等独立,确定上述地区获得自治权和其他被托管地区获得独立的具体期限(《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50页)。

1960年2月24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在莫斯科组建各民族友谊大学(《苏联外交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5期,第539—540页)。

1960年9月23日

——苏联政府领导人H.C.赫鲁晓夫向联合国大会第15次例会提交的提案:关于清除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3、9、10、12、27、32页)。

——苏联为落实联合国1960年12月14日颁布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权力的宣言而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02、107、108、110、117、179页)。

1962年9月21日

---

① 巴苏陀兰(Basutoland),莱索托王国的旧称。——编注

② 贝专纳(Bechuanaland),从1884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后来成为殖民地(由南非管理)。1966年独立,改名为博茨瓦纳。——编注

——苏联向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次例会提交的宣言草案：关于将裁军后节余的资金和资源用于和平目的(《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67—168页)。

1963年5月20日

——苏联政府向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希腊、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塞浦路斯、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突尼斯和西班牙等国政府建议：关于使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无核区(《真理报》,1963年5月22日)。

1963年7月9日

——苏联外交部长A.A.葛罗米柯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信,信中建议将1965年宣布为国际合作年,并指出1965年"应成为：1.完全彻底地清除可耻的殖民体系,给予目前仍承受着殖民奴役的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一年"(《真理报》,1963年7月17日)。

1963年9月

——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在亚-非团结组织执委会例会上发表的声明,苏联代表团团长在这次图尔孙-扎代例会的发言——关于苏联果断、坚定和毫不动摇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真理报》,1963年9月12、14日)。

二、近东和中东

苏联揭露了巴格达条约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35、42、46、75、90、93、95、98、103、105、110—113、115、117、128、131、145、146、149、151、161、170、171、173、174、177、178、179、181、184、200、205页)。

苏联揭露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莫斯科,1961年,文件,第35、93、95、102、131、145、149、177、200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期,第24—27页)。

1955年4月16日

——苏联外交部关于近东和中东安全的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反对在该地区建立侵略性集团,并准备为巩固该地区的和平而支持和发展与近-中东国家的合作(《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35页)。

1956年2月13日

——苏联外交部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反对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在于1956年2月1日发表的旨在干涉近—中东国家内政的华盛顿声明中打算采取的举措,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把本国军队派入该地区的计划。苏联政府宣布,其将一如既往地捍卫近—中东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坚持不干涉该地区诸国内政的政策(《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42页)。

1956年4月17日

——苏联外交部关于近东形势的声明。其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旨在制造近东地区紧张,以吸引该地区各国加入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挑起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恢复帝国主义在

近东的地位的政策;表明苏联政府准备支持联合国关于加强和巩固近东地区和平的措施和建议(《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46页)。

自1957年以来

——苏联揭露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学说"的殖民主义本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3、96、98、99、102、103、105、108—111、113、115—116、119、121、125、126、131、145—147、151、177、184、200页)。

1957年2月11日

——苏联政府就近—中东和平和安全以及不干涉该地区各国内政问题,给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建议;苏联政府还同时向上述各国转交了关于上述问题的联合声明草案(《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5页)。

1957年4月1日

——苏联外交部就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兰的百慕大会议所发表的声明,其中揭露了美国针对近东和中东的侵略性政策方针,指出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自身在该地区国家中的殖民主义地位。苏联政府重申,为了巩固近—中东地区的和平,就必须落实其以前便提出过的建议:使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近—中东地区所存在的一切争议性问题,成为四大国的共同义务,不干涉该地区国家的内政,放弃吸引该地区国家加入大国军事集团的企图,彼此放弃向该地区国家提供武器,清除在这些国家领土上所建立的外国基地,撤出外国军队,促进近—中东各国的经济发展(《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8页)。

1957年4月19日

——苏联政府建议美、英、法等国政府,发表关于谴责以武力手段来解决近—中东问题和放弃干涉该地区国家内政的声明(《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9—101、109—111、115页)。

1957年10月11日

苏共中央建议英国工党政府,声明支持苏联提出的,旨在维护近—中东和平的提案(关于英国、苏联、美国和法国发表声明,谴责以武力手段解决近—中东所存在的问题;关于拒绝干涉该地区国家的内政和彼此停止向该地区所有国家供应武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17页)。

1957年10月19日

——塔斯社关于近—中东形势的声明。声明揭露了美国对近—中东国家的侵略政策,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准备在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参加下侵略叙利亚。苏联政府重申了自己关于维护近—中东地区和平的建议,并宣称,将坚定地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和防止战争,准备以联合国的原则和目标为指导,采取措施,以制止侵略和给予被侵略国必要的帮助(《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19页)。

1957年12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给美、英、法等国政府领导人所发送的信函,其中建议,为了争取近—中东形势的正常化(各国之间)相互约定,不采取任何破坏该地区国家独立的举措,拒绝以武力方式解决与近—中东相关问题(《消息报》,1957年12月12—13日)。

1958年5月5日

——苏联外交部转交美、英、法等国驻莫斯科使馆："苏联政府就各政府首脑会议所提出问题而起草的提案。"该提案第十二条款涉及"缓和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法"的问题(关于谴责和制止破坏该地区和平的行为，关于谴责以武力方式解决争议性问题和干涉该地区国家内政，关于拒绝向该地区国家供应武器和在这些国家部署核子—导弹武器，关于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42页)。

埃及

1956年7—10月

——苏联维护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权力(《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51—56、58—66、68—69页)。

1956年9月至1957年2月

——苏联反对英、法和以色列武装侵略埃及(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61—62、64—66、70—84、86—91、96页)。

1956年11月5日

——苏联政府给英、法和以色列等国政府首脑的信函，其中严厉警告英国和法国政府立刻停止侵略埃及，并十分坚定地声称，要动用武力摧毁侵略者和恢复世界东部的和平(《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80—83页)。

1957年3月28日

——塔斯社声明：关于以色列在西方强国支持下准备再次对埃及发动新的侵略(《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7页)。

约旦

1957年4—5月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帝国主义针对约旦的阴谋(《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3—105页)。

黎巴嫩和约旦

1958年5—10月

——苏联为反对美国和英国武装干涉黎巴嫩和约旦，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筹备武装干涉伊朗和要求英美军队撤出黎巴嫩和约旦而进行的斗争(《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45—147、149、151—153、156—190、192、194、196页)。

伊拉克

1963年6—7月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为争取自身民族权利和反对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干涉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所发生事件而进行的斗争(塔斯社6月16日声明，参见1963年6月16日《真理报》；7月9日苏联政府对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政府的声明，参见1963年7月10日《真理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7月9日给安理会的信

函,参见1963年7月11日《真理报》)。

也门

自1957年起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英国侵略也门(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9、110、111、113、114、116、117、143、192页)。

阿曼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英国侵略阿曼(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8、110、111—114、116、117、143、192页)。

叙利亚

1957年9—11月

——苏联为防止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叙利亚的预谋而斗争(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9、111—119、121、124—128、131、200页)。

1963年9月3日

——苏联在安理会上否决英美起草的决议草案,后者把叙伊边境所发生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叙利亚(《真理报》,1963年9月5日)。

三、非　　洲

……①

——苏联为消除外国在非洲国家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而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1、32、33、36、62、152页;第2卷,文件,第1、2、3、16、25、27、30、33、52、67、73、75、80、85、91、92、96、99、100、101、106、107、108、110、117、124、145、146、162、165、178、179页)。

自1959年起

——苏联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关于使非洲成为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地带的提案(《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85、102、106、142页;第2卷,文件,第30、33、44、53、85、93、94、96、146页)。

1960年2月14日至12月30日

——塔斯社就法国在撒哈拉沙漠进行核试验问题所发表的声明(《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94;第2卷,文件,第33页)。

1963年5月22日

——H.C.赫鲁晓夫给非洲独立国家政府和国家首脑会议主席的电报。苏联政府在电报中声明,支持"非洲团结的思想"和为彻底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为巩固国家独立和发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日期字迹模糊。——编注

展国际合作而斗争(《真理报》,1963 年 5 月 23 日)。

1963 年 6 月 25 日

——H. C. 赫鲁晓夫给在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国际会议的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的信函,其中表示(苏联)支持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真理报》,1963 年 6 月 25 日)。

阿尔及利亚

……①

——苏联发表言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 61、62、76、94、114、116、117、126、129、137、138、139、143、192、193、197、219—222、224、229—232 页;《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2 卷,文件,第 124、140、141、160 页)。

1962 年 3 月 28 日

——苏联外交部,就法国由于苏联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而对苏联采取不友好立场所发表的声明(《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 18 期,第 172 页)。

1963 年 3 月 23 日

——塔斯社声明:谴责法国政府在位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再次爆炸一枚核武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 23 期,第 321—322 页)。

安哥拉

——苏联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2 卷,文件,第 75、80—81、132、180 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 12 期,第 26—30、46—55 页;第 13 期,第 55—56、329—339、366—372 页)。

喀麦隆

1959 年 3 月 4 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言捍卫喀麦隆人民利益(《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1 卷,文件,第 66 页)。

肯尼亚

1962 年 9 月 11 日

——苏联支持肯尼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2 卷,文件,第165 页)。

刚果

1960—1963 年间

——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刚果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1 卷,文件,第 115、121、125、131、133—134、138—141、149—156 页;第 2 卷,文件,第 13—14、16、23、25、28、31、34、39、41、46、51、56、57、60、67、71、95、121—122、133、164 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 23 期,文件,第 103 页)。

---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日期字迹模糊。——编注

摩洛哥

1953—1955 年间

——苏联支持摩洛哥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1 卷,文件,第 31、37、41 页)。

1956 年 10—12 月

——苏联发表言论,支持摩洛哥政府提出的关于将丹吉尔(省)与摩洛哥合并的要求(《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 67、92 页)。

莫桑比克

1962 年 7 月 27 日

——苏联支持莫桑比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2 卷,文件,第162 页)。

尼亚萨兰①

1962 年 5 月 31 日

——苏联支持尼亚萨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2 卷,文件,第147 页)。

南—北罗得西亚

1962 年 4 月 26 日和 1962 年 6 月 18 日

——苏联支持南—北罗得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2 卷,文件,第 143、154 页)。

卢旺达—乌隆迪

自 1959 年起

——苏联政府发言捍卫卢旺达—乌隆迪人民的利益(《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1 卷,文件,第 83 页;第 2 卷,文件,第 34、73 页)。

突尼斯

1953 年 10 月 23 日

——苏联支持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1 卷,文件,第 33 页)。

1961 年 7—8 月

——苏联就法国对比塞大地区的侵略而支持突尼斯(《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2 卷,文件,第 91、99、100、101、106 页)。

西南非洲

1954 年 10 月 12 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赞成将西南非洲列入国际托管体系(《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① 马拉维的旧称。——编注

1卷，文件，第35页）。

——苏联支持西南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20、178页）。

南非

——苏联反对南非共和国境内种族歧视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89、99、101页；第2卷，第97、114、175页）。

四、亚　　洲

柬埔寨

1962年8月25日

——苏联政府同意，参加柬埔寨建议的就承认柬埔寨、确保柬埔寨中立和领土完整问题而召集的国际会议(《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0期，第266—267页）。

印度

1961年12月

——苏联支持印度及其为解放果阿、达曼和第乌而进行的斗争(《真理报》，1961年12月19—22日）。

印度尼西亚

自1954年起

——苏联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争取将西伊里安岛与印尼合并的斗争(《消息报》，1957年5月21日；《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5期，第577页；第11期，第104—106页；第17期，第118—119页）。

1958年5月14日

——苏联政府就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而发表的声明(《真理报》，1958年5月15日）。

南越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反对美国干涉南越内部事务(《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8期，第516—518页；第18期，第128—130页；第20期，第14—17页）。

老挝

1954年7月20日

——五大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印度支那协议问题签字，该协议内容涉及停止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行动，从而宣告了法国帝国主义针对这些国家的殖民主义战争的结束。协议计划在上述国家中建立一个由加拿大、印度和波兰等3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停战条件的落实情况。

1959年5月至1960年3月

——苏联政府就东南亚条约组织教唆老挝政府拒绝执行日内瓦会议关于老挝问题的决议而发表言论,其中建议恢复关于老挝的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并召集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参与国的会议,以研究老挝的局势(《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期,文件,第198页;第3期,文件,第173、244页;第4期,文件,第9、101、131、158、352页;第6期,文件,第18页)。

1960年9—12月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谴责美国政府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站在叛乱者立场上干涉老挝内政和反对宣布打算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以梭发那·富马为首的老挝新政府(《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9期,文件,第90页;第10期,文件,第299页)。

1960年12月至1961年4月

——苏联政府建议,召集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参与国的会议,以研究由于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站在叛乱者立场上对老挝内政的干涉而导致的该国当前的形势,恢复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委员会的活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0期,文件,第340页;第11期,文件,第51、52、53、54、55、56、75、88、92、204页;第12期,文件,第114、213页)。

1961年5—6月

——苏联代表团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调解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提出: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草案,关于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撤离老挝领土以及关于国际委员会的权力等内容(《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3期,文件,第69、150、272、306页)。

1962年7月23日

——苏联政府与1961—1962年间老挝问题调解国际会议的参与国一起签署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0期,文件,第36页)。

1963年2月

——苏联-老挝联合公报以及Л. И. 勃列日涅夫在老挝国王访问苏联期间所发表的讲话,其中指出,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援助老挝,坚决捍卫其自由和独立,并使其免受任何侵犯(《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第199—201、204—205、214—218页)。

1963年5—9月

——老挝问题调解国际会议两主席之一,苏方主席给老挝联合政府总理以及1962年日内瓦协议参与国政府和老挝问题国际委员会主席所发送的信函草案,内容涉及必须停止外国干预和老挝局势的正常化(《真理报》,1963年5月11、18、30日;6月21日;9月7日)。

五、拉 丁 美 洲

古巴

1960年7月16日

——塔斯社声明：如果古巴遭到武装干涉，苏联人民不会坐视不管；苏联将凭借自己的实力给予古巴必要的帮助(《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8期，第270—275页)。

1961年1月4日和13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表保卫古巴共和国的言论(《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1期，第21—32、152—153页)。

1961年4月

——由于古巴受到武装入侵，苏联给予古巴人民支持(《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2期，第266—268、283—287、289—300、315—326、336—350页)。

1962年9—11月

——鉴于美国针对古巴的侵略政策，苏联政府消除因此所导致危机的活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1期，文件，第76、91、135—140、142、144、147、148、149、150、151页；第22期，文件，第1、11、16、17、21、125、133、139、155、158、159、162页)。

1963年3月29日

——H. C. 赫鲁晓夫给拉丁美洲与古巴团结大会的贺词。其中宣称，苏联人民将一如既往地与革命的古巴在一起，始终不渝地帮助古巴人民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第331—332页)。

1963年4月28日至5月23日

——苏古联合公报和苏联政府领导人H. C. 赫鲁晓夫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期间的讲话，其中指出，苏联人民将始终如一地与古巴人民在一起(《真理报》，1963年4月29日和5月25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61年12月5日和7日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就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内政问题给安理会的信函和声明(《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6期，第296—302页)。

危地马拉

1954年6月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政府在美国的挑唆和指使下对危地马拉所实施的侵略(苏联代表察拉普金6月20日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6月22日《消息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6月24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1954年6月26日《消息报》；苏联外交部长6月25日给危地马拉外交部长托里斯里奥的信，1954年6月26日《消息报》；苏联代表6月25日在安理会上的发言，1954年6月27日《消息报》)。

1963年9月20日

附件:

与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相关的资料

1. 苏联坚决反对把和平共处理解为:维持国家内部的某种“原状”和拒绝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在一系列针对苏共的诬蔑性攻讦中,中共领导人的主要谬论之一在于,苏联所执行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似乎意味着其忽视了(忘记了)各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并号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和平共处。

这里不妨指出,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的有意曲解,实质上与帝国主义集团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解没有任何区别。虽然后者一直无法成功地把这一错误的概念在各依附性国家人民和被自己奴役者中间传播。

在与苏联政府接触的过程中,美国上层国务活动家们曾不止一次建议苏联,保证苏-美两国在如下基础上和平共处,即苏联同意维持世界现状(不为维持世界现状制造障碍),放弃对解放运动的支持。

苏联不仅要坚决地驳斥美帝国主义的类似企图,而且还要不遗余力地强调,并不是苏联应放弃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而是美国应当停止干涉世界各民族奋起反抗自己压迫者的事务。

这方面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1961 年 6 月,苏联政府领导人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维也纳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会见。当时,美国总统的观点便遭到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激烈、毫不妥协的反击。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赫鲁晓夫同志 1961 年 6 月 15 日在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演讲中是这样描述的:

“与肯尼迪总统的交流表明,我们对国家间和平共处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总统讲话的意思可归纳为:应想办法阻止民族运动在本国建立某种不利于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的制度。

如果双方同意这一观点,(苏-美两国)就需要签署一个协议并承担对其他国家实施监督的义务;不允许对现有制度作任何变更,即使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话,某些国家的民众想要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那就绝对不能容许。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我们(苏联)是绝不会接受的……”

2. 苏联利用联合国组织为清除殖民主义和保卫已获得解放国家的民族独立而斗争

自联合国建立初期起,苏联便开始在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中进行紧张的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世界所有民族的独立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为了立即给予各殖民地国家、被托管和其他非自治地区的人民完整的独立,并使其能够自由地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为了更迅速而彻底地根除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的总辩论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宣称：

“我们向各殖民地人民为反对殖民者和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神圣斗争致敬。如果殖民强国继续无视理性的呐喊，继续顽固执行自己以往的殖民政策，继续压迫殖民地国家服从自己，那么那些反对殖民制度的国家，就应当全力帮助斗士们去争取自身的独立，反抗殖民者和殖民奴役；必须从道义、物资等方面，去帮助各民族为争取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神圣和公正的斗争。”(参见《1946—1962 年间苏联与非洲国家》文件集，第 2 期，第 18 页)

1960 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上，苏联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发出呼吁，号召永远结束可耻的殖民体系。在苏联的倡议下，1960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给予各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宣言。

在为落实该宣言诸原则而进行着坚持不懈地斗争的同时，苏联还建议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例会，讨论关于如何具体落实该宣言诸原则的问题，因而最终成立了监督宣言落实情况的特别委员会。1962 年，该委员会根据宣言的要求研究分析了 12 个殖民领地的局势，1963 年——14 个殖民领地。

在该宣言通过之前，世界上共有 92 个殖民地、被托管和其他非自治地区，总面积 1 402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8 400 万；在宣言通过 2 年半之后，已有面积 4 055 万平方公里，人口 3 900多万的殖民地和被托管地区获得解放。这一时期，在非洲出现了如下一些新国家：塞拉利昂、卢旺达、布隆迪、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在亚洲——科威特；在加勒比海——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大洋洲——西萨摩亚。1963 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使西伊里安岛回归祖国。多灾多难的肯尼亚人民也临近获得国家独立。

在特别委员会中，苏联多次发出倡议，并坚持通过相应的决议，其目的就是要尽快使那些目前仍处于殖民压迫之下的国家和民族获得独立。该委员会里的苏联代表，不遗余力地揭露西方强国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其不情愿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落实宣言所规定的条款。苏联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中的活动，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苏联都是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旗手。

苏联还广泛利用自己在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权力，维护各不同民族的利益，以使其避免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干涉、侵略企图和公开侵略活动的伤害。在最近几年间，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已近 10 次利用常任理事国表决原则，否决其通过旨在以阻碍世界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和加强殖民者立场的决议。苏联利用否决权的具体事例如下：反对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2 次)，各殖民强国针对刚果的挑衅行为(4 次)，美国和英国针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侵略措施以及在审议一系列由于西方强国的侵略性政策所产生的问题的过程中。

不论是在联合国内部，还是在联合国之外，苏联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一直得到坚持自身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的各民族的深切同情。这些国家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均认为，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比如，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 年 2 月，当涉及苏联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原则的问题时便宣布，这些原则“已使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转变为一个坚持的、始终不渝的……人权捍卫者和各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参见《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176 页)。

加纳总统 K. 恩克鲁玛于 1961 年 7 月宣称,“如果没有苏联,非洲摆脱殖民枷锁的解放运动必将经受全面残酷而粗暴的武力镇压”(参见《苏联与非洲国家》,第 360 页)。

3. 关于苏联支持亚非国家的中立

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不可估量的帮助还体现在,苏联政府支持年轻的亚-非独立国家所坚持的中立方针,即所谓不结盟政策。中立主义(即不结盟)有利于这些年轻国家捍卫自己所赢得的民族独立成果,挫败了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将这些国家拉入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手段——即集体殖民主义的方式,进而控制这些国家的企图。中立主义(不结盟)还有助于这些年轻的、已获解放国家解决民族解放运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通过全力支持本民族经济的方式来获得经济独立。H. C. 赫鲁晓夫 1960 年 3 月 4 日在阿富汗的演讲中指出,中立政策和不加入军事同盟“有助于动员各民族力量以解决最重大的内部问题(任务)”(H. C. 赫鲁晓夫,1960 年,第 202—203 页,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第 1 卷)。

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极力反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中立方针。众所周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中立主义为“不道德的”现象。美国对印度、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就是想迫使其加入由美国主导的、于 1954 年在东南亚拼凑起来的侵略性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的支持拒绝加入军事集团的印度等国的中立方针的举措,无疑加强了民族解放运动所坚持的,反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压力的立场。

H. C. 赫鲁晓夫在 1955 年,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进行“友谊使命”访问期间宣布,苏联对中立政策持充分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与此同时,他还宣称,苏联政府赞赏印度和缅甸拒绝加入军事集团的做法。1955 年 12 月,在仰光政治会议上,当谈到缅甸政府反对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时,H. C. 赫鲁晓夫强调:“缅甸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受到了世界进步力量的赞扬。”(《友谊使命》,1956 年,第 233 页)

在 1955 年 12 月 6 日,H. C. 赫鲁晓夫和吴努的联合公报中指出:

“……应当谴责建立(军事)集团的行为,因为它会导致国家(民族)间的恐慌和不信任,只有不加入此类集团的政策,才会有助于国家之间建立互信和产生良好的意愿,从此对保障和平和安全的事业做出贡献。”(《友谊使命》,1956 年,第 250 页)

H. C. 赫鲁晓夫 1955 年 12 月 29 日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报告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的“友谊使命”的成果时所发表的声明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反响,其中指出:

“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印度领导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后者宣布,印度将在我们和其他国家之间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是真正的中立国家,并只会有助于增进我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友谊使命》,1956 年,第 355 页)

在历史性的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H. C. 赫鲁晓夫在会议报告中也表明了苏联对中立政策的支持。他在报告中强调了中立的积极意义,认为中立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了世界

广大的"区域"，正是由于一系列爱好和平的，宣布以不参加军事集团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原则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得到了成倍的加强(H.C.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党的二十大的总结报告》,第21页)。

亚非国家的中立政策，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政府和苏共的支持。H.C.赫鲁晓夫在一系列场合——在苏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讲话中，在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的友谊使命访问期间的讲话和声明中，在1960年10月13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的发言以及其他一些言论中——均强调过我们对中立(不结盟)政策的拥护。例如，1960年2月11日在印度议会会议上的讲话中H.C.赫鲁晓夫便说："印度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不断增长的威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的个人威望都是以印度政府所执行的中立政策，以与军事集团相对立的不结盟政策为基础的，这一政策中凝结着智慧和力量。"(H.C.赫鲁晓夫，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1960年，第1卷，第77页)

在给予坚持中立政策国家有力支持的同时，苏联还在其他方面发挥着影响力，如削弱西方强国的军事—政治殖民主义集团，赞成非洲多数民族国家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坚持不加入军事集团的方针。苏联的支持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致使美国政府以及紧跟美国政府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被迫在近几年间重新构建自己针对中立国家的策略路线——从公开指责中立不道德，转而保证准备在尊重这些国家的中立政策的基础上发展与中立国家的合作关系。

苏联对中立政策的支持，对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军事冲突之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西方强国急于利用中国反对印度的行动，来破坏和败坏中立政策的声誉。美国和英国也开始对印度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目的就是想把印度——如果不是形式上的，那就是实际上的——拉入西方强国在亚洲建立的军事体系。从另一方面来看，印度国内的右翼分子们，也在不断要求重新审定印度的对外政策，即要求放弃中立方针。至于中国领导人，则极力把印度的中立丑化为所谓的"欺骗"、"幌子"、"挡箭牌"等，甚至制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相互对立，而后者，众所周知，已是西方强国两个军事集团的成员之一。1963年4月，周恩来在实况采访中对巴基斯坦通讯社记者声称："……印度的和平和中立政策只是个幌子……不结盟的印度实际上已成为南亚地区最受美国赏识的'结盟'国家了。"(塔斯社，1063年5月7日第107期邮政信息简报附录，第9—10页)

在这种情况下——当反对印度中立的势力结成了一条独特的，由美帝国主义、印度国内的反动派和中国领导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之时，苏联对亚-非国家所执行的中立政策的支持便有助于他们抗衡帝国主义的压力。

4. 关于苏联政府支持已获解放民族争取统一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剩余领土的斗争

苏联政府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解放西伊里安岛屿而进行的斗争。在1960年2—3月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期间，H.C.赫鲁晓夫对在巴厘岛召集的群众集会的与会者们说道："我们——苏联人民认为，你们提出的，关于将西伊里安岛屿与印度尼西亚故土合并的要求，是完全公正和合法的，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并对你们表示深刻的同情(理解)。"

苏联与要求将西伊里安岛与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印尼人民的紧密团结还体现如下方面：一方面在道义-政治上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另一方面——广泛帮助其加强武装力量。而对此，许多印度尼西亚国务活动家，均在讲话中充满感激地提到，甚至连荷兰和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也不得不承认。

鉴于苏联政府于1962年2月9日所发表的关于西伊里安岛的声明，苏加诺总统在1962年2月12日给H.C.赫鲁晓夫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我看了苏联政府的声明。该声明坚决支持印尼人民从荷兰殖民主义的桎梏下解放西伊里安岛的斗争。我以本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对这份声明表示崇高的敬意。"苏加诺希望，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将有助于加速清除西伊里安岛上的殖民主义。

苏联政府还坚决支持印度统一本国领土上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斗争。

苏联还阻止西方强国利用安理会反对印度解放果阿和本国领土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企图。

5.（苏联）极力支持非洲国家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基础上确保非洲国家的团结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苏联都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自身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团结和统一。

苏联向1961年成立的、坚持反殖和反帝立场的卡萨布兰卡国家集团——具体包括加纳、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埃及等非洲国家——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苏联反对成立由法国政府帮助并受帝国主义控制的非洲多国联合体——非洲-马尔加什联盟。虽然关于该联盟苏联国内并未发表正式声明，但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了一系列抨击性的文章。

苏联积极评价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因为正如1963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所显示的那样，在该组织中进步的非洲政治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给这次通过了非统组织宪章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致电中，H.C.赫鲁晓夫强调：

"我们之所以赞成非洲爱国主义者的追求，不仅在于他们为了争取完整的独立而不懈斗争，还在于他们与世界上的反帝、反殖战线一道，巩固了非洲大陆所有已获解放力量的团结。"

该电报受到了非洲所有进步社会舆论的大力称赞。

在会议结束之后，H.C.赫鲁晓夫又向参与此次会议的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发送了信函，信中满意地表示："当前，在许多令人类担忧的问题上，苏联和非洲国家的立场不是完全一致，就是基本相同。"

在上述信函中还指出："苏联政府认为，此次会议的最重大成果，便是与会者就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并一致通过了该组织的宪章。该宪章所设定的崇高目标受到了苏联国内的一致赞许。"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423, л. 1 - 36

№23051

普拉特科夫致苏斯洛夫函：提交即将发表的批评中共的文章

(1963年9月2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M. A. 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M. A. 苏斯洛夫同志在双边会谈上所作发言基础上起草的编辑部文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中共领导人的分裂纲领》。此文打算发表在下一期的《共产党人》杂志上。

普拉特科夫(签名)
1963年9月24日

手写批注：

加夫里洛夫同志：请把经过少量修改的文本交给《共产党人》杂志社。向出版社表明我们的愿望，即处理文本中的重复的问题。

苏斯洛夫
1963年9月27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中共领导人的分裂纲领

是否忠诚于马列主义、忠诚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党派领导人的理论纲领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活动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我们的共同事业，都会在其对当代一系列原则性问题所持立场，在他们的方针、观念和行动上体现出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要坚决谴责中共领导人，就是因为他们正在修正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及其所确定的基本前进方向，而这些基本前进方向正是马列主义政党正集中力量为实现工人阶级最终目标而斗争的依据。

中国领导人，正越来越远地偏离了马列主义诸原则以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并相应越来越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他们极力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觊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试图向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而对那些不同意其这样做的人，便扣上“反马列主义者”的帽子。自从走上这样的道路之后，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违背自己本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始终与兄弟党团结一致，为解决所有国家共产党人的总任务而进行共同斗争。

1. 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唯一正确的路线。中共领导人的观点的政治危害极其

站不住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由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经过共同努力才制定出来的，并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性文件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在通过了该声明的由81个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会议上，所有代表团都是由各兄弟党中最具威望的领导人、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组成，因而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当时，为了协调各方观点和就所有问题达成统一立场，起草委员会和大会本身花费了近2个月时间。最终，所有党派均赞成，要一致通过一份纲领，但要同各党进行协商，得到各党的赞同，使各党无一例外都在上面签字，这样，这份纲领就可以成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党必须遵守的唯一的一部法律。

对当今的时代进行确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其中应当指出：

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就是由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两个对抗的社会制度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和殖民体系瓦解的时代，是所有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

正是基于上述对我们时代的认识，声明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力量如果能够在行动上团结一致，就可能以更少的代价和更短暂的教训，实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正如声明中所指出的，当代世界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各民族，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革命运动，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社会民主运动等必须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共同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个声明，是在总结了世界发展和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深刻分析了近几十年来世界舞台上所出现的一系列最新进步趋势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充分考虑当代特点的同时，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具体斗争纲领，该纲领认为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及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由那些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决定的。

该纲领事先便考虑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当代所有革命力量的全面发展和巩固的问题，指出了在各民族与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和将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的过程中，在全球赢得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途径，认为上述斗争进程，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即两种敌对社会体系之间经济竞争的环境中进行的。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为各共产主义党派、工人阶级、劳动者们、所有民族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当代理论分析、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斗争目标及其实现方式的、结构严谨的有机整体。这就是为何有人——如中国领导——会随意抓住该路线的个别方面并以之来反对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这样做，势必会危害到整个路线的成功实施。

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述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学说的体现，是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

运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它使得马列主义理论中一系列最重大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在革命进程中工人阶级领导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发展中的榜样的力量；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及其在当代条件下的特点和任务；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关于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等。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是一条创造性的路线，它概括和总结了各共产党的新经验和当今世界的诸多重大变化，并从这些变化中得出了一系列实际的结论。

在宣言和声明获得通过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国际事件的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

苏联共产党严格而毫不妥协地坚持共产主义党派的总路线。我们党的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宣布，苏共认为："严格遵守各兄弟党共同做出的评价和结论——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总任务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党派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共党纲包括了上述宣言和声明中所有最重要的原理和结论。例如，当前时代的性质，世界革命进程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问题，国际工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问题。正如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一样，苏共自己的党纲始终依据马列主义伟大学说，其论述与马列主义政党的集体性意见表述是完全相符的。

我们党始终坚决驳斥任何片面地重新解读宣言和声明的企图以及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质疑和擅自篡改 1957 年和 1960 年会议的原则性结论的图谋。

应当指出的是，在 1963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的信件(发表)之前，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没有引发争论。该信不仅对现有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提出质疑，而且实质上还试图以自己在"25 点"中所提出的新表述来替代现有路线。

事实上，还在 1960 年就已有迹象表明，中共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歧。但只是从 1962 年 12 月至 1963 年 1 月，中国领导人才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对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法国、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文章。尤其是在中共中央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信件发表之后，情况已变得非常清楚了。此时，中共领导人与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仅仅体现在问题的个别方面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面，而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总路线发起了进攻。从这里，我们也会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的原因，即中国领导人为何要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因为根据所有兄弟党在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达的一致观点，这次大会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解释了中国领导人对……问题的态度……①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62，л. 108－112

①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25626

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会谈纪要：罗马尼亚不赞同中共的做法

(1963年10月3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6日
第772号

与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的会谈记录

1963年10月3日

罗马尼亚大使谈到了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在罗马尼亚疗养的事。

从与乔治乌的会谈中得知,曾涌泉在疗养期间曾会见过罗马尼亚的领导人。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对曾说,罗马尼亚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共的攻击。乔治乌说,中国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们声称苏联政府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违背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和损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至少是一件不严肃的事。不会有人,也不应有人永远相信他们花费了那么多物质、时间和力量是为了证实他们在正式文件中所写的一切。中国领导人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采取另一类解决问题的方法。乔治乌说,甚至是罗马尼亚方面好像也发现,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一些他所不能同意的问题(他具体地指出了经互会中的一些问题)。应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诸如会见和会谈。

接着乔治乌问,今后应怎样发展各国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前景如何,苏共和中共的谈判将如何进行,谈判是否会进行。他似乎一边在思索,一边在说话,最后他说,应该及时召开兄弟党代表大会,但又立刻对此表示了怀疑,是否必须急于召开这样的大会,指出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主要是兄弟党代表大会在帝国主义面前、在共产主义敌人面前还未显示出强大的团结力量。如果现在就召开大会,我们之间的分歧还没有解决,未必能显现我们的团结力量。我请乔治乌认真思考自己的疑虑,我说,在当今的条件下中国挑起分裂事件,大搞派别活动,我们需要原则,需要兄弟党的斗争,需要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同时我们也强调了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性。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6,д.8,л.16-17

№25628

契尔沃年科与法特万会谈纪要：关于艾地对中国的访问[1]

（1963 年 10 月 16 日）

摘自 C.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 年 10 月 16 日
第 763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的会谈记录

1963 年 10 月 16 日

印度尼西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法特万先生(二秘)谈到艾地的北京之行很不满意,很不开心。

根据法特万所说的,艾地似乎想向中国领导人解释如何看待最近的中苏争论,争论的结果只能导致分裂。艾地感到很忧伤,他没有看到中国悬崖勒马的迹象。

艾地担心苏中两国代表第二次会见的结局和前景。艾地认为第二次会见即使举行,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位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人员说从艾地含含糊糊的说话中可以知道,北京向艾地表示,愿意提供大笔经济援助,但他不敢接受,因为如果他同意接受中国的援助,会引起苏加诺的怀疑,甚至是愤怒。

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告诉我们,艾地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好像曾试探过同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见的可能性,想借助此次机会帮助化解矛盾,停止他们之间的争辩。艾地好像想从中调解,使他们之间日益尖锐的论战停息下去。但是艾地的好意没有得到中方的谅解,他深表遗憾和忧愁。

……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6, п. 496, д. 8, л. 44 - 46

---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3734

贝内迪克托夫与鲍尔斯会谈纪要：中国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

(1963 年 10 月 18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3 年 10 月 5 日
第 855 号

机　密
文本第 4 份

与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的会谈记录

1963 年 10 月 18 日

我对美国(驻印度)大使作了礼节性的回访。

谈话是从有关中国的问题开始的。切斯特·鲍尔斯认为，再过 5—6 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必然会垮台。其理由如下：首先，该国的领导人承担的责任过多，但其能力又很有限；其次，老一辈革命者退出历史舞台，担任国家领导的都是些年轻人；最后，中国无法养活整个国家。这最后一点，鲍尔斯认为最关键。他说，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只能在粮食收获年景好时可能勉强维持国人的粮食需求，而在年景中等和歉收时就会出现饥荒，成百上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中国适用耕种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如果按人均面积计算，只及印度的 1/3，但人口增长速度却很快。为了增加粮食收获量，中国必须使用大量的化肥，但中国工业生产又无法满足其实际需要。

美国大使认为，在中国没落的情况下，苏联和美国都不应趁机染指中国。因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必然会导致世界性的冲突。那时，美国不应当利用蒋介石，因为“后者明显已经没落了”。美国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使中国保持中立，即使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保持均势。在世界各国的帮助下，中国应当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并推行温和(外交)政策。其他国家应当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应当“维持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平衡”。关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鲍尔斯将之定义为“遏制”政策。

我对鲍尔斯的以上言论及其所设置的前提提出了反对意见。我相信，中国通过兴建必要的水利工程和加强劳动的组织管理就能够使其粮食收获量翻一番。我指出了鲍尔斯陈述理论中所包含的漏洞和错误，并根据苏联政府和党的文件的有关精神，阐释了苏联对中国的立场。我表示，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根据国际社会的意见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在谈话期间，美国大使公开宣称，美国将会竭力扩大和加深中国与所有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他指出，“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美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世界强国不要再相互采取那种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行动。这里，他列举了古巴和德国问题，并认为这些都是当代最尖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命运。鲍尔斯做出如下结论：“你们可能，比如利用古巴来反对和激怒我们(美国)，也可能以此来给肯尼迪政府制造麻烦，甚至可以使伯利·戈德华特当不上美国总统。但我认为，(你们)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干。最好以协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最好以克制的态度行事。”我指出，(苏美双方)之所以能在古巴问题上达成一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苏联为了满足美国付出了许多。苏美双方都应当极力采取举措以改善该地区的状况。

在这方面，我对该地区各种反革命集团无休止的军事准备表示了担心。后者公开宣称，打算入侵古巴和推翻那里的合法政府，而所有这些集团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纵容。美国大使同意我的观点，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纵容政策是相当危险的。他说，美国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措施以安抚苏联。鲍尔斯呼吁苏美双方，在德国问题上都保持克制态度。

关于自己前不久在加尔各答发表的声明所引起的不良反应，鲍尔斯解释道，自己认为，目前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已不能定义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对某个其他国家的态度了，即他暗示，这已经不是中立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敌视态度。不过，在此鲍尔斯仍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内的其他国家，印度依然维持原来的立场，其与西方的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鲍尔斯断言，美国并不反对印度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例如，去年印度政府曾就获得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询问美国的意见，A. 哈里曼便说过，美国不仅不反对印度这样做，甚至还乐观其成。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美国大使表示希望能够再次与我见面，以便就印度局势和印-巴关系的调解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鲍尔斯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调解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印度由于担心来自两方面的攻击，而不断武装自己和为此组建 30 个师。要知道，印度国内还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 A. 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 年 10 月 24 日

补充发送材料 3 份，具体包括如下同志：A. A. 葛罗米柯、拉宾和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国大使)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6 卷，第 4103—4105 页

№138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如何应对周恩来的讲话

(1963 年 10 月 21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10 月 21 日会议第 120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波利扬斯基、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叶夫列莫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葛罗米柯、马利诺夫斯基、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

在经互会里关于古巴问题的意见发自北京的电报。[①]

应该给予驳斥和对卡斯特罗说清楚，或者，让塔斯社进行报道。

关于共产党协商会议事宜的密码电报。

H. C. 赫鲁晓夫的意见。

如果以分裂为目的的话，就应该召开协商会议(这是多列士的观点)。

比较正确的是陶里亚蒂的观点——不召开会议。

关于对周恩来演说的反应。

应该做出反应——或者是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或者是对《真理报》记者的问题给予答复，或者是给中国人写信，说：我们准备恢复经济和贸易关系，或者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信。

最好是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积极的立场出发，不能带有论战的性质。

РГАНИ, ф. 3, оп. 16, д. 948, л. 19 - 19об

№207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会议而采取的措施

(1963 年 10 月 2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10 月 23 日会议

---

① 大约从 1963 年开始，古巴代表作为观察员，被邀请参加了几次经互会在布拉格召开的会议。——原注

第120号记录第33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报纸《参考消息》歪曲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而采取的措施。"

绝　密

1. 批准给苏联驻哈瓦那大使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一和附件二)

2. 批准塔斯社的消息报道草稿(附件三)①

附件一：

就中国《参考消息》报转载英国《金融时报》和德国《明镜》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一事给苏联驻哈瓦那大使 **А. И.** 阿列克谢耶夫和苏联驻北京大使 **С. В.** 契尔沃年科的指示。

第120号会议记录附件

不晚于1963年10月23日

优先发送

哈瓦那

苏联大使

抄送：北京，苏联大使

请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会谈，根据受到的委托，向他作如下通报：

中国半公开性质的报纸《参考消息》，于10月12日和16日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和西德《明镜》(10月16日)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的歪曲报道。西欧的这些反动报道指出，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好像对古巴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古巴对苏联援助的使用"没有效率"，批评古巴和中国"互相调情"。这些报道然后指出，在这次经互会会议上，古巴好像被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古巴加入经互会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援助的使用。

西欧的这些歪曲报道被中国的《参考消息》转载。这些歪曲报道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破坏经互会的活动，使中国舆论界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古巴进行的援助产生错误的认识，激发古巴人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信任和不友好的情感，并给这些国家同古巴的关系带来危害。

当然，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杜撰的以及得到中国报纸迎合的这种言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这些歪曲报道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些报道如此迅速就被中国的报

---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纸转载,这说明,这些文章或许就是由中国授意的,这种方法早就被人们所知道了,为了掩盖真正的作者,是经常会采取这种方法的。

请向卡斯特罗转交塔斯社通讯报道的如下文本:

“完全是为了挑拨的歪曲报道。

莫斯科,10月(塔斯社)。今年10月10日英国的《金融时报》、10月16日西德的《明镜》上发表了关于所谓《经互会秘密会议》的报道。报道说这次会议好像讨论了古巴方面提出的,关于对其进行经济援助的请求。上述报道甚至列举了《辩论的材料》,旨在对事实进行歪曲,目的是要在苏联和古巴的关系中、在加入经互会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古巴的关系中投下阴影。

根据塔斯社得到的确切消息,《金融时报》和《明镜》的报道,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杜撰,是愚蠢的歪曲报道。

应当注意,一些国家转载这些报道,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挑拨。”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附件二:

关于中国《参考消息》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一事给苏联驻北京大使C. B.契尔沃年科的指示。

第120号会议记录附件

不晚于1963年10月23日

优先发送

北京

苏联大使:

根据给您的给驻哈瓦那大使的指示的副本(以单独电报发出),请与古巴驻北京大使见面,并与他进行谈话。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197,л. 121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198,л. 51 - 52、53

№2192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问题

(1963年10月22日)

苏共中央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国际部、苏联外交部“关于中国报纸《参考消息》歪曲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1963年10月22日

绝　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北京大使通报说(今年10月18日从北京发来的电报)，中国半公开性质的报纸《参考消息》于10月12日和16日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和西德《明镜》(10月16日)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的歪曲报道。西欧的这些反动报道指出，在这次会议上，好像讨论了由于古巴遭受自然灾害而向其提供援助的问题，向其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报道说，会议上苏联代表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好像对古巴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古巴对苏联援助的使用“没有效率”，批评古巴和中国“互相调情”。这些报道接着指出，在这次经互会会议上，古巴好像被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古巴加入经互会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援助的使用；会议拒绝向古巴提供援助来克服自然灾害。可以认为，中国人将使古巴领导人知道《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是歪曲的报道。

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苏联外交部认为应该使苏联驻哈瓦那大使同卡斯特罗进行会谈，应该使卡斯特罗注意到，资产阶级报纸的这些报道以及中国报纸转载的这些报道都是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也应该委托苏联驻北京大使同古巴驻北京大使进行相应的会谈。同时塔斯社应发表简短的报道，对英国和西德报纸上的这些歪曲事实的报道给予简短的评论。塔斯社的这一报道的文本应转交给菲德尔·卡斯特罗。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议。

Б. 波诺马廖夫

В. 库兹涅佐夫

手写批注：

决议：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以便投票。

B. 马林

1963年10月22日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357，л. 35 - 36

№103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

（1963年10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0月25日会议第87/92г号记录

第92项　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

采纳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在塔什干开辟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时间为每昼夜1小时。

ЦХСД，ф. 4，оп. 17，д. 549，л. 27

№13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

（1963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1月10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第6项　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

H. C. 赫鲁晓夫：我认为——这已经属于波诺马廖夫同志的问题了——很明显，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现在我不是在提建议），但是，应该确定方向，以便使人们了解我们在召开共产

党会议问题上的立场。否则的话，在我们的朋友之间就会出现分歧和开始“争吵”：一些人赞成召开会议，而另外一些人则反对。[①] 我们使人们发生争吵，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表明自己的意见。这不，弗拉霍维奇[②]说：请提示一下，你们是什么立场？

我已经说过，我认为，现在坚持召开会议，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有害之外，这种会议不会产生任何其他的效果。同志们应该以此为方向，谨慎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赞成这一点，如果人们一定要坚持的话。但是，出于这种谨慎的考虑，我们认为，最好是不要急于求成。

在此，问题并不在于会议的筹备方面，现在，已经过了这种分界线，也就是就共同的行动纲领达成一致的界线。显然，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不可能再来做这项工作了。因此，现在，如果操之过急的话，这就意味着急于走向分裂，使事情发展到分裂的地步，而我们的目的恰恰是团结我们的力量。

这不，已经找到了某种论据。应该同法国人商量一下，别让他们感到伤心，因为他们是最积极的，是我们最忠诚的同志，也是在这件事上最坚定的人。因此，应该与他们商量：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同时也考虑到了，意大利和其他党也赞成这一点，但是，我们自己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Б. Н. 波诺马廖夫：也许，现在这样做是合适的，也就是给中国共产党发出信函。将向他们提出建议：停止论战一个月，也许，要根据这一点通报一下情况。

Н. С. 赫鲁晓夫：您现在总是想着这封信，关于它我们将专门谈。而关于这方面，我说，您有机会提前考虑的，现在，或许应该这样。区别在于：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因此，让人们有了悬念。

赫鲁晓夫：关于蔗糖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关于价格的问题。波德戈尔内[③]同志，我认为您关于蔗糖问题的准备工作过于缓慢。今年就快结束了，我们已经来不及瞻前顾后了，播种期就要来临了。显然，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物质方面——也就是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物质利益的制度。

波德戈尔内：一切都准备好了。

赫鲁晓夫：还没有行动，而只是准备好了。

波德戈尔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希望再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商量一下。我们打算提出关于扩大播种面积的建议，以便获得800—900万吨自己生产的蔗糖。

赫鲁晓夫：就农业问题召开中央全体会议的事情，显然，我们需要周全地考虑。我认

---

① 关于举行共产党协商会议的思想，是几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来的，最初并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在苏中辩论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将不会达到制定共同纲领的目的，而只会加剧已经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立场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1964年3月7日的信中，包含了以下内容的建议：在1964年5月，举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晤；在1964年6—7月期间，举行1960年莫斯科会议筹备起草委员会组成成员的共产党代表的会晤；1964年秋季，举行全体兄弟党的会议。——原注

② 弗拉霍维奇，1940年曾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1963年时的身份不详。——编注

③ Н. В. 波德戈尔内，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编注

为,大约在1964年2月,应该召开中央全体会议。在关于化学工作的报告中,可以稍微提及一下这个问题,而在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中,应深刻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关于化学工作的报告中,它只是一个附加的问题,而在后一个报告里,它才是主要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将是"非公开的"和"致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人的"。在这封信里,我不仅要代表我个人,而且还要代表中央主席团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者政治局委员们呼吁,不仅是对毛泽东一个人,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人说,也不仅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而且是代表我们的整个领导层,代表我们的党中央。

在这封信里应该按如下方式进行阐述: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图。如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心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的所有共产党人一样,我们非常担心:在我们之间已经有尖锐的分歧,将会削弱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而这只会让我们党的敌人以及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感到高兴(或许,没有这些华丽的辞藻,可能会顺利一些)。

我们认为,在中央委员会声明中提到的那些问题,是正确的,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利的。即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裁军的问题,等等类似的问题。因此,显然可以把他们视为我们立场的基础,但是,对此我们大概有着不同的理解。难道我们现在应该在某些细节问题上激动和进行辩论,而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感到高兴,同时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吗?

自然,我们能够理解,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所想的,但是,我认为,你们也应该理解我们的想法。最好是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这要好过于单枪匹马,我们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两党之间的争吵,给其他一些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他们显然是向你们说过,他们希望是你们的朋友,但是,这话他们也对我们说过,希望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和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军事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为什么我们要制造这些困难呢?谁需要这样呢?争吵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停止我们之间的争吵。

关于边界问题,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方面,就此问题两次提出了呼吁。你们同我们一样,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边界线是历史上形成的,边防军并没有改变他们,这些争吵只能使双方关系复杂化。这是政府方面的问题,因此,应该让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派出人员前往各地,考察和研究这些争端问题(我不知道,应该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在一封信里提出所有这些问题,或者,在一封信里提出来更好一些,因为,在我们单独写信呼吁他们停止争吵以后,又提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似乎不太正确,因此,也许,最好是在一封信里把这一切问题都提出来,以便在政府级别上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消除这个问题)。

在你们这方面,在报刊和某些活动家的演说中,都说边界是俄国沙皇改变的。但是,难道我们,共产党人,现在应该进行争吵和相互推卸我们以前政府活动的责任吗?我们不想为俄国沙皇进行辩解,他们曾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土,而我们相信,你们也不会为自己的帝王辩解的,他们也拥有俄国沙皇的性质,也为自己掠夺了许多领土。因此,难道我们现在,在以共

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在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是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而发展的最终阶段是国家意义的消亡？在这个时刻，我们却相反地表明，我们准备制造让工人阶级的敌人感到高兴的冲突(应该从容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这样的文件，以便使动摇不定的人理解这一点。

因此，应该周全地考虑一下——把这一点写进这封信里，还是单独地提出来。

请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不坚持，或许是单独地提出来，或许是写进一封信里。

米高扬：如果不是为了争吵的话，应该写进一封信里。

赫鲁晓夫：还是在两个月之前我就说过，应该写信。就拿哥穆尔卡来说吧，他问我："您是否考虑一下，恢复与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①我说："没有考虑，也不想考虑，因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哥穆尔卡自己已经考虑了关于与阿尔巴尼亚恢复关系的可能性问题。正如我所想的那样，这个同盟者，像一头山羊一样，还不知道要蹦到哪里呢。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另一封信，也就是关于给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我认为，这封信应该按如下方式去写——

亲爱的同志们，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一年对于苏联的农业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一年(理由是：这样的寒冬以及干旱的夏季)，你们的国家也同样蒙受了苦难。

为什么我们要给你们写这封信，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这样做的理由。

我们的储备粮食已经用尽，因此，当苏联农业出现这样困难的状况时，你们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你们罗马尼亚的农业，多年以来一直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你们以前请求我们提供援助，我们总是决定满足你们的要求——不管你们是按照合同范围，还是超出合同范围向我们提出请求。这样一来，就消耗了我们的储备粮，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年，为了满足你们的请求，我们拿出了最后的储备粮支援你们，我们指望能有好的收成，这样，我们不仅能够恢复，而且还能扩大自己的储备，然而，却出现了这样的不利情况，我们甚至连自己的需要都不能保证了，因此，我们立即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了1 200万吨粮食。这立即引起了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风潮。

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在购买粮食，而且在运输粮食方面，都存在着困难。

大家都清楚，我们无法再继续以这种态度对待这种情况了。因此，我们希望说明自己的观点，并认为，无论是我们国家的利益，还是你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我们这样做。也可能，在3—4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供应粮食和棉花方面，不能够再承担任何责任了，我们请求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

我们将以满足自身需要和积累一定数量的储备为出发点，这种储备不仅仅是苏联的储备，而且也是你们的，以便使我们在储备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预见到一些事情，以便使那些不

① 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的局面没有出现，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苏中冲突中，与北京站在了一个立场上，并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公开的尖锐的批评。——原注

能保证自身需要的国家,立即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以防重复我们今年出现的那种状况。

如果现在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可耕地保障程度的话,那么,它的情况是这样的:土地保障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紧随其后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其他一些国家,大致处于同等水平上。例如:罗马尼亚拥有多少可耕种的土地,那么,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也基本上是这些,但是,他们的保障程度却是不同的,收成情况也是如此,化肥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依靠其他部门,为提高化肥的生产量投入基本资金,以此来提高粮食收成,确保粮食收获总量和为储备粮的积累创造条件。不这样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并没有忽视这给你们所造成的困难。但是,现在更周全地考虑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上,粮食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要比陷入这种状况好得多。只是由于我们每年都满足你们的要求和减少了自己的储备,才落得今天这种境地,而我们寄希望于恢复储备粮,但是,事情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你们自己也要考虑一下储备粮食的问题,因为你们每个国家的土地保障程度不同,收成也不一样。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粮食收获量,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这并不是制度的关系,而是化肥的数量和质量起到了作用。

因此,我们打算给你们写这封信,并向你们说明,我们原来承担的那些责任……(没有听清),而明年我们将无法履行这些责任,因为在一年时间里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此,显然,需要的不是一年、两年和三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积累储备粮的任务,这要求3—5年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一些。因为,为此还要使化肥制造厂投入生产,拟定的灌溉工程已经开始进行。我们不愿意拖延这些任务,我们现在希望开始实现自己的计划(以上就是要说的大概内容)。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2,л. 1-34

№1385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给毛泽东的信

(1963 年 11 月 26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3 年 11 月 26 日会议第 125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

扬斯基、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葛罗米柯、谢米恰斯内、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

在给毛的信的方面与哥穆尔卡交谈时的主要问题。

可能是中央委员会写给我们党的信，但是，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把材料告知给各级党组织。或者给中国人写信，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将不进行公开的论战。

准备好给兄弟共产党的信。

安德罗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和伊利切夫同志，应该就中国问题在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言。①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8，л. 21 - 22

№25630

契尔沃年科与索苏尔巴拉姆会谈纪要：中蒙关系处于紧张状态②

(1963 年 11 月 28 日)

摘自 С. В.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 年 12 月 5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拉姆的会谈记录

1963 年 11 月 28 日

我在苏联大使馆会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他途经北京去马尼拉参加地域性的贸易会议。他主动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作礼节性的访问。陪同他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萨姆丹。

① 在 1963 年 12 月 9—13 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Ю. В. 安德罗波夫、Б. Н. 波诺马廖夫和 Л. Ф. 伊利切夫，就苏中关系问题进行了发言，阐述了双方分歧的实质。由于已经规定了单方面停止论战，没有在《真理报》上发表他们的演说稿。——原注

② 该文件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索苏尔巴拉姆强调了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援助的意义,蒙古不止一次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要求。索苏尔巴拉姆告诉我们,目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和工人有3 000名,到1964年苏联专家和工人的人数将达到8 000人,他对专家和工人的工作评价很好,特别指出,没有苏联的援助,蒙古的发展远景规划无法顺利实现。

接着索苏尔巴拉姆扼要地谈到了一下蒙中关系,他说蒙中关系很紧张,指出1964年的贸易协定尚未签订。蒙方设想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要达到1 200万—1 300万卢布,而中方认为只能达到600万—700万卢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给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马匹……索苏尔巴拉姆说,1964年的贸易最后没有谈成,这样会影响两党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国在劳动力问题方面给我们施加压力。至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中国工人人数大约有6 300人,中国政府要求我们签约,保证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蒙方不能同意,表示国际惯例中没有这种签约的先例,再说,在蒙的中国工人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所以实际没有必要签订这样的协议。中国不同意蒙方的意见,一直拖延我们提出的关于中国工人能否于1964年到蒙古参加工作的答复。

索苏尔巴拉姆继续说,我们并不排除中国要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召回自己的工人这种可能。如果工人被召回,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基本建设计划就会发生一定的困难,因为完成这些计划需要有3 000名中国工人。如果这样的话,蒙古人民共和国只得挖掘自己的内在潜力,不使国民经济受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6, п. 496, д. 8, л. 73－75

№10397

波诺马廖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言论

(1963年12月[①])

机　密

文本第17份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苏共中央书记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П 2001号

收文6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全会工作的整个过程再次表明，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带来好的成绩，并在苏联人民面前展示了新的令人鼓舞的前景。

这次全会还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表示，我们的国家满怀信心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在最新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情况是，中央全会给出了解决两项相互关联的任务——在城乡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地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

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深刻和详细的报告中，不仅苏联人民，而且各国劳动人民为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找到了新的动因。

中央全会向所有国家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提出了今后许多年的建设计划，始终不渝执行和平政策。我们，像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个政策为巩固苏联的事业服务，为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服务，为总的社会进步利益服务。

全会的工作，同我们党的全部活动一样，——这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真正的进攻，这是列宁主义在行动中的体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即解决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大家都清楚，我们走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成就俱在，社会主义的威力在增长，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但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中国活动家们，他们顽固地不想看见我们的党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实在成就，不想看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持正确的道路。

迄今，中国领导人暴露出了更多的阴谋，他们反列宁主义、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通报关于目前这方面的形势。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党和人民建设共产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同绝大多数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同心协力地行动，而这时的中国领导人正进行着反对我们的诽谤运动。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及其他同志，在6月中央全会的讲话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实质。在这次全会后发生了什么？

最近的事实表明，中国活动家们被民族主义的傲慢所迷惑，不听取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一致意见和号召。据说，他们没有回心转意，而且继续加强分裂活动。

从《苏共中央的非公开信》中你们知道,中国代表团以怎样的谣言归咎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在莫斯科 6 月双边会谈中采取了哪些卑鄙的伎俩。

苏共中央代表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建设性纲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遭到苏共中央代表团坚决反对后,停止了会晤,表现出了不想寻求化解分歧的途径。

谈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急剧地恶化了同苏联的国家关系。由于他们的原因,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正进一步减少。由于签订了《禁止在三大领域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国领导人通过可耻的诽谤运动达到了反苏、公开分裂方针的巅峰。

中国分裂分子现在主要是打击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进步力量的堡垒——反对列宁的党,反对苏联。最近数月来,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其他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文章内容粗暴地攻击我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纲领以及我们所有对外和对内的政策。中国领导人现在千方百计,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并不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而只是反对苏共的领导路线。

没有非常愤怒的感觉,就不能阅读这些充满诽谤,对我们的党以及其他兄弟党的真正立场造假的中国报刊的言论。这些言论中,还显出中共活动家们一个荒谬的阴谋——企图破坏苏联人民、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对我们的党、对中央委员会、对苏联政府以及对我们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任。

昨天在北京,在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之后,又发表了诽谤文章,反对和平共处政策,反对我党的领导。

我们可以告诉中国的活动家们:你们白费心机了。苏联和我们的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从来没有这样崇高,我们的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团结一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地团结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周围。(长时间鼓掌)我们的党和人民,整个国际工人阶级非常了解和热爱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长时间鼓掌,全体起立)……作为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因为他热诚接近人民群众,因为他不断地关心劳动人民,因为他有真正革命战士的勇气,因为他为保卫和平而忘我奋斗。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破坏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崇高威望!(鼓掌)

(一)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许多路线上开展破坏活动。现在已完全清楚他们想要什么:

——分裂列宁缔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破坏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我们的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果;

——使国际工人阶级脱离争取团结它的全部队伍，争取联合民主力量到反对垄断资本统一战线的道路，而走上宗派主义策略和“左”倾冒险的道路；

——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外政策的基础，保证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制止热核战争的方针；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于国际紧张局势并使其尖锐化，鼓吹军备竞赛。

当然，中国的活动家们不会公开讲自己的真正意图，他们举着“世界革命”的旗帜行动。但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面具。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大国主义、领导权的意图所迷惑。他们真正的计划是要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服从自己的路线和自己的狭隘利己主义利益。

如果以他们活动的基本方向来说，那将是这样的画面：

由于中国分裂分子的罪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这样的局势：自成立以来它的团结便受到威胁。从北京发出激烈的攻击，反对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决定的、协同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各共产党的实际工作遭受直接的损失，因为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反对争取和平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劳动人民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国领导人把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解决的问题强加于争论，诱使革命政党的力量离开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共的活动家们，对其他共产党的利益一点也不关心，以大肆叫嚣的批评猛烈抨击其他共产党，他们力图使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失去信用，破坏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望。

例如，北京活动家们为什么要指责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

首先，是因为这些党派全力加强自己民族与苏联的团结；其次，他们积极动员本国民众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并赋予工人、全体劳动者反对垄断独裁和政治反动派的日常斗争以重要意义；再次，他们与社会主义者和整个工人运动保持了行动上的一致；最后，在为自己国家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同时，他们不听从北京活动家们的“建议”，而是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准备采取任何斗争方式，其中不排除和平斗争方式。

那么，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事实上，在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情况下，中国活动家们根本无法提出任何积极的纲领性意见，实际上他们谴责任何一项能保证建立反垄断资本的统一阵线，换句话说，也就是能保证组建和训练革命政治大军的现实活动。

在自己的诬蔑行动中，中国的宣传机器竟堕落到了如此下流的地步——借鉴了(敌对势力)反共产主义武器库中的一些惯用伎俩。例如，他们所谓的“莫斯科的手杖”的说法，意思就是说，似乎只要这个手杖一挥，其他共产党派别便一会儿向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向另一个方向。北京的这一说法不是别的，而正是老一代资产阶级关于“莫斯科之手”的寓言的再版。这一谎言是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者们发明的。当年，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们便曾用之来反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如今，它又被北京领导人借用。北京活动家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送给我们革命

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领袖们的一份大礼。

不过,同志们,事情的实际情况已远远超出了对各兄弟党领导人的简单诬蔑。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可谓不择手段和不惜血本,他们公开从各类变节者中招募自己的拥护者以组建宗派集团,而且甚至也以某某“党派”称之。积极参与这方面活动的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如今,建立了此类“党派”和集团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英国、美国、锡兰、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有这些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叛徒们均高喊,自己将依靠中共反对苏联和本国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则称之为所谓“真正的革命者”并在北京热情地招待这些人。

那么,究竟有哪些人享受到了如此的殊荣呢?例如,在瑞士宣称自己为“真正的共产党”的叛徒集团只有5名成员。中国代表立刻接纳了这些人,并向其提供了印刷机。如今,该集团以“党”的名义出版了大量的诬蔑性传单。在澳大利亚,亲中国集团只有2名成员,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名义发行了机关报。在英国,当一个月以前14名夸夸其谈者所提出的亲中国观点被基层党组织否决后,又在一个啤酒馆完全依照北京口气粗制滥造了一份宣言。

在与到访中国的共产党人会谈时,北京领导人极力促使其反对苏联及其本国的共产党,甚至连前不久才从监狱中获释的溥仪——前满洲皇帝也参与其中。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今又“嚣张”起来,他在接见外国代表时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而“苏共领导人则是修正主义者”。由此看来,中国活动家们在干部方面的问题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们竟找了这样一个“大人物”来鉴别事关列宁主义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的对外宣传,服从于宗派斗争的目的。现在北京电台昼夜不停地用数十种外语进行广播。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图书市场堆满了有关中国的资料。

资产阶级圈子毫不掩饰、兴高采烈地去迎接连续不断运来的北京宣传品。这些宣传品甚至在西德、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在许多反动制度下的拉美国家,就是说,在那些一般禁止社会主义国家图书进入的地方广泛散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用意是清楚的。他们企图造成这样的假象,各个国家所有的“政党”都拥护他们。同时,他们加紧说服那些政治上不成熟以及那些因其他原因能够接受中国主张的政党领导。除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外,他们成功地影响了日本共产党领导的立场,还有新西兰共产党。顺便说说,它总共只有600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部分领导越来越陷入亲华立场。侨居北京并早已脱离本党和本国人民的缅甸、马来西亚和泰国共产党的活动家们随着中国之声附和。一年来,自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宗派小组和政党而开展公开的斗争之日起,与这个时期之前相比,他们其实一个人也没有吸引到自己一方来。

中国共产党人,实质上力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础上建立宗派集团。但共产主义运动的绝大多数——约70个共产党——坚决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证实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完完全全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鼓掌)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北京培植的宗派小组，没有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生根，他们不可避免地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也要强调指出，不能把屈服于中国影响的政党领导人的立场与这些政党的共产党人和党员的立场相混淆。在这些政党内，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开始，直至党支部，有许多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的真正朋友，他们反对中国路线，反对把中国路线引入党内的人。

中国的活动家们，力图使民族解放运动归自己领导。他们到处把自己描绘为亚非拉各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现在大家多么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还是没有任何实事求是的纲领，打算帮助世界上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他们的革命斗争中取得进一步切合实际的成果。

确实，现在年轻的民族国家，已经是世界这一地区的基本力量。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取得经济独立，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最容易解决这个任务。某些国家已经按这个方向行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是批驳列宁创立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次是继续强调说，武装斗争对民族解放运动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请问，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谁?！反对奈温、纳赛尔、恩克鲁玛，反对莫迪博·凯塔还是本·贝拉以及其他为巩固民族独立，为捍卫自己国家的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但是要知道，正是当地的反动派要推翻这些政府，帝国主义集团要进行阴谋活动。结果是，中国的宣传实际上鼓励了他们。

中国活动家们现在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政策的矛头，在世界上这些地区活动特别明显。他们不害羞地放出所谓"苏联帝国主义"的谎言。中国的宣传机关和各大使馆，千方百计诋毁苏联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他们暗中对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说，不能相信"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似乎要剥削"贫穷的国家"。他们采取直接的经济压力。例如，不久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向印度尼西亚商务代表团暗示说，假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支持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斗争，那么中国可以大大地扩大对印尼的援助。

中国代表已长时间进行组建亚非拉三大洲的分立主义工会及其他联合会，按他们的图谋，这些组织必须与世界一般民主运动相对立。

大家知道，民族解放运动并非同一种类型的运动，因为有社会力量的不同成分。中共的领袖们究竟指望谁呢？虽然他们空谈革命力量，实际上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联合居心不良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种族主义分子，利用卑鄙的感情，利用民族"有色"和"白色"的差别来投机取巧。这样可耻的事，不仅对共产党人不相称，甚至对普通的诚实人——民主人士也不相称。

中国领导人在某些地方对个别活动家发生影响，但他们不能停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世界上有苏联，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有良好的作用；在年轻的民族国家有很了解自己人民利益的力量，他们已经成长，他们能看清楚中国霸权给他们带来的危险。他们已不止一次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公开谈论此事。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同已解放国家的战斗联盟坚强起来，并粉碎帝国主义者以及中国分裂分子的一切计划和打算的可靠保证。

接下来，我们谈关于国际政策的问题。中国的宣传叫嚷说：中国共产党与同它在一起的人，——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最不妥协的战士。但事情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难道中国政府在加勒比危机时刻采取的立场,证明是对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正如大家知道的,中国政府拒绝支持苏联使古巴免受美帝侵略的防御措施,与此相反,而是移山倒海般猛烈诽谤苏联。据古巴人自己承认,苏联不止一次被他们证实,苏联拯救了革命之岛。中国的活动家们不是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采取措施制止美国的侵略,拯救古巴的革命,而实质上是在背后打击一切反帝战线。

难道中国政府在印中冲突的行为,能证明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吗?中国政府在边界争议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只能为印度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效劳。

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谈反帝斗争,越来越接近巴基斯坦,这是一个反动制度的国家,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

怎样查看出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全部立场?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对《莫斯科条约》的态度实际上把自己引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集团一伙。不久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声明,他们准备即便全中国“没有裤子穿”,也要掌握核武器。事实上这一切只能促进军备竞赛,并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原子狂人。

北京对谋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反应是怎样的?在北京,人们不掩饰自己的欢悦。在北京的报刊上出现了一幅漫画,肯尼迪被描绘在血泊中,下面题词:“肯尼迪,啃泥地去吧!”要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谋杀的背后是种族主义者,是美国“疯狂的”反动军界。中国领导人因肯尼迪被谋杀而欣喜若狂,有意或无意地加入这些反动派与战争集团一伙。

最后,要讲一讲关于中国加强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密切接近的情况。帝国主义的领袖们非常明白,什么对什么有关系。我们是原来情况的证人:在北京反帝喊得越响,则越多的帝国主义政府竭力同中国建立关系。当然,“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因中国宣传的叫喊而改变,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领袖们深信中国的活动家们反对苏联,而力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并使中国同自己的关系密切。来自日本、法国、英国、西德的“大生意”代表常常到中国去。居于高位的中国活动家们在祝酒词中和报刊上慷慨地奉承和恭维的,就是那些“血腥的帝国主义”代表,并同他们联合起来经常指责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在这些生意人当中,有过去的大战犯,中国活动家们遇到他们甚至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共产党人不反对同帝国主义国家发展广泛的经济联系。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领导人这样做不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立场,而是为了使更多国家同苏联对立,并建立自己的不同国家的集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方针,实际上阻挠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力量进一步逐渐增长。这样,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在这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助长帝国主义者的声势。

例如,不久以前大家都知道,从白宫发出的指令中有这样的指示:“中苏分裂,像他们所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和自由世界。”垄断组织的报刊没有掩饰自己主人的阴谋。例如,《华盛顿邮报》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表示,“利用中苏分歧是为了西方的利益”。这就是阶级敌人评价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谓“革命斗争”的结果!

中国活动家们对外政策实践的总结是怎样的?他们越来越使自己的国家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民孤立起来,他们已经削弱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艰苦贫困和流血牺牲为代价赢得

的国家威望。关于当代基本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他们公开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同意的路线。因而他们表明，他们实际上反对和平共处的政策，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体系有力量，各国人民有能力不容许新的世界大战发生。

在刚结束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华沙会议上，中国代表不是偶然地千方百计辱骂保卫和平运动，他们路线的一个拥护者竟然达到这样程度，他当众声明："国际保卫和平运动不应以争取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目的。"中国活动家们同时肯定地说，责备他们否定和平共处是冤枉的。一切问题在于他们的立场没有原则，充满矛盾，并实际上完全归结到否定或破坏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同志们，我们讲的这一切揭露了北京当前政治方针的真实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以空话掩盖对世界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而实际上对基本的革命力量，对反帝斗争的整个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

中国领导人现在越来越多地承担贯彻自己方针的后果。在国际会议的论坛上，中国代表越来越频繁遭到坚决的反击。这明显地表现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世界妇女大会、尼科西亚亚非团结组织等会议上。华沙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刚结束，他们就对尼科西亚会议抱有特别大的期望。这些国际会议的绝大部分参与者，愤怒地批驳中国代表分裂民主的、爱好和平力量的阵线，谴责他们诽谤苏联以及攻击《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现实表明，中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猖獗的反苏宣传引起越来越大的愤懑。

还有更大的政治失败在前面等待着中国分裂分子。但是我们的党，我们国家的威望，尽管北京的宣传家们进行一切诽谤，不但没有发生动摇，反而与日俱增。(鼓掌)

坚定的，同时也是灵活的、列宁主义的苏联对外政策，已不止一次挽救世界避免热核战争，得到人类的绝大多数支持。希望遏制侵略者，制止热核战争，和平得到维护，爱好和平的人们首先同苏联联系在一起。(鼓掌)

(二)

同志们，有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国领导人这样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党同各种倾向斗争的经验，是开启我们答案之门的钥匙。

现代革命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在它将近成立前，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了对自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在最近10年内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就提出了新的任务及解决这些任务的新方法。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运动内部通常会暴露一些政治活动家的弱点，他们没有足够的无产阶级锻炼和培训，受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因此，当革命道路转折的时候，他们通常很难站稳立场。

中国领导人惯于讲革命空话的毛病，他们的自高自大，教训别人的一切语调——这都是内部思想和政治弱点的表现，他们没有能力提高面临新任务的水平，这是他们在需要解决国

内和国际重大任务面前折腾的表现。

十分明显,中共领导在国际舞台推行自己的特殊路线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相联系,即用列宁说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庸俗化”成为“三面红旗”方针的后果。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明显失败,国家好像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不是真诚自我批评地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正国家的状况,而是在对外政策上走上沙文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道路。他们企图诿过于人,竭力把自己内政失败的罪责推到苏联身上,把失败和撤退苏联专家联系起来。

我们的专家,当然不能支持强加于他们发展生产的冒险实践。他们是“大跃进”失败真正原因的无意见证人,这个失败在他们撤退前早已明显暴露出来了。至于“人民公社”的失败,把它联系到撤退苏联专家,那简直荒谬极了。因为我们的专家没有为中国的农业工作过。

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类似不配称为“解释”的荒诞无稽和骇人听闻,被民族主义迷惑的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全世界扩散这些诽谤,而且把它作为说服本国人民的基础,唆使他们反对苏联。在这种可耻的事情中,他们达到这样的程度,竟不害羞地把这些诽谤写入今年 11 月中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决议中。

民族主义——当现实打击他们的不切实际、弄虚作假的计划和口号时,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通常的靠山。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态度,他们大喊大叫的、超革命的空洞辞藻——这只能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掩饰。

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贯穿于他们的所有路线。民族主义促使中国领导人染指社会主义大家庭最珍贵的财富——苏中友谊。民族主义也是中国领导全部所谓理论的源泉,成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纲领。既是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亚非拉各国的理论;又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反对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提纲;还有从民主组织赶走“白人”代表的图谋;还有不惜任何代价得到“自己的”原子弹的志向;还有对与印度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这一切都是民族主义真实的表现。

这样,在以中国活动家们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左的”空洞辞藻为掩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

现代机会主义倾向有一系列的特点。现在,它已不像共产国际成立后的最初年代,与共产党的建立有联系。它已掌握了早已存在并取得了政权的政党领导机关。

这一流派的代表们,力图以自己的特殊思想纲领和政治方针为基础,在北京组建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流派。

这一反列宁主义的流派,有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包装——毛泽东主义。当然,这绝对不是严整的、完全的理论。(民族主义就是它的基本来源。除民族主义外,其中还强烈感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这包括“不断革命论”。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不能掩盖有明显的孔子学说烙印的思想和表达方式。)①

①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文中被划掉了。——译注

毛泽东主义的折中主义特征，给予现代托洛茨基分子越来越多的理由，热烈地支持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和观点。

毛泽东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是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化身，并直接修正它的基本原则。

真的，举他的"促进"革命论为例，他限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一种武装斗争形式，忽视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原理——这是直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修正。这里还有一系列例子——这是教条主义最坏的一种形式：重复旧的关于世界大战的表达方式，关于时代的旧定义，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旧的表达方式，等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他思想也有机地包括进去。难怪托洛茨基分子如此高兴地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路线和活动。)①

现在，中国公开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被提升到各个时代和各国人民最伟大的理论家一级。

在中国报刊上可以看到有关他的论述："毛泽东继列宁和斯大林之后，总结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来没有过的丰富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尤其是"总结了时代的一切重要的科学成果……"

所有这一切极端吹捧和夸大的真实思想何在？在于树立毛泽东的全世界领袖的地位，并提出中国领导的领导权诉求理由。

今天，中国领导人背弃自己原来对我们的党，对二十大路线的评价。对毛泽东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他烧尽了原来所崇拜的一切，而原来所焚毁的一切，现在崇拜起来。"(屠格涅夫语)

这是毛泽东观点的一些对比。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他说："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

现在毛泽东的宣传队叫嚣，似乎二十大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中国领导现在对斯大林过度赞扬，而他们对斯大林的真正态度，可以按毛泽东在1956年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的讲话来判断。他对意大利同志说："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以自己的行动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带进共产主义，呼吸这样的空气令人难受。他成为共产主义的成吉思汗。斯大林的错误更甚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是，他提出以党内特务系统为基础的政治方法，建立怀疑和恐吓的连坐方法，这种方法会使人们做出卑鄙而恐怖的行为，在工作中互不信任，使人民生活在威胁中。"

可是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怎样说的呢？现在他们虚伪地对斯大林进行颂扬，赞同他施行镇压的方法，并且声称，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意味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中国活动家们甚至肯定地说，苏联的导弹威力对保证世界和平不起任何作用。但

①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文中被划掉了。——译注

是请听,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1957年说的:“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武装到牙齿。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500公斤‘小卫星’……如果搞一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5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把苏联的强大同订立和平协定联系起来,把苏联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保护中国同中国的独立直接联系起来。

而现在中国领导人吹嘘,他们不需要苏联的支持。例如,不久前陈毅声称,不需要苏联的核威力来保卫中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要知道,假如苏联不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帝国主义者可能早已利用任何合适的情况(例如,中国领导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状况),以便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那里生活着6亿多人。

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都明白,正是苏联以自己的全部威力,保证防御能力并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三)

同志们,分析目前由于中国领导人反对我们总路线而形成的状况,我们应当完全认识清楚,强加给我们的斗争可能将是长期的。

这场斗争有着自己的特点。这是一个掌握一切意识形态手段和国家机器的执政大党的领导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领导人打着“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旗帜,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大喊大叫地把自己描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这有时可能把政治上不够成熟或没有经验的共产党人引入歧途。

当然,不应夸大中国领导人分裂路线的危险性,但也不能把它缩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害羞地在方法上,蛊惑地利用资产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加强反帝斗争的自发志向。如果不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真正目的和行为,那么可能把某些阶层的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个别队伍推向冒险的道路,从而对开展世界革命运动带来不小的危害。

我们的党竭尽全力,不容许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保证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尽我们一切所能,改正中国活动家们当前的方针。

苏共中央在这里的依据,是列宁关于政治领袖和政党的动摇性不应把千百万群众的真正利益,及各国人民的命运成为被我们排挤对象的指示。人民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巨大的反帝力量。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为了中国共产党,值得、也需要吵一会儿架。

遵循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原则,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按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不久前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去新的一封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建议发展经济、文化及其他联系。

各兄弟党在苏共中央这新的步骤中，看到了我党对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高度理解的表现，它的列宁主义英明和丰富经验的表现。(鼓掌)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自己的政策作长期打算。伟大列宁教导我们的党，要对革命运动内部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实行始终不渝的、无产阶级的策略。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中指明哪些途径？

第一，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的路线。

我们党的立场在纲领中已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苏共非常关心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不对民族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则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主要敌人，是国际反动派在其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斗争中基本的政治和思想武器，与民族主义祸害作斗争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我们的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加强同各共产党的联系。今年苏共中央接待了 90 多个兄弟党代表团。这大大地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数字。赫鲁晓夫同志尽管在百忙之中，也要同其中许多代表会晤并座谈。

国际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对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的党肩负着召开这样会议的责任。为了严肃地审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的问题，中央委员会认真地研究各兄弟党的一切意见和所有立场。它主要的目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团结各共产党，确认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总路线。

第三，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过去和将来都沿着列宁的道路——世界上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团结一致的道路前进。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民族主义迷惑中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么，用他们的话说，“天当然不会塌下来”。

在悠久的岁月中，我们的国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一直向前发展。现在，我们的力量已无比增长，我们在世界各国有那么多朋友，任何人不能遏制我们。(鼓掌)

应该说，最近，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他们遭受到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坚决回击以及中国人民对反苏方针的不满，他们力图修改自己的反苏策略。他们开始更多地夸耀自己希望维护同苏联人民的友谊，同时加强对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的诽谤性攻击。其中，去年底召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证明，他们的主要路线仍然不变。会议确定的目的不是反对反共产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借口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立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甚至没有提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

当然，我们应该向苏联共产党员，向全体苏联人民说明中国领导人路线的错误程度。特别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作用，我们进行对外联络的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已增长。他们执行责任重大的、党的委托，应当广泛和深思熟虑地宣传苏联的成就，我们的党带给苏联的伟大列宁主义真理。关于苏联政策的真理要传达给中国人民，继续在中国人民中间播下友谊的种子。特别是将来，当国内不再有毛泽东个人崇拜压力的时候，这些种子会结出自己的成果。

第四，中央委员会教导我们，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决定性贡献，在于逐渐扩

大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共产主义建设——这是苏联人民对一切现代革命力量最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党的力量——在于它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的正义性。实践和生活完全证实,正是我们路线的正义性,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政治方针是站不住脚的。(鼓掌)

每年,可以说是每一天,都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并在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面前反驳中国活动家们的论点。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说得非常好:“我们沿着伟大列宁指示我们正确的,唯一牢靠的道路前进……没有力量能干扰苏联人民达到预定的目的。”

苏共中央竭尽全力,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在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下继续前进。(长时间鼓掌)

РГАНИ,ф. 2,оп. 1,д. 665,л. 12 - 19

№10396

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裂

(1963 年 12 月[①])

机　密

文本第 15 份

苏共中央书记 Ю. В. 安德罗波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 年)12 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 П 2002 号

收文 6 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全会的会议上,已经第二次听取关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于因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情况通报。这一事实证明，苏共中央极其关心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证明伟大列宁的党对为社会主义体系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巩固而斗争的事业的高度负责。(鼓掌)

共产党员完全有理由担心最近在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情况。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关于中国领导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破坏活动。

中国的领导当然明白，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团结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是团结各国进步力量的骨干和核心。因此，他们首先主要竭力于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破坏兄弟党关系的思想基础，拆毁团结和联合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各国人民的组织政治链条。中共领导人，力图分离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实现自己长远的阴谋。

事实证明，不顾苏共中央及其他兄弟党致力于消除已发生的分歧，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近来加强了，具有公开政治斗争的性质，反对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体制定的方针。在这个毫无原则的斗争中，中国领导人不择手段。

数年前，当中共领导人以自己的特殊立场登上国际舞台时，可以表明，他们发起与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争论，纯属理论问题。例如，关于评价我们时代的特点，关于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可以表明，北京的活动家们在随便搞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但是，他们后来的行动证明，这不但是对这样或那样的理论问题的各种解释(当然，这本身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明确，在开展的论战中，谈论的是关于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路线不受中国分裂分子的恶意攻击，关于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最根本问题的政治方针。

中国领导人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击，他们的行为已经不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是越来越把意识形态分歧转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政策范畴的斗争重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公开的宗派工作。他们竭尽全力破坏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使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不和睦。中国领导人明显地执行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其队伍的方针。很明显这一切符合他们的特殊目的。

(一)

大家知道，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行为遭到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决反击。有鉴于此，中共领导人现在企图随机应变，改换策略，稍为更深地隐藏自己的真正阴谋。开始时，按北京战略家的阴谋，应当用“左”的辞藻和一点也靠不住的宝剑来表示他们的非凡勇气和革命性。近来越来越改用劝人信服的话，说中国领导始终为和平共处而斗争，说他们也没打算过通过发动战争等手段“促进”革命。总而言之，看样子已经像高

唱其他歌曲了,虽然仍明显是老调,因为中共领导人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做到,除了隐瞒自己那些引起各国人民极其厌恶和愤怒的观点和主张。

在现阶段,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策略特点之一,就是力图不惜任何代价抹黑苏联共产党,把它的政策与其他兄弟党的政策相对立,力图证明,似乎苏联在国际舞台的路线不符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中共领导人明白,我们的列宁主义党以及苏联的爱好和平与国际主义的政策,是他们走向实现大国民族主义图谋之路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力图以任何手段和方法破坏苏共的威望,削弱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影响。

与不久以前不同,那时中国宣传的火力主要集中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现在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二十大后执行的全部对内政策。中共领导无论在自己国内还是与其他党会谈时,千方百计竭力强调,似乎他们并不反对苏联共产党,只是与其中央委员及苏联政府有分歧。然而,这并不比中共领导的卑鄙伎俩更高明。不可能使始终不渝地贯彻数百万苏联共产党员大军意志的列宁主义、苏共中央委员与我们全党、全体人民相对立。况且大家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宣传对党的最高机关——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措施及文件进行攻击,反对谴责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反对二十二大通过并得到不仅全党而且全体苏联人民一致拥护的我们党的纲领。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最近的多篇文章中这样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关于苏共纲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承认,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而中共机关的理论杂志《红旗》写道:"这个纲领……是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本杂志还声称,苏联人民"背弃了共产主义的高尚理想,因为他们以物质福利的观点来解释共产主义社会"。而在这一切之后,中国领导人想让人相信他们,似乎他们更"热爱和尊敬"苏联共产党以及全体苏联人民。

很典型的是,中共领导企图把我党竭力保障苏联人民更美好的生活描绘为背弃共产主义的理想。

在这个方面,现在北京各剧场演出的话剧《雷锋》具有代表性。譬如,从毛泽东同志本人去看这话剧,就可以看出这剧本具有何等意义。这话剧的主人公直言不讳地批评人们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他在舞台对着观众说:"从前你光着脚走路,后来穿布鞋了,现在是橡胶鞋,而以后想炫耀穿皮鞋了,而且可能是长筒靴了。这样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全场活跃)

当然,我们明白,在中国现在皮靴对普通人来说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也理解中国人民经历过的困难。但是,当把困难视为理想,当以此立场企图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企图证明,只有处于困难之中并认为这是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那么,这不可能不引起任何明白人的抗议。

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在论战的怒火中"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正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在那里最大限度地完全满足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在那里每天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发挥体力和脑力的能力,保障越来越充分的自由发展。

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明白这个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关于这样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但是，他们为了宗派的、民族主义的目的，准备诬蔑苏联人民的成就——国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财富。

许多兄弟党的同志说，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近来不止一次声称，在贯彻中国方针的斗争中现阶段不应分散，而要集中力量主要打击苏联，或像他们直接讲的"擒贼先擒王"。这个策略在中共领导最近的全部的宣传和宗派工作中得到完全的证实。在中国报刊的版面，充满反对苏共和反对苏联的诽谤内容。仅在8月份，一家《人民日报》就发表了200多篇各种各样的反苏性质的材料。从11月初开始，对苏联的俄语广播从每天6小时增至9小时。

几乎每天都有从中国播放北京报刊的反苏文章，中国发言人的讲话，还有阿尔巴尼亚的以及其他诽谤性的材料。在中国共产党官方的党和国家的文件中，甚至采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三大敌人的表达方式。同时，中国刊物直接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苏联共产党人。今年10月，《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同匈牙利①报纸记者会谈时说："苏联比帝国主义更坏。"

中国领导人做出类似声明，恬不知耻地继续确认，似乎正是他们"遵守阶级立场"，"划清敌友界限"。事实上，正如事实所表明，中共领导人，不是集中火力反对帝国主义，而是掉转政治斗争战线去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

中共领导人宗派活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力图破坏我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如果以前，他们是反对那些不支持他们的路线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那么现在，他们玩弄的计谋更狡猾，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引诱，对另一部分施压，对第三部分恫吓。不久前，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彭真做出对策略路线的改变，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因此，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国家要不同对待，但主要打击核心，打击苏共……要把一个一个国家区分开来，从而达到瓦解修正主义阵营的目的。"

如果在1959—1960年，中共领导人在实行自己的特殊路线的斗争中，企图通过所谓骑兵进攻的跃进取得成就，那么现在，他们则转入了长期和顽强的围攻。他们指望长期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共领导打算经过这样的斗争，据他们说，可能持续数十年后，一部分厌倦了并退到局外，另一部分开始动摇，第三部分则完全"举起白旗"。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实行这条路线，极大地减少了同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经济联系，公然宣称，其理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反对中共的立场。不久前，民主德国在北京的大使被中国外交部召见，直接向他声明，如果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停止反对中国领导人的立场，那么"将严重影响民主德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但如此，中国外交部1963年9月5日致民主德国政府的官方照会中写道："如果民主德国确实把德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那

① 原稿将"匈牙利"手写改为"某社会主义国家"。——译注

么它理解到这个最简单的事实,应站在中共一边。”①

中国领导人对波兰和匈牙利实行了粗暴的讹诈政策。具有代表性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年9月,政治局委员朱德在与匈牙利在中国的代表会谈时声明,假如匈牙利同志与苏共路线划清界限,那么中国欢迎。假如你们,朱德威胁说,站在修正主义一边,那么我们将反对你们。②

中共领导对蒙古有特别的打算。不久前泽登巴尔同志对苏联大使说:“现在中国人一方面采取经济压力方法,把乌兰巴托铁路的运输降至微不足道的规模,减少自己的商品供应量;停止贷款援助;以中国工人的行动讹诈我们……另一方面,他们企图进行破坏苏联援助蒙古的威信,破坏我们之间关系的宣传,寄希望于在我国、在蒙古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

中国代表无耻地利用古巴的困难和复杂的局势,问题是,在那里才刚成立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中国的宣传机关(利用古巴人民的无知)③在古巴散布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苏古关系的谣言,他们肯定地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似乎打算停止援助古巴。同时,中国的宣传千方百计鼓吹中国对古巴援助的意义。

不言而喻,中国领导这样的分裂活动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应有的反击。这些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员十分明白,中国的分裂主义者要达到什么目的,要把事态引向何方,他们同时认为,必须动员力量进行反对分裂活动的斗争。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特发展的路线,煽动民族争吵和各国人民间不信任的方针以及派遣破坏组织分子到我们队伍的方针,虽然可能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最终必将遭到完全和可耻的失败。(鼓掌)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要通过互相和全面合作的努力,通过同苏联的友好,必将建成通向他们新的幸福生活道路。(鼓掌)

事件的发展越来越说明,中国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活动,直接同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实行的错误对内政策相联系,它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大家知道,所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路线导致中国经济何等的巨大失败。当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大的和落后的国家——事情是复杂的,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像列宁说的,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现在要非常重要地说明:为了什么目的在发展经济的领域采取错误和冒险的措施?中国领导人在1958年前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取得了无疑的成就后,马上进行危险的试验,使国家经济倒退了几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十分明显,中国领导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路线,试图飞跃地、一下子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超越所有发展阶段,因此声明自己要求担当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这样直截了当地说: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种,是以加速度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属于这类国家的当然是

---

① 在原稿中将最后一个句号改为省略号,并手写加上“德国统一社会党及其委员会断然拒绝这些图谋”。——译注
② 此段在原稿被划掉,代之以手写文字,但字迹不清,无法翻译。——译注
③ 括号中内容在原稿中被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译注

中国；第二种，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原地踏步的国家；第三种，是从社会主义向后转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在1958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决议中肯定地说，在中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转变可能要3—4年或5—6年。决议中还说，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了。

大家都看得清楚，“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时还有“丑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都失败了，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所谓“调整国民经济”的口号。这个运动的简单思想，实际上就是让地方干部承担犯错误的主要责任，形式上保留原来的口号，竭力掩盖放弃总方针。

早已停止了“小高炉”的土法炼钢运动，修订了随意的技术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是1958年在会议上通过投票决定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改变为通常的农业合作社，恢复了物质利益关心原则，当时中国领导人曾如此草率地嘲笑这个原则。

最近，中国领导人力图千方百计强调，他们国家的经济“已经稳定”，指出工业和农业都向前发展。但不能不看到，现在这个“发展”是在1958年的水平上开始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可悲经验的结果，使国家经济倒退到这样的水平。同志们，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由于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遭受了残酷的教训，现在从一个极端猛撞向另一个极端。

还在几年前，他们向全世界宣布宏伟的炼钢、生铁、采煤的计划数字，声称“提前工业化”——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它将于最短的期间实现。现在，中国领导违反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把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决定推迟到不确定的时间。在上述“调整”运动的过程中，基本建设企业缩减，工业发展速度急剧下降，2 000多万人从城市强迫下放到农村。

与1957年兄弟党宣言中阐明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反，中国领导人现在证明，国民经济各部门应按下列次序发展：首先是农业，然后是轻工业，最后才是重工业。现在他们总的说，工业化政策的制定要非常依赖农业的状况。假如这一切他们仅为中国设想，那是好的。这样可能会考虑，中国某些特殊条件为他们解释这样的决定。但是，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改正原来的错误，便匆忙把自己的仓促决定赋予为普遍特点，并把它作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则。

但是要知道，实质上这样对待工业化的态度意味着在同资本主义竞赛中放弃阵地，在困难面前投降，更不用说这一切不可能不削弱中国的国防力。

顺便说说，中国领导人喜欢提醒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防能力的必要性，甚至责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国防。那为什么他们自己对这个公认的最重要的任务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最近几年的时间，苏联不惜资金制造导弹核武器，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可靠的盾牌，而中国却缩减了对国防有直接影响的钢铁、有色金属以及许多其他种类的工业品的生产。无须惊奇，这样的结果，武器现代化和中国军队的装备严重地放慢了。难道这一切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防力吗？

发生理所当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领导不顾在发展经济中的一切困难，顽固地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的兄弟合作？要知道，这很明显，中苏经济和科技交流正

常化,苏联政府近来不止一次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这只能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快地扭转在经济中的大失败。

骤然看来,这是一幅不明白的景象。我国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获利较少,但它不止一次提出这样的合作建议,同时中国拒绝我们所有的建议。究竟如何解释中共领导这样的立场?只有一点:中国领导人害怕他们的人民知道关于苏联无私的、兄弟般的建议的真理,那时,他们企图归咎我们的党和苏联人民的一切卑鄙诽谤将完全粉碎。中共领导担心,同我国的合作,可能会把消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造成不可容忍环境的二十大思想清风吹到中国。在今年初的边防部队会议上刘少奇直截了当说:“现在风从西方、东方、北方和南方把铺天盖地的沙尘吹到我国,这些沙尘影响我们呼吸。如果我们同西风、东风和南风进行斗争,并学会了战胜它们,那么我们还没有学会同北风,同从那里吹来的沙尘作斗争。”①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风从北方来”的恐惧。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思想的影响下,害怕人民自觉意识的增长,他们政治积极性的提高,迫使中国领导人更紧密地关闭面向苏联的所有门窗,这样对二十大思想影响的害怕,当然不是偶然的。

同志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不能不使一切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人提出抗议。还在人民政权的最初年代,兄弟党已注意到中国领导在实践中的某些负面现象。例如,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同志太过分追求建造庞大的国家机关,尤其是强制扩大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机关。任何到中国来过的人可以观察到,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仍然明显地告知关于这方面情况的信息。那就可能明白,不要忘掉中国发展历史道路的特点。但是,无法解释的是另一点。无法解释的是,中共领导不仅没有对这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进行斗争,反而像是有意识地保存这些现象,使之适合于自己今天的政治目的。

在党内形成绝不容许流露即使最轻微批评的环境。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清洗运动”,实质上变成残酷镇压一切不同意中国领导当前政策的人。对当前中共领导政策的动摇,首先是那些同情苏联的人遭到镇压、撤职、降级或下放农村。在所谓的“改造”运动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人们因一丁点儿理由而离开家庭,被强迫派去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停发粮票。所有这一切都充当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新方法。

这是中国公民自己如何描述中国的状况。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杨乃文(Ян Най-вин)在自己的信中说,大规模地建立“思想检查”制度,定期进行检查“政治可靠性”,这是中共实行新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如被怀疑对中共领导的方针有一丁点儿不同意,”他写道,“就要遭到无穷的检查、审查和批判,直至他们真的或假的承认错误为止。这一切摧残人的生活,导致某些人自杀,在人们中产生敷衍应付、没有原则性的心理。”

然而中国领导人把这样的制度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典范,并企图把它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坚定地说,无论我们的党,无论其他兄弟党,无论何时,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接受这个社会主义“典范”。(鼓掌)我们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言嘱咐我们的无

① 在原稿中用笔钩掉了这段话的引号。——译注

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并深信，只有在贯彻他们的思想道路上才能建立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生活。(鼓掌)

(三)[①]

同志们！不能不考虑到，反对中国领导分裂路线的斗争，是在历史环境的具体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的特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增长以及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都在增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发展，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在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在增长。现在人民民主国家早已不是15—18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国家了。它们全部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了自己的经济，顺利地发展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同时，当然，加强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增长了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这些现象当然有着正面的意义，因为它建立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总的实力加强都得到保证。

但不能不看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伴随着由于克服旧的传统和观念以及从资本主义继承的旧心理而产生一定的困难，还要克服由于许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消灭经济落后而产生的困难。这全是历史造成的事情，我们正在顺利地克服成长中的困难，并将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努力继续克服。[②]

中国领导人，企图利用在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发生的客观程序，来达到自己的分裂目标。中国领导人利用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利用各国人民完全自然的对加强主权的志向，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基础，削弱它们同苏联的联系。

现在，中国的报刊广泛宣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依靠“自力更生”的提纲。我党中央已声明，假如中国领导人没有在提纲中放入以干扰国际社会主义分工并最终导致各国人民按民族分布地分离为主要思想的特别内容，那么对这提纲不作任何反对。

这样，如果用心观察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力求达到：

——拒绝各国的经济和政治联合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每一个国家孤立发展，建立以中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对抗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拒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国际经验；承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崇拜实践的合理性。

同志们，实质上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一切分裂活动以及自己的国内政策，都意味着一条放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经济竞赛的路线，意味着不相信在这场竞赛中战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性。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在两大体系竞赛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性和困难面前投降。

---

① 原文如此，未见题号“(二)”部分。——译注

② 此段在原稿中被全部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放弃”。——译注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特殊政治方针以及围绕它的叫嚣,不仅号召掩盖这个投降,而且转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失败的注意力,把这些责任推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很明显,中共中央因此不顾我们提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继续攻击我们的党。

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政策,在共产主义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以及它的大吹大擂的革命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和困难任务面前惊慌失措,否定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和纪律性,具有从一个极端猛撞到另一个极端的倾向。这一些势力,正如列宁不止一次指出,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局限性"(《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31 卷,第 128 页),具有特殊的稳定性。

共产主义运动,已不止一次遇到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潮流的代表。只要回想起关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反对 20 年代的"左"倾共产党人,反对托洛茨基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活动分子的斗争就足够了。了解这次斗争历史的人,不能不觉察到中国领导人不仅假借上述潮流中的观点,而且仿效他们的斗争方法反对我们的党。他们越深入开展自己的破坏活动,越能明显地看到,"左"的空话只是掩盖其实行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同志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问:怎能发生像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大党,带领人民走向胜利,在夺取政权后的最初年代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可能发生,像这样党的领导滑到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泥潭?

只要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国家的具体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可以获得对此问题的正确答案。20 多年来,直至 1949 年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党,吸收了数十万农民,他们曾很好地对外国奴役者,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但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本性,没有像无产阶级所固有的素质:高度的阶级觉悟、组织性和纪律性。

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事业。否则中国革命可能不会取得胜利。但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农民方面,太把农民理想化,同时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他们认为,农民是比无产阶级更进步、更革命的阶级。这样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组织规定。党的成长优先依靠农民,并长期进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1949 年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只占 2%—3%。现在,中共党员人数达到 1 800 万人,但就其构成来说,仍然是一个农民党。

只要领导政策正确,如同列宁领导的那样,在农民中普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可以不引起此类负面作用。但是,当中共领导人本身经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自己的压力时,没有同它斗争,而企图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解释中国领导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作所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领导人现在肯定地说,似乎他们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在二十大以后开始

的。实际上，在中共酝酿民族主义、机会主义以及直接反苏的情绪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还在20世纪30—40年代，所有在苏联学习过的同志在中共都遇到了不友善的对待。对在共产国际学校学习过的人，要求做出书面声明，放弃他们在莫斯科学过的一切东西。在这个时期，已经相当强烈地感到中国领导人的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那时他已经强调指出，只有中国领导人不仅能够正确了解和评估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的形势。

1949年春，中国领导人对一系列问题的特殊立场使自己感觉非常清楚，以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派米高扬，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华北西柏坡同毛泽东会谈。顺便说说，在这些会谈中，苏共中央力图说服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更多地注意在最大的工业中心，像上海这样一些城市的工作，更广泛地开展工会工作，等等。

很典型的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执政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要求苏联支持他们撤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支持中国吞并它。苏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他们，也不会同意自己这样做，虽然中国领导人从那时起不止一次重复这个问题。可以再列举其他事实，完全驳倒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他们同苏共的分歧只在二十大之后开始的论点。有一切理由证实，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主张很早以前在中共领导内就已成熟了，他们的代表者等待公开发言的合适时机。

中共领导人经常在农民中间工作，本身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一切负面后果的影响。在相当的时候，中国领导还能保持用批评的态度评价自己的工作，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毛泽东在1942年针对这个问题说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很遗憾，不得不承认，经过许多年以后，中共领导忘记了这个危险性，并容许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自己的党内占优势。

（四）

我党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常常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的。苏联共产党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诚挚的同情，敬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同志。我们坚决相信，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破坏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友谊基础，归根到底，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苏联和中国人民将一起在一个队伍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鼓掌）

苏共中央已经声明，中央委员会不会屈服于狂热的斗争，不会走上吵架的道路，不采用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斗争中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卑鄙伎俩。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苏共中央为了消除存在的分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把已开展的论战在共产党人之间可接受的框架内进行。按我党建议，今年7月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在这些谈判中，苏共代表团受中央委托，提出了一系列巩固苏共同中共两党团结的建设性意见。如果谈判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那么对此罪责完全归咎中国代表

团,它不仅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设性建议,而且竭尽全力使这次会谈失败。

你们知道,今年10月苏共中央再次提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因此,苏联的报刊停止发表论战的材料。但是,中共中央实际上又拒绝了苏共中央这次倡议。

不久以前,今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信中重新建议采取措施,必须促进中共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对此信的答复暂时尚未收到,但不能不提高警惕,中国领导人收到此信后,并没有停止在报刊上发表反苏言论。不久以前,早已是北京喉舌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在编辑部文章中,实质上对苏共中央的新建议进行攻击。与此同时,中国发表反苏文章,并在电台广播,恬不知耻地欺骗人民,肯定地认为,苏联的报刊似乎在进行"疯狂的反华运动"。

苏共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次表明世界共产主义的舆论,认为我们是按列宁的方式在对待其他兄弟党,其中包括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沉着和耐心。同时,苏共不止一次声明,它不能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切身利益的最重要原则。

最近,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同志会谈时,公开而且相当肯定地声明,他们不准备同苏联改善关系,换言之,要以我方"无条件投降"为条件。他们想要什么?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就看得清楚,他们想要我们的党把自己的政策服从于中共领导的大国意向。他们想要苏联人民恢复个人崇拜时代的制度,放弃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放弃列宁的和平共处方针。但是他们应当知道,世界上没有力量能把我们的党、我国的人民从列宁的方针指引下击退下来。(鼓掌)

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顽强地克服发生的困难,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的破坏活动,更积极地执行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坚决捍卫集体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针。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争取巩固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的斗争是严重的,而且可能是长期的。一切事实证明,中国领导人将继续顽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将企图并继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自己的宗派和破坏活动。

但是我们党的力量在于:以国际主义政策对抗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以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发展合作的路线,对抗他们使社会主义大家庭思想混乱和分裂的政策;以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策,对抗小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苏联共产党人的这一方针得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热烈支持。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指出,要最大限度地沉着,利用一切可能性,制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利用一切手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克服分歧。正是基于这些意见,苏共中央采取了行动,不顾中国狂妄的反苏运动,一次又一次建议中国领导人认清当前局势的一切责任,并制止事态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党维护和巩固团结的努力,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人民自己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强大。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越来越新的胜利。它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在全世界民主力量中赢得了空前崇高的威望。

为了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为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加强，为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大家庭——未来共产主义的文明榜样的发展和加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贡献数十年来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巩固而忘我斗争所积累的一切经验以及强大的力量。

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及其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原则的全体苏联人民的路线，我们坚定地相信，这条路线一定胜利！（长时间鼓掌）

安德罗波夫(签名)

1963年12月26日

РГАНИ，ф. 2，оп. 1，д. 665，л. 20－34

№10395

伊利切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

(1963年12月[1])

机　密

文本第16份

苏共中央书记Л. Ф. 伊利切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П 2003号

收文6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自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不同的政治和理论纲领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以来,已经过了不少时间。

开始并不完全清楚,后来越来越明确地显出中国领导人的真正政治目的,他们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战略和策略。苏共中央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遵循国际主义的最高利益和对一切革命力量团结的关注,不止一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同志式的讨论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大量的、正确的列宁语录,耐心地阐明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有根本问题的立场。

但是苏共中央以及各兄弟党的努力未能获得中国领导人的理解。

相反,最近他们强烈地开展自己的分裂活动,顽固地扩大争论的范围。更准确地说,杜撰越来越新的"有争议的问题",企图使争论尖锐化。结果,他们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文件的纲领越来越远。

当然,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偶然的错误认识,可能是个别的错误,还是摆在我们面前一定的政治和理论性质的错误体系?

现在,颁布官方声明、半官方通告之后,特别考虑到中国分裂分子的实际行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应付的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而是举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的战略和策略基础的修正,是以好战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为基础的思想体系。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行为方式说明什么?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试图从中共中央文件中,找到一点与当今所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对比具有令人信服的、合理性的论据,但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论据,甚至根本没有。看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一篇又一篇讲话,这类东西很多,但你不能摆脱中国理论家们不诚实的感觉,因为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是一回事,而所说的是另一回事。因此要说:"不知啃什么东西,但什么都没有咽下。"中国领导人的行为表明,不是对真理的关切使他们恐慌,他们不单是从事寻找以自己的"特殊"立场为论据的全部理由,而主要是发明越来越新的,攻击苏共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借口。

如果当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动甚至可能陷入错误认识,有人可能考虑过,同志们是否错了,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公开出面,修正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理论信仰相对立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包括我们时代一切基础的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当今时代的特点及其主要矛盾,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形式,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问题,等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思想政治纲领不是局部地,而是基本上在主要方面离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

现在,任何人未必能怀疑以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各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学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到思想方法乃至工作方法是发展与完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伊利切夫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人民日报》，1960 年 1 月 4 日)这种自以为是的意图，想把某种特殊的、“民族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位置上。这深深地败坏了自己的基础。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既然不可避免地像连锁反应一样产生，很遗憾，已经开始产生“印度尼西亚化的”、(“日本化的”)[①]以及其他“种类”的马克思主义。这归根到底可能将分裂分子招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它分割成个别孤立的民族中队和小队。

工人阶级、各国共产主义者只有一面理论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建立，后来经各国共产党，首先是我们的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共同努力发展的学说。(鼓掌)

我们的党过去和现在都声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按民族的分布地划分。本质上没有，也不应当有，无论是德国的，或是俄国的、中国的、印尼的，任何的其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各民族的、国际主义的学说。(鼓掌)

难道中国的理论家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则？不，假如事情真的这样，那么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按自己的想法歪曲地解释、掩盖真相，乔装打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注意到，这就是中国同志企图把它作为理论基础强加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这样，现在谈的是，不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而是要毛泽东思想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旗帜。

这些企图导致什么结果，其危害性何在？

——它导致革命理论不切实际地失去作用，为迎合恶性的政治方针而修正理论原则，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以民族主义代替国际主义；

——它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后拖，否定我党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它追求的目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绝对化，把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兄弟党。

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对先锋主义、领导权的主张以及大国主义的意图“说明理由”，他们要求对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进行修正。但是，列宁主义在本质上，在自己的特征上，是属于国际的，这不是可以利用来说明民族主义领导理由的学说。对此最可能接

①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稿中被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译注

近的是孔子学说——中国历史上特别崇敬的学说。

还在一年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警告过:

"……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宗派主义严重危险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凸显。看不见这一点,就是害怕见到事实,拒绝现实的情况,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上负有全部责任。"近来中国领导人竭力加强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他们毫无原则、造谣中伤地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这一切表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性已更加增长。

因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应正确地说:

——与教条主义、左倾宗派主义、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斗争主要方向的时期已经来到了。

(一)

最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顽强地企图掌握自己发展革命理论的垄断权,不掩盖自己奢望扮演唯一捍卫和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角色。

当你阅读中国的报刊,有时你实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断然声明到这种程度,说什么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就是在中国领导身上肩负着,在理论上领会当今时代与革命斗争经验的任务,说什么这个结论对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有着"普遍真理"的性质。

但是,要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幻想的基础之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遇到了老朋友——在各个时期打着各种牌子的修正主义。但每次都是同一目的——使马克思主义失去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以及革命的力量。如果离真理近一点,对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做这样的评价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教条主义在实际上、在实践中不是别的,而是修正主义的反面。中国理论家们,需要教条主义的帷幕,是为了掩盖其反列宁主义路线。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绝不决定于口头上的保证和发誓。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创造性,要在具体条件下善于运用。列宁在揭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原因时写道,他们"不是重复背熟的词句,而是认真地审视新的历史条件,他们深思,为什么实际生活是这个样子,他们用头脑工作,而不只是用语言"(《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16 卷,第 45 页)。

中国理论家们臆造的正统性,并紧连着不合逻辑和没有原则性的行为,这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征。

在相当的时候,北京的政策攻击列宁的和平共处主义原则。他们宣称,"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时候尚未到来",以及"说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就是欺骗劳动人民"。现在,北京深信,直接攻击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没有给他们带来声望及荣誉,而与此相反,中国的宣传退出原先的立场,现在提出另一种更加巧妙的说法。

刚出版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一文中坚信,不是

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或他们报上写的“列宁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至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和平共处政策，那么，据报上的论点，“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是“阶级投降政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叛变”。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的理论家们也做出这样的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声称，如果打原子战争，地球上死掉一半人后，人类将创造“更高的文明”。这时他们公开宣称，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指责苏共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切不可饶恕的罪行。

然而，在北京就觉察到，他们骇人听闻的声明受到普遍的愤怒。他们明白，他们作了草率的预算，迅速地改变了方针。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官方声明中表示坚信，他们也进行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虽然他们在公开的讲话中，改变了自己观点的宣传政策，但在国内的内部会议上，仍继续错误的宣传，而且，对出席这样会议的人提出严重警告，泄露信息要受到监禁。

究竟中国人民相信什么？下面就是从中国的一封来信中的真实叙述：

“根据中央领导的设想，假如战争爆发……那么这对中国没有关系。情况是这样的，当世界核战争发生时，首先灭亡的是古巴、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乃至苏联和美国。至于中国，它参与这场战争后，可能死掉一半人，但它的损失将不超过其他国家的损失，因为它还有4亿人……将能顺利地解决领土、边界以及不平等条约等一切问题。不言而喻，谁将占据剩存世界的统治地位，即使帝国主义仍将保留下来……十分明显，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对理论与众不同的态度，经常没有论证地以一种立场代替另一种立场以及虚伪等现象，不仅表现在处理对外政策，而且表现在对内政策问题的处理方法上。

有时觉得，理论对于中国领导人就像辕杆：你往哪儿拉，它向哪儿转。

在最初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调，在自己的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考虑了苏联的经验。但是，当转变到“大跃进”政策时，H. C.赫鲁晓夫早在数年前就指出这个政策没有根据，中国领导人粗暴地破坏了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原则，把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大跃进”方针失败后，宣布了新的、相反的提纲：“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

接下来，我们回想一下中国“人民公社”的历史。

当建立人民公社时，没有任何经济的合理性，当时却宣布，这是“登上天堂的阶梯”，是最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已经被忘记了，现在中国领导人仍讲人民公社，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并已回到当初的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缺乏勇气承认错误，虽然列宁教导过，善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这是严肃政党必需的特征。

“大跃进”口号发生过什么情况？

开始想2—3年内一步“跳入”共产主义，而现在深信，即使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好几十年。当然，政策中可以改变口号，比如，因经济的合理性发生变化。但是，在中国改变方针——不只是改变，每次改变都宣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不管中国理论家混乱不堪的理论钟摆摆向何方，总是被宣布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贡献，是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

还是不久前，在中国的报刊上，在官方的讲话中经常强调，运用苏联丰富的经验帮助中国人民更快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但是，从1958年开始，宣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兜售某种完全相反的论点。高傲地声明，据他们说，苏联“滞留”在社会主义阶段，在自己的发展中“停滞不前”，没有什么可向它学习。据说，中国会比苏联更早建成共产主义。藐视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经验，归根到底的结果是公开的反苏宣传。

当前，抹黑苏联社会中由于贯彻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而确立起来的所有新事物已成为中国宣传家们的家常便饭。

他们公然愤怒地对待新的苏共纲领。中国领导人对待我们国家以科学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好像把它作为对他们人身的侮辱，破坏他们威望的图谋，对他们自尊心的打击。起初，他们秘密地在自己党的队伍中，后来开始公开辱骂我们的纲领，贬低它的意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度评价新的苏共纲领，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文件，称之为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宣言。

这样的评价使中国领导人不满意。他们认为我们的纲领正是“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如果听他们的话，那么苏共无权发展列宁关于革命、国家、政党的学说。中国的鼓动家们把苏共纲领的人道主义理想革出教门，声称纲领似乎“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但是，他们指责“修正主义”显得不够，因此声称，我们的纲领导向“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

看来，状况已经到了极坏的程度。

根据中国理论家们的论点，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合乎发展规律的，不是加强人民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团结，而是内部矛盾的增长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是扩大民主，而是缩小民主；不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而是扩大困难和贫穷。据他们见解，人们因此得到“革命锻炼”。

总之，他们想以庸俗的立场来研究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共产主义运动。

不但如此，他们毫无道理地传播关于“苏联社会资产阶级蜕化”的谎言，而且他们提出这种谎言的“论据”是野蛮和猖獗的。据他们说，苏联人民“吃惯好的”，习惯于好生活，丧失了革命理想，他们关于世界革命似乎什么也不想知道，不要支援被压迫民族。在中国的报刊上，几乎看不到关于我们生活光辉一面的信息。但在我们的报刊上，只要一提到成为被告的一帮阴谋家，——中国的宣传就声称苏联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社会的发展在 1958 年已经结束了。

不久以前，我们的同志访问了北京，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北京一条热闹的街道上，举办了庆祝十月革命 46 周年的图片展览。其中广泛地反映我们国家 20 和 30 年代的事件，中国的“公社”、“大跃进”；但是讲述关于苏联人民在最近 10 年取得的成就，关于苏联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则完全找不到。甚至在那里还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全心全意提供给中国的机器，现在他们把工厂的商标都剥下了！

这样，企图使中国人民忘却苏联人民最近 10 年的劳动。

苏联人民令人鼓舞地建设共产主义。我党纲领拟定的伟大计划，是每一个苏联人的人生目的。中国领导人，把这些计划以及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事实宣称为昙花一现。现在中国的宣传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苏联人民在建设中取得成就”，但是，在建设什么？“意外”用上共产主义一词。

中国领导人口头上尊重苏联人民。

但实际上，他们内部指示，建议召开会议，每一个发言人必须在会上随便讲什么关于苏联人，关于我们国家不好的东西。中国领导人企图使苏联人民与党对立，使党与其列宁主义的领导相对立。他们描写的情况是这样的，似乎他们对苏联的党和人民怀着友好和尊敬的感情，仅对苏共领导进行斗争。但是我们自己清楚地知道，中国分裂分子反对谁：他们反对我国全体人民，反对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反对苏共中央及其列宁主义的领导。我国人民、我们的党及其列宁主义的领导是团结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破坏他们的团结！谁想打击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谁企图迫使我们放弃建设共产主义纲领，那么他将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坚决回击。

出于什么目的，中国领导人要攻击苏联纲领，反对我们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反苏运动？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这里隐瞒自己行为的真正政治动机，给他们披上伪理论的外衣。

但问题是否仅在于理论上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近年来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都失策了，现在力图把中国人民遭受困难的过失推到苏联身上，使沙文主义欲望在中国人民中炽烈起来，并在民族主义的浪峰逃避承担自己的责任。

但他们能否成功实现自己的策略，看看将来吧！

(三)

中国理论家们的两面派手腕,可能在对待个人迷信的例子中看得最清楚。他们喋喋不休地提出众所周知的某领袖,说他是“万能的”,可以随自己的意志决定历史进程。

中国领导人,力图维护很久以来树立起来的、对斯大林原封不动的声望。苏共和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时,中国代表在所有的发言中,尤其在专门准备好的讲稿中,蓄意把个人崇拜说得天花乱坠。1963 年 9 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官方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在全世界大登广告宣扬。中国作者声称:“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斯大林辩护。”

问题在哪里?

要知道,中国的政策曾完全拥护我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措施。为什么现在改变了立场?庇护个人崇拜的真正目的是极其明显的,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个人崇拜的指责,冲击了在中国建立的制度。他们认为个人崇拜正确,就是认为自己正确。他们维护声望空缺的宝座,就是想把毛主席树立在它的上面。

真的,围绕毛泽东个人所做的事情中,有许多东西很让我们想起早已翻过的历史记载。

毛泽东被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五位经典作家。中国的宣传确认: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时未能具体预见发展的整个过程。毛泽东肩负着,总结摆在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面前的,当今时代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60 年第 5 期)为了确定毛泽东是中国唯一和伟大的理论家,蓄意限制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学、党校学习“毛泽东主义”。派往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禁止听讲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苏共历史问题的课程!

人民政权 13 年来,在中国出版的列宁著作总印数约 700 万册。而毛泽东著作的印数近 4 亿册。仅毛泽东的 3 篇文章——《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总印数几乎等于所有列宁著作的印数。

背诵毛泽东的著作,像曾经背诵孔子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一样。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思想是当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如果我们能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这 4 卷,掌握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无论什么工作我们都能担得起来……我们可以说:‘读破毛著,成功一半。’如果你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可保证在工作中取得一半成就。毛主席在建设时期,除《选集》外,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这些都要认真阅读。主席还发表了 20 多首诗词。这些诗词内容深邃、激动人心,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经典结合。我建议大家把这些诗词都背出来,因为它们会自然增添力量。”(全场活跃)

下面是另一个方法。这是《劳动报》介绍的。

《劳动报》认为“三放四看”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好方法。“三放”——报上写道——这就是把一本毛泽东著作放在家里，另一本放在工具箱里，第三本放在身边。“四看”——就是开会前看，饭后看，睡前看和路上看(引起一片笑声)……遇到困难并不可怕——报上最后说——可怕的是不学《矛盾论》。(引起一片笑声)

在中国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夸张的程度。现在已不是把毛主席比作太阳，而是把太阳比作毛主席。(全场活跃)不论在幼儿园还是中小学校，在大学还是工厂，在公社还是机关，在俱乐部还是剧场，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在向人民灌输毛主席伟大这一思想。

这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有一位工人被机床切断了右手，患者被送到了医院。外科陈医生决定再植断手，发布了独一无二的手术资料，这的确是世界外科实践中的杰出成果。

但是，中国的宣传怎样报道这一事件？

当工人被送到手术台时，外科医生似乎在想：“如果我只简单地清理残余部分，那么工人就失去一只手，毛主席就失去一位为社会主义积极奋斗的战士。(笑声，全场活跃)我试试再植断手，那时工人可能留在战斗队伍里，将为毛主席的三面红旗而奋斗。”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外科医生放下手术，走去同党委书记商量。(全场活跃)书记称赞外科医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但陈医生不是前往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而是去图书馆。为什么？竟然是为了制定毛主席教导的战略计划。(全场活跃)最后外科医生开始做手术。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十分严肃的语气来叙述！

中国的宣传，把一切成就和成果都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使人牢记，如果没有毛主席，无论中国人民，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寸步难行。

“如果历史赋予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伟大使命——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报》宣传说，“那么现代历史赋予人人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更伟大、艰巨和重要的使命——促进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并彻底完成它，粉碎并埋葬可恨的、奴役人类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并消灭它的最后堡垒——美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深信伟人的力量达到这样程度，以致开始随意对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似乎他们已能完全支配这些规律。

中国人民在 1958 年提出口号：“苦战三年——幸福万年。”发展国民经济指标经过修订，翻了许多倍。这样的修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能发现了某些新的经济可能性？不，这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愿望，把客观规律服从于自己的个人意志。果然不出所料，“大跃进”没有搞成，魔幻的变化没有发生。这怎能不想起列宁关于类似情况的讲话：“假如共产党员中有人想三年内能改造经济基础、小农业的根源，那么他当然是个幻想家。”(《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32 卷，第 193 页)

主观态度也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领导人不是依据对目前时局的客观分析来评价国际形势、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方针及其实施，而是根据自己的任意评价。这种态度的结果是大家知道的。他们的分裂主义行为毫无疑问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活动复杂化，对

国际革命运动造成不小困难。

假如不是口头上,而是按事实来判断,中国领导人很少珍惜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

他们玩弄的一整套伎俩包括:使一个民族的利益与其他民族的利益互相冲突;利用解放斗争的特点作投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直至勾结反动分子、各兄弟党抛弃的叛徒以及托洛茨基败类。

他们把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推向冒险主义和孤立的道路。难道可以否定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每天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当革命形势尚未到来时号召起义,当战胜条件尚未成熟时提出革命战争的口号。假如共产党员不再为劳动人民的迫切利益,为他们的经济要求,为民主,为和平而进行斗争,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同共产党员断绝关系。

中国的政策利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民族复兴的渴望,特别尽心竭力地企图讨好他们。

列宁曾经希望,哪怕是先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它作为基地,依靠它并在革命斗争中前进。而中国的领导人现在尽一切可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各国的完整体系。

可以想象得出,假如民族解放运动离开了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会如何。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国内革命时期表现得灵活机动,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斗争方法。当需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员巧妙和坚决地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但当必要的时候,他们向国民党让步,做出妥协性的决定并达成协议。而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自己经验中的仅仅某些方面绝对化,顽固地强加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所谓“三 A”国家),号召他们只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采用暴力方法。

中国同志使自己的观点绝对化并强加于世界革命运动,明确申请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为了对此不产生怀疑,《人民日报》干脆要求:

“以毛泽东为首的思想阵地,在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体进步人类面前应担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这就是全部的意识形态,全部的世界观!

(四)

中国领导人“特殊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实质就是这样的简单。

假如这条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占优势,那么结果如何?

结果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失;世界革命运动可能误入歧途,对共产主义命运、对人类命运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帝国主义可能从中国领导人实行“特殊的”路线中取胜,而共产主义事业可能失败。

中国领导人不惜渲染,俨然把自己打扮成唯一真正的反帝战士。实际上,他们致力于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领导的“特殊路线”助长了反对共产主义的

声势。

数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宣传，企图使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信心。中国领导人的理论与实践，破坏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

中国的分裂分子，虽然他们或许不想这样做，但实际上破坏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信。

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共产主义离不开人民的幸福，需要极大地满足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而是用狂热的禁欲主义来偷梁换柱，丑化了社会主义，把人贬为自满的政治机器螺丝钉，剥夺他们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难道不是常说的反动派求之不得的东西，似乎共产主义不是别的，而是“极权主义的贫穷社会”！

在人们的思想中，共产主义会结束民族争吵与仇恨，把各国人民和民族团结到统一的国际主义大家庭。

中国领导人的概念破坏这些理想，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立，把民族间的仇恨同各国人民的博爱、平等相对立。

共产主义随时随地与在地球上终止战争并奠定持久和平联想在一起。

中国领导人号召在数亿人的白骨上建设“更高的文明”，这只有助于反共宣传，鼓吹共产主义侵略性和惨无人道的叫嚣。

苏联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是争取人类幸福新社会的化身。已经46年了，反共产主义一直力图以任何方法诽谤我们的制度，歪曲我们的目标，扑灭我国普照全世界的光辉。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方针，他们破坏苏联威信的企图，事实上与普遍的资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浪潮相联系。

同志们！我们党的中央全会讨论了H.C.赫鲁晓夫的纲领性报告。中央全会的全部工作生动地体现了管理国民经济，关心生产力加速发展及苏联人民福祉不断提高的列宁主义科学。现在每一个苏联人更清楚地感到我们的计划、我们党的纲领的现实性。

我国正在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新阶段上前进。

管理国民经济的列宁主义科学基础，是洞察社会发展规律，相信群众的创造力。明确认清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经济是保卫共产主义的决定性战场，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对国际革命起着主要的促进作用。

什么是对全世界人民崇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是提高经济潜力，提高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防力量，实际地帮助斗争中的各国人民，还是仅仅模棱两可地谈论世界革命？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不同回答，这就是分歧所在的基础。

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已有很长时间。他们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不是今天，而是许多年以前。

当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有些什么大的成就，有什么未能达到的目的？

不得不痛心地承认，他们成功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个别队伍。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受到损失。他们使个别兄弟党背离列宁主义的方针，而在某些党内使一些小组脱离党并使他们服从自己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以放肆的蛊惑行为，利用“左”的、超革命的辞藻使许多国家中不成熟、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迷惑、糊涂、思想上误入歧途，对当代重大问题的理解产生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

当然，所有这一切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小的危害。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达到他们所渴望和力求得到的主要目的。

他们未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失去斗志，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也未能把领导权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大多数共产党再次表现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的信心，维护和加强自己的队伍，在组织上团结一致，政治上凝聚高度战斗力以及准备迎接新的革命战斗。但是，中国分裂分子在追求自己的冒险性目的失败后，并未放下武器。

因此，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分裂破坏活动估计不足。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积极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捍卫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及其以 H. C. 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鼓掌)

我们的最高职责是：磨炼并完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

——就是这样一种武器，它使共产党人赢得了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就是这样一种武器，它将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

РГАНИ，ф. 2，оп. 1，д. 665，л. 35－39

№23016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

(1963 年 12 月 1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现将 1963 年 12 月 13 日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中关于苏中分歧问题一节发给你们。

我的意见是将这一节发言发给各级党组织。

如有意见，请提出报告。

H. 赫鲁晓夫（签名）

1963 年 12 月 24 日

根据法令规定，在得到该文件 6 个月后各联盟共和国

共产党中央、各边疆区和州党委——便可以就地销毁

摘自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 1963 年 12 月 13 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

我们在全会上所讨论的问题已经结束。但这里还涉及苏中分歧问题。对此，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在自己的发言中也都谈到。因而，我也想与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掌声）

在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等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发言中均阐述了一些涉及苏中分歧和中共领导人针对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立场等一些问题。

对于上述内容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呢？

首先，针对中共领导人我们打算采用认真分析双方现有分歧的方式，而不是粗鲁的谩骂。因为谩骂的做法并不是伟大的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人所熟悉的工作风格。

我们党在开展辩论的时候，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观点，从而以此来维护马列主义真理。对于我们而言，马列主义学说是高于一切的，我们将继续坚定地以这一学说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最近，人们尤其明显地感觉到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开始发生动摇，其结论也越来越站不住脚（自圆其说）。

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地分析中国领导人的错误立场。你们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央发出的一些公开信和其他文件，其中详细阐述了我们党在一系列最重大国际共产党运动问题上的立场。我只想简单地就其中一些内容谈一谈。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宣传机器每当我们中央全会举办之际都表现得特别神经质，并集中火力向苏共发难。如今，他们的做法如下：称赞苏联人民，称赞我们党，但对苏共中央，尤其是中央主席团却大肆谩骂，特别强调主席团中的赫鲁晓夫并对之步步逼进。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究竟想干什么呢？可能是妈妈的错（妈妈从小没管教好）。如果妈妈没有赋予其理智，那么谁——甚至学校，也都是不管用的（会议厅传来笑声）。因为学校不可能遗传给人们智慧，而只能起到促进其智力发展的作用。可能，这里，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也并不想为此而争论，而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中国领导人想的是：他们在即将闭幕的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中忽然看到赫鲁晓夫被赶出中央，或者其他类似的玩意儿。

针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想法,我们能说什么呢?同志们!我已是快70岁的人了。我工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党。我是否担任现在的职务是由党和人民决定的。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当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捍卫自己的党和本国人民。这就是我一直坚守的行为准则。至于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正如人们常说的,犹有余力。(全体观众起立,持续不断的雷鸣般的掌声)

我想说的是,在他们那儿,在中共领层中对我们国家的形势形成了一种非常概念化的认识。他们仍延续着个人崇拜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他是第一书记,因此便高高在上并宣布真理。我们过去的确是这样一种情况:斯大林便是真理。他虽然并不总是宣布什么,但有时会说一些被看成是规律的、不明智的话。这是我们在个人崇拜时的情况,不过现在我们已从这种情况中摆脱了出来。可中国领导人依然用个人崇拜的标准来评判我们。

对此,请允许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内战年代,我曾到过格鲁吉亚。有一次,我到了一个格鲁吉亚教堂,看到了那里所摆放的偶像——耶稣很像格鲁吉亚人。(会议厅传来笑声)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座偶像是由格鲁吉亚人画的。俄罗斯艺术家笔下的上帝也跟自己长得差不多,因为他是按照俄罗斯人的模子刻画的,正如所谓每个鞋匠都是用自己的模子来做靴子的。

与此类似,中国领导人也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苏联人的心理、政策和国内生活以及我们党的生活的。毛泽东怎么说,便怎么做。而实际上,同志们,我们如今已摆脱了那个时代,并不会再回去了。我们本身并不是真理,而是准备把问题提交大家讨论,以便通过集体的力量、智慧和经验来找到真理——这才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持续不断的掌声)

而如果问题只涉及某个人,那倒是不难解决的。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个只涉及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集体,而我——只是党的奴仆,是其政策的执行者。这一政策是根据我们的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做出的,对我们的国内外日常工作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掌声)

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们对此难以理解。而斯大林当年也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党——就是他,也只有他。

我曾经与斯大林在电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那是在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有一次在电话中问我道:

——在乌克兰西部诸州农民的份地规模有多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同志们,当时在乌克兰西部还未实行集体化。

我答道:各式各样。因为土地差异很大,土地的供应率也是不同的。在罗夫诺和沃伦州诸州——份地的规模最大,因为那里的土质都是沙土,而在利沃夫、德罗戈贝奇和捷尔诺波尔诸州——份地规模较小,因为当地的土质较好。

——那具体有多少呢?

我对斯大林说:在罗夫诺和沃伦州诸州有10—15公顷,在利沃夫、德罗戈贝奇和捷尔诺波尔诸州有7—10公顷,而在斯坦尼斯拉夫奇克州有7—15公顷。

斯大林又问道：为什么份地规模这么大？

我对他说：因为如果认为这些份地的规模大，那么许多拥有如此多的土地的农民就得被纳入富农范畴，虽然他们并没有剥削别人的劳动。我们为什么要人为地扩大此类农民的范围呢？

斯大林问：关于份地大小的问题是由谁决定的？

我答：是当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筹备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有米高扬同志，还有我。后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的提案，因而这也可看作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斯大林在电话中答道：给我把这个决议改了。

这就是个人崇拜，一个“个人”便可以“随意修改”集体的决定。这都是过去的事。如今，我们已告别了个人崇拜和当这个“个人”可以恣意妄为时期所存在的那些现象。

但在中国仍有人可以“随意修改”集体通过的决议。而有谁胆敢反对个人崇拜的恣意妄为，就将受到追究和丢官撤职。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中共曾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活动家，革命者、中共政治局委员——高岗。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甚至不及刘少奇和周恩来，更别说毛泽东了。高岗曾是一位苏联热烈的拥护者和朋友。但高岗如今何在？他在自己的家中被逮捕，然后宣布他服毒自杀了。让我们试想一下这个问题：究竟他是自杀还是被杀的呢？我们大家都晓得，在个人崇拜时期，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坚决反对类似的事件！（掌声）

苏共中央反对对那些在某些问题上持有自己的观点或者犯有错误的同志采用镇压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遵照列宁的遗训。众所周知，列宁一生曾坚决地为了党的路线而斗争，他斗争的对象包括有托洛茨基、民族主义者、右倾和左倾主义者。当年在签订布列斯特协定之时，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列宁被迫宣布，如果中央通过错误的决议，他就辞职。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列宁也没有枪毙任何一个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为了团结全党和实施党的正确路线，他开展了思想斗争。如果当时斯大林是党的首脑，那他就可能逮捕自己的对手，可列宁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即使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最初也不得不考虑列宁在自己遗嘱中所作的指示。列宁指出，斯大林可能会滥用权力，就是说斯大林可能大开杀戒。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列宁向党发出了警告。遗憾的是，中央当时并没有重视列宁的建议，相信了斯大林，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功绩方面(只注重了他的“誓言”和忠诚于列宁原则的保证)。但斯大林欺骗了共产党员们的信任，他消灭了许多诚实的，坚持原则的人们，而到了晚年自己也完全变成了一个病态、多疑、刚愎自用的人。是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今，中共领导人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盘算和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党会通过一项关于斯大林的新决议。可能，难道我们中竟有人会这样做吗？难道没有斯大林，我们现在过得不好吗？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指责我，是因为我曾经列举了苏联人众多的言论之一，即如果斯大林早一些离开领导岗位，那么苏联人民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可能会过得更好些。我认为，苏共中央收到的带有此类内容的信件，虽然内容比较幼稚，但它们却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真实的一面。

我们究竟在哪些问题上与中共领导人发生了分歧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里我并不想详细谈这方面问题。因为关于事情的本质大家已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央 6 月中央全会资料和其他文件中了解得很清楚了。

这里,请允许我简单地讲一讲如下几个问题。

例如,关于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

在很多年以来,中共领导人极力攻击和平共处原则,并断言该原则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国领导人宣称,这不是列宁主义立场,关于此列宁从没说过。中共领导人宣称,这都是赫鲁晓夫杜撰和强加给其他国家的。

在攻击和平共处原则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可能忘了当年甚至还自夸说,似乎是他们在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发明了和平共处原则,即众所周知的所谓“潘查希拉”。可是,当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之时,中国领导人便随即抛弃了这些原则,并开始攻击和平共处政策。尤其是针对我们党的政策,他们攻击得最为起劲。

如今,中共领导人宣称,他们拥护和平共处原则,但同时又提出了保留意见,即他们反对把这一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这已是在玩文字游戏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与这一原则不正相符吗?……难道非要直接问:你们是否赞成和平共处才行吗?中共领导人已是在玩杂技技艺,而不是在坚持政策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得很健忘。中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各兄弟党历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中也是签了字的,这些文件指出:

“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苏共二十大决议通过的、在当代条件下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两个体系并存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各民族间和平和友谊的牢固基石。”(摘自 1957 年宣言)

在 1960 年各兄弟党声明中也写道:

“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条件下,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提出并在 1957 年莫斯科声明和和平宣言、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决议,以及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将成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

我再重复一下,在上述这些文件上中国领导人都是签了字的。

那么,试问: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真正立场究竟如何呢?结论是:他们一直在左右摇摆——就没有坚定的立场。

事实上,同志们,和平共处原则——这可并不是谁的杜撰,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我们眼下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客观实际的要求。

总之,和平共处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规律性。当世界上只有唯一的资本主义体系之时,并不存在和平共处的问题。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曾发生过战争，但这些战争都是为了重新分割所占领的土地，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都是一部分掠夺者反对另一部分掠夺者的战争。

当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异类，因而后者一度不承认它。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试图清除这一异己分子，并发动了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干涉，并以战争反对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

但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苏维埃国家全体劳动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自己亲密的共产党周围并打败了敌人：外国干涉军、内部的敌人——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

由于胜利，这个世界上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这个国家是由从前的沙皇俄国的工人阶级首先建立的。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劳动成为了主宰，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斗争——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

随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严峻的考验——法西斯的侵略，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试图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奴役我国人民。但苏联人民光荣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最终，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均被摧毁，许多国家的人民得以解放。

当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曾企图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国家，阻碍社会的发展，终结社会主义的历史。可是，那些企图以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们，如今早已在坟墓里化为灰烬，而共产主义及其思想却整个地球高歌猛进。

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一些大陆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劳动人民赢得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如今，在资本主义的周围已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当今世界上存在有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一天天、一年年地发展壮大起来，这一事实本身便体现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地主制度和全世界剥削者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展示了新社会的成就，以自己的劳动胜利显示了获得了自由的人们的能力和才干，即使他们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

在这方面，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表现得尤其显著。如今，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居世界第二位。我们仍在自信地前进着。用不了多久，苏维埃国家将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头把交椅。这些成就充分显示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的优越性。

需要重复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新阵地。殖民体系业已崩溃。许多新成立的国家均宣布，他们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诚然，其中仍有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还不甚明确。但正如人们常说的，成功的开始便是胜利的一半。历史和各民族的斗争都将使得马列主义所宣传的科学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日益被越来越多的

人们所接受。

(需要重复的是,中国领导人也是在这样的文件中签了字的。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领导人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究竟持何立场呢?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而是左右摇摆着。

同志们,和平共处原则,这可不是什么人臆造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被分裂为两个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的历史真实。①)

要知道,和平共处并不是以人们之间的事先约定为基础的,而是由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因此,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掌声)

中国领导人试图粗暴地歪曲我们的政策。他们对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的苏共大肆指责,似乎是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臆断是很容易予以驳斥的。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党纲、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6月中央全会决议和许多其他文件便能够非常清晰地做出如下判断: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全世界都晓得,我们国家早已不存在剥削阶级——他们几十年前便已被消灭了。但在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为战胜剥削者的斗争——依然继续存在。

如今,苏联共产党和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正如在自己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那样,始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在帮助国际工人阶级从事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促进所有国家无产者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国领导人找不到一个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臆断——似乎苏共背离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立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发动战争,以便在其他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原则上是反对"输出革命"的。革命应当在社会内部成熟,并应当由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来实施。而我们不会参与此类事务,当然这并不包括如下内容:苏联曾多次教训了那些反革命"出口商",帮助正在斗争的民族战胜干涉他国内政的帝国主义者们。这便是我们的立场。(掌声)

中国领导人还提出了另一臆断,即似乎苏联把和平共处原则扩展到了殖民者和被压迫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并以此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所有人都了解苏联和我们党的立场,那就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在英、法和以色列冒险家们入侵埃及之时,我们曾向后者提供了帮助;我们帮助印度尼西亚为合并西伊里安岛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帮助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这一帮助并不仅仅体现在道义方面,而且还包括了武器等

---

① 此处原文还有被删去的一段话:"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了一个拥有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苏维埃国家,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异己分子。资本主义一直试图把我们从地球上消灭掉,但没有成功。我们……于是,便开始了和平共处。二战以后,又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译注

物质方面。

大家都晓得，苏联向一系列年轻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以便其赢得经济独立。

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在裁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中国领导人对苏共和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提出指责，并认为我们这样做似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代表也是1960年各兄弟党共同声明的签署者之一。

当时，“会议认为，落实苏联提出的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计划对人类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此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所有兄弟党和工人党——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均签署了赞成裁军的1960年声明，因而即使这是一个幻想，也是我们共有的一个幻想。

包括中国在内的1960年兄弟党会议通过的告全世界人民书特别强调了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意义，其中指出：

“各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世界强国已经有两年没有进行核试验了。那么，谁又会反对(他们)再进一步并通过一个关于彻底禁止此类毁灭性试验的决议呢？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们不断地宣布自己打算再次恢复原子武器试验并经常威胁要中止他们在各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关于禁止核武器的谈判。”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各国人民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已成功地签署了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可中国领导人现在竟与戴高乐将军一起反对该条约，并称这是对各国人民的欺骗。

如今，中国领导人批评我们签署了该条约。他们要反对自己曾赞成过并与各共产党共同制定的告全世界人民书。他们说，我们签署该条约便是对苏联人民的背叛。

在签署关于禁止在大气层从事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怎么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和其他人民？我们如今所要做的是不再污染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呼吸的空气，难道这能被认为是一种背叛吗？

我们还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水下从事核爆炸的条约。这自然也就排除了污染海水和鱼类的可能性，而后者是全世界人民都需要捕捞和吃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可以放心地吃鱼了，而不必担心他们会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这怎么能叫作背叛呢？

我们签署了禁止在太空从事核试验的协议，从而使宇航员们可以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从事宇宙窨研究。该条约所包含的条款都是以和平为目的。稍后，我们又成功达成了关于不向太空扩散核武器的协议。

至于地下核试验，众所周知，我们正在努力禁止此类试验，但暂时还未成功达成协议。我们国家与其他强国一样都拥有同样的条件——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此类试验以完善自己的武器和服务于科学为目的。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领导人所持立场的逻辑性呢？中国领导人反对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目的何在呢？

要知道,是他们自己致函帝国主义者,并邀请其来谈判和讨论关于裁军的问题的。

他们怎么能说裁军——是一个幻想呢?要知道,在这个问题我们可是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兄弟党的同意的。

中国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立场暴露了他们的真正图谋。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有两个衡量事物的标准——其中一个适用于自己,而另一个——用于其他人。例如,据他们说,似乎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脑子里充满了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希望与其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妥协——其中包括裁军问题在内。原来,中国领导人对裁军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前不久,周恩来在讲话中向全世界提出建议——召集各国首脑会议以讨论裁军问题。

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我们向全世界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建议——是幻想,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话,那么周恩来发出的邀请及其在这方面的活动会有利于世界革命吗?其目的究竟何在呢?是指望共产党的代表们从美国去他们那儿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只能是帝国主义联邦政府的代表们。那么,请问,这难道不是对帝国主义者抱有幻想吗?只能这样去理解,中共领导人才是真正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没有一点革命性。

中国领导人还批评我们,理由是我们不认为世界战争是必然的。难道这仅仅只是我们的观点吗?难道这不正是所有共产党-工人党在1957年和1960年的会议文件中所得出的一致性结论吗?需要强调的是,在那些文件上也留有中国领导人的签名。

如下便是1960年声明的内容:

“终有一天,我们会消除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并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战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防止世界战争的爆发。”

当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得出这一结论之际,他们所有人均不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会发生变化。的确,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但当代世界的力量对比却变化了。

我今天曾提到腊斯克的声明。这实际上是美国的另一个面孔,是帝国主义的鲜活写照。该声明究竟说什么呢?美国在他的童年时期曾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时光:大西洋保卫了美国。可如今,有了苏联,后者拥有洲际导弹,拥有原子弹。因而海洋已不能像从前那样保护美国了。而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类似情况,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参见苏共二十大决议,在那里我们党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掌声)

如果现在苏联手里没有现代武器,没有导弹,没有原子弹,那么,哪一个帝国主义傻瓜会考虑与我们“共处”的问题?那也就不存在任何共处的可能性。

当谈及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时,我们绝不是在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怜悯。在从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中帝国主义是不择手段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

这里,给你们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我曾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

他对美国的活动非常愤怒，并说：美国人——这些狗崽子们向我们这里派遣了大量的破坏分子和间谍等。而我答道：他们并不是狗崽子，只是些帝国主义者。他们实施自己的政策只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难道您指望他们给您送礼物来吗？（会议厅活跃起来）古巴同志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活动很愤怒，并说：他们这些狗崽子们向古巴派遣了大量的破坏分子和特务，以便从事针对我们的破坏行动……我们能够理解古巴同志的愤怒，因为如果美帝国主义不这样做反而是令人感到奇怪的。① 要知道，当我们国家刚诞生时，收到的也不是"礼物"，而是干涉军——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②苏联人民把他们都从自己的国家中赶了出去。那可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要平静地对待这方面问题，应当从阶级立场出发来看待帝国主义者们，而不能简单地带有急躁情绪。

从根本上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工人想要为自己的劳动得到应有的报酬；资本家则相反，他们想让工人更多地干活，而自己则少支付工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关系。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时，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而当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拥有导弹，他们也有导弹，如果他们按了导弹发射钮，我们的导弹也会瞬间启动。这样，便开始促使帝国主义者们对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正是因此才出现了腊斯克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所发表的那些言论。这正应验了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论断，即……③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但其已不是那么的强大和随心所欲，并不得不顾及在实力上正越来越追赶上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掌声）

中国领导人恼火苏联共产党获得如此之高的声望。他们相信帝国主义者的"智慧"。当然，我们的确也相信敌人并非傻瓜。在"帝国主义"一词的背后，我们也应当看到帝国主义国家中一些务实的人们和政治家，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中间一些人的智慧去反对其他人的狂热，利用敌人阵营中的弱点和矛盾。但首先，我们得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手中的武器。要知道，即使是狂妄的希特勒，如果知道自己将在1945年落个饮弹自尽的下场，他可能也就不会发动战争。

因此，即使现在我们说阿登纳④没出息，如此地污辱他，他也只能听着，并说：你们骂我了，但我跟其他人一样晓得，如果发起战争，那么第一个毁于战火的便是西德。大家都看到了，虽然人们都说他傻，是傻瓜，但他却很聪明。（会议厅里传来笑声）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顾及那些"疯子们"和侵略集团。因为这些人即使知道自己将毁于战火，有时也可能去冒这个险。也正是因此，我应当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掌声）

如果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强大，这些力量使帝国主义感到害怕，那么和平共处就是可

---

① 这一段话是后加的，替代了原来的文字："如果你们不想让他们到自己这里来，就得相应地采取自己的阶级政策。"——译注

② 此处原文复印件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③ 此处原文复印件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④ K.阿登纳，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编注

能的。如果力量平衡被打破,和平共处也就可能不太和平。因为帝国主义者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如果他们感到有可能祸害我们,就会这样去干。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并随时准备给予帝国主义者以应有的反击。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自己也不会拒绝这样去做。

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比我们更革命,理由是他们使用了更多的革命性语言。他们指责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沉迷于经济主义,似乎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国民经济方面,而较少关心其他革命事务。的确,我们确实很重视经济建设,因为我们把这看作是落实列宁教导的途径,即以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促进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据说,中国领导人曾对非洲人这样说过,俄国人——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而我们饿着肚子、光着脚,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在干革命,而俄罗斯人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力量主要用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如果我们只埋头干革命,而时至今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维持在50年以前的状态,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如果真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会有排斥力,并成为一股让人厌恶的力量。

帝国主义者们如今为什么会忧虑?原因是苏联正一年年地强大起来,日益积蓄力量,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以及我们人民的生活福利都不断增强。(掌声)我们将以此来战胜帝国主义。这是一条可靠的道路,是在全世界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掌声)

中国领导人极力把自己打扮成超级革命者,拼命地骂帝国主义,骂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们,极力在世界上鼓噪。他们喊的声音倒是不小,但见不到他们做任何务实的事情,也没有干任何革命方面的工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需要这些由响亮的辞藻所构成的光华灿烂的烟火,以便用自己"左"的东西来批评我们,以便用空洞的蛊惑来掩饰自己对马列主义的背离和自己那些并不算小的罪过。

在自己的辩论资料中,中国宣传机器早已超越了我们所能容忍的底限。我这里并不仅仅指他们针对一些人的人身攻击——他们在这方面可是做得够多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而在于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那么让人难以置信地极端,采用了那样恶毒地大呼小叫的方式。看到他们所写的东西,即使魔鬼也会自叹不如:难道共产党能这样写东西吗?难道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采取这样的争论方式吗?不,同志们,这不是辩论,而是错误的、下流的漫骂。

我坦白地对你们说:有时你都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争论什么呀?因为我们现在所争论的许多问题显然完全是中国领导人空想出来的,人为夸大出来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放弃这样的争吵。但我得强调一点,那就是在他们有这方面意愿的情况下!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暂且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愿。于是,人们便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某个人需要利用这些"理论"分歧,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掩饰自己的不良图谋和为自己的错误寻找辩解的理由。

例如,他们指责我们似乎正在复辟资本主义,而他们——据说是在建设共产主义,并马上就要跨越到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他们打算在共产主义建设中超越我们并向我们展示应当

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但最终除了对全世界发出了一阵喧嚣之外，什么结果也没有。“大跃进”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如今，人民公社实际上已不存在，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称谓。他们所谓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采用了我们集体农庄的章程。

有一次当我们访问北京时，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形势很好，中国几年内将完成“向未来的跃进”。他当然并不曾与我们协商过此事，而只是作了一个通报，说我们要这样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硬要往坑里跳，并认为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举动，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根据我们的经验，非常谨慎而礼貌地告诫毛泽东关于此类实验的危险性。但我看到，自己这样做并不会有所帮助，而人家也不愿听。怎么办呢？于是，我也只能说，那就让他试试吧，但我们将坚持列宁主义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集体农庄生产的一切有利因素。

于是，他们尝试了，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指责我们的顾问、工程师、冶金工作者等都是“生产极限论者”的机会主义者；说我们这些人不理解新事物；说自己要在几年内赶超英国……同志们也都看到，当时中国的情况也的确不错，于是中共领导人又提出了在很短时间内在钢铁和煤炭生产方面超过英国的口号。

于是，便开始了“赶超”运动。但最后又怎么样呢？他们开始用手工方式建造小高炉。可是，即使200多年以前彼得一世在乌拉尔所修建的炼铁炉也要比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要先进。但是，如今中国人却开始建设此类炼铁炉。可哪里有合适的能在此类炼铁炉里炼制的金属呢？他们可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们集中了上千万人来搞此类建设，农业无人问津。据说，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也在自己家里建造了一个这样的炼铁炉，以证明自己尊重总路线和毛泽东的英明才智。此类“工业”的最终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如今，这些炼铁炉已废弃了，而所谓赶超英国也放弃了。

如果我们也走这样的道路，放弃集体农庄，瓦解我们的工业和工厂，难道不会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坚定地坚持列宁的方针，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绝不能仿照中国的样子，走他们的错误道路。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毛泽东当时曾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想搞整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想让所有部长都到生产第一线去工作3个月。据说，这样做效果不错。我答：毛泽东同志，这都是我们曾做过的事，对于我们而言，这都是已经历过的阶段。我们都扛过圆木，也有描写关于这方面生活的电影和绘画作品。当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工作，组织了在生产第一线和矿山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活动。当年，当我在莫斯科当州委书记之时，曾参加过地铁站的建设工作，用桶搬过土。这对我们当时而言，是对的。可如今再要这样干，会怎么样呢？

中国劳动力倒是很丰富，例如，如果派陈毅去生产第一线，可能还行，但如果我们派葛罗米柯同志到工厂去，会怎么样呢？工厂经理会让他去操控机床吗？是的，任何一位工厂经理都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葛罗米柯同志会把机床整坏的。(会议厅气氛活跃起来)

不，同志们，我相信葛罗米柯同志是一位好的外交部长，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他去做

一名车工。(会议厅气氛活跃)

我们不必去模仿一部分落后人口的活动。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们党曾有一位这样的领导干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每当他去参加工人大会，便要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间，好像他没钱去买一束腰带似的。

A. И. 米高扬：他曾是中央委员会书记。

H. C. 赫鲁晓夫：是的，他曾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仍是总要用一根绳子作腰带。(会议厅传来笑声)为什么呢？要知道，即使工人们现在也不是用根绳子当腰带的，而都是买皮带的。这就是说，他是在作秀。这种方式——是一种过时的方式。(掌声)

当中国领导人向我们建议此类工作方式之时，我只能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只是，我无法对他们说：请你们自己也不要这样去做，即使毛泽东没有询问过我的意见。因此，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这样做，而至于你们如何，只能自己决定。于是，他们便这样做了并做得更过分。

前不久，中国人代会讨论了经济问题；公布了一个报告，但其内容却让人难以理解。据此报告，中国在某些经济领域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而在其他领域情况却比“往”年更糟。至于究竟是哪一年——没说。我们当然明白，因为没有什么可说，也不能列举数据，而只会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应付一下。这是在生活状况不太好时常有的事。

中国领导人置整个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不去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应当集中力量抓经济，全力振兴国民经济，认真思考和利用一切机会放弃自己的冒险活动——这才是他们在对事情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应当做的。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病得不轻，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与苏共的斗争中，用在与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争斗上。

同志们！上述情况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虽然我们热爱中国人民，高度评价其坚强和勇敢，尊重中国共产党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发自内心地希望，这场涉及数亿人民命运的“大跃进”和欠考虑的试验能够早一点结束，以便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

我们的担忧还在于，中国力量的削弱——这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损失。那个大谈战争问题并号召大家不要害怕战争的人并不会妨碍人们记住一点，即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拿着步枪是无法打仗的，即使你的对手是一些纸老虎。我们只对帝国主义发表宣言和讲话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们需要的是实力。如果国家的经济遭到破坏，实力又从何而来呢？总之，不管怎么说，结论只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考虑欠周的行动会导致中国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活动家们将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重大的损失。问题的症结何在呢？问题在于，我们将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力量去补偿中国经济的衰落。当然，可能有人会这样说：中国的衰弱或强大与否——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但我们可不能这样来看问题。要知道，帝国主义者们即使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的，他们时刻梦想着削弱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方面，而绝不能允许国际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帝国主义一方转变。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恢复和弥补由于中国经济的失

败而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清楚这一点，同志们，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威望不是建立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实际中，关键是中国领导人是否明白这一点，对此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把握。

中国领导人现在试图把自己国内经济失败的责任怪罪到苏联身上。他们到处撒谎，说什么中国经济的失败似乎都是由于苏联无理由地从中国撤走自己的专家造成的。我们之所以被迫从中国召回自己的专家，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在中国受到了粗暴的待遇。你们大家从相关文件上便能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

可能，苏联专家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受到的类似待遇也与中国的影响不无关系。

朝鲜人要求我们在他们国家像装配工一样工作的工程师们都立下字据，以防其向外国传递朝鲜的生产机密和资料。他们甚至还要求我们的专家们在这些字据上按下手印。我们必须与朝鲜人理论一下这个问题。

当美国人要求前往美国的苏联人留下指纹时，我们曾向其发出了严正的抗议。我曾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只索取罪犯们的指纹，而对我们诚实的人们是不应当这样做的。我们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我们不去你们那里了，让你们见鬼去吧，于是他们变更了法律。(热烈的掌声)如今，针对其他国家前往美国的人美国人仍要求留下指纹，但针对俄国人，苏联人——不需要。(热烈的掌声)

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有意夸大分歧？因为他们想把本国民众的情绪纳入一个新轨道。中国的情况很糟糕，人们挨饿，没有衣服和鞋穿，这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于是，他们便想开溜。

中国领导人对民众宣传说，苏联撤走了自己的专家，因而导致中国粮食歉收。但大家都晓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向中国派遣农业方面的人——农艺师、专家和顾问。大家看到，这一切都是中国领导人臆造出来的。他们利用民众不了解实际情况，极力转移人们对中国国内实际生活中所发生问题的注意力。

中国领导人强迫我们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通过什么道路来赢得政权。对于我们而言，这已是经历过的阶段，对此我们早在46年以前便已说过，并进行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中国也是经历了这一阶段的。因此，这里理应指的是那些依然由资本家掌握着政权的国家及其政党。这就首先需要听一听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共有两条道路——和平的道路和非和平的道路。这是对的，既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也切合实际，而且这一命题在我们的党纲和各兄弟党的声明中也都是有的。

关于这一问题，1960年(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是这样说的：

“在关于不同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上，各共产党确认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论断……

但各个国家将采取何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则需视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与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发生了分歧。

中国领导人试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其他党派。

我们坚持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原则,据此,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由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列主义政党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当前形势来决定。而当年,列宁也正是这样做的。列宁在一种形势下拥护和平过渡,但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则号召发动武装起义。

如今的中国领导人由于我们提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和平道路便批评我们。但要知道,和平过渡的方式可绝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恩格斯和列宁都写过关于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文章。关于战后时期,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英国共产党编制了一份新党纲,稳重的波立特来到莫斯科,并将该党纲草案递交斯大林修改。该党纲把(英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心放在非和平方式和起义方面,而斯大林建议在其中增加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以和平和议会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的内容。①

正是这个中国领导人喜欢援引其言论的斯大林曾认为,一些国家存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斯大林死后和苏共二十大之前,我们也曾讨论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道路。

如果我们在各兄弟共产党宣言和声明中只涉及一条道路,即武装起义的问题,那么就将置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正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的各共产党组织于极其困难的境地。② 他们将不得不转入地下和放弃合法的斗争方式。在目前条件下这样干难道是明智之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政党的活动经验证明,他们能够顺利地展开合法工作,从事阶级斗争并为最后的决战积蓄力量。用一个标准或一种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将会局限各个党派开展活动的可能性,这至少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理应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什么时间采取行动和如何行动。而关于这方面内容在我们的二十大决议以及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文件中均有正确的记载。

应当说,在很多时候中国领导人的做法简单让人难以理解。他们的行动很不符合逻辑。例如,他们想与蒋介石争夺自己沿海的岛屿。根据他们的请求,我们向其提供了大炮、歼击机,甚至还有导弹。他们用大炮打啊,打啊,可是随后却停止了一切活动,再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中国战略家答道:你们知道,敌人离得越近,对我们越好,如果我们要夺取了这些岛屿,他们将会离我们越远。(会议厅传来笑声)真没办法说——这种战略多么奇怪!(人们都笑起来)如今,中国领导人已经发出了1 901个警告了。(会议厅传来笑声)所有这些举动好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领导人所发出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革命词句。

还有一个事实。去年,在一次关于援助老挝的会谈期间,梭发那·富马请我们大使转告莫斯科,希望苏联能向其提供几架旧的活塞式歼击机,而飞行员他们可以向中国人要。因为,如果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在敌方区域着陆,飞行员便会立刻被认出不是老挝人。我们表示同意满足老挝的这一要求,并向梭发那·富马发了一封关于我们准备向其发送歼击机的电报。可中国领导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也说"很好",你们在援助歼击机的问题上做

---

① 本段括号内的文字是手写体填加的。——译注

② 这句话是后加的,替代了原来的文字:"如果现在意大利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提出关于武装起义和内战的问题,那么第二天他们便会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译注

得不错，但你们还应派一些自己的飞行员去，因为你们的飞行员比中国人更像老挝人。(会议厅内一片笑声)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坚定性！中国领导人总是爱唱革命的高调，似乎他们就是想找碴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并以此来“推动”革命。可他们自己又不愿意打仗，而只是挑动其他人。

那么，他们为何要大嚷大叫，他们不负责任地空谈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因为苏联和美国针锋相对于他们有利，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也只有这样想，我们才能够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的战略家们可能是这样想的：让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斗，互相扔原子弹，而我们则坐山观虎斗。即使给中国扔了几个原子弹，也没什么可怕：因为中国人多——反正最终会比俄国人和美国人剩得多。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战略与革命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们曾多次想向中国领导人解释，当代的世界大战可不能再用游击战争的尺度去衡量。因为这样没有一点用处！可中国领导人可能依然对核战争的性质没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战争对人类命运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不会冒这种险。我们需要秣马厉兵，但不必表现出匹夫之勇。我们准备保卫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今天，鉴于帝国主义者反对古巴的图谋，我再次重复了我们对他们的警告。这种警告会有益于古巴。所有人都会明白这一点，而美国也会正确理解的。(掌声)

但我们不会去挑拨离间。如果敌人没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也就不会付诸武力；如果他硬把我们拖入战争，那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也会动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持续不断的掌声)

现在，请允许我讲一下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党坚决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提出批评。他们在把斯大林当作自己的盾牌的同时，也接受了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保护自己的那些下流做法。

在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同时，我们党正尽一切力量确保斯大林时期的滥用职权不再重演，因为它们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重大的牺牲。与此同时，我们完全不否认斯大林所做的以及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我们党和人民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过程中所取得的那些好的、积极的东西。

要知道，实际上有两个斯大林：一个斯大林——我们中的许多人均与他一起工作过并做了一些好的事情；还有一个斯大林——他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诸多危害。

我们高度评价和维护斯大林在自己活动时期所做的那些好事，因为其在反对阶级敌人和自己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宗派主义者、民族主义倾向者的斗争中加强了社会主义立场，确保了列宁主义的胜利。

我们党之所以要批判斯大林的滥用职权，是因为它粗暴地违反了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因为它不仅打击了敌人，也打击了自己人；因为它歪曲了列宁的遗嘱。

中国领导人在把斯大林当作自己的挡箭牌的同时，也接受了斯大林的粗暴错误。看来，他们是把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所采用的那些下流做法也借鉴到自己的实践中了，而这就必

然要违背马列主义原则。

斯大林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人物,并一直想从历史上为自己找到依据。他崇拜彼得大帝,也迷信伊凡雷帝。斯大林说过:“伊凡雷帝是一个聪明的男子汉,如果说他做过什么傻事的话,那就是他应当再多杀几十个波雅尔家族,那么情况就可能会更好些。正因为伊凡雷帝没有这样做,因而一度使自己成为教父。”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伊凡雷帝时代,而是完全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因此,依然使用伊凡雷帝时代所采用的方法开展党的教育和整顿党的工作秩序,那将是极其荒谬的。

苏联人民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有荣誉感和自尊心,经过了列宁主义的党的教育,我们将捍卫和坚持这些原则。任何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侮弄人,任何人都不行!(热烈的掌声)

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我们恢复了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的生活规范,集体领导原则,每一个党员和每一个由党选举的领导干部都有向党汇报工作的义务并归党领导,而不是相反——党向他汇报工作和由他支配党。(掌声)

如果你们询问任何一个苏联人,问他如何看待清除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以及恢复列宁主义的我们苏联生活的规范和原则,那么,每一个苏联人都会答道,他欢迎和完全拥护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方针。

中国领导人当然也不需要斯大林。他们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并对其提出批评。中国领导人需要的只是斯大林曾推行的那些秩序和管理方法,需要斯大林曾用过的那把斧头,以便吓唬党和人民,进而指挥党,而不是领导党。这样一来,就潜伏了巨大的危险性,同志们!危险在于,中国活动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泥淖。小资产阶级大吹大擂、自高自大、傲慢和自认为一贯正确的优越感日益渗透到了他们的整个身心。他们走上了错误的、危险的道路,并因此而削弱了社会主义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力量。

可是,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立场,不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宣言和声明以及苏共党纲所指明的道路。(掌声)

人们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中国领导人在近年来要日益加紧攻击苏联、我们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施一系列分裂活动?

公正地说,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日益转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越来越公开地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如果要深究中国领导人如此行为的原因,就必须从中国的国内形势入手。① 由于感到自己无力解决国内所存在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便试图把民众引上一条虚伪的歧途,而在国际舞台上他们也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其目的就是要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58 年以前当中国经济发展良好之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毛泽东患了夸

---

① 原文此处删去了一段话:“中国的形势极其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极其贫困。而中国领导人却没有从本国人民的利益出发,集中力量去解决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译注

大妄想症，中国领导人想在最短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苏联。他们开始宣称，虽然自己胜利得较晚，但要更早地建成共产主义。为了急于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和开展"大跃进"，并开始兴建小型炼铁炉和实施了其他一些举措，但结果却破坏了国民经济。①

如今，中国人口的年增长速度为1 300万—1 500万。这些人都是要吃饭的，但中国没有足够的粮食来供养这些人口。

中国人民是勤劳的民族，他们曾忍受过比这更沉重的苦难，而他们也一定会经受住自己当前所面临的、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不明智举措而导致的困难。中国人民经受的困难是严峻的，许多人被饿死，可能现在正处于饿死的边缘。但我们关于当前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很少。

但我们依然希望，现实生活迟早会迫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政策。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是经过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的。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去克服分歧，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热烈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665, л. 50 - 103

№099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草案)：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

(1963年12月13日)

草案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的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1963年12月13日通过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并一致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苏共中央第一书记H.C.赫鲁晓夫同

① 原文此处删去了一段话："导致人民挨饿，如今事实证明'大跃进'是一项冒险主义的政策。现在，他们不公布任何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统计数据。但他们这样做是徒劳的，而中国的经济状况也是极其严重的。"——译注

志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为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之间存在的分歧而开展的政治活动和进行的实际工作。

全会确认,今年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及苏联政府其他文件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的实质所作的评价,赞同苏共代表团 1963 年 7 月会晤中共代表团时开展的活动,并对会谈由于中共方面的原因中断,而苏共中央多次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未得到肯定答复,表示遗憾。

苏共中央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过去和现在都一贯认为,对目前出现的分歧不应通过公开论战的方式来解决,而应通过 1960 年兄弟党声明中规定的方式,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相互磋商、交换意见来解决。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开了公开论战并进行了其他活动,其形式和方法都是马列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所不能容许的。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变本加厉地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转移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问题和进行反帝斗争的力量与注意力,破坏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反帝阵线。

苏共中央全会赞同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发言中再次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重申苏共中央 1963 年 11 月 29 日就该问题对中共中央发出的呼吁。

苏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能以我党为榜样,并从自己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加强兄弟党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团结,以促进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总是怀着友好的情谊,今后仍将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巩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今后在所有的政治活动和实际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贯彻我党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坚定捍卫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友谊,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执行团结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人民的路线。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党的会议上说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所产生的分歧的实质以及苏共中央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所采取的措施。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665, л. 1 - 3

№23017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记录：讨论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1963年12月13日)

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所开展的活动"

1963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一致赞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H.C.赫鲁晓夫同志所进行的旨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统一，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之间已有分歧的政治和实际活动。(掌声)

全会批准了"苏共中央今年7月14日公开信"以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其他文件对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分歧的评价，赞成1963年6月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期间所从事的活动，并对由于中共代表的原因而导致谈判失败，苏共中央多次提出关于终止公开争论的建议未获得(中方)积极回应而表示了遗憾。

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为指导，苏共中央始终认为，业已产生的分歧不应通过公开论战的方式解决，而应以各兄弟党声明中所制定的方式——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相互磋商和交流意见。

中共领导人所开展的公开辩论和其他行动，及其所采取的一些在马列主义者之间关系中无法让人容忍的方式和方法让我们感到深深地遗憾。现今，他们越来越把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转移到国家间关系上，分散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迫切任务和反帝斗争的精力和注意力，动摇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削弱反帝阵线。

苏共中央全会赞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自己多次发言中再次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辩论的建议，批准了苏共中央就该问题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发出的信件。

苏共中央期望中共中央能够仿效我们党的榜样，从自己方面也采取一些实际的步骤以便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从争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的斗争利益出发加强各兄弟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均始终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怀有友好的情感，并将在今后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我们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苏共中央全会委托中央主席团今后将继续在自身政策和实际活动中坚定不移地落实我

们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诸决议，坚决地捍卫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并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加强苏中人民之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友谊，循序渐进、始终不渝地贯彻团结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的路线。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党的会议上对现存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所导致的分歧以及苏共中央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采取的举措做出解释。(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我们已有了一个可以表决的基础性提案。有人反对吗？没有。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变更的吗？没有。有人建议通过所有提案。有人提出如下建议：由我们全会的所有与会者立刻进行表决。(掌声)赞成通过所提交的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活动的提案草案的人，请举起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有人弃权吗？提案一致获得通过。(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我想通知你们的是，我们刚才所通过的草案和决议，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等同志的发言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就中国问题所作的那部分发言内容将不予以公开。

赫鲁晓夫：你们大家都知道……①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你们也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掌声)

同志们，我们全会议事日程上所列问题已全部结束。

所有应邀参加中央全会工作的同志们都可以走了，但请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们留一下。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679, л. 150－154

№20821－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阿法纳西耶夫的讲稿

(1963 年 12 月 13 日)

未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中央全会与会者的讲稿

C. A. 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① 原文如此。——编注

……①

同志们！

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获悉，目光短浅的中国领导人继续对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及忠实于列宁和为了和平不断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对我们忠心爱戴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实施攻讦。

不顾及人民的意愿和意见，以虚伪的言辞为掩护，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进行不断的诬蔑和诽谤。

他们企图以各种卑鄙、下流的方式将自己的冒险主义纲领强加给其他国家。

我们以蔑视的态度回击中国领导人所做的各种攻讦，向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保证，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我们坚定地团结在列宁的党中央周围的坚定信念。

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团结起来！

……

РГАНИ，ф. 2，оп. 1，д. 696，л. 120－121

№0990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印发波诺马廖夫等人在中央全会的讲话

（1963 年 12 月 16 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63 年 12 月 16 日第 257 次会议第 90 号记录

关于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问题。

绝　密

一、内部印发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 年)12 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二、这些材料发至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边疆区党委、各州党委、各自治区委、各市委、各市区委、各工

① 有关苏联经济发展的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业生产部门党委、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北方地区以及原始森林地区和山区的党委、拥有区党委权力的基层党组织。

中央委员会书记

Л. 勃列日涅夫(签名)

发送：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马林同志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665, л. 4

1964 年

№25531

黑根与邓小平谈话纪要：中苏分歧与政治论战[①]

（1964 年 1 月 14 日）

……

Ю. 黑根[②]：如何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对作为党总书记的您提出这个问题：从国际观点来看如何才能解决这些意见分歧。

邓小平同志：我们在与苏联共产党的会议上十分清楚地向苏联共产党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一直坚持不将我们内部之间的分歧成为社会舆论的产物，也不将它们在敌人面前展示。……可别人却宣称在敌人面前讨论思想分歧并将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关系方面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如果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且所有的人都对此十分感兴趣，那就需要在这里将其彻底弄清楚……

那些现在赞成停止公开辩论的人也正是以前声称公开辩论是唯一正确方式的那些人。某些呼吁停止公开辩论的人，比如赫鲁晓夫，一方面说停止公开辩论，而另一方面却又对我们进行攻击。在你们的党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的。最近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了 2 000 多篇对我们进行攻击的文章。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相互间讨论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刊登了自己的公开信。为什么他们要急于如此？为什么他们不能等到会议结束后再刊登这封信？我想，要是他们想对美国方面作姿态的话，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黑根：可现在有哪些机会呢？……

邓小平同志：我们以前已经阐述过我们的观点。对方不同意这点，认为公开辩论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所以我们曾声明，以及在双边会议期间也声明，如果该方法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既然公开辩论已经开始，那么就该遵守平等。这意味着最好是双方各自刊登对方的文章……可只有苏联报刊超过 2 000 多篇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并没有刊登多少文章。如果这里应该有平等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刊登 2 000 多篇文章……我私自在想，也许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总而言之，不应该有不平等。总认为自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约瑟夫·黑根，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编注

己非常聪明,这不太好。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会议,早晚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至于国际会议,我们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没有矛盾。我们首先提出了这项建议,然后苏联共产党也同意了。我们与苏联共产党遵循一种意见,当召开国际会议时,就必须保证会议成功。这应该是团结的会议,而不是分裂……至于我们双方的看法,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尽管我们以前反对公开辩论,可从发展角度来看它,也不是件坏事。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将得到团结。而这种团结只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

……

主要的是必须保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兄弟党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的正确立场。只要能够正确地对待所有这些主要问题的话,就能达到团结,如果脱离了这个基本观点,那就只能走向虚假的团结。而我们呢,必须要真正的团结。现在进行争论的问题正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意义非同小可。有希望,但发展将是曲折的。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08,д. 6,л. 14 - 18

№2578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

(1964年1月14日)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掌握的情报:中国领导人积极利用对苏广播进行分裂运动的宣传。北京的对苏俄语广播的容量和时间不断增加,目前他们通过8个频率每天进行8小时15分钟广播。

中国电台俄语广播宣传的主要方针是歪曲事实,诽谤和破坏苏联的内外政策,引起苏联人民对苏共中央执行的列宁主义方针产生怀疑,使苏联人民与自己的党和政府相对抗。

为此,北京电台除了使用其他反苏的材料以外,最近多次用俄语播送《人民日报》、《红旗》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中央与我们分歧的由来》、《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战争与和平问题中的两条路线》、《两条正相反的和平共处政策》。

除此以外,北京电台有系统地播送阿尔巴尼亚报刊杂志上的强烈敌对的材料以及有些

兄弟党叛徒和分裂主义者的演说和声明。

绝大多数苏联人民正确对待北京电台的节目，谴责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中央的诽谤性的污蔑，对他们的分裂路线表示愤怒，认为这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背叛。

在给中国领导人和北京电台的信件中，苏联公民痛斥反苏宣传的组织者，要求他们停止这一活动。例如来自波多利斯克的钳工叶尔莫拉耶夫在给北京电台的信件中说："我们深信，你们想在我国找到你们政策追随者的愿望是徒劳的，是毫无疑义的。如果北京不改变政策，等待你们的将是悲剧。我国的工人不听你们的广播……"

库利亚布斯克师范学院的一群学生给北京电台写了一封信，代表苏联青年要求停止对苏共中央及其制订的政策进行肆无忌惮的污蔑。

许多苏联公民对中国领导人所做的一切表示极大的愤慨，另一方面表示困惑，为什么苏联政府不采取措施切断这样的广播，声明要制止这样的广播。

莫斯科无线电与电机学学院一名叫谢尔吉耶夫斯基的学生写信给北京电台说："我认为最好永远停止你们的广播，你们广播中的乌七八糟的话听起来很难听，尤其是听那些宣誓永远效忠的人讲这些话……"

来自巴甫洛达尔的一名叫乌里扬诺娃的学生给中国写信说："我一听你们的广播就火冒三丈，苏联政府竟然允许听你们对苏联政府的异端。"

来自伊尔库茨克的一名列车员莫伊谢耶娃声称："为什么我国政府不发布命令，制止北京的俄语广播，他们讲的关于我们的都是胡说八道。"

伊尔库茨克机场的工作人员塞尔玛申科、博戈亚夫连斯基等人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莫斯科、赤塔、滨海边疆区和其他地方也遇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一听到北京电台广播，马上愤怒地把收音机关掉。

但是也有少数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受到中国广播的影响，他们开始散布一些不健康的言论，做一些与我们敌对的事情。例如：伊尔库茨克大学一名副教授叶戈罗夫经常收听北京广播，在周围人群中试图证明这些广播内容与苏共的宣言不同，内容清晰，观点有理。叶戈罗夫在人群中所散布的关于苏联社会小资产阶级变质、苏联政府缺乏明确的革命路线的言论都来自中国的捏造。

"吉尔吉斯建筑工程"学院一名叫奥斯莫洛维茨的工作人员也经常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受到它的影响，在同事中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活动，并复述中国广播的诽谤和谣言。

撒马尔罕区"红色发动机"工厂的工人布鲁克受北京广播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开始对苏联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并表示支持中国领导人的路线。

在北京广播的影响下伊尔库茨克机车库车工伏德杨宁、布拉戈维申斯克师范大学教师克纳、军官科祖林、切列姆霍夫斯基剧院的演员科布泽夫、火车司机西多罗夫等走上积极反苏鼓动之路。

个别人甚至自己写了匿名信，制作了传单，其内容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

住在文尼察区的加夫里连科被查明写了一封内容反动的匿名信，他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预防性的谈话中承认他的反苏观点是在北京广播的影响下产生的，他决定在苏联公民中传播这些观点。

新西伯利亚绝缘制件工厂的司机帕夫柳克写了一封匿名信，寄给了苏共中央，表示同意中共的观点。在对他进行预防性的教育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些观点是受北京广播宣传的影响。

乌斯基卡缅诺戈尔斯克冶金工厂工人邦达连科在中国电台的影响下制作了反苏传单，因此被开除了苏联共产党党籍。

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共和国、鞑靼共和国、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和古比雪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奥伦堡、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区都出现过匿名信和传单，作者支持中共领导人的观点。

在中国电台广播的影响下，有些敌对分子给中国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写信，有倾向地列举苏联的一些现实情况，对苏联领导人进行诽谤和污蔑。

原党的干部费多谢耶夫因发表污蔑性的声明被开除出党，他多次写信给中国，恶毒攻击苏联政府的领导人。费多谢耶夫建议将他的信刊登在报纸上或者作为无线电广播稿件。

中共中央收集到了来自新西伯利亚的匿名信，写信人恶毒污蔑苏共的政策和苏联的生活条件。信件的作者支持中共的分裂行动，请求将此信作为稿件在电台里播放。

一些敌对情绪较大的人给北京电台写信，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以好像是苏联存在的反苏组织和反苏小组的名义写信。他们赞同中国领导人的敌对行动，请求供给他们用于在苏联进行反苏宣传的资料。

鄂木斯克工厂的工人巴尔别辛在写给北京电台的信中说："……在收听你们的广播之前，我是不同意苏联政府执行的政策的。收听你们播放的一系列节目后我懂得了许多。我有许多熟人，可以在他们中散发你们的文章。一个月中我可以散发二三千份。"

阿拉木图的一名人士给北京广播台发了一封匿名信，其中对苏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诽谤。他以"思想先进的共产主义者组织"的名义声明，北京广播台对领导人进行批评的节目"促进了组织的迅猛发展"。然后他对于敌对的广播宣传采取积极的活动，并尽力证明与北京广播台的秘密关系。

莫斯科也有人给北京电台写同样的匿名信。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采取措施揭露、制止反苏分子的敌对行动，找出匿名信材料的作者。

关于在政治上尚不成熟的、受中国宣传影响的苏联公民，我们正在与党和社会组织一起采取预防性的措施。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 谢米恰斯内(签名)

1964 年 1 月 14 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р. 4649, ед. хр. 435, л. 1 - 6

№25530

契尔沃年科与黑根会谈纪要：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①

(1964年1月25日)

1964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与从中国回柏林赴任外交部副部长的Ю.黑根共进午餐时，契尔沃年科同他就中国问题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黑根反复强调，任何情况下对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的方针都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中国人显然是在搞分裂，让兄弟政党脱离苏联共产党，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黑根说，他觉得站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共产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在与中国人搞的分裂活动斗争中，最近表现得有点消极，这可能使反对中国领导人分裂方针的共同阵营因此而迷失方向。

黑根认为，匈牙利驻中国新大使哈拉斯的想法值得注意。哈拉斯宣称，如今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寻求统一和团结时应该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回顾，分析自己的错误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方面的失算，要公开地承认这些。在回答黑根的问题时哈拉斯表明，他哈拉斯对"我们"的概念是指苏联共产党和与苏联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党。……黑根着重指出，匈牙利大使在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谈话中作了以上的表述，还不时看看自己记在拍纸簿上的一些提纲。黑根为苏联共产党的政策进行辩护……黑根讲述了他与波兰驻中国大使E.克诺泰的谈话。

克诺泰说，所有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和团结的共产党应该更积极地反对中国分裂主义分子……是该提出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纪律问题的时候了。

……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7, п. 508, д. 6, л. 1－3

№25533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②

(1964年1月28日)

在莫斯科，克诺泰从北京回华沙的途中。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②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克诺泰指出，最近他自己以及其他一些驻北京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的同志都有一种印象，好像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国家共产党在与中国激进主义者的宗派主义派别方针斗争中表现得有些消极。而且他还强调说，在与中国领导人就一些争论问题有可能取得相互谅解方面，有些共产党显然存有幻想。谁这样想，谁就犯错误：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克诺泰同时还说，对中国人有利的是其他共产党中会有尽可能多的人被这样的幻想所感染，因为这会产生一种等待希望的局面，一种不是去寻找斗争方式，而是削弱在兄弟党队伍中揭露中国立场的局面……

总之，克诺泰强调道，谁珍惜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珍惜所有建立在真正的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他就应该以刻不容缓的、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斗争为出发点，不仅与中国的分裂主义方针，而且要与有危害的、危险的也是中国领导人竭力要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纲领进行斗争。“我想要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与……[1]同志、斯彼哈尔斯基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会的同志讨论这些。”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08，д. 6，л. 30 - 31

№20278

外交部远东司呈送的备忘录：中国领导人对蒙古的要求

(1964 年 1 月 30 日)

绝　密

仅 1 份

关于中国领导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求

(情报资料)

苏共二十大之后，米高扬同志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会谈。1956 年 4 月 7 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米高扬同志会谈中，提出蒙古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周恩来回忆说，1949 年米高扬同志在中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曾向斯大林提起过

---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译注

将蒙古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之后,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同志给出了一个错误答案,并问到我们是否认为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之一。[①]

周恩来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他自己也抱有同样的观点,即斯大林给出的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了回应米高扬同志对这种观点的反对,周恩来正式说:斯大林给出的回答,即蒙古是否合并到中国应该问问蒙古人民,确实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与党的原则一致的话,斯大林的回答本应有所不同。周恩来推测斯大林本应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当时是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会谈,他本可能说中国应该与蒙古人民对话。周恩来认为斯大林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表达他的观点。米高扬同志解释说:斯大林的这个回答应该解释为,斯大林事实上是在反对提出将蒙古合并到中国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因这个问题与中国同志卷入争论之中,他建议将这个问题留给蒙古人民来解决。

依照在同一会谈中刘少奇所表述的,中国人民对蒙古脱离中国很痛心。刘少奇说在苏联举行俄国和乌克兰合并300周年的庆典上,(有些人)说蒙古在300年前就已是中国的一部分,问到蒙古能否重新合并到中国。刘少奇接着说,中国人民把蒙古看作是和台湾一样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米高扬同志认为把蒙古和台湾等同是错误的。中国人生活在台湾,但在蒙古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蒙古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也不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以后蒙古要求以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蒙古人民尝到了独立的滋味,再也不想放弃独立。米高扬同志接着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把蒙古合并到苏联的想法。当日本占领部分中国并试图攫取蒙古时,我们举起手中的武器来保卫它。危险过后,我们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武力,帮助蒙古人民建立自己的军队来保卫国家。并且,当时许多蒙古同志提出将蒙古作为苏联共和国合并到苏联的问题,我们无条件地拒绝了。最后,米高扬同志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脱离中国而后悔的情绪,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感到担心。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脱离中国的行为是由蒋介石政府执行的。这个行为是正确的,它起因于实际情况。

周恩来和刘少奇总结说,他们不是在提把蒙古合并到中国的问题,这些可以以后再做。但是他们认为表达出"中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适宜的。同年4月,当米高扬同志在乌兰巴托的时候,他把以上提到的与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对话内容告诉了蒙古朋友。泽登巴尔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宣布,他们同意米高扬同志所主张的立场,并强调他们将拥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
库尔久科夫
1964年1月30日

CWIHP Working Paper №42,2003,pp.23-25

---

① 参见以上文件№16472、№16476。——编注

№10400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节录):关于中苏关系部分

(1964年2月14日)

……

五、关于苏中关系

同志们!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贯认为,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和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完全无私的和国际主义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支持中国劳动人民,支持他们的共产主义先锋队,为争取独立、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我们认为,兄弟般地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保护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自己的职责。

我们党、苏联人民都清楚,苏联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规模和性质。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期内,建造并以最新设备装备了大约200个大型工业企业、车间。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系列工业部门,而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这样的工业部门。例如航空工业、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动力、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仪表制造工业、无线电技术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各种部门。

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企业,使中国能够每年生产870万吨铸铁、840万吨钢、3 220万吨煤炭和页岩。我们国家协助建立的企业所生产的锡占整个部门产量的70%,而在合成橡胶产量占100%,电力生产占25%—30%,载重汽车和拖拉机产量占80%。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国防企业,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1950—1960年期间,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各种期限的苏联专家达1万多人。1951—1962年期间,在苏联学习、培训和实习的中国工程师、技术员和专业工人大约有1万人,学者大约有1 000人。在这段期间,有1.1万多名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于苏联的高等院校。

自1953年起,根据苏共中央以及H.C.赫鲁晓夫同志的亲自倡议,消除了我们两国相互关系中存在的不平等因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表现之一。在此之后,中苏之间的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毛泽东在1957年说:"在中国问题上,消除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和积留下来的问题的功劳,属于赫鲁晓夫。"

1959年,中苏经济联系的范围比1953年扩大了几乎1倍,而在此期间,给工程项目供货

数量增加了7倍。自1954—1963年期间，苏联转交给中国24 000多套科研文件，其中包括1 400个大型企业的设计草案。这些文件饱含了苏联人民以及它的科技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全部科技文件实质上是无偿提供给中国的。

苏联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条件极其优惠的贷款，总计8.16亿卢布。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牢固地取得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地位，坚定不移地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我们经常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切最重要的举措，竭力使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协调一致。

应该说，在给予中国人民以帮助的同时，苏共中央也非常珍视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持。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出口给苏联的一系列贵重商品，传授中国科学积累的经验，而且还有为巩固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共同进行的斗争。

1950年，苏联与中国之间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不仅对两国之间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对巩固远东和平都是重要的促进因素。

苏联神圣地信守该条约中自己的全部责任。每一次，当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苏联都表现出准备彻底履行自己同盟者的责任。例如，1958年秋天，苏联政府首脑H.C.赫鲁晓夫同志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明："进攻我们国家的好朋友、同盟者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进攻苏联。"1962年的7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声明。从所说的可以看出，苏联政府是怎样认真地对待加强中苏友谊这项事业的。

但是，很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58年开始，越来越经常地采取各种措施，破坏中苏间的友谊，并以一些未经协商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不仅给苏联，而且也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困难。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单独的不友好的行动，转入坚决地压制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了。1960年各兄弟党的莫斯科协商会议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向苏联提出要求，要求重新审理以前签订的，关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全部协定和议定书，拒绝苏联计划供给的一大部分设备，将中苏贸易规模弄到最小的程度。

苏联政府，尽管也明白，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方针将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带来危害，但是，除了同意这一点，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结果是，1962年苏联与中国之间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和技术协作)的总规模，从1959年的水平降至36.5%，而成套设备和材料的供给减少了97.5%。1963年，经济合作和贸易规模继续缩减。

自然，对于中苏合作的急剧缩小，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苏共中央多次致函中共中央，呼吁预防这种现象发生。我们还建议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建议没有反应。怀着自己特殊的目的，他们一步一步地恶化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间关系。

中共领导人在采取压缩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方针时，最初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

"第一，由于苏联的帮助，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初步基础，因此，今后绝大

部分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设计工作,将由本国力量来完成,我们想减轻苏联援助中国的负担。但是,对于那些我们自己不能设计、建造和装备的工程项目,今后我们还将请求苏联的帮助。

第二,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最重要的工程项目,缩减基本建设工程的总数量以及压缩那些不是很迫切需要的工程项目,以便更好地实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内的建设规模今后还将扩大,速度还将更快。

第三,由于最近两年农业自然灾害,给我们收支差额方面造成了一系列困难,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缩减苏联援助建设的一些工程项目,为我们两国之间更顺利地合作创造一些条件。"(摘自中国政府代表团领导人顾卓新在1961年2月10日中苏谈判时发表的声明)

现在,正如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已经"忘记"自己过去的一切表白,并断言,似乎中苏间联系的缩减是苏联方面倡议的,仿佛这一点也正是造成中国国民经济最近一些年来处于困境的原因。

现在,中国的宣传机关拼命想证明,仿佛所有这些不是苏联援助中国,而只是普通的贸易业务。为了抹去人民心目中苏联援助的印象,中国甚至不择手段,将苏联的机床和机器上的出厂商标撕下,并造谣说,仿佛苏联将已经老化的设备供应给中国。恰恰相反,不仅中国人自己,就连外国的报刊都断言,苏联援建的这些企业,如长春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电机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都是现代工业的优秀典范。

类似行动是与最起码的道德品质相违背的。让中国领导人去思索吧,但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苏联的指责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指责说,苏联缩减了自己的援助,这引起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布谣言说,苏联的援助没有效果,无足轻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援助"没有效果","无足轻重",那么,援助的缩减又怎么能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损失呢?

这些都是中国同志惯于使用的表达方式,而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呢?事实表明,所有这一切,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尽管中共领导人表现出这些公开的敌意,我们国家仍然忠诚地履行着自己以前承诺的责任,仍然继续协助中国建设80多个工业企业,和从前一样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学者和大学生们还在苏联进行生产实践和业务学习活动。对于1960—1961年期间中国出现的经济困难,苏联的反应是兄弟般的。当中国极其缺乏粮食的时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中共领导建议,相互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白糖。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在5年时间里按贸易结算方式分期清偿所欠2.88亿卢布债款的机会。

如果说苏联,正如中国领导人断言的那样,竭力压缩自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那么,它为什么还要采取所有这些步骤,一次又一次地向中方建议扩大互利贸易和经济合作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领导人没有给予答复。他们也无法给予答复,因为正是中共领导人自己竭力压缩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的。

为了尽量给由于"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辩护,中共领导人总是经常地提

出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尽管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中，这个问题已经多次阐述过，但现在，不得不再一次谈一下这个问题。

苏联政府向中国派出自己的专家，出发点是：援助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国民经济缺乏相当数量的专业干部。这绝对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对中国人民真正的兄弟般的援助。

考虑到，对外国专家的需要具有暂时性，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专业人才很快就会成长起来，苏联政府先后于 1956 年、1958 年提出了召回自己专家的问题。当时，类似的建议对有苏联专家工作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提出过。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专家，这些建议被其他所有国家接受了，而中国政府请求苏联专家再停留一段时间。

在坚持留下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当局又故意非难苏联专家，给予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的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正好遇上了"大跃进"，它破坏经济发展比例，违反一切技术规则。苏联人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政策的危险后果，他们对于违反技术要求的事向中国的组织多次提出警告，但是，没有任何人重视他们的劝告。由于无视苏联专家的劝告以及中国工人粗暴违反技术规则造成了重大事故，并时而伴有人员伤亡。例如，新安江水电站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由于忽视技术条件，造成凿岩坍塌，工程被拖延了一段时间。在新丰江水电站，也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过梁中断，基坑下陷。在这两起事故中都有人员伤亡。可以理解，苏联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人理睬我们的专家，因此，他们开始申请允许他们返回祖国。

况且，自 1960 年春天起，中国当局开始"劝诱"苏联专家，教唆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引起我们理所当然的愤怒。

苏联政府多次提请中国当局关注所有这些令人气愤的事实，并坚决请求为苏联专家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但是，对此的答复是，中国当局开始更加不友好和侮辱性地对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看作是"保守分子"，开始千方百计地辱骂苏联的经验和技术。对苏联人的监视加强了，经常性地搜查他们的私人物品。在这种情形之下，召回我们的专家是摆脱业已形成的状况的唯一出路。

现在，当众多事实开始明了时，有理由认为，自 1959 年起，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激化自己与苏联的矛盾之时，与其说他们需要专家，还不如说他们需要关于专家们的问题，即能否利用他们来作为与苏共进行斗争的理由。

为了巩固中苏之间的友谊，苏联政府在召回自己的专家之后，努力调整这个问题。1960 年 11 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受苏共中央的委托，A. И. 米高扬同志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正式会谈并声明，如果中国确实需要苏联专家，并且为专家们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那么，我们准备让专家们返回中国。关于这一点，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在与周恩来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会谈时也说过。在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双方会晤时(1963 年 7 月)以及在苏共中央 1963 年 11 月 29 日给中国领导人的信函中，我们再一次正

式声明,如果中国需要我们专家的技术援助,那么,苏联政府准备研究派他们前往中国的问题。对于所有这些建议,中国领导人没有作任何答复,而为了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却继续利用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他们试图利用我们召回了专家这一点,来解释重新审理经济计划、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出现的困难。

但是,第一,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困难还是在召回苏联专家之前就出现了,是"大跃进"危险的试验造成的后果。第二,最大的困难正好出现在那些完全没有苏联专家,或者苏联专家为数不多的部门。

1960 年,在煤炭工业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只有 2 人,国营农场和生荒地部门 3 人,农业和林业部门各 1 人,召回他们怎么可能对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林业、轻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作产生影响呢?事实上,最大的失策正是出现在这些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

是时候了,中国领导人应该停止将自己的党、中国人民以及社会舆论继续引入歧途,应该诚实地说明将中国人民置于困境的真正原因。

而真正的原因就是中国领导人忽视了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客观规律。

该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即由于中国领导人的逐年努力,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中苏之间的经济合作,还是文化交流,社会团体的往来都减少了,而与此同时,对苏联人民的馋言中伤和挑唆诽谤之辞却增多了?只有一个解释:中国领导人竭力使自己的人民与苏联人民隔绝,他们害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真相,害怕知道苏联就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兄弟般的无私建议,于是就到处散布无耻的谣言,以此来诬蔑我们的党,诬蔑苏联人民。中共领导人担心,与我们国家的合作可能会使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精神这股清新的风吹送到中国,而正是这次代表大会消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状况。(掌声)

我们还认为,必须向全会说明,只是由于中方的错误才使中苏边界遭到破坏。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文件里,都讲过这件事。1962—1963 年期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

苏联政府已经提出倡议,就中苏边界某些地段明确划分一事进行磋商。我们的出发点是,中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中苏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而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地段。

为破坏中苏友谊的基础,中共领导人在自己国内以及国外肆无忌惮地组织反苏联的宣传活动。中国的报刊充满了挑唆诽谤性文章,这些文章对苏联的现实进行指责,对苏联人民进行无耻的诽谤。在中国政府的一份声明里,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评价:"与一切战争势力联合以进行反对和平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联合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

所有这些论点都是彻头彻尾的诽谤性谬论,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朋友,还是对于我们的敌人,这一点都是绝对显而易见的。苏联的共产党员们,全体苏联人民都会愤怒地批驳这种无耻的谎言。诽谤者所能干的只是这样肮脏的勾当。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执行列宁的方针。

РГАНИ,ф. 2,оп. 1,д. 720,л. 31 - 36

№25777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苏联的对外援助[①]

（1964 年 2 月 14 日）

M. A. 苏斯洛夫于 1964 年 2 月 14 日在 2 月中央全会的报告

（晚上召开的会议）

苏斯洛夫：……没有一个国家不向我们求援，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援助他们。（掌声）只是近期我国给阿尔及利亚、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锡兰、老挝和许多其他国家给予巨大的援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除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和恶毒的谩骂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同志，我想插一句，请原谅。他说得对，但他没有说，这点我知道，他的报告做得很好，很详细。我们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具体表现在哪里？当苏加诺打算反对荷兰人，我们廉价出售给他们驱逐舰、巡洋舰、装备火箭的舰艇和其他武器、鱼雷艇；而等要走的时候，苏加诺说：我们没有会掌握潜艇的人员。请把你们可同我们一起去战斗的人派给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的潜艇艇员给他们。（掌声）这不是口头上的支持，而你们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设备。后来他说，我们有装备导弹的轰炸机，但是没有能够发动攻击的机务人员。请给你们装载有导弹的轰炸机的机务人员给我们。后来，我和苏班德里欧讲话的时候说：好的，我们的人会去的，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击沉荷兰航空母舰的排演。（掌声）

再次抱歉。也门发生暴动时，这些您在报上也见到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打击了那些妄图恢复也门王国政权的反革命军队。

苏斯洛夫：上面提到的这些武器英国支援了没有？

赫鲁晓夫：谁给他们呢？纳赛尔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有人，他们有我们出售给他们的飞机，可就是没有机组人员，请支援我们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请售给我们一些运输机，可以将武器和士兵运送到那里，再支援一些武器，我就将机密告诉您。"马林科夫同志说，他要什么我们都给，但是必须打着纳赛尔的招牌。我说，咱们就打纳赛尔的招牌。（掌声）这样我们给他们"AH－12"飞机，我们支援了机组人员，送去也门的有武器和轰炸机，轰炸机上喷涂的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星号，机上的人员是我们的，炸弹是我们的，飞机也是我们的。（掌声）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喜欢打仗，我们只是坚定地站在不干涉的立场上。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掌声)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上面的例子不足够说明问题,你们看,我们这些基督教徒是名副其实的,我们信奉基督教的信条。(掌声)

菲德尔·卡斯特罗碰到我,对我说了许多话。我对他们说:“您听好,讲到美帝您很恼火。他们做的就是帝国主义做的,请设想一下,如果您也像他们一样强大,您也会像美国那样。他们美国人对我们却不会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们,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反对我们,应该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对不起,我在您做那么精彩的报告时,与您一起唱起双簧起来。请把我们的这些话从您的报告中删去。

苏斯洛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新报告中有些内容解释得很透彻……

赫鲁晓夫:同志们!我想请你们注意这一点,例如,我们给中国贷款,有意思的是,如果经济学家能注意到,我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谈判,他们自愿向我们提供贷款,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机会的话,我们会接受贷款……

РГАНИ,ф. 2,оп. 1,р. 6321,ед. хр. 720,л. 67 - 95

№25776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

(1964 年 2 月 15 日)

请赫鲁晓夫同志作这次会议的闭幕发言。

赫鲁晓夫:同志们!我想作些解释。两个月前我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过一封信。中央委员们都知道,因为这封信我们是写给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检察委员会全体委员。这封信我们也寄给了一些兄弟党。这样它就是我们的路线,也是与其他兄弟协商过的,我们希望停止争论,希望中国人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同意信中的意思。

报告人和其他同志在发言中都讲到中国对此信的态度。他们对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断加强进攻,继续执行分裂的路线。

在目前进行的中央全会上我们也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进行分裂的问题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党的信件不予答复,我们商量了这个问题并决定对此给予还击——将我们的报告、决议和所有文件刊登在报刊上。

有些党(认为我党公开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党)的代表请我们拖延几天,不要将决议

和报告公之于众。他们说——这几天之内我们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争论。

如果他们不接受呼吁，我们认为应该公布那些在全会上通过的文件，到那时我们也将揭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同志们，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央委员们、全体党的积极分子、党组织的代表们能理解，明天我们不会将第二个问题的报告内容、第二个问题的决定公布出来。我们还将召开关于本次全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讨论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也会讨论。何时公布有关文件，何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以后会有通知。如果这个过程会延迟的话，我们就不会等到这些资料公布，就召开积极分子秘密会议，会上将讨论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如果讨论的时间不长，最好公布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资料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

这就是我要向大家、全体中央委员、积极分子通报的内容。我们还是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有没有人反对这种策略？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做法是否会有结果，那我说，我估计不会有结果，但是有些同志还是相信中国人会善意地接受我们的意见，应该给这样的同志机会。我们之所以应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争斗，就不要装成是好斗的公鸡。让我们表现出骨气、耐心并给这种机会，即如果争斗，那就不是为了争斗而争斗，而是为了团结而争斗。所以我们应该和那些与我们的理解和观点一致的党最大限度地加强联系以及表明自己的立场。

同志们，我想解释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为什么暂时我们不会公布这一切。昨天我们想，该问题应该以非公开的形式来讨论，因为如果 6 000 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一些人会这样说，其他人会那样说，这样会导致整个党都会知道。因此我们希望同志们通过党组织得知，到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党组织告诉你们。

一共有 8 个人讨论了苏斯洛夫的报告。

РГАНИ, ф. 2, оп. 1, р. 6321, ед. хр. 721, л. 154－156

№23019

韦尔边科致赫鲁晓夫函：拉丁美洲人民拥护苏联

（1964 年 2 月 15 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昨天当我听完了 M. A. 苏斯洛夫所作报告的第一部分之时，我感觉，该报告的第一部分

不够有力,甚至还带有防御的意思。而当听完了报告的第二部分时,我才开始明白,我的判断下得有些过早了。

我认为,所有共产党员们早就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即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给予坚决的回击,而其分裂主义思想观念也将受到我们强大的宣传,我们强大而坚定思想的压制。

中国分裂主义者们最大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就是试图使您脱离中央,使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脱离党和人民。

我国人民对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的热爱是早就公认的,在会议厅里,您受到人们满怀热爱和喜悦的欢呼,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我这里要重复的,这只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

在这封我请您读的信中的东西,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甚至可以说成是我的隐私。我想说的是关于离这个大厅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拉丁美洲的人们对您的热爱。几个星期以前,我因公务去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关于数十次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对苏联和您所表现出的热爱和友好情谊的著名事例,我就不再一一重复了。

这里,我只想对您说一件令人激动的事。那是在1963年11月24日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当走近加里波第广场之时,我们看到有一群人聚集在广场上。在人群中的一个高台上站着一个手举美国国旗的演讲者,在结束讲话之时他高呼"美国万岁,洛克菲勒万岁"。此时人群发出一阵鼓噪之声,出现了另一位演讲者并高声讲道:"你是美国的走狗,美国佬,强盗。苏联——我们的朋友,那里有我们的兄弟。"与此同时,他忽然摘掉萨姆博列诺式帽子,挥拳朝那个拿着美国旗的演讲者打去,而后者瞬间便消失了。而此时整个人群均站立着,以纯粹的墨西哥人的冲动情绪一字一顿地高呼着这样的口号:"俄国万岁,赫鲁晓夫万岁。"

此时,人群发出一字一顿的高呼声——"赫鲁晓夫万岁",甚至比我们会议厅里的欢呼声更积极、更响亮。

这里还有一个实例。您当然晓得所有记者们的语言——当然包括我们的记者在内——都是非常尖刻的。在墨西哥,我们曾组织了一次与墨西哥记者的新闻发布会。我要重复的是,这都是些语言尖刻而性质外向的人们。他们请我们谈谈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由于担心他们会厌烦,我原本只想作一个简单的答复。可实际上,就这个题目的谈话竟用了近3个小时。请相信我,在这3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们,尤其是女记者们在赞扬我们的立场的同时,又一次激动地开始高呼"万岁苏联,万岁赫鲁晓夫"。如果当时有一位毛泽东的拥护者也在场,如果毛的"思想"拥有些许成绩的话,那么在自己的国家中墨西哥的记者们可能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到他,哪怕只有一个字。可实际是,当时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只有"赫鲁晓夫万岁"的强而有力的口号声在房间里轰鸣。

我对您说这些,完全不是为了贬低我们与中国分裂主义者斗争的意义,也不是为了以此来恭维您,完全不是这样!我甚至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地承认,我们——苏联人,当听到远在现在这个会议厅15 000公里之外的人们对您、对苏联表达自己的热爱之情的时候,都激动得

流泪了，甚至还有人由于幸福而像男子汉那样大哭起来。

苏共中央委员

A. A. 韦尔边科

1964 年 2 月 15 日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706, л. 1 - 2

№23020

别图霍夫致苏斯洛夫函：如何答复中国寄来的贺信

(1964 年 2 月 15 日)

苏斯洛夫同志！

请就如下问题提出中央的意见，即是否应当答复中国同志——我们在中国一起工作的熟人——发来的贺词和问候。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在革命节日和新年之际发来此类贺词。

别图霍夫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706, л. 3

№2553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苏共要求停止公开论战[①]

(1964 年 2 月 18 日)

彭真在谈到苏联 2 月 12 日写给各兄弟共产党的信件时说："你们在这份文件中说中共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中央至今没有回复苏共中央11月29日有关停止公开辩论的信……的确,对你们1963年11月29日的来信我们是没有答复。可难道这封信是最后通牒,难道那有期限要我们必须答复你们?我们不可能顺从地执行你们任何指令。"

彭真说:"我想提醒一点,你们在1963年11月29日的信之后并没有停止辩论……这算什么?你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是'沙皇'?而你们说的话和声明就是命令?你们是不是认为啥时想公开辩论就开始,啥时想停止就停止,而我们就也应该沉默不语?"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6,л.35-37

№25774

甘科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中国在火车上散发反苏传单

(1964年3月23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边防管理总局
1964年3月26日
第1245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科夫同志:

据运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苏联的"北京—莫斯科"苏联列车长反映,1964年3月23日中国人在自己的边境站满洲里从货运车厢里搬出大量的反苏俄文书籍。

已查明,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检验后向来自苏联的乘客散发这类书籍,特别在那些俄语掌握得很好的回国越南留学生中间散发。

中国职工平常还把反苏期刊整齐地放在满洲里车站上的专业书架上。

我们采取了严格检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重点检查在苏联外贝加尔站工作的中国公民。

特此告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边防管理总局代理局长

甘科夫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10,д.18,л.22

№1039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4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4月13日会议第97/102г号记录

第102项 关于延长苏联的无线电汉语广播时间。

一、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延长苏联用汉语向中国居民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从6个小时增加到9个小时。

二、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提供用于扩大苏联汉语无线电广播规模必要的技术工具，采取措施保证能够在中国境内清楚地收听到苏联的无线电广播。

ЦХСД,ф.4,оп.17,д.575,л.32

№25762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古巴进行宣传活动[①]

(1964年4月14日)

……

1964年4月14日外交部给中央执行机关寄去一份题为《中国分裂分子在古巴的宣传活动》的材料，材料由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编写。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宣传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基本上是从中国运来的,因为宣传印刷品在古巴必须得到古巴社会主义统一革命党宣传鼓动部的批准。“这里这类印刷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都不受欢迎,其理由是公开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会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害,会破坏人民中间的团结,尤其在此时,正在建立共产党的时候。”……

“去年年底古巴社会主义统一革命党宣传鼓动部已经采取措施,限制《北京周报》和1963年最新发行的明显反苏的书刊运进古巴,其他书刊只得存放在书库里,不得出售。”

“涉及中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刊物不得出售。”(这种刊物只有在中国人私营的书店才能买到)

РГАНИ,ф. 5,оп. 58,р. 7745,ед. хр. 116,л. 93 - 95

№25790

苏联驻印尼使馆致苏共中央报告: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工作

(1964年5月29日)

根据苏共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指示所开展的工作①

1964年5月29日

……

……事实证明,中共领导人为了分裂,早就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诱导。

……有一次我们跟艾地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讲了他写一本关于他苏联之行的书。但此后艾地借口工作繁忙说,如果有人帮他收集资料,这样工作就会快一些。这类资料被收集好了,翻译为印度尼西亚语,但是工作没有进展。

……有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故意不参加我大使馆的招待会。

……在中共与苏共分歧问题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采取保持平衡的立场,站在无原则的立场找自己有利的看法。有时候印度尼西亚中央领导人说争论有害,其他时候说,争论是真正马列主义的大学,还有时候明显地在讨好我们,试着开中共领导人的玩笑……但从所有这些情况,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话中都能感觉到亲中国的情绪。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至于苏吉斯曼，他的亲中国思想为人知之甚少。他是一个支持三驾马车的人，因此必须研究他在1963年给苏联写的那份报告。

……为了使印度尼西亚摆脱苏联、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摆脱苏联共产党，中国分裂主义分子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采用贿赂、收买的手段在印度尼西亚公民中物色可靠的人物，中国经常给总统身边的领导人送礼。

……大使馆在执行2月中央全会指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出版方面，出版部门尽量广泛地刊印2月中央全会的文件；出版了印尼版苏斯洛夫报告1 000册，作为《苏维埃国家》(Негери Совьет)杂志的副刊(共10万册)；

苏共2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刊登在这份杂志上，也刊登在《苏维埃新闻》(Вери Совьет)报纸上，共2 500份；

另外还有通告各种展览会散发苏共2月中央全会的文件。

印刷这些文件需要大量资金，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我们已于今年5月通过外交部提出再拨出一部分资金。我们相信用在这上面的钱会有一定的回报。

我们大使馆有不少青年通晓印尼文，确定的人数为8名。他们可以用印尼文给大家作讲座。

应该指定并提供文件，报告纪录片和电视片的发行计划，以便介绍苏联的生活以及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1964年6月8日《红星》向中央主席团提出加入揭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裂活动、反列宁主义路线行列的请求。

……1964年10月19日 H. 梅夏采夫报告北京电台8次播送中国领导人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电报的全文。

……

РГАНИ，ф. 5，оп. 55，р. 7745，ед. хр. 116，л. 154－191

№21930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回复

(1964年6月1日以前)

草案

苏共中央决议："关于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复信"

不晚于 1964 年 6 月 1 日①

1. 批准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信件的复信内容(附录一)。②

2. 批准给苏联驻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的指示(附录二)。③

3. 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波诺马廖夫同志)向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介绍苏共中央的上述复信内容。

4. 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示(附录三)。④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476,л. 20

№21931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草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共运的立场

(1964 年 6 月 1 日以前)

苏共中央就中国领导人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诸问题的立场给中共中央的信件⑤

不晚于 1964 年 6 月 1 日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已于 5 月 7 日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信中包含着你们对我们今年 3 月 7 日去信的答复。在这封信中⑦,你们不仅拒绝了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党派提出的旨在消除

---

①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上所标注的日期,源自 1964 年 6 月 1 日 Б. Н. 波诺马廖夫和 Ю. В.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随附报告的复印件上所注日期。该报告已散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书记。——原注

② 参见以下文件№21931。——编注

③ 附录二未公开。——原注

④ 参见以下文件№21932。——编注

⑤ 这个草稿在编辑时根据 1964 年 6 月 15 日的文本做过校订。——原注
该信件的中文本,作为 1964 年 6 月 15 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表在 1964 年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第 2 版。这里的译文是按照信件草稿原文翻译的,苏共中央对草稿的修改,均有俄文编辑所加注释说明。读者可对照《人民日报》阅读。——编注

⑥ 这里所标注日期是 1964 年 6 月 1 日 Б. Н. 波诺马廖夫和 Ю. В.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报告的日期,而信件草稿是这个报告的附件(参见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476,л. 19)。

⑦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这封信件”,而是“自己的信件”。——原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所有建议，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了与各党代表会面、举行谈判和共同与之讨论全世界共产党员所忧虑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 3 月 7 日自己的[1]信件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 3 月 7 日信件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目前，多数兄弟党都已赞成立刻召集会议。一些党原则上同意召集这次会议，但与此同时，鉴于你们对此次会议的举办持反对态度，他们均对会议举办的时间提出了保留意见。不过，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 5 月 7 日的来信中建议，将此次会议的举行推迟“4—5 年或更长时间”，而且声称，“不召集会议比召集会议要更好些”。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年 10 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在反对这样做。当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等国的共产党建议在 1962 年夏季召集会议时，你们是最先对此表示同意的。[2] 1962 年 4 月 7 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1962 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 1963 年 3 月 9 日和 6 月 14 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3] 最后，你们在 1964 年 2 月 29 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

---

①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自己的”一词。——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最先”一词。——原注
③ 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中没有发现中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9 日和 1963 年 6 月 14 日致苏共中央的信。——原注

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

由此可见，还在不久前你们仍赞同召集会议，并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② 然而，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却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那么请问，在近 2 个月以来——从 1964 年 2—4 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共中央有什么正当理由来重新考虑在召集会议问题上的立场。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看起来，问题在于：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在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③

虽然对其他党的意见，你们极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并声称不害怕他们的“坚决回击”；但实际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并极力避免这种诚实而直接的对话，避免将自己错误的纲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相对比。

你们最近提出的反对召集会议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④ 例如你们断言，⑤国际会议的召集只会与中共和苏共代表之间的会谈一样，“导致激烈的争吵和大家四分五裂，从而最终无法得到任何结果”，“引起公开的分裂和各走各的路”。

在事先对此次会议的结果做出上述臆断的同时，中共中央显然已决心将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与会者们，并且不打算谋求与所有兄弟党的团结。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次会议的确已转变为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舞台。但是，如果所有与会者都希望克服困难，如果中共代表愿意寻求与所有兄弟党的相互理解并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此次会议就可能成为加强我们之间团结的转折点。⑥

---

① 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中没有 1964 年 2 月 29 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话。——原注

③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原注

④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最近”一词。——原注

⑤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例如”一词。——原注

⑥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

“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将会导致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裂。

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

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原注

在提议召开会议时，苏共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打算首先把精力集中在那些共同的问题上，这将会把所有的兄弟党团结起来。①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绝大多数兄弟党所支持的马列主义路线的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领导人及其少数支持者所坚持的、与上述路线相对的、错误的纲领。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来阻止其进一步发展的话，这种严重的情况将会成为分裂的严重威胁。而召集国际共产党会议，正是此类最重要举措之一。相对于在国际会议中集体交流意见的方式，兄弟党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制定出统一的立场，使所有的兄弟党在完整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又能积极地参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路线的制定。②

我们认为，虽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召开，一定能在维护团结，防止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并最终完全走向分裂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是需要所有兄弟党派及其领导人，能够充分意识到自身对我们运动的命运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深刻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及其可能导致分裂的后果。③

此次会议有可能消除所有那些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带有诬蔑性和臆断性并引起论战的东西，从而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兄弟党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总体任务的讨论方面。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与各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们谋求共同语言的本领。在这种情形之下，尽管目前我们内部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又有什么理由断言，我们就不能在一些一般性问题上达成相互理解和约定呢?

苏共认为，召集各共产党国际代表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在当今世界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需要我们进行集体性分析并在评价、立场方面相互协调的

---

①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裂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像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原注

③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原注

问题。在国际形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国家极其友好团结的发展、国际工人运动中以及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进程,都要求各共产党采取一些新的政治举措,以动员群众,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平、民族独立,为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而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斗争。而新的国际会议的召集一定会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①

中共中央信件中的如下论断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②:在当前条件下,任何人都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因为没有类似于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性机构。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

---

①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两段文字被如下段落所替代:

"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

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4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

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

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

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

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1957年和1960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

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像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

中共中央5月7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关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句表述为"中共中央断言"。——原注

殊的责任。1957 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①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 11 月 14 日的晚间会议②上也声称，"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争论的课题，③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首先，④参加过 1957 年和 1960 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⑤ 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议。⑥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反党派别小组。⑦ 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⑧ 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

① 这一委托是在会议上以特别决议的形式决定下来的，不应在公开的媒体上公布。——原注
② 在《人民日报》中，此处为"下午会议"。——编注。
③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争论"一词，而是"分歧"一词。——原注
④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首先"一词。——原注
⑤ 指的是 1957 年 11 月 14—16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真理报》，1957 年 11 月 22 日)和 1960 年 11 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真理报》，1960 年 12 月 6 日)。——原注
⑥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是新的国际会谈"。——原注
⑦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反党派别小组"一词，而是"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原注
⑧ 校订后的文本中，"扶植"一词前有"人为地"一词。——原注

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是有意义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5月7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某个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①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宣传运动,②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

①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此后填加了如下一句话:"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宣传"一词前还有"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的词句。——原注

中共中央在5月7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①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这样，我们对中共反对各种关于消除已有分歧的建设性建议的动机进行了研究。② 应该确认，③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5月7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

①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之后还有一句"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话。——原注

③ 在《人民日报》的文本中，"确认"一词前有"再一次"一词。——编注

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①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

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②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③的信④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

---

①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该段最后还有如下一句话:"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本段和上一段之间没有分段。——原注

③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这里有"5月7日"一词。——原注

④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这里有"本身"一词。——原注

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表现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达成协议①：会议应该尽快召开，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以转交给预备会议进行审议。②

---

①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达成协议"一词，而是"商定"一词。——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该句为"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原注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26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1960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从一开始便出现分歧的问题,未必能够找到其他的途径,何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党并不是全权代表,都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出决定。我们建议①预备会议的召集时间为1964年底。②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③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至于26党代表预备会议的问题,则属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职能范畴,因此,只有他们才可能解决该问题,而不是我们两党能够说了算的。④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集体解决⑤涉及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РГАНИ, ф. 3, оп. 16, д. 476, л. 21－36

---

① 在米高扬的批注中,此处有"考虑到形成的局势"一句。——原注

②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不是如下内容:"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从一开始便出现分歧的问题,未必能够找到其他的途径,何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党并不是全权代表,都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出决定。我们建议预备会议的召集时间为1964年底",而"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原注

③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处有"苏共和中共代表的"一词。——原注

④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原注

⑤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处用的是"共同解决"一词。——原注

№21932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草案)：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回信

(1964 年 6 月 1 日以前)

苏共中央关于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信件的复信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

不晚于 1964 年 6 月 1 日①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访中共中央，并递交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信件的复信。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476，л. 39

№1385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

(1964 年 6 月 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4 年 6 月 4 日会议第 147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И. 勃列日涅夫、А. Н. 柯西金、А. И. 米高扬、Н. В. 波德戈尔内、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В. В. 格里申、Л. Н. 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 В. 安德罗波夫、П. Н. 杰米切夫、Л. Ф. 伊利切夫、В. И. 波利亚科夫、Б. Н. 波诺马廖夫、А. П. 鲁达科夫、А. Н. 谢列平；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

① 该指示上标注的日期源自 1964 年 6 月 1 日 Б. Н. 波诺马廖夫 Ю. В. 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随附报告的复印件上所注日期。参见：РГАНИ，ф. 3，оп. 16，д. 476，л. 19。——原注

第 2 项　关于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信的复函。①

赫鲁晓夫、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

1. ……

2. ……②

3. 中国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应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立场？

当他们提议召开协商会议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不合乎逻辑。③

如果召开协商会议和不能达成统一的话——这并不代表着分裂，而仅仅是明确了立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如果他们将决定，意见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就争取不召开会议。

已经拥有统一的纲领——让我们召开会议，并明确现实所证实的那些情况——保留。④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着，应该做出总结。

在殖民主义制度衰落的最后阶段，进步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了。

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谨慎地指出与反动力量的接近。

基本上赞同。

同志们应该参考报告内容完成工作。⑤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8，л. 35－38

---

①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复函所标注的日期是 1964 年 6 月 15 日，并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1964 年第 10 期)。苏联政府表示：准备在将达成协议的任何期限内，举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其目的是使两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苏联政府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建议(曾经在 3 月 7 日信中提出过)：在近期的未来召开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 1960 年大型会议编辑委员会的 26 个兄弟党代表的协商会议，以便讨论举行新的大型会议的前景问题。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磋商会晤是在 H. C. 赫鲁晓夫退休之后，在 1965 年 3 月 1—5 日进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新的大型会议是在过了几年之后，在 1969 年 6 月 5—17 日进行的。——原注

② 在俄国发表的档案中，此两节内容空缺。——编注

③ 在致苏共中央的 1963 年 3 月 9 日、6 月 14 日及 1964 年 2 月 29 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赞成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而在 5 月 7 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立场，建议推迟举行这种协商会议，最低限度推迟 4—5 年。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没有及时地召开这种会议，担心在苏中论战尖锐化的情况下，不能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而最终只能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分裂局面(H. C. 赫鲁晓夫的立场，参阅：1963 年 11 月 10 日会议速记记录)。临近 1964 年春天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并体现在给中共中央 3 月 7 日的信函中。两党立场的前后不一致性，取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有利于其中的哪一方，并与担心在会议过程中将不能获得对苏联共产党有利(或者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原注

④ 指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 1960 年会议的声明(参阅：《真理报》，1960 年 12 月 6 日)。——原注

⑤ 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 1964 年 6 月 15 日的信中，谈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分裂局面，帝国主义分子将是多么的高兴，根据他们的意图显示，已经找到与那些能够实现这种分裂的人员接近的某种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注意到了，正是在现在，当中国宣传机关积极地叫嚣'关于革命'和'关于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执政集团尤其表现出准备与北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原注

№208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答复

(1964年6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6月4日会议第147号记录第2项

绝　密

基本上赞成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回复信函的草案。

委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根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制定附函文本。

РГАНИ，ф.3，оп.18，д.256，л.3

№1039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述苏中边界历史问题

(1964年6月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4年6月8日会议第101/6г号记录

第6项　关于在苏联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以及在绘制地图方面，对苏中边界划分历史的错误说明问题。

(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同志)

苏共中央注意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学术书籍和历史地理地图，对于中苏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于俄中17世纪到20世纪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给予的评价不确切。历史地理地图册、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帝国的版图里。

一系列苏联学者的著作，明显地夸大了中国文化对于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人民的影响，并说在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地区，过去就有中国人的存在。

苏共中央决定：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苏联高等教育部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苏联国家地质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和中等专业教育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教育部修改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地图册，删除其中对于中苏边境线确定问题所进行的不正确的评价，并将改正后的中学和大学教科书予以出版。

二、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协商，整理出版学术资料，在这些资料里，要以正确的立场阐述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国境线划分的历史。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

ЦХСД，ф. 4，оп. 17，д. 579，л. 4

№23047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宣传

(1964 年 6 月 24 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4 年 6 月 24 日
第 1495－c 号

机　密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中共领导人继续利用北京广播电台积极向苏联宣传自己的分裂观点，与以前一样，其播报时间为每昼夜 8 小时 15 分钟。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广播电台的播报内容变得越来越具有诬蔑性和恶毒用心，其中除了跟以前一样包含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其他中国报刊中的敌视性资料外，还播放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以及外国共产党中的叛徒和分裂分子——如威尔科克斯①和格里巴②的流氓言论。来自越南和朝鲜的亲中国报刊的资料以及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所发表

① 威尔科克斯，时任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② 雅克·格里巴，时任比利时共产党书记。——编注

的此类内容的言论，在北京广播电台的播放内容中占有一定比重。

北京广播电台通过不同的频率向外播报，其中一些频道借助日常使用的无线收音机便可清晰而稳定地收到，尤其是在苏联国家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苏联人对北京广播电台的敌视性节目持否定态度。他们愤怒地谴责该电台的诬蔑性质，能够对中共领导人极力促使苏联人民对抗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挑拨离间谋图做出正确的评价。苏联人民各阶层，在自己给北京广播电台的去信、发言和声明中，均对中共领导人给予了驳斥并要求其停止这种活动。

例如，杰米尔-塔乌市的工人 A. И. 帕索奇尼琴科在给北京广播电台的信中便写道："我们全家都听过你们的广播，我们感到无比地愤怒。你们想干什么？是想证明我们的政府错了吗？我们希望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这也是你们所希望的。否则，将如何解释你们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性攻讦。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相信亲爱的党，谁也别想迫使我们去相信你们的诬蔑。"

塔什干的工程师热利亚兹科在给中国广播电台的去信中将他所听到的广播内容评价为：胡说八道、诬蔑和谎言的大杂烩。他依据真实材料论据充分地驳斥了中国的指责：如"苏联蜕化变质"，"苏联资本主义泛滥"，苏联"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等。在信的结尾，他建议道："请抛弃你们的诬蔑，因为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让我们的敌人们高兴。"

马拉干金州"彼得罗夫卡"国营农场工人 П. Г. 克里梅尔曼对自己周围的人们说道："竟卑鄙到如此地步，硬要把苏联人民为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都说成坏事。有必要对中国的广播实施干扰。因为他们所说的针对苏联政府的谎话都是些垃圾，不应当让他们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最近，尤其是当苏共中央 2 月中央全会资料和 M. A.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共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公布之后，苏联人民对北京广播电台节目的兴趣大幅减弱。

……①

……团员指出，正是在中国广播电台的影响下他才起草了这份传单。

卡拉干金斯基出租汽车停车场工人弗多维琴科 1964 年 5 月 13 日在党的公开会议上声称："中共领导人对我们党的批评是对的。在苏联就是没有自由。"

上述类似不健康现象在以下地区的苏联公民中同样存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阿穆尔、伊尔库茨克和苏联其他诸州。

另外，北京广播电台的诬蔑性广播也被国内个别带有敌视情绪的人所利用，他们定期收听该广播，并在苏联人中传播广播内容，为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活动进行辩护。

---

①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页。——编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广播在常驻苏联的中国公民中拥有相当的市场,这些人中包括那些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人和华侨。在中国广播的影响下,其中一些人也开始从事敌视我们的活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与党和苏维埃机关一道,采取进一步举措以消除中国广播宣传的危害性后果。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米恰斯内(B.)(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435,л. 59 - 62

№21934

赫鲁晓夫的口述记录:对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思考

(1964 年 6 月 27 日)

H. C. 赫鲁晓夫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能性一些思考的口述记录

1964 年 6 月 27 日

("巴什基尔"号船[①])

遇事一定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周围到处充满了蛊惑人心的玩意儿。

如今,在为了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阶段,就曾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一些步入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国家的作用问题。那么,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们,是否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个以前不曾有过的问题,因为那时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的,而是乌托邦的。只是在随后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创建,并制定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才建立了党,并以该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工人的党。有人一会儿对你们

① 赫鲁晓夫 1964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4 日乘"巴什基尔"号船前往丹麦、瑞典和挪威访问,该文件为在此期间的口授记录。——原注

说现在就是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提出哈里曼式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是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本·贝拉式等。有人说："我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如奈温[1]、莫迪博·凯塔[2]、恩克鲁玛[3]等。

我敢说，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在气质和认识方面不尽相同，可谓形形色色，却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其中多数人都真诚地信仰着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

但这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他们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可能，他们连自己也没有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不愿意纠缠于具体的争论。可是，也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才能够表露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真正认识以及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差异。

我们是从建党的斗争中开始的，我敢说，我们是在某种清心寡欲的，在沉重的、沙皇专制的地下严峻环境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事斗争，说实在的，需要的是这样一些人——能够抛弃尘世中的一切，并整个献身于斗争事业。

至于如何看待宗教，我们遵循的是列宁所做出的结论，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针对这些麻醉品，即对人民的认识只起欺骗作用的手段，我们当然必须与之斗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当年的俄国沙皇是教会的首脑，因此教会也就成了沙皇的宪兵。教会虽然只效忠一个主人并从这一个地方获得指令，但它却拥有各方面的职能。教会控制着大量地产，拥有巨额财富。另外教会在思想方面，如果可以这样说，或者如果要在当时的俄国寻找某种思想的话，那么教会——便是专制和沙皇恣意妄为的奴仆。

因此，当我们的革命忽然爆发时，与宪兵相比，教会是我们更危险的敌人。革命后沙皇时代的宪兵没有了，但教会依然存在，因为它依靠并利用了民众的支持。教会一度是我们更危险的敌人。因此，为了战胜它，我们就必须集中力量以揭露教会所起的作用并与之展开斗争。教会的神父们不止一次，也不都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许多地方成了富农暴动等活动的组织者。

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正是在经历并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历史之后，才走到了目前的发展阶段。如今，一些新出现的国家正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之中，而其他一些国家才只是走上独立道路，才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今世界上所有业已形成并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现象表明自己的态度。

РГАНИ，ф. 52，оп. 1，д. 263，л. 83－85

① 奈温，时任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政府主席。——编注
② 莫迪博·凯塔，时任马里共和国总统，苏丹联盟党总书记。——编注
③ 克瓦米·恩克鲁玛，时任加纳共和国总统，人民大会党创始人。——编注

№2193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制定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

（1964 年 8 月 19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解决可能引起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领土和边界纠纷的原则》①
第 155 号记录第 2 项
1964 年 8 月 19 日

绝　密

责成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和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安德罗波夫同志），参考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提相关意见，制定主要的原则性章程，以作为和平解决可能引起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领土和边界纠纷的指导思想。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73，л. 1－2

№13854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苏边界问题

（1964 年 8 月 19 日）

你们已经看过了关于边界问题的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② 昨天，我也读了这份文件，

---

① 决议起草和提交人包括：Н. С. 赫鲁晓夫、Л. И. 勃列日涅夫、瓦罗诺夫 Г. И.、Д. С. 波利扬斯基、А. П. 基里连科、Ю. В. 安德罗波夫、А. А. 葛罗米柯。——原注

② 1964 年 6 月底，经过长期磋商，中苏边界工作小组双方达成了关于中苏东段边界绝大部分走向的协议草案。7 月 10 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时突然说到，苏联与中国也有领土问题，外蒙古比千岛群岛的面积大得多，还有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的领土，这笔账是算不清的。（见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1964 年 7 月 10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5/116，第 37—46 页）7 月 12 日，参加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发表了毛泽东谈话的情况。次日，日本三个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并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还提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编注

感到很气愤。整个昼夜我都在思索着，该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做些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文件中。这就是我打算采取的方针。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该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问题。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与中国之间就存在着这个令人敏感的问题，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存在着这个敏感的问题——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① 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而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那里存在着这样的问题。② 在中国，与所有邻国之间，与朝鲜人和越南人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们都处于航道上，所以也就没有提出来。与我们没有分歧。毛泽东曾经说过：在1954年，当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我们就谈了这个问题。③ 他们当时还说，你们看，蒙古曾经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我当时就回答说：是的，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未必愿意回到中国的怀抱。

总之，这是蒙古人的问题。而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中方问。我记得，当时

---

① 根据1920年的特里亚农和约，按照战胜国的意愿，把特兰西瓦尼亚(面积大约为10万平方公里)地区划归罗马尼亚国家所有，这个地区历史上属于正在衰落的奥匈帝国东部的一个州。同时，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在民族意识中极其痛苦地接受了当时丧失这个地区的事实：要知道，自中世纪以来，传统上属于匈牙利"神圣的伊斯特万"国王的领土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命运，始终与匈牙利本身的命运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这并不奇怪。霍尔蒂当局旨在修改匈牙利边界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打算)，在匈牙利相当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中获得了支持，因这它也在极其努力地改写着新的地缘政治局势。1940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当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无数的匈牙利人把这个事实视为恢复了历史的公正性。1947年签署的巴黎和约，确定了匈牙利国家战前的、"特里亚农"边界线，仅对其做了不大的修改(不是有利于匈牙利的)，这样一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仍然被留在了罗马尼亚人的手中。1948年1月24日与罗马尼亚条约的签署，对于匈牙利亚说，不仅是承认了在边界问题上的原状，而且还承认了那样一个事实，即几乎200万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处于罗马尼亚政府的管辖之下。在莫斯科关于有利于"人民民主阵营"团结的压力下，自40年代末期开始，关于修改边界的要求，连同批判性地提出罗马尼亚民族政策问题的内容，在匈牙利的报刊上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当局，完全继承了自己权威性的前任的传统，极其慎重和小心地对待不仅是在匈牙利社会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开的民族统一情绪，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对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民族文化过去与现在的共同性给予了关注。大马季亚尔人修正主义的主观幻想，致使布加勒斯特官方也出现的幻觉，经常给两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造成麻烦(参阅匈牙利党领导人拉科西的回忆录：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8，№ 5-6)。正如从1956年秋天(还是在匈牙利发生起义之前)撰写的致苏联外交部的标题为《关于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罗-匈关系》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54—1956年期间，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曾经多次向苏联外交官抱怨，在他看来，匈牙利领导人，包括拉科西本人在内，所表达的两面派意见：仿佛他们有理由不承认战后的边界(АВПРФ，ф. 077，оп. 37，пап. 191，д. 38，л. 56-6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出现打着复兴社会主义口号的社会意识的高涨，伴随着公开提出以前禁止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地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倡议者，自然不是共产党领袖，而是他们的论敌——共产党人-革新派)。这引起了罗马尼亚领导人极其不良的反应。罗马尼亚领导人完全不倾向于在改革的道路上采取最畏缩的步骤，他担心复兴现有制度的思想，不仅会"传染"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而且会活跃匈牙利少数民族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追求使国家免受匈牙利变化之风的影响，乔治乌-德治及其同僚，在自己的对内宣传活动中，越来越开始强调大马季亚尔人沙文主义的危险性。自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起义爆发之后，这个方针被特别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在匈牙利起义被镇压之后，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其对内宣传活动中继续弹奏民族主义这根弦，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利用了对于全体罗马尼亚人来说不管其政治观点如何都是共同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联合是公正的。——原注

② 指的是使保-罗关系出现麻烦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自两国人民摆脱了土耳其枷锁之后，两国相互追求多布罗加地区引起的，在历史上它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沿岸之间的一个州。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就曾经由于多布罗加地区发生过武装冲突，这些冲突长久地留在了人们对历史的回忆中，无论是对于罗马尼亚人，还是对于保加利亚人。现在，北多布罗加地区属于罗马尼亚的组成部分，而南多布罗加地区则属于保加利亚。——原注

③ 以H.C.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于1954年9月末和10月初期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并积极参加了其成立5周年的庆祝活动。——原注

葛罗米柯也在场。我回答说,我们怎么能够说呢,他们未必愿意。[①]

安德罗波夫:还说过,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国家观念。

赫鲁晓夫:就这些。

安德罗波夫:甚至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控制了蒙古。毛泽东是这样对日本人说的。大家都清楚: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联合国组织的成员国,拥有大使和其他人员。

在伊塞克湖逗留期间,我参观了普尔热瓦利斯基博物馆。那里的馆长——一位残废军人告诉我,主要展览品都保存在列宁格勒。我想说的只是,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里保留着普尔热瓦利斯基对中国民族的鉴定。你们可以阅读一下这些资料。不是所有的人都读过普尔热瓦利斯基的作品,即使读过了,也不是都能够理解的。H. M. 普尔热瓦利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中国人的丑恶、伪善、野蛮和狡猾。

葛罗米柯:恩格斯也曾经写过这样的内容。

赫鲁晓夫:吉尔吉斯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此我就不想多谈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入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边界的认识,关于对国家以及国家消亡的认识。国家何时消亡,镇压工具——军队和警察——何时消失。由此,边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消失的。让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这就是我们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经历的过渡阶段。我们胜利了,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正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为它创造一切基础和条件。在这个过渡阶段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对这份文件进行研究,将会是非常有益的,这里已经提出了问题,有理论也有实践。

在封建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里,这些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呢?这些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我们也就应该这样解决吗?我们继承的遗产,自然也包括纠纷,这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引起的纠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被传播着,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继承下来的所有这些

---

① 《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会谈的内容。该报写道:中国首脑说,苏联打着保障蒙古独立的幌子,以《雅尔塔协定》为借口,实际上是把这个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参阅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塔斯社〕,《真理报》,1964年9月2日)苏联方面坚决驳斥了这种说法。根据《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国领导人希望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H. C. 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同志于1954年秋季访问北京期间,曾经向他们提出了这个建议。作为对此的回答,苏联领导人声明说:"决定蒙古人民的命运,不是在北京或者在莫斯科,而是在乌兰巴托,关于蒙古的国家性问题,只能由蒙古劳动人民自己决定,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做出决定。"(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独立的蒙古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8月,至此仍不承认在现有界线范围内的蒙古主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苏联,同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但条件是:通过全民公决的途径确定蒙古人民追求独立国家存在的意图。1945年10月20日进行的全民公决,是全体蒙古人民支持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的证据。同时,在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蒋介石手中不仅继承了对蒙古国家性的怀疑态度,而且还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谋求。但是,现存的一个没有档案材料证明的说法是:1954年秋天,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在以H. C. 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在讨论因个人崇拜引起的错误时,中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只是在1962年12月,才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条约。在中苏关系尖锐化的情况下,希望使乌兰巴托成为自己与莫斯科论战时的盟友,北京才同意签署这个条约的。然而,在1964年9月的论战中,蒙古方面坚决地、以非常强硬的方式,支持了苏联关于1954年事件的说法,并把中国的声明评定为对苏联的"无耻的中伤",同时指出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觊觎蒙古主权的意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参阅蒙古电讯社的声明,《真理报》,1954年9月10日)——原注

遗毒，令我们饱受了痛苦。

由此可见，我们也将会依靠武器来进行重新划分。边界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而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就这样答复他们的信和他们的建议。我们应该使这份文件成为公众财产。①

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每个国家都继承了边界。如果现在我们开始回到某个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回到哪个阶段上，才能够确定正确的和公平的边界线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中国人说："俄国沙皇掠夺了这些土地"。② 让我们来弄弄清楚吧。俄国沙皇掠夺了这些土地。而现在俄国沙皇没有了，中国的封建者和中国的帝王也没有了。他们同样掠夺了这些土地，就像俄国沙皇那样进行的掠夺。在那里居住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毛泽东也知道，是中国帝王掠夺了这些土地。那些被确定的与中国的边界线，可以这样说，分割的并不是中国人的，而是哈萨克人、蒙古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人的领土。③ 那么，现在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走向共产主义。我们反对战争，我们不以战争的途径解决争端问题，尤其是关于边界的问题。这是理智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分子还有什么区别呢？我强调一下，这种解决争端问题的方法，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现在，我们是13个国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有50个、100个和所有的国家都将会成为社会主义的。

---

① 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声明说，毛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至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中国关于在苏联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的理论遭到了批判，这个理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而是争取霸权的斗争："在毛主席的中间地带里，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被他纳人到了中间地带里，并获得了'反帝战士'的证书……除了把克虏伯康采恩、蒂森先生、洛希尔财团，或许还有弗兰科将军本人迎进自己的队伍之外，没有给革命运动留下任何东西。"毛关于千岛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为了大国的目标而与阶级敌人结盟并发挥作用的意图引起的。谋求苏联领土（远东部分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地区）的理由是，这些领土曾经属于过中国，这些谋求已经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借助于类似的理由可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线最初只是沿着距北京不到100公里的长城一线。要知道，中国的边界线的确曾经是在那里经过的，长城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在文章中还写到，从历史权利的角度来看，中国对苏联远东地区领土的谋求也是毫无根据的，要知道，兴安岭以北地区从来也没有进入过中国的版图中，居住在那里的居民都是满洲的逃难者和向他们纳贡者；实际边界线划分的过程，伴随着俄国占领了阿穆尔水域的北半部，而中国占据了它的南半部，这在19世纪中期被《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固定下来了。现有的边界线是"历史上就形成的，并被生活本身所固定下来，而关于边界的条约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基础"。按照《真理报》的看法，把领土谋求视为普遍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仅是触犯了苏联的利益，而且还破坏了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签署的国际条约的体系，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原注

② 《真理报》以如下方式转述了毛泽东在1964年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会谈时所说的话："大约100年以前，贝加尔以东的地区是俄国的领土，而从那个时候起，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和其他地点，也变成了苏联的领土。我们还没有就这份清单算账呢。"（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塔斯社〕，《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毛演说中的这条内容被加上了以下注解："无可争辩：沙皇政府实现了那种侵略政策，准确地说，这也是中国帝王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所实现的政策。在不同的时代里，有时是这一方，有时是另外一方更强大一些，他们相互占据着上峰"，但是，仅仅根据"在古老的年代里，一个帝王曾经战胜了另一个，然后自己也遭到了失败"这个理由，怎么就能够怀疑工人和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呢？要知道，他们世代居住和劳动在这些土地上。"那些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苏联领土的属性提出质疑的人们，是否会想到：世代生活和劳动在这片土地上的苏联人民，是如何对待这种谋求的，要知道，他们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祖先的土地。"（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原注

③ 根据稍晚些时候的资料显示，在中国居住着350万蒙古人，93万哈萨克人，11.5万吉尔吉斯人，1.3万乌兹别克人。（参阅 С. И. Брук，Население мира，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2-е изд.，М，1986，с. 373）——编注

遗产是要保留的。我们将是这些遗产的拥有者。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争端问题呢?显然，最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将是通过被边界线分割的居民进行表决的方式,或者通过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仲裁机关。我认为,这样做非常好。让我们来问一下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维吾尔人:他们愿意去哪里。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中国人通过枪毙愿意来我们这里的人的方法,来阻止居民。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我们拥有巨大的优越性。我们也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正如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这不仅仅是歌里所唱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我们这里有人道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秩序,等等。

这一点将会被正确理解的,无论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还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世界里。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在此还需要做一些工作。这样,把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建议,作为中国方面建议的基础。不必惊慌,因为接受问题只是一个方面,随后就是应该如何进行表述。应该对这一切进行发挥。他们承认边界,然而,他们却说,请承认这些边界是俄国沙皇通过不公平的方法获得的。那么,让我们也来这样说,从哪一方面是不公平的,让我们来找到自己的表达方法。

我们承认这些边界,我们也承认,以前,无论是俄国的沙皇,还是中国的帝王,都实行过反人民的、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政策。因为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是——强者战胜弱者。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在我们这里通过的边界线,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到中国公民。我们这里没有中国公民。因此,话题指的是什么呢?如果谈到领土的话,那么,在历史上他们是属于哈萨克人的领土,是乌兹别克人的领土,是吉尔吉斯人的领土。在中国的吉尔吉斯人,要比我们这里的多。① 这是吉尔吉斯人的领土。该说什么呢?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吧。让吉尔吉斯人自己决定,让哈萨克人自己决定,如果哈萨克人愿意脱离我们的话,我们的宪法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哈萨克人(他们居住在中国,并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愿意的话,你们也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意这一点,你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应该打仗的。让我们给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吧,让他们通过民意测验的途径,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里不是两个德国。在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而这里只有一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大概,这就是你们的解决办法。

伊利切夫:非常好。

赫鲁晓夫:这也许是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文件。它在未来也许不仅仅适合于我们,而且将会适合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也不可能进行,因为在毛泽东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是不会研究它的。

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让我们随后公布所有这些文件。我们建议这样解决问题。同志们,这将会是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文件。我考虑,应该更好地加工它,应该仔细地

---

① Н. С. 赫鲁晓夫的资料不准确。根据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的资料显示,在苏联有 215 万吉尔吉斯人,而在中国仅有 10 万多人。(参阅 С. И. Брук,Население мира,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2-е изд,М,1986,сс. 143,373)——编注

收集和整理材料，吸收我们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参加这项工作。

葛罗米柯同志就这个问题已经找过我。我打算给他这个建议。

全世界都承认，100 个国家支持我们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意见。中国、朝鲜和越南——出于客观方面的考虑——没有支持我们。①

我们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我们应该依靠理论原则，依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原理。让我们来解决问题吧——或者把它抛到一边，或者站在约翰逊的立场上，而他因塞浦路斯和越南问题受到了指责。②

这就是我要讲述的内容。

同志们，不要着急，谁也没有逼迫你们，需要一周就用一周，需要两周就用两周，如果需要一个月，那么，就用一个月的时间，谁也不会讲坏话的。

安德罗波夫：在罗马尼亚人那里可别出问题。

赫鲁晓夫：这些问题肯定会出现的，关于这点我想过，在匈牙利人那里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有 12 万人。让我们这样说：正像他们想的那样，有 12 万匈牙利人同意希望通过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仔细考虑一下。把他们交出去或许对我们有利。没有任何问题比政治上的胜利更重要了。

他们侵入乌克兰人的境内，排挤乌克兰人，占据了最好的土地，而乌克兰人却迁移到山区里。我对卡达尔说过："你们掠夺了我们祖先的土地。"在议会里有一幅装饰画。阿尔巴特公爵带着自己的军队向斯拉夫人讨要水、土地和草场。斯拉夫人给他了。公爵又说："你们要交出自己的土地。"因为他们拥有武器，公爵就这样在那里定居了。③ 我对卡达尔这样说过。他说："我们是从乌拉尔来到这里的，请把乌拉尔后面的土地给我们吧。"当然，这是与卡达尔开玩笑的话。

自然，这也将涉及罗马尼亚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相就应该是真相，对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安德罗波夫：也将涉及保加利亚。

---

① 指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 C. 赫鲁晓夫致世界各国国家(政府)首脑的 1963 年 12 月 31 日信函。其中包含了关于签署国际协定(条约)以及关于在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时不使用武力的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北越领导人，对这封信函没有表示支持，他们竭力追求使自己的影响力传播到这些国家的整个领土上。——原注

② 1963 年 12 月底的时候，在塞浦路斯岛上，在塞浦路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在美国的积极参加下，企图在该岛上部署联合国的军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964 年 3 月 4 日做出决议，确定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性，根据该决议向该岛派出了联合国的军队。约翰逊政府促进了美国参加到越南的冲突中，其目的是阻止在南越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从 60 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在西贡的军事顾问人数扩大了，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美国的干涉阻碍了南越游击运动占领西贡的意图，然而，北越当局越来越被卷入到冲突的游击队一方。1964 年 8 月 2 日，美国军舰在东京湾遭到了北越军舰的攻击。过了几天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东京湾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美国总统被授权采取有海军参加的针对北越的公开军事行动。这是使越南战争升级的决定性步骤，它导致了美国与北越的直接军事冲突。临近 1964 年底的时候，在南越已经驻扎了 2.3 万名美国军人。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们的人数超过了 50 万人。——原注

③ H. C. 赫鲁晓夫弄错了。匈牙利人(马季亚尔人)迁移到现在的匈牙利境内，是在 9 世纪与 10 世纪的交界上，当时乌克兰人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话题可能指的是，马季亚尔人排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斯拉夫部落。当时匈牙利部落的首领不叫阿尔巴特，而是叫阿尔帕德(死于 1907 年)。——原注

赫鲁晓夫:应该附带说明一下,通过仲裁机关进行裁决,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而如果其中的一方反对的话,那么,最好是推迟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交给时代和历史来解决。这就是全部。

葛罗米柯:暂时不召回代表团,也不交付文件?目前,有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发表了声明,如果需要举行下一次全体会议的话,那么,将推迟很长时间。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开了3个小时的会议,此后,关于这些问题,外交部长是如何考虑的呢?我现在还不能说。他应该如何考虑,而我应该如何考虑?应该考虑到,他们将在那里待着,要待很久。也许,可以说,我们前去与政府进行磋商。现在交通条件很好,只要定下来召开委员会会议,我们就会立即赶到的。从会议到会议需要1—2个星期。我们浪费了时间。责任全在于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也听说了,教授已经离开了。勃列日涅夫将进行汇报。

勃列日涅夫:他们提出了请求,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向隆哥教授转达几句感谢的话。我们将会面,科里奥诺夫同志将转达,还请求转赠礼物——帕列赫艺术盒和镀银搪瓷餐具。这是非常有益的。如果同意的话,就这样做。

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同志,让我们的同志以我的名义给教授写一封短信,应该表达我们的同情。在信中还要提到陶里亚蒂。我们尤其要向您表示感谢,在这种情况下把您牵进来。这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我们没有以我们党的名义说过任何事情。这将是借口,现在这将成为所有报刊的财富,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在此,还可以通过教授对陶里亚蒂说一些热情的话,可以让他来治病。对我们来说这个人是非常宝贵的。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4,л. 1-70

№25973

帕杰尔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关于美国旅游公司的情况

(1964年8月29日)

全苏国际旅游股份公司
第5-9/1194号文

1964年8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 K. 苏达利科夫：

按照伊斯坎达罗夫同志的要求，向您提交驻香港国际旅行社的合约方“艾尔敏旅行中心”旅游公司的报告，以及含有“迪克公司”银行分理处信息的广告手册，它是上述旅游公司的所有人。

附件：小册子1份，报告1页。

东方国家局副局长

M. 帕杰尔斯基

关于香港国际旅行社的合约方“艾尔敏旅行中心”旅游公司的报告

“艾尔敏旅行中心”隶属美国银行办事处“迪克公司”，它成立于1945年，主要在远东和东南亚国家从事金融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办了一系列作为“独立”公司存在的分支机构。

“艾尔敏旅行中心”专门推销游客不多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游，也是组织欧美国家旅游的服务站。1963年8月同国际旅行社建立业务联系后，开始从事欧美国家游服务。公司对同国际旅行社合作很感兴趣。

公司经理季尔克·布林克(美国公民)去年两次来过苏联。

公司的第二号人物是乔治·昌格。

公司共有14名员工，全部是华人。

去年该公司这条线路共兜揽了40多位游客前往苏联。

苏联驻东京、德里和卡拉奇大使馆为公司送往苏联的游客建立了发放苏联签证的简易手续。

公司对后者提供的服务付款很及时，苏联为方便付款在苏联对外贸易部设立了自己的账户。

公司在当地报纸刊登了苏联旅游的广告。由于居住在香港的华人表现出对前往苏联旅游的兴趣，却困于没有国民身份，公司向国际旅行社提出了这些人领取签证的问题。

国际旅行社会同“艾尔敏旅行中心”建立业务关系，引起了香港其他一些更大公司的兴趣，来国际旅行社做工作，使之产生同3家香港公司进行合作的意愿。

东方国家局资深监察员

B. 列别杰夫

1964年8月29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218，д. 30，л. 2-3

№25786

奥尔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驻华使馆开设中学高年级班

（1964 年 9 月 14 日）

致苏共中央

Ю. В. 安德罗波夫同志

伊利切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作为一种例外，从 1964 年 10 月 1 日起在北京的八年级制学校里开设九年级班级，指的是今后如果形势需要，可以将这个学校改为中学，其类型完全可以与我国的中学相匹配。

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政治角度的考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办的八年制学校现有 157 名学生，其中 80 名是人民民主国家、中立国家（印度尼西亚、阿富汗、摩洛哥）等 14 个国家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

上述国家的大使强烈请求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办高年级班，以便他们的孩子在念完苏联学校的八年级以后能够在他们尊敬的、比北京的其他学校有许多优势的苏联学校继续学习。对于在北京开办的英国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许多原因，包括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都感到不满。必须注意的是，刚在北京成立的法国大使馆宣称，他们要开办法国中学，所有外交工作人员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地）上该所学校。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同苏联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共同商量了这个问题，认为在现今中国的情况下，从 1964—1965 新学年起要开办九年级的班级为了接下来教学计划和大纲修改为符合中学的标准。这样苏联的学校会引起更多不仅仅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立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国家代表的注意。

……苏联外交部认为，根据上面所述的，关于在北京八年级的苏联学校开办九年级的班级应视为我们对外关系的措施。

A. 奥尔洛夫

1964 年 9 月 14 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р. 4652，ед. хр. 451，л. 135－136

№20803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年9月21日)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报告
关于应中国的领导机关1964年9月16日所发邀请
派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

致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办公厅提交了苏共中央关于应中国方面的邀请派出代表团参加中国建国15周年的庆祝活动的决议。

在给中国领导人的回信中应该暗示，这一邀请是伪善的，特别是中国官方代表对这一邀请做出的口头解释。这样做是重要的，因为中国领导人总是企图利用信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很可能会发表这些信件。

认为也应该在报纸上发表关于派遣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报道，报道中要阐述我们复函中的主要内容，但不要直接提到这封信。

在这篇报道中，同时也要指明受到中国邀请的其他国家，指明苏联对中国建国15周年庆祝活动的态度。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给中国领导人的复函、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在报纸上发表的报道以及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的指令都在附件中。

请审议。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
1964年9月21日

手写批注：

决定：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各中央书记

B.马林
1964年9月21日

在给赫鲁晓夫的文件上的手写批注：

进行投票表决。

同意。H.C.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3,оп.16,д.538,л.102а,103

№20806

安德罗波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为庆祝中国国庆在苏联开展的活动

(1964年9月22日)

绝 密

1964年9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关于196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我们建议举办一些活动来庆祝这一节日。

根据从中国方面得到的正式消息，今年中国建国15周年庆祝活动将组织游行和国宴。北京将不会举办隆重的聚会活动。

据此认为，苏联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向中国相应的国家机构发送贺电，同时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向中国外交部发送贺电；

在联盟大楼十月大厅举办晚会，邀请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大使馆其他代表，以及根据合作计划前来苏联访问的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这场晚会；

在《真理报》、《消息报》、《苏联》和《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上发表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和材料。

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要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要反映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加强苏中友谊和全面合作的政策，要反映出苏共和中共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强调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进行努力的斗争。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①

---

① 参见以下文件№20802。——编注

请审议。

Ю. 安德罗波夫
В. 库兹涅佐夫
1964 年 9 月 22 日

手写批注：
决定：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便表决。

В. 马林
1964 年 9 月 23 日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538，л. 179

№2080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 年 9 月 2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4 年 9 月 23 日会议第 164 号记录第 46 项

绝　密

1. 应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邀请向中国派遣一个苏联代表团，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代表团团长)，中高等特别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同志，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库拉托夫同志，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主席扎利波沃伊同志，苏中友好协会理事缅霞采夫同志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

2. 批准给中共领导人复函的文本(附件)。①

3. 委托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给苏联大使的指示附后)转交给中共领导人的信。②

4. 批准在报纸发表的关于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通报的文本(附件)。③

---

① 参见以下文件№21938。——编注
② 参见以下文件№21940。——编注
③ 俄国发表该档案时没有刊登该附件。——编注

5. 批准给派往中国参加中国国庆15周年活动的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附件)。[①]

6. 中央秘书处要确定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并解决代表团访问中国相关的组织问题。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82,л. 17 - 18

№21938

赫鲁晓夫致中国领导人函: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年9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60号记录第46项的附件

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给中共领导人的信:关于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国建国15周年庆典活动。

1964年9月23日

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收到了您们的邀请函,邀请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我们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

中国副外长王炳南和中国驻苏临时代办张德群在转交邀请信时,做出了内容完全相同的解释,他们说,苏联可以向中国"或者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团,或者派遣政府代表团,或者派遣社会组织代表团",或者"不派遣代表团"。他们都强调说,不要派遣"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任团长的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兄弟般真诚友好的感情,高度评价中国人民为革命的胜利和发展进行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我们决定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15周年庆祝活动,该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 В. 格里申同志(代表团团长),中高等特别教育部部长В. П. 叶

① 参见以下文件№21939。——编注

留金同志，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T. 库拉托夫同志，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主席 H. 扎里波娃同志，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理事 H. H. 梅夏采夫同志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 C. B. 契尔沃年科同志。

代表团前往中国的日期将另行通知您们。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米高扬

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282, л. 84 - 85

№21940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

(1964 年 9 月 2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 160 号会议纪要第 46 项附件
草案

就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庆典问题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

不晚于 1964 年 9 月 23 日[①]

北京

苏联大使(收)

请拜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并将(苏共中央)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件(参见附件[②])转交给他。

将上述信件文本同时也会被递交给中国驻苏联使馆。

请电告执行情况。请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庆典期间各外国代表团在中国的行程安排的大致情况。

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282, л. 86

---

① 草案所标注日期源自 1964 年 9 月 23 日苏共中央主席所召集会议的日期。——原注

② 参见以上文件№21938。——编注

№21939

苏共中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注意事项

(1964 年 9 月 23 日)

第 160 号记录第 46 项

给前往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64 年 9 月 23 日①

我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期间，应当强调我党、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有的真诚情谊，并对中国人民为争取革命胜利和发展所作斗争的高度评价。必须利用每个机会以展示我们对中国劳动者代表们的热情。

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苏联代表团是在苏中关系极其复杂和关键的时期去中国的，此时的中共领导人已对苏联和苏联政府采取了敌视的政策，并试图引起苏联人民和党与苏共中央和我国领导人的对立。

很显然，中国领导人一定会极力利用此次苏联代表到中国的机会来达到上述政治目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代表在自己的言行上一定要坚持以苏共中央二月(1964 年)全会决议和我党出台的关于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和反对中共领导人分裂的新托洛茨基方针等问题的相关文件为指导。

必须对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国家及其领导人发出的攻击性言论给予坚决的回击。在苏联代表团结束中国的行程之前，针对中国代表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人身攻击应提出严正抗议，在个别情形下针对中方发起的具有反苏性质的活动应拒绝参加。

在适当场合下理应强调我们对中国领导人现行路线的关心，宣传苏共在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努力，广泛普及苏联的爱好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我们国家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弘扬列宁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成就。

在中国逗留期间，我代表团应与坚定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场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并在行动上与之保持步调一致。②

如果中方就党际关系、继续进行苏共和中共代表双方会谈、由 26 个共产党代表组成的

---

① 该指示上所标注日期源自 1964 年 9 月 23 日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日期。——原注

② 在发送给 A. И. 米高扬的那份指示草案中留有一些修改印迹。在“运动”一词之后用蓝色铅笔写了如下文字：“以我们所需要的行动路线对之施加影响。”在该页的左侧空白处与上述蓝色铅笔文字相对留有“A. M.”等字样。在校订后的指示文本中，“运动”一词之后所加的文字已不存在。——原注

起草委员会工作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等问题对我方进行试探，我代表团应以苏共中央关于此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听取中国代表的意见并向中央通报相关情况。

苏联代表团在中国期间，可以基本遵循中国方面提出的行程安排计划，同时也可视具体情况或在征得中央的同意之后对自己的行程做出必要的调整。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82，л. 88－89

№2080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针对中国国庆活动而采取的措施

(1964年9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9月25日会议第160号记录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10月1日)庆典活动采取如下措施：

1. 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国国务院发送贺电，同时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向中国外交部发送贺电。

贺电的文本在1964年10月1日的中央报纸上发表，关于是否发表对贺电的回电要根据收到这些回电的情况而定。

2. 委托苏共莫斯科市委、苏联对外文化联系和友好协会、苏中友好协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苏联文化部，于1964年9月30日，在联盟大楼十月大厅举办晚会，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

邀请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大使馆其他代表，以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这场晚会。

中央报纸要发表关于这场晚会的报道，其中要指出出席这次晚会的官方代表。

晚会开支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金中支出。

3. 委托《真理报》、《消息报》发表庆祝中国国庆15周年的文章。委托《苏联》和《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刊登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照片和报道。

4. 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要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要反映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加强苏中友谊和全面合作的政策，要反映出苏共和中共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强调出苏共中

央和苏联政府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进行努力的斗争。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82,л. 22 - 24

№1385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处理中苏边界问题

(1964 年 9 月 25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4 年 9 月 25 日会议第 160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米高扬、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格里申、叶夫列莫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马利诺夫斯基。

发自北京的密码电报。

赫鲁晓夫、波诺马廖夫、米高扬、波利扬斯基。

进行了归纳总结。自己承担很多。①

指出:在结论中应该更加谨慎,不能起到刺激的作用。应该避免冲突。委托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再考虑考虑,但是,不能失去分寸。中国人不希望发生冲突,我是这样认为的。可能会发生边界冲突、交火。也可能,已经派出机动部队,严格核实这些情报,核实他们的来源。谁说的,同谁说的。密码电报已阅,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进行研究,并与安德罗波夫同志的部门机关共同研究。

关于罗马尼亚代表团(毛雷尔同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②

应该弄清楚,陈毅关于罗马尼亚对我们有领土要求的声明,是否属实。③

关于前往中国的代表团的名称。

米高扬同志说,怎样为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命名。

---

① 可能指的是苏联驻中国大使 С. В. 契尔沃年科。——原注

② 1964 年秋季,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的庆祝活动。1964 年 8 月,正值罗马尼亚摆脱法西斯分子 20 周年之际,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中国代表团可能谈到了关于罗马尼亚对苏联领土要求的问题。——原注

③ 可能指的是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不包括第涅伯沿岸地区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敖德萨州的南部地区)和布科维纳北部地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切尔诺夫策州)的要求,在 1940 年以前这些地区属于罗马尼亚的组成部分。罗马尼亚方面没有正式提出关于重新审理与苏联的边界的问题。——原注

赫鲁晓夫同志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派代表团前往？

苏斯洛夫同志说：如果将举办“音乐会”的话，那么，就应该前往。

波德戈尔内同志：也可能会做出卑鄙的事情。

波利扬斯基同志：没有写给所有的人，这不是最高级别的。可以称代表团为党和政府代表团。

关于给中国人的贺信。①

批准。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8，л. 45－47

№20805

葛罗米柯致陈毅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

(1964年9月30日)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外交部部长

陈毅同志：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请接收我们真诚的祝贺。

借此机会，请转达我们对中国人民最诚挚的愿望！祝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

让苏中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让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

苏联外交部部长

葛罗米柯

1964年9月30日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82，л. 104

---

① 196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标注日期为9月30日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致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贺信。在贺信中指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上，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始终是，并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的、无私的和忠实的朋友。”同时表示坚信：“任何力量也无法破坏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原注

№20770

赫鲁晓夫同日本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国的核武器

(1964 年 10 月 3 日)

……①

下田：现在在这里谈谈中国。美国国务卿指出，中国将在近期进行核试验。非常想了解您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国是否有实际力量搞这样的实验？

H. C. 赫鲁晓夫：核爆炸，我想，中国人是能够制造出来的。我们还认为，他们应该已经制造出来了。在关系密切的时候，兄弟关系的中国学者被允许进入我们很多秘密的工程，他们看到了我们是如何做的。制造核弹最主要的不是看到了如何制造，而是要有基础。我们给了他们生产核燃料的机械设备。

A. И. 米高扬：我们给他们设计了工厂并提供其他帮助。

H. C. 赫鲁晓夫：这样，他们从我们这获得很多，也了解了如何去制造。我们当时希望他们应该这样去做，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但困难的是技术、工业和科学研究基础实在非常薄弱。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是用一些军事信息来交换的。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美国的"空对空"导弹。那是 1958 年的事，当时他们相互开火射击，他们(中国人)用我们的导弹打落了飞机。得到之后，要仿制也要有基础才行，中国当时基础很薄弱，生产了 600 万桶②石油，能源基础弱。

A. И. 米高扬：说是他们石油贫乏。

H. C. 赫鲁晓夫：这个可不好，如果只有 600 万，那是不足够的，这就说明了工业水平。我们有 22.3 亿还尚且不够。这不是说，中国人生活得比我们好，这只能说是非常低的水平。如果集中力量，正如陈毅所说的：我们可以没有裤子，但我们不能没有原子弹，那么就能拥有。如果你们想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另外，你们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从科学、技术的观点来说，你们是能够制造出来的，日本有科学技术的基础。

……③

谈话持续了 2 个半小时

翻译：Л. A. 斯特里扎克

记录：H. 加夫里洛娃

---

① 此前的谈话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② 原文没有带任何单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石油累计生产的数量，因为 1959 年中国的原油年产量是 373.3 万吨。——译注

③ 以下谈话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964年10月4日
第2号

РГАНИ,ф.52,оп.1,д.597,л.115-151

№25632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中国试图离间苏蒙关系①

(1964年10月7日)

绝 密

与蒙古驻中国大使Д.策伯格米德的会议纪要

1963年10月7日

策伯格米德说，9月30日陈毅在接见代表团时，多次表示感谢蒙古政府和泽登巴尔同志本人能派代表团前来庆祝中国国庆15周年。策伯格米德叙述道，当蒙古代表团抵达北京时，陈毅与其他中国同志努力营造一种特别热情的氛围，拥抱、亲脸等。

……

策伯格米德对我解释道，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委托鲁布桑利用参加中国国庆节之际试探一下中国人与蒙古就一系列问题——有关中国人对领土的诉求、关于派遣中国工人去蒙古等问题方面的诚意……

而后，策伯格米德又通报了有关周恩来今年10月3日会见鲁布桑的情况(这次会见时除他们俩外，只有策伯格米德参加)。

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一开始就说蒙古与中国之间的分歧，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团结。周恩来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可能产生分歧，但这是次要问题，而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团结一致，这才是主要的。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侵犯，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在这场斗争中团结起来。对此，策伯格米德说，鲁布桑回答说：蒙古以前是、目前也是支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一致。鲁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布桑接着说,众所周知,蒙古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后我们也要友好相处。接下来在谈了关于中国人提供的帮助后,策伯格米德说,鲁布桑指出,从某个时候起中国政府开始对蒙古采取了些不友好的举措。他将召回中国工人作为例子。现在我们不得不从农村动员年轻人去建设工地,而在农村,那里也出现了自己的困难。鲁布桑当时就向中国政府转达了蒙古的请求,派1万多名畜牧人员去蒙古,为期3—5年。同时鲁布桑还强调,最好是派遣与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中国畜牧人员。

当来自中国各不同地区的工人被派来后,促进了许多问题的解决,而这些问题则一定会遇到的(出现了日常生活方面和语言上的困难,穿越整个中国的路费等)。策伯格米德解释说,提出派遣边境地区的畜牧人员问题,其实质意味着试探中国人对内蒙问题的立场,因为实际上讲的就是蒙古人——来自内蒙的牧民。

策伯格米德说,可以看出周恩来没有准备答复,因此他开始提出许多次要问题,同时考虑自己的答复。然后,周恩来说,他理解泽登巴尔同志的想法。他接着说道,新中国成立后与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前,在革命胜利之前,中国与蒙古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而现在来说,这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有了边界,交换了这方面的报告,就像主权国一样存在。周恩来接着又说,我们也有了双方应该共同遵守的友好条约。

至于经济援助,周恩来接着说道,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向蒙古提供援助。同时周恩来还提到泽登巴尔曾三次访问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是毛泽东接待的,当时毛泽东对泽登巴尔同志说:“应该向该国提供援助,直到它能在经济上独立为止。”周恩来接着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我们向蒙古提供了经济援助,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策伯格米德说,这时周恩来就开始细数中国对蒙古提供的种种援助)。

策伯格米德而后又说,周恩来特别注意到了有关中国工人的问题,同时强调指出,以前在实践上存在各种误解,可中国政府并没有关注这些误解,因为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周恩来接着说道,最近有关中国工人的问题在蒙古变得尖锐了,这是蒙古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造成的。周恩来说,我们努力不将党之间的分歧转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去,但我们是以一种精神教育自己的人民,而你们在蒙古是以另一种精神进行教育。所以当中国工人碰到蒙古工人时,他们会发生意见分歧。这可能会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特别是现在,当意见分歧变得公开时,因此而加入到分歧中的人群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经发生了不幸事件(周恩来指的是在蒙古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中国工人被杀害的事件)。

周恩来继续说道,因此才产生了把中国工人召回国的想法。我们的出发点是召回中国工人就能消除产生误解的土壤。如果现在派遣一批新的中国工人,而他们是以我们的思想教育的,这就可能引起比以前曾有的更深更大的分歧,有可能会发生冲突,事情会导致更多的中国工人被杀害。

因为你们的报刊在批评中国,如果中国工人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们该怎么办?更何况你们已经批评中国领导人了。如果派遣牧民,这意味着分歧会传播得更广,将转移到农村,所以最好是将派遣中国工人的问题暂时搁置。周恩来说,当然,这会给建设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损

失，可与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不如延缓建设。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想帮助你们，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困难。他突然说到，你们是苏联的邻国，该邻国向你们提供很多的援助。然后周恩来开始说，可是分歧将逐步解决，关系将得到改善，到那时中国就能向蒙古提供援助。要有耐心等待，不要对未来失去希望。我们将友好共存，而此刻，当分歧还未消除之时，我们应该努力使分歧不再深入，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反复说蒙古人有权请求中国的帮助，中国一定会提供帮助，可现在不是时候，对此的条件也不合适，需要等待。周恩来说，我们尊重泽登巴尔同志有关派遣中国牧民的想法，可现在不是派遣的时候，中国政府将研究这个问题并通过蒙古驻中国大使转告这些答复。我们将不认为这是个简单次要的问题；周恩来强调说，我们不会将问题搁置一旁，请将这些转告泽登巴尔同志。

策伯格米德讲述道，周恩来在午宴代表团时说，尽管分歧将会持续很久，可必须友好相处，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要团结。他说，这一点我们要服从于解决中国与蒙古之间相互关系方面的所有问题。同时，周恩来几次说到，提出的具体问题(如工人的路费等)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这并不是主要的，是次要问题。策伯格米德注意到周恩来在暗示，主要的是蒙古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性质。

策伯格米德指出，周恩来对待蒙古代表团尤为礼貌客气，会谈时努力不引起任何细微的激化，并不止一次请求向泽登巴尔同志转达他的问候与祝愿。

策伯格米德说，作为主要的团结问题，毛泽东在会见代表团时也说过，他也请代表团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泽登巴尔同志转达问候。策伯格米德说，当代表团坐飞机启程回国时，中国领导已经在机场，并不止一次地表示，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应该友好共处，相互尊重等。

策伯格米德在概括上述内容时说出了这样的观点，在与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国人好像是在谨慎地让代表团明白，如果蒙古能放弃在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功中那种强硬的原则立场，他们就准备向蒙古提供大量的援助。大使继续说道，很显然，蒙古严重妨碍了中国人在亚洲和非洲国家中实现自己的方针，因为，比如说，在许多方面蒙古的做法让中国人感到十分讨厌。策伯格米德表示，遗憾的是蒙古的力量太小了点，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发展经济，要真实、鲜明地在内蒙古的蒙古人和亚洲其他国家面前展示繁荣的典范，更有力地动摇在亚洲以及其他各洲的大汉沙文主义和冒进主义的各种计划。

策伯格米德同时还说，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人谈话时的声明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和毛泽东本人的威信，甚至那些对蒙古领导层的内外政策并不完全赞成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蒙古领导层在对待中国领导人方面实施的方针表示怀疑，现在他们极其愤怒地谈论上述所说的毛泽东声明。

……

通报上述内容的同时，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如今中国在与蒙古关系方面的尝试，是中国领导精心策划的新一轮阴险的而且更为准确的战略步骤和行动的重要部分，旨在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泥沼中”越陷越深，使兄弟国家脱离苏联(他们顽固地试图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的“真诚捍卫者”，并多次在所有级别的场合表示，他们说，“分歧，这不是主要的，通过争论谁也死

不了的,主要的是团结”,等等。10月6日彭真与波兰活动家就这个方面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国人重新试图对德国人暗送秋波,他们对德国人说:“你们是西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而我们是东方的前哨,所以我们要团结。”对罗马尼亚活动家,中国更高一级的领导人也在全力进行工作,尽管正如当时的乔治大使说的那样,没进行任何相互的讨论)。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有必要专门地,也包括暗示性地提前几年研究蒙古的问题(还包括让其他人,除泽登巴尔外,特别是一些有威望的有影响力的蒙古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们向苏联共产党靠拢的问题,要让苏联和蒙古关系的牢固程度不仅仅依赖于现在当政在位的一两个人),要进一步巩固它作为苏联忠诚盟友的立场,更为有效地和系统性地利用它去冲垮中国领导的各种计划,特别是他们玩弄的所谓亚非“团结”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把戏。

也许时机已成熟,可以考虑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出访蒙古的问题,把这一问题作为我们巩固和发展与蒙古的联盟而对蒙古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同时,应当考虑必须减轻蒙古人因中国人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而产生的某种恐惧,这点是蒙古同志在与我们的谈话中微微透露出来的。

比方说,蒙古大使策伯格米德秘密地通报说,蒙古国内正进行局部的动员(尽管对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能说,借口动员参军而征集青壮年去建筑工地),从蒙古方面建立了专门的岗哨用以监视中国人在边界的活动……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 0100,оп. 58,п. 508,д. 7,л. 25-35

№25635

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①]

(1964年10月7日)

绝 密

……

契尔沃年科说,对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交有关缔结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和边界争端的国际协议一事，他想要弄清楚中国方面的看法。

王炳南：我们认为当前在解决边界和领土这样复杂的问题时，恐怕不能仅采用一种方式，因为这样会限制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方式。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08，д. 7，л. 18－24

№25636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立场[①]

(1964 年 10 月 8 日)

1964 年 10 月 8 日契尔沃年科会见了波兰驻中国大使克诺泰，后者向苏联大使通报了有关 1964 年 10 月 6 日波兰代表团与彭真的会谈内容。

彭真表示，在有关边界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支持波兰人，但没有转达官方声明。

雅罗辛斯基(代表团团长)强调说，波兰人在等的答复就是毛泽东是否对日本社会党人说过，苏联使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分裂了出去，而作为补偿将把东德的部分领土转交给波兰。

而后彭真解释了中国在与苏联边界谈判中的立场。

“同时他好像是在开玩笑似的表示，我们中国人是教条主义者，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是修正主义，因为我们在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说我们不要求归还这些领土。”

彭真：“我们现在遭到原子武器的威胁，目前苏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拥有原子武器，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有脑袋、双手，用两条腿走路。他们造出了原子弹，那我们也会造出原子弹。我们应该有原子弹……因为如果我们造不出原子弹，他们就要消灭我们。”

关于起草委员会的问题：

彭真：“现在试着召集这个委员会，其实这是项非法的工作。如果苏联领导人还不停止，那他们就是在搞分裂。我们现在有争论，可没有分裂，这比要搞分裂的要好；如果可以保持统一，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为什么还要搞正式的分裂呢？”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08，д. 7，л. 36－44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3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

(1964年10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8日会议第16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Г. И. 沃罗诺夫、А. Н. 柯西金、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В. В. 格里申；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В. И. 波利亚科夫、Б. Н. 波诺马廖夫；会议由 Н. В. 波德戈尔内主持。

1. 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措施。①

苏斯洛夫、柯西金、波诺马廖夫、波德戈尔内。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基本的和主要的文件——名称有些狭隘(在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

柯西金同志说：都准备了什么文件，从来没有谈到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问题。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对文件进行编辑。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8，л. 48

---

① 指的是苏联共产党倡议召开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1960年大型会议编辑委员会的26个兄弟党代表的协商会议，以便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消除现存的分歧和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苏共中央的包含关于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的1964年7月30日信函，已经分别寄发给了80个共产党。其中45个共产党在临近10月初的时候，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共产党的提议，与此同时，有许多共产党表示犹豫，也有某些共产党的决定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反对举行这样的会议(朝鲜、阿尔巴尼亚和日本共产党也是如此)。苏共中央联络部预料，在编辑委员会组成中的26个共产党，将会有19个共产党参加这样的会议。在有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及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代表 Б. Н. 波诺马廖夫、Ю. В. 安德罗波夫和 И. И. 乌达利佐夫签名的致苏共中央的1964年10月6日的报告中，包含了关于举行会议和编辑委员会工作程序的具体建议。在报告中还建议采取措施，弄清楚那些没有答复苏联共产党7月30日信函的共产党，对于参加编辑委员会工作问题的立场，并着手开始准备编辑委员会应该通过的那些文件的草案(《当代局势和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及战争的斗争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致中国共产党的信函；致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呼吁书；致已经获得解放或者正在为争取摆脱殖民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呼吁书，阐明在现阶段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原则》的文件)。在 Н. С. 赫鲁晓夫退休之后，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层中，出现了希望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自己以前立场的愿望(包括在召开会议这个问题上)。然而，这些愿望落空了。在1964年11月中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此后，代表团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不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11月底，苏联共产党建议推迟编辑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期限，把它从12月15日延迟到更晚些时候，以便有可能更好地准备这些会议，进行补充磋商。关于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思想，最终演变成了组织1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协商会晤，这次会晤是于1965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上就消除分歧和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忠诚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还讨论了关于准备和进行共产党的新的大型国际会议的问题，并确认参加了1960年会议的共产党代表进行预先磋商会晤是必要的。在1965年3月集会的共产党，针对越南事件发表了声明，谴责了美国对这个国家事务进行的军事干涉。——原注

№219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一些措施

(1964年10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的举措》①
(M. A. 苏斯洛夫、A. H. 柯西金、Б. H. 波诺马廖夫和 H. B. 波德戈尔内)
第162号记录第1项，1964年10月8日

绝 密

1. 批准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做的修改②，给澳大利亚、阿根廷、保加利亚、巴西、英国、匈牙利、民主德国、德国、印度、意大利、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的信件文本(参见附录1)。③

2. 批准给苏联驻意大利、英国、罗马尼亚、巴西和古巴等国大使的电报内容(参见附录2)。④

3. 批准给越南劳动党中央的信件内容(参见附录3)。⑤

4. 批准中央主席团会议⑥对与兄弟党代表会谈提纲所作的修改(附录4)。⑦

5. 责成苏共中央国际司、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和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司，在今年12月1日以前，向苏共中央提交为起草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草案。⑧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84，л. 1-2

---

① 针对苏共中央决议的附带证明，在一张单独的纸上用蓝色墨水笔书写："针对第162号记录。证明。针对记录第162号第1项的决议尚未出台。指示文本仍将继续进行加工整理。M. 索科洛娃，1964年11月3日。"以上着重线由 M. B. 索科洛娃所加。——原注

②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批准"一词之后的上行用蓝色铅笔加注有如下文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在修订后的文本中在"批准"一词之后加上了这些文字。——原注

③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在"捷克斯洛伐克"一词之后的"附录一"被用普通铅笔勾掉。在修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④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附录二"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⑤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附录三"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⑥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在"批准"一词之后的上行用普通铅笔加注了如下文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批准"一词之后加上了这些文字。——原注

⑦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的"附录四"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⑧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参见：РГАНИ，ф. 3，оп. 16，д. 541，л. 22)。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在一单独纸张上用蓝色墨水笔写有如下证明："针对第162号记录第1项的决议未散发。电报内容仍将重新编定。1964年11月4日，M. 索科洛娃。"——原注

№25637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匈牙利代表团访华情况[①]

(1964年10月9日)

……

哈拉斯在与我见面时主动谈到，在与匈牙利代表团进行的所有会见和会谈中，中国方面从毛泽东到代表团陪同人员的所有级别的人员都不止一次的重复这么几句话："匈牙利和中国之间团结的必要性"，"中国和匈牙利是好朋友"等。

彭真在接见时表示："匈牙利人和中国人本来就是好朋友，我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分歧。"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08，д. 7，л. 45－49

№10273

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赫鲁晓夫的错误

(1964年10月14日以前)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

不晚于1964年10月14日

同志们！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现在应当向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报告由于赫鲁晓夫同志不正确的行为而在中央主席团内部造成的局面，以便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使我们党的领导情况健康化与正常化。

大家知道，近些年来，我们党在经济与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然而，如果领导不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种种严重错误，我们的成就不知要大多少。问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题的实质在于下述几个方面。近些年来，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错，我们这里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赫鲁晓夫同志把无限的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却完全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正确地运用这一权力。他粗暴地践踏领导党、领导国家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实质上是完全放弃了这些原则和准则。列宁主义要求党的一个领导人必须服从领导集体的意志，要求领导人之间要有正确分工，要求他们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内外政策上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被他忘诸脑后。

尤其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赫鲁晓夫同志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公然无视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同志们的主张，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最近以来，甚至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也都由他一个人做决定，而任何一项合理倡议，只要不是出于他本人，则一概予以压制。他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对待同志高傲自大，粗暴无礼，缺乏容忍态度，已习以为常。党和人民的一切成就，列宁主义方针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胜利，他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最近以来，在他的一切行动中，摆在第一位的，不是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而是他本人的利益。我国任何一项多少有些重要的措施，都必须盖上“系赫鲁晓夫所为”的印记。

至于说工作方法和作风，在这个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的领导实践。现在，在主席团会议上，除了他，已经没有任何人发表意见。如果有谁想谈谈自己的意见，立刻就被打断。是啊，谈也没用，反正第一书记我行我素。

怒气冲冲的吼叫，强迫命令，粗暴淫秽的污辱，恶毒的谩骂，这样一些“方法”，已经成了他习以为常的行为准则。对于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他完全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狡猾手法：先打一个人，过一阵子则用甜言蜜语去拉他一把。然后，又如法炮制去对付另一个人。

他的这种做法，往往把同志们搞得意志消沉。

他使用的一种最可怕、最阴险的“方法”就是，不给主席团任何委员以工作，而对那些真想干些事情的人，则是给予打击。甚至连出差也禁止，在他看来，这是游手好闲和游山玩水。他想用这种方法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一切全靠他一个人，只有他在真正地工作，而所有其他人都是懒汉；第二，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干部。

与此同时，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个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他公开提倡巴结献媚、阿谀奉承、放肆鼓吹、赞扬个人、美化甚至歪曲事实这样一些令人不能容许的风气，并助长此类现象。

对于不合他的心意或者敢于反对他的人，他越来越采取威胁的方法。而人们又不能不理睬这种威胁，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手中掌握着何等巨大的权力，他在性格上是何等放荡不羁和专横霸道。他甚至连最起码的礼貌和行为准则也不顾及，满嘴脏话，令人厌恶。正如俗话所说，他的话难听得都不堪入耳，就连铁石般的蠢货听了，也会脸红。什么“笨蛋、二流子、懒汉、臭气包、臭苍蝇、落汤鸡、臭狗屎、粪便”等，不一而足。这还仅仅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他所用的那些侮辱人的话，而他经常“通用的”那些话，则是根本不能见诸报章，也是令人难以启齿的。他不分场合，甚至当着妇女的面也满口吐脏话。

在此没有必要去证明,只有那种完全丧失一个领导人的全部品质的人,才能下流到这种地步。仅需强调的一点是:一位领导人如果无视集体的意见,他就不可避免地会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情况就是如此。

自然,这种事并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发生的。他一天一天地脱离现实生活,不再听取现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在怎样地生活。有些同志可能会反问:怎么会这样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经常在国内走动嘛!是的,他的确常常下去。但他在下面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他想要看到的东西。他现在下去视察,已经不是去向人民学习,不是去听群众说了些什么。不是,他是没完没了地去教训大家,他自己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话。

正因为如此,由他主张推行的一些措施,都造成了严重挫折,致使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党政建设、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种种措施以及解决国内外政策中其他若干问题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缺点。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由他倡议提出的某些措施,执行的结果不止一次地使我们党、苏共中央和我们全国陷入不利的境地,使我们党和祖国的威信受到明显的损害。

简而言之,赫鲁晓夫同志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把自己置于党、党的领导机关和全国之上。他个人专权表现得十分明显。现在已经很清楚,党现时与之打交道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实际上是提出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以取代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他这样做时像个恶意的煽动家,在口头上反对个人迷信,主张严格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然而在行动上却相反,采取个人迷信时期的做法。因为现在此种做法已暴露无遗,而且采用此种做法已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坚决反击再生的新的个人迷信崇尚者,也就是说,要按伟大列宁的遗嘱来做的时候了。

我们决定走这一步,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且心情也并不轻松。在走这一步之前,我们不得不一再反复地仔细思考和衡量。我们长时间地、耐心地寻求方法,讨论各种可能性,以便于纠正。何况赫鲁晓夫同志早在以前就有过不少不良品质、行动和行为,他的一些危险的毛病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暴露出来。

我们曾经指望他能够纠正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过失和失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同志改掉他的行为失当,克服他的坏性格。

促使我们这样的还有另一个理由,这就是赫鲁晓夫也有他的功绩,这是任何人也不想否认的。共产党人和所有苏联人,都一致赞同和拥护我们党致力于消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以恢复党与国家生活中列宁主义准则的这一列宁的方针。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贯彻这一方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性给予应有的评价。谁也不想否认他在其他工作领域,尤其是在担任领导初期所做的一切有益的和正确的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止一次地想使他改弦更张,表示我们不同意他的一些不正确建议和决定。我们曾经希望他能够悔悟,能够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领导人那样,从我们的意见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愿望并未实现。

总的来说,以上所述就是促使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将此问题提交党中央全会的几点

缘由。现在，请允许我开始分析由于赫鲁晓夫的过错而在经济、国家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以及苏联对外政策执行方面所犯的各种具体错误和严重缺点。

关于在对内政策种种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请允许我从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讲起。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党的新纲领已经3年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如果我们骄傲自满，夸大我们的成就与成绩，掩饰严重的缺点，那就不对了。

对于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在我们这里制造出一个所谓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的神话，而且这个神话还在无限制地大肆吹嘘。试图证明，在赫鲁晓夫同志执政的10年中，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奇迹。他本人在其无数次讲话和意见书中，无休止地硬说，我们的事情都搞得很好。报刊、广播和电视也跟着他这样说。听他们这样说，好像我们这里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而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道路简直就是一曲成功与胜利的凯歌。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自然我们大家都高兴不已。但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正视现实。而现实，同志们，竟然是：恰恰在这所谓"伟大十年"中，在我国最重要方面，各项指标急剧地恶化了。我用某些事实加以说明。

七年计划和苏共纲领的规定的各项任务都未完成。

最好是从苏共纲领中阐述的各种任务完成的情况谈起。只要很快浏览一下3年总结，就能确信纲领中规定的许多指标的完成期限是不实际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事先没有进行深入的经济论证和计算，便由一些只在理论上懂得经济而远远脱离生活的人们制定了。更有甚者，主席团委员中，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参与纲领的制定。他们拿到的是现成纲领。

苏共纲领规定的一切计算，都是以社会产品的增长速度为依据的。先在工业品总产量方面，然后在人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其计算也是以社会产品的增长速度为依据的。那么，1959年2月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七年计划(1959—1965)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关于这一指标的任务究竟怎样完成的呢?

请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年　份	社会产品年均增长速度(%)
1950—1953	10.6
1953—1956	11.1
1956—1959	8.9
1959—1962	6.9
1962	6.0
1963	5.0

上面的统计表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直到1956年底，社会产品增长速度一直是提高的，其后就开始下降了。1956—1963年时期，增长速度总共降低了6.1个百分点。这并非偶然。8年当中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多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不能不令人担心。因为社会产品的高增长速度是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最大优越性之一。如果说在“伟大十年”当中我们开始在增长速度方面交出了我们的阵地，那么很显然，其原因就在于经济领导上的失误和严重错误。

这也从工业工作质量指标，尤其是固定资产利用指标的急剧恶化得到了证明。在七年计划的4年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个百分点，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个百分点。

或者我们可以再举工业生产部类“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发展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来看一下。这些年来，这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了。

赫鲁晓夫同志这位工业管理改革思想的倡导人，当初曾经热情地说服我们，要求我们相信恰恰是改革才能在这方面迅速地带来有利的变化。① 然而，事实说明，改革以后，比例失调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严重了。这种比例失调到1963年已经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10%)比“第二部类”的增长速度(5%)高出一倍。因此，1963年就整个工业生产水平而言，苏联是美国的65%(美国为100)，可是其中就第二部类的对比来讲，我们一方仅为45%。

可见，就“第二部类”来说，我们较美国落后一半，我们要想赶上他们，看来需要15年时间，也许更长些。

同控制数字相对照，七年计划关于轻工业与食品工业的任务，现在并未完成。大家看得出，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方面的提议也破产了，上述部门的发展速度根本没有接近。相反，工业管理的改革很遗憾却加深了比例失调，使局势更加恶化了。

劳动生产率速度不断下降这种危险的趋势，也令人严重担心。下面两个数字很说明问题：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达7%—8%，而在现行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上下降到了5.6%，而且还在继续下降。1962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为5.5%，1963年则为5.2%，到1964年上半年只有4.2%。

然而，按照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即使在技术进步，即在生产中发展和采用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问题上，我们做得也远非如此，并非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不应闭眼不见，在某些生产部门中，我们的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这种落后不是在缩小，反而在扩大。

这方面的原因之一，就是赫鲁晓夫同志对于技术政策的领导不断干预，而且是外行的干

① 在1957年5月7—11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法令，并对苏联宪法中关于组织管理结构部分做了修改。——原注

预。数年以前，他曾疯狂地反对对于领导技术进步的机构实行集中和垂直组建。过去被他否定过的一切，他现在居然都加以维护，把它们视为某种新事物。他设立了大量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却没有权力，它们脱离生产，它们采用新技术的计划对于企业没有约束力。结果，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严重受阻，机构更加重叠，而统一技术政策的推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这仅仅是工业发展领域中几个最重要的例子。

下面简单谈谈建筑业方面的情况。不可否认的确凿事实是：所谓“伟大十年”的一切改革，也使建筑业的状况恶化了。我们未完工的建筑项目年复一年地增加。它从1958年的175亿卢布逐年增加，到1963年已超过260亿卢布。建筑速度降低，建筑规模缩小，5年中的成本仅仅降低了0.5%，而计划规定应为4%。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指示，现在全国一切工程项目表(指列入基本建筑投资计划的在建与改建项目名录)，毫无例外都得报送莫斯科审批。但这里来不及审批，而没有方案就不能开工，结果项目施工计划就得拖延下去。

例如，他做出的建设4—5层住房的指示，其代价恐怕是难以计算的。他解散了苏联建筑科学院，只是因为该院不同意他的这样一个结论：4—5层住房造价最便宜、使用起来最方便，而且可使居民分散，在遭到原子弹攻击时能够保护居民，等等。

生活证明，科学院里的人员都是有真才实学的。现已查明，盖4—5层住房，每平方米的造价，如果加上市、区交通建设费，要比盖9—12层住房高得多。由于推行建“5层”的方针，城市中的建筑密度大大增加了，交通、供热、地下水以及其他管线都令人不能容忍地延长了，城市的外观恶化了，根本谈不上舒适，住房里连电梯都没有。

现在，这位新冒出来的总建筑师在打退堂鼓了，又号召盖高层建筑了。然而，第一，他这种荒唐指示造成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第二，改行多层建筑并非易事，这种建筑需要重新为它建立工业基础。

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任性，更正确地说是随心所欲，在农业方面犯了更多的错误，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大家都知道，他到处宣扬，使人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懂得农业，是他把几乎落入深渊的集体农业和国营农场挽救出来了。大家也都知道，他不让任何人插手农业问题，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但是，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我国农村的状况，就在现在也是令人极不满意的。

去年，国内甚至连面包都发生了严重困难。为此，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建议实行凭本供应制度。现在战后已经过去20年了。我们不得不被迫拨出860吨黄金，用于向资本家购买粮食。如果农业果真兴旺发达，那么在“伟大十年”过程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一次歉收就使得我们越出常规，想在全国实行可怜巴巴的口粮配给制，动用国家的国防储备粮，迫使向来卖粮的苏联用黄金去买粮。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况与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已大不相同了。①

---

① 因1962、1963连年歉收，国内粮食等农产品严重匮乏。烤制面包品种减少，规定出售杂粮，于是国内农产品消费受到限制。苏联向一些友好国家出口的粮食减少。因此，提出实行粮食凭卡配给问题，但未实施。1963年8月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主要从加拿大，部分从美国进口。——原注

真实的情况是：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总产量按产值计算低于1958年的指标。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

严重缺粮和缺饲料，迫使我们不得不大量屠宰牲畜。其结果是现在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从一切情况看，今年的牲畜与家禽的采购与去年相比，将大约减少190万吨。今年下半年肉的销售量将比去年下半年少35%。现在，肉类产品的销售各地几乎普遍长时间脱销，而某些工业中心城市今年几乎就没有肉类产品。

我们的农业严重地落后于国家向它提出的要求。我们还远没有满足人民对于粮食的需求，尤其是他们对于面包、肉类、牛奶、土豆和蔬菜这类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直到现在，我们尚未解决对农业工作人员实行物质利益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发表了多次演说，征求了不少意见，却毫无结果。

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工作日的劳动报酬所得，货币与实物产品合计为1卢布56戈比，而5年以后，到1963年，则为1卢布89戈比。你们看，5年当中，一共才“增加”33戈比，也就是说，一个工作日每年才增加7个戈比。

如果每个集体农民平均一年劳动230—250天，这就是说，他每月平均收入37—40个卢布。这要比其他劳动者每月平均少收入一多半。这还是仅就平均数讲的。而我们现在许多集体农庄，一个工作日仍然只发50—60个戈比的货币与实物产品。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从集体农庄外逃。

在此，有必要再指出一点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在引用集体农庄庄员收入增长的数字时，总是避开1953年前的指标，不愿意去回忆他们战前的收入是多少。然而，只有老老实实地去分析对比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请看下面说明集体农庄发给庄员主要产品粮食的变化情况数字。

作为劳动报酬，平均发给每个集体农户的粮食如下：

1940年8.2公担

1953年7.2公担

1959年7.1公担

1961年5.8公担

1963年3.7公担

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发给实物的真实数字。它排除了随机应变、玩弄价格、任意确定收入多少的可能性。它彻底地批驳了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声称的战前和战后至1953年以前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没有得到报酬的说法。这个数字说明，情况恰恰相反。它证明近10年里集体农庄庄员从农庄作为劳动报酬领得的粮食在逐年减少。

正因为如此，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直到现在眼睛盯着的主要是自己那块宅旁园地，而不是集体农庄的公有生产。而我们这些人没有搞清农村中由于我们的过错而出现的种种情况，就开始指责集体农庄庄员迷恋自己那土宅旁园地。

赫鲁晓夫同志对于农业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其劳动成果这个问题的真正态度，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不久前，听说有些地方优秀牧羊人每月挣到180个卢布，他动怒了，大声喊叫说："这简直是腐败，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下令清除"腐败"。

再举一个例子：根据他的指示，取消了农业专家们的保证工资。其结果是最近5年里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的23万大学生中，只有4万人即占17%的人前往农村工作。

总的来说，我们是在按照赫鲁晓夫同志的意愿，在农业中由一方摆向另一方，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他到处(包括北方地区)强迫种玉米，而在种玉米烫了手，花费了大量资金与劳动力并无所获之后，就打退堂鼓。于是他又向各地普遍发布指示禁止种草。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打退堂鼓，说必须种草。他时而声称扩大向日葵的播种面积是不适当的，时而又下令扩大向日葵的播种面积；时而大声疾呼在畜牧业中要推广"Z型挤奶器"，时而又要推广"旋转型挤奶器"。这才真是转来转去呢！

这些年来，由于他的过错，真不知还干了多少其他蠢事，犯了多少其他错误！请大家回忆一下可耻的"梁赞州事件"。① 他不能不知道，这是冒险行为，但他还同意了，结果许许多多老实人，虽然与此诡计无关，却大受其害。在他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竟把30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农庄，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

在他的坚持主张下做出决定，要求限制私养牲畜头数，缩小宅旁园地的规模。② 其结果是：牲畜遭屠宰，肉奶大量减少，而减下来的宅旁园地则长满了野草。那些先前通过集体农庄或者由本人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或商店去卖的人，现在则换了一个角色，自己变成了买主：这就使得城市劳动者所需食品的供应状况更加恶化了。

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声称：国营农场生产的农产品要比集体农庄生产的农产品几乎便宜一半。可是，当有人告诉他，对于国家来说，实际上集体农庄的产品要比国营农场的产品大约便宜45%时，他大发雷霆。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因为国家对于集体农庄产品的生产没有花费，这同国家对于国营农场的支出不同。看来，赫鲁晓夫同志连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也不懂。同时，应该强调指出：国营农场的经营制度是最先进的，我们党今后仍将继续发展国营农场的生产。

---

① 根据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的倡议，梁赞州提出1959年度该州采购和向国家交售肉类计划超出计划两倍的过高保证。由于大力调动该州的一切资源，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两个计划。然而在报告中，他却采取谎报、从邻近各州购买牲畜和欺骗等手法，上报说已全面完了所承担的保证。1959年12月里奥诺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的欺骗行为被揭发后，于1960年9月自杀身亡。——原注

② 根据赫鲁晓夫倡议，1959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禁止居住在城市与工人村镇的公民私人饲养牲畜的命令"，并要求国营农场在两三年内将职工个人饲养的牲畜收购完毕。由于各地完成这个命令不力，赫鲁晓夫在1963年7月31日的意见书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1959年11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提议将国营农场的工人和专家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国营企业的职工所拥有的宅旁园地面积减至0.15公顷。1963年决定，将这一问题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去研究。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提议撤销关于禁止个人所有制成分饲养牲畜与减少宅旁园地问题的决议，认为该项决议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原注

在访问埃及[①]期间,他强迫纳赛尔接受水栽培法[②],在我们国内他也宣传水栽培法。但在苏联水栽培法是很昂贵的,而且是没有前途的事情。而在埃及,每年两三熟,为什么要用水栽培法呢,谁需要它呢?

简单谈谈落后集体农庄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地宣传必须认真研究解决落后集体农庄的问题。然而,在10年中,他甚至连一点时间都未用来哪怕搞清一个落后农庄。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模范农庄,譬如卡里诺夫卡农庄(赫鲁晓夫生于库尔斯克州卡里诺夫卡村)。然而,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而已。要知道,这个村子是得到国家的巨大帮助才发展起来的。国家勾销了它的大笔欠款,在该村进行了所谓试点建设,给它提供的援助是任何农庄都没有得到过的。难道能够以卡里诺夫卡为例来得出有关我国农村情况的结论吗?很明显,是不能的。而赫鲁晓夫同志恰恰是以卡里诺夫卡为依据做出他的论断的。

简单谈几句他最后一次在国内的视察,这次视察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两周之内访问了足足几十个州、边疆区及共和国。[③] 可效果怎样呢?没有任何效果。1963年,正当国内粮食情况极度危机时,他没有下去视察,因为这对他不利。今年收成情况不坏。于是机会立刻来了,也就有情绪去视察了。但他去哪里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他只去收成好的地方。

但是,同志们,你们大家都清楚,虽然今年收成总体来说好于去年,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理由像报刊、电台和电视上在他视察的日子里那样无节制地乐观和吹嘘,因为农业情况目前并不好。

赫鲁晓夫同志不善于也不懂得如何才能真正搞好农业,于是就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改革。他在去斯堪的那维亚访问[④]的前一天,还火急地照例写给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一份意见书,提出改革农业的新建议。在我们看来,这个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完全取消各生产管理局[⑤]党委的作用,把这些党委变成经济机关的附庸。不然,怎样理解不久前他在中央主席团里说过的下述一段话呢。他说:"好就好在党委现在已经坐末把交椅了。在我视察中,到处都突出向我介绍生产管理局局长。这很好嘛。这就是说,人们已经从我的意见书中得出了结论。"

恰恰是在这次视察中,他甚至连一点时间都没有抽出来,哪怕是去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党组织的一位书记,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的一位书记谈谈话。同志们,这难道不是一位党的领导人已习惯于对党委坐末把交椅感到高兴吗?他在口头上甚至提议根本取消生产管理局党委而用设立政治部主任取而代之,其职位相当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不久前,他又说过,也许应当根本撤销生产管理局。这就是说,农村里党的

---

① 赫鲁晓夫于1964年5月9—25日对埃及进行了正式访问。——原注

② 水栽培法是在人造培养基中对植物进行无土栽培。——原注

③ 赫鲁晓夫1964年8月4—18日到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和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北奥赛梯、鞑靼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库斯塔奈伊和垦荒州,以及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等地视察。——原注

④ 1964年6—7月间赫鲁晓夫访问斯堪的那维亚三国:丹麦、瑞典、挪威。——原注

⑤ 为便于领导某些产品(谷物、甜菜、棉花等)的生产,1962年3月成立了地区性集体农-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原注

机关也应撤销。你们看，他已经谈到什么地步了。

赫鲁晓夫同志在农业领域整个活动的特点，是极端主观主义，经常超前和过火，不愿意考虑现实情况与农业发展规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他多次声明中的一次，他说：7年中，整个农业重要产品按人均产量计算，要超过美国的现在水平。① 实际上，我们与人家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

要想证明农业情况不佳，证明他在领导上犯有种种粗暴错误，还可举出一系列其他事实。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能再继续容忍他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了，不能再让一个人在全苏范围内，而且是在如此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去搞那些考虑欠周的危险试验了。

国民收入逐年下降

请允许我下面谈谈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既定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方面的材料也是令人担心的。下面苏联科学院的统计数字，它表明了最近10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年　　份	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0—1953	11.0
1953—1956	12.0
1956—1959	8.9
1959—1962	6.9
1962	6.0
1963	4.0

可见，直到今年年初，在8年中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2/3。你们看得出，是在逐年降低。显而易见，这并非局部，并非偶然，而是施加一定影响的结果，确切地说，是对经济的领导令人不满意的结果。

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居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赖以提高的主要来源。由于国民收入速度的下降，我们每年损失的净产值与1956年以前时期相比，高达80亿—100亿卢布。显然，这会大大减少国家的消费基金与生产基金。

苏共纲领规定的1961—1970年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增长速度超过9%，使国民收入在10年当中增加一倍半。然而，实际上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在1963年仅为4%，即较党的二十二大的规定低一半以上。为了弥补下降部分，国民收入现在必须在1970年以前每年增长至少13%—14%，但这是一项非常困难，更正确地说，是不现实的任务。

① "在按人口平均的肉类、黄油和奶类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最先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22日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西北地地区各州和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上提出来的。6月2日，赫鲁晓夫在1957年全苏农业和全苏工业展览会上，又第二次宣布了这个口号。——原注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七年计划和苏共纲领规定的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收入的增长任务完成得不好。按七年计划规定,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必须增加大约 40%。而实际上,5 年中他们的实际收入平均只增加了 20%。

应当指出,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提高,严重影响了职工实际工资额度。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在上述时期内提高了 17%,而在消费合作社里,这类价格也高出 1963 年国家价格 13%。于是,我们不得不延长执行下述各种措施的期限,如 1962 年调整工资,将最低工资提高 50—60 卢布,对工资收入低于 70 卢布的职工免于征税等项措施。①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事实都引起了居民的不满,使他们不相信我们规定的措施有执行的可能,破坏了我们党及苏共中央的威信。对于实际涉及的问题,党中央和政府现已收到大量来信,我们不能对其置之不理。

上面所述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最重要的倾向与现象,而这些倾向和现象所涉及的,则是 10 年来我国经济带有根本性的、主要的方向。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等增长速度的降低,许多其他计划任务未能完成,以及各项社会性措施没有执行,都证明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严重的,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越来越落后,虽然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社会主义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优越性,但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优越性的利用却越来越差。

同志们,我们提醒你们注意到这样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成就构成严重威胁的挫折,恰恰都是管理工作改革之后这些年中出现的,而且在继续起作用。在这些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实行改革和推行种种"新的"管理制度,工业、建筑业和农业明显地处于解体状态。而赫鲁晓夫同志竟然无视这一点,把国内情况吹得如何美好,简直把我们这里说成是人间天堂。这难道不是蛊惑人心吗?

关于大规模改组的性质和特点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1953 年以后的 10 年,是在不断改革、各种改组、改造的标志下度过的。结果,整个经济管理结构以及党政机关结构,打个比喻来说,简直是从上到下,从广到深地被翻腾了一遍。而每一次这种改组都叫做革命性的、根本性的改组。这些改组都被赋予某种理论依据,都被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改组,都被贴上取得某种神奇效果的标签。

是否真的如此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大量的改革实际上是些什么货色吧。谁都不会说不需要搞任何改革。生活在前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方面事务的领导和管理机构都不会是永远不变的。它们需要完善和改进。但必须严格遵循列宁的指示,就是说不能仓促从事,

① 根据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 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的规定,计划提高和调整职工工资。第一阶段拟于 1962 年结束,但并未实现。——原注

切忌鲁莽行为。而且,往往有许多同改革有关的问题,是需要拿到全党和党代表大会上去讨论的。

然而,列宁的这些指示却被忽视了。甚至就连成立工业州党委和农业州党委以及与其相应的苏维埃机关这样理应由党代表大会讨论的重大问题,却通过另外途径去解决了。①

其结果又是怎样呢?在他看来,新的党政管理机构系,似乎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状况。可是,分析表明,结果恰恰相反:由于欠考虑和不完善,新的管理体系未能如愿以偿。

管理改革之后,国民经济的状况,如前所述,是恶化了。这是对新管理体系的无情判决。它们产生的后果,是前所未有的领导机构重叠、一团糟、官僚主义,或者简直是杂乱无章。领导和管理机关的结构并未精简,反而复杂化了。整个国民经济,我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没有从这种种花样翻新的措施中得到任何好处。

总的来说,工业领导的改善事实上并未做到。国民经济委员会一般都管辖几个州,整个经济管理权集中在这些国民经济委员会手里。因此,工业州党委管辖地区如与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区域不相符时,工业州党委实际上也成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附属物。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委,也被剥夺了干预农业领导的权力,因此也变成了生产管理局的附属物。

这种情况在我国还从来没有过。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以及自下而上的所有机关和组织,从来都是由党来领导的,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我们摧毁了部一级主管部门,取而代之的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委员会一级的主管部门。然而,洋姜并不比萝卜甜,并没有达到精减机构的目的。如果说在撤销部委局之后的第一年,机构还有些减少的话,那么在实施改革之后部委局的数量则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国内管理机关的总人数仅在5年当中就增加了50多万人。而且,仅在最近一年半之内,机关的开支就几乎增加了8亿卢布。

已有的老缺点未能消除,却又增添了许多新的非常可怕的缺点。工业与农业各自为政,实质上是两者已经分离。而列宁则要求我们组织领导必须做到“大工业更快地同农业结合,以使产品正确交换”。此外,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科学也都脱离了生产。

尤其应该受到严厉批评的是按所谓生产原则对于州和边疆区的党政机关进行的改组。这项措施被说成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政机关的组建原则,而实际上却是背离列宁的指示和苏共纲领关于这个问题的要求。

设立工业和农业的州党委与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党、政、经机关的职能、权利和义务令人难以置信地混同和彼此替代,造成了工作的重叠。总之,出现的混乱是我们苏维埃国家在其整个存在期间所不曾有过的。至于说问题的理论和政治方面,

---

① 关于改组党的领导机关,即按生产原则划分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决定,是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1962年11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做出的。与此相适应,也改组了苏维埃机关。苏共中央1964年10月中央全会撤销了这些决议。——原注

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说得不客气些，简直是绝对行不通的。

同志们，请你们自己想想：苏共纲领和章程中写道，我们党已经成了全民党，而领导作用仍然属于工人阶级。这就是说，党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党，否则还谈什么领导作用。改革的结果怎样呢？从工厂到州和边疆区，所有的工人都在同一些组织里，而农民和其他农村劳动者则完全在另一些组织里。这好像是一个党里有两支队伍：一支工人队伍和一支农民队伍。

我们必须结束这种不正常现象，因为这种改组：

第一，违背了列宁关于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统一，以及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要求，削弱了工人阶级对于全体居民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第二，违背了列宁关于大力加强构成我们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的思想，导致工人阶级同农民相分离；

第三，将党一分为二，降低了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政治思想上的统一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改组是同苏共党纲中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长的规定背道而驰的，党纲规定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它对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发挥日益增长的影响。

在此，请大家搞清楚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苏维埃怎么能够按生产原则组织呢？

苏维埃作为国家政权的形式，要是没有领土，就是不可思议的。国家的职能可以改变，但是，作为国家象征的领土则是不能改变和取消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

苏维埃是最具群众性的政权机关。它是全体人民的政权，而不是一部分属于工人、另一部分属于农民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不只管经济，也管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社会、文化、卫生、教育等一切方面。这就是说，苏维埃拥有全权。

有人企图使我们相信，改组是前进的革命步骤。但是，我们并未前进，而是大大倒退了，已经倒退到革命初期的情况，那时工人、农民(即贫雇农)、士兵和水兵都分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苏维埃。然而，恰恰是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才被列宁称为党的最伟大的成就。

列宁从来没有把地域原则同生产原则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此应当指出，我们建立起生产性的州党委和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所建立的并非是生产性机关，而是地区性的部门机关。工业州党委——这怎么理解呢？工业是生产部门，而州则是个地域标志。这是无法回避的。

简而言之，改组——不论这次改组或其他种种改组，把我们的全部工作统统搞乱了，妨碍了我们的前进。在10年当中，进行了如此多的改组和改革，以致人们现在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可以说他们是在不断变换花样的改组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的。党、政、经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也一样，都是怨声载道。人们公开讲："改组实在叫人讨厌极了，搞得人们没有时间工作。现在是既缺面包和蔬菜，也缺牛奶和肉类，可改组是绰绰有余。"他

们说得对。现在是结束这种胡作非为的时候了。

在结束这一部分时，应当讲讲下述一点。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常说："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列宁对所有这些改组会说些什么呢？

下面就是列宁的原话。他说："我们许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①]这句话真是切中要害！你们看到，列宁认为，大多数轻率的改革是灾难。列宁还指出："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②]

我们怎样才能从所有这些改组和改革中摆脱出来呢？这只能按照列宁的劝告去做。他讲了下面一段话："应当及时醒悟过来……从我们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学到了一些东西……"[③]

伟大列宁所指引的这条路当时是正确的。而今天，它仍然是唯一正确的。

关于对外活动方面的种种错误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扼要地谈谈党所制定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在解决最重大的问题方面，是怎么贯彻执行的。

我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明确的路线，对所有对外政策问题都做出了相应的指示。它创造性地制定了为实现和平和防止核战争而实行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政策的途径和方法，以便解决我们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证在和平条件下建成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和进一步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世界上任何一个党都没有我们这样一条富于经验而又可靠的对外政策路线。然而，有一条路线是一回事，而如何实现它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最可靠的路线，如果实行时采取的方法和行动不妥当，其结果也不会好，而会带来坏处。

凡是留心观察各种事件发展的人，都会很容易看出：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按照党的方针去做，而往往是提出了和实际上推行了另外一套方针。在对帝国主义阵营的涉外政策上，党要求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耐心和冷静，别上敌人可能把我国推向核战争边缘的种种挑衅的当，不要采取讹诈和威胁的政策，在捍卫与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攸关的根本利益上，要表现出坚定和果断。

可我们看到的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国家曾经不止一次地被拖入忽而这种、忽而那种处于战争边缘的危险局面。

---

①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2卷第351页。——译注
②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404页。——译注
③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79、383页。——译注

请你们回想一下苏伊士运河危机吧。[①] 当时,我们距爆发一场大战只差一步呀! 有何理由非要打仗呢? 那时,我们同埃及之间甚至连互助条约都没有。对方也没有请我们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采取行动而投入战斗呢?

我们国家当时尚未从反希特勒的战争中真正恢复过来。人民不要战争,也不希望打仗。战争会像晴天霹雳一样。如果事件真的发展到这种结局,苏联人民是不会感谢我们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打仗。如果这样,那就不是政策,而是政治冒险和讹诈,是不负责任地玩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和我们伟大事业的命运了。所幸,一切都安然过去了。可赫鲁晓夫同志立即把这说成是他的天才所取得的结果。

还有一个臭名远扬的"柏林问题"。[②] 赫鲁晓夫同志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谈时[③],由于柏林问题,事情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至肯尼迪声称: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欧洲的气候将变得令人厌恶。他在此是指爆发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发出了最后通牒:无论如何,在某个限期之前,柏林必须变为自由城市,就是说,即使发生战争,也不能阻挡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期望的是什么。要知道,我们这里并没有那种蠢人,认为应该为争得"自由市柏林"而打仗。自那时起,不止一个限期过去了,但柏林并未成为自由市。是的,建起了柏林墙[④],但为此无须发出最后通牒嘛。现在,这一点也被说成是个伟大胜利。然而,不论你怎么变着法说,其结果都是对我们不利的。赫鲁晓夫同志本想吓唬一下美国人,但是他们并未被吓倒,反而是我们后退了,使得我们的国家、政策和武装部队的威望和声誉受到不小的打击。

下面谈谈加勒比海危机。[⑤] 赫鲁晓夫同志洋洋得意地说,斯大林都没能进入拉丁美洲,而他做到了。但是,第一,"进入"的政策并不是我们的政策;第二,只有冒险主义者才能说,在当代条件下,我国是能够给予那个大陆的各国以实际军事援助的。因为它距离我们数千公里之遥,而且隔着大洋。怎样向那里运送军队,怎样向他们提供给养呢? 在这种情况下,导弹是没有用的。它只会把应当帮助的那个国家毁掉。你们可以问问我们的任何一位元帅和将军,他们都会说,对拉丁美洲实行军事"进入"那是胡言乱语,是充满大战危险的。如果我们为了帮助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而对美国首先实行核打击,那么不仅我们自己会受到反击,而且所有人都会同我们断绝往来。

---

① 指1956年英、法、以色列三国对埃及发动的侵略战争。它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是埃及政府对运河实行了国有化。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领土。10月31日英法联合海军从海上封锁埃及,空军则对城市进行密集轰炸。当天,苏联政府即就英、法、以色列武装侵略埃及发表声明。11月5日苏联政府致函英法以三国政府首脑,指出苏联准备采取武力保卫埃及(1956年11月6日《真理报》)。1956年11月7日,军事行动停止。——译注

② 指赫鲁晓夫对确定西柏林地位问题所持的立场。1958年11月27日,根据赫鲁晓夫的倡议,苏联政府就柏林问题向美、英、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照会。照会中声称:6个月后,将把苏联所有关于它同西柏林相互关系和关于驻德苏军在交通方面的一切权利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要求给予西柏林以非军化自由城市的地位。柏林问题曾经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讨论,然而苏联政府的提议均未被采纳。1961年6月21日,赫鲁晓夫发表强烈声明,宣布:如果西方大国不同意苏联的提议,苏联将采取坚决的步骤。——原注

③ 指赫鲁晓夫于1961年6月3—4日在维也纳同约翰·肯尼迪的会谈。——原注

④ 将西柏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隔离开来的墙,建立于1961年8月13日。——原注

⑤ 指1962年秋,因赫鲁晓夫倡议将苏联弹道导弹部署在古巴和美国随之封锁古巴而造成的国际局势急剧恶化。苏美两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对抗,有发展成核战争的危险,后经外交途径解决。——原注

由此种种，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出，对于古巴的政策是冒险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声称，如果美国动一下古巴，我们就将对它予以打击。他坚持把我们的导弹运往古巴。这就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危机，把世界引向了核战争的边缘。这也吓坏了提出如此可怕主意的组织者本人。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得被迫接受美国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要求和条件，直至令人可耻地由美国人来检查我们的军舰。导弹以及大量部队也都按照美国的要求撤出了古巴。

这件事也损害了我们国家、党和军队的国际威望，同时却有助于提高美国的威信。苏古关系也严重恶化了。古巴人民和卡斯特罗都把撤除导弹看作是让古巴去听凭命运的摆布。在古巴人对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关系上，出现了重大裂痕，直到现在还时有表现。

然而，你们知道，就是在古巴危机中的失败，赫鲁晓夫同志也把它说成是胜利。而且，他还想继续走这条冒险的老路。就在不久前，他还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声称："应当同古巴签订互助条约，人们会叫，这是冒险。那就见鬼去吧，让他们去叫。"没有比这再露骨的了。

大家都看见，在最近7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这也并非偶然，而是通过战争来威胁帝国主义的途径去推行对外政策的一种制度、一种特殊"方式"。当然，如果没有其他出路时，对帝国主义者是可以而且应该用武力给予威胁，以便使他们清醒，但却不能把这变成一种制度。

我们仍将一如既往，不放弃对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正义战争的各国人民给予帮助。帮助是必要的，但要考虑到他们的要求和我们的利益，要考虑帮助的实际可能和干预的后果。应当永远牢记列宁的下述指示：我们必须表示出最坚定的和平意愿，因为帝国主义者会利用任何机会来恢复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宣称："只要苏联和美国谈妥，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对此，我想讲几句。

这个口号是不对的。美国急着想称霸世界，企图强使所有人都接受似乎美国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和领导人。这个口号就意味着，我们把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看作只是俯首帖耳执行美国人意志的国家。然而，法国和联邦德国的例子说明，事情并非如此。这种口号会违反我们的意愿，也会使欧洲的一些小国臣服于美国。

而我们的任务在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阵营中的争吵与矛盾，来证明美国并不是这个阵营的盟主，它没有权力争做盟主。最后，如果这样来说明问题，那就会恶化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此，请允许我就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讲几点意见。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已经出现令人非常担心的局面。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跟着苏联走的国家；第二类是跟着中国走的国家；第三类是超脱于这两类之外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和近期加入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面临着完全现实的分裂的威胁。

出现分裂危险的主要原因，是滑向大国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中国领导人进行的破坏活动。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在这些原因方面，赫鲁晓夫同志是有过错的。他在同兄弟国家领导人谈话时，表现粗暴，缺乏涵养，高傲自大，语出伤人。

他当众称毛泽东是“老套鞋”,后者知道了,当然大怒。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他同乔治乌-德治谈话出言不逊,粗暴干涉罗马尼亚的内政,叫喊他们对农业一窍不通,尽管这并不符合事实。[①] 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同卡斯特罗的好友本·贝拉谈话中,他说卡斯特罗是一头见到任何一块红布都会猛扑过去的公牛。[②] 类似这种令人不能容许的评语,他还不止一次地用在其他如乌布利希、哥穆尔卡等一些同志身上。而且,对于他们,他是今天骂,明天就把他们捧上了天。当着大庭广众和本人的面,他说的是一套,而在背后,他说的则是另一套。这种做法不会有助于团结。无怪乎列宁当年曾经告诫说,个人的品质是会造成分裂的。

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同我们的关系上保持警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想法。例如,他策划出一些要保加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愿并入苏联的计划。

当向蒙古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根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在保加利亚,当人民获悉这个传闻时,当即爆发出颇使我们的朋友们感到意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打着“我们不想变成莫斯科的一个省”的旗号,把不少人联合了起来。

赫鲁晓夫同志另一个同样危险的主张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采取设立仲裁机构或进行民意测验的办法。这个主意是他不久前提出的。试问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能根据第三国的判决而把自己的领土交给另一国呢?或者说,某一领土的归属问题怎么能够不由该国全体人民、该国政府来解决,而只由住在该领土上的居民来解决呢?这是同载入我们纲领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切原则相违背的。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不合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他时而下令要给予坚决反击,时而又建议停止争论。这就在各国兄弟党的队伍中造成了惶惑不安和惊慌失措。一些党同中共进行论战,另一些党则沉默不语,总之是各自为政。可是,中共领导人却未浪费时间。它制定了计划,精心准备,对我们进行了有组织的进攻。

应当承认,在激化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我方在中印边境冲突[③]期间的行为,起了负面作用,并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迷惑不解。中国人发动战争,是做了蠢事。但不管怎样,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尽管百般标榜中立,它也是个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本不应该向它供应武器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

不能把事情看成是: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思想混乱和行动摇摆的局面中,我们就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同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我们一方面不能放弃原则性立场,同时我们也应当理智地、更明确地、更细致地实行同所有共产党合作的列宁主义政策。应当永远放弃诸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并入”苏联,就各种领土争端实行仲裁与民意测验等的主张。这些主张决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

---

① 指1963年6月24—25日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原注

② 看来是指1964年4月25日至5月7日本·贝拉访苏期间赫鲁晓夫同他的一次谈话。——原注

③ 指1962年10—11月间中印边境发生的冲突。——原注

的结果。

因此，任务就在于纠正已经出现的局面，善于用列宁主义的政策来恢复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也必须搞清楚我们党和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给其他国家首先是那些不久前才获得民族独立并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以经济和财政援助。

对于苏联在这方面所起的杰出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们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今后仍将一如既往给上述国家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与其他援助，仍将宣传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外介绍我们已有的建设经验，帮助他们培养干部和发展文化。

然而现在，在这方面存在着任性，缺少深思熟虑的政治态度，往往考虑不周，而有的只是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主观愿望。他总是企图牺牲国家的利益来做好人，以此给自己争得威信。对于这种种慷慨的，然而对于我国人民却是沉重负担的赠予以及其他经济援助，他总是以还须帮助这些国家更迅速地发展其独立自主的经济为理由进行辩解。

然而，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来看待事物。事实是，数百年来，是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一直在统治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在那里建有经济和军事的堡垒，熟悉那里的情况、风俗习惯和那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在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干部。那些国家的人民也使用他们的语言。而我们则往往对那些国家毫无所知，却给他们以广泛的财政、经济技术、军事以及其他援助。

在许多情况下，结果是令人可悲的：其中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吃光了我们给予他们的东西，就转脸离开了我们。资本家们嘲笑我们，他们嘲笑得对。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往往不能做政治和阶级分析，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虽然分得清什么是卢布，什么是侮辱人——握住拳头，将大拇指从食指与中指中间伸出，但他们却不能区别共产党人与叛徒，而跟着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亦步亦趋，可就是对于这样一些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我们却给它们以援助和贷款。

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

在几内亚，由苏联帮助，建起了飞机场、罐头工厂、榀木厂、发电站、广播电台、冷库、容纳 500 个床位的医院、宾馆、综合技术学校和畜牧场，并正在进行地质勘探等。向那里供应了多少机器设备呀！所有这一切都白白丢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塞古·杜尔把我们从那里赶了出来，甚至连我们帮他们在克纳里科建的飞机场都不准我们飞往古巴的飞机使用。

在伊拉克，我们把宝押在了卡塞姆的身上，在那里大兴土木：建起 542 公里铁路(可 1963 年在苏联一共才建了 673 公里铁路)，截至 1963 年建设了 200 多个项目。这时，卡塞姆被推翻，公开敌视苏联的人掌了权，他们血腥地镇压了伊拉克共产党。叙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当权的也是些露骨的反动派和民族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在获得我们的大量援助之后，不想偿还我们的贷款了。

作为无偿援助，我们给了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将近 2 亿金卢布，还不算拨

给他们武装部队的大量装备和武器。如果把我们的钱哪怕用于对这些国家人民最重要的事情上,那还说得过去。然而,用于诸如雅加达的容纳10万人的体育场、仰光的宾馆、加纳的设有同位素实验室的原子能研究中心、马里的体育场、几内亚的旅馆等,就未必可以称作最重大的事情了。这类例子也是很多的。

目前,苏联仅仅给予20个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就已达34亿新卢布。在苏联协助下,这些国家已建起数百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10年中,我们在各个国家一共建了6 000多个企业。在阿富汗、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苏联给予的贷款分别占它们各国借款总额的12%—50%。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公然昧着良心,已经不是请求,而是要求:没二话,给钱!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理论"叫做:富国必须帮助穷国。

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已经帮助而且应当帮助各国兄弟人民,但给予援助要合情合理,要精打细算,要履行严格的政治路线。理所当然,我们在给予此种援助时,不能以牺牲苏联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需要为代价。

不能不提请你们也看看赫鲁晓夫同志主持对外政策时所采用的方法。在此,有必要谈谈他去外国的访问、接见活动、所谓的"亲属外交",以及其他一些情况。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是竭力让我们的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而力图由他本人去解决许多国际问题。他宣扬有效的外交手段是"最高级会谈",而这一政策的实际体现就是他去国外的访问。

外国报刊对这些访问的反应很有意思。美联社记者夏皮罗这位聪明、刻薄而又不失幽默的记者,关于我国政府首脑赴斯堪的纳维亚的访问,做了如下评论:"这次访问基本上带有家庭野餐的性质。苏联最高统治者,又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访问20国的名单上增加了3个新的国家[①]……赫鲁晓夫喜欢携家眷到国外旅行……其他任何一位著名国务活动家都不能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放下自己国内的公务,到全世界去旅行。"

的确,任何其他著名活动家都不可能进行花费如此高昂且往往毫无结果的访问。无怪人们表示不理解。许多人说:"果真他在家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干吗?"这是值得考虑的。仅去年一年,赫鲁晓夫同志出国访问和在国内视察就用了170天,而现在,1964年还未结束,他已经又有150天不在家了。如果再加上1963年他举行的128次盛大招待会、午餐和早餐会,也就是每3天一次,那么还剩下多少时间工作呢?

他出访总是带着一大批随行人员,而且有些出访除了亲属外,还要带上许多其他人。例如,访问美国时同他一起去了150人。[②] 他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莫洛托夫想偕夫人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想赠送德国人两辆大公共汽车。[③] 他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去美国带上了

---

① 1954—1964年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阿富汗、缅甸、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丹麦、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挪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美国、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南斯拉夫等国。——原注

② 指1959年9月15—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原注

③ 指1955年7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讨论"关于苏南谈判结果"问题时的发言。——原注

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了一大批礼物。他去巴黎，也带上夫人、女儿、女婿，并带去了礼物。① 他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是由家属陪同。② 他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带上夫人、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

而且，他每次出访都带去许多贵重礼品，例如：飞机、汽车、皮货、特制枪支等，有时，他送礼不看对象。譬如，赠给塞古·杜尔一架伊尔-18飞机。去埃及时，他带去两辆海鸥牌高级轿车，还送给纳赛尔的孩子们几辆莫斯科人牌小轿车，以及其他礼物。反过来，主人也向他和夫人、女儿、女婿回赠了汽车。

尽管他的多次出访对于我们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每次都大肆宣扬一番。《真理报》和《消息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把这些访问吹得天花乱坠，把它们说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刊登和转发大量照片。1952年一年，《真理报》上刊登的斯大林照片只有6张，而仅1964年一年，该报发表的赫鲁晓夫照片就有147张。你们看，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真正战士的一例！

历次访问以及进行的喧嚷叫嚣和自我吹捧，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国内外的人们，相信赫鲁晓夫同志似乎真正具有超人的品质和在群众中拥有无可争议的崇高威望。

举行招待会、早餐或午宴等，也都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每天都有大批可来可不来的外国活动家、实业家以及游山玩水的资本家等到我国访问。不管需不需要，他对这些人一律予以接见。

这一切使大家都感到厌烦。为了接待外国客人，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有数万人脱产。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对此也很厌烦。要知道，苏联人——无论负责工作的人员、部长或其他同志，要想出席赫鲁晓夫同志的招待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在自己的即兴讲话以及同外国人的谈话中，往往把属于国家的最高机密的信息泄露出去。有一次，他在一个不适当的场合炫耀起导弹的数量时，向一名外国记者讲出了有关宇宙摄影的秘密材料。在各种会议上，应该说在请了大量根本不该请的人出席的会上，他也讲了许多不该说的东西。而他在国外就更加放肆不羁了。他这样做了之后，却反过来指责克格勃，说它的工作人员不会保密。赫鲁晓夫同志践踏国际礼仪的最起码准则，也给我们的外交和国家的威望造成了巨大危害。在联合国会议上，他脱下皮鞋，用它敲桌子，以示抗议。③ 这一可耻行径，至今还被他说成是勇敢。另外，你们也会想起这样一件事：他作为一国总理，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听到一些什么人从大厅内喊了什么话时，他立即高声喊道："掘地三尺，把他们埋掉。"在西方，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惊讶。他们说："身为苏联总理表现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该怎样呢？"确实，他连最起码的自制力都没有。例如，他在出访斯堪的纳维亚之前，讲到他同联邦德国大使的谈话时说"我把他痛快地大骂了一顿，向他说——

---

① 指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赫鲁晓夫访问法国。——原注

② 指1960年2月11日至3月5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阿富汗。——原注

③ 赫鲁晓夫曾经两次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讲过话：1959年9月18日在联大第十四次会议上讲话和1960年9月23日在联大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原注

我们要把你们德国人都干掉,从地球上消灭光"等。同志们,你们大家想想,假如有人同我们的大使这样讲话,你们会怎样,你们会对此做出何种反应?

现在,说说赫鲁晓夫同志在同外国活动家谈判方面的创新。最重要的谈判,他不是委托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长和外交官们进行,而是越来越多地委托给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去谈。阿朱别伊同肯尼迪、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艾哈德总理等人进行了谈判。[①] 可以说,政策成了家族的事。阿朱别伊现在是他最信得过的人。赫鲁晓夫同志每天,甚至往往每天几次地援引阿朱别伊的话:阿朱别伊说了什么什么,阿朱别伊劝他怎么怎么办。他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在干部的安排上,成了阿朱别伊许多主意的执行者。应当坦率地指出,阿朱别伊在这些方面是个完全不称职的人,甚至是个信口开河、有冒险习气的危险人物。

不久前,奉赫鲁晓夫的委派,阿朱别伊访问了联邦德国。[②] 他同西方记者们的谈话很不负责任,他的声明给西方报刊以借口,把事情说成似乎为了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苏联宁愿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人民而向军国主义分子做出让步。这不能不引起德国和波兰同志们令人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满,他们坦率地声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正当复仇主义甚嚣尘上,而德国军国主义者又公然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苏联总理打算访问西德呢?

前俄国沙皇们或者肯尼迪、丘吉尔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过去或现在采取此种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党内,这种广泛流行于王公与皇帝宫廷的家族-朝廷外交,也复活了呢?难道我们这样做体面吗?这不是我们的路线,它是一条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严厉谴责的路线。

上述种种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错,在我国对外政策活动中,与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的性质相左的轻率鲁莽、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则成了一条基本方针。很明显,这一切将会削弱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会使我们国家遭受一定孤立,会破坏我们党的威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再继续容忍这种情况,不能再加深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必须坚决地清除这一切,使这一领域也得到净化。

关于新的个人迷信的出现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谈谈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所采用的方法。

---

① 指1961年11月阿朱别伊访美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谈话,以及他1963年2月访问意大利、1964年7月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62—1964年访问古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芬兰。——原注

② 应西德报社之邀,阿朱别伊于1964年7月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朱别伊时任《消息报》主编而主要是赫鲁晓夫的女婿的这次非正式访问,被利用来推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常化。阿朱别伊拜会了联邦总理艾哈德。在谈话中,讨论了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双方在两个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赫鲁晓夫正式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可能性。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领导人密切注意此次非正式接触,对于阿朱别伊的某些言论反映不好。——原注

前面已经指出，他在工作中践踏集体领导原则，在决定对内对外政策最重大问题时实行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法。他采用的有害做法是，许多原则问题不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而是在吃午饭时，仅有部分领导成员参加的情况下决定的。难道在吃午饭时能够认真讨论问题吗？难道可以设想，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谈点什么吗？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吗？

请允许我用赫鲁晓夫同志的埃及之行为例，说明他为所欲为，不尊重领导集体的意见，在做出这些或那些决定时走得多么远。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不受监督的言行，把决议强加给中央主席团的惯用手法。

动身之前，他在主席团提出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的问题。[1] 大家都表示反对。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中途，他突然发来密码电报："应该授予英雄称号，让格奥尔加泽带着奖章来开罗。"大家都很惊讶：纳赛尔有何功勋，为什么授予他如此崇高的称号？要知道，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摧残共产党人，把他们投入惨无人道的集中营。

有人说他释放了共产党人。但这是他传出来的信息。他消灭了许多共产党人，那里的共产党遭到破坏，被禁止活动，被宣布非法，而且纳赛尔并不打算废除这项法律。另一个理由，说纳赛尔似乎在建设社会主义。难道我们是第一次遇到民族主义者抓社会主义这面神圣的旗帜吗？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纳赛尔本人不止一次声称，这是"为了伟大的、慈悲的真主"的社会主义，它的基础似乎是《古兰经》。

有人还说，纳赛尔开始"左倾"，几乎是在实行集体化。请你们看看他的全部言行和他对苏联的态度。当苏伊士运河出现致命危险时，他是我们的朋友。当狂风暴雨似的危险过去后，他唱的是另一个调子。他说，"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粉碎了敌人"。他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阿斯旺水坝。[2] 这确实是苏联人民赠给埃及的最伟大的礼物。开始纳赛尔先向美国请求援助，只是在遭到拒绝后才请我们援助。而且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裂(叙利亚退出)，强劲的竞争对手出现(伊拉克的卡塞姆)，严重的国内局势，美国拒绝兴建水坝，等等。

有根据认为，他现在是个心怀鬼胎的人。在赫鲁晓夫同志访问埃及期间，阿列夫[3]紧跟其后也访问了埃及。他发表了一些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演说，而纳赛尔为了洗清自己，说"阿列夫是个民族主义者，目光短浅"。其实阿列夫讲的话，都是纳赛尔讲过的话。他们是连母亲都难以区分的两个孪生兄弟。有些纳赛尔不便讲的话，由阿列夫去讲。这就是谜底所在。

现在要授予埃及的这样一位活动家以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勋章！

对赫鲁晓夫的第一封电报还未来得及答复，接着又来了第二封电报："在同纳赛尔谈论

---

① 1964 年 5 月 23 日，纳赛尔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为巩固本国的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加强同苏联的友谊而进行的斗争。同一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副总统阿梅尔也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原注

② 指在尼罗河兴建的阿斯旺水坝第一期工程完工(1960—1964)。——原注

③ 1964 年 5 月 20 日赫鲁晓夫在开罗接见了伊拉克共和国总统阿布德·萨拉姆·阿列夫元帅。——原注

授勋时,他请求给他的副手阿梅尔元帅,也授予同样的称号。”请想一想中央主席团的处境:已向纳赛尔宣布,这个消息自然也已透露给报界。如果不授予阿梅尔这个称号,那将是件丢脸的事,使我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威望受到损害。不得已只好同意采取这个步骤。

再看看向埃及提供3亿金卢布新贷款这件事,赫鲁晓夫同志发来电报:“埃及请求提供5亿卢布贷款。我知道,很困难。请讨论,能提供多少。”他担心主席团会拒绝,立即又发来第二个电报:“我同纳赛尔已谈妥提供3亿卢布贷款。”随后,没有经过任何请示,他擅自宣布向埃及国营农场赠送价值300万卢布的设备。

还有一件事,他在埃及发表了反对民族主义的讲演。[①] 这类讲演只有经过中央主席团同意后才能发表。因为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几乎能把阵脚搞乱,会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发生争吵,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损害。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他用这个题目发表了一篇含糊不清的讲演,使许多年轻国家戒备起来。

同志们!请大家仔细想想,所有这一切他是用什么方法办到的呢?这一切以及所做出的决定,他都是背着主席团一个人出主意,然后制造出使主席团没有回旋余地的局面,再把一个又一个的个人决定强加给主席团,如不同意,我国的威望会受到严重损害。难道这是他大肆宣扬的列宁主义准则吗?完全不是。这是他对列宁制订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和准则的粗暴践踏。请你们来判断,他在破坏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走得多么远。

在他访问埃及期间,还有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在同纳赛尔谈判时涉及到对埃及共产党的血腥野蛮镇压。竟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者纳赛尔却说服了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使他相信,埃及共产党是一个“不正确”的党,它的工作“不对头”,没有考虑纳赛尔的进步作用,“方向不对”,“走的道路不对”,总而言之这个党简直是由清一色的以色列代理人组成的。没有会见过任何一个埃及共产党人的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逐字逐句重复纳赛尔对他讲过的话,并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替埃及共产党制订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请你们想一想,纳赛尔成了共产党的审判官!带着这样的“指南针”我们将走向何方呢?如果这件事被传播出去,而他自己也会无意说出去,如果有人知道我们似乎企图从莫斯科把路线和策略强加给其他党,那么这就正中了中国分裂主义者的下怀,他们正在这方面指责我们。这样,怎么能保证埃及共产党,随后还有非洲和中东各国共产党不同中国分裂主义者组成一个阵营呢?非常明显,他的这些行动是不明智的、不正确的和危险的。

必须指出,近来米高扬同志也胆敢干赫鲁晓夫所干的那些事。例如,在访问印尼期间,他同苏加诺讨论了印尼共产党的内部情况。[②] 难道这能允许吗?他儿子,谢尔盖,也参加了所有的秘密谈判。你们可以看到,恶劣的榜样是容易传染的:“家族外交”越来越蔓延。

下面谈谈赫鲁晓夫同志是如何履行他分内的职责的。直截了当地说,近来他实际上是

---

① 指赫鲁晓夫1964年5月16日在阿斯旺市举行的向阿斯旺水坝建设者授勋大会上的讲话(载1964年5月18日《真理报》)。——原注

② 指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于1964年6月22日至7月5日访问印度尼西亚。——原注

放任不管。中央主席团的许多会议他没有亲自主持过，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一次也没有主持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也没有主持过，只有在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时每年到部长会议去一次。按照他本人的计划，他今年的工作不超过5个月。

这都是在一切领导大权集中于他一身，而他又闭目塞听的情况下发生的。赫鲁晓夫同志总喜欢说，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干部，但他自己却占据了所有重要职位：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最高统帅部。他还主管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和国防部。

这里还应当谈谈他的恶劣的干部政策。他对干部是很粗暴的。在此期间我们有多少干部被撤换，或者因为他不喜欢，或者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或者因为他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他支持一些可疑的甚至危险的人物，支持一些骗子和滑头滑脑的人。举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贝利亚的亲密战友谢罗夫为例。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沾满了鲜血，他亲自主持过150次“三人小组”①会议，杀害了几万名无辜的苏联人。有文件揭发他是迫害党的干部的“特别监狱”的组织者之一。② 谢罗夫的罪行是数不胜数的，但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③ 令人不解的是，中央第一书记却不断地提拔这个人。

赫鲁晓夫同志不做干部的工作，也不了解他们，他几乎不接见任何人，其中包括部长们。共青团中央和全苏工会中央的书记们到不了他那里，苏共中央各部部长们见不到他，甚至党中央的书记们，被他接见过的也实属罕见，正如常说的，只是“一小会儿”。甚至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各加盟共和国中央的书记们和各州州委书记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试问这样怎么能够领导全党全国呢?

在中央主席团内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主席团委员们的作用被降低了。主席团委员们对此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所有这些批评意见，甚至最小的不同意见，都遭到粗暴的拒绝。中央书记处的处境就更糟了。如果它决定了某一重要问题，马上就会遭到训斥。看来，他担心中央书记处，想限制它的权力，近来已开始谈论要改组它。

请看看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召开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全会，仅仅举行过有数千人参加的中央全会。④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听到批评或不同意见，也不会有人提出大胆的建议。

在苏共中央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农业委员会、意识形态委员会、化学委员会、重工业委

---

① 指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5年5月27日命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属中央的共和国、州、边疆区内务部机关建立的“三人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有：内务部局长或副局长、民警局局长、同案件有关的处长。“三人小组”有权决定驱逐、流放或在集中营关押5年以内的处罚。由于1937年7月31日开始了大规模镇压，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也建立了自己的“三人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有内务人民委员、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长和边疆区和州的党委第一书记、边疆区和州的检察长。“三人小组”有权决定包括枪决在内的任何惩罚。1938年11月“三人小组”被撤销。——原注

② 指1950年在列福尔托夫组建的特别监狱。该监狱属联共(布)监察委员会管辖。——原注

③ 谢罗夫1945年5月29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63年3月，在国家情报局工作人员别尼科夫斯基案件被揭露后，谢罗夫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其军衔由大将降为少将。——原注

④ 指举行有为数众多的党、政和经济工作人员参加的扩大的苏共中央全会的做法。——原注

员会。但这些委员会也是无权的，不能决定任何问题。这样的委员会是不需要的。未必需要建立现在这样的中亚中央局和外高加索中央局。① 但这些问题需要单独研究。

我们苏维埃机关的作用降得太低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解决属于苏维埃机关职权范围的哪怕是最普通的问题时，都不通过这些机关。例如，授予基辅市、基洛夫州以及其他地区勋章的仪式至今尚未举行。② 由最高苏维埃主席授勋，这是制度。但赫鲁晓夫说，他要亲自授勋。因此必须等待。

他对待加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态度是令人气愤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没有他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甚至不能就纯属它们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通过决议。乌克兰人因为在基辅建设了一座体育馆被他臭骂一顿，格鲁吉亚人也因为同样的问题遭到他的严厉训斥。在几次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他嘲笑过白俄罗斯人。他对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了解甚少。他对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还必须请你们注意他对我国武装力量和国家安全机关的错误态度。实际上，他瞧不起军队，不尊重我们光荣的军事长官。他妄自尊大，自称为军事理论家，他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军人们并不支持。他毫无道理地让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退休了，其实，他也让莫斯卡连科、扎哈罗夫、崔可夫等人退休了。至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近来对他也经常谩骂和凌辱，说国防部长似乎游手好闲，什么也不懂，对问题不深入研究，需要解除他的职务，等等。的确，这些话不是当面讲的，而是背后说的。为了保持"平衡"，当国防部长在场时，却常对他讲些恭维话。坦率地说，这难道不是政治娼妓的手法吗?

至于一般军官，赫鲁晓夫把他们称为不折不扣游手好闲的人，他提议撤销他们的各种优惠待遇。此外，在解决同国防有关的重大问题时，他忽视军人的意见。例如，在签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③之前，中央主席团没有讨论过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意见。结果，在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行动协调方面造成了严重失误。

总之，我们大家都应当以更谨慎和关怀的态度对待我们引为自豪和光荣的苏联军队。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待他们，不能冒冒失失和主观主义地解决同建设和加强我国武装力量的防御能力有关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容易出大问题，搞不好会弄得焦头烂额。

实际上，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已不再重视国家安全机关。他很少关心这个机关的工作，不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送给他的大量调研资料。

国民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正是赫鲁晓夫同志一意孤行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突出的失败只是可悲的事例之一。1958 年前，苏联的学校教育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世界上被理所当然地称为较好的学校。但我们的领导人认定，学校教育的状况不好，必须进行改

---

① 指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为了"协调和配合党组织的工作"而建立的苏共中央中亚局(1962 年 12 月 20 日)和苏共中央外高加索局(1963 年 2 月 7 日)。在赫鲁晓夫退休后，上述两局于 1964 年末撤销。——原注

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授予基辅市列宁勋章的命令于 1961 年 7 月 21 日通过，关于授予基洛夫州列宁勋章的命令于 1959 年 12 月 25 日通过。——原注

③ 指 1963 年 8 月 5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原注

革，尽管没有任何现实条件来保障改革的胜利。[①] 请看5年的工作总结：普通教育水平降低了，学习兴趣下降了，高等学校招收不到质量较好的大学生。

为什么把学习年限由10年改为8年制，为什么重视夜校而轻视一般学校，在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和缺乏物质技术基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劳动教育等问题，改革的创始人或其他什么人都不能回答。这种种改革是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证明的。但那个既不懂学校又不懂教育学的人，硬要动手进行改革。在这个培养年轻一代人的如此重要的社会问题上，难道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进行试验吗？

苏联科学院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突出的。在最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我们的改革家猛烈地抨击了苏联科学院，甚至扬言要解散它。[②] 什么原因呢？原来在选举新院士时，那个投靠李森科的努日金，由于137人中114人投票反对而没有当选。仅仅因为这件事，就对享有世界声誉的、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苏联科学院——科学的摇篮进行威胁！从罗蒙诺索夫创立科学院近250年来，它忘我地和忠实地为我国的利益服务。苏联科学大军的司令部和组织者为我们祖国建立的大小功勋不可胜数。有人竟然忘记了这一点，并想严厉制裁科学院。不用说，苏共中央不会姑息这种恣意妄为的人。我们有责任要求他遵守制度，要求他明白是在向谁动手。

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过去和今后都非常重视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视我们光荣的科学家，因为没有科学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请允许我向苏联科学院及其领导机关保证，苏共中央不会让科学院受委屈。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一个充满独裁野心的人可以发展到何种地步。产生这种独裁欲望的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同志深信，他比所有的人更高明、更聪明和更有远见。在任何地方他都想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重工业中他想当主要的冶金专家，在农业中他想当最高农艺师和畜牧专家，在建筑业中他想当总建筑师。他不明白，他仅仅是领导人之一，他的工作是党委派的，我们党不是他创建和为他而创建的，他仅仅是党的公仆。

请允许我谈谈同这个人对谦虚的认识有关的几个问题，顺便也谈谈他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创始人列宁的特点是非常谦虚和俭朴。大家都很了解这一点，因此我国人民已习惯用列宁这把尺子去衡量每一个领导人。很遗憾，赫鲁晓夫同志无论如何也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不知羞耻地说，他的名字是深受欢迎的，他的这种声望具有重大意义。报刊，首先，是《真理报》和《消息报》，成了他的家庭报刊，充满对他歌功颂德的东西。他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胡说八道的话，都在报刊上发表。究竟出版了多少册赫鲁晓夫

---

① 1958年6月2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一份意见书，建议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载1958年9月21日《真理报》)。根据这个意见书的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58年12月24日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取消了7年普遍义务教育制，代之以8年普遍教育制，8年毕业后实行义务生产劳动教育。——原注

② 指1964年7月11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按照全会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即解除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中央的工作上，并推荐米高扬担任这一职务。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谈到农业发展问题，他说，科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脱离农业和工业迫切需要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原注

的书和小册子,甚至无法统计!更准确些说,这些书和小册子不是他撰写的,而只是他署名的。他本人根本不会写作。

为了追逐名望,他不择手段。不久前报纸上发表消息说,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审议了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纲要,他似乎作了非常重要的批示。实际上,这一天没有举行主席团会议,而是开会讨论居民肉类供应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一篇空洞的讲话。后来报纸上把这次会议说成是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并公布了会议总结报告。①

在不久前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如此杂乱无章的讲话,建议把五年远景计划扩展为七年或八年计划,甚至更长期的计划。② 他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便于掩盖五年计划的失败。报纸上却把这个建议描绘成伟大人物的新发现。

总而言之,应该说,他总要经常显示自己,经常在报纸上看见自己和自己的名字的愿望,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嗜好。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每天在报纸上发表关于他的消息。如果没有什么可供发表,那就发表他在某地旅行的消息。他在这方面总能找到出路,如发表他同某人谈话的速记记录。这些速记记录中阐述的思想,充满令人厌恶的东西,而报纸却几乎把它说成是名言警句。

对他的国内旅行和出国访问,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广泛宣传,大肆张扬。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手拿面包和盐欢迎他,而他认为这是应当的。各州和共和国领导人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这样做,正如人们所说的,会给你点厉害看。

赫鲁晓夫经常断言,他是个列宁主义者,似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但实际上,他像个庸俗的市侩,竟然干出一个党员完全不应干的事,有时甚至干出连沙皇都不敢干的事。举个例子:根据他的指示:在克里米亚和皮聪达(高加索地区)他的别墅里,修建了耗资约500万卢布的游泳池。

请你们再看看,他家有多少辆轿车!儿子4辆,女婿2辆,妻子和女儿每人至少1辆。另外,专供他家使用的还有4辆。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共110人。瞧,这就是"列宁式的谦虚和俭朴"!

他在攫取奖章和礼品方面是何等卑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从所有的人(包括劳动者和资本家)那里索取这些东西。他搞到的奖章之多无处悬挂。当谈到他70寿辰的礼品③时,

---

① 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苏联部长会议于1964年7月24日讨论了关于保证完成采购肉类、牛奶和禽蛋的国家计划的措施问题。但在1964年7月25日《真理报》上却发表了这样的消息:"1964年7月24日,在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下,举行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研究了制订1966—197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基本方向问题。"——原注

②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从1963年5月起开始编制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远景五年计划和七年计划中1964—1965年的调整计划。1964年8月31日,苏联计划委员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送了五年计划草案。为了讨论发展国民经济远景计划的编制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于1964年9月26日举行联席会议。赫鲁晓夫没有同苏共中央主席团任何委员商量,就在开幕词中建议编制国民经济七年计划或八年计划取代五年计划。——原注

③ 1964年4月17日,大规模地庆祝了赫鲁晓夫的70诞辰。为了表彰赫鲁晓夫的"杰出功勋",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最高级奖章。——原注

他甚至连虚假的谦虚都没有，声称要从各加盟共和国收取礼品，尽管那里没有任何人打算这样做。不久前他获得了舍甫琴柯奖金，不知道为什么奖励他，难道仅仅因为他引用过别人事先替他挑选的舍甫琴柯的作品。①

他接受奖章时，也没忘记自己的亲属。他的儿子谢尔盖，一个无知的孩子，肩上还没有挑起过任何重担，竟然获得了列宁奖金和社会主义英雄称号②，还被授予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女儿拉达也获得了勋章，尽管她经常不去上班。女婿阿朱别伊获得两枚列宁勋章以及列宁奖金获得者的称号。③

他的讲话通常持续几个小时，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两个报告长达13个小时。④他在这方面也是不谦虚的。不禁要问，在我们1 000万党员的队伍中难道找不出第二个报告人吗？试问，为什么要发行那部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⑤ 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赫鲁晓夫同志竟敢放肆地议论列宁，攻击列宁，这个事实说明他骄傲和妄自尊大到何种程度。在一次大型招待会上，有近2 000人参加，其中还有许多外国人，他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似乎不是工人阶级和武装士兵，而是些婆娘们进行的。这是什么话，难道不是企图贬低列宁的作用和抬高自己吗？怎么能这样出言不逊呢！

在这方面还应当批判性地评价赫鲁晓夫同志反对个人迷信的立场。难道能把斯大林仅仅描绘成精神病患者、狂热者、靠斧头和断头台进行统治的独裁者吗？这样，把容忍他当权这么多年的党和人民摆在什么地位上了呢？不错，斯大林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了重大的罪行，为此我们严厉地谴责他。但不能言过其实，不能歪曲事实真相。事实说明，斯大林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为巩固和增加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做了许多事情。所有这些是人所共知的。确认这些事实真相无论如何也不能看作是恢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企图。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但不能贬低斯大林的功勋，更不能一笔勾销这些功勋。

这里理所当然地产生一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这样做是否是为了抬高自己？很像是这样！顺便说一句，近来他经常把自己同斯大林相提并论。这引起人们的警觉：今天仅仅同他对比，明天则要求其他东西。这种羡慕之心是很危险的。

简单谈谈他周围的在政治上同他亲近的人物。他同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他们不信任和持怀疑态度，但他另外接近一帮人，同他们结成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内阁”，他们不尊重任何机关，甚至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关。他们企图通过赫鲁晓夫同志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他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施加独特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他们成了他的支柱，他们加工(也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使之具有

---

① 1964年3月，赫鲁晓夫被授予1964年舍甫琴柯奖金，以表彰他在乌克兰进行的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原注
② 1963年4月，赫鲁晓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原注
③ 1960年阿朱别伊被授予文学艺术列宁奖金，以表彰他的著作《面向美国：赫鲁晓夫访美记》。——原注
④ 指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两个报告，即苏共中央总结报告(1961年10月17日)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1961年10月18日)。——原注
⑤ 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于赫鲁晓夫70诞辰时在苏联发行。——原注

政治和理论的外貌。简言之,他们制定和决定赫鲁晓夫同志实行的政策。

这些人巧妙地取得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任,并使他相信,没有他们将出现不幸。他们不断为我国的所谓第一号人物唱赞歌,使他相信,他似乎是一贯正确的,他似乎具有独特的实践甚至理论方面的天赋和其他的优秀品质。当然,他们这样做不是无私的,而是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而且他们都恬不知耻地获得了各种奖章、学位和荣誉职位,这都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报答他们的热心效劳而慷慨赏赐的。

现在,当大家都已知道赫鲁晓夫同志错误言行的许多事例后,会提出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的问题。有人会问:这是什么,是否是对赫鲁晓夫的新的个人迷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更确切些说,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是重新复活的个人迷信。

在共产党员和人民中,早就对赫鲁晓夫同志的言行表示愤慨,并且公开说,他树立了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这个事实对所有的人都不是秘密。这是我们的党员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证明。当然,赫鲁晓夫同志不得不考虑当前的形势,因此不得不对自己的真正意图进行伪装和掩盖,施展各种招数,进行蛊惑宣传。他反复强调说,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存在的秩序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列宁的工作作风。然而,你们大家看到,现在伪装已经剥去,蛊惑宣传帮不了他的忙。

同志们,认识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尚未最后完全形成是重要的。在个人迷信形成过程中,在它开始复发的阶段,我们就着手消除它。如果从另一种立场去评价这一可悲的事实,那么你们可以确信,这将会给我们党的威信带来严重的损害,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似乎我们党及其中央在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没有能够阻止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的树立,在个人迷信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恰恰是不对的。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请允许我谈谈这一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赫鲁晓夫错误行为的根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一个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领导人,为什么会背离这条路线呢?这首先是权力过分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你们记得,列宁早在他著名的《致代表大会的信》[①]中就指出了这种过分集中的严重危险。他看到的危险正是:斯大林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列宁对此表示怀疑。生活表明,列宁是何等正确。

党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②] 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

① 指列宁于1922年12月口授的意见书。——原注(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37—343页。——译注)

② 在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1958年)上,赫鲁晓夫被推荐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原注

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

我们党遵循马列主义理论，过去和现在都反对个人迷信。与此同时，党主张需要有威望的领导人。我们一向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我们需要有权威的、深受党和人民尊敬与爱戴的领导人，正像列宁说的，他们能够做出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认为是正确的决议，并能够提出这种建议。

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及其主席团正是这样的有威望的领导人集体。如果列宁当年曾幻想拥有几十个天才的、经过职业训练和长期学校教育的、相互很好配合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人，那么今天我们党拥有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有威望的领导人。仅仅我们党中央就有近400人。况且在党中央周围正在成长着一批能够接替我们的、有能力的新的组织者。

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

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望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我们每个人都为这种事态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性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我们在关心提高这个人的威望时，显然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如何超过了应有的界线。

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①] 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了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无疑，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危险，还需要一个条件，即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列宁指出："这些或那些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有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预防中央分裂的角度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②]

我们党和人民也曾赋予列宁真正无限的权力。但列宁具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称为列宁式的品质。所有深刻了解列宁的人都一致认为：同列宁一起工作，完成他的指示是何等幸福！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同志不具有这些品质，哪怕是与此相似的品质也没有。相反，他具有列宁曾经批评过斯大林的几乎所有的那些不良品质和素质，他甚至还发展了其中某些不良品质。

实际上，我们这位领导人的特点不仅是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而且他还

---

① 指1957年6月22—29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被从党中央机关清除出去。——原注

② 中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40页。——译注

热衷于发号施令,匆忙行事,判断问题时先入为主和偏颇不公,易于发怒,动辄侮辱性地指责他人,尤其是最近表现出来的过分自夸和自信。此外,他还具有列宁当年形象地称为真正粗暴的大俄罗斯警察的特点。

在初期,赫鲁晓夫同志虽不能控制自己,但总还能掩盖这些品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品质占了上风,成了他性格中主导的东西。在他思想上很快发展了这样的信念:现在中央内部似乎没有一个有才干的人,周围似乎都是些侏儒,只有他自己才是鹤立鸡群的大人物。①

当然,我们都记得,赫鲁晓夫同志从前并不是这样。当年,在党和政府工作方面,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是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的确,从前和现在一样,他不擅长理论,更确切些说,他在理论方面不甚了了。党内集体的工作弥补了他的这个弱点,而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严重的缺陷,能够倾听同志们的意见。然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在谈论赫鲁晓夫同志的个人品质时,还不能忽略他的年龄。或许,他的许多不良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已进入暮年,尽管他本人对此并不服气,还硬说他似乎刚过中年。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对此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句体贴人的话,我们理解那些不愿成为老人的人的心情。但事业应当高于一切。我们在评价问题和事件时,恰恰应当从事业的利益出发。

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着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由小事已变成具有决定意义因素的局面。赫鲁晓夫同志把自己同党的整个领导对立起来,他的行为束缚着中央的工作,因而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实际结论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呢?我们认为,按照列宁的建议去办,是扭转形势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你们大家记得,列宁在谈及斯大林时写道:这个人"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②

你们看到,除撤职外,列宁没有找到其他办法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他认为所有其他措施都不能达到目的,因为领导人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他已拥有滥用权力的本领。我们现在也形成了类似的局面。

---

① 指英国作家斯维福特著作中的主人公,他在旅行时进入了小人国。——原注
② 中译文参见中文版《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40页。——译注

有人会问：这种措施是否太严厉了？我想，恰恰应当按照列宁的建议去办。为什么一定这样处理呢？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①没有采纳列宁的建议，代表们认为列宁的要求太过分。斯大林当时表示忏悔错误，并保证改正错误，因此代表大会保留了他的总书记职务。生活表明，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代表们，他们犯了错误，为此不得不付出极昂贵的代价。现在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形势。

我们在全面考虑问题的这个方面和权衡一切赞成意见与反对意见之后得出结论：这次必须无条件地和严格地执行列宁的指示，必须听列宁的话。

我们认为，最明智的处理办法是赫鲁晓夫本人提出解除他所担任的各项职务。在我们党内，在劳动人民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人们将能正确理解这个步骤。同时，这将有助于提高苏共的威望，并将表明，我们党不是把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声誉问题，而是把事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最后，这也符合赫鲁晓夫同志多次说过的话，即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到老年他打算退休。

这样，现在把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提交大家审议，这些措施可归纳如下：

1. 解除赫鲁晓夫同志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职务。②

2. 制订和通过有效的补充措施，来保障完全消除党和国家这个或那个领导人恢复个人迷信的可能性。

党纲中规定的措施不能保障完全消除这种危险。前面已经指出，列宁认为，一个人手中集中无限的权力是能够产生个人迷信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应当限制个人的权力。出发点必须是，权力应当集中在党中央及其授权的中央主席团手中。

为达到此目的，必须：

第一，今后绝对禁止一人身兼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设置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职务；坚决提高党的中央全会的作用，举行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全会，而在必要时举行全苏会议，但不能像现在这样，用它取代中央全会。

第二，实行每年在中央全会上讨论一次中央主席团的工作报告的制度；完全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严格划分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之间的职权，扩大他们的权利，提高每个人对具体委托给他们的工作的作用和责任心。与此同时，制止个别领导人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台吹捧自己的任何企图；保证在主席团内部对一切原则问题能够进行自由的、公开的与认真的讨论和集体审议。

第三，取消违背列宁主义原则和有损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把党一分为二的做法。撤销两个州党委和两个边疆区党委，即农业党委和工业党委，恢复原来的领导机构，即在边疆区和州恢复统一的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苏维埃机关和其他机关也作相应的调整。

---

① 指1924年5月23—31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原注

② 1956年2月27日，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必须建立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以便改进对俄罗斯联邦党的工作和经济的领导。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兼任俄罗斯联邦局主席。——原注

第四,大大提高农村党组织的作用,扩大其领导机关对农村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在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中,除这些措施外,还必须关心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首先必须关心提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作用。

为此目的,必须扩大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和间接处理问题的范围;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定期听取部长会议主席团简要的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工作,使他们有机会向政府,向部长们系统地提出质询,等等。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以及地方苏维埃应建立同最高苏维埃类似的工作制度。

在最近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先应当听取中央主席团关于党和国家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措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报告,然后听取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苏联人民生活条件、提高其对劳动成果物质利益关心的措施的报告。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大家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去坚决和勇敢地扭转目前的局面,消除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的义务是毫不拖延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坚定地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捍卫党的纲领、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决议。我们党是一个强大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我们的目标明确,我们知道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苏联人民沿着通向光辉未来的道路顺利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可靠保障。

АПРФ,ф. 2,оп. 67,Пакет №223

№20286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1964 年 10 月 14 日以后①)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手稿)

卷宗名称,出处:《B. M. 莫洛托夫的科学理论活动》

① 该文件未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应在 1964 年 10 月 14 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编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在国际环境中的孤立状况。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列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大小国家，人口超过人类的1/3。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进入了广泛展开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国人民带来了真正发挥人类创造力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社会主义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的内在力量是何等伟大，从资本主义奴役的桎梏下获得解放的人民力量的增长是何等的迅速。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捍卫自己已赢得的权利已经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并时刻准备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设中去。任何干涉他国事务的企图都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而应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后，人民取得的成就也在与日俱增，这使资本主义国家中压迫劳动人民的剥削者感到十分恐惧。他们不能不意识到，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统治和统治集团仍赖以维持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末日正在到来。

"美国垄断资本及其英、法同盟者公开帮助西德帝国主义，这个西德帝国主义恬不知耻地鼓吹复仇主义的侵略目的，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发动战争。在欧洲中心，威胁全人类和平和安全的危险的侵略温床正在死灰复燃。在远东，美国垄断资本正在扶植另一个战争温床——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它的日本军国主义，它正在威胁着亚洲各国，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深刻的矛盾把帝国主义国家与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的国家区分开来。"(引自苏共纲领)

帝国主义国家一方，它们付出了不小的努力，不仅建立了军事集团，而且还组建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政治和经济集团，这些集团的危险性与政治危害性曾经被错误地淡化。但是，这些集团并不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而改良主义者们，企图通过充当帝国主义者的仆从，帮助他们的事业，只起了有限的效果。改良主义者的这种做法常常引起劳动者们的积极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正在不断增长。

不管建立多少帝国主义集团，它们无法克服销蚀和削弱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深刻矛盾。在这些集团内部，争取更有利的经济和政治阵地的斗争以及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争取统治地位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甚至在那些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和非军事集团内部，参加集团的国家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我们有时使用"帝国主义阵营"这个词，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从而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为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建立了一定的共同的政治利益基础。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事实上，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即分裂的、世界帝国主义矛盾系统的遗留物，从来也不能建立起像业已建立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那样的、建立在深刻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基础上的世界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牢不可破的基础不仅在于经济基础的一致性,而且还在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与目标的深刻的一致性。这些利益和目标,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为纽带,以兄弟友谊与社会主义合作为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的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团结,兄弟国家的人民正在这种革命思想旗帜的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现在西方国家实行的、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说明,帝国主义集团对自己地位的稳固性和稳定性缺乏信心。这种军备竞赛绝对不能巩固已经腐蚀的资本主义制度,绝不能保障帝国主义国家的未来。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其他诸多侵略措施也是没有前途的。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就可以确信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些年,美国拒绝与苏联进行贸易,以此表明它不愿与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企图给苏联制造严重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做有没有达到它力图削弱我们国家的目的呢?当然没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不走这条公开的侵略道路,相反,却日益发展与苏联的贸易联系。只有不愿正视事实的人才会否认,美国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已遭受了彻底的失败。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圈内,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一种倾向是要加速发动世界大战,另一种倾向则要推迟世界大战。但是不能不承认,那一事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即越来越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侵略集团对社会舆论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势,正在日益增加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现实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正视真相,看到这个现实的危险,不允许存在消极的自我安慰情绪,提高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阴谋的警惕。但同样,也不能让来自帝国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仆从们的恐吓得逞,任何软弱的表现以及警惕性的不足只会鼓励侵略者。在过去,和平和进步的力量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强大的物质技术手段和保卫和平与人民的发展的自由以及彻底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的其他巨大可能,世界上没有能够制止人类走向这条光辉道路的伟大运动的力量。

……最近几年,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疯狂展开的军备竞赛要求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经常的警惕,并不断采取自觉的、坚决的行动。如果不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实现的。现在,各国人民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越来越紧密地与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军备竞赛引发新的战争的危险,把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置于国际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中心。

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呢?

H. C.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在当代防止战争可能性"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说:"全世界千百万的人在问:新的战争能否避免,难道人类除了两次流血的世界大战以外不得不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最近几个十年来的

世界历史变化，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不能不承认，战争问题使千百万的人感到不安。也不能不承认，战后时期发生的世界历史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分析世界形势，说出自己的话。不妨提醒一下，工人阶级过去也只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听到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真理的。众所周知，修正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问题上也是不全部讲真话的。他们或者隐瞒这个真理，或者极力用战争来吓唬人，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所扮演的都是帝国主义奴仆的肮脏角色。

在上面所引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中，战争问题是提得含糊和不明确的。要知道，阻挠和防止一场不大的、所谓局部战争的发生是一回事，这在过去就曾发生过，防止爆发世界大战的问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历史经验表明的，所有大国和许多小国都会卷入世界大战。把这些问题混淆起来，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二十次党代会上的和后来的讲话的一个特点。

在上面所引的话之后，赫鲁晓夫同志说："众所周知，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在转到问题的理论方面，然后再转到实践方面之前，必须排除这些话所造成的一个虚假的印象，似乎列宁的最重要的论断之一——帝国主义存在时期战争不能避免的主题，只适用于'帝国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的时期，也就是说，只适用于十月革命前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情况不是这样的。不论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以后，列宁都坚持不懈地捍卫这一对战争的观点。但是上面所引的说法的主要缺点，在于歪曲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观点本身。在这一说法中，列宁的观点是被简单化地、片面地，因而也是不正确地加以阐述的。

只要熟悉一下列宁的话，就不难确信这一点。

列宁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没有不发生世界大战的保证，但他也指出了摆脱战争的道路。赫鲁晓夫同志引用了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则论断，但是他不说列宁讲的摆脱战争的道路。

然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就是在过去也从不承认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而是号召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坚持不懈地培育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推翻产生现代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旗帜，不局限于发表一般的口号，而是号召进行积极的革命斗争。众所周知，只是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地主和资本家在俄国的统治，我们祖国才挣脱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战火，也向其他人民指出了摆脱战争和产生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可靠道路。难道这一光辉的事实，不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关于防止战争的道路的学说的明证。

列宁的学说，并不像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那样，归结为承认战争在帝国主义存在时的不可避免性。这个有关战争的学说的第二个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列宁关于这样的

一个革命性的结论,即各国人民如何和通过何种途径不仅应该而且有可能终止战争,并且终止产生战争的原因本身。不讲这第二部分,不谈摆脱战争的道路问题,就不能正确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战争的观点。尤其是因为列宁的学说,为如何真正防止战争的问题,提供了在科学上明确的和在实际上有根据的回答。

完全清楚,赫鲁晓夫同志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战争的观点时,走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粗暴地歪曲了列宁关于战争的学说,犯了严重的理论错误。

……但是,人们说,不能那样看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似乎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一个国家中,甚至在像上衣的纽扣那样小的国家中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摆脱战争。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1960年)就是这样俏皮地说的。可能,这句俏皮话在有的人看来是有趣的,但是试图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是不可能有任何好处的,且不去说,这也不能掩盖思想上的空虚。

犯近视症,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者的进程中发生的世界历史进展,和其后,对在欧洲和亚洲以及后来在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中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前所未有的高涨估计不足,那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忘记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已存在于一个和几个已不能影响整个国际局势的小国中那样的时代,同样是错误的。

我们的最大胜利是苏联走出了战前的国际孤立状态,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正不断得到巩固。但是能否忽视那个事实,即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把这个体系与某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上衣的纽扣”相比是不合适的,即使是为了开玩笑!在继续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能否认为,战争危险的问题是一个“简单、明确和比较容易的问题”,列宁在他的关于战争问题的一次最后的讲话中,在1922年12月写的《关于我们代表团在海牙的任务的笔记》中,曾专门对这种不严肃的议论提出过警告。

必须明确地回答一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关于摆脱战争的道路的理论学说是否适用于现在的条件——这些原则性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而资本主义还作为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的条件下,是否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是,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并且更公开地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发言中肯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论断已经过时了,它在“现时代”已不适用了。

而且,赫鲁晓夫同志在谈到列宁对战争问题的观点时,重又认为列宁曾讲过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和使人民摆脱战争的问题,对此不能默而不谈。所引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言论不仅与事实,首先是与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的事实明显矛盾的,而且也是与对马克思主义者无可争辩的一个理论观点明显矛盾的。这个观点认为,列宁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论断,在国际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对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像现在这样只生活在两个世界体系之一的人民,都具有并非暂时的意义。

完全清楚，赫鲁晓夫同志的上述言论是一种要抛弃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性论断之一的号召。如果说这不是修正主义，那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的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是明显的。而且在他言论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定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赫鲁晓夫同志通常避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作公开的攻击，多半是用赞扬列宁的词句来掩盖他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反对革命的倾向。他在关于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的近视和自信的声明，看来是他这类言论中最轻率，也是最使党和广大的社会人士迷失方向的言论。

РГАСПИ，ф. 82，оп. 2，д. 1662，л. 6－20

№20006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1964年10月15日）

绝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C. B.契尔沃年科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与兄弟党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的谈话记录

1964年10月15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请求与中共中央一位领导人会面。我们得到通知，将与苏联大使会面的是伍修权，后者接见我的时间，安排在10月15—16日的午夜24时。

我向伍修权通报说，10月16日苏联报纸将公布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解除H. C.赫鲁晓夫同志所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的决议。苏共中央会议一致强调，苏共将继续坚持以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等会议决议和苏共党纲为指导，以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为基础，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不懈奋斗。苏联政府将继续根据列宁主义诸原则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而斗争。

在听取我的通报之后，伍修权说，这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关于苏共将继续坚持以

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等会议决议和苏共党纲为指导，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因为这是苏共的内政。关于苏共继续遵守历次莫斯科会议所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我们对此给予肯定，因为这些宣言和声明都是真正的历史性文件，理应成为所有共产党行动的指南。

随后伍修权又说：至于我们党(即中共)，她将坚定地遵循这些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如果苏共能够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坚持这些文件中所包含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原则，我们将给予相应的评价。

伍修权预先声明，此次苏方所通报的内容——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国际问题，只有中共中央才能对此给出正式答复，他能说的仅限于上述内容，因为此类问题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伍修权的各方面举动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似乎早在此次会谈之前中国人便已通过某种渠道了解了我们通报的实质性内容。

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苏联驻中国使馆一等秘书 A. A. 勃列日涅夫和三等秘书 Ю. M. 加列诺维奇等。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手写批注：

苏共中央联络部已了解了文件中的相关情况。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O. 罗满宁
1964 年 12 月 24 日

РГАНИ，ф. 5，оп. 49，д. 716，л. 360－361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08，д. 7，л. 56－57

№25399

苏联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

(1964 年 10 月 16 日)

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致以敬意，并且荣幸地

通知：今年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满足了赫鲁晓夫要求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并且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大使馆利用这次机会，再次向中国外交部致以最高的敬意。

北京，1964年10月16日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3，п.215，л.41

№25763

苏达利科夫的报告：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

（1964年10月21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1964年10月21日

第831/дв号

关于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①

一、关于中国

近来中国的宣传攻击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内外政策的声调压低了一些。看来中国正在研究局势，以便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局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个时候要适时地采取一些措施，表示我们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意，支持建设性的观点，如果中方有这样的观点的话。当然，我们应当研究中国对我们举措的反应，考虑他们在消除现有苏中分歧时与我们配合的准备程度。

其中首先采取的措施可以提到以下几项：

1. 逐步对一些牵涉到两国利益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例如向中方详细地通报即将参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

2. 在答复今年10月17日周恩来的信件时,根据我们在裁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可以原则上不反对召开禁止核武器大会的思想,同时指出这一思想苏联早已提出过。

3. 暂且不急于继续进行边境谈判,要记得,中国在最近声明中提到过中国代表团要来莫斯科的时间是通过外交途径来协商的。

4. 允许中方提出关于中国公民进入苏联某些岛屿从事生产活动(捕鱼、采集柴火等)的请求,这无疑会促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河(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地区的形势正常化。

5. 不急于执行1964年7月17日"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科学、社会团体和旅途联系"的决议中还没有执行的条款。今后根据中国的态度对决议再作修改。

6. 逐步恢复在我们中央报刊上登载中国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文章。考虑暂停对中国的广播节目的禁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取决于中国今后播出节目的性质。

7. 研究关于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参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问题。

8.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1954年12月30日签订的航空协定的照会给予肯定的答复(关于允许中国人在苏联过境飞行)。

二、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 适时地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报苏联政府在第二十次联合国大会对主要问题的立场,并通报我们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2. 在苏联报刊实际上已经停止刊登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第二十次大会上讨论涉及面尽量更广一些。关于人民共和国生活的报道停止了刊登,也停止了刊登揭露美国在南朝鲜的政策的文章。建议刊登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3. 研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加强他们的国防。

4. 定居在苏联的朝鲜公民不愿返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会给苏朝关系造成隔阂,也许应该不让那些不愿返回自己国家的朝鲜公民定居在苏联。

……

三、关于蒙古

1. 关于建立蒙古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

今年来我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发展很快,包括其国内生活和外交活动方面。特别是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范围扩大了。今年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缓慢,特别在畜牧业方面,苏联援助的资源使用不当。

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一些组织,有时候是一些部门,主观地、不用科学态度对待与蒙古关系中一些原则问题,在采取措施的时候,不考虑这个国家根本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之

蒙古在经济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在向我们请教时许多方面估计错误。

这些问题可以像苏联一样通过一个机构集中解决。较合适的是建立苏联式的蒙古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这样可以通过一个机构来集中解决蒙古的问题，这一机构可以考虑当今的问题，也可以确定国家发展的远景规划，彻底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

2. 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

泽登巴尔同志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多次邀请我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邀请原则上同意，就是访问的时间尚未确定，一直拖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40多年与苏联并肩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至今没有一位苏联元首和苏共第一书记去那里访问。当前正在进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团结和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摆脱苏联影响而进行的剧烈斗争，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具有重要意义。

3. 关于两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确定苏蒙边境个别地段的问题。

苏蒙边境个别地段早已确定，但不符合苏联国家边境保卫的新情况（特别是沿河的边界地段），现在必须弄清蒙方的意向，他们是否愿意在目前就确定苏蒙边境个别地段交换意见。

四、日本问题

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主要表现在贸易方面（今年与日本的贸易额为3亿美元，占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总额的第三位）。除此以外，我国与日本开展广泛的文化、科技交流，今年计划加快政治关系方面的步伐（国会代表团互访，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互访）。

为了进一步发展苏日关系和巩固我国在日本的影响，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1. 进一步开展正式的会晤、接触，为以后的政府代表团互访作准备。

根据今年9月18日双方发表的关于日本国会代表团访苏的精神，继续做好发展两国国会互相交流的工作。

2. 苏联和日本之间的领事关系已恢复，1965年苏联代表团已与日本商谈互派领事事宜。出发点是：苏联与日本之间的领事关系根据1956年12月的共同宣言已经得到了恢复，同日本方面进行互换领事馆的谈判。

3. 建议寻找苏日直接空航的途径。

4. 与日方商讨捕鱼业科技合作的问题，签订相关的协议。

5. 建议苏联对外贸易部和其他团体提出3—5年内与日本贸易的意向，必须特别考虑广泛吸收苏联东部地区广泛参加贸易的问题。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10，л. 209－216

№25764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①]

（1964 年 10 月 27 日）

机　密

……

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庆典之前，大约从 9 月 28 日起，中国中央报纸上反苏的文章减少了一点。同时在北京(以及在其他城市)公共场所的书架上已经撤去了反苏的外文书籍。可是在庆祝 15 周年期间，无论中央出版部门，还是地方省的报刊上反苏的言论重新激烈起来了。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10，л. 217

№20771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事宜

（1964 年 10 月 28 日）

摘自 С. В.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964 年 10 月 28 日

10 月 28 日早晨，苏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大使馆说，周恩来想在 15 点 30 分会见苏联大使。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然而，在大约15点钟的时候，大使馆又被打电话通知说，由于周恩来忙于一些事情，这次会见要推迟一段时间。在推迟了很长时间之后，大约在17点钟，苏联大使被要求赶快到周恩来的官邸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兄弟党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同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谈。

互致问候以后进行了具有记录性质的短暂会谈。之后周恩来开始阐述实质性事务。他说，今天已经是10月28日了，在最近2周发生了许多变化。在10月15日夜晚苏联大使接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通报。中国发了贺电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当选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封电报也表达了中国的问候和期望。正如他，周恩来，在接到的通报中所反映的，苏联大使在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明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这一点。（确实，在缅甸大使举办的招待会上，徐明在同我的谈话中想知道，大使馆将会怎样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莫斯科将采取什么措施庆祝这个节日。对于这些问题我只是进行了笼统的答复。徐明几次提议为苏中人民的友谊干杯。他立刻就引用了中国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当选的贺电中的内容。对于中国同志送来的贺电和问候我表示了感谢。并且说，苏联共产党历来而且现在仍然坚持我们党的团结和友谊以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中苏人民的团结。）

周恩来继续说：同时，我们还不太了解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苏联政府发生的变化，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就党和国家的路线进行接触。对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两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我们可以向苏联派遣我国的党和政府代表团以便表达我们的问候，同时，我们也可以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

周恩来建议说，如果你们对这个建议的实施感觉有困难，那么中国方面可以提出第二个建议：我们欢迎苏联相关代表到中国来同最高领导人进行接触，这可以是公开的或秘密的途径，这都取决于苏联同志感觉哪种形式合适。

如果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感觉这两个建议都不合适，那么中共中央准备听取苏联方面的意见。

我对周恩来的接见以及他所提的建议表示感谢，我说，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改善两党和两国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强调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遵循统一的立场，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寻找改善我们两党关系的途径。

之后周恩来说，中方在贺电中也表达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愿望。然后周恩来谈到了调解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进行接触。事情应该一步一步来。"

我也说道，我想知道，关于中国方面打算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的级别事先有什么打算？当然，这或许是预先提出的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怎样,这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应当会具有一定的级别,因为中国方面的打算是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他也说,他知道到十月革命纪念日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他建议苏联大使在这次会谈之后尽快把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给苏联领导人。看起来周恩来对这次会议好像很匆忙一样。

我答应周恩来立即把他的谈话内容报告给莫斯科。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建议,我们想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这一点必须通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即最高领导人对于他们原先所持的总的政治路线在原则上并未改变。我们得到了关于前不久召开的政治局和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彭真进行的发言的消息。当地的苏联公民以及同我们友好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的代表向我们通报的信息也证明,中国领导人强调他们的政治路线没有改变,其中包括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上的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代表团积极开展了多方面工作,其目的是让他们对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各兄弟党代表会议产生怀疑和失去信心。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通报。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领导人,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新的形势下,打算在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各兄弟党代表会议问题上改变他们的态度。

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议开始,中国人停止了在官方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中的反苏言论,减少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同时,近来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商店、饭店、机场和车站重又出现了许多反苏的材料,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报》以及其他报刊出版的著名的9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期间产生的。

考虑到新的局势,最高领导人无疑在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他们产生了一些战略性设想并采取了一些步骤。最近有消息说,中国领导人打算主动改变同苏联的关系,首先是在国际政策方面。或许,这个消息是由中国人散播的。这个说法好像是彭真在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的。周恩来在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谈话以及其他的场所也表达了这种说法。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积极主动的依据是,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同苏联共处呢?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同苏联的国家关系等。

这样,不排除中国领导人会按照这个计划采取措施。但是,他们的实际意图怎样还有待实践和事实来证明。

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新的局势主动采取措施,来表现我们想改善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当然,应当强调在这些关系的原则基础上。

我方采取的这些措施,包括其他的一些措施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在希望改善同苏联关系上的发言和意图的真诚性以及他们希望在什么条件下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研究周恩来提出的具体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有关会谈的建议中，其中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们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只能在如下情况下进行，也就是，如果我们邀请其他兄弟国家的代表团，这样中国代表团也不会突出起来。

自然，这个代表团到莫斯科的访问会削弱苏中关系的紧张程度，可以搞清楚我们党和国家相互关系中的一些政策问题，并且可以尝试搞清双方在新的局势下关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或许，也应该再次建议他们参加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的工作。这对于我们对其他兄弟党可以产生好的影响，特别是可以影响那些已经产生动摇的兄弟党，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良好意愿以及一贯为维护统一而斗争的行动。

然而，应当强调，我们认为仅仅邀请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可以被中国人利用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的访问就会有一些困难，也会对苏联采取不同的措施造成困难，其中包括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真实观点的情况下对会谈纪要的准备。

如果整个局势不允许在11月7日前邀请兄弟国家代表团，如果这一建议是不合适的，那么就建议中国方面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之后派遣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个建议从我们的方面来说是完全合适的，特别是考虑到苏联现在正同兄弟党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和磋商。可以建议这个代表团在11月中旬访问，但是它不应该被拖延到预定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开始的时候。

如果中国人拒绝按照我们指定的条件到苏联访问，那么作为一个预备方案我们可以考虑关于到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然而，关于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应当被看作是对中国方面关于进行双方会谈建议的回应，而且，这次访问应当在11月份以前进行。这个建议也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中国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认为，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我们对北京进行秘密访问的建议(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会谈，其中包括在莫斯科进行秘密会谈)，因为这样的访问会被兄弟党错误理解为我们在背着他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如果决定让兄弟党知道这样的访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他们开展大量复杂的、推心置腹的解释工作。

这就是我们谈到的一些想法，当然，这只是以我们得到的信息和我们的观察为基础。我们也有可能没有考虑到最近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形成的所有状况，也可能没有考虑到苏联共产党同兄弟党在磋商过程中产生的因素。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РГАНИ, ф. 5, оп. 49, д. 716, л. 353－359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7, п. 508, д. 7, л. 68－74

№25640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共希望在访苏期间与兄弟党联系[①]

(1964 年 10 月 29 日)

1964 年 10 月 29 日契尔沃年科再次应周恩来的请求与其会面。

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他作为代表团领导。

周恩来:"我们想……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建议,邀请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共同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并在这些国家的兄弟党之间建立联系。"

(没有提到南斯拉夫)

周恩来说,这天他已经与提及的上述国家的大使们交谈过了。

"他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转达,说万一要是苏联同志向他们发出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希望他们能接受邀请并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周恩来还表示,同时告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们,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主动提出派自己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的话,那就更好了。"

周恩来同时还对苏联大使说,他"恐怕不得不要暂时在节日期间留在北京了,现在不能离开北京,因为在北京的大会上要作发言的"。

周恩来最后的倡议(有关兄弟国家),未经苏联共产党同意,"更令人深信,中国人做出的姿态是不真诚的,他们企图束缚苏联共产党,使它失去主动的精神,并使召集起草委员会的计划受挫"。

……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08,д. 7,л. 75 - 79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07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驻华使馆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

(1964年10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29日会议
第168号记录第1项
关于苏联驻中国大使1964年10月29日来电
第1170—1175号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就苏联驻中国大使1964年10月29日来电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92，л. 1

№2000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通报中共中央的建议

(1964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0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1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向资本主义国家各共产党组织——起草委员会参加者通报有关中共中央的建议。

决议的起草和递交者：Л. И. 勃列日涅夫、M. A. 苏斯洛夫、Б. Н. 波诺马廖夫、A. A. 葛罗米柯。

1964 年 10 月 30 日

绝　密

兹决定将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而起草的下述文件内容向资本主义国家各共产党领导人——起草委员会的参加者作出通报。

不按顺序

苏联驻各国使节①

迅速以口头方式向与我们友好的领导人转达苏共中央如下通报：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经可靠渠道向你们通报如下情况：

苏联驻中国大使 10 月 28 日应邀与周恩来会面。借中国领导人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同志当选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职务之机，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两党和两国人民紧密团结的方针路线。他声称，中共领导人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保持正常联系。

有鉴于此，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建议派遣党-国家代表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如果落实此建议有困难，那么中方欢迎苏联派相应代表来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接触。

随后，他又说，如果中方关于派遣党-国家代表前往莫斯科的建议被接受，那么，该代表团的领导人为周恩来。中方将以建议的方式邀请除南斯拉夫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代表来莫斯科参加庆典。中国领导层将把自己的这一倡议通报给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除南斯拉夫外)，并表明自己的诚挚愿望，以便这些政党在来莫斯科的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主动性。

苏共中央讨论了中国领导人的上述建议，并认为，苏联理应尽力利用这一建议来恢复双方的联系。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协商之后，我们将向这些国家(南斯拉夫除外)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发出邀请，以便其派遣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

在向你们党的领导人通报上述情况的同时，我们还想真诚地表明一点，即我们党永远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在马列主义、莫斯科历次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关于我们在这方面要采取的后续步骤，均会及时向你们作出通报。

苏共中央”

---

① 文件建议，根据所附目录向各地发送。得到相应通报的各国共产党有：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英国、德国、印度、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原注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93,л. 5,62 - 63

№2000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

（1964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0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2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邀请兄弟国家代表团来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的决议

决议的起草和提交者：Л.И.勃列日涅夫，М.А.苏斯洛夫，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

1964年10月30日

绝　密

请各苏联使节确认给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内容(附录第一、二、三、四、五号)[①]

附录二

北京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请拜访周恩来同志，并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名义向其通报，莫斯科将乐意接受中国党和国家代表团来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请转告周，莫斯科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来访将有益于双方的接触和交流。我们同意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应当“循序渐进地

① 第一、三、四、五号附录未在这里公布。——原注

改善苏中关系”。

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安排如下：

11月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召开盛会，11月7日——阅兵式，劳动者红场游行，晚间——招待会。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们愿意，他们便有机会在11月6日召开盛会期间发表祝辞。

请向周恩来同志询问关于中国代表团来访的日期及其人员组成情况。我们建议对外公开报道中国代表团来参加11月7日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情况。

如果周恩来同志询问，是否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来莫斯科，请转告他，我们已邀请了如下国家的党和政府代表团来访：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政府代表团以及通过苏联-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渠道邀请的经阿尔巴尼亚来访的一些代表团。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93，л. 5，65 - 66

№2000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驻华使馆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事宜

（1964年10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1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9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因中方询问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典期间的活动情况而给苏联驻中国使节的指示”的决议

决议的起草和提交者：Л. И. 勃列日涅夫，А. Н. 柯西金，А. И. 米高扬，Н. В. 波德戈尔内，Ю. В. 安德罗波夫，А. А. 葛罗米柯。

1964年10月31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请确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参见附录)

附录

机　密

北京

苏联(驻中国)大使(收)

其一,中国代表将参加的所有与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有关的活动均应在友好和无拘无束的气氛下进行。会谈和招待会的组织工作都应给中国同志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即我们已为与他们接触和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做好了准备。

当然,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将参加招待会,那么,你们应对其和其他主要中国客人给予特别关照。如果中方在谈话中涉及苏中关系等重要问题,你们在答复时应当以自己已知的、我们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原则路线为指导,并强调,我们党,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准备为发展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我们期望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将给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带来积极成果。你们可以根据招待会的气氛,以祝酒的方式,向中方表明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一贯立场: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并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胜利。

我们同意你们附录中关于邀请参加招待会的人员组成名单。

其二,你们通报中说,将应邀在北京的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言。我们的答复是:你们应当表示同意,并做好发言的准备。发言内容应以Л.И.勃列日涅夫和A.H.柯西金同志10月19日接见宇航员们时的谈话精神为指导。其中应指出,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成就;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友谊的坚定决心;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以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积极发展与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兄弟般友谊和全面合作的强烈意愿;表明我们党将为巩固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做出一切努力。

你们的发言应属于一般政治性的,不要涉及有争议的问题。

РГАНИ,ф.3,оп.18,д.293,л.7,74-75

№21171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

（1964 年 11 月 2 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4 年 11 月 2 日
第 2584－c 号

机　密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安全委员会收到的关于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活动及其对今年 10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反响的补充资料。

在全会资料公布之后，最初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只是对这些事件表露出喜悦之色并相互展开议论，而与苏联公民一起交谈时则往往对这方面话题避而不谈。

近期，中国学生开始就这一话题与苏联人积极交流，在个别情况下还会与其展开辩论并认为，(苏联国内)所发生的事件是中共领导人正确政策的胜利。

今年 10 月 26 日，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班便与苏联大学生之间出现了一场这样的辩论。

在辩论期间，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五年级的(中国)大学生唐宾明(Тан Бин-Мин)便声称，在中国发展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在苏联盛行的是修正主义和与帝国主义的妥协。赫鲁晓夫正是因为修正主义才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时间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唐宾明还断言，苏联采取的揭露和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举措体现了赫鲁晓夫政策的盲动主义，而在具体行动上采用的是法西斯方式。他接着还说："如今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一切都清楚了，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我们是对的。"

唐宾明和其他中国人在反对苏联大学生观点的过程中以粗暴的方式叫喊说，后者也都是修正主义者。

唐宾明的观点得到了莫斯科大学中国研究生韩金庆(Хань Цзинь-Чин)和齐忠涛(Ци Чжун Тао)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后者的举止极其放肆无礼，他与唐宾明一样，在歪曲事实的同时还对苏联实施了粗暴的攻击。其中，当涉及著名的纳乌什金事件时齐忠涛声称："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安静地坐在车厢里，这时一群苏联士兵闯了进来，将他们(中国学生)带下

火车并围了起来。这是军阀作风、法西斯主义，你们是真正的法西斯。”

上述中国人批评苏联的行为，并对我们的报刊进行污蔑性攻击。他们声称，似乎这些报刊中所写的一切都是歪曲的，《真理报》早已不再讲“真理”了，等等。

中国大学生在写给祖国的信件中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H. C. 赫鲁晓夫被免职是中共领导人政策的胜利。

例如，一位在莫斯科一所大学中求学的姓张的(中国)大学生在一封给自己在中国的同志的信中便写道：“……许多人都向我们表示祝贺，都说中国胜利了，现在毛泽东成为了世界的领袖。

……在了解赫鲁晓夫的命运之后，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是多么的正确啊……”

还有一位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向国内发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其中写道：“……我立即便知道了两件令人高兴的新闻：中国爆破了原子弹和赫鲁晓夫在苏联被解职(这里使用了污辱性的表达方式)。这表明，西风最终还是落败，东风变得更加强劲。真正的马列主义终将战胜自己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阻碍……”

一位在列宁格勒上学的方姓中国人在今年 10 月 18 日写给祖国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和前天发生了两件震撼人心的事件。第一件是修正主义头子下台。这说明修正主义者们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自己国内都已是举步维艰，他们已不能团结一心了。当然，新的(苏联)领导人依然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所奉行的仍是修正主义路线。(当前苏联国内)所出现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我们国内的形势更好。我们的外国朋友变得越来越多。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队伍变得日益强大。真理在我们一边，胜利终将属于我们。而修正主义者终将彻底垮台……”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迹象表明，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正在加紧搜集关于苏联人对 H. C. 赫鲁晓夫同志被免职事件的态度，以试图搞清楚这一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否跟自己所说的一样。

苏联科学院生物-化学学院预科生(中国人)吴耀武(У Яо-У)，便曾多次向认识自己的苏联公民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真正原因。

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研究生沈友才(Шэн Юн-Цай)便就此问题向一位苏联大学生询问，在未得到满意答复之后，便声称：“目前，关于赫鲁晓夫被免职的真正原因只是在党组织内部向(苏共)党员们传达。”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B. 谢米恰斯内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21 卷，第 34—36 页

№10141

契尔沃年科致苏达利科夫电：越南代表团到达北京情况

(1964 年 11 月 3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Н. Г. 苏达利科夫同志：

一、今年 11 月 3 日 17 时 10 分(北京时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中央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长雍文谦，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代表团成员中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阮文镜，代表团随行人员共 14 人。

在机场上欢迎代表团的有：邓小平、王震、陆定一、伍修权、罗贵波及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等。参加迎接的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中国少先队员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人员向代表团成员献了花。

该代表团飞往莫斯科的时间将另行通知。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说，代表团 11 月 4 日将不会出发飞往莫斯科。

二、与越南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老挝联合政府部长冯维希，他打算 11 月 5 日与越南代表团一起飞往莫斯科。

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受范文同委托询问，在莫斯科机场上双方是否发表讲话，特别是范文同是否发表演讲，请向北京发来通知。

范文同同志还让转告，他预计在莫斯科逗留 7 天。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

送：葛罗米柯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苏共中央联络部(鲁萨科夫同志)、奇斯佳科夫同志、档案室

阿尔哈罗夫发

克拉耶夫斯卡娅收

1964 年 11 月 3 日 14 时 40 分

АВПРФ，ф. 79，оп. 19，п. 19，д. 11，л. 53

№25406

苏联驻华贸易代表的报告：苏中贸易发展状况

（1964 年 11 月 3 日）

苏联驻华贸易办事处
北京
1964 年 11 月 3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苏中贸易关系[①]

……

以下是有关苏中易货贸易的数据：

（单位：百万卢布）

年份	1950 年	1952 年	1956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互换协议	519	871	1 348	1 849	1 498	827	675	540	422
向中国出口额	350	499	660	859	735	331	210	168	144
从中国进口额	169	372	688	990	763	496	465	372	276

……

……1950—1955 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 15 亿卢布的贷款。根据 1950 年的协议，第一笔贷款为 2.7 亿，以设备和原料的形式支付。……中国在 1956 年开始以供货方式偿还贷款。

下一年的剩余债务是 1.379 亿卢布，到 1965 年，剩余债务将会是 1 690 万卢布……

……

对华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单位	1950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3 年	1964 年
协议总额	百万卢布	350	859	735	331	168.5	144
机器设备	百万卢布	37	537	454	97.4	38.0	71.5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0.6	62.5	61.8	29.4	22.5	49.6
完全交付的企业设备	百万卢布	1	359	336	71	13.1	23.5
燃料、矿物原料、金属	百万卢布	106.9	166.3	171.7	91	84.3	43.4
所占比重	百分比	30.5	19.4	23.4	27.5	50.0	30.0
石油	千吨	161	2 409	2 392	2 928	1 408	448
化工产品化肥、橡胶	百万卢布	6	9	10	5.2	4.2	6.3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7	1	1.5	1.6	2.5	4.5
农业原材料	百万卢布	0.5	2	1.2	3.5	8.2	11.1
所占比重	百分比	—	—	—	1.0	4.8	7.7
原木	千立方米	—	—	10	133	454	555
食品原料及食品	百万卢布	4.6	1.7	1.5	57.7	0.6	—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3	0.2	0.2	17.4	—	—
谷物和面粉	千 吨	—	—	—	201	—	—
糖	千吨	21	4	—	501	—	—
其他的工业产品	百万卢布	4.5	5	3.6	0.5	12.2	3.9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1	0.5	0.5	0.2	7.2	2.7

对华进口商品的结构变化……

	单位	1950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3 年	1964 年
协议总额	百万卢布	169	990	763	496	372	276
燃料、原材料、金属	百万卢布	33	134	118	166	49.5	28.6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9.2	13.5	15.4	23.0	13.8	10.4
钨精矿	千吨	8	25.6	19	18.3	12	6
钼	千吨	0.6	4.8	4.6	2.2	1.4	1
锡	千吨	3.8	20.8	17.7	11.2	4.3	1
汞	千吨	—	1.4	1.4	1.3	0.4	0.1
化工产品肥料、橡胶	百万卢布	3	30	35	9	10	13.1

续 表

	单位	1950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3 年	1964 年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9	3	4.5	1.8	2.7	4.7
硼砂	千吨	—	10.1	18.6	14.4	6.9	14
建筑材料	百万卢布	1	11	11	12.1	8.7	1.3
所占比重	百分比	0.6	1.2	1.4	2.4	2.3	0.5
混凝土	千吨	79	561	552	594	373	—
农业原材料、畜产品	百万卢布	41	147	92	31.6	13.7	15.8
所占比重	百分比	29.5	14.9	12	6.4	3.7	5.7
木材	千吨	8.6	13	11.2	5.8	4.5	4
生丝	千吨	0.7	1.7	1.3	0.5	0.05	0.05
小件生皮毛	千片	0.8	3.1	1.1	0.5	0.5	5
烟草	千吨	—	36.3	15.1	4.9	—	—
桐油	千吨	5	21.7	10.5	3.7	1.75	1.75
食品生产原材料	百万卢布	60	100	59	4.5	2.8	2.8
所占比重	百分比	35.6	10.1	7.7	0.9	0.8	1.0
茶	千吨	4.3	17.3	10.2	3	3	3
食品	百万卢布	19	170	96	12.6	19.0	38.8
所占比重	百分比	11.6	17.1	12.3	2.5	5.1	14.1
米	千吨	9	658	416	23	—	—
苹果	千吨	0.3	73.2	63	24.3	44.6	60
柑橘类水果	千吨	—	48	27	10.8	17.3	20.5
出口工业产品	百万卢布	2	387	352	310.9	262.1	170.9
所占比重	%	0.9	39.1	46.1	62.7	70.4	62.0
缝纫用品	百万卢布	—	76	79	86	79	52
服装	百万卢布	—	47	54	48.1	40	36.35
毛纺	百万米	—	12.6	14.6	14.5	10.8	5.76
皮革鞋	百万双	—	9	9.5	2.9	1.1	0.75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д. 29，п. 512，л. 26－32

№09907

克里夫佐夫致苏达利科夫电：周恩来等访苏启程日期

（1964 年 11 月 4 日）

通过高频线路寄发的电报
发自北京
1964 年 11 月 4 日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H. 苏达利科夫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刚刚通知我们，康生、伍修权等人乘坐的飞机于明天，即 11 月 5 日北京时间 8 时 30 分起飞。

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将于北京时间 9 时由北京起飞。与周恩来乘坐同一飞机的还有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老挝情报部长冯维希。

苏联驻华使参赞
克里夫佐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7 卷，第 4278 页

№25407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苏中贸易发展状况

（1964 年 11 月 5 日）

机　密
文本第 4 份

1964 年 11 月 5 日
第 889/ДВ 号

苏中贸易关系[①]
(清单)

……1949 年以来苏联与中国的贸易

协　　议	1957 年	1959 年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易货(百万卢布)	519	1 849	647.7	540.2	420.8
百分比 1959=100	28.16	100	36.5	29.2	22.8
对华出口商品(百万卢布)	350	859	210	168.5	144.3
百分比 1959=100	40.7	100	24.4	19.6	16.8
对华进口商品(百万卢布)	169	990	464.7	371.7	276.5
百分比 1959=100	17.1	100	46.9	37.5	27.9

……

……1959 年后，中国的易货数额全面缩减……

估　算　单	1957 年	1959 年	1962 年	1963 年	所占比重
易货(百万卢布)	2 609	3 748	2 322	2 304	100
百分比 1959=100	69.6	100	62.0	61.5	
社会主义国家(百万卢布)	1 660	2 571	1 177	971	42.1
百分比 1959=100	64.9	100	45.8	37.8	
资本主义国家(百万卢布)	940	1 177	1 145	1 333	57.9
百分比 1959=100	79.9	100	97.3	113.3	

……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АВПРФ，ф. 0100，оп. 57，п. 512，д. 29，л. 38－41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677

范文同与哥穆尔卡会谈纪要：周恩来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

(1964 年 11 月 8 日)

机　密

越南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与波兰统一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会谈资料

1964 年 11 月 7 日、8 日，范文同①与哥穆尔卡主动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是与波兰同志讨论越南南方问题。

首先，范文同对波兰代表团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中的积极活动向波兰方面表示感谢。他高度评价波兰人直接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中为越南人民解放越南南方和全国统一而斗争事业中所做的贡献。范文同满意地指出，他与波兰代表团团长之间有着密切接触的事实。

接着，总理描述了越南南方的局势。按其发言来说，南方正越来越多地朝着爱国力量有利的方向发展。越南南方政权虽有武装力量，常规部队及其他部队编制(40—50 万人)，但已不能采取多大的有效措施来反对爱国者的斗争。傀儡军队正在瓦解，士兵士气极端低落，大批开小差，阮庆部队的大量军事文职人员改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与此同时，范文同继续说，众所周知，美国人深陷越南南方，实际上已进入死胡同。甚至西方报刊，其中也包括美国报刊对此不得不承认。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情况，由于其在该地区的侵略得不到它的许多盟国首先是法国的支持而深陷困境。

在此期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越来越巩固，阵线获得了越南南方居民最广泛阶层的支持。现在，它控制着越南南方三分之二的土地，居住该处的居民占南方一半左右。阵线的纲领满足了居民各个群体的利益。现阶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加强对南方的影响，同时，很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在这种情况下，范文同说，我们指望合理地加强南方的斗争。我们相信这将促使越南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调整。我们真诚地期望这种调整，不拒绝任何方面，哪怕是细小地推进

---

① 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因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7 周年于 11 月 5—12 日逗留莫斯科。——原注

越南南方问题的政治解决步伐。我们觉得，严格地履行1954年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是达到调整的最佳途径。必须回到这些协议上来。我们反对越南南方问题拿到联合国来讨论。

在进一步会谈过程中，范文同不止一次地回到越南南方问题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同时他强调，越南人真的关注这个问题。“要知道南方人民已经受20年的战争，承受着巨大的牺牲”。他以间接的方式赞同比较可能的是召开新的日内瓦越南会议。

总理还谈到印度支那及老挝日内瓦会议的协同主席问题。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对苏联撤掉越南和老挝的协同主席职位的意图持反对意见。

对此，哥穆尔卡指出，波兰人，他们知道苏联方面的这个意图，但不赞同它。根据他们的意见，保持协同主席席位似乎有利于利用它来谋求越南人民的斗争利益。

这个意见明显使范文同高兴。

结束越南问题时，总理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协调行动的必要性，首先是苏联、中国、波兰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使越南南方的政治调整成功。他希望，波兰人将能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询问哥穆尔卡对所谈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他有意见的话。

感谢对波兰代表团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活动的高度评价，哥穆尔卡使范文同相信，波兰人今后将利用他们的一切力量帮助越南人民为解放越南南方和国家统一而斗争。但我们对此，哥穆尔卡说，除了继续我们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外没有其他手段。

您所述的越南南方政权武装力量人数(40万—50万)，他继续说，我看这个证实了这个政权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得到了部分越南南方居民的支持。军队似乎尚未瓦解，他们仍在反对爱国者，没有调转枪头反对越南制度。可见到的是，阮庆及其拥护者似乎在国内尚有基地。美国人，若在南方的兵力没有2万以上，不可能做到反对爱国者运动。

与此有关的，哥穆尔卡说，产生了一个问题：越南南方阵线合理存在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您似乎预料事件会发展成这样：在某一阶段将准备选举成立越南南方临时政府，然后，再组成永久的联合政府。阵线在选举中能指望获胜？

阵线的地位是强大的，范文同回答说，他们十分巩固。由于阵线得到了南方居民的广泛支持，可以有信心地说，他们进行选举的话，会在选举中获胜。阵线准备与任何阶层和集团的代表合作，只要他们有意爱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若成立联合政府，各种政要人物及各个社会集团都会加入。这个政府愈广泛愈好。阵线的这个政策我们支持它。当我们说越南南方应是中立时，我们是真诚的。如果美国人同意南方中立并撤离，我们准备做出任何保证尊重这个中立。这不是战术行动，要让越南南方保持10—20年的或更长时间中立，我们对此同意。至于说到国家恢复统一，这已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将由越南人民来解决，什么时候进行？看来，要很长时间。

但是美国人，哥穆尔卡说，未必在越南南方会轻易让步。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来看。这里主要是，越南南方问题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义务互相紧密交错。假定，美国人离开南方的话，那时他在其他地区的盟国会说，美国不可信。美国人会这样处理？恐怕

未必。

我们对此能够理解,范文同着重说。但是,我们好像觉得美国仍会被迫走上政治问题的调整。也许这将经过3—4年,或更长时间来发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意与美国人谈判,但条件是越南南方阵线作为主要的爱国者参与美国的谈判。

哥穆尔卡说了自己的想法,目前要特别关注阵线在阮庆部队内部旨在进一步瓦解所进行的工作。

根据范文同的说法,这个工作正在进行:越南南方政权的军队中有阵线的人员,这既是指一般人员,也指军官。甚至在指挥人员中也有阵线的拥护者。借此,大大地帮助了爱国者袭击边和机场的战斗行动。

哥穆尔卡感谢范文同告知此信息并重新指出,在国际监督委员会中波兰人今后将用自己的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虽然波兰代表团留在委员会内也使波兰有所不便:开支大、与美国的外贸摩擦等。但尽管如此,他强调说,我们在越南朋友面前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有关越南南方问题的任何其他想法或具体建议,哥穆尔卡补充说,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建议,我们会乐意地提出。

迄今我们也没有,范文同回答说。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波兰同志通报有关越南南方的形势和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

之后,哥穆尔卡说,按他的意见,要顺利解决像越南这些具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如果我们的阵营不团结,整个运动不一致,那么就难以用共同力量来解决许多具体问题。所以,要想一切办法保持和巩固团结。对此,最好的方法是召开兄弟党会议。谁都不准备"革除"任何党,将其驱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应该是加强团结。

我可以坚定地声明,他继续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地追求团结。我们不止一次地与苏联共产党领导活动家们谈论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并相信其诚意。对此问题,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说什么。我们的代表团来莫斯科是来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并怀着巨大希望尽可能巩固统一和团结。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已没有原先的乐观。在这里,苏联同志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我们的情绪变化是因中国领导的行动引起的。我们刚从北京获悉说,中国的报刊要刊登反苏内容的文章。说真的,我们可以事先抗议说,这些文章是针对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但是,第一,是谁给了中国人有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解除赫鲁晓夫的职位,这是苏共的内部事务。如果任何一个党在自己的刊物上讨论那些不时发生在我们国家机构内所发生的变动,我们将给予十分坚决的回击。第二,这是很主要的,中国人是否在下阶段准备发表类似争论来引向反对苏联共产党?这将会导致什么?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乐观不起来。

从北京到莫斯科,范文同指出说,我与周恩来一起飞行,可以坚定声明,中国同志是真诚要巩固统一和团结。

我不相信，哥穆尔卡说，他们会与其他一些党一样地希望？我要再次重申，没有了整个团结，很难接近和达到具体问题的解决。

范文同提出异议。我认为通过具体问题取得一致可以逐步达到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统一和团结。

之后，看来总理希望终止这个问题的谈话，同时表示遗憾说："会谈结束时，不得不谈到这个主题。"随后，他感谢哥穆尔卡、波兰同志给他这么多时间的关注。

参加会谈的，越南方面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大使阮文镜、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及代表团翻译柯耶①；波兰方面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克里施柯、波兰外交部长拉帕茨基和波兰驻苏大使普休尔科夫斯基。

根据范文同的建议，会谈由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二等秘书 P. 哈米杜林翻译。

资料编制者 哈米杜林（签名）

1964 年 12 月 8 日

АВПРФ，ф. 5，оп. 30，п. 107，д. 451，л. 154 - 159

№20773

勃列日涅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处理

（1964 年 11 月 8 日）

会谈开始之前，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中周恩来主动谈了一些问题。

周恩来同志：作为我们谈论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勃列日涅夫同志谈谈决定怎样处理我们的贺电。您曾经对我说，要同你们的同志商量，请告诉我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将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由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的同志也表达了向我们祝贺的愿望，我们的意见是：出版一本集子，包括所有的贺电。也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并答复你们。

同时，我想对你们发来的温暖的贺电表示感谢，这些贺电是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发送给我们的，这份贺电已经发表在我们的报纸上。

周恩来同志：很好。我想谈论的第二个问题很严肃。你们知道，我们党和政府派遣以

① 上述越南同志只在 11 月 8 日参加了会谈。——原注

我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友谊并参加隆重的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你们也认为,这次访问是友好的表现。

然而,昨天克里姆林宫举办了招待会,其中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方国家的记者,这次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向我提出了一些挑衅性的问题,这是对我的侮辱。首先他对我说,希望我们中国人不要搞政治游戏了。我明白马利诺夫斯基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决定转入另外一个话题。我对他说,这些游戏很简单,揭开幕后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然而马利诺夫斯基没有就此止住而是走得更远。他说,我们不应当让任何恶魔妨碍我们的关系。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他指的恶魔是谁,他就继续说,苏联和中国人民希望幸福,就不要再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妨碍我们了。

这个问题很清楚:这是挑衅和侮辱行为。我忍受了这一挑衅,走向了另一方向,我要离开,因为事实上美国的记者就站在我们旁边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时,其他一些苏联元帅走了过来,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仍然在继续说。然而我们没有再听他的话,我的翻译也没有翻译这些话,但是另外一名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的话。事实上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我们苏联人已经推翻了赫鲁晓夫,而现在你们就把毛泽东推翻。然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继续同贺龙会谈。他对贺龙同志说,他的元帅军装很漂亮。对此贺龙说,穿上弗伦奇式军上衣更好。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同意了这一点并补充说,穿上棉袄更好,然后又说:“这就是斯大林给我们的军装,而你们的军装是毛泽东给的。”

他还对贺龙同志说,以这种方式进行谈话是错误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已经对米高扬同志说过,我亲自听到的只是马利诺夫斯基说话的第一部分,他说不要再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妨碍我们了。我本来可以做出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回答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并继续我们的谈话,这必然会在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人们中引起震动,处在我的位置上的任何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当这样做。”周恩来强调说:“何况,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侮辱了我们代表团,侮辱了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也侮辱了我个人。”

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从我的方面来说,这是正常的、公平的也是必须的。当然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昨天在招待会上就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人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在当时看起来就会产生争论,因为必须当场查清所有的细节问题。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是有权力这样做的。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上述事件是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招待会的祝酒词之后立刻就发生的。马利诺夫斯基在祝酒词中批评了美帝国主义。然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开始向所有的出席者祝词,而我也走向苏联的元帅们,以便向他们提议为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而干杯。这时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了那些污辱性的挑衅的话。如果我们立刻就回敬他,这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将是他们的一顿“大餐”。

我经常说,对于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我们要谨慎并认真思考。我指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之后,怎样理解他马上就对我们的污辱性

言论呢？很显然，他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这些话使他的祝酒词丧失了意义。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我亲自看到，美国大使是怎样面带微笑地注视着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发言。然后，正如米高扬同志对我说的，你们就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祝酒词交换了意见并得出结论说，他的发言太强烈了。

米高扬同志：我对您说的是我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同志：这些发言只是证明了在敌人面前的软弱。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美帝国主义者看透了他。我们作为你们的盟友，却在平息这件事情。我会想起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我被邀请到了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发言时而软弱，时而强硬。但是美帝国主义者看透了他。这只会有损于苏联的威信。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是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侮辱。

这就是我当场没有迅速回敬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言论的第一个原因。如果处在他位置上的是赫鲁晓夫，那么我就会立刻这样做。但他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我们对你们访问的目的是表达我们的祝贺和友好情感。如果这是我们内部的谈话或者出席这次招待会的只有兄弟党的代表，那么我就会立刻回敬他。然而出席这次招待会的是各界受邀的人，因此我决定今天说出这件事情并表示我们的不满。这不是小事。这是因为应当解决共产党员产生的这些问题。我为什么没有迅速回敬马利诺夫斯基言论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想搞清所有的细节问题，在招待会上我们问贺龙同志，他同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是怎么结束的，而只是后来才知道了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同志：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们原来也不知道细节。

周恩来同志：如果我要弄清楚招待会上发生的所有状况，那么这就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这个问题不是通过抗议就能够解决的。如果只是通过抗议可以来做出反应，这个问题的性质就会更加严重，这个问题的意义也将更大。从招待会回去之后我研究了整个细节并得出结论：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具有这种想法，我指的是你们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同志。因此我今天决定向苏联党和政府三位领导人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并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理解这件事？难道你们同意我国代表团来访问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儿对我们进行公开的侮辱和挑衅吗？然后，难道就可以认为，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的，你们希望我们像你们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一样也这样对待毛泽东吗？关于这一点苏联另外一位元帅在昨天已经对我们说了："任何蔬菜都有自己的时节。"

米高扬同志：是哪位元帅？

周恩来同志：我没有亲自听到这样的言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或许这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吧？

周恩来同志：这些话同时有两层意思，关于撤掉赫鲁晓夫并希望也撤掉毛泽东。这些言论可以被理解为教唆撤换毛泽东。但是我不相信这一点。

贺龙同志：我们背后不远就站着两个美国记者。

周恩来同志：如果有人制订了这样的计划，那么这是徒劳无益的企图和妄想。这丝毫也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的权威，但这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侮辱。难道这有助于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吗？这只能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我们两党之间的争论和原则分歧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之间个人的争论以及这两位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个人素质。帝国主义者这样确信。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话中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应该在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我们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同志：首先我想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遣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这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并且同意你们的建议。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直到今天我们才对你们代表团的访问问题有了正面看法。我们把这看作是我们改善党和国家关系而进行的接触迈出的重要一步。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没有参加研究这个问题的主席团会议，因为他既不是主席团成员，也不是主席团候补成员。

米高扬同志：在讨论的时候没有一个元帅参加。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友谊，并打算今后继续遵循这个原则。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的决定看作是克服现有分歧、促进局势正常化而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代表团来访的态度。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才从米高扬同志那儿了解到了您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谈话的第一部分内容。

柯西金同志：我昨天晚上也了解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对此很愤怒。

勃列日涅夫同志：因为我们谈话的精神完全是开诚布公的，我可以说，我们对这件事很愤怒。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话不仅没有反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而且事实上他甚至也没有权力在这种场合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招待会上的言论，周恩来的表现很有分寸，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您开诚布公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给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打了电话并在电话中询问了他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解释说，他除了对我们两国之间友谊的关心之外，没有想表达其他的意思。关于这一点他也说，领导人的更换有助于改善关系，他也同意，或许他没有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关于这一点他个人准备道歉。至于您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意见反映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这种看法，我们要对您说，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领导人的意见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把这看作是对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对你们代表团的侮辱。我再次重复说，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不清醒的状态下，没有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知道我们的元帅们和国防部领导人的情绪。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都很好。比如，崔可夫、索科洛夫斯基和扎哈罗夫同志都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扎哈罗夫同志说了"任何蔬菜都有自己的时节"这句话，那么我可以很确信地说，这只是针对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话。

周恩来：我不能确切地说，这是谁说过的话，但是我很了解扎哈罗夫同志，在北京我同他打了一年多的交道。①

勃列日涅夫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同我的谈话中说，对他的理解不够准确，但他还是准备进行真实的道歉。我认为，他是会进行正式道歉的。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感到遗憾。我想，您应该相信我们这一点，并且这也不应该妨碍我们共同努力。

周恩来同志：这个问题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还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如此大范围的招待会上出现的，这次招待会是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47 周年在昨天举行的。此外，说这些话的不是别人，而是国防部长，并且是在他谴责美帝国主义者的祝酒词之后说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已经表述的想法。至于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是喝醉了酒，他所说的话没有表达他的感情，那么这只会增加我的怀疑。

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都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他没有过这种想法，那么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我们有句格言："酒后吐真言。"我有时候也喜欢喝酒。有一次赫鲁晓夫把我给灌醉了。关于这件事你们可以询问一下莫洛托夫。诚然，他现在已经不是外交部长了，或者询问陪同我的费德林同志。我当时是完全喝醉了，但没有说出一句不适当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想法，他是不会说出来的。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昨天的话说得有逻辑、有条理。为什么我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费德林同志仍然健在，并且还在工作，可以通过葛罗米柯同志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米高扬同志：我和你们也喝了酒，但是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周恩来同志：作为一名国防部长，他是不能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我国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在对朝鲜同志关系方面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为此我们撤了他的职务。我们没有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至于彭德怀，他确实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企图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你们可以记起，关于这件事在 1956 年我们的同志和米高扬同志一起到朝鲜进行访问。

米高扬同志：彭德怀企图撤换金日成。

周恩来同志：我们也得出结论，应当免除彭德怀的职务，而赫鲁晓夫不同意我们的这个意见。

米高扬同志：不对，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是支持你们关于彭德怀的看法的。他支持的是彭德怀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周恩来同志：让我们不再谈论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是，彭德怀想干涉朝鲜同志的内

---

① 朝鲜战争期间，扎哈罗夫曾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常驻北京。——编注

政,我们认为这是他反党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他还有其他重大错误。因此我们多次向朝鲜同志解释说,彭德怀犯了错误应当为这些错误负责。我举了我们党实践中的一个例子。至于兄弟党是怎样对待自己犯了错误的同志的,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首先,勃列日涅夫同志刚才说,主席团成员们关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交换了意见,也就是说,这是在我说出所有这些细节之前。而你们却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存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表述的意思。

米高扬同志:在最近一次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没有这个意思。

柯西金同志:通过人民的情绪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毕竟你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周恩来同志:第二,勃列日涅夫同志说,按照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本人的说法,他没有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这两点中我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谈话。同时,我保留我们代表团在讨论这个问题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力。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们,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我们代表团将会讨论这些情况并告诉你们。

米高扬同志:当周恩来同志告诉我关于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谈话之后,因为我知道主席团的意见,马上就谴责了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把参加招待会的客人送走之后我才了解到了这次谈话。

米高扬同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见,那么我就不会马上谴责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

柯西金同志:今天的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说,你们代表团在谴责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已经向你们正式声明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你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完全相信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话,你们应该相信我们。当然,这个问题非常令人烦恼。我们完全不会维护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并对他感到愤怒。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没有维护马利诺夫斯基。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一起站在列宁墓的讲台上谈论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分歧,这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对我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来访以及努力消除分歧,他本人和苏联元帅们都非常高兴。我相信他完全同意我们党关于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意见。他对你说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意外的。或许你们发现,他说祝酒词时非常激动,并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周恩来同志:对于敌人是可以这样的。

柯西金同志:我告诉你们一些细节。我们自己也在考虑所有的情况并寻求解释。

周恩来同志:柯西金同志请我们注意苏共中央委员会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言论的驳斥。但是我想坦率地说,我相信,如果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进行了谈话,那么对我说得更多。

米高扬同志：他说得已经够多了。

周恩来同志：我们决定不关注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是这样评价的。

康生同志：我没有参加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谈话。在招待会结束之后，当周恩来同志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吃惊。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也感到非常吃惊。

康生同志：这使我想起5年前发生的一些事。当时是在庆祝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侮辱了毛泽东同志。当赫鲁晓夫侮辱我们的同志时我不感到惊奇，因为赫鲁晓夫胡说八道。但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当我们来庆祝你们节日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当然已经习惯了各个地方的人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污辱性言论。这不会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带来任何损失。但我非常不安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直接同我们代表团领导人说了这些话。我们在不断追求克服分歧，团结对敌。难道在美国记者在场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有益于我们的团结吗？我们来访问是打算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对我们领导人污辱性的言论对这一点没有好处。我相信，苏联人民对我们代表团的来访是热情的、赞成的，是不允许这样的污辱性言论的。如果我重复了在这里已经说过的话，这是因为我想起了昨天同基里连柯同志的谈话。当周恩来同志在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谈话的时候，我在同基里连柯同志谈话。基里连柯同志是这样评价我的，他说："康生同志，您过去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而现在是个不好的朋友。"我当然不愿同基里连柯同志争论，就回答他说："我以前是、现在是、今后还将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如果我们不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我们就不会到你们国家来。至于针对我的侮辱，每次到你们国家来，我都能从赫鲁晓夫那儿听到。每次我都会回击这种侮辱。但是昨天基里连柯同志说我已经不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不愿引起争论。当安德罗波夫同志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就走开了。

周恩来同志：我们决定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当我们邀请你们代表团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整个领导集体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分歧。

对于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以及新产生的情况我们非常难过。关于康生同志同基里连柯同志的谈话我无话可说，因为关于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信任和尊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

我们邀请中国代表团的决定是坦诚的。在你们到莫斯科之前我们就把这件事通报给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这也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友好的。

周恩来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我知道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两点意见，知道了柯西金和米高扬同志的对这些意见的补充，也了解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刚才所说的话。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意见，也应当认真对待苏

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并请求转告中共中央，在同你们的关系中我们希望真诚相待。无论是会带来多大痛苦的事实我们都要互相告知，我们要真诚和诚实。我希望以今天的谈话为我们做到这一点奠定基础。

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谈开始的时候，我表达了我们对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可能采取的另外一种措施，并谈了我的看法。现在我建议讨论我们会谈的日程问题。我建议再进行几次会谈，或许是2—3次。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是否有时间。

勃列日涅夫同志：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准备进行几次会谈。

周恩来同志：或许，一开始我们就达成了关于进行2—3次会谈的一致意见。如果需要的话这些谈话也许需要延长。举行会谈的时间取决于你们。

勃列日涅夫同志：问题是，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想同我们举行会谈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尽量使这不妨碍我们的谈判。

周恩来同志：我们理解你们。或许，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饭了，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我们每天举行会谈。我们没有任何困难。

勃列日涅夫同志：明天我们要举行招待会欢迎那些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而访问我国的外国代表团。这不允许我们进行工作谈判。

康生同志：我们有一个痛苦的经验——我们同你们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在午饭的时候开始发生。

柯西金同志：现在就让我们不再这样。

周恩来同志：我们请求你们在今天晚上通知我们关于明天会谈的时间。

会谈后进行了午餐，所有参加会谈的人员都出席了。

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尽力营造一种温和的气氛，他们提议为我们党的团结和友谊干杯，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干杯。

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说，中国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由中共中央在今年9月确定，中国政府将审议在今年12月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一次会议。其余的谈话都具有记录的性质。

参加会谈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乔冠华、潘自力同志和代表团顾问姚晨(Яо Чжэнь)以及4名中国翻译，还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局领导人О. Б. 罗满宁同志和翻译Р. Ш. 库达舍夫、И. А. 罗高寿。

这次谈话由库达舍夫和罗高寿同志记录。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562，л. 25－37

№2234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同中国代表团会谈的通报

（1964 年 11 月 9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4 年 11 月 9 日会议

第 171 号记录第 3 项

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47 周年庆祝活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主席团对这次会谈工作表示肯定。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96，л. 2

№2077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央全会通报中苏代表团会谈结果

（1964 年 11 月 1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4 年 11 月 13 日会议

第 174 号记录第 9 项

1. 认为必须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中国代表团是为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47 周年到苏联的。

委托勃列日涅夫同志通报这一情况。

2. 审议 Ф. Р. 科兹洛夫同志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意见。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299，л. 3

№20010(25734)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通报与中共代表团谈判情况①

(1964 年 11 月 14 日)

摘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Л. И.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上的发言稿“关于与一些兄弟党的谈判和协商”②

1964 年 11 月 14 日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通报关于苏共 10 月中央全会以后进行的与许多党洽谈和咨询的问题。

10 月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无疑是我党内部的事务。全会的决议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我们朋友和敌人广泛议论的话题。

反动的政治集团、资产阶级的报刊竭尽全力歪曲 10 月中央全会决议的意义,在群众中散布各种关于赫鲁晓夫同志被解职后苏共内外政策改变的推测。应该说,10 月中央全会以后资产阶级的报刊在前一段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国家蒙骗了一些人,在那些日子里甚至在部分兄弟党领导人的声明中感到有些不信任,感到有些紧张。

几天内情况都明显地改变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解释,苏联报刊登载的关于苏联不变的列宁方针,关于我党忠于第二十次、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讲话以及苏共的纲领,都受到进步社会舆论,受到一切坚持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欢迎。

苏共中央发给兄弟党的有关 10 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秘密通报帮助了他们正确地评价苏共中发生的事情。有些兄弟党要求我们给他们提供关于苏共 10 月中央全会结论的补充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莫斯科接见了澳大利亚、英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我们主动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举行了欢迎会,在莫斯科与正在苏联的泽登巴尔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的立场是,类似这样的会谈也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举行。但是,这样做一开始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关于 10 月中央全会的情况如何通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领导人,最近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好。

---

① 该档案部分来自俄国发表的内容(关于苏中谈判),部分摘抄自俄国档案。省略号表示未抄写的内容。——编注

② 该发言稿曾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等阅读。在编辑过程中文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动:例如“缓和”一词的表述;还有一些段落被删节,如苏联国防部长 Р. Я.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声明中的一些片段等。这里所公布的经过编辑的文本是勃列日涅夫在 1964 年 11 月 16 日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上的发言稿(РГАНИ,ф. 2,оп. 1,д. 762,л. 114－131)。——原注

众所周知，近3年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现在已经转为公开。这样的争论对许多兄弟的活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这样的争论也不能不影响我党和朝鲜、越南以及日本、印尼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考虑与这些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共商我们的共同问题。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提出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个建议。中国领导人希望苏共中央、苏联政府近期邀请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

苏共中央主席团当然清楚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这个要求有其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有责任利用一切可能寻求中共和苏共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使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合作的局面健康化，因此苏共中央主席团预先与有关国家的兄弟党商量以后，决定邀请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法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党政代表团。而阿尔巴尼亚通过与外国友好协会的名义来邀请。你们都知道，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接受了邀请，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进行会谈的时候，接触问题的范围更加广泛，但交谈和咨询的主要大致有3个问题：

——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

——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系的统一；

——我党、我国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我简单地谈一下上述每一个问题。

关于10月中央全会的问题。

会谈的结果说明，兄弟党代表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解除赫鲁晓夫同志职务的决定，完全支持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没有一个党怀疑我们的决定和动机。但是会谈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对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做出了另外的评价，这集中表现在意大利共产党方面。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赞同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定的同时，对这样突然的决定和通报方法感到不满。

英国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也有同样的看法。

在与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同志的会谈中我们尽量解释，他们的看法不符合苏联当前的实际条件，解除赫鲁晓夫职务恰好说明第二十次大会决议、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是符合实际的。许多问题由于会谈的结果被澄清了，虽然在有些细节问题上还存在差异。可是，不管是苏共中央主席团还是兄弟党的同志们都充分肯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绝不会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兄弟党团结的阻力。

关于加强团结的问题。

中心问题是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和编辑委员会，根据协商，编委会应于12月15日开始工作。中国、越南和朝鲜共产党对会议和编委会持反对立场。实际上，罗马尼亚同志也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声明，只有在全体与会者的同意下，编委会才能开始工作。英国、意大利

共产党的代表认为,会议条件还不成熟,但他们并没有拒绝参加会议和编委会的工作,如果这方面的工作会开始的话。

你们就可以看到,情况很复杂,赞同召开会议的有61个党,而26个中的19个党愿意参加编委会工作。很明显,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参加,会议和编委会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考虑到这一点,并为了把中国代表重新审视自己立场的过程变得简单,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提出不一定要坚持编委会在12月份开始工作。

看来,此事不能忽视。最重要不是编委会的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始,而是编委会工作的目的是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能够得到改善,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够巩固,这样,给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了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决定,我们将与兄弟党进行协商。

关于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问题。

在会谈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有共同性,大家都提。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总的来说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虽然还有些问题需要补充、明确和改进。在与亚洲国家和古巴的关系上,问题复杂些。例如:古巴同志在会谈过程中提出要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他们要求我们在古巴驻扎军队。他们提出,苏联政府能否向公众发表正式的声明,声明侵犯古巴就是侵犯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的设备,甚至火箭、核武器全力击退敌人的进攻。越南同志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越南南部活动频繁。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国际主义责任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进行全面的,包括军事方面的援助。我们进行过,现在还在进行这样的援助,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应该谨慎从事,防止事态发展到引发世界热核战争的地步,因此必须跟古巴同志进一步商洽。

关于苏中谈判。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特别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报告关于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情况。

中央委员们从11月初给他们的通报中已经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即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恢复苏中两党间联系的建议给予积极回应之后,还得出一个结论:中共领导人在上述建议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个目的——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方向。据我们所知,中共领导人将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看作是自己在(苏中之间)意识形态论战中的胜利,借此,进而可能将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给我们党(苏共)和其他兄弟党。

就是不久前举行的会议上,中共声称,“赫鲁晓夫的退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方针”与“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10月24日,艾地①同志说,在苏联和中国重新接近的道路上存在着“困难和障碍,原因

① Д. Н. 艾地(1923—1965),从1959年起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从1961年起担任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思想立场的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1965年9月30日,因发动军事政变失败被打死。——原注

在于：苏共仍将一如既往地坚守本党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既定路线”。他希望我们明白，我们党应当对这些大会的决议重新加以审视。

尽管苏中关系的改善面临重重障碍，苏共中央主席团仍认为，应利用一切可能来与中共进行接触，以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是否准备采取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实质性举措来促使苏中关系正常化。

我们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向对方强调，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遵照苏共近期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纲领和莫斯科会议诸文件所确定的方针行事，任何改变这一方针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其二，在苏中关系正常化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体形势方面给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的同时，我们认为可以利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来提出如下建议：停止公开论战，终止针对兄弟国家的宣传，放弃对其他兄弟党内部事务的干涉。

与此同时，我们还打算建议中国领导人，希望双方在促进苏中两国间关系正常化方面联合采取一些步骤。

我们完全是怀着良好的愿望来进行这次谈判的，并极力希望从一开始便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我们想通过双方面对面的交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以便发现双方分歧的关键症结。与此相关，我举一个虽不十分重要，却相当典型的细节：此次谈判期间并未出现以前那样的情形——双方只是朗读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大论，却不做正面的接触。

谈判是从 11 月 8 日开始的，随后在 11 月 9、11、12 日继续进行。由于全会与会者们都已从速记资料中了解了谈判的情况，我这里将不再详细地描述整个谈判的过程，只是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主要内容和最终结果。

从一开始，各种迹象便表明，我们的谈判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中国代表极力利用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对(苏共)10 月中央全会决议持肯定态度，并强调，这些决议为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中共代表还极力证明，我们党的总路线——已不是“赫鲁晓夫式的路线”，因此我们应当与后者决裂。他们甚至声称，不应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与苏共(以往)的“错误路线”相提并论。

我们代表团以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向中共代表解释道，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所反映的并非是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我们整个党的意愿，是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我们提请中国同志注意，此次谈判的重点并非是重新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路线问题，虽然中共的路线中有很多问题苏方并不同意。

我们声明，如果每个来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都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可能只有走入死胡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利益，我们认为我们都应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存在分歧的情形下使我们的关系开始步入正常化。至于那些仍存在争议的原则性问题，在我们看来，仍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和认真细致的研究。而现在，

我们只能为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平心静气地讨论所发生的分歧创造条件。

随着会谈的进行,我们逐渐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我们建议中国代表具体地讨论,苏共和中共如何通过联合行动来加强反帝国主义阵线。我们还提出如下建议:关于双方均停止公开的争论;关于中共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作准备。

应当说,中国同志,尤其在谈判初期,完全拒绝讨论我们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他们以苏共继续坚持原来的总路线为由,拒绝了苏方关于双方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甚至于,他们还说,如果苏共继续坚持二十大方针,保持自己的既定纲领,那么中方就不可能停止斗争。

在拒绝讨论关于巩固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具体措施的同时,中国代表与中共领导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明显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极力阻止苏联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这尤其在苏美关系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同志便指责柯西金同志说,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后者走近美国大使,并与之交谈。康生声称,"我亲眼看到,柯西金同志带着友好的表情走向美国大使。这表明,苏联政府在此类问题上持双重立场"。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向他做了充分的解释,此举不过是外交场合的惯例,任何一个政府的首脑都必须如此行事,其中包括中国的周恩来同志。谈判中出现的这个小插曲很直观地说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解决,以便能与中国同志达到相互理解。

关于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问题,是此次谈判的重点。

中国同志坚定地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参加原定于12月15日召开的该委员会的工作。康生说,"如果你们希望讨论问题(关于召开协商会议),但又将之与原定于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硬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明显带有神经质的威胁和最后通牒的口吻,很显然:他们明白,如果拒绝参加兄弟党的集体会议,可能会使其陷入被动。因此,在坚持原则上必须召开协商会议的同时,我们代表团在这一问题表现了应有的灵活性。

我们向中方做了耐心的解释,即关于首先召集该委员会会议,然后再召开兄弟党协商会议的决定,这体现了61个党派的共同意愿。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代表团强调,我们并没有将召集委员会会议的日期非固定在12月15日不可,如果中国共产党原则上同意参加会议,以便通过兄弟党派的共同努力来克服(中苏间)分歧,那么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人员构成、名称和工作方式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以便让包括中国同志在内的所有与会成员都感到满意。

我们认为,今后在解决有关起草委员会的问题上,应极力让尽可能多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党来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停止争论,关于参加协商会议,关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等都使中共领导人感到处境不利,但又不便于一概予以简单的回绝。于是,在会谈期间中国代表便借用各种理由,极力使谈判局面复杂化。例如,当周恩来同志断言"赫鲁晓夫的指令"似乎仍对苏共中央发挥作用时,米高扬同志答:在涉及与中共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方面,我们

中央与赫鲁晓夫同志不存在分歧，或者可以说甚至是观点上的细微差异也不存在。

中国代表立即揪住这句话不放，并由此断定，既然这样，他们便不再期待能与苏共改善关系，因为双方继续谈判的基础已不存在。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真正成为了中国方面用来提出蛊惑性指责的口实。11 月 7 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与周恩来同志的交谈中说了一些欠考虑的话。他说，赫鲁晓夫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应当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赫鲁晓夫都不可能妨碍我们"。中国代表对马利诺夫斯基的鲁莽举动反应异常强烈，认为此话是公开号召"推翻毛泽东"。他们极力渲染这些话，似乎他们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共中央的观点。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的欠思考的言语提出批评，并强调，马利诺夫斯基的个人言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代表中央的观点。中国代表已被告知，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将为自己错误的表述请求原谅。尽管这样，中国代表团仍不断重复提出这一问题，似乎认为，这样便可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

在谈判末期，中共代表的语气已变得非常平静了。这尤其表现在 11 月 12 日最后一次谈判之时。在得到了根据其请求我们所提供的苏共 10 月中央全会相关资料之后，中国代表声称中共将严格保守资料的机密性。与此相关，周恩来同志指出，保持（两国间）互信——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我们都需要的。他重复了当格里申同志率领的苏共代表团今年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话："我们的争论——是暂时的现象，而团结应当是永远的。"

苏共代表团建议，在中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举行两党和两国代表的高级会晤，以便双方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循序渐进地达到如下目标：恢复互信，加强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如果举行此类会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无论是将会晤地点定在北京或莫斯科，是采取公开的方式还是秘密的，均可。

我们指出，在提出上述建议时，苏共中央遵循着一个指导原则，即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争取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的名义，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都团结起来。

周恩来答复道，他将把苏共中央的上述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还作了如下补充：（今后）我们双方都有必要在创造新环境、寻找新的交流渠道方面下工夫。"如果当你们认为，举行两国高层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你们便可就如何讨论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他在最后结论中说，好在我们两党之间协商的大门仍一直敞开着。

综上所述，可以说，尽管与中共初次谈判的成果有限，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它的积极作用。完全可能，中国领导人将这些接触只当作是"火力侦察"，借此以考察我们在捍卫苏共原则路线上的坚定性。虽然目前仍很难预料，在经过此番"侦察"之后他们将采取怎样的策略。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放弃一些幻想之后，中共领导人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充分利用苏共 10 月中央全会所创造的客观前提，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而这样的前提无疑是存在的。苏共全会的决议将使中共可以不失体面地与我们接近。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在与中共的争论中苏共的原则路线是正确的,但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言论和举动对原本已相当复杂的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例如,关于他针对毛泽东同志所发出的污辱性言论,关于他匆忙将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尽管这里有必要指出,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不少挑拨离间的事)。随着赫鲁晓夫同志离开领导岗位,类似这些对苏中关系产生了相当危害的不良因素已不存在。

这不论是对我们,还是中国领导人都是件好事。显然,目前和今后我们都要实行灵活的政策,通过党和国家等渠道与中方保持联系。如果中方重新激化争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我们也将坚定地通过谈判,以平静而非谩骂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与此同时,我们今后将更加坚定地坚持我们党的原则立场,绝不允许放弃。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我们不会去激化国际紧张局势,主动挑起军事冒险。

我们不会放弃在我们国家内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将继续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无论我们多么珍视与中共的友谊,但也绝不会以放弃上述理想为代价,因为党、人民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不会允许我们那样做。

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坚信,终有一天,中共会与其他兄弟党派一道前进。在指出这一前景的同时,对我们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争吵,而是成熟、谨慎行事和多用智慧。

同志们!

最近几周以来,主席团和书记处在与兄弟党代表会晤和谈判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今天看来,这项工作是必要的、有益的。与兄弟党的接触和会晤让我们再一次检验我们在社会主义合作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政策的基本方面。在会见过程中我们深信,我党在这方面的总方针也是正确的。

同时我们发现,对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实践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在尊重平等、独立和领土主权的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互助。众所周知,过去就是这些原则经常被违反。

……

今后我们应该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所有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保卫这一伟大的学说不受来自左和右的攻击。

应该学会了解各国的具体条件和考虑兄弟党活动的具体环境。

马列主义政党希望独立,成为自己国家的主力。这些想法不应该妨碍,而应该帮助我们在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力量的总任务。

同志们!我党和我国人民完全赞同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这次决议得到我们外国朋友的理解。可是我们决不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存在的困难熟视

无睹。

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身边有头脑敏捷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千方百计利用我们的困难。他们能否成功，一切取决于我们在国内进行的事业。尽管对兄弟党和革命力量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是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是我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就。无论从国家的观点还是从国际主义观点来看，最主要的是加强我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

过去我们看到了，现在更看清楚了，我们面临着国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只有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党的集体智慧和意志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最重要的是提高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包括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保证全党的统一和队伍的团结，加强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的组织性以及共产党员在为实现纲要规定总路线斗争中的坚定性。

РГАНИ，ф. 2，оп. 1，д. 758，л. 9 - 18

РГАНИ，ф. 2，оп. 1，д. 6326，ед. хр. 758，л. 3 - 20

№25920

谢尔盖耶夫致安德罗波夫函：对苏中关系的意见和建议

（1964 年 11 月 16 日）

同苏共中央联络部顾问杰柳辛（Делюсин）通过高频电话进行的会谈：关于谢尔盖耶夫给安德罗波夫的信件

1964 年 11 月底

他读了这封信，甚至读了几次。他对这封信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封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他的一些同志也阅读了该信件。信中的许多内容都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了。他思考的一些问题与信件中提出的今后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这封信件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它发来的正是时候。

B. A. 谢尔盖耶夫写给安德罗波夫的信（副本）

1964 年 11 月 16 日

敬爱的尤里·弗拉基洛维奇：

我在外交部工作了14年多，从事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外交工作者，我当然对当前的苏中关系的状况感到不安。在苏联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能够非常近距离地对苏中关系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后来这种关系的复杂化和恶化的过程进行观察。由于我在工作中就我们处理中国问题的工作方式以及为反对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观点和行动而采取的措施提出的一些意见没有得到大使馆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应当向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阐述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我认为，现阶段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运的团结和统一。在此方面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符合我国的利益，也是世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客观需求。我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美国明显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对外政策中的侵略性和冒险性)也要求我们坚定地在此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这就使我们必须使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进步力量加强联系，并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冒险家，防止世界大战。

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这一重要的目标首先会给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带来巨大的利益，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再次得到巨大的增长。

我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问题在于实现苏中关系的正常化，恢复和加强苏中友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客观需要不仅是我们国家，而且是中国所需要的；这也是两国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需要。

调解苏中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正常化首先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这会使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体系的所有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周围，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扩大同中国的贸易，这无疑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向前进，在健康的合作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发展速度，加强我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统一，加强我们对中立国家的影响。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强大国家，拥有大量的国内资源，同我们存在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并且正在致力于制造原子武器。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东部边界出现这样一个敌视我们的国家，这一点无须证明。我们自然希望中国成为我们的友好邻国，而更好的情况是，使它成为我们反对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者的盟国，成为一个不是威胁到我们，而是我们在东部的屏障的国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向我们需要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影响只能在两国关系友好或者“平静的”的条件下进行。

毫无疑问，我国对中国的巨大市场感兴趣，以便用于我国的工业和作为我们所需的一些原料、矿藏和一些农产品的来源。现在，当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把他们的目标瞄向中国的时候，使中国滑向同工业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加强稳定的经贸关系的方向对我们是不利的，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积极地，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开展工作。

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实现这些目的无疑就不得不克服一些巨大的困难，当然，这需要同中

国、中共领导人开展一些艰巨而紧张的工作。这些工作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可以由中国的一些复杂性反映出来，而且，由于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使这种复杂性得到了增强。我认为，在最近几年，我们在对中国的工作中经常所持的都是一种消极悲观的立场，而苏中关系的状况越来越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必须尽快再次对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审议，再次对所有的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研究的原因。

最近几年，我们中间非常盛行的一种看法是，同中国的破裂不可避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不可避免地同中共在组织上划清界限。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诚然，苏中关系的状况，同苏中关系相关的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状况，以及国际共运状况近来都变得非常复杂。公开的论战以及同这些论战相关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这场斗争的逻辑驱使中国领导人更加敌视我们。

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行径众所周知，因此我将不予谈论。毫无疑问，苏共对中国领导人就一些意识形态问题、政治问题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行的主要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所有复杂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和行动，关于我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就尖锐地提了出来。我认为，需要好好地考虑考虑，为此我们以前对中国施加影响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是否妥当。

我认为，苏共中央在今年7月15日信件中所提出的如下内容是完全正确的。“在两党之间进行公开争论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诽谤性的、考虑不周的言论，这些言论妨碍了相互理解”。确实，在我们同中共和中国的相互关系中，双方都积累了非常多的诽谤性的、考虑不周的各种不健康的言辞，这些都会不可避免地促使同中国关系的破裂。

这种看法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呢？日积月累，这些看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在此方面，来自我们驻北京大使馆的原始情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些情报则是非常不足的。而中央则在这些情报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所采取的立场的一些认识。我认为，近年来，大使馆的许多报告材料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抱有成见，有倾向性，过于单方面强调一些负面的东西，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政策相关的政策，特别是对其对外政策都一概予以谴责。

正如我们在最近的言论中所正确地强调的，把每个国家的利益同整个阵营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一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我认为，在对中国的国内状况及其对外政策进行研究的时候，对这一原则考虑得不够。

诚然，正确地实现这一原则的必要的前提是应当对该国的国内局势和国际处境予以客观、科学的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基础首先就要确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基本的和共同的东西；其次，要确定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国际处境，这种特点和处境在现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和中国政府内外政策的一些有别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第三，要准确地确定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中的那些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危险倾向，这些

倾向不仅会给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损失,而且还会给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总路线造成损害。

如果我们在制定报告的时候都逐步遵循这种有区别的方法,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可以都接受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一些主要的、能够作为共同基础的东西,并把这种东西巩固下来;这就要求在我们的政策中必须考虑到中国国内发展的客观特点及其国际处境,并把由此产生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相协调,而不是把中国的特点同这些总路线对立起来。至于第三个因素——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领域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冒险倾向,那么,在明确确定其形式和表现之后可以平静地同其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许,主要是秘密地进行斗争),以便消除这种倾向,使他们"默不作声",进行秘密讨论。同时,我认为,经验表明,现在我们有可能产生影响,使中国人在国内克服民族主义的唯意志论的错误,但只能间接地产生影响,因为这些问题都很微妙,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

我清楚地记得,当您,尤里·弗拉基洛维奇在从对河内进行访问回国的时候,在我们的大使馆内作了发言,并且特别说,把这些共同的东西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即我们同中共和中国是联合在一起的,随后会出现苏共同中共恢复友谊的共同的基础,以及苏联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我们没有进行这种有区别的分析,当有人试图这样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总会被看作是"客观主义者","对人们的情绪漠不关心",甚至被看作是"维护中国的人"。

近年来,大使馆在制定报告的时候没有进行这种有区别的分析,而只是描述一些关于中国发展的不健康的现象和不健康的对外政策,事实上对中共的活动一概予以谴责,而不考虑到同中国的发展阶段相关的特性和状况;大使馆所描述的东西通常都只是一些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冒险倾向。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寻找和描述中国内外政策中表现出的冒险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不足、劣迹(众所周知,中国的这种错误表现是足够多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中国同我们在客观上联合起来的一般的事实经常被无视和忽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采取如下先入为主的论调:中国人生来就偏向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且他们总是以朋友和共产主义者为伪装。从这一公式出发,他们所撰写的所有报告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揭露"、"展示他们奸诈的图谋",他们的民族主义、冒险主义和沙文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难,但是,我认为,我们报告的任务应当更多一些,这些报告应当是全面的。

对中国的局势及其对外政策所进行的研究,采取的是片面的方法(在挑选材料时采取的相关方法——对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有倾向地进行加工,对一些东西进行拼凑,断章取义,利用一些个别的、有时候是偶然的事件,对一些材料和言论没有进行足够的核实,采用一些不可靠的消息来源),比如,采用当地苏联籍移民的言论,以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材料进行推断,以及新华社半公开发行的材料——《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夸大当地外交使团的一些传闻等,以此作为其结论的主要论据。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信息通常会增加一些

在逻辑上不合常规的结论，增加一些无谓的猜测，做出更加“尖锐”的评价，寻找更加强烈的表述。

中国方面的一些重要材料以及中国政府的一些官方声明事实上却被忽视了，被看作是“谎言”和“虚伪”，却没有关于中国国内状况及其对外政策的一些非官方的消息。在中国外交部之外，同中国代表进行的非正式的联系、会谈和接触事实上完全没有。事实上没有对中国代表开展工作，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客观上的困难。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而且甚至认为这样的会谈没有必要。同外交使团的联系基本上是同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中立国家的外交使团建立的联系。

因此，在了解大使馆的报告材料的时候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一些轻率的、论据不充分的内容。通常反映的关于中国人的所有行动的都是一些阴暗的方面，而没有一些主要是健康的方面，反映的通常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幻想。中共和中国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言论要么被看作是冒险主义(常常喊叫的反美主义)，要么被看作是企图突出表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便“为自己辩护”，“应对我们的批评”，“欺骗和误导其他党”……中国方面所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必定被看作是沙文主义、冒险主义，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被看作是反苏分子。

中国一些正面的东西及其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仅被看作是“中共领导人为了巩固其在国内反对苏共和苏联的立场，为了推行其冒险主义路线”等，也就是被看作是不利于我们的事情。无论中国人做什么都是不好的。这样就使自己“不能自拔”。

如果根据我们的报告材料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同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了，已经不存在和中国进行团结和接近的任何的基础，甚至是联合起来共同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声明。从这种立场“自然会”得出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政策“根本对立”的结论，中国对我们采取的都是敌对的政策，任何使关系正常化的企图都是无望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当不存在共同基础的时候，当中国的社会制度遭受怀疑的时候，当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代表的声明完全都不相信的时候，而一切都被看作是虚伪的表现的时候，自然就谈不上关系正常化和加强团结了。

正是这样的结论以及根据这些结论提出的建议使两党关系向分裂的方向发展，大使馆的许多报告材料都多次坚定地强调了这一点。大使馆提出的建议主要都是建议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向中国人施加政治上的压力，来“劝服”他们，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手段，“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更大的打击”。在对外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孤立”他们，可以通过中国内外困难的加剧和深化来迫使中国领导人改变其政策。我们的工作人员遵循的正是这样的方针。事实上他们没有寻找现实的途径来使关系正常化。

无疑，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产生了影响。我认为，在公开论战的过程中以及在公开论战开始之前，我们有时候表现得过于急躁，耐心不够，扩大了一些消极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把中共和中国的政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对立起来。而我们为对中国施加影响而采取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未必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从

国家政策方面来说，我们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是过于匆忙了，过于情绪化，比如，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这导致中国对我们工业设备的购买减少了，整个贸易也减少了，还引起了其他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没有履行已经签署的合同等。另外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公开批评中国在印中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这导致了在推行对中立国家已经协商一致的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困难，使情况更加复杂。这还被印度右翼大肆利用来挑拨苏中关系，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就巩固亚非团结问题上对中国做出的一些言论也是不正确的。

近来，在公开论战的过程中我们的报刊总是充斥一些有失风度的、刺耳的论调，而“论战”本身有时候也变成了对骂。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同志侮辱中国人的一些言论，其中包括他多次重复说，在中国“几个人不得不只穿一条裤子”。这是在挖苦中国人的贫穷，在中国确实存在饥荒和重大困难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无疑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这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只会对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

我认为，在论战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该(尽管遭受中国的攻击)论及一些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共的党内政策问题，特别是不应通过政府发表声明。

我产生的印象是，这种反对中国领导人错误想法和行为的斗争方法是无效的。这反而会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素材，使他们来开展反苏宣传。这种斗争方法在客观上只会激化情绪，使事态更为严重，削弱相互信任，使关系更为复杂；而不是克服分歧，最终导致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组织上双方都划清界限，有时候还会使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中立国家的关系复杂化。

在这场论战中中国人对我们以牙还牙，甚至做得更甚。随着情绪的激化他们从对我们的一些行为和发表的一些声明的批评转而对我们整个对外政策不加区别地一概予以否定和贬斥，后来开始对苏共的党内政策进行诽谤，开始从多方面在政治上对我国和我党展开斗争。尽管中国人也试图强调说，他们的斗争和批评是为了“反对赫鲁晓夫领导层的修正主义”。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远远超出了批评赫鲁晓夫的范围，并且开始对整个苏共进行攻击。在中国掀起了反苏的热潮。这种状况被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他们利用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自尊心，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敌视和仇恨被转到了我们整个党和苏联人民身上。毕竟，民族主义浪潮是自发的。遗憾的是，甚至许多以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受这一浪潮的影响也转到了我们的对立面。

由于事态的这样发展，在我国的东部边界上不再是对我们友好的盟国，而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凶狠而狡猾的对手。在我国的东方出现了以中国以及与其相邻的亚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越南)为代表的第二条战线，其危险程度不亚于西部战线。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复杂化还加剧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的离心倾向和动摇情绪。随着苏中关系的恶化这种倾向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国人那些令人憎恨的分裂主义行径加剧了这一进程，他们利用了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企图“打入楔子”。

中苏双方的这种互斗是徒劳而无益的，它只会使帝国主义者得利。这越来越多地分散

了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和资源。

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内外政策中推行的一些民族主义行为和歪曲事实的行为是否存在问题？当然是存在问题的，并且应当被我们逐渐注意。但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过去采用的反对中国冒险主义的斗争方法和斗争形式是否正确？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打击”和“孤立”未必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我认为，他们只是深深地受到了民族主义的伤害，就把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对我们进行反击，并且在实践中甚至鼓励民族主义者，使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影响。这种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反过来被用于反对我们自己，给我们带来了危害。采用这些斗争方法和方式的结果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只是遭受了损失。

看起来，应该对我们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中需要采取的新的斗争方式、方法和策略进行好好的考虑，它们应当有别于以前的斗争方式、方法和策略，但是应该更加有效。我认为，新的局势使得我们更加容易寻找这种斗争策略。

赫鲁晓夫被免除职务以及双方事实上公开停止论战，尽管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分歧仍然没有消除，但现在仍然是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转折时期。当然，同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存在重大分歧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应最大程度地巩固已经出现的“和解”趋势并尽力不再像以前那样转入公开论战、采取以前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后者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这会使我们今后同中国的关系更加复杂，或许还会加深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并随后削弱我国的国际地位。

看起来，较为有利和对我们较为有益的方法是采取一切手段来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发生根本的转变，来使我们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相接近，来巩固公开论战中的“休战”状态。我还认为，最好不要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等待“中国人反思自己”，而应相反，应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使中国“不能脱离”我们。

毫无疑问，苏中关系的巩固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而且还取决于中国方面。但是，根据中国人近来的一些行为（周恩来到莫斯科访问，中国报刊事实上停止了对苏联和苏共的攻击，发布了我们的一些主要的政治文件，不再散发那些我们众所周知的用外语出版的出版物等）来看，中国方面在同我们的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和主动。无论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图是什么，看起来，中国人立场中出现的这些新因素都反映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转变，而对此我们是能够利用的。

我认为，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存在巨大的客观可能性。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对此都感兴趣。我们两国存在共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中国对外政策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针都为苏共同中共、苏联同中国之间恢复合作提供了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推动着中国与我们接近。

首先，对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说，越来越突出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必须恢复同苏联的经济合作和联系。在“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做了许多蠢事，犯了许多唯意志论的错误，生活给了他们惨痛的教训。从各方面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尽管他们没有公开谈

论(中国想“保存脸面”)。现在他们在试图使国内的经济生活正常化,在逐步转而实行较为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法。中国基本上正在从“大跃进”中得到回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未能使主要的工业领域得到恢复。中国急需现有企业中使用我们的设备的配件,急需一些设备来建设被搁置起来的企业,急需建设新的工厂的设备。每拖延一个月都会给中国的经济、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中国人试图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相关设备和得到相应的帮助,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取得大的成效。

对工业设备和科技经验的需求推动中国恢复同我们的良好关系。这将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条件再次成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力量。我们不应放弃这种机会,应当在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前,重返中国市场。

我认为,推动中国人急于同我们恢复关系的第二个具体的因素是中国坚决加强国防能力的需求。军事技术老化和陈旧,现代航空工业极弱,原子弹的制造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些都使得中国面对美国对其东南沿海进行的侵略活动事实上无力防御,特别是在拥有现代化空军的美国面前。尽管中国人很勇敢,但他们明显感到自己在军事上的落后。他们所有的关于原子弹是“吹出来的”的口号以及进行 350 次“严重警告”都表现了中国国防力量的落后。

中国当然不能指望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相应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得到新的军事技术的唯一来源就是苏联。这又为我们使中国在军事上“依赖于”我们、加强我们对中国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总的来说,同苏联改善关系的趋势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客观意图、愿望或者是“真诚”,而且是由一些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的一些表现。因此,我认为,把近来中国领导人采取的一些措施看作是针对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虚假的意图”、“奸诈的图谋”,看作是被授意做出的“不真诚的意图”是不正确的。中国的民族利益驱使其领导人趋向我们,尽管他们都很自负。

我认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中国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的趋势必须得到支持并被我们所利用,因为这种趋势对我们有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利,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有利。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形成了新的局势,并出现了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新的趋势。这使我们处于主动的地位,还使中国方面不致丧失许多威信。尽管中国人把苏共领导层的变更看作是赫鲁晓夫政策的破产造成的后果,尽管他们看起来将会企图对我们施加政治上的压力,或许会在一些具体的舞台上提出各类“最后通牒”,但是,他们未必愿意主动采取措施使苏中关系更加恶化,因为他们明白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毫无前途的。

但是我认为,新的局势使得我们必须在对外政策中改变对中国的策略,其中包括转而采取一些不致使中国疏远我们的方法,使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我们。以前的策略、方法和方式未必能达到这一点。在此方面,为达到这一目的,希望能够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采取一些措施,以便逐步加强中国同我们的联系,不必匆忙,不必一蹴而就,要沉着

冷静，考虑到各种“支持”和“反对”，要考虑到尊严，循序渐进，以便不引起我们朋友的不安，但同时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迅速采取行动，不把扩大这种关系的主动权转到中国人手中。看起来，在这一工作中，在开始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把在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同苏共和中共关系的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区分开来。因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

我完全赞成最近我们的所有发言以及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方面所做的工作，此外，我还想谈论一些关于我们可以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我认为，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在党的关系方面：

1. 尽力使目前的状况稳定和巩固下来，也就是事实上双方都停止公开的论战，使两党关系转入秘密谈判阶段。在这一问题上，在此阶段希望我们的报刊不要发表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批评的材料，也不要发表关于兄弟党进行的这样的批评的材料，因为这会带来再次爆发公开论战，使局势的发展陷入以前的轨道的危险。

2. 因为停止公开的论战本身并不能导致现有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最好应当做好今后进行谈判和同中国的错误作斗争的准备，应当对导致分歧的每一个问题的原因再次进行仔细研究，再次客观而毫无成见地对中共和中国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采取的内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和内容进行研究。在这一工作中应当着重指出中国发展中及其对外政策中反对帝国主义方向中的一些总的、积极的因素。这些总的和主要的方向应当被看作是苏共和中共团结的基础，在苏共和中共代表进行会见后制定的共同宣言和联合公报中可以以相应的条款记录下来。

同时，最好对中国对外政策中固有的民族主义的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些特点)，以便在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对外政策路线的时候正确地考虑到这些特点。还应当明确地确定中国领导人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并对其予以研究(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根本上同大多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是有分歧的)，并对其继续从原则上给予这种趋势和不良倾向进行严厉的批评，在有针对性地对其予以沉痛的打击的同时，在这些问题上未必要牵扯到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对内政策。

3. 当然，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应当继续同那些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尖锐批评的兄弟党领导人一起开展工作，或许，在短短的时间内难以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改变他们的策略和斗争形式。毫无疑问，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表现出最大的谨慎，采取一定的策略，以便不使我们的朋友们为难，不使他们脱离我们，但同时不使他们陷入关于同中国打交道的形式的这些问题中。

4.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像以前一样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来解决争论以及一些成熟的国际问题，并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应当强调，现在各国共产党团结的基础应当是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这些都

是集体制定和签署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只有通过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来增加或者修改。

5. 同时,考虑到中国人在关于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日期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呢?是否应该同其他的兄弟党进行磋商,把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后一段时间呢?为了我们的利益,是否应当让关于起草委员会召开的时间这一问题产生阻碍作用呢?使我们失去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机会,失去同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联系的机会呢?或许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共产党追随他们,由于中国人的自负,或许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这些党的破裂。

6.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试图再次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础,在苏共和中共代表再次举行的双边会谈的过程中团结中国共产党呢?而随后在这些谈判没有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在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及追随中共的其他党的情况下来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和共产党国际会议呢?

我谈论的这些都只是为了提出问题,因为中央当然会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在国家关系方面:

非常可能的是,在新形势下中国方面可能愿意扩大苏中贸易、经济、文化和科技合作,在这些方面中国很感兴趣。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来促进这种合作,扩展在此方面与我们有利的联系。

1. 在此方面现在应该就如下一些问题拟定一些建议:我们可以向中国供应什么样的工业设备和零件,还应当向中国方面征询他们的需求。

2. 在科技合作领域中国方面以前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供应设备和物资的请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到了我们的搁置,或许应当满足其中的一些请求。

3. 如果中国方面感兴趣的话,或许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再次声明说,我们愿意向中国派遣技术专家。

4. 我认为,今后应当希望再次审议关于向中国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共同建设从伊尔库茨克地区经由中国东北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输油管道(这也是使中国在经济上依赖我们的一种手段)。而这也可以保障我们在太平洋沿岸向日本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输出石油。通过中国领土建设这一输油管道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更不用说这还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理由,向中国派遣我们的专家。

5. 由于我们希望中国“依赖”于我国强大的经济,希望加强我们对中国的影响,一旦苏中经济关系正常化,看起来,应当对关于接受中国加入经互会的问题进行研究,或者确切地说就是对关于大力扩大经互会的市场问题进行研究。大家都知道,在最近中国人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件中提出来关于扩大经互会的建议。这给了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

6. 我认为,由我们主动提出关于帮助中国加强其国防能力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建议非常重要。当然,只有在中国人同意同我们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下才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在此方面对中国提供帮助可以成为加强苏联同中国联盟关系的基础,还可以使中

国人民解放军在工业技术上“依赖”我们。此外，我认为，应当认为中国未来必定会在所谓的“新技术”领域取得进步，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在对外政策领域：

毫无疑问，应当特别注意关于恢复关系的问题，如果不能恢复团结的话，至少苏联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这种协调行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我们的对外活动不仅会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力反对，而且中国也会发表一些言论和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加以反对，而或许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追随他们。

1. 在这一问题上应当把苏联和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些共同的原则和目标区分出来，并在一次或几次政府的联合声明中巩固下来，这可以成为在国际舞台上采取共同行动的基础。比如，为和平和防止世界大战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特别是反对美国的侵略冒险政策，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完全禁止原子武器而斗争，以及在关于现代国际局势的一些问题上——德国问题、越南局势问题、老挝问题、刚果问题、古巴的安全保障问题、在马来亚问题上的立场等。

2. 应当在我们的报刊上开始阐述(要考虑到相关性)中国政府的一些对外政策活动，这些活动应该对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总的对外政策路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还应全文或者以节录的形式发表中国政府的一些声明，或者中共领导人就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发表的声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些主要文件中国方面都是全文发表的)。

3. 在一定的阶段应当表现出我们的报刊对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提出的一些建议的支持，这些建议对于维护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应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当基本符合我国的对外政策路线。比如，我认为，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完全禁止原子武器的提议可以一般地表示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强调，我们早就提出了这一建议，并且从来都没有收回这一建议。

由于中国爆炸原子弹已经完全是一个事实，我认为，为了我们的利益应当主动表现出愿意帮助中国进入所谓的“核大国”行列，尽管徒有其名。在就这一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些一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核大国”参加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共同的为实现完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

4. 可以再次尝试通过磋商，同中国协调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总路线。我认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比在其他问题上能够更加容易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同时，看起来在印度支那地区上美国最近更加可能进行挑衅，推动我们同中国在此共同行动(美国在老挝问题上积极采取的军事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更加积极地支持在此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在我们的报刊上开展广泛的运动，制止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干涉。我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拒绝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斗争，不应该放弃担任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角色。放弃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还会被美国用来破坏日内瓦协议，该协议

总的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束缚了帝国主义者。

5. 或许应当审议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延期批准在最近召开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对联合国宪章进行变更的问题，利用这一问题通过亚非国家对美国及其追随者施加压力，以便尽快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宣布说，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为扩大他们在联合国这一组织的代表权而进行的正当的斗争，但是不能批准有违联合国宪章的修改，直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权利。

6. 最好我们还能够主动向中国人提出关于停止在各类国际会议的发言中相互进行批评的问题，以后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应当努力事先进行协调，确定共同的发言的方针。

有理由认为，所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会导致中国以及倾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支持我们其他的对外政策措施，或者至少不会努力破坏这些对外政策措施。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偏离我们的总路线，可以逐步贯彻这一路线，同时能够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对外政策活动"纳入"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中，并以此加强斗争的主要方向。

无疑，今后的实践活动会提出许多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来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改善这种关系。毫无疑问，中央会更加清楚，在此方面应当在什么样的时间内、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循序渐进地采取这些措施。

当然，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和加强这种关系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需要付诸巨大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

看起来，这一过程最初会遭遇到中国旧的保守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抵制，他们最近鼓吹反苏宣传，设置一些障碍，而一旦同苏联改善了关系，他们将会被迫退后。同时，我们在苏中恢复关系方面采取主动还可以对中国的健康力量提供帮助，使他们压倒民族主义者。

一些同我们友好的国家和党试图继续积极地同中共展开公开论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阻碍因素，看起来必须对他们开展工作。使他们转而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方法，同中国的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作斗争或许需要一些时间。

同时，我认为，采取新的对华工作方法中的一个客观上的困难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部分从事中国问题的工作人员出于惯性对中国采取消极的态度，不信任中国，不能明了加强苏中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采取以前的方法对待这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苏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将意味着他们以前的看法和结论得到了证明：我们同中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我认为，不相信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可能性会使一些同志出现一种趋势，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遵循以前的准则和判断，不由自主地寻找论据来证明这些判断，以中央提出的必须"警觉"，"提高警惕"为借口，以反对中国人的"虚伪和狡诈"为借口，夸大和鼓吹现有的一些消极因素和事实，而不顾其一般的联系，然后他们会以此不由自主地妨碍我们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苏中合作，阻碍利用一些新的机会。

遗憾的是，我认为，现在在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上就存在这类现象，他们受以前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影响太深了。受这种工作方法的影响，他们难以看到一些新的现象，难以看到苏中恢复合作的可能性和前景，难以随后促进这种合作的实现。

或许，我们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在这种工作方法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教育工作中，一旦明白并揭露了中共领导人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看起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就会不由自主地形成一种总的对中国人感到厌恶的情感，因此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一条足够明确的界限——中共领导人行动的界限在哪里？中国人民的界限在哪里？在这一问题上值得深思，为什么在我们的集体中会发生类似扎哈罗夫(贸易代表处的科员)同志的行为？他在今年10月25日在喝了一点酒之后，先是试图用手枪，后来用猎刀刺向了一名中国警卫。这是不是深深地表现了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呢？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应当好好地考虑一下，可以让一些同志暂时脱离涉及苏中关系方面的工作，而在随后，如果可以的话，当他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再返回这一工作领域。

我认为，这些同志，其中也包括契尔沃年科大使，在我们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情况下，他看起来也非常难以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我认为，即使在最近一段时间，即使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体会议之后，他仍然在极力强调和证明说，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没有任何新的变化，"一切仍然照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工作形式。这种想法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大使馆的工作产生影响。他对大使馆对外工作方面的态度也是这样。

同时，老实说，对于任命Ф. В. 莫丘利斯基同志为大使馆的顾问令我感到吃惊，该同志从今年6月份到大使馆工作。

当然，在此谈论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中央是英明的，将会明白，这是否正确。

最后想就我们对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工作的形式和采取的策略谈论一些总的想法。

现在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并且这一体系正在不断发展，在这一体系中的各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利益，这些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这种民族利益和民族特点经常会赋予对外政策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使对外政策转化成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是有害的形式。

当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还不成熟的时候，它们自然被迫在政治和经济上会更多地依赖我们。但是，随着它们的发展和巩固，它们这些国家会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它们特殊的民族利益会对它们的对外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尽管这些都是一般自发的趋势，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在国际领域协调总路线变得更为困难，而这些总路线是完全能够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的。这首先会使我国的外交活动变得更为复杂，而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先锋作用是得到了承认的。大家都还承认，苏联的政策和行动同坚如磐石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统一的有机体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事实上，为了使我们能够起到先锋作用，看起来就必须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集中并融合进我们的政策中，把它们汇聚为统一的总路线和统一的行动，尽管有时候这些政策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一任务使得我们这一先锋国家担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不干涉某一社会主义国家

的国内政策，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善于找到并强调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的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善于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特点及其对外政策，在现阶段消除这些情况是不现实的。无疑，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考虑到，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对外政策的手段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们的对外政治联系的状况，比如在联合国的地位等)。

当然，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太强大，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也不大的时候，相对容易达成协议，而随后它们完全会失去先锋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但是当它们同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国际地位的特点及其对外政策就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以致它们经常会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不同于我们的政策，更何况这些特点被作为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和激进的观点和行动被予以强调和鼓吹。

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一国的大小及其对外政策的特点，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耐心地选择一条共同的、协调一致的立场，如果不能一下子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一具体的问题就应当暂时被搁置起来。

这意味着必须不断地加强协调，把每一个国家的政策纳入共同的总路线中，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状况和特点，通过定期地交换意见和进行协商，尽可能避免采取那些尽管总的来说是共同的和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不适合某一个或某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措施，这些措施随后仍然会是准备不充分的，从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还不是成熟的措施。

在这一问题上，看起来有必要成立一个合作组织，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组织各种“劳动分工”，该组织的任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对外政策上进行“乐队扮演和演出”，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外政策的“工具”，并演奏它所拥有的乐器，由于它们被统一指挥，那么就会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的。

在新的局势下，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工作形式相对简单，比如向一些共产党中央及其政府通报我们采取的一些行动的意图(也即是说，这只是我们行动的一个例子，需要注意的是，它会被其他所有的国家效仿)，在我看来，这些做得都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制定总的路线的立场的方法，其途径就是事先就我们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和措施进行协调，事先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交换意见，要强调它们的平等地位，以便随后在仔细地考虑到它们的意见和想法的基础上就实施该项行动或者发表的声明的方法、策略途径和方式问题通过最终的决议，以便不损害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看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站在同一阵线并采取共同行动。在整个问题上，我认为与其做得慢一点，不如做得漂亮一些，以便我们采取的每一项对外政策措施都能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当然，这需要我们在外交上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我国驻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代表都更加积极地展开工作，或许，苏联外交部领导人需要更加经常地到相关国家进行访问，来协调

出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的途径，它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出现新的分歧，避免使事态复杂，它无疑首先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这不仅不会束缚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动性，反而会保障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坚定地采取统一的行动。苏共和苏联的先锋作用决定提出对外政策的主动权将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

是否会出现如下问题：根据上述所述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总路线是否会过多地束缚我们自己的行动，丧失我们的先锋作用？不，这是不可能的。苏共和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在国际共运中的先锋作用是由一些不可遏制的客观因素决定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它已经积累了最为丰富的经验，现在正在指引其他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苏联是国土最大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正在以高速度继续向前发展，在马列主义理论上也不断向前发展。苏联和苏共在所有这些领域都起着领导作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赶上。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无论是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或是在国际安全方面，我国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威望。

所有这些客观因素都是苏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其他共产党中发挥先锋作用的客观基础。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在我们的正确政策下中国领导人会危及我们的先锋作用。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主观上有发挥先锋作用的意图，但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现在没有，或许将来也不会拥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来发挥像我们国家所发挥的那种先锋作用，中国既没有发达的工业，也没有在整体上发达的经济，没有像苏联所拥有的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反，中国过去犯了许多错误，得到了许多教训，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失败，这是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忘记的。

因此，苏共和苏联完全可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先锋作用。而且，我认为，在现在这一时刻我们必须全力充分利用各个机会，以便达到如下这一伟大的目标：恢复和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的团结和共同行动，这要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基础，而事实上，这当然是以我们的总路线为基础。

在该信件中我难以更加具体和详细地阐述我的一些想法。或许，并非所有的想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认为其中的一些想法是值得关注的，并且需要澄清的话，我愿意另外进行解释，另外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谢尔盖耶夫

1955年入党，哲学副博士

1964年11月16日

ГАРФ, ф. 10026, оп. 4, д. 2870, л. 83-114

№2077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与兄弟党会谈的结果

（1964 年 11 月 16 日）

……①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同志们，在现任中央委员会 168 名委员中共有 146 名出席了本次中央全会。其余未到会的委员都有正当的理由：出差、生病等。149 位中央候补委员中到会的有 137 人，监察委员会委员到会的有 54 人。

那么，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宣布本次全会开幕。有人反对吗？

表决：没有。

……

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报告：对于同一些兄弟党谈判和磋商的总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0 月全体会议决议的国际反响；兄弟党请求苏共中央对 10 月全体会议决议更加详细的解释，苏共中央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同兄弟党进行了谈判。讨论同兄弟党之间产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挑起的中苏争论的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建议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支持中共中央的建议。勃列日涅夫认为他们有责任利用一切机会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除阿尔巴尼亚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参加了十月革命胜利 47 周年纪念活动。

关于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

……

波德戈尔内：同志们，下面进行下一个问题——关于 11 月在莫斯科(我们)与一些兄弟党派谈判和协商的结果。

发言的是勃列日涅夫同志。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苏共中央全会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通报关于在苏共 10 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与一系列兄弟党派之间进行的谈判和协商情况。

在 10 月中央全会上我们讨论的当然都是我们党内的问题。不过，由于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具有的重大国际意义，因而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密切关注的焦点。

一些反动政治集团和资产阶级报刊也不遗余力地歪曲苏共 10 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含义，企图在群众中散布各种的谣言，即似乎苏共由于解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职务而随即也改变

① 此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了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全会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使一些外国人迷失了方向。在那一段日子里，从个别兄弟党领导人的言论中我们甚至已感了些许担心和不安。

针对这一情况，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以及苏联报刊均作了相应的解释，以表明苏共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列宁主义方针，忠诚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党的路线以及我们党的纲领。我们所作的这些解释性说明得到了所有进步人士和社会舆论的热烈欢迎。而所有坚持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立场的马列主义政党也对我们表示拥护。苏共中央通过秘密方式向各兄弟党通报了10月中央全会的相关决议，以帮助其正确地评价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一些兄弟党还要求我们提供关于全会结果的补充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请求，并在莫斯科接待了澳大利亚、英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我们还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和泽登巴尔[①]同志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我们应当与其他社会国家兄弟党举行会谈。我们还讨论了关于如何向中共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领导人通报10月中央全会情况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间，中共领导人在共产党运动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近期，这场辩论已变得完全公开化了，并经常采取的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方式。该辩论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我们党与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国兄弟党的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思考了关于与这些党的领导人接触的可能性问题，以便相互讨论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十月革命节前夕，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并建议派一个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庆典。

在向我国大使通报上述建议的同时，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想借此与苏共领导人建立联系。"我们接受了中方的这一建议。中方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即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此期间，除了南斯拉夫外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都前往莫斯科。而针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除了南斯拉夫"，这是否是中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中国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说，这只应看作是中方给苏方的一个建议。

我们认为，利用一切可能来谋求中共与苏共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以及改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友好合作的环境，这是我们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一初衷，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事先与相关国家的兄弟党进行了协商之后，决定邀请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来莫斯科。我们给阿尔巴尼亚发出的邀请是通过对外友好协会的渠道进行的。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的，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派来了自己的代表团。我们还考虑应当同时邀请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来访。

---

① 尤·泽登巴尔，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译注

在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谈的过程中,我们涉及了广泛的问题。但双边协商和谈判的核心问题主要是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及召集各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

下面我们简要地谈谈这些问题。

一系列会谈情况表明,各兄弟党代表完全支持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称赞我们党的列宁主义路线。

许多外国共产党组织表示要坚定地、无条件地与这些决议保持一致。许多共产党在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祝辞中均表示支持10月中央全会决议。

与此同时这些会谈也证明,个别共产党领导人依然对免除赫鲁晓夫同志职务的问题抱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意大利共产党所坚持的立场。在称赞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同时,该党领导人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理由是意大利同志们对这些决议的性质及其通报的方式感到意外。

持上述类似观点的还有英国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

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在会谈期间极力向各兄弟党代表作了解释,即一些兄弟党的观点并不符合苏联国内现有的实际情况,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是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模式的真正体现。通过这些会谈我们解决了与兄弟党之间所存在的许多问题,虽然仍存在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观点上的差异。但最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各兄弟党的同志们都极力强调,在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观点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妨碍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友好团结关系。

总体而言,我们与来访的各代表团所举行的会面和会谈是非常有益的。通过这些会谈,使我们有机会向朋友们解释一系列与10月中央全会相关的问题,并与其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一些问题。

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和几个月以前已协商过的准备于12月15日开始工作的编辑委员会等问题,在我们与各兄弟党的谈判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越南和朝鲜等共产党对该国际会议和委员会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跟从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尼亚同志仍与上述党派联合起来,并声称只有在全体与会者都同意的情况下编辑委员会才可以开始工作。英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认为,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他们并不拒绝在召集时参与会议和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正如大家都看到的,情况是相当复杂。已有61个党表示应召集此次国际会议,而在26个党中已有19个决定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至于一些代表团是否赞成将编辑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日期定于12月15日,这倒不是什么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主席团认为,这个问题仍需要与各兄弟党进行研究和商议,并最终确定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期限。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关于我们与中共代表的谈判情况。

同志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收到了中共关于派遣代表团来莫斯科的建议之后,鉴于

该问题的重要性，中央主席团便立刻向中央委员们作了通报。从通报中大家都已知道，我们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在我们两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建议。当然，我们很清楚，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建议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这样的打算，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继续制造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事件。

我们已了解到，中共领导人把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看作是自己在这场思想论战中所赢得的胜利，从而能够将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给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派。

就在不久前，中国召集了一系列会议，期间他们宣称，“赫鲁晓夫下台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胜利，是反对‘当代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中国报刊转载了艾地同志的发言内容，即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新的相互接近的道路上仍存在着“困难和阻碍，这都是因为苏共在自己的活动中依然继续坚持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艾地认为，对我们党的大会决议应当重新加以研究。

尽管存在着上述这些情况，苏共中央主席团仍认为有必要利用这次与中共接触的机会，来了解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是否已准备采取一些最起码的实际步骤，以促进苏中关系的正常化。

中央主席团认为，我们自己应当坚决强调，我们党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苏共历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苏共党纲和莫斯科历次会议文件。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建议中国代表团采取一些旨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设性步骤，并就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问题交换意见。

我们认为，利用这次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机会将有益于我们向其提出如下建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停止反对兄弟党的宣传活动，放弃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

另外，我们还打算建议中国领导人，以便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以促进苏中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

我们的确是带着良好的意愿来进行这些谈判的，并极力使谈判进程走上建设性的轨道。

我们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于11月8日开始，并在11月9日、11日和12日继续进行。

其中一些会谈常常是连续进行7个小时以上，会谈的内容既复杂又沉重，根本无法用速记的方式来记录。

会议伊始，情况就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谈判将是复杂而沉重的。中国代表试图利用当前形势对我们施压。他们对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反应积极并强调，这些决议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但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又极力证明，目前还没有出现有利于改善苏中两国关系的新的条件，因为苏共依然维持自己的总路线不变。他们甚至宣称，不可能将中共的正确路线与苏共的错误路线相提并论。

会谈期间，我方代表团始终以平静而坚定的态度向中共代表解释，苏共行动纲领和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反映的并非是某个人的个人观点，而是代表了我们全党的意志。我们提请中国同志注意，我们代表团并没有在谈判期间向中方提出重新审视中共领导人路线的问题，虽

然对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均持不同见解。

我们声明,如果每个代表团都要求其他党重新研究自己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必将走入死胡同,而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在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当总往后看,而应当着眼于未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存在分歧的条件下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下基础。至于那些涉及原则性的有争议问题,我们认为,双方都应当努力创造条件,留出足够的时间和创造更多的一起工作的机会,以便能够通过正常的、平心静气的方式来讨论这些已产生的分歧。

我们建议中共停止公开论战,并参加各兄弟党国际会议和编辑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我们还建议中国代表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如苏共和中共应采取哪些共同举措以巩固反帝阵线。

讨论这些问题占用了我们谈判的许多时间。我们代表团极力以各种方式建议停止论战和召集编辑委员会会议,并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正常化和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应当说,中国同志,尤其是在谈判初期总是极力回避讨论我们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而当涉及苏共中央将坚持自己的总路线不变的问题时,他们表示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甚至还说,如果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方针和维持自己的党纲,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停止斗争。

应当说,同志们,我们并不害怕论战。我们的马列主义立场是强大的,而且得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的拥护。我们认为,公开的论战,尤其是采取那些近一段时期所表现出的那样的论战方式,只能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危害。也正是因此,苏共中央才建议停止公开论战。

在表示不愿意讨论加强反帝战线团结的具体措施的同时,中国代表身上还相当明确地反映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共领导人依然极力阻止我们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这在苏联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与我们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甚至说,中共和苏共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直接取决于苏联是否仍继续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关键要看,苏方提出这一问题的语气和性质如何。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同志甚至指责柯西金同志的如下行为,即在 11 月 7 日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后者竟然走近美国大使并与之交谈。康生宣称,“当柯西金同志以友好的姿态走近美国大使时,我都感到脸红。他(柯西金)对待帝国主义分子的态度表明,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具有两面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对康生同志作了通情达理的解释,即这不过只是约定俗成的外交礼仪罢了,任何一个政府首脑都会这样做的,其中包括周恩来同志本人在内。我这里提及这件事的目的在于,这个细小的插曲直观地说明了中国同志所坚持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性质。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苏联肩负着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责任。我们国家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而这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体现在实

际行动中。可是，当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建议中国代表讨论关于在反帝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时，他们却拒绝了我们的建议。

我有些跑题了，请不要把这些话记入速记记录……（勃列日涅夫同志脱离报告讲稿所说的那些话没有被记入速记记录。）

关于召集编辑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也在谈判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同志坚决地声明，中共将不参加已计划于12月15日召集的该委员会的工作。康生宣称，“如果你们想要讨论问题，而同时又想把12月15日举行的编辑委员会与前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中国代表团的这些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中明显透露出神经质。从谈判的过程中可看出，他们也清楚，拒绝与兄弟党采取共同行动可能会置自己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在坚持必须召集会议的同时，我们代表团也作了耐心的解释工作。我们对他们说，关于召集这次委员会会议以及随后的各兄弟党国际会议等决定代表了61个党的意愿。我们强调，召集会议的日期并不是非要定在12月15日不可，如果中共原则上同意参加会议，并愿意与各兄弟党共同致力解决所存在的分歧，那么关于召集委员会会议的具体日期、人员构成、名称和工作方式等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以便使包括中国同志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我们打算，今后在解决编辑委员会的相关问题时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以便使包括中共在内的尽可能多的兄弟党都能够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参加会议和共同致力于反帝斗争的建议是不可以被简单地拒绝的，因为这将置中共领导人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与我们会谈期间，中国代表极力使用各种借口以使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

我们代表团始终采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论据充分地提出其他建设性建议，应当说，最终，中国同志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对我们说出了实情，即他们无权进行谈判。他们宣称，“我们的使命在于，建立与苏共的关系和研究目前的形势”。这一正式声明是由周恩来同志做出的。

在谈判的最后，中共代表们也开始采用比较平静的语气了。这尤其表现在11月12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在接受了我们根据其要求所提供的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相关资料之后，中国代表承诺，中共将会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保密。对此，周恩来同志指出，相互信任——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苏共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谈中提出了如下建议——只要中方做好了准备，就可以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代表之间的高级会谈，以便双方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一步步地使事情向好的方面推进，从而恢复我们之间的互信，加强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此类会谈的地点既可以在莫斯科，也可以在北京，既可以采取采用公开的方式，也可以是秘密的方式。

我们还说，苏共中央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为了赢得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和反帝革命力量都团结

起来。

周恩来同志答复道,他将会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一建议。他还补充说,“我们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营造新的环境和谋求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说,尽管我们与中共的首脑接触和讨论的情况复杂,但这些会谈毕竟是有好处的。通过这些接触之后,中国领导人完全可能进一步看清当前的形势。他们一直在试探我们是否仍会坚定地捍卫苏共的原则性路线。至于其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目前仍难以预测。但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共领导人会放弃自己的一些幻想,并以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利用苏共10月中央全会所营造的客观前提条件来促进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在与中共争论中,苏共所坚持的原则性路线依然是正确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自己的一些尤其是涉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言论中,说了许多欠考虑的、即兴创作式的不成熟的话,而这些话均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同意。

(赫鲁晓夫同志的)此类声明以及针对一些国家领导人所发表的污辱性言论,违背了我们党的原则,给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造成了损害,从而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担忧。我们认为,10月中央全会已结束了这种情况。

同志们!

看来,我们今后仍将继续执行灵活的政策,坚持走通过党和国家渠道与中国接触的路线。如果中方要重新激化论战——我们不能排除这一情况,那么我们将会以自信和平静对话的方式来应对,而不是谩骂。

与此同时,我们仍将坚决地捍卫我们党的原则性立场。

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我们将尽最大可能以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团结。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中共将会与其他兄弟党一道前进。在指出这一发展前景的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不要使这成为双方矛盾激化的理由。而做到这一点就会在任何情况下巩固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央主席团和秘书处在与各兄弟党代表的会谈和谈判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今,我们已完全清楚地看到,这项工作既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党和人民完全赞成10月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而这些决议也得到了我们国外友人的理解。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所存在的那些困难视而不见。

我们不能忘记敌人们正在极力利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此,我们今后仍将继续坚持斗争,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和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政治和国防力量。我们知道,此举不仅对我们国家,而且对整个世界均具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必须继续提高全体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以确保我们党坚不可摧的统一和队伍的团结,加强党和国家的纪律,在落实我们党纲所提出总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掌声)

波德戈尔内：同志们，我们是否需要对以上报告展开讨论？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不必了。

波德戈尔内：有人想发言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没有。

波德戈尔内：那么，同志们，如果大家允许的话，这里有这样一个提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听取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与一些兄弟党谈判和协商的结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通过相应决议，以表示赞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与各兄弟党代表团谈判期间所做的工作。

从会议厅传来许多声音：正确。(掌声)

波德戈尔内：大家接受上述提案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接受。

波德戈尔内：有必要表决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不必。

波德戈尔内：有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地方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没有。

波德戈尔内：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一决议正式表决吧。赞成我所读提案(决议草案)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有人弃权吗？一致通过。

勃列日涅夫：对此我还想说几句。我们在对外通报中央全会的情况时，将不提及关于勃列日涅夫曾作过报告。因为这没有必要。这是其一。我想，大家都会对此表示同意的。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是的。

勃列日涅夫：其二，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尤其是根据我们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我们再次提请大家，当然这里既包括你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今后针对所有问题都要最严格地遵守我们党的相关规定，因为这些都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们的财富。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即提请大家注意，并希望你们也相互提醒并引起注意。因为就曾发生这样的事，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因为遗憾的是，就曾发生过此类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实，我们还未来得及)讨论的一个不需要国内，尤其是外部(不相干的外人)知道的重要问题，却在次日由“路透社”公布了所发生的一切。要知道，这种情况有时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的(给我们造成不小的)困难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并相信今后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制度(我相信，作为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我们一定会严守党的秘密，尤其是当中央正在强调不要泄露某个问题的重要性的时候)。尤其是当中央刚刚强调了这方面问题之后，大家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不向任何人泄密。

表决：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想，我们这样做是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受了委屈的。

表决：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们提交给本次中央全会的问题到此结束。如果同志们对本次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没有意见,也没有其他特别声明,那么全会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同志们！谁对苏共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有什么声明或特别声明吗?

表决：没有。

勃列日涅夫：那么请允许我宣布,全会工作到此结束。

РГАНИ,ф. 2,оп. 1,д. 762,л. 1 - 133